

■ 南开史学家论丛 ■

陈志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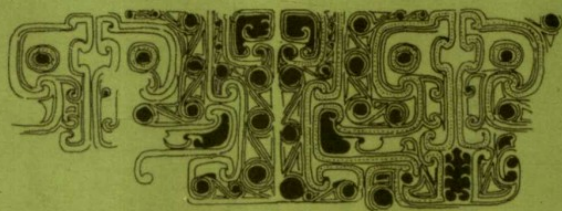
巴尔干古代史

范青璜



中华书局

南开史学家论丛



ISBN 978-7-101-05428-6



9 787101 054286 >

定价：38.00元

南开史学家论丛

陈志强◎著

巴尔干古代史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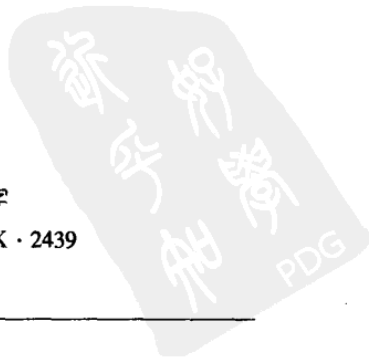
巴尔干古代史/陈志强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南开史学家论丛. 第3辑)

ISBN 978 - 7 - 101 - 05428 - 6

I. 巴… II. 陈… III. 巴尔干半岛 - 古代史
IV. K5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9068 号

-
- 书 名** 巴尔干古代史
著 者 陈志强
丛 书 名 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三辑)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4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428 - 6/K · 2439
定 价 38.00 元
-





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教授，1982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94年博士毕业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获历史考古学博士学位，1995年晋升为南开大学教授，现任历史学院副院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近年来，曾作为高级研究员赴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希腊雅典大学、亚里士多德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从事科研和讲学。长期致力于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对欧洲古代中世纪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也有相当研究，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社科项目，出版《拜占廷帝国史》、《拜占廷学研究》、《拜占廷文化》等著作8部，《拜占廷国家史》和《剑桥插图中世纪史》等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学报》、《世界历史》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是我国拜占廷学首席专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SS004)”
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01JB770002)”成果

南开史学家论丛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敦书 白志良 冯尔康 刘泽华 范 曾
李治安 李剑鸣 陈振江 陈志强 张国刚

主 编 刘泽华

副主编 李治安(常务) 陈志强

总 序

南开历史系创建于1923年,但前三十年历史系在南开是兼尔小科,有时只有一两人维系,不绝若缕。进入50年代开始了迅速发展,到今天已发展为南开的“四大支柱”学科(化学、数学、经济、历史,这是校方的提法),也是全国的史学重镇。这一变化的标志要从1987年全国评定重点学科说起。那年首次评定重点学科,南开全校共获得12个,而不足百人的历史系竟有三个。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名声大噪,人们刮目相待。一些人评论:历史系向来不显山不显水,原来水有潜龙,山有卧虎!近几年由教育部主持的全国一级学科评比中,南开历史学科居全国第二位,与北大相邻。重点学科重评后依然保持三个,其中中国古代史竟跃居首位。这一势态无疑为同行瞩目。出现这样局面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有大局和小局因素等等。大局是共同的,这里省略,只说小局,而且主要说1987年以前的情况。

说起来,我们既无“天时”之利,也无“地利”之便,剩下的只有“人和”一项。孟子说的“人和”就是称意的“人治”。就南开历史系以往的发展史而言,也只能从“人治”的角度去分析。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自身的有效发展。从制度上难于找到成因,而历史系又是著名的穷系,别的不说,一个教研室都分不到一间办公室,有一个时期系主任都没有一间办公室。因此“人治”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多次说过,历史系有今日之显赫,我们不要忘记学术带头人,尤其不要忘记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

几位多年的老领导。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这几位先生也多次跌宕起伏,但他们四位一直居于系领导中心。郑天挺、吴廷璆是党外的民主人士(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共),杨生茂、魏宏运先生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杨生茂、郑天挺、吴廷璆交替任系主任或副主任,魏宏运则是“党代表”,到文革后期和80年代前期则继任系主任。他们之间的组合可以说是一种奇遇,配合的也很默契,像个“不倒翁”,在外力的冲击下不免左右摇摆,但他们有一个重心是不变的,这就是他们实行的“中左路线”。所谓“中左路线”,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政治上“跟而不紧”,不搞新花样,近似庄子的“应帝王”;二是有机会就抓业务。郑天挺先生、雷海宗先生、吴廷璆先生是大专家,不用多说,他们在业务上起着样板和指导作用。但他们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这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安排。因此杨生茂和魏宏运无疑就成为关键人物。杨生茂先生已年届人瑞,而他从来就是一团瑞气:忠厚、虔诚、精深、宽容、执着集于一身。他至今依然是一位执着的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不要求一统;凡事以身作则,但不要求“达人”;学术上孜孜以求,执牛耳于一方,但决不傲人,对同事和后进一贯尊重有加。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杨生茂曾是我的领导(在一起编写教材),他从来不会说让我们如何办,但我们都听从他的,他是靠身体力行来领导的!时至今日,学术界已相当多元化,但对杨生茂先生的人品与学品几乎无不翘首起敬。魏先生作为“党代表”更是处在风头浪尖。在那个“左”的时期,他也不能全离开“左”,但只要有一点机会和空间他一定是“偏右”的,并依靠专家推进教学与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这几位先生狠抓教材建设,这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学术事业,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诸先生的几本中国古代断代史相继出版,雷海宗先生的《世界中古史》也交出版社,后因被划为“右派”而终止。其他先生也都有相应的讲义印

发给同学。师辈们的努力为南开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风云突变，一场急风暴雨也席卷南开，雷海宗被康生点名定为大右派。说起来有点蹊跷，这位大“右派”摘帽很早。随后又给他配备了助手，进行专业“抢救”，1961年又被请上了讲台。魏宏运先生在这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杨志玖先生因为雷先生辩护遭到大报署名文章的批判，如果在其他单位难逃“右派”的厄运，但由于魏先生再三说服有关人员，使杨先生免遭一劫。杨志玖先生多次同我说起，没有魏先生的庇护，后果不堪设想，别的不说，一家七口（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夫人为家庭主妇）不知如何生活下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王玉哲先生一向不问政治，不知从哪来了一股激情，在讲授中国上古史时竟兴致勃勃地宣扬铁托在普拉的演说，这不能不招来批判。由于杨志玖先生得到庇护，王先生也就较平稳地过了关。如果真的把杨志玖先生、王玉哲先生划为“右派”，我敢说，南开中国古代史后来就不可能被评为重点学科。另外还有几位颇有才学的先生，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原单位都视为“包袱”，魏先生和杨生茂先生竟请来在历史系安家落户。那个时期不少系揪出过这种“集团”，那种“俱乐部”，相比之下，历史系却风平浪低。魏宏运先生、杨生茂先生总是谆谆告诫年轻人：有时间多读书！魏先生常以郑先生为例说，郑先生白天忙于公务不能读书（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夜间、假日要补回来，要向郑先生学习。新一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魏先生还热情地要青年向沈元学习（沈元，一位学历史的少年“右派”，在家励志苦读，写出了出色的学术文章）。这个班子还商定，要每个青年教师订出进修计划，并指定导师负责，定期检查和汇报，有点像现在的在职研究生。凡此种种，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革命者”都要批魏先生的“右”。1959年差一点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处于半倒状态，被“挂起来”。“文革”乍起即

把魏先生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这无疑是很合乎当时的政治逻辑的。但在历史系一群中,魏先生的革命资历比较长,又没有“历史问题”,出身“贫农”,他的言行多半属于重业务、依靠专家之类,也说不上什么大的政治问题,即使一时被打倒,到落实政策时又能勉强站起来。“文革”中期结合干部时,还只能是他,并且继任系主任。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他“痼疾”依旧,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大家编写教材,把多数人又引入“业务”之中,成就了“文革”后的一批教授。

在这篇序中我讲这些干什么?我是要说明,没有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几位组合成的“中左路线”,就没有“人和”,就没有相对平静的读书环境,就没有学术气氛,就难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梯队,我也敢断言,也不会有三个重点学科的降临。有人说,还是“左”了一点,或许是这样。但有一个事实:魏先生几次是因“右”而倒台。再“右”一点会如何,谁来“右”?有道是:“人生恨水长东”!

对评定重点学科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论,但我认为这总是一个重要的整体性学术水平标志,南开历史学科一下子能有三个重点学科真是不容易呀!有了重点学科为南开历史学科进一步发展带来机遇。因为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向重点学科倾斜,其后这个“项目”、那个“工程”以及什么“基地”、“中心”等等,都与有否重点学科有密切的关联。自从有了重点学科,南开历史学科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科研与教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我在这里说重点学科也有另一层意思,它与“南开史学家论丛”人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第一辑收入的作者都是我们的师辈,多数又是首次申请重点学科的带头人。这里要说明一点,吴廷璆先生无疑是“第一辑”中的首选。但当具体编辑时,得知吴先生的文集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再选入

本论丛,就会发生版权冲突,无奈,只能暂付阙如,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收入。

编辑第二辑时,人选难于确定,进退维谷。多种因素制约又不能敞开编选,于是找了一个省事的办法,在难于处理的地方,以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为限。

第三辑入选者对象是新一代学者。这一代人都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应该说也都得益于重点学科提供的条件。这一代人才济济,我没有能力一一准确评价和排座位,于是采取了更简化的办法,凡在新一轮重点学科申请中任学术带头人的都收入。这就是本编的六位同志。这个办法易于操作,但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遗憾。只能留到以后再弥补。这次编辑的原则与前两辑也有所不同,这次要求每个人拿出专题性代表作,只要看本辑的书名就可一目了然。每个人的专长与简况在卷首作者简介中已有交代,这里不再重复。

在这十位作者中,王永祥教授不幸英年早逝,令人不胜唏嘘,在此谨表沉痛的哀念!

还有几位同志从南开“分身”到其他大学任教(他们还在南开兼职),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喜者,南开历史学科培养和成长出了出色的学者,成为“争抢”的对象,是南开的骄傲;惧者,南开流失了人才!天耶?地耶?人耶?令人叹息!南开历史学院是有情的,人虽走,茶不凉,对他们的离开,我们不免怅然,但他们为南开作出的贡献我们将永志不忘,本论丛以收入他们的著作为荣。南开永远是他们的家!

最后我要说几句我的学长范曾先生。孔子说“依於仁,游於艺”,用于范曾最为恰当。范曾靠一支妙笔画尽风流、尽述情怀,天下谁人不知?!这里我仅说几句他对母校的返哺:他创建了东方艺术系,开拓了艺术史的研究,教书育人呕心沥血;这些年来捐赠逾千万,其中仅历

史系就有数百万之巨,其中有对恩师的孝敬,有对后学的奖掖,捐建了“范伯子学术基金”,长期支持对学术研究。“仁者,爱人”,范曾,仁哉、仁哉!

是为序。

刘泽华

2006年11月

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前 言

巴尔干半岛是个大舞台,历史上有许多民族来到这个舞台上,或成为来去匆匆的过客,或是占据舞台中心的主角,或变为摇旗呐喊的小角色。有的长期称霸半岛,有的游离于核心地区,有的日益强盛繁衍到今天,有的则自生自灭没有留下历史踪迹。他们为生存各显其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使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一直热闹非凡。

笔者1983年第一次到欧洲就是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落地的。那是个多雪的冬天,虽然刚刚进入11月份,但是当地头场雪已经把周围覆盖成银装素裹的世界了。2004年11月笔者再度造访克里特时,那里湿凉的小雨下个不停,让人不禁感叹巴尔干半岛南北气候变化的悬殊。后来在希腊留学期间,我们还曾有机会到南斯拉夫(包括今天的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地小住,领略了巴尔干半岛美丽的风光。生长繁茂的山林带来的不仅是夏日的凉爽,而且还夹杂着密林深处神秘的传说,阳光下地中海的海滩不光有舒适享乐,也常常带给人痛苦的历史回忆。我们利用每年的假期遍游爱琴海岛屿,也曾在马尔马拉海和黑海岸边留下足迹。那些盛产大理石和橄榄的海岛不仅让人流连忘返,而且遍布半岛各地的历史古迹总是使人回味无穷,回荡在山区教堂里的圣诗歌声常在耳边响起。黑海南岸那风急浪高的场面至今给我留下些许恐怖的回忆,倒是多瑙河畔和波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使我感到一丝轻松,环绕亚得里亚海海岸那令人疲倦的旅行远不如几度在克里特岛的旅行那样惬意。

巴尔干半岛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撩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巴尔干半岛是人类最早涉足的地区之一,考古学已经证明了巴尔干半岛是人类原

始初民活动的地区,其年代不比目前所知全球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的年代晚。巴尔干半岛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使得半岛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生存形态,其一是环绕海洋的沿海生存形态,其二是北纬41度线以北的丘陵农牧业生存形态。丰富的资源和生存条件使得各地可以形成独立自给的定居区,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方面可以养育大量的人口,另一方面也使半岛内各地区得以相互保持距离。前者凭借海上近海交通的便利,轻易地接收吸纳地中海古代其他文明而迅速发展,后者则因山区交通不便形成的闭塞状态而缓慢发展。两种发展造成的差距使前者的辉煌掩盖了后者的早期开发成就,也使前者成为后者的主宰。

直到古典希腊时代,巴尔干半岛南北两种生存形态尚未融合,但是相对独立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制也使得它们相安无事,保持各自独立的发展。留存至今的古代文献大多是以文明发展相对成熟的古希腊视角记载的,因此反映巴尔干半岛北方成就的内容极为罕见,或带有当时人的偏见,以至后人对北方民族的了解非常缺乏。

罗马帝国凭借军事暴力,在开疆拓土扩张帝国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向东发展领土的远征中,将巴尔干半岛纳入帝国统治体系中。罗马帝国第一次靠武力强制将巴尔干半岛两种不同生存形态结合起来,其标志性的行动是建立了以多瑙河为自然边界的罗马帝国巴尔干半岛各行省。这种强制性的结合只具有军事行政意义。

作为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拜占廷帝国继续完成着这一结合,力图通过形成宗教、文化传统深化这种结合。直到13世纪初,拜占廷人的这种努力是成功的。一种被整个东欧世界承认的拜占廷斯拉夫传统基本形成,巴尔干半岛似乎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是巴尔干半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谐局面。但是1204年西欧十字军骑士的胜利将这个刚刚完成还有待发展巩固的结合打破了,以拜占廷政治文化体系为核心的巴尔干半岛整合体系被打乱了,拜占廷帝国失去了半岛整合过程的主导权,原本能够使巴尔干半岛继续整合并形成更加稳定的现代生存的过程中断了。现代地区共同利益依靠的是共同的经济基础。这

个基础需要在中世纪漫长的贸易活动中加以培育。巴尔干半岛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没有继续下去。拜占廷帝国朝贡体系还没有形成巴尔干半岛共同市场或商业体系，帝国的大厦就崩塌了。

巴尔干半岛群雄逐鹿，争夺半岛最高控制权的斗争的唯一结果是削弱了共同利益的基础，减弱了半岛各民族联系的纽带，并为一个新兴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土耳其人是第一支从南向北成功侵入巴尔干半岛的异族异教力量，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拜占廷国家的衰落，而土耳其人的崛起也是阿拉伯人失败的主要外在原因。土耳其人从14世纪中期开始，利用巴尔干半岛分裂和各国衰落的机会，迅速发展，控制了半岛局势。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强权，它企图利用新的传统取代已经形成的拜占廷斯拉夫传统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相反，这种新的因素加剧了半岛分裂的趋势。

近代以前的巴尔干半岛就是一个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民族多样性极为突出的地区，是一个多样性因素没有经过历史合理协调融合并逐渐形成整体利益的地区，因此是一个地区内部差异性超过了地区共同性的地区。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形成近现代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交往规则时，巴尔干半岛从中世纪遗留下的分裂局面被强化，古代的遗产成为近现代民族国家对立的基础。巴尔干半岛的各种对立因素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相互碰撞，而不是消融。任何不适当的外部干预都会导致这些对立因素变成爆炸性的力量，巴尔干“火药桶”是这种力量的外部表现形式。近代以来巴尔干半岛存在的种种问题，不仅仅是当时国际政治角逐或巴尔干国家利益冲突的结果，其深层次的原因来源于此前漫长历史的演变，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现代巴尔干半岛问题远没有解决。分裂的巴尔干半岛，其各国经济利益、政治关怀、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文化基础的多样性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很少见到的，由此产生的政治、民族、文化和宗教冲突将长期存在。其背后存在的深刻的分裂原因使这里的共同联系变得十分脆弱，而消解这些分裂因素的力量显得极为软弱。

历史经验告示人们,巴尔干“火药桶”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危害性,但是巴尔干半岛区域化将是世界上最难以实现的目标。

绪 论

巴尔干半岛是指欧洲东南部被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爱琴海、马尔马拉海和黑海这五海包围的三角形陆地半岛地区。但是这个名字的地理含义在古代与今天有很大的区别,其主要的争议集中在半岛北部边界,究竟是以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为自然疆界还是以多瑙河流域为人工疆界?如果强调其自然疆界,则问题简单明了,上述五海包围的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南部地区就是巴尔干半岛的地理范围。如果以其人工疆界划线,半岛地区就向北扩展,既可以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也可以包括今天的匈牙利。

根据人们一般的理解,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等9国,占地7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7751万。古代的巴尔干半岛大体以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为界,包括的地区相当上述9国中前8个国家,而不包括罗马尼亚,从土地面积上看,这就减少了23万多平方公里。

即便在今天,巴尔干半岛的定义也还存在不同意见,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就将希腊排除在“巴尔干国家”之外,而将罗马尼亚计算在内^①。事实上,今天的罗马尼亚疆域几乎全在多瑙河以北地区,这个地区就像多瑙河中游以北的匈牙利地区一样,在古代是不被看做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直到今天,巴尔干半岛北部界限的划分仍然是有争议的。大体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称为“多瑙河—萨瓦河—库帕河

① 1934年签署的《巴尔干各国政治协约》就包括了罗马尼亚。

线”，即从黑海的多瑙河出海口沿北纬 45° 上下逆多瑙河西去，当多瑙河在贝尔格莱德处转向北时，沿同一纬度逆多瑙河支流萨瓦河继续向西，直到萨瓦河支流库帕河，由此向西穿越大卡佩拉山和契恰里亚山之间的谷地抵亚得里亚海东部的达里耶卡湾。第二种意见称为“多瑙河—德拉瓦河—索查河线”，其东段与第一种意见相同，到奥西耶克城以东时离开多瑙河，大体沿北纬 46° 上下逆德拉瓦河西去，由卡拉万克山转入索查河，顺流南下亚得里亚海最北端的的里雅斯特湾。第三种意见的西段与第二种意见相同，但东段起自德涅斯特河，沿河北上直到北纬 48° ，转而向西，从东喀尔巴阡山北麓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再连接到德拉瓦河—索查河一线，该线可以称为“德涅斯特河—东喀尔巴阡山—德拉瓦河—索查河线”^①。本书采取第一种意见，因为“多瑙河—萨瓦河—库帕河线”基本准确地反映出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古代历史界限。由于本书涉及的是巴尔干半岛古代的历史，因此多瑙河以北地区虽然会被涉及到，但不被当作主要的描述对象。

“巴尔干”这一名字来源于土耳其语 *Balkan*，意为“林木茂密的山脉”，原指多瑙河南部的黑姆斯山（今老山山脉即巴尔干山脉），后逐渐引申泛指整个半岛。在古典时代和拜占廷时期，人们一直沿用黑姆斯山的称呼，直到土耳其人进入半岛地区才逐渐改称巴尔干山脉。使用“巴尔干”山脉的名字指称该半岛地区始于19世纪^②，当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该地区民族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相继独立。巴尔干半岛近代历史由此揭开了辉煌

① 读者除了可以参考《大英百科全书》的相关词条，还可以参考卡特编辑的《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地理》论文集（Francis W. Carter ed.,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Academic Press, London, NY, 1977），第2和第7—9页，作者写道：“按照本书的写作意图，巴尔干半岛被定义为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些现代国家，以及被称为土耳其欧洲部分所占据的领土。”

② 1889年德国地理学家A. 措伊纳首次用“巴尔干地区”一词取代“土耳其欧洲地区”，后得到学界认同。现代地理学界更倾向于将该地区称为“东南欧半岛”。Francis W. Carter ed.,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Academic Press, London, NY, 1977, pp. 7—8.

的篇章。辉煌的历史激发出无数绚丽的作品,有关巴尔干半岛近代历史的书籍汗牛充栋,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此类书籍近千种。但是,涉及该地区古代史的书籍则极为少见。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几乎部部都是精品,出自著名专家之手。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前牛津大学俄罗斯和巴尔干历史教授迪米特里·奥伯林斯基的名著《拜占廷帝国,500—1453年的东欧》,这部书的名称本身就特别。作者不使用 Empire 而使用 Commonwealth 来表示“帝国”一词,用意独到。根据《牛津双解词典》,前者一般是用以称呼“在一个皇帝统治下的一些国家”,例如罗马帝国,而后者则用来称呼“因共同利益组成联邦的一些国家”,例如大英帝国或称英联邦。该书从地理定位入手,首先描述了迁徙到巴尔干半岛的各个民族,而后以两章篇幅叙述了9—10世纪巴尔干半岛的变化。作者以巴尔干半岛为出发点,逐一分析了拜占廷文化影响逐步扩展的过程,以及作为主导性政治、文化主体的拜占廷帝国与东、中欧各民族的关系。最后三章重点阐述了拜占廷的文化、宗教、法律、文学和艺术影响。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明确指出:“本书涉及两大主题。其一是拜占廷帝国与东欧各民族关系史,该主题是多样性和主要描述性的主题。……其二是这些民族在中世纪通过与拜占廷帝国建立的关系,其统治阶级和有文化阶级逐渐被引导接受了许多拜占廷文明的特质。”^①他认为这些共同点成为东欧各民族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凝聚力量,它们包括共同的东方基督教信仰、对君士坦丁堡教会至高地位的承认、对拜占廷皇帝君临整个东正教世界的认可或默许、对罗马—拜占廷法律的接受、承认在拜占廷工场、学府和教会等场合形成的文学艺术倾向和风格具有普遍的价值。这些要点构成了拜占廷帝国(或“联邦”)的文化核心,也是巴尔干半岛各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价值中心,正是这些共同点使得拜占廷文明能够不断同化持续进入这一地区的不同民族,使它们的发展朝向同一的文化道路,并逐步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I.

融合入东正教世界。作者认为,这个世界在近代以前的中心就是巴尔干半岛,“其核心地区就是作为希腊人、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家园的巴尔干半岛”。换言之,巴尔干半岛在此后的历史中成为一个主要的舞台,上演了许许多多影响东欧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大剧目。当我们探讨巴尔干半岛古代历史问题时,就不得不把拜占廷历史和文化问题放在中心位置。可以说,离开了对拜占廷帝国历史的了解,我们就无法深入理解巴尔干半岛古代历史的发展。

真正以巴尔干半岛为叙述对象的专著是约翰·凡·安特维尔普的《中世纪初期的巴尔干半岛》和《中世纪晚期的巴尔干半岛》。安特维尔普长年执教于美国密执甘大学,讲授巴尔干半岛史,这两本姊妹作品就是应美国学术社团理事会(ACLS)东欧委员会之邀为满足教学需要而作。作者开篇论及巴尔干历史研究学术史,指出:“据我所知,本书是所有语言中这类作品中的第一部。目前有许多专门谈论拜占廷帝国历史的作品,其中包含大量巴尔干半岛的内容。但是,这些作品的重点都在拜占廷帝国及其制度的历史;这些作品在涉及尚未成为帝国省区的斯拉夫人地区时,多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来处理斯拉夫国家。许多巴尔干国家也出版了涉及他们自己国家或这些国家内部地区中世纪历史的各种各样书籍,很多巴尔干半岛以外的史家也出版了关于个别地区(如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史书。然而,还没有一部书把中世纪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①数年后,作者的第二部作品问世了,他在11年后出版的简装本前言中谈到全书策划及写作的过程,以及两部书的参考资料分布。他特别提到,该作品是其15年教学的结晶,不仅是他本人和许多国家许多学校同行共同努力的结果,还是多年来选修其巴尔干半岛史课程的同学与之教学共长,不断完善其写作思想的结果。这种关于教学科研关系的认识相当正确,但在一般的学术专著中还很少提到。这两部书的结构并不复杂,大体是按照

^① John V. A. Fine, *The Early Medieval Balkans, A Critical Survey from the Sixth to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p. VII.

年代顺序,逐渐展开巴尔干半岛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换言之,作者是把巴尔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最初的自然状态转变为人类活动的舞台,从半岛南部出现的古典时代人类活动的舞台转变为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场所,直到15世纪拜占廷帝国灭亡,奥斯曼土耳其人称霸半岛为止。应该说,作者将巴尔干半岛当作一个客观的观察对象的意图是明显的,既反对“拜占廷中心论”,也反对巴尔干各国“多中心论”,主张“历史发展主线论”,也就是按照不同时期分别叙述各个阶段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安特维尔普的总结可以说是巴尔干半岛历史研究的学说史结论,其中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关注巴尔干半岛古代整体史的研究?我们姑且可以将它称为“安特维尔普之谜”。

某个领域的学术发展有时表现得相当缓慢。安特维尔普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分析的有关巴尔干半岛研究的学术史在经历了20多年后,至今大体保持原状,没有大的进展。学术界没有过多关注巴尔干半岛古代历史的原因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历史特殊性造成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5世纪中期征服半岛各国以前;该地区并没有形成地区共同特征,无论从民族构成还是国家组织乃至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因此该地区没有像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那样形成半岛特有的区域共同利益。拜占廷帝国一度企图通过军事、政治、宗教或文化等多种途径将巴尔干半岛纳入帝国的体系,但是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其统一进程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打断。至少在土耳其人提出“巴尔干”这个概念以前没有人将该半岛视为一个整体。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信仰是几大宗教的信仰。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依靠的是军事强权,它没有也不可能将散沙一般的巴尔干地区统一起来,它提出的巴尔干地区观念也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可。

在一个自然环境与人文生存空间多样性极为突出的地区,社会生活和民族多样性可能是该地区内在的特点,与此相关,政治分裂则是其

必然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统一则是一种外来强制性的力量,是与该地区本质特征不相符合的人为计划。在古代,多瑙河以南和希腊以北的巴尔干半岛长期处于未开发状态,少量山地民族活动在靠近平原的山坡地带。直到罗马人征服巴尔干山脉南部地区后,才迫使生活在当地最北部的达吉亚人北移到山区。拜占廷帝国时期是巴尔干半岛开发的时代,这个帝国作为推进半岛统一的力量,依靠政治军事暴力和宗教文化融合两种手段强行实现其统一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事业^①。拜占廷帝国所做的第一次统一半岛的努力最终以失败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进行的另一种统一进程。土耳其人的征服战争是近代意义上的统一行动,它虽然发生在15世纪,但是在攻城战中使用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炮则标志征服战争属于近代历史的范畴,它最终还是失败了。显然,巴尔干半岛缺乏统一的内在动力,那么该地区也不可能存在作为整体的地区历史,这是“安特维尔普之谜”的一个基本答案。

人们关心巴尔干半岛作为整体的历史,是近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当这个地区成为巴尔干战争的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和科索沃战争、南斯拉夫战争的主战场以后,这里更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人们在关注今天的巴尔干半岛的同时,力图从历史中找到现实问题的根源,希望从历史中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甚至预测其未来的走向。然而,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项实证性的研究,是历史家从各种史料中解读“过去”的工作。因此,史料的多寡决定了人们保持其研究热情的可能性。拜占廷人留下了大量巴尔干半岛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近代以前该地区各个阶段不同居民的记载。这些史料十分珍贵,但大多是以拜占廷人的立场观察问题,其“拜占廷中心论”影响着现代历史学家的解读工作。这就难怪我们接触的巴尔干半岛历史书籍多是由拜

^① 现代国际社会曾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应该从字典中取消“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一词,其理由来自现代因素。笔者认为现代巴尔干半岛分裂的原因存在于古代历史之中。"The Balkans: safety in numbers" *The Economist* (International Report, Sept. 27th, 1975, p. 55), 转引自 Francis W. Carter ed.,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p. 6.

占廷学者完成的,也难怪学术界不重视巴尔干古代整体史研究。这也可能是对“安特维尔普之谜”的另一个回应。

巴尔干民族国家史学的发展是与他们各自民族解放独立斗争发展密切联系的。发掘本民族的历史资源,整理本民族的文献资料,书写本民族的历史,都是围绕他们各自民族发展的中心课题进行的。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也许只有在巴尔干各国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巴尔干整体史的研究才能真正开展起来。这里,适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关系,前者建立在后者的个案研究基础上,而后者应以前者的观念为指导。离开了任何一方,巴尔干半岛历史研究的水平都不可能提高。安特维尔普的作品虽有开拓之功,但水平维持在基本教学的程度,远达不到我们手边拜占廷历史著作的层次。这正是目前巴尔干半岛古代历史研究状况的真实反映。我们暂不详细分析其作品的成败得失,但是通过该作品与其他史学名著的对比,还是深刻地感到巴尔干半岛历史研究的艰难。根据我们初步的统计,截止到本世纪初年,有关近代以前巴尔干半岛历史研究的成果不足 150 种,其中论文占了绝大多数,专著不到 40 种。在这些专著中,专门涉及具体国家或地区研究的有之,深入探讨个别问题或具体事件的有之,而巴尔干半岛通史性的作品则屈指可数^①。

让我们通过具体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统计数字来看目前巴尔干半岛古代历史研究的几个特点。首先,巴尔干半岛古代史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在 150 余种论著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完成的只有 10 种左右,1950 年以后完成的占了绝大多数,其中 50 年代只有 5 种,60 年代面世的有 17 种,70 年代问世的有 34 种,而 80 年代和 90 年代完成的分别达到 44 种和 45 种。从这些初步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近 20 年来,巴尔干国家古代史研究不断升温,学者们的视野不断扩大,逐步深入各种研究领域。特别是东欧政治体制巨变促使巴尔干古代史研究热情的高

^① 这里引用的数字主要依据安特维尔普作品中提供的参考书目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在检索到的近千册书中,只有大约 150 种涉及巴尔干半岛古代史。

涨,出现了相对多的研究成果。其次,具体的个案研究仍然是研究的主体,而宏观的通史性研究分量很小。在我们掌握的近40种专著中,涉及沙木埃尔、努法鲁等历史人物的有5种,涉及保加利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南斯拉夫等国家和塞尔维亚、斯拉夫等民族史的有8种,涉及斯科普杰、奥赫里德、贝尔格莱德等重要历史城市或马其顿、多瑙河中游、达尔马提亚等地区史的作品有10种,涉及拜占廷帝国与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周边民族双边关系史的有6种,涉及巴尔干半岛地区发现的城堡、印章、钱币等考古成果的有7种,这些成果都属于具体的微观研究;只有3种作品属于通史写作,可以算作宏观研究,其中包括我们以上提到的安特维尔普的《中世纪初期的巴尔干半岛》和《中世纪晚期的巴尔干半岛》。再者,与欧洲其他地区古代历史研究相比,巴尔干半岛古代史研究属于后起的新学科。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没有相关著作出版,学术论文也很少。同一时期,涉及拜占廷帝国历史的著作就有百余种。前面列举的一组数字表明,巴尔干古代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学科,或者可以把该领域的研究当作东欧政治体制变革的产物。

我国与国际巴尔干半岛古代史研究的状况大体相似,或者更差一些。目前,我国尚未出现关于这一课题的专门著作,但涉及该地区民族问题,特别是斯拉夫人起源等问题的论文还可以找到几篇。其原因有如上述,主要是历史资料短缺和研究语言准备不足造成的。为了弥补巴尔干半岛古代史研究的不足,本课题组经过长期的准备,在国家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奋斗数年,在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是前述安特维尔普著作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巴尔干半岛古代史叙述的框架。客观地说,我们还缺乏巴尔干各民族语言的基础,还不能完整地阅览全部基本史料,还不得不借助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与前人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既不是以“拜占廷中心论”为指导,也不是一般性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根据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重点描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突出每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换言之,

当某个历史阶段表现出“拜占廷中心”的特征时,我们的叙述就实事求是地以拜占廷帝国为中心来描述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当另一个阶段表现出“拜占廷、保加利亚争霸”的特征时,我们就如实地围绕这个特征讲述半岛的历史。巴尔干半岛的问题是复杂的,其原因在于半岛的历史是复杂的。我们的叙述就是要尽可能地再现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及其多方面的因素。由于本课题组的能力和完成时间有限,本书一定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地给读者展示出完整的巴尔干古代史,并给读者留下深入研究和想象的空间,本书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果,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些相应的知识,能激发读者对巴尔干半岛古代历史更大的兴趣,甚至吸引更多读者致力于相关课题研究,那么本书作者的目的是达到了。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巴尔干半岛的物质环境	(1)
第一节 自然地理	(1)
第二节 气候、物产与生活类型	(11)
第三节 人文地理变迁	(22)
第四节 公路交通与城市	(36)
第二章 希腊罗马遗产	(50)
第一节 古希腊时代的巴尔干半岛	(52)
第二节 古罗马东扩与行省建制	(74)
第三节 巴尔干半岛的古典文明遗产	(91)
第三章 哥特人和匈奴人	(99)
第一节 哥特人的起源和迁徙	(99)
第二节 哥特人退出巴尔干历史舞台	(113)
第三节 匈奴人和“阿提拉帝国”	(130)
第四章 早期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	(143)
第一节 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半岛	(143)

第二节	阿瓦尔人入侵巴尔干半岛	(161)
第三节	巴尔干半岛失去控制的年代	(169)
第五章	保加利亚人	(187)
第一节	保加利亚人的起源	(187)
第二节	拜占廷—保加利亚关系:冲突与融合	(193)
第三节	巴尔干半岛的和平局面	(202)
第四节	巴尔干半岛两大强国的对抗	(227)
第五节	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兴起与灭亡	(243)
第六节	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兴起与灭亡	(261)
第六章	俄罗斯人与匈牙利人	(279)
第一节	早期罗斯人与俄罗斯文明化	(279)
第二节	俄罗斯与巴尔干半岛	(304)
第三节	匈牙利人	(319)
第七章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	(339)
第一节	塞尔维亚人	(339)
第二节	克罗地亚人	(363)
第三节	罗马尼亚人	(366)
第四节	阿尔巴尼亚人	(368)
第八章	拉丁人	(372)
第一节	拜占廷帝国的衰败和十字军战争的兴起	(372)
第二节	第四次十字军战争	(380)
第三节	重建巴尔干秩序的失败	(396)

第九章 土耳其人	(407)
第一节 早期土耳其人	(407)
第二节 哈扎尔人	(415)
第三节 潘臣涅格人	(425)
第四节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	(429)
总 结	(445)
参考书目	(446)
相关王朝在位君主年表	(477)
译名对照表	(507)
后 记	(547)

第一章 巴尔干半岛的物质环境

人类的活动,无论是狩猎农耕中的体力劳动还是冥思苦想的脑力劳动,都深受其生存环境的影响,也都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特别是在人类生产能力相对低下且人类生活更多受制于生存环境的古代,地理环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当我们叙述巴尔干古代史时,不得不首先对其自然环境进行必要的描述。

第一节 自然地理

在地球地质运动的漫长岁月里,非洲大陆板块对欧亚大陆板块的冲击形成了地中海复杂的地貌特征,平缓的非洲海岸线与曲折蜿蜒的欧洲海岸线形成鲜明对照。欧洲大陆自西向东排列着比利牛斯、亚平宁和巴尔干三大半岛,与半岛附近散布在地中海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岛屿一起,构成地中海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绚丽多彩的风貌。其中巴尔干半岛受地质运动影响最大,岛上形成了多道走向不一的大地褶皱。有人曾说,如果把巴尔干半岛的褶皱“烫平”的话,其面积将超过整个欧洲^①。巴尔干半岛呈三角形插入东地中海,其东南水域形成了海岛星罗棋布的爱琴海,其西南沿海隔亚得里亚海与亚平宁半岛意大利东南地区相望,多瑙河及其支流穿过其北部山谷,向东南蜿蜒曲折流入黑海,形成了半岛北部的自然疆界。多瑙河上游河水从欧洲中部的巴伐利亚高原直泻流入多瑙河中部平原,在这里与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德拉

^① John Fine, *The Early Medieval Balkan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p. 1.

瓦河、萨瓦河和来自喀尔巴阡山的蒂萨河汇合，南流的河水在贝尔格莱德处几乎转了90°向东流去，把北岸的南喀尔巴阡山和南岸的斯特拉山与巴尔干山抛在身后。这道北部的自然疆界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巴尔干半岛第一道自然屏障，把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的诡异传说连同山地民族阻隔在河北地区。多瑙河南部就是巴尔干半岛的历史舞台。

巴尔干半岛地理环境复杂，半岛被东、西、南面分布的六大海洋包围。半岛东部临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与波斯普鲁斯海峽和达达尼尔海峽一起将半岛与亚洲大陆分割开来，其东南部濒临爱琴海，南部深入东地中海，西南有爱奥尼亚海，其西侧有亚得里亚海。与欧洲其他半岛不同的是，这些海域，特别是爱琴海、爱奥尼亚海和亚得里亚海东部星罗棋布地散布着许多岛屿，其中既有面积达到8261平方公里的克里特岛，也有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小岛礁。长期以来，半岛周围的这些动荡不息深不可测的海洋保护着巴尔干半岛古代居民不受外部敌人的侵扰，为他们中大胆的探险者提供探寻新世界、创造神奇故事的天地，同时也成为使人担惊受怕的海盗入侵洗劫的途径。其中半岛东侧的黑海、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构成了拜占廷帝国疆域的中轴线，更由于君士坦丁堡这个政治中心处于中轴线的中点而成为帝国的中心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巴尔干半岛地理形势和地貌形态复杂，纵横交错的山脉构成了半岛大部分的山区，被山脉分割的小块平地成为农耕活动集中的平原区，而漫长多样的沿海区不仅是人类海上活动的基地，也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生活的场所。三种区域交织在一起，虽然相互区别，却并不截然分开，它们之间的分界不明显。如果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观察，巴尔干半岛分为希腊地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前者的生存环境多与海洋相联系，而后

者与山区相联系^①。在漫长的古代中世纪,希腊地区发展起以海上商业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形态,而色雷斯和马其顿以北平原地区则一直保持以定居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山区丘陵地带则以牧业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在人类交往和活动区域相对有限的古代社会,上述诸种地理特征决定着当地居民生存所需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条件,由此形成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有较大差异。

早在公元前7世纪,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古希腊人就从海上向四周的滨海地区扩张,建立了许多与母邦保持密切联系的商业殖民地^②。爱琴海自古就是希腊人创造神奇历史的空间,他们在这里充分发挥了海洋民族的天赋,以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为基础,发展出令现代人自叹弗如的灿烂文化。正是这些无与伦比的文明,成为中世纪巴尔干各民族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黑海北岸和西岸沿海地区的希腊殖民城邦在古代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干鱼、蜂蜡、海盐、原木和皮毛不断从这里运往希腊母邦,而希腊城邦的手工业制品连同生活方式也被商人们源源不断输入俄罗斯平原,随着希腊艺术品进入俄罗斯平原的还有丰富多彩的希腊文化内容^③。可以说,黑海及其连接爱琴海的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是沟通地中海上的希腊和乌拉尔山西侧的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等古代民族的主要途径。这条海上通道及其附近地区在中世纪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拜占廷人与北方民族和罗斯人进行频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往来的主要路线,而且是拜占廷帝国的心腹地带。

^① 剑桥大学的巴尔干学者 J. L. 宾特里夫使用人文地理学的新方法对巴尔干地理进行深入研究,认为更新世和上新世的地质变化决定了该地区史前时期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此后再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直到工业革命前夕。J. L. Bintliff, "New Approaches to Human Geography, Prehistoric Greece: A Case Study", in Francis W. Carter ed.,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p. 71.

^② 据希罗多德说,直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还保持着这种出海经商的习惯。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第24节。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11页。

^③ A. Popp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the Baptism of Rus: Byzantine - Russian Relations between 986-89", *DOP*, 30 (1976) p. 198.

爱琴海位于巴尔干半岛南方,是地中海的支海,大约 611 公里长,299 公里宽,21 万多平方公里。爱琴海上航线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过克里特岛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海域则进入亚得里亚海,连接爱奥尼亚海航路,向南绕过克里特岛东西两侧进入东地中海,交通十分便利。事实上,爱琴海上数千个海岛使它成为东地中海的一个巨大港湾,因为它们为远航的船只提供了避风港和中续站。由于爱琴海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它在上古时代成为亚、非、欧三大洲文明相互融合的场所。古希腊文明深刻地影响巴尔干半岛中世纪的历史,既为巴尔干地区各种文化独立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也为多种文明融合创造了共同认知的框架。

亚得里亚海是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海域,面积几乎与亚平宁半岛一样大小,在巴尔干古代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分隔巴尔干半岛与亚平宁半岛的奥特郎托海峡在意大利东海岸的巴里附近最为狭窄,只有 72 公里宽,大约是一天的航程。直到 11 世纪诺曼人入侵以前,这里成为巴尔干半岛居民与西欧联系的主要通道。而沿亚得里亚海南北走向中心线的航道成为地中海东方贸易的主要航线,拜占廷人长期利用对这条线路的控制权维持其对东地中海贸易的垄断,并获得巨大利益。但是,7 世纪以后,这些海洋几度丧失了其自然屏障的作用,7、8 世纪时阿拉伯人从马尔马拉海威胁拜占廷帝国首都,从东地中海发动对沿海居民的洗劫,9、10 世纪时罗斯人则从黑海方向攻击巴尔干半岛,11、12 世纪时诺曼人从西南方海上侵入半岛地区。

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和绵延起伏的山地构成了巴尔干半岛重要的地理特征。横贯欧洲中部的山脉在东欧地区分为两大走向,向东发展的山脉构成了今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境内的西喀尔巴阡山、东喀尔巴阡山和南喀尔巴阡山,向东南发展的山脉则进入巴尔干半岛。在这里,大体形成了两组三支山脉。卡帕提亚阿尔卑斯山脉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形成了西北到东南走向的一组,包括韦莱比特山、迪纳拉山脉和品都斯山脉;向东发展的另一组则包括了斯塔拉山脉、巴尔干山脉和罗德比山

脉,前两者构成一支,与后者恰好组成了西北到东南走向的“人”字形山区。这6个山脉又逐一分裂为走向不同高低各异的山区。它们之间分布着少量大小不等的平原,河溪穿流其上^①。

和欧洲屋脊阿尔卑斯山脉相比,巴尔干半岛地势比较平缓,没有高耸陡峭的山峰。整个半岛近20座千米以上的山峰最高的不超过3000米。位于今天保加利亚境内罗德比山脉西端的穆萨拉峰是半岛的制高点,只有2925米,而希腊中部的奥林波斯山比它还低8米。相对平缓的山地和各个山脉之间形成的山口为北方民族南下迁徙提供了通道。6世纪前后大举南下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各部落就是沿迪纳拉山脉和品都斯山脉辗转流动到希腊南部的阿提卡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其他地区^②。

从多瑙河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北线河谷平原地区逐渐隆起的是斯塔拉山脉和巴尔干山脉,它们沿多瑙河南部河谷平原南端一字排开,似乎形成了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天然屏障。巴尔干山脉全长530公里,由众多的高山组成。但是,斯塔拉山脉和巴尔干山脉未能形成巴尔干半岛北部真正的屏障,一则其山势并不险峻,二则其高度有限。朝向多瑙河中游的北麓坡度比南麓更平缓,易于攀爬翻越。特别是巴尔干山脉有多处便于通行的山口通道在中古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和军事作用。罗马时代,巴尔干山脉就开辟有6个隘口,拜占廷人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3个山口^③。这些通道不仅为北方各民族南下创造了机会,而且为拜占廷人北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它们将多瑙河中下游河谷地区与色雷斯平原地区连接起来,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综观历史,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日耳曼人、匈奴人、斯拉夫人、罗斯人、潘臣涅格

①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1993, vol. 14, "Balkan States".

② J. M. Wagstaff, "Settlements in the South - Central Peloponnisos", in Francis W. Carter ed.,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pp. 202—204.

③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7.

人、库曼人、乌泽人、蒙古人等不同民族先后通过这里进入巴尔干半岛，或定居一时或成为半岛的新主人，永久定居于此。在近代以前的巴尔干历史上，只有土耳其人是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侵入半岛的，其他民族均从北方进入巴尔干半岛。总之，半岛北部的山脉断断续续，走向不一，且山势平缓，多山口通道，易于通过，无法构成阻挡北方民族南下的屏障。

沿达尔马提亚地区亚得里亚海岸高耸着韦莱比特山脉和迪纳拉山脉，其最高峰达尔米多山不过 2500 米。再向南有伊庇鲁斯山区大片的石灰山岩，生态环境十分恶劣^①。半岛中部的罗德比山脉和希腊北部的品都斯山脉在整个中古时期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这主要是得益于地中海潮湿的海风。品都斯山脉向南一直延伸到科林斯地峡，逐渐降低，变化为山丘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平原，而后沉入地中海，形成了海上众多岛屿。希腊半岛及其岛屿享受着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适于早期人类生存，因此成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相对于多瑙河北岸寒冷的环境，巴尔干山脉以南的巴尔干半岛对北方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古初期大批游牧民族迁徙定居在这里，形成了半岛复杂的民族构成^②。

希腊中部的品都斯山脉和色雷斯平原西侧的罗德比山脉之间被称为马其顿地区，由萨尔和巴布两高地构成，其中心区有许多湖泊，奥赫里得湖为其中最大的湖，奥赫里得湖及其周围地区后来成为保加利亚王国的中心。对于北方“野蛮”民族而言，巴尔干半岛的山脉并非难以逾越，而对于生活在平原和大城市的“文明”民族而言，这些山区就显得格外艰难险阻。因此，在古代中世纪漫长的岁月中，拜占廷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十分缓慢地向山区扩散，相反，北方民族的袭击和入侵总是迅雷不及掩耳。迪纳拉山脉一度成为斯拉夫各部落南下的通道，一直被古

^① Count Louis Voinovitch, *Dalmatia and the Yugoslav Move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0, pp. 6—8.

^② Robert Sallares,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5—30.

代罗马人和拜占廷人视为险途,在古代中世纪这里成为难以征服的地区,甚至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后,这里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①。

巴尔干半岛山区的地理特点对当地居民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这里山区覆盖着大片的森林、草场和山坡绿地,半岛山区受周边海洋吹来的暖湿空气影响,孕育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半岛各地居民提供了得以自给自足的生存环境。而绵延起伏的山脉和山涧高地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躲避外族入侵和战乱的避难所,使半岛地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民族几乎都能长期生存,世代留其香火不绝。他们中的一些民族今天虽然已经融合为现代国家,但是山区的隔绝条件使他们大部分仍然保持本民族古老的传统和生活习俗^②。

巴尔干半岛北部沿多瑙河一线的直线距离长达1200公里,多瑙河自西向东穿越山谷,曲折注入黑海,这条大河及其中游支流萨瓦河和德拉瓦河形成了半岛北部的自然界线。综观全岛,河流分为多瑙河系和沿海河系两大系统。多瑙河系主干河流是多瑙河,其支流均匀分布于北部山区沟壑之间。多瑙河河谷以南的山脉成为多条支流的发源地,它们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德拉瓦河、萨瓦河、大摩拉瓦河、提莫克河、伊斯库尔河、奥苏姆河、杨特拉河等。这些河流的源头大多在沿河的山区,分别注入多瑙河。这些河流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运输和远足的便利,但同时也成为阻挡北方民族流动的屏障。只是进入冬季结冰期,因河水短时间结冰,降低了其自然屏障的作用,因

① N. G. I. Hammond, *Epirus, The geography, the ancient remains, the history and the topography of Epirus and adjacent area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7, p. 45.

② Renc Ristelhueber ed, *History of the Balkan Peoples*, trans By Sherman David Spector, NY: Twayne 1971. 尽管资深的巴尔干学者 W. S. 乌西尼奇认为此书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而是关于巴尔干民族史的一般性介绍,但是,该书还是以400余页的篇幅描述了诸多人所共知的民族历史和重大民族问题。参见 Wayne S. Vucinich, *Slavic Review*, vol. 32, No. 1 (Mar., 1973), p. 195.

为冰面的厚度足以承载人类大规模迁徙的重量^①。

德拉瓦河发源于意大利境内的东阿尔卑斯山,向东穿越奥地利,全长719公里,是多瑙河最大的支流之一。德拉瓦河流域在古代中世纪期间没有得到全面开发,该地区人口分布稀少。德拉瓦河谷在中世纪期间成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侵入欧洲腹地的通道。萨瓦河位于德拉瓦河东南方,为巴尔干半岛内最长的河流。它发源于朱利安阿尔卑斯山脉,山上雪水顺山势而下,全长940公里。库帕河、乌那河、维尔巴斯河、波斯那河、德里那河等支流从附近山区汇集流入萨瓦河主河道,向东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注入多瑙河。萨瓦河流域覆盖面积达到近10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巴尔干半岛其他河流。萨瓦河谷地平原直到中世纪晚期才被斯拉夫人和塞尔维亚人开发出来,如今是半岛北部重要的农业区。在多瑙河支流中,大摩拉瓦河对巴尔干半岛历史影响最大。它是由西摩拉瓦河和南摩拉瓦河构成,伊巴尔河和尼萨瓦河等多条支流将其流域面积扩大到近4万平方公里。大摩拉瓦河全长221公里,发源于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向北注入多瑙河。大摩拉瓦河下游谷地平原是半岛重要的“谷仓”,塞尔维亚人在此兴起,其农产品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和一度称霸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提莫克河为大摩拉瓦河和伊斯库尔河之间的小河,伊斯库尔河与之相隔一个山丘。伊斯库尔河发源于里拉山,全长65公里,是海拔550米的索非亚平原与多瑙河之间的主要通道。除了上述河流外,奥苏姆河、杨特拉河等支流均为小河,它们的长度大多没有超过50公里,类似的河流大约共有10条。这些支流是巴尔干半岛北部多瑙河南岸流域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有利于当地农业发展,而且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②。

沿海水系同样重要,但是它们没有形成类似多瑙河河系的整体性。梅里奇河是色雷斯平原上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里拉山脉穆萨拉峰,全

^① Francis W. Carter ed.,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Academic Press, p. 18.

^② Francis W. Carter,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77, p. 15.

长 460 公里,先向东流,中途转向东南,最后向南流入爱琴海。其中上游分布着阿尔达河、斯特里亚纳河、托伯尼察河和顿德查河等支流,流域面积达 5.3 万平方公里,为色雷斯平原农耕区提供主要水源。黑海西岸多瑙河入海口的多布罗加地区为冲积平原,主要依靠多瑙河三角洲形成的沼泽和湿地水源,逐渐成为巴尔干半岛北方重要的农耕区。以马其顿地区首府塞萨洛尼基为中心的平原,汇集了瓦尔达河、劳迪亚斯河,水系发达,形成了爱琴海北岸重要农业区。其中,瓦尔达河最长,达 420 公里,流域面积 2.2 万平方公里。它发源于其西侧的萨尔山脉,首先向北、东北流淌,而后绕过斯科普杰城,掉头向南流入塞萨洛尼基湾。这几条河流灌溉的马其顿平原是巴尔干半岛第二大沿海平原,对半岛历史发展影响极大。亚得里亚海东岸沿海最大的平原是迪拉修平原,这里汇集了从伊庇鲁斯山区到达尔马提亚南部群山发源的多条河流。其中维卓塞河、奥崧河、代沃里河、什昆宾河、埃尔贞河、伊斯赫姆河、马特河都直接入海,众多河口形成了冲积型的迪拉修平原。而该平原东侧附近山区的内陆河德林河自南向北流淌 346 公里,注入萨瓦河。这条河串联着普里斯帕湖、奥赫里德湖和费尔哲湖,是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淡水资源区。还有一些小河,如康查亚河、塞提那河等分别灌溉着更小的河谷平原^①。巴尔干半岛河流大多难于航行,只有多瑙河、德拉瓦河、萨瓦河等大中河流可以航船,而河流冲刷形成的谷地却是人类活动的主要通道。

与巴尔干山区交织存在的是平原,分为内陆平原和沿海平原。内陆平原大多有河流穿过,而沿海平原的面积较小。前者主要指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色雷斯平原和多瑙河河谷平原,后者则是指希腊、亚得里亚海东岸和马其顿沿海的小块平地。与山区相比,平原是农耕区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农副业产品,成为以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城市赖以生存的食品产地。一般而言,平原因其地理上的优势,不仅在政治和经济

^① John R. Lampe and Marvin R. Jackson, *Balkan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1982, pp. 23—25.

而且在军事和交通方面发挥着比山区更重要的作用。色雷斯平原依傍罗德比山脉,东面临黑海和马尔马拉海,梅里奇河从北向南穿流而过。这里的农耕活动一直十分活跃,为附近城市提供食物供应,特别在拜占廷时代是君士坦丁堡的谷仓。由于色雷斯平原控制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交通,扼守通向亚洲的道路,这里长期驻扎帝国军队,一方面构成拱卫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一道防线,另一方面控制着联系东西北各个方向交通要道的战略要地^①。色雷斯平原是巴尔干半岛经济军事地位最为重要的地区,可以说谁控制了这块平原谁就主宰了半岛、特别是拜占廷帝国的命运,因此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多瑙河河谷平原从西向东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下游三角洲地区,成为来自多瑙河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定居地^②。这里遍布沼泽泻湖,河道沟渠纵横交错,水系发达,随着北方民族的进入,沼泽地被开发为肥沃的农田,虽然当地气候寒冷,每年的无霜期较短,但顽强的北方民族仍然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盛产谷物的大面积农垦区。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还主要表现为它是诸多游牧民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因为该平原南部比邻巴尔干山脉平缓的北麓山坡,易于通行。特别是多布罗加地区在古代长期为“野蛮”民族占据,直到罗马皇帝图拉真(Tranjan)于101—105年通过达吉亚战争征服后,这里被并入罗马行省。公元3世纪大危机迫使罗马边防军后撤,多瑙河再度成为罗马帝国边境线,而多瑙河下游平原此后一直成为防范北方民族入侵的军事中心^③。4世纪时的哥特人和5世纪的匈奴人都强渡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从此打开了其他游牧民族近7个世纪入侵巴尔干半岛的历史。382年西哥特人由此进入巴尔干半岛,6世纪中期第一批斯拉夫人也首

① Machiel Kiel, *Studies on the Ottoman Architecture of the Balkans*, Variorum Reprints, London 1990, p. 254.

② Spiridon G. Focas, *The Lower Danube River*, In the southeastern Europe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plex from antiquity to the conference of Belgrade of 1948, tran. By Rozeta J. Me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p. 456.

③ Spiridon G. Focas, *The Lower Danube River*, pp. 467—470.

先到达这块平原,继而南下半岛内地,保加利亚人则在 681 年占领该地,并最终成为巴尔干半岛的主宰势力^①。

以塞萨洛尼基为中心的马其顿沿海平原位于罗德比山脉西南部和品都斯山脉东北部,是巴尔干半岛中部极为重要的沿海平原。这里如同希腊沿海平原一样,虽然在提供农产品方面不能与色雷斯平原相比,但是,对当地经济生活的影响远比附近的山区重要,特别是它们作为农牧业与沿海两种生产方式的结合地,成为多种生产生活物资的集散地,比内陆平原增添了新的特色。

总之,巴尔干半岛多山地少平原,虽然湿润多雨形成的沟壑河流在山谷里造成大小不一的平原,但它们相对独立,互相之间缺乏自然联系。这样,山区、平原和沿海地区出现的畜牧、农耕和渔猎三种主要生产形态就对半岛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拜占廷帝国作为古典希腊罗马社会文化特性的主要继承者,本质上保持了地中海经济社会类型。古希腊以地中海支海爱琴海为中心形成的文化特征,在以西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时代得到继承,至拜占廷时代又得到延续,只不过其活动中心转移到黑海—爱琴海—东地中海一线。这样,地中海经济社会类型的拜占廷帝国如何协调巴尔干半岛内陆山区经济社会类型就成为中世纪巴尔干半岛经济史演化的主要课题。

第二节 气候、物产与生活类型

巴尔干地区的气候主要受地中海气候影响,特别是主宰半岛南部的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分布在北纬 40 度附近,而半岛北部则主要受中欧大陆气候影响。所谓地中海气候,主要表现为四季区分不明显,全年温度差异不大,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干旱且日照充足。希腊地区冬季最低温度在摄氏 10 度左右,夏天平均温度为摄氏 30 度上下。每年 10 月初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30, p. 34.

至第二年4月为雨季,全年降雨量几乎都集中在雨季的11、12月。4月以后半岛多数地区进入旱季,连续数月晴空万里,特别是7、8两月滴水不下。这种特征明显的地中海气候控制着塞萨洛尼基和达尔马提亚以南地区^①。马其顿地区以北的巴尔干半岛与南部不同,其气候主要表现为年度温差较大,冬天寒冷潮湿,受来自中欧的寒冷空气影响,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0度,个别时期甚至更低,而夏季因山地海拔较高,气候凉爽,无明显的旱季。虽然全年降雨均匀,但无霜期短,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山区土壤层很浅,植被很薄,低矮的树林和灌木林覆盖多石的地表。自然降雨很难保存下来,大多渗透到岩石中,汇集到洞穴沟壑。山谷中一般是被雨水冲刷下来的土壤形成的河谷平原,沿河温带植物繁茂,适合北方农作物生长。

巴尔干地区物产丰富,有6600种植物生长在半岛上,是欧洲最适于植物生长的地区之一。其中黄星矢车菊、石竹花、苜蓿草、风铃草、蓼衣草、百里香草、剪秋罗属植物、毛蕊花属的植物等遍布全岛,长势最好,针叶松大多生长在沿海山区。半岛南部地区属于人类最早进行开发活动的地区,因此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改变较大,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是动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大型动物很少出现。半岛最常见的是中小型动物,如山羊、狐狼、豪猪、蝙蝠、松鼠、仓鼠、大白鼠、猓獾、貂鼠、狼、狐狸、野兔、野猪、孢子、鹰、羚羊,只在高海拔山区还有熊活动。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许多新物种被引进到半岛地区,诸如牛、马、驴、骡、狗和鸡、鸭、鹅、孔雀等日益向山区普及^②。

巴尔干半岛自然资源丰富,物产种类繁多。就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而言,农业和农村生活占据主要地位,不仅遍及半岛各个主要农耕地区,而且逐渐渗透到山区和沿海地带的畜牧和渔猎生活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叙述也必不可免地以巴尔干半岛的农业为主。

① Francis W. Carter,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77, p. 25.

② Robert Sallares,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Y 1991, pp. 16—23.

总体上看,当地各种农业产品主要用来满足本地生活需要。半岛南部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适宜山坡上种植的橄榄、棉花等经济作物和果园中葡萄、柑橘等水果的生长,而沿海沿河平原地区肥沃的农田则盛产燕麦、黑麦等产量稳定易于保存的硬粒谷物,北方干旱的山丘地区还有利于放养各种家畜。为了克服地中海夏季长达数月的干旱期,半岛各地自古就修建了各种蓄水池,收集自然降雨,利用密封的引水渠道灌溉农田和果园。多瑙河下游平原、色雷斯平原、马其顿平原主要以谷物、蔬菜和水果种植为主,全岛绝大多数山地则发展山羊放牧业,南部沿海山地生长着繁茂的橄榄树和果树,林地之间的农田种植有亚麻、棉花和芝麻,伯罗奔尼撒半岛还在中世纪兴起了丝织业,该半岛北端的科林斯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丝织业中心,而莫利亚全境都种植养蚕必需的桑树^①。

麦子是巴尔干地区主要的谷物产品。古典希腊罗马时代种植的麦子以软粒小麦为主,直到7世纪前后,多种更加易于生产和保存的麦子开始普遍流行,包括黑麦、燕麦、大麦,它们与小亚西亚和埃及地区的软粒小麦不同,虽然以之制成的食品不及软粒小麦可口,但是由于其产量稳定而受到欢迎,特别是黑麦的比例不断上升。此外,当地还种植谷子等谷物,但大多用于饲料,因为巴尔干人认为小米伤胃。另外,黑麦、燕麦、大麦的生长周期比小麦短,可以种植两季,许多文献都提到了春季和冬季种植麦子的最佳日期^②。谷物种植决定了巴尔干地区居民的主要食物是面包。一些文献提到面包可以使用多种麦子制作,但是软粒小麦制作的面包最可口,而黑麦、燕麦、大麦和小米制作的面包质量最差。13世纪的历史家抱怨说,大麦面包是农民的食物,而像他这样地位

^① Francis W. Carter ed,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Academic Press, London, NY, 1977, pp. 28—35.

^② J. Teall, "The Grain Suppl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00—1025", *Dumbarton Oaks Papers* 13(1959)87—139.

的人实在无法下咽^①。为了制作上等面包,麦子需要磨细,反复过筛。家庭自制的面包比较粗糙,因为其中含有更多的麦糠,而面包房加工的上等面包价格较贵。雅典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古时代当地曾出现过一种以牛力驱动用于揉面制作面包的机械,说明面包的需求量相当大^②。文献记载,面包房制作的面包使用烤炉,而农民家庭制作的面包使用木炭灶。

面包是巴尔干地区居民的主食,需求量比较大,但是由于供应基本稳定,面包价格长期维持不变。3、4世纪的法律还记载,古典时代,特别是罗马帝国时期向公民免费分发面包的传统始终没有废除,通常是由居住在城市里的高级贵族负责发放。每户家庭的面包消费量从3、4世纪每天3—6磅(大约相当于3—6斤)逐渐下降到11、12世纪的1.5磅。据现代学者分析,面包消费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耕面积缩小后巴尔干人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动物蛋白的摄取量比例上升^③。7世纪以后,免费发放面包成为教会负责的救济活动的一部分,只是发放的对象不是所有的城市居民,而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乞丐和贫苦穷人,特别是在大饥荒爆发时期,教会的救济面相当广泛,许多东正教圣徒以此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巴尔干半岛食物产品大多与当地的饮食密切相关。这里居民的饮食观念与今天巴尔干地区各民族的习惯非常接近,而与同时代西欧人相差较大。其原因一方面是两地居民消费与当地自然资源比例基本协调,另一方面是传统的生活习俗影响较深。例如他们通常每日三餐,除了宗教斋戒外,早、中、晚三餐必不可免。其中、晚两餐比较讲究,既有餐前小吃和汤,也有餐后甜点,正餐多为肉类,或是带酱汁的肉排,也有撒满香料的烤肉,鸡、鸭、鹅、牛、羊、猪、鱼等都列入其食谱。上层贵族

① Robert Sallares,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p. 248.

② Robert Sallares,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p. 315.

③ Ph. Koukoules, "Onomata kai eide arton kata tous Byzantinous chronous", *Epeteris Hetaireias Byzantinon Spoudon*, 5 (1928) 36—52.

使用的香料和其他调料不仅有本地产品,而且有来自印度和东亚的花椒大料。就面食和肉食的比例而言,古代巴尔干地区“文明化”程度越高的民族食肉量越低,山区食肉量高于平原,例如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平均食肉量高于希腊人,而北方山地民族食肉量大于沿海地区^①。显然,这是受早期游牧民族生活习俗影响,也受半岛各区域生活资源状况影响。

巴尔干半岛居民的饮食结构中蔬菜水果占的比例较大。其蔬菜种类繁多,水果产量极大,橄榄油使用广泛,这些食物来自巴尔干半岛盛产的园艺产品。圆葱和圆白菜是最主要的蔬菜,几乎为所有人食用,甚至被列入交纳给教会的贡赋清单。包括豌豆、蚕豆、饭豆、青豆、菜豆等各种豆类也是重要的食品,许多土地财产清单中都种植有豆类。蔬菜大多种植在农家菜园中,除上述主要蔬菜外,还包括韭菜、黄瓜、大蒜、茼蒿、胡萝卜、葫芦、橄榄、南瓜、胡瓜、苜蓿等。通常,当地居民多以新鲜蔬菜为原料做成凉菜,这种蔬菜沙律是全岛各族民众普遍欢迎的菜肴。根茎蔬菜则烹饪煮烂食用。中世纪名为《中餐和晚餐》的小册子提到,居民主要的食物有面包、豆类菜肴和蔬菜沙律,补充食物有橄榄、水果、鱼和酒,以及奶酪。普通人几乎顿顿离不开加柠檬汁、橄榄油和盐的蔬菜,豆汤、面糊或大麦粥也必不可少。水果中以苹果、橘子、桃子、李子、西瓜、无花果、草莓、胡桃、樱桃、杏、香橡、核桃、桑仁、栗子和葡萄为主。其中葡萄产量最大,不仅用于日常食用,而且用来酿酒。普通农家酿制的普通酒多为自家食用,修道院或大制酒作坊酿制的酒则用于出售,质量也比自酿的酒好得多^②。今天巴尔干半岛种植的很多经济作物在古代尚未引进,如烟草就不为古代巴尔干人所知。但是,芝麻、橄榄、棉花和亚麻等经济作物在古代就是巴尔干地区的农产品。

巴尔干地区森林资源集中在山区,对树林的利用与农耕同时发展。

① Thanasis D. Sfikas ed.,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Aldershot, England 1999, pp. 125—129.

② A.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Oxford 1991, p. 808.

虽然半岛地区的植被浅薄,没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缺乏大型木材,但是当地出产的林木可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历史文献记载,古代半岛地区需要进口粗大的原木,以进行大规模土木建筑活动。但是,频繁的砍伐和半岛地区林木生长的缓慢使木材供求矛盾日益突现,人们的建筑习惯也随之改变,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建筑材料从土木转变为砖石^①。这一变化早在古典时代以前就发生了。动物食品、毛皮和蜂蜡等产品主要来自狩猎、养蜂等生产性活动,这些产品成为农牧业产品的补充,其中蜂蜜是巴尔干半岛居民甜食的主要来源。

农业是古代巴尔干半岛的主要生产部门。希腊罗马时代,半岛地区的农业发展就保持较高水平,形成了地中海农业的特征。例如,在农业技术方面普遍使用适用于多石且有机质土壤层较薄土地的浅层单铧犁,而在菜园和果园中则普遍使用手工种植,各种各样的锄头和手耙具有不同的用途,用于收获的农具主要是镰刀,而脱谷则利用牲畜踏踏或敲打。古代巴尔干地区缺乏大规模谷物生产的工具,既没有深翻土地的犁具,也没有打谷机械。但是,当地盛产葡萄和橄榄则促进了复杂的压榨装置的发展,不仅各种碾压部件设计精巧,而且使用了原始的水力和畜力为动力。由于地中海特殊的旱季和雨季气候,巴尔干地区的农作物种植大体分为冬夏两季,除了半岛最南部每年种植两季外,大多数地区采取轮作制以恢复和保持地力。

古代巴尔干半岛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缺乏文字记载,现代学者根据有限的史料估计,谷物的最高产量大约相当于种子的20倍,一般情况下产量为种子的6倍左右。但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大体可以满足巴尔干地区居民的需要,据12世纪以后的文献反映,巴尔干半岛向意大利和多瑙河以北地区出口粮食、酒类和其他农产品。由于巴尔干地区历来人口密度不高,所以当地从来没有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相反,劳力不足是该地区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由于争夺土地资

^① Slobodan Curcic and Evangelia Hadjityrphonos ed., *Secular Medieval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1300—1500) and its Preservation*, AIMOS, Thessaloniki 1997, pp. 56—60.

源而发生的社会动荡在这里也很少出现^①。人口和土地资源之间比例的相对平衡有助于半岛地区形成稳定的土地使用制度。大部分地区实行国家管理下的村社土地制度。8世纪的《农业法》表明,村社里的农民耕种小片份地,并以村社为单位定期缴纳国家税收。多数土地采取敞开耕作的方式,只在收获季节架设篱笆以防牲畜啃食。份地的分配由村社集体决定,农民有迁徙的自由,涉及的财产和税收问题则依据《农业法》的条款处理^②。农民使用份地的权利不可剥夺,并可以世袭。《农业法》自8世纪初以后长期通行于巴尔干半岛说明其符合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该法律反映出,农民份地之间有分界,但不足以防止牲畜进入他人农田。菜园、果园、葡萄园和种植橄榄的林地也分配给农民使用,除了后者采取敞开式耕种外,园地都以栅栏和壕沟围起来,防止牲畜啃噬和不法之徒偷盗。各村庄还保存一定数量的公共土地,为村庄所有农民共同使用,它们分散在村庄核心区的农民生活住区和村庄周围地带,放牧用的草场、砍伐生活用材的树林、河流经过的河畔等均属公共土地。

一般的村庄以农民住区为核心区,分为农民的生活区域和生产区域,前者包括住房、磨坊、谷仓、草垛、酒窖、饲料棚、车库等,后者包括份地、林地、牧场、打谷场、菜园、果园,还有羊栏、马厩等家畜区和公共用地。村庄和村庄之间以地界分开,“古老的地界”在村庄之间因土地发生争执时是最权威的判断根据。同时,在村庄内农户之间也存在各种形式的地域划分。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农村中的村庄组织具有的纳税单位的含义。《农业法》规定:“如果农民因贫困不能经营其自己的葡萄园而逃匿移居到外地,那么,让那些被国库要求负责缴税的人们来采集收获葡萄”,“如果逃离自己田地的农民每年应缴纳国库特别税,那

① J. Teall, "The Grain Suppl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00—1025", *Dumbarton Oaks Papers* 13 (1959) 87—139.

② W. Ashburner, "The Farmer's Law",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32 (1912) 68—95. 斯拉夫法律专家发现,直到17世纪时,《农业法》仍然在巴尔干半岛多数地区流行。

么,那些采集该田地果实和占用这块田地的人负担双倍税收”。这两条法规比较清楚地表明农民因破产而迁徙的自由权利,明确地肯定了与逃亡农民同在一个村庄的其他农民们具有使用弃耕农田的优先权。前者强调因农民逃亡成为弃耕土地的使用和该土地产品的归属问题,而后者强调的是纳税义务的转移和完税的责任问题。这两条法规向人们透露了重要的信息,即当一块田地成为弃耕田后,该田地原来承担的国家税收义务并不因为原主人的消失而消失,其税收义务不是确定在农民身上,而是承负在田地上,换言之,国家只关心土地税收,而不关心土地经营者究竟是何人,只要能够保证完成政府税收,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并不重要。而国家确保农民完成税收的组织机构是村庄,逃亡农民所在村庄的其他农民以完成该土地税收的责任和义务换取了使用弃耕地优先权。国家通过立法杜绝土地荒芜,以强制村庄集体完税来保证财税收入。在一定的税收年度期间,政府测定的地方纳税额度是固定的,因此对村庄内农民而言,每块荒芜农田都意味着增加了自身的税收量,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占用弃耕土地。在这里,《农业法》提供了拜占廷帝国税收“连保制”的证据,按照这一制度,荒芜农田的税收由其所在的村庄代缴^①。

至于村庄的管理机构,从9世纪的文献可以发现,国家通过行省政府实现对地方的管理,地方政府则主要以派遣巡回法官和税收官吏控制农村居民^②。法官不定期地在某一地区各村庄之间巡回,处理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类纠纷,他们调查和判决有关地界、借用牲畜和利息等纠纷。同一村庄由多名农民作证的契约和协议也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法官并非常驻一地,而是不定期巡回,在法官离开某村庄期间,农民可以按照法律订立契约。法官具有行政管理意义,其权力来自于政

① I. Karayanopoulos, *The Byzantine State*, Thessaloniki 1983, pp. 90 - 99. (in Greek)

② 菲洛塞奥斯的《官职表》完成于9世纪,是研究此期数百年拜占廷帝国行政管理问题的最重要的资料,目前有多种文本行世,本书参考 J. B. Bury,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 Oxford 1911, pp. 131 - 179 所附原本本。

府任命,并通过司法管理行使这一权力。国家对村庄的经济管理则是通过行省税务官员每年5月和9月征税活动实现的,他们每3年重新清查农村土地状况,确定税收额度。而村庄土地“划分”问题,是与村庄作为国家税收基本单位的作用紧密相关的^①。土地划分是说明土地使用状况的重要现象,巴尔干地区普遍存在的土地定期划分应该如何解释呢?农民为什么要进行土地划分?既然农民已经在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上耕种经营,似乎没有理由进行土地划分,如果村庄里经常出现划分土地的现象,其原因何在?划分哪些土地?由什么人进行划分?每次划分间隔的时间有多久?答案可以在村庄里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弃耕土地中找到。这些弃耕的土地和尚未划分的公共土地是村庄土地划分的对象。从有关村庄集体缴纳税收的研究中人们了解到,村庄为保持完税的能力,必须使弃耕的土地恢复生产,而农村人口的增加又迫使村庄中的农民不断划分公共土地。在村庄中进行的土地划分不是土地重新分配,而是土地追加分配,被划分的土地不是全部而是部分。非正式的划分平时即在进行,有能力经营的农民们有权参与非正式的土地划分,并占用这种划分后的土地,这种划分具有法律效力。可见在确保土地生产的前提下,任何农民都可以参与村庄内的非正式土地划分。但是,由政府派遣的税务官吏主持进行的正式土地划分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平时进行的非正式土地划分由于多户农民的参与,必然会在划界、地点等问题上产生争执,进而在税收方面造成问题。政府每3年进行一次的农村土地清查登记,就成为村庄内土地的正式划分。在正式土地划分期间,税务官和法官将审查认定农民平时进行的土地划分的合法性,同时进行土地税收清查。

划分后的土地即成为农民个人的份地,农民对自己的份地拥有完全自主的使用权和处置权。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具有种植决定权,并有权采取包括筑篱笆、挖壕沟和设陷阱等保护庄稼的措施,并对因此造

^① 此期拜占廷帝国税收管理问题可参见 I. Karayanopoulos, *The Byzantine State*, p. 97.

成的牲畜死亡不负任何责任。农民的土地权利也表现在农业产品方面,以产品归劳动者所有的原则使农民的权益得到保护。例如,取得土地经营权力但未进行整枝、松理土地、筑篱笆挖沟渠等管理劳动的农民无权获得该土地上的收成,而经协商同意,在他人橄榄树林地经营的农民可以享有3年该林地的收获物。偷盗或故意毁坏他人劳动果实的行为被处以极为严厉的处罚,如偷割他人谷穗和豆荚者应遭到鞭打,砍伐他人结果的葡萄藤或烧毁他人饲料棚者应被砍手,纵火焚毁他人谷堆被处火刑,屡次偷盗谷物和葡萄酒者被处警目。

巴尔干地区的农民成份复杂,其中包括什一分成租佃制和对分租佃制的承租人和租佃人、领取工钱的雇工、收取定金的代耕者、破产逃亡农民、牧牛人、园林看管人、奴隶主人、磨坊主、牧羊人等。可见农民是指在农村生活劳动的居民,他们中既有以种植土地为生的农业劳动者,也有以经营畜牧业为生的牧民,他们贫富不同,生产劳动形式有别,但是,其地位平等,享有同等权利。农民均拥有独立财产,其中不仅包括住房、库房、酒窖等消费财产,而且包括份地、果园、劳动工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农民对这些私人财产拥有完全的自由支配权,并受到法律的保护。除此之外,农民还享有自由迁徙移居权,当他们面临破产时,可以将自己的土地委托他人经营而远走他乡,而当他们感到在本地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时,还可以返回原来的村庄,法律仍然承认其原有的权利。返回村庄的农民有权收回其原有的土地,如果其原有土地的生产条件变动太大难以收回的补充措施。另外,农民均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利,他们不仅可以作为证人参加邻里之间的协议,而且可以监督村庄内共有土地和水资源的使用情况,甚至可以否决村庄中不公平的土地追加分配。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农民,无论是土地出租者还是承租者,都是经营自己土地的劳动者。这种情况显然与同期西欧农村中普遍发展的庄园制和领主制有极大区别。前苏联史学界总是力图套用西欧历史发展理论解释巴尔干地区历史,尤其在封建化问题上纠缠不休,其代表作品反映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翻译的有关论著中。我

国学术界也多受其影响,至今反映在许多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事实上,以西欧农业发展史为依据得出的理论模式不适用于巴尔干地区农业发展史^①。

农民虽然享有平等的法权,但他们的实际状况却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反映在贫富差距比较大这一事实上。村庄中最富有的农民拥有多份土地,其中除了其自家的份地外,还包括代耕暂时离开村庄农民的土地,他们是以犁耕劳动换取分配收成。这部分农民既种植谷物,又经营葡萄园和橄榄树林,还饲养牲畜或拥有磨坊,甚至放贷取息,而他们的财产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些富有的农民与不劳而获的大地产主有本质区别,他们不是有权有势的权贵,而是村庄中的普通成员,是经营份地的劳动者。与此同时,村庄中贫穷的农民只有少量的份地,一些外来农民则没有土地,他们依靠租佃来的土地为生,其中什一分成租佃农民可以占有土地收成的9/10,而五五对分租佃农民只占有1/2的收成,这里出现的巨大差别可能是因税收造成的,即前者的土地税收由承租人负担,而后者的税收由土地租佃人承担。奴隶主要被用于放牧牛羊,可能属于家奴。奴隶与农民的区别在于,奴隶不具有法人地位,奴隶主负责赔偿其奴隶造成的损害。

巴尔干半岛的渔民和牧民与农民的景况大体相似,前者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村庄里,以捕捞为生,后者以放牧为主。两者的产品大多在农贸市场上用于交换其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和布匹。由于半岛地区山区、平原和沿海区域交错,各地相互影响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以渔民和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如村社组织、生活习俗、饮食结构等,与农耕区的农民没有大区别。例如渔民,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沿海或河流湖泊地区以捕鱼为生的农民。他们的生产生活以水生物为资源,社会生活围绕捕捞活动展开。一般情况下,渔村拥有自己的码头,村镇则有两三个码头,用于停靠鱼船和交易捕捞物,因此这种码头大多成为当地的海货

^① 前苏联的有关学术观点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列夫臣柯:《拜占廷》,三联书店1962年版。

集市。和农民处理耕地一样,渔民也为正常利用水域划分捕鱼区。文献中常常提到,某渔村或某修道院拥有一定数量的池塘。国家向渔民征收捕捞税,税收额确定在捕获物的1/3到1/4。渔村的渔民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作业,各家有自己的渔船,而大一些的村镇则建立捕捞队集体出海作业,其收获量较大,比个体渔民更加富裕。集体捕捞的船队通常选聘当地经验丰富的渔民为队长,他不仅可以保证出海作业的安全,而且可以帮助渔民增加收入,自然其个人的收入也高于普通渔民,文献证明队长占有每次收获物的1/10。捕捞的鱼除一部分用于渔民及其家庭食用,一部分交纳税收外,其他部分就地出售,或制作成鱼干(腌或熏)运往大城市出售。在各种鱼产品中,鱼子酱售价最高。一些质量上乘的鱼产品甚至远销君士坦丁堡^①。

总之,巴尔干半岛在漫长的古代中世纪历史期间经历了缓慢的开发过程,来自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不断补充了活跃的劳动力资源,他们在拜占廷人成熟的农业经济生活影响下,逐渐地改变各自的生活形态,在山区、平原和海岛上发展出适应他们所在地区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尽管巴尔干半岛各地区之间山地阻隔,但各地居民之间仍然保持着多种形式的往来,文化交往时而密切,时而疏远,时而温馨,时而残暴。

第三节 人文地理变迁

巴尔干半岛居民主要由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5个人数较多,分布地区较广的民族构成,其中南斯拉夫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蒙特内格罗人,他们是在斯拉夫人原始部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5个重要民族进入半岛的时间有先后,大体顺序如同以上排列。他们目前的活动区域是20世纪两

^① F. Tinnfield, "Zur kulinarischen Qualität byzantinischer Speisefische", *Stud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Past and Present*, 11 (Tokyo 1988) 155—176.

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此外,在半岛北部和西部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人居住区,以及分散各地的犹太人、吉普塞人,但是这些人不是当地的古代居民^①。

根据现代史前考古发现证明,巴尔干半岛最早的居民活动可以上溯到 10 万年前旧石器晚期,基因分析确定他们是来自非洲最早人类的族群,但是他们与现代巴尔干人是否有某种联系还是个不解之谜。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穴居人在 4 万年前的冰川后时代留下了活动的遗迹,此后直到大约 1 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现代人活动的遗迹更加明显。巴尔干半岛山区洞穴和山岩上都发现了砍削石器和岩画。大约在公元前 7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巴尔干半岛早期先民逐渐进入驯化植物和动物后的定居生活,这使他们有可能增加人口数量,扩大人类社会范围。可以描述的巴尔干半岛历史与文化由此开始^②。

古典时代以前的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其南部地区为欧洲文明发源地。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证明,当地史前文明大体上分散在 5 个地区: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多瑙河中游地区、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摩尔达维亚和西乌克兰地区。爱琴海和巴尔干中部文化群包括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东南部、罗马尼亚西部地区。亚得里亚海文化群包括该海域东西沿海地区。多瑙河中游文化群包括该河中下游河谷平原。巴尔干东部文化群包括黑海西海岸、色雷斯和马其顿大部分地区。摩尔达维亚和西乌克兰文化群包括这两个地区和后来发展的古罗斯文化。这些史前文明采取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定居农业的初期。考古遗址发现的房屋多是使用树木为柱,以柳条编织墙壁,再涂抹泥土。在干旱的地中海沿海地区,人们使用土坯建筑墙壁^③。

① Renc Ristelhueber ed., *History of the Balkan Peoples*, trans By Sherman David Spector, NY: Twayne 1971, pp. 264—266.

② Robert Sallares,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p. 25.

③ Francis W. Carter ed.,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pp. 36—42.

巴尔干半岛各地区出现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具有共同特征,首先表现在人类手工制品方面。斧头、手斧、装饰品、手铲大多是使用石头和骨头加工的,同时期被发现的还有黏土制作的神龛、印章、祈祷的陶俑和鸟形容器,一些黏土或大理石人像显然是多种男女神。半岛出土的史前织布机、纺车锭、纺锤、骨针、纺轮,以及在陶器表面发现的针织物印痕都证明原始的纺织生产已经出现。典型的陶器是带有圆圈底座的半球形陶碗,经过高温烧烤,表面涂有彩色,绘有细条装饰图案,彩绘图案或是红底白线或是白底红线。半岛各地新石器时代陶器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表现出地方特点,无论在材料、形制,还是在用途、装饰图案方面都逐渐形成各自的特色。直到公元前6000年前后,半岛地区出现了金属器具,标志着巴尔干史前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向金石并用的青铜时代过渡。

爱琴海和巴尔干中部地区是欧洲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群。虽然当地各原始民族的生活习惯不同,但是其相同的生存环境和物质资源条件使他们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特点。该地区定居农牧业主要出产一种产量很低的野生小麦,有时这种小麦被称为“双粒小麦”。同时,当地居民驯养一种从西亚引进的山羊。山羊的引进可能是中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族群迁徙的结果之一,但是也可能是两河流域和埃及农牧业技术扩散,或东地中海盆地各个农业民族通过贸易活动相互文化传授和文化互渗的结果。希腊克里特岛在公元前5700年已经出现了陶器,但直到3000年以后才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①。爱琴海西岸和北岸的塞萨利和马其顿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和制陶文化被学者一致确定为欧洲最早的定居文化遗迹。受爱琴海文化影响的巴尔干中部文化,主要是以

^① A. H. Stride, R. H. Gelderson and N. H. Kenyon, "Evolving Miogeanticlines of the East Mediterranea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vol. 284, No. 1322 (Feb., 1977), pp. 255—285. A. E. R. Boak,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Problem of Races in the Prehistoric Aegean Basin",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13, No. 1 (Oct., 1917), pp. 25—36.

捕鱼和狩猎为消费物质来源^①。考古发掘证明,这种渔猎文化属于流动性生活形态。而且由于非定居生活导致与农耕有关的一切器具,如陶碗、陶罐等陶器都没有出现。在爱琴海文化影响下,巴尔干中部地区也通过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获得和消费野生小麦和山羊。猎狗是当地居民唯一驯化的动物,当地居民还逐渐驯化了树林中的野猪。由于水资源丰富、林木茂密,巴尔干中部地区具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其文化发展受到最先发展的爱琴海文化的影响。

巴尔干半岛西部亚得里亚海文化群深受爱琴海和巴尔干中部地区文化群的影响。随着人类海上活动的加强,农牧业技术和生活方式逐渐传入这个地区。这一地区考古发现的许多表面装饰简单印模图案的陶碗和陶器成为其文化的标志,后世学者因此将这种文化称为“印模文化群”。与爱琴海和巴尔干中部地区陶器相比,这里的陶器质地粗糙,可能是使用粗砂和黏土混合烧制而成,其表面用贝壳或锋利的工具压刻出图案。原始农牧业技术可能是经海路由商人带到该地区的,因为这一时期巴尔干人已经开始从事近海航行。多瑙河中游文化群也受到爱琴海和巴尔干中部地区文化群的影响,该文化群的居民虽然属于中欧人种,但是自公元前4000年以降,他们也开始种植原始的野生小麦,驯养山羊和家猪。该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之处在于,其定居点具有封闭性,在居民住宅区外使用壕沟和栅栏为防护屏障。同时,其驯养的家畜也出现了家猪,其种植物中则增加了意大利稷粟。巴尔干东部文化群比多瑙河中游文化群出现的时间略早,根据梅里奇河流域上游考古发现,这一文化群的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年,该地房屋使用柳条编织墙壁,外面涂抹泥土。遗址的房屋呈横排分布。这里的民居建筑和制陶技术也都受到爱琴海和巴尔干中部地区文化群的影响,大概其建筑技术更加复杂一些,可能曾建造过两层楼的房屋^②。该文化遗址考古还

① Francis W. Carter,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77, pp. 35—37.

② Slobodan Curcic and Evangelia Hadjityrphonos ed., *Secular Medieval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1300—1500) and its Preservation*, pp. 110—122.

发现了青铜锥子、鱼钩、别针、斧子、手斧等金属制品，专家因此判定它属于金石并用文化。

青铜时代的巴尔干半岛发展出城镇，但是受到公元前 3500 年前后一支来自于俄罗斯草原的闪米特游牧民族的不利影响。新来的民族发展起库尔干文化，可能属于印欧语系文化的分支。此后千余年，库尔干文化沿多瑙河向西传播，到公元前 2300 年时已经到达爱琴海。他们在社会结构、氏族制度、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方面，都与巴尔干半岛原有土著民族有区别，但在漫长的文化冲突碰撞中，逐步融入当地文化。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巴尔干地区逐渐形成了印欧语系的多种文化，其中包括伊利里亚文化、亚美尼亚文化、威尼斯文化、菲利吉亚文化、米西安文化、达吉亚文化、色雷斯文化、希腊文化。其中大部分属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文化，其社会阶层中出现了军事贵族，有的甚至形成了早期的王权国家，有的则建立起军事要塞。同时，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促使各地涌现出许多大小不一的村庄。

在巴尔干半岛各种文化中，希腊文化发展的水平最高。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希腊克里特文明逐渐进入其辉煌时期，出现了文字和国家，直到公元前 1500 年被其他文化灭亡，它一直是该地区文化的代表。巴尔干半岛北方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奥托马尼和维腾堡文化、摩尔多瓦地区的蒙太奥鲁文化、多瑙河下游和色雷斯地区的泰伊文化、潘诺尼亚和南斯拉夫地区的彩陶文化均同属这一阶段的文化。

公元前 1600 年至前 1200 年间，在中欧和希腊地区出现了军事强权和青铜冶炼中心，例如多瑙河上中游地区的乌乃提西—土木鲁斯文化，小亚卡帕西亚地区的奥托马尼—维腾堡文化、希腊的迈锡尼文化均为其中最重要的中心。公元前 1400 年，土木鲁斯人向多瑙河中下游和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扩张，造成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阿纳多利亚地区的动荡，进而引发了东地中海世界的动荡^①。乌恩非尔德人属于印

^① 49 Spiridon G. Focas, *The Lower Danube River*, pp. 346—350.

欧语系人种,是威尼斯人、亚美尼亚人、菲利吉亚人和米西安人的祖先。他们向南方的迁徙引发了东地中海地区大规模的移民潮,亚美尼亚人、菲利吉亚人和米西安人于此期进入小亚细亚的阿纳多利亚地区。一度称霸西亚的赫梯帝国被灭亡。希腊迈锡尼文化辉煌了 200 年后遭到来自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乌恩非尔德人的攻击,从此进入衰落期^①。而多利安人南下巴尔干半岛彻底改变了希腊的历史。

公元前 1000 年以后,伊利里亚人南下占据了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势力范围直达伊庇鲁斯,其东向势力范围以瓦尔达—摩拉瓦河谷为界限。东伊利里亚人后来扩张到罗马尼亚西部,而北伊利里亚人包括了威尼斯人和潘诺尼亚人,其活动范围在萨瓦河以北。他们依靠波斯尼亚地区发现的铁矿,大力发展活跃的铁矿贸易,其贸易对象包括希腊城邦的商人。

在古典的希腊罗马时代,巴尔干半岛北部居民主要由色雷斯人、达吉亚人和伊利里亚人构成,前者生活在半岛西北部的山区,后者则生活在色雷斯狭窄的平原地区,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公元前 6—4 世纪,这种影响达到了顶峰,因为此时的古希腊文化发展到了其顶峰阶段。考古发掘证明,希腊文化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希腊陶轮的引进极大推动了当地制陶技术的发展,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也被接受,许多希腊的神受到当地人的顶礼膜拜,当地最早的金属币也仿造希腊货币。一般认为,古希腊人铸造金属币的技术学自西亚的阿纳多利亚人。色雷斯文化还受到来自乌克兰草原地带的闪米特游牧民族文化的长期影响,该地区东部古代努阿文化遗址考古证明了这种影响的存在,而东方原始民族不断的入侵为之带来了高加索艺术风格和兵器制造技术。同一时期,生活在俄罗斯草原北部的斯基泰人南下征服了黑海北部的

^① Marija Gimbutas, *The Bronze Age Cul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Hague, Mouton 1965, pp. 23—26.

辛迈利安人,与色雷斯文化发生接触,促使后者加速了铁器的使用^①。

达吉亚人生活在色雷斯北部地区,公元前5世纪时,在希腊文化影响下,其社会发展加快,阶级分化明显,出现了部落贵族、军事阶层、商人和奴隶,并在梅里奇河上游形成了国家,称为“色雷斯国家”。第一位国王是奥德里森王朝的特里斯^②。公元前429年,该王国在西塔尔西斯国王统治期间,与雅典城邦结盟,势力向西扩大到整个马其顿。此后不久,马其顿王国的菲利普二世崛起,迅速统一希腊全境,特别是其子亚历山大更发动了对亚洲和非洲的军事扩张。巴尔干半岛的达吉亚人在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重新联合建立国家,国王德罗米亥迪斯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多瑙河北部和黑海北岸地区。公元前3世纪,凯尔特人从多瑙河以北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入侵巴尔干半岛。由于他们在军事扩张中大量使用铁器,因此在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并迅速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色雷斯、马其顿、塞萨利、希腊南部的广大地区,直到最终击败德尔非的反抗为止。凯尔特人的入侵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达吉亚人在战争中加快对铁器的利用,在战后则扩大了对铁犁的应用。其重大的意义在于,铁器的推广使达吉亚人农耕范围迅速向林区扩展,人口和实力同步增长。此后200年,达吉亚人国家占据了巴尔干半岛东半部,成为罗马人征服以前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力量。

罗马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此后色雷斯人、达吉亚人和伊利里亚人等半岛土著居民进行了150年的顽强抵抗。公元9年,后来成为皇帝的罗马将军提比略彻底征服达吉亚人,建立起达

① Ivan Venedikov, "Thrac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New Series, vol. 35, No. 1, (Summer, 1977), pp. 72—80. S. Casson, *Macedonia, Thrace, and Illyria: Their Relations to Gree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down to the Time of Philip, Son of Amynt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p. 246—302.

② Vasile Parvan, *Dacia, an Outline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of the Carpatho-Danubian Countries*, trans. by I. L. Evans and M. P. Charleswor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 12—31.

吉亚行省^①。该行省包括亚得里亚海东岸整个地区。公元 29 年,另一位罗马将军和后来的皇帝克拉苏完成了对多瑙河南岸地区的征服,建立了莫埃斯亚行省^②。公元 85 年,罗马皇帝多米提安发动达吉亚战争,迫使达吉亚人屈服并派兵参加罗马的征服战争,直到 106 年罗马皇帝图拉真彻底征服达吉亚人,并建立达吉亚行省^③。罗马统治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土著文化,拉丁语取代了达吉亚人和色雷斯人的语言,贸易活动将自然资源大量输出半岛地区,当地社会经济生活被强制纳入罗马帝国的行省体制,军事公路迅速发展,将半岛各个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连接在一起,这些都导致巴尔干地区原有民族文化与特性的消失。色雷斯人、达吉亚人和伊利里亚人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身份,成为罗马帝国的三等公民和军队的主要来源,而半岛也在皇帝戴克里先改革,特别是皇帝君士坦丁建立“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后一分为二,色雷斯地区被划分入东方大区,而伊利里亚地区并入伊利里亚大区。

公元 3 世纪,属于日耳曼部落的哥特人开始进入巴尔干半岛,214 年罗马人和哥特人在达吉亚地区发生第一次军事冲突,强悍且熟悉山地作战的哥特人取得胜利并占领该地区。此后哥特人继续进攻色雷斯地区,并在大约 200 年间占据并定居该地区,其国家权力得以发展。直到匈奴人侵入巴尔干半岛时期,哥特人一直是巴尔干地区重要的势力^④。此后,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相继迁徙定居在巴尔干半岛。

在公元 6 世纪中期斯拉夫人大举迁徙进入巴尔干半岛以前,色雷

① Vasile Parvan, *Dacia, an Outline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of the Carpatho - Danubian Countries*, pp. 21—26.

② Stewart Perowne, *Death of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69, pp. 210—221.

③ Sir Ian Richmond, *Trajan's Army on Trajan's Column*, London: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982, p. 34.

④ P. Heather and J. Matthews, *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5—42.

斯人、达吉亚人和伊利里亚人处于罗马帝国和其后的拜占廷帝国统治下,属于“罗马化”的少数民族。此外,在半岛东北部山区还生活着土著达吉亚人。由于这些部落民的社会生活尚处于原始或半开化状态,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所以现代学者大多根据古希腊或古罗马作家的相关记载了解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以他们主要活动的地区名称为之命名。

斯拉夫人自6世纪侵入巴尔干半岛并定居半岛大部分地区后,至今是该地区主要的民族。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大部分斯拉夫人被当地社会所同化,无论在体质、风俗还是在政治、文化方面都成为半岛地区重要的民族构成。例如,在希腊地区,斯拉夫人一方面将土著希腊人驱赶到生存条件更加恶劣的山区和海岛上,另一方面通过通婚与幸存下来的希腊人融合,接受希腊文化,融入希腊社会的文明生活^①。这种融合相当深入,以至我们在今日的希腊人中随时可以看到他们的痕迹,甚至在现代希腊人的体质方面都保持着斯拉夫人的特征。现代考古学研究认为,古典时代遗存下来的雕像反映出古希腊人普遍具有俊美的一般特征,这在现代希腊人中很难发现,这些特征大多保存在少数海岛或山区居民中。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出现在11世纪历史文献中的乌拉赫斯人就是被最初侵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挤出平原进入色雷斯山区的古希腊原住民^②。同样,与乌拉赫斯人同时出现在11世纪文献中的阿尔巴尼亚人,也被认为是基于相同理由而被迫进入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的古代希腊人和罗马时代的伊利里亚人^③。显然,巴尔干半岛山地在历史上长期成为当地居民躲避战乱的避难地,也是古代巴尔干民族存续、古风遗传、古典政治风格传承的重要地区。

① Florin Curta, *The Making of the Slav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Lower Danube Region, c. 500—7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0—214.

② D. Dvoichenko - Markov, "The Vlachs", *Byzantion*, 54 (1984) 508—26.

③ S. Pollo, A. Puto, *The History of Albania*, London - Boston 1974.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8.

现代保加利亚人的祖先于6、7世纪进入巴尔干半岛后与斯拉夫人融合。土耳其人则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于14世纪进军欧洲并最终征服巴尔干半岛以后定居该地区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上述诸主要民族都分散混合定居,生活在一起,只是由于近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巴尔干地区多次爆发战争,才导致各个单一民族群体趋于相对集中。

现代人种学研究认为,巴尔干地区是欧洲民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其中重要原因是巴尔干半岛地处海陆交通要道,是不同文明汇集之地,诸多古代先民比较容易地从多个方向进入半岛。半岛西北部的多瑙河中游平原向中欧敞开着大门,半岛东北方的摩尔多瓦成为从乌克兰草原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宽阔的通道,半岛东部的色雷斯平原则是从小亚细亚跨过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而来的各民族轻易通行的地区,而半岛沿海地区也不能构成自然屏障,阻挡附近的东地中海沿岸民族和意大利人从海上进入巴尔干半岛。长期的民族融合使现代学者很难从种族体质学的角度分析巴尔干民族,而只能以语言和宗教信仰的所谓“文化”角度来观察当代巴尔干民族问题。例如,希腊人大体上是由深色毛发、眉毛浓重且相连的中等高矮的地中海人、深棕色眼球和深棕色毛发的高地中海人,以及黑色毛发的马其顿人这三种人构成。又如,保加利亚人最初属于匈奴乌戈尔人^①,从乌克兰草原进入并定居巴尔干半岛后,与南斯拉夫人和土著居民融合,形成了现代的以高地中海人和浅色毛发的新多瑙河人作为主要成分的保加利亚人。再如,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来自古典时代的色雷斯人、马其顿人和伊利里亚人,他们在斯拉夫人迁徙的压力下退入山区,15世纪以后逐步伊斯兰教化,并与土耳其人结合。其体形外貌大致分为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托斯克族和南方的贵族族,前者多为中等身材、浅棕色眼睛和深棕色毛发,后者身材瘦高,皮肤深色。

巴尔干半岛各民族人种学上的区别较小,各民族的区别不在体质

^① 乌戈尔人目前主要分布在芬兰等北欧地区。

方面,而在语言和信仰方面。希腊语流行的主要区域在半岛南部,使用这种语言的居民分布范围包括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中部。目前,保加利亚语使用的范围主要在其本国内。阿尔巴尼亚语的使用范围更大些,南斯拉夫南部和希腊北部的阿尔巴尼亚族仍然使用本民族语言。塞尔维亚语是巴尔干斯拉夫人的共同语言,使用范围在半岛中、西部。土耳其语只是保留在半岛东南部少数民族土耳其人中。然而,目前巴尔干半岛各民族语言已经失去了其古时具有的“纯洁性”,每种语言都混杂了其他语言中的因素。例如,阿尔巴尼亚语就是色雷斯语、伊利里亚语、拉丁语、斯拉夫语和土耳其语的混合语言^①。而分散在半岛各地的吉普赛人和犹太人使用的民族语言更是夹杂了大量其所在地区的方言。

巴尔干半岛各个山区和平原的分散格局使得全岛难以形成统一的自然地理中心,拜占廷时代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都偏居一隅,前者在半岛最东部,而后则临爱琴海,与内陆平原城市如色雷斯平原上的亚得里亚堡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因此,这些经济政治中心城市对全岛发挥的行政和军事统辖作用受到了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拜占廷帝国千余年历史中,巴尔干半岛实现统一的时期只占 1/10 左右,即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半个世纪、马其顿王朝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和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末期的 10 年。斯拉夫人曾经在保加利亚平原上的萨尔迪卡、马其顿北部山区的斯科普杰建立起强大的政治中心,而新兴的土耳其人最初进入巴尔干半岛时也曾曾在亚得里亚堡建立自己的首都。这些政治中心都未曾全面控制半岛各个地区。巴尔干半岛古代历史上政治格局呈现的多中心现象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政治特点更因为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而得到了强化,并一直保持到现代。

根据奥伯林斯基的分析,公元 1000 年前后,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

^① Martin E. Huld, *Basic Albanian Etymologies*, Columbus: Slavica 1984, pp. 36—38.

出现了新的转折点^①。此前,拜占廷帝国保持着罗马帝国时代在半岛上的政治格局,继承着半岛的遗产,在维护罗马帝国“传统疆域”的同时,通过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手段,将陆续迁徙到半岛或半岛附近地区定居的游牧民族逐渐转化为“文明”民族。瓦西里二世一度恢复了巴尔干半岛的统一,并使之成为拜占廷帝国的中心区,真正体现出拜占廷帝国作为海洋帝国的本质,因为只有巴尔干半岛天然地将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东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有机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11 世纪初时,巴尔干半岛居民成分也在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后逐渐稳定下来。多瑙河中下游地区、德拉瓦河流域、斯洛文尼亚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半岛地区,大体分布着 5 个主体民族。其中,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共同构成了巴尔干半岛的多数民族,也是拜占廷帝国的主要民族,在半岛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斯拉夫人分布最广,因为保加利亚人此时已经斯拉夫化了,成为斯拉夫人的一部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原来就是斯拉夫人的部落。还有大量与希腊人融合而自称为希腊人的斯拉夫人。第三个民族是靠近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地区讲拉丁语的罗马人,他们后来逐渐被周围的斯拉夫人所融合。斯拉夫人何以会逐渐扩展到包括巴尔干半岛的整个东欧地区,他们的人数何以会超过其他更为古老的民族如希腊人或拉丁人而成为东欧的主体民族,这个问题恐怕也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方能加以解决。笔者认为,斯拉夫人最初生活的地区比较寒冷,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因此在他们被迫南下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了以种族繁衍的数量对抗自然环境压力的生活方式^②。当他们进入南方生存条件更为适宜的温暖环境时,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就立即体现出其特有的数量优势。相比之下,已经普遍信仰基督教并遵守基督教戒律的地中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206.

^②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维什格勒德有 300 名妾,在别尔格勒有 300 名妾,在别列斯托沃有 200 名妾”。《往年纪事》,王铨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9 页。

海人却以农耕为基础,采取了一夫一妻的生活习俗,其种族人数劣势在斯拉夫人的数量优势面前更加突出。

其他两个民族为阿尔巴尼亚人和乌拉赫斯人(Vlachs)。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起源不详,11世纪始见于拜占廷史料记载,当时,他们占领了斯库台河附近的阿尔巴农山谷,因此被称为阿尔巴尼亚人。13世纪时,阿尔巴尼亚人广泛散布于伊庇鲁斯地区,并在14世纪建立阿尔巴尼亚公国。在巴尔干国家反对土耳其侵略的战争中,阿尔巴尼亚人主要充当拜占廷军队的雇佣兵。1392年,威尼斯人占领地拉那。退入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在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最后一个坚持反土耳其统治斗争的中心^①。

至于乌拉赫斯人,学者们根据他们使用拉丁语为母语分析认为,他们是古代罗马人的后裔和现代罗马尼亚人的祖先。他们在11世纪以前一直活动在巴尔干半岛东南地区,曾被罗马—拜占廷人所统治,后来,这支土著民族因受日耳曼人和阿瓦尔—斯拉夫人进攻而避居山区,长期以山区放牧和山坡地耕种为生^②。11世纪以后,他们随季节变化而在山区和草原之间迁移,活动范围大体在塞萨利平原和品都斯山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迁徙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各地,最后定居在今天罗马尼亚地区。拜占廷史料称,他们的奶酪和手工编制的外套因为其物美价廉而特别出名。他们还作为拜占廷帝国雇佣军参与多次重大战事,1025—1027年,乌拉赫斯人雇佣兵参加了拜占廷人对意大利的远征。此后,乌拉赫斯人实力有较大发展,对拜占廷农贸经济构成威胁。拜占廷皇帝阿莱克修斯因此开始推行迫害乌拉赫斯人政策,没收其土地,将他们驱逐进荒芜山区。资源争夺导致的对立使他们与12世纪末

^① Henry Skene, "The Albanians", *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 (1850), pp. 159—181.

^② A. J. B. Wace and M. S. Thompson, *The Nomads of the Balkans, an account of life and customs among the Vlachs of Northern Pindu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New York: Biblio & Tannen, 1972, pp. 12—18, 189—197.

重新崛起的保加利亚人联合进攻拜占廷帝国,巴尔干半岛地区因此陷入国家争霸的混战。在混战中,乌拉赫斯人成为反拜占廷人的主要力量。乌拉赫斯人后来和达吉亚人融合为现代罗马尼亚人。

达吉亚人是喀尔巴阡山脉南端的土著居民,公元2、3世纪期间被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征服,成为达吉亚行省的臣民。拜占廷时代,他们先后遭到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的攻击,退却到南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山区,虽然继续其传统生活方式,但是接受了拉丁语。10世纪以后,他们接受保加利亚传教士的洗礼,皈依了基督教信仰,斯拉夫宗教和文化传统影响持续增强,在靠近多瑙河的瓦兰吉亚和摩尔达维亚地区,东正教教区存在到14世纪。

巴尔干半岛北部自然边界多瑙河以北地区,存在许多古老的民族如阿瓦尔人、摩拉维亚人,但其分布状况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捷克人在中世纪长期受到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传教影响,但是随着匈牙利人对潘诺尼亚平原的占领,他们与拜占廷人的联系渠道被阻隔切断,退入波希米亚地区舒马瓦山以北的伏尔塔瓦河流域。再如,入主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牙利人虽然生活在河左地区,但是与巴尔干半岛联系非常密切。在拜占廷历史文献中,匈牙利人也被误称为“土耳其人”^①。11世纪以前,他们从顿河流域西迁,并从事贩卖战争奴隶的贸易。837年,匈牙利人与拜占廷人发生第一次直接的军事冲突,当时,保加利亚人联合匈牙利人进攻拜占廷军队,但遭到拜占廷舰队的沉重打击。在9世纪末爆发的拜占廷保加利亚战争中,拜占廷人收买匈牙利人进攻保加利亚王国,迫使后者一度停战求和。至10世纪,匈牙利人势力迅速发展,多次入侵拜占廷帝国,甚至兵临城下,围攻君士坦丁堡。此后,两国关系缓和,948年,两位匈牙利王子前往君士坦丁堡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而后不久,拜占廷政府派遣传教士,在匈牙利东、南部地区传教,取得极大进展,东正教在这些地区迅速传播。但是,

^① Gy. Moravcsik, *Byzantium and the Magyars*, Amsterdam 1970, pp. 12—14.

11世纪后,匈牙利人彻底转向西欧的罗马教会,服从罗马教皇,罗马教会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并排斥东正教的影响,使匈牙利成为东欧罗马教会的重要国家^①。此后,匈牙利王国与拜占廷帝国贸易关系密切,物产交往频繁。但是,随着匈牙利人南下进入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两国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引发多次战争,在此期间,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罗斯和诺曼人结盟。12世纪时,两国的战争不断,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势力兴起,他们才转向共同的敌人。匈牙利王国在巴尔干半岛事务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研究巴尔干半岛历史中,应该注意该民族的活动。

第四节 公路交通与城市

巴尔干半岛地理地貌的主要特点是多山,几大山脉将半岛分隔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地区,因而也形成了多个重要的道路系统,它们之间也存在横向的交通。这些连结各个城市和乡村的公路在巴尔干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北到东南走向的韦莱比特山、迪纳拉山脉和品都斯山脉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一字排开,形成了曲折漫长的海岸屏障。真正成为巴尔干半岛各个地区分水岭的是横贯半岛中部的斯塔拉山脉、巴尔干山脉和罗德比山脉,它们形成的西北—东南走向的“人”字形山区将倒三角形的半岛分隔成为多瑙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城市的色雷斯平原地区和以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为中心城市的马其顿平原和希腊中部平原地区。这三大地区均有独立的交通系统,与波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中心区保持密切联系^②。

多瑙河平原分为中游平原和下游平原,位于斯塔拉山脉和巴尔干

^① Paul Tabori, *The Real Hungary*, London: Skeffington and Son 1939, pp. 56—76.

^② F. W. Carter,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7, pp. 405—428.

山脉以北,其中多瑙河中游平原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多瑙河下游平原通过黑海西部海域与拜占廷帝国中心区联系密切。多瑙河地区通过斯塔拉山脉和巴尔干山脉的山谷和各地山口及大小道路直下半岛中部和南部,直达色雷斯平原及其中心城市。

巴尔干半岛最重要的公路是从君士坦丁堡向西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大道,至今它仍是“东方快车”的线路。它最初是由罗马人于1世纪修建的,用于从亚平宁向东方快速运兵。中世纪期间,它成为君士坦丁堡前往欧洲中部的的主要通道^①。古希腊时代,人们注重发展沿海商业殖民城市,道路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罗马人为了战争的需要,首先修筑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军事公路,这为中古时代的交通奠定了基础。一般情况下,沿这条公路从君士坦丁堡旅行到贝尔格莱德需要32天左右^②。人们出君士坦丁堡“金门”向西,沿马尔马拉海岸逐渐转入内陆,三四天后到达伊拉克雷城;出城继续西行进入大片的森林地区,一天可到阿卡丢堡小城;此后约经6天行程,到达黑米蒙都省首府亚得里亚堡城。这座城市位于色雷斯平原西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把守通往君士坦丁堡大路的第一道门户。出亚得里亚堡城向西南方前进,沿梅里奇河逆流方向的大道逐渐转入山区,色雷斯平原美丽的风光被旅行者甩在了身后。在前往下一站腓立普堡途中,旅行者左侧可以看到林木茂密的罗德比山脉,右侧可以遥看里拉山上的皑皑白雪,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可以远远地欣赏巴尔干山脉优美的天际线。大约经过6天的行程,旅行者可以到达被罗马人称作苏齐城的地方,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行程的一半。由苏齐城西出“图拉真城门”继续向西旅行,山路越发难行,并需通过许多山口。在诸多山口中,海拔840米的瓦卡雷尔山口是整条大道的最高点。由此到保加利亚平原最大城市索非亚有3天的路程。这个城市当时称为萨尔迪卡,其规模仅次于亚得里亚堡和腓立普堡,是巴尔

① Stable URL, "Speed of Railroad Trains in Europe", *Science*, vol. 14, No. 358 (Dec., 1889), p. 409.

② Hugh Henckened, *The Pre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1956, p. 45.

干半岛中部的军事战略要津,自罗马人初建后,为拜占廷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所重视,多次重新修建。特别是,城市依傍着伊斯库尔河,人们可以逆流向西南进入斯特里蒙河上游并顺流南下马其顿平原,也可以向东南进入梅里奇河并顺流东进色雷斯平原。出索非亚继续向西前进,旅行者进入巴尔干山脉地区,著名的巴尔干山在其右侧,通过一些隘口后,来到多瑙河中游支流穆拉瓦河上游流域,此后的大道多沿河而下。这段路程大约需要4天,才到达尼斯城。尼斯城是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的出生地,也是巴尔干半岛北部重镇。由此北行直达多瑙河边境,南下经索非亚进入马其顿,或朝东南方向顺梅里奇河而下,进而顺巴尔干山势南下色雷斯平原,或可向西进入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波斯尼亚地区。出尼斯城后,大道向北一直沿摩拉瓦河顺流而下直入多瑙河河谷地区,约经7天路程到达莫埃思亚地区首府维明纳修城。此城位于多瑙河南岸,扼守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河口,由此到达旅程终点贝尔格莱德只有两天时间。贝尔格莱德在罗马时代被称为辛吉东农城,是多瑙河中游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城市所在的位置正是巴尔干半岛北部界河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它与维明纳修城一起控制多瑙河的通行,是巴尔干半岛北部最重要的边防城市^①。

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在巴尔干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在军事方面,其次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它沟通了半岛东南部与西北部的联系,既是向北方多瑙河边境运兵的主要通道,又是北方民族南下的首选道路。而这条大道又与巴尔干半岛第二大道“埃格南底亚”有多处连通,成为半岛公路网络的主动脉。综观历史,这条大道也经历了7、8世纪的黑暗时期。当时,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进攻下,拜占廷帝国军队节节后退,退守色雷斯平原,半岛北部处于混乱,社会生活倒退,商旅不通,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也陷入200多年的荒废境地。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很少提及沿大道的城市,也很少有人

^① W. V. Herbert, *By - Paths in the Balkans*,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06, pp. 35—38.

记载巴尔干半岛的路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原来使用的罗马地名逐渐被斯拉夫称谓取代。大道的再度辉煌是拜占廷人重新控制巴尔干半岛北方地区。而使它成为国际大道并驰名欧洲和西亚地区的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1096年彼得领导下的“穷人十字军”首先沿这条大道东进,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王康拉德三世、巴巴罗萨等率领的十字军都经此前往东方,但是他们留下的记载不约而同地抱怨巴尔干半岛道路难行^①。1521年土耳其军队完成了对巴尔干地区的征服,并控制了全岛的交通动脉,这条大道遂再度发挥其重要作用。

埃格南底亚大道的作用仅次于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它东起君士坦丁堡,西至亚得里亚海港城市迪拉修姆城(今地拉那),东西贯通半岛,连接君士坦丁堡、色雷斯平原、马其顿平原和伊庇鲁斯等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宗教作用十分突出。在罗马统治巴尔干半岛时期,埃格南底亚大道是罗马军团进军东方最便捷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大道,其作用超过了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②。西罗马帝国衰亡后,统治半岛的拜占廷帝国继续利用这条通道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区,只不过其出兵的方向与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相悖。巴尔干地区北方民族的不断入侵使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的作用上升,并使埃格南底亚大道的作用逐渐降低^③。埃格南底亚大道以君士坦丁堡为东部出发点,沿马尔马拉海岸到伊拉克雷城,由此与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分开,一路向西,顺沿海平原地区直达塞萨洛尼基。埃格南底亚大道从塞萨洛尼基穿城而过,继续向西进入山区,经过埃德萨、比托尔杰,到达沃赫里德湖畔的重要城市沃赫里德。大道由此再向西,从迪纳拉山脉和品都斯山脉连接处地势平缓的山谷

① Edward Peters ed., *The First Crusade, the chronicle of Fulcher of Chartres and other source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pp. 67—72.

② W. V. Herbert, *By - Paths in the Balkans*, pp. 69—72.

③ 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Macedonia*, Oxford 1972, p. 25—30.

穿过,经过什昆宾河畔的爱尔巴桑城,最终到达迪拉修姆城^①。

除了上述两条作为半岛地区主动脉的大道外,巴尔干半岛还有许多中等道路,将两大道和不同地区联系起来。这些道路中首先要提到瓦尔达河—摩拉瓦河谷道,它南北走向,南起爱琴海最大的海港城市,马其顿地区首府塞萨洛尼基,北抵莫埃思亚地区首府维明纳修城,全长约700公里。该大道连接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和埃格南底亚大道,是多瑙河地区通往爱琴海和地中海的最主要的大道。塞萨洛尼基控制塞尔马伊海湾,爱琴海在东侧的哈里基第基半岛和西侧的锡塞利地区的伴护下深入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地区,使这个城市成为半岛最好的出海口,而瓦尔达河—摩拉瓦河谷道因此显示其重要性。从塞萨洛尼基沿瓦尔达河谷逆流向北,首先到达瓦尔达河上游的斯科普杰,由此翻过分水岭进入摩拉瓦河流域,顺流北上直插尼斯城。剩下的路程完全走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北段,最终到达多瑙河流域^②。这条线路至今发挥重要作用,由贝尔格莱德至塞萨洛尼基的国际铁路大体上沿着这条道路南下。

还应提到的是黑海道路,它南北走向,沿黑海西岸南北穿行,连接多瑙河入海口地区和君士坦丁堡,沿途经瓦尔那城、梅森不里亚城、安夏鲁斯城和代沃度斯城。诺瓦—色雷斯山道主要穿行于巴尔干山脉,它北起多瑙河南岸城市诺瓦,顺巴尔干山脉北麓缓坡南进,经过山城尼科堡和著名的什普卡山口,渡过罗斯河,翻越斯拉德那山,进入梅里奇河谷和色雷斯平原,遂与君士坦丁堡—贝尔格莱德大道南段连通。中古后期,随着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势力的兴起,这些山地民族在巴尔干西北地区与半岛中部的联系日益密切,该地区通往巴尔干内陆的道路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黑山—尼斯道显得十分重要。这条道路从靠近亚得里亚海地区的斯库台湖出发,翻越黑山,经过配奇城,穿越科索沃平原抵达尼斯城,这条道路又被意大利人称为赞塔道,取当地古斯拉夫

① 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Macedonia*, Oxford 1972, p. 25—30.

② Edward Peters ed., *The First Crusade*, p. 236.

人部落名。在巴尔干半岛各地,这类区域性的道路还很多,它们与其他大道一起构成了半岛的公路网,将各地城乡联系为一个整体。

某些现代学者将巴尔干半岛的道路分为纵横两类,认为罗马人向东地中海扩张时代开始大规模修筑道路,并充分利用了横向道路,既强化了其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也扩大了罗马文化的传播。此后在拜占廷帝国时代,纵向道路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半岛内部的交通系统由于北方民族南下定居和势力发展而得到了完善。同时拜占廷人适时利用巴尔干半岛的交通系统传播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影响,构建起以巴尔干地区为核心的东正教世界^①。

巴尔干半岛自古就是多种文化碰撞融会之地,活跃的经济生活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城市。古典希腊时代,半岛南部的希腊地区就兴起了以阿提卡地区的雅典城邦为典型代表的众多城市,至中古时期,整个巴尔干半岛出现了以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为典型的著名大都市,它们发挥了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作用。

首先让我们以君士坦丁堡为例,简略了解巴尔干半岛古代城市的状况。这座城市由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所建,其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廷。该城位于巴尔干半岛最东端,东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其东、南有马尔马拉海,城北吕库斯河河口自然形成了“金角湾”。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希腊人就在开拓黑海沿岸商业殖民城邦的活动中,建立了拜占廷城,以其首领柏扎思的名字为新城命名。在公元前546—前448年的希波战争中,拜占廷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年)、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后21年)和古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约56—120年)都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23.

对此作过记载^①。拜占廷城不仅在希波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在希腊诸城邦对黑海贸易中举足轻重,当时作家称,没有拜占廷人的同意,任何船只只想进出黑海^②。这座城市的辉煌时代始于君士坦丁一世,他充分认识到该城的重要性,并倾整个帝国之力以5年时间大兴土木进行扩建。这座城市坐落在海峡西侧的小山丘上,东面扼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把守马尔马拉海北面出口,西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其势易守难攻^③。这里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同时它还控制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要道。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拜占廷帝国千年都城所在地。

经过君士坦丁重新修建的拜占廷城成为巴尔干半岛最大的城市,面积约为8.1平方公里,超过旧城十几倍。在帝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下,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数迅速攀升,达到数十万人。现代学者根据该城粮食进口的记载粗略估计,当时君士坦丁堡人口在50-100万之间,这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都是首屈一指的^④。城北的“金角湾”是一个条件极佳的自然港湾,全长十余公里,主航道宽约460米,并有多处分支水巷,可供船只停泊。自古以来,这里便成为世界各地商船汇集

① 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Strabo's Geography*),迪勒尔编注,阿姆斯特丹1975年版,卷7,第6节,第320行。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卷7,第63节。

② 颇利比乌斯:《历史》(Polybius, *Historia*),卷4,第38-44页,转引自AA. Vasil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1, p. 58.

③ 吉本形象准确地描述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优势,认为“占有这两条水上重要通道的君主随时都可以在敌人的海军来犯时将它们关闭起来,而为前来贸易的商船敞开。……曾经向地中海心腹地带疯狂显示物力的黑海地区的野蛮人,很快便自认为无法超越这不可逾越的屏障,被迫终止了海盜行经”。见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卷,第377页。

④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问题历来争论很多,原因是相关原始资料缺乏准确数字记载,学术界的推测数字在50-100万之间。参见AA. Vasil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1, p. 59.

的地方,发财致富的市民形象地称之为“金角湾”。这里至今仍然是土耳其最活跃的港口之一,它与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连成一片,成为著名的贸易中心^①。拜占廷古城凭借一面靠山两面临水的地势能有效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同时其独特便利的水陆交通有助于发展商业贸易。即使在它受到敌人围困之际,“这都城依靠他所圈人的宽广土地,仍能进行各种生产以满足他的众多居民的生活必需和高级享受”。而马尔马拉海拥有最佳的鱼类资源,“到了汛期,不需要任何技术,甚至几乎不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便可大量捕获”^②。

如同古典时代的其他城市一样,君士坦丁堡也汇集了宫殿、广场、剧场、竞技场、集市、私人宅院、公共浴池、神殿(教堂)。小山丘上豪华的皇宫拔地而起,大理石阳台和柱廊比其他城市的同类建筑更加宏大,特别是大皇宫建筑群内各种大殿、宫室、花园极为精致典雅,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和巴尔干半岛的典范。地下通道将皇宫与大赛场连接起来,皇家花园则建有大理石码头直通马尔马拉海。大皇宫占地60多万平方米,占据城内7个山丘中最高一个,是全市的制高点,为三角形城区的顶点。城墙沿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岸向西伸延约4300米,与城西的君士坦丁堡城墙连接^③。城内集中了大量建筑,除大皇宫外,还有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2座剧场、8个豪华的公共浴池、153个私人浴池、52道沿街柱廊、5座囤粮谷仓、8条引水渠道和蓄水池、4座用于集会和法院公审的大厅、14所教堂、14座宫殿和322条街道,以及4388座私人拥有的贵族官邸,贵族官邸的数量是罗马古都的两倍

① Glanville Downey, "Earthquakes at Constantinople and Vicinity, A. D. 342—1454", *Speculum*, vol. 30, No. 4 (Oct., 1955), pp. 596—600. 笔者在当地考察时,对该区的繁荣和巨大规模感到惊讶,并联想到拜占廷帝国时代的昌盛。

②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卷,第377页。

③ 百年后由塞奥多西皇帝修建的城墙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形成新的防务体系。H. C. Dwight, *Constantinople, Old and New*,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5, pp. 24—36.

半^①。古城旧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向西正对宽广的麦西大道。大道南侧有巨大的大赛场，完全仿照罗马竞技场的式样建造，比罗马的大赛场长40米左右，宽阔的赛车道可容8辆赛车同时参赛。场内均匀地分布着许多立柱和方尖碑，其中有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一些立柱上则装饰各种雕像。可容纳10万人的看台分蓝、绿、红、白四色分区建造，外墙则由四层拱型门廊构成，上面装饰精美的大理石雕刻。大量古代艺术杰作用来装饰城市，其中来自古希腊宗教中心德尔斐神庙的三蛇铜柱至今仍然竖立在伊斯坦布尔大清真寺前广场上。麦西大道两侧柱廊排列，一路向西，直达圆形的君士坦丁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文人墨客演讲吟诗，喝彩之声不绝于耳，周围矗立着大片公共建筑群。最高大雄伟的帝国议会和元老院建立在十几级大理石台阶上，广场中心36.58米高的巨型花岗石圆柱坐落在6.1米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顶端耸立着从雅典运来的阿波罗铜像。君士坦丁广场再往西是塞奥多西广场，这里是多条重要的罗马军事大道的汇合点，也是全城最大的集市。集市里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比邻，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大理石柱廊构成的麦西大道两侧有市政厅、将军府和国库，以及国家图书馆和优雅的贵族宅区。除了公共建筑外，城里还有风格各异的罗马贵族庭院，吸引着地中海世界各色人物^②。君士坦丁堡的经济生活十分活跃，奠定了城内各项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城区中心地带建立的巨大商业区，汇集着全国各地的商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货物，街道上各种肤色的商贾身着不同民族服装来来往往，他们用各种语言进行交易，而“金角湾”中停泊的各国船只更显出这座城市的国际地位，拜占廷金币是各国商人最信赖的国际硬通货。商业活动促进了手工业发展，各类作坊和工场云集在大皇宫内或附近地区，世界著名的皇

^① 参见425年前后成书的《职官录》(Notitia Dignitatum)，O. 西科编注，柏林1876年版，它记载了前此近百年拜占廷帝国军政官职和君士坦丁堡的情况。

^② Procopius, *Buildings*, trans., by Dewing, London and New York 1914—1940, pp. 45—56.

家丝织厂和铸币厂建在皇宫内,而兵器和金银加工场则散布在城市中心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中心。

作为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行政中心所在地,大皇宫则是帝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所有政令都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地中海世界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信使和受委派的高级地方官吏往来于驿道客栈,将各地军事和政治情报送入大皇宫,也带着皇帝和朝廷的命令奔赴各地。标有“军情”标志的流星信使可以在不到 120 天的时间里,从首都直达最远的边区^①。首都因其繁华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吸引各阶层精英云集,这也符合皇帝有效地控制地方势力的政策,已被派往各地的官员都在首都留有宅府和家眷,这既是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他们的愿望,因为保持与权力中枢的密切联系将有利于他们仕途顺利发展。

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与其特殊的宗教、文化地位同时得到提升,这是巴尔干半岛其他大城市无法比拟的。公元初几个世纪,在地中海世界形成了 5 大教区,即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克和拜占廷城(即君士坦丁堡)教区,其中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上升最迅速,从排名最后到排名第二。381 年举行的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会议承认君士坦丁堡教区仅次于罗马教区的地位,从而使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克教区从此隶属于首都教区。皇帝们严密控制教会事务,各地主教,包括罗马主教都必须听命于皇帝,随时应召奔赴首都接受训示。

君士坦丁堡是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文化中心,由此也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最大的文化中心。安全舒适的环境和繁荣昌盛的城市生活吸引着各地的知识分子,分散在其他城市的文人学者和艺术匠人不断涌入首都。其中语法学家和哲学家在朝廷支持下建立语言学校,传授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知识。由于吟颂古典诗篇和名著是时尚所需,也是从

^① T. Hauken, *Petition and Response, an epigraphic study of petitions to Roman Emperors*, Bergen: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at Athens 1998, pp. 345—354.

政为官的基本要求,所以拜师学艺的市场极大。许多艺术工匠开设作坊广招学徒,或承包和制作建筑所需的艺术品,因为首都的建设需要大批人才和人手。他们仿造古希腊的绘画雕刻,并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逐渐形成了拜占廷艺术风格。法学家举办法律学校,培训大量急需的司法人才。按照当时的规定,国立学校教师需通过全国性考试,由朝廷选择和任命^①。君士坦丁堡尚古之风长盛不衰,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文献蔚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成为首都文化生活的“热门”话题。为了整理古代图书,帝国政府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正是在长期整理古籍的工作中,形成了以中世纪希腊语为基础的古典文献版本和以亚历山大科普特语为基础的科普特版本。除了社会上层的文化生活外,首都的市井文化也极为丰富,除了定期举行的大型赛车竞技赛事和体育竞赛外,各个剧场经常上演传统剧目,各种节日常常把君士坦丁堡人带入彻夜狂欢之中。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弟子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欧洲、亚洲各地的年轻人在首都学校中接受教育。

如果说君士坦丁堡还保留更多古典时代的特点的话,那么巴尔干半岛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就是真正的中世纪城市。该城位于爱琴海最北端的塞尔马伊湾北岸,希腊北方的哈里基第基半岛西侧,沿海湾建设。它的北部是海拔1210米的基索斯山脉,附近是加里克斯河和瓦尔达河入海口。塞萨洛尼基始建于公元前315或316年,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卡桑德拉为纪念其妻即亚历山大的姐姐塞萨洛尼基而建立的,这个城市因此也以她的名字命名。罗马帝国征服东地中海期间,塞萨洛尼基于公元146年成为罗马帝国马其顿行省的首府。使徒保罗曾于公元50—51年前往塞萨洛尼基传教,并建立了基督教在欧洲的第二个教会。他被当地的犹太教徒赶出城后,两度致信该城居民,为《圣经》留

^① N. H. Baynes and H. L. B. Moss,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49, pp. 200—220.

下了篇章^①。由于该城特殊的地理位置,拜占廷人大力发展当地的工商业,充分发挥其商品集散地作用,使之迅速成为拜占廷帝国第二大城市。为了加强该城市的防御,塞奥多西皇帝统治期间还修建了环绕主城区的城墙。但是,6、7世纪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大举入侵期间,该城遭到多次洗劫。最初,该城教会隶属于罗马教会管辖,但在毁坏圣像运动初期,皇帝利奥三世强制罗马放弃对它的管辖权,以作为对罗马教会反对其毁坏圣像政策的惩罚。此后,塞萨洛尼基教会隶属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这个富庶的巴尔干半岛经济中心始终受到各方军事强权的觊觎,巴尔干半岛北方强国保加利亚人、西地中海强权西西里王国的诺曼人、西亚北非强国阿拉伯人和新兴的地中海强国威尼斯人,以及14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多次进攻该城。这个城市的历史真切地映射出拜占廷帝国多灾多难的历史,浓缩着拜占廷人大喜大悲的社会生活。

这座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城市以沿海丘陵的制高点为中心,埃格南底亚大道穿城而过。这条大道原属于罗马帝国完善的公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着帝国首都罗马城与东方各地的命脉。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它又成为首都君士坦丁堡与巴尔干半岛西部和意大利之间联系的主要通道。作为罗马帝国政治传统的正宗继承者,拜占廷帝国保留了旧罗马帝国政治生活的主要设施,因此,塞萨洛尼基的许多罗马时代的建筑仍然保留下来。进入城门后,罗马时代建造的高大凯旋门首先映入眼帘。这个凯旋门建立于公元300年,是为庆祝晚期罗马帝国东部皇帝加里利乌斯于297年在东方战役中取得的胜利^②。沿大道两侧分别建立的罗马行省官府宫殿和大型集市一直是人们活动的中心,广场上柱廊林立,大理石雕像似乎在述说着帝国的辉煌。靠近码头的“下城”区大多在埃格南底亚大道南侧,那里活跃的商业区比首都君士

^① Chrysanthe Maupoulou - Tsiume, *Byzantine Thessaloniki*, Pekos 1992, pp. 43—54. (in Greek)

^② Chrysanthe Maupoulou - Tsiume, *Byzantine Thessaloniki*, pp. 46, 63, 71.

坦丁堡的商业区毫不逊色。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地的商人在此进行交易,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塞萨洛尼基的商业气氛比首都更为浓厚。

但是,真正使塞萨洛尼基有别于君士坦丁堡的特点在于,这个城市建立了大量的基督教教堂。在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教堂中,首先应该提到加里利乌斯凯旋门以北的“圆形教堂”。它原是加里利乌斯建立的罗马式万神殿“楼东达”,4世纪末塞奥多西一世皇帝大力推行基督教“国教”政策,将它改建为教堂,并在直径近30米的圆拱形墙壁上装饰了大量基督教圣像画。这个教堂从罗马时代的多神教神殿向基督教教堂的转变,真实再现了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化的历史^①。沿埃格南底亚大道向西路南侧,在距离“楼东达”数百米的地方,肃立着高大的“圣索非亚教堂”。该教堂是圣徒安德烈于5世纪末建立的,保持着基督教早期建筑流行的长方形教堂“瓦西里卡”的特点。教堂内不仅装饰有精美的基督教圣像镶嵌画,而且采用罗马时代高贵建筑通常铺设的镶嵌画地板。这个教堂是当年官府和贵族举行宗教仪式的正式场合。与这些教堂同样古老的教堂是“圣大卫教堂”,它位于“上城”的圣索非亚大道西端,最初是皇帝马克西米安为女儿塞奥多拉受洗信仰基督教后修身养性所建,后来在9世纪被皇帝利奥改建为修道院。该教堂虽然不如上述两个教堂规模宏大,但是,它保存着许多完好的早期拜占廷圣像画和后来几个世纪的壁画。最能代表塞萨洛尼基特点的是“圣迪米特里教堂”,传说这位圣徒在该城面临外敌人侵城破之际神勇退敌,保护了全城百姓免于涂炭。因此,该教堂成为塞萨洛尼基城市守护神的所在地,备受当地居民的崇敬。事实上,这个教堂始建于412或413年利昂提奥斯总督统辖该城时期^②。教堂大殿长55米,中央大厅处为典型的拜占廷教堂十字形建筑,内部大厅被不同颜色的大理石和花岗岩柱子分隔

^① Chrysanthé Mauropoulou - Tsiume, *Byzantine Thessaloniki*, pp. 47—55.

^② 另有一说认为该教堂最初建立于435年以后。G. A. and M. G. Soteriou, *Η Βασιλική του Αγίου Δεμητρίου στην Θεσσαλονίκη*, Athens 1952, pp. 56—58.

为5道长廊,其外墙上排列着多层窗户。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该教堂是建立在罗马时代建筑的废墟上,其中一个神秘的地下室据说是圣迪米特里遗物上流淌下甜美圣油的特殊地方。该教堂曾于629—634年和1917年被大火烧毁,但旋即被当地善男信女们按照原样重新建立起来。虽然,圣迪米特里教堂几经破坏,但是它仍然保存了7世纪和11世纪的镶嵌画圣像。塞萨洛尼基至今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拜占廷教堂,大大小小数十座之多,它们见证了拜占廷时代巴尔干半岛社会生活的变迁。

除了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外,亚得里亚堡、雅典、索非亚等城市都是巴尔干半岛的重要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7世纪以后在半岛北部还兴起了腓立普堡、斯科普杰、萨尔迪卡、普里斯卡等城市,它们虽然不及君士坦丁堡规模大,城市生活也不如君士坦丁堡繁华,但是却和君士坦丁堡一样在半岛各地区发挥重要的区域中心作用。巴尔干半岛大大小小的城市通过遍及各地的公路网,构成半岛机体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带动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

第二章 希腊罗马遗产

叙述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当从古希腊罗马谈起;叙述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和文化,更不能不从古希腊谈起。因为,古希腊不仅是欧洲历史的源头,而且是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而古罗马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也深刻地影响了半岛地区千余年的社会发展。

关于古代巴尔干半岛土著居民的来源,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看,还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沿北纬 41 度线看去,从今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经保加利亚和希腊边界,再向西划过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中部,巴尔干半岛被分划为两部分。此线以南是古代希腊人的世界,以北则是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达吉亚人活动的区域。伊利里亚人主要活动在半岛西北部山区和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发现证明,这个地区有多种早期人类文明存在,因此可以将伊利里亚人再分为几个不同的文明群体^①。古代色雷斯人活动的区域大体相当今天保加利亚和马其顿东部平原,而达吉亚人则主要活动在今天保加利亚北部和罗马尼亚地区。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曾提到这三个古代巴尔干半岛土著居民,说他们很早就参与了希腊人事务^②。这些土著巴尔干半岛人的来源一直是巴尔干地区各国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他们与当代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关系更是当代学者辩论的焦点。例如,阿尔

① John Fine, *The Early Medieval Balkan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p. 10.

②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两书都多次提到这些古代民族的名字。

巴尼亚学者力图将伊利里亚人确定为本民族的祖先,而罗马尼亚学者极力证明现代罗马尼亚人就是达吉亚人的后裔,而匈牙利学者则加以反对,坚持认为 11 世纪以后出现在文献中的乌拉赫斯人才是罗马尼亚人的祖先^①。这些学术争论伴随着巴尔干半岛各国对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日趋尖锐,其背后暗藏着各自对领土主权的要求。

客观公正地说,上述巴尔干半岛土著居民都属于印欧语系民族,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并非定居一地,而是因半岛地区不断的动荡流动在半岛各地。例如,现代阿尔巴尼亚人可能不是半岛西部人的后裔,其祖先很可能来自半岛东部地区,因为阿尔巴尼亚语言中有大量巴尔干半岛东部拉丁语的遗痕,换言之,其与半岛东部拉丁语的关系比与西部拉丁语的关系更密切,而阿尔巴尼亚语中大量借用其他沿海民族语言的现象使人们有理由确信,他们的祖先原本不是沿海民族,而是半岛内陆民族,进而表明阿尔巴尼亚人并非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民族。他们最初可能就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多瑙河流域,4 世纪以后受到哥特人和斯拉夫人入侵的影响流散到半岛各地,特别是进入那些相对安定的偏远山区。这三个古代民族大体控制着北纬 41 度线以北地区,其早期的历史被生活在该线以南地区的古希腊人的光辉所掩盖。伊利里亚语和达吉亚语目前已经消失,仅有部分地名人名保留在阿尔巴尼亚语中。我们从古典时代希腊作家了解到的这些古代民族和希腊人一样是现代巴尔干人的祖先。同样,现代巴尔干半岛任何民族绝不是古代单一民族的后代,而是早期巴尔干半岛各民族融合形成的现代民族。颇有争议的阿尔巴尼亚民族的起源,可以被认为是希腊人、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达吉亚人,以及后来的斯拉夫人和罗马人融合的结果。

^① F. R. Maunsell, "The Rhodope Balkan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8, No. 1 (Jul., 1906), pp. 7—24.

第一节 古希腊时代的巴尔干半岛

希腊,位于半岛的南部,是巴尔干半岛重要的组成部分。希腊国土面积31986平方公里,只相当于古希腊人势力范围的一小部分。希腊所在的地区地理形态复杂,具有多样性。“希腊是个多样化的地区。地中海式地形和亚高山地形只相隔几英里;肥沃的平原与荒秃的山地相交错;许多富有冒险精神的水手与贸易商同在一个社区,与内陆从事农业的乡民为邻,后者根本不知道大海商业,既传统又保守,甚至与小麦和牲口同样传统、保守。希腊的这种反差即使在今天也让人吃惊”^①。其最明显的特点是三面环绕大海,北部与巴尔干半岛接壤。爱琴海占据了希腊的东部和南部,并深入希腊半岛,而爱奥尼亚海护卫其西部。希腊任何地区与海洋的距离不超过100公里。希腊多山,大部分区域被山丘覆盖,形成了自西北向东南走势的山区和被山脊分割的许多小平原。各个小平原几乎都是山区河流形成的冲击平原,“其中有些在沿海,如地处海湾南岸、狭长而肥沃的亚该亚平原;有些则在内陆,如拉喀德蒙(斯巴达)平原;差不多所有平原都因山地而与大海隔绝”。这些平原为小区域自给自足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自然资源基础,也为城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②。希腊半岛最重要的山是品都斯山,为巴尔干半岛西部群山的延续部分,主峰斯莫里卡斯峰高2637米。由于石灰岩山区植被很薄,生存条件恶劣。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是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中部山区之间一条狭窄的平原,也是希腊北方重要的产粮区。总之,多海多山多岛屿和小平原分散是希腊的地理特点。

^① 基托:《希腊人》,徐卫翔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20多年来作者对古希腊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深刻见解令各国读者钦佩,笔者非常赞同其分析问题的方法,故在本书中多处引用。《希腊人》的翻译多有失误,出版质量较低,本书在引用时对明显的文法错误作了适当的修改。

^② 基托:《希腊人》,第30、32页。

希腊约有 30% 的土地可以用于农耕,而 60% 的面积为山区和草地。尽管希腊地理条件不利于农田活动,但是,地中海气候却有利于生存。温暖的天气,充足的日照,丰富的水资源特别适合蔬菜水果和橄榄树的生长。“在这小小的希腊世界所发现的恒常的多样性,也有另一个重要的结果。虽然绝大多数希腊城邦肯定是能自给自足的,但是,多亏了各种不同的海拔高度,许多城邦也有它们特有的出产……。这一切鼓励了商业贸易和持续的交往。……结果就是,在史前,希腊对贸易商和来自克里特而后是腓尼基的其他民族敞开怀抱,进入有历史记载的年代,希腊人自己走向了大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①。

人类最初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时间可以上溯到 20 万年以前,而后沿陆路逐渐南下到半岛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地区。这些最早的定居者是半岛的土著居民,他们缓慢的生活节奏在此后数千年里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直到公元前 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新移民进入半岛地区。据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是由当地原始居民阿卡迪亚人、阿提卡雅典人和佩拉斯吉人融合发展而来的^②。希罗多德就断定,希腊两大民族之一的伊奥尼亚人就是佩拉斯吉人的后裔,他写道:“原来这两个民族(指拉凯戴孟人和伊奥尼亚人)从古老的时候起就在希腊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了。后者是过去的佩拉司吉民族,……佩拉司吉人从来还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居住地。”^③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在特洛伊战争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在希腊有过任何共同的行动,这一地区也确实没有被通称为‘希腊’”^④。爱琴海上一些岛屿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古希腊的

① 基托:《希腊人》,第 33 页。

② 基托认为:“一个本土的非希腊的种族居住地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地区,在某个不能确定的时候,说希腊语的民族从更远的北方占据此地——无疑是很缓慢的——并将他们的语言强加给他们。”《希腊人》,第 33 页。学术界普遍认为,希腊人是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进入巴尔干半岛的。

③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第 1 卷,第 56 节。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 卷,第 3 节。

先民主要种植野生小麦和燕麦等谷物,使用石制工具,同时栽种葡萄、橄榄树和无花果树,驯养山羊和绵羊。山羊可能是更早期的人类从西亚引进的动物,而制作陶器也可能是东地中海各民族通过贸易活动进行文化传授和互相渗透的结果。

希腊克里特岛是希腊最早出现人类文明的地方,它东西长 250 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位于爱琴海南部。早在公元前 5700 年这里就已经出现了陶器,但直到 3000 年以后才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公元前 3000—前 1100 年是希腊半岛的青铜时代,被称为“希腊底时代”。在此时期,克里特经历了兴起与衰落的变化,物质文明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陶器制作的数量显著增加,而且房屋建筑技术提高较明显,同时发展起活跃的海上航行,社会组织从单一的畜牧或农耕生活逐渐过渡到军事贵族控制下的城市生活,阶级分化促进了国家的形成,各城市之间为争夺霸权进行长期的战争。同时,各城市充分利用海上贸易活动将势力扩展到整个东地中海和黑海世界,克里特国王“米诺斯是第一位组建海军的人。他成为今天被称为‘希腊海’的主人,统治着基克拉底斯群岛,在大多数岛屿上派出最早的殖民者”^①。

克里特人究竟来自何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曾有学者大胆推测,克里特这个最早的古希腊文化发源地是由来自黑非洲的移民开发的^②。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肯定了克里特与古埃及的密切联系,克里特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影响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诚如学者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1 卷,第 4 节。近 20 年的爱琴海考古发现证明,基克拉底斯群岛曾存在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其存在的时间大体与克里特文明相近。一些学者根据出土的大理石雕刻分析,认为这个被火山喷发埋葬的文明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克里特文明。参见 Pat Getz - Preziosi, *Sculptors of the Cyclades: Individual and Traditio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 C.*,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pp. IX - XI.

^② 基托就此分析认为,克里特人“留下了自己的绘画,通过这些绘画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体态纤巧,深色皮肤,是起源于北非的黑发‘地中海’血统。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到无人居住的克里特时,他们已经经历过旧石器时代。他们之中的另一些人是否走得更远、在希腊的其他地区定居了呢?这是我们所不知晓的。”基托:《希腊人》,第 20 页。ch. Spencer, *Black Athena*,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Newsreel/Resolution Inc. 1991.

指出的：“如今与过去的认识不同，从埃及到克里特或者从克里特到埃及的直航显然存在着可能性，因为早期就出现了海上航行。无论如何，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和其他爱琴海域的航船都能为其远航提供水手和设备。”^①也许欧洲现代研究者们比希罗多德那个时代的人更缺乏勇气承认克里特文化“南来”的事实，后者就明确指出：“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我的研究证明，它们完全是起源于异邦人那里的，而我个人的意见则是，较大的一部分则是起源于埃及的。……这些风俗习惯以及我就要介绍的其他风俗习惯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②本书在此涉及这个国际学术热点问题，主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巴尔干半岛文化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纵观巴尔干半岛历史与文化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自克里特以后的古希腊时期是半岛历史最辉煌的阶段，而古希腊文化是半岛多种文化中最灿烂的明珠。古希腊文化之所以成为地中海世界文化发展的顶峰，除了这种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外，与其他古代文化的密切交流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自公元前2800年以后，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克里特因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发展极为迅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阶级分化导致社会变迁，国家组织与相应的制度逐渐确立。在其控制下的各个城邦，长期维系着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生活，同时，积极从事海上贸易。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克里特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控制整个爱琴海。克里特王宫克诺索斯宫殿依山建立，气势宏大，占地2万多平方米，围绕着这座“迷宫”的种种传说反映了当时该文化发展的盛况，而其不设城墙防御体系的敞开式都城证明了当时克里特的海上霸权。公元前1700年前后，克里特遭到大地震袭击，破坏严重，但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在短期内很快得到恢复。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此次大地震后，克诺索斯宫殿得到

^① Alexandra Karetsou ed., *Crete - Egypt,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links*, Herakleion - Cairo 2001, p. 9.

^② 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第50—51节。

重建,克里特文化进入另一个发展的高潮阶段。

此后两个世纪期间,克里特不仅继续保持其海上霸权,将其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销售到爱琴海和希腊半岛各地,而且将各地贡品征收到克里特王国中心。这种关系从现代考古发现可以得到证明,因为这个时期爱琴海各地的器物均带有明显的克里特风格,这是当时“主流文化”的艺术表现,它明确影射出克里特文化霸权背后的海上实力和经济霸权。克里特的农牧业发展代表了当时整个东欧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现代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使用的工具涉及农耕活动的各个阶段,其中包括开垦荒地的双面镢、翻耕土地的木犁、铲除农田杂草的锄头和收割庄稼的镰刀。种植的粮食作物包括野生小麦和产量较低的大麦,水果和蔬菜类植物主要有葡萄和橄榄,前者除了用于平时的食用,大量地作为酿制葡萄酒的原料,后者则用来压榨橄榄油,其广泛的用途使之成为整个爱琴海世界的畅销产品。国王掌管下的宫廷汇集了来自各地的财富和珍奇异宝,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组织手工业生产,使克里特的金属加工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掌握的史料和文物还不能为我们描绘出当时克里特人的日常生活图景,特别是关于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但是,克诺索斯宫殿遗址发掘出的文物和壁画清晰地向我们展示出国王和王室贵族的生活。他们居住在结构极其复杂的建筑群里,该建筑设计之精巧,布局之合理,使用功能之齐全都超越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宫殿建筑。特别是依山而建的宫殿分多层设计,为解决通风和采光问题增加的大量天井体现了克里特建筑者的奇妙构思。而许多规格不一的柱廊不仅克服了多层建筑的重力问题,而且增加了宫殿的典雅风格。回廊、楼梯、过厅连接的大小不等的宫室,层层叠叠,精巧的门窗隐约透露着多重宫室的秘密,平添了整个建筑的神秘色彩。人们称其为“迷宫”,毫不为过。它不仅留下了千古奇话,而且为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建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①。

^① Slobodan Curcic and Evangelia Hadjityrphonos ed., *Secular Medieval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1300—1500) and its Preservation*, AIMOS, Thessaloniki 1997, pp. 235—255.

公元前15世纪,克里特古代国家再度遭受大地震的袭击,伴随的巨大海啸加重了惨重的地面损失,克里特王国瞬间被大自然的沉重打击毁灭。也许这次地震灾害比200年前的地震更加严重,也许海啸彻底毁坏了克里特人长期赖以维持其繁荣的舰队。这个千年强国突然衰亡,曾达到了相当高发展水平的米诺斯文明毁于一旦,但是,它留下的文明遗产连同线形文字A一直影响着爱琴文明的发展,并对古希腊和后来的巴尔干半岛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一时期,爱琴海中部基克拉底斯群岛兴起了基克拉底斯文明,成为希腊青铜时代重要的文明中心。该群岛总面积2523平方公里,是由希腊大陆延伸沉入爱琴海的山脉形成。岛上的居民可能来自小亚细亚阿纳多利亚地区,修昔底德记载他们曾受克里特人的统治,被驱赶到基克拉底斯岛^①,而希罗多德认为他们是克里特国王的臣属,后遭到多利安人攻击,迁徙到基克拉底斯岛。考古学家在岛上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的石雕像,特别是具有现代抽象艺术特点的大理石人物雕像,其雕刻手法比克里特和迈锡尼的陶俑更加成熟。据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基克拉底斯文化的发展水平先于或高于爱琴海其他文化^②。由于米诺斯文明、基克拉底斯文明、迈锡尼文明都涉及海外贸易活动、文字、宫殿、国家、城市生活和各种材料制作的多种形式的艺术品,它们被学界公认为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文明。但是,这些被视为文明象征的东西并没有被后来的希腊人所继承,以至当时使用的文字成为一种死文字,国王为中心的社會政治生活形式也消失了,为宫廷控制的劳动者似乎也变为

① 修昔底德记载基克拉底斯大部分海岛后来臣服于雅典,这事实上是一个先进文明遭到自然灾害打击进而丧失实力地位而被迫接受新兴势力控制的绝好例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9节。

② Pat Getz - Preziosi, *Sculptors of the Cyclades: Individual and Traditio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 C.*,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pp. IX - XI. “20世纪60年代基克拉底斯群岛的非法盗挖活动达到高潮,其中纳克索斯岛的情况尤其严重,破坏十分厉害。数以千计的史前古墓被洗劫一空——其中一些墓穴里并没有小雕像——有关雕像制作者的大量信息丧失殆尽”。保罗·G·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凌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自食其力的独立生产者,《荷马史诗》中记载的公民大会也是雅典早期先民所不了解的。

取代克里特文明霸主地位的是希腊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迈锡尼人很早就进入巴尔干半岛南部,与其他定居在半岛各地的早期希腊先民一样,在缓慢的生活节奏中缓慢地推进其社会的发展。他们长期处于克里特霸权压制下,同时也受到克里特文化的深刻影响。如果说把克里特文明归属于巴尔干半岛文明还多少有些牵强的话,那么迈锡尼文明则真正属于巴尔干半岛。然而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霸权都是建立在强大的海军实力基础上的,正如修昔底德记载的那样:迈锡尼王“阿伽门农还拥有远比其他统治者强大的海军,他之所以能够组建联合远征军,固然是由于参加者的拥戴,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参加者对他的畏惧。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荷马史诗所提供的证据的话,阿伽门农自己的海上力量事实上是所占份额最大的。……当时,阿伽门农的国家是一个陆上强国;如果没有一支舰队的话,他充其量只能统治附近少数岛屿(数量不会很多的)”^①。有些学者认为迈锡尼人可能是公元前3000年迁徙来的亚该亚人的后裔,但希罗多德认为他们大部分属于伊奥尼亚人的后裔,“假如后一个假定是真的,是不是希罗多德是对的,迈锡尼人之中的大部分民众是伊奥尼亚人,不论他们是否希腊化了?”^②关于迈锡尼人来源的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议,目前仍在探讨中,但是他们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南下定居希腊大陆的东部是确定的结论。迈锡尼遗址的发掘逐渐将其神秘的面纱揭开,人们了解到这一文明高度发展的事实。公元前15—前14世纪是迈锡尼文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整个希腊大陆几乎都处于其强大的影响下,爱琴海,甚至整个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也通过其活跃的海上贸易受到这种影响。迈锡尼文明比克里特文明有更大发展,前者大体上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仅出现了设防的城市和完备的国家组织,社会阶级分化等级分明,贫富分化严重,形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9节。

② 基托:《希腊人》,第21页。

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权力和相应的国家机构,而且使用文字(线形文字 B)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凭借强大的武装力量,迈锡尼王国从各地强制征缴贡品,为争夺霸权经常发动对其他城邦的战争。战争虽然维系了迈锡尼王国一时的繁盛,但却难以使其霸权保持久远,它只强盛了 200 年便进入王国的衰亡阶段,这比克里特称霸的时间短了许多。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 12 世纪的特洛伊战争后衰落,因为战争消耗了希腊人的力量,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破坏,国家的实力被极大削减,并最终被来自海上的人侵所灭亡。“腐败的迈锡尼时代在公元前 12 世纪末走到了尽头。其他的征服者,即来自希腊中北部的多利安人,这时不再是占领掠夺小王国的成功冒险家,而是毁灭性的人流,使这一悠久的文明突然终结,并且开始了一个黑暗时代,长达三个世纪的混乱之后,古典希腊才出现”^①。

如果我们将克里特文明看作一种来自北非的海上文明的话,那么迈锡尼文明则更多地带有西亚陆地文明的影响。“晚期克里特艺术直接导向了大陆上的迈锡尼文化,几乎没有中断过,虽然添加了一些新的特征。不同的是宫殿布局。不仅在于迈锡尼人的宫殿更多地带有堡垒(大陆上更复杂的外部条件可以解释这点),此外,房间也更少开窗,好像源于更为严酷的气候下的风格;而且,当这种风格得到发展以后,形成了与任何克里特建筑都不同的对称性。其他差异是,在彩陶上人形图案更为显著”^②。与克里特文明相比,迈锡尼文明具有更强烈的尚武倾向,其首都本身就是一座重视防御的城堡,在陆海武装实力和军事技术方面,迈锡尼文明似乎也更胜一筹。在迈锡尼人长期且不间断从事的战争中,最著名且流传后世的就是对小亚细亚特洛伊城的远征^③。迈锡尼人靠军事征服取代克里特人的爱琴海霸权,维持其对巴尔干半岛

① 基托:《希腊人》,第 23 页。

② 同上书,第 20 页。

③ 荷马的史诗全面生动地记载了这次战争的全过程。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和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南部及其海域的控制权达数百年,但是,他们也是由于长年战争特别是进行了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而衰败。

公元前12世纪以后,多利安人从巴尔干半岛北方大举入侵,平毁了迈锡尼宫殿,难民四处逃散躲避杀戮,他们流亡到小亚细亚、雅典和爱琴海各岛屿。多利安人属于印欧语系,使用铁制兵器,崇拜男性神,社会组织军事化,其社会文化比爱琴海原有文明更原始。迈锡尼时代的许多城邦和定居点逐渐缩小了,商业贸易出现了大幅度倒退,曾经在爱琴海流行的线性文字也消失了,一度控制整个地区的国家组织瓦解了,无论是曾经风光一时的克里特艺术风格还是迈锡尼主流话语都从历史舞台上谢幕了。后代学者把多利安人控制希腊的300年称为“黑暗时代”^①。希腊人经历了数百年的努力才逐渐从多利安人入侵造成的巨大社会倒退中恢复过来,并进入灿烂辉煌的“古典时代”。

古典时代到来以前,古希腊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荷马时代”。这个时代是以公元前9世纪的盲诗人荷马命名的,因为他留下了一部至今为世人所知的史诗。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以外行的语言对《荷马史诗》做出不准确的叙述,最好引用专家的概括总结。“《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古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战争。特洛伊人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北隅,神话传说把这场战争的原因归结于神明之间的争执,争执又涉及于凡人。据说主神宙斯从普罗米修斯那里得知,他若同女神忒提斯结婚,生下的孩子将会推翻他的统治。宙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决定把忒提斯下嫁凡人。在忒提斯与米尔弥冬人首领佩琉斯举行婚礼时,争吵女神因未受邀请而进行报复。她向席间扔下一个写有‘给最美的女神’的金苹果,引起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女神阿佛罗狄忒的争吵。宙斯让三位女神去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判。帕里斯因出生时有异兆,被父王普里阿摩斯抛弃伊达山中,长大后在山中放牧。三位女神分别许给帕里斯权力、武功、美女,帕里斯把美誉判给了阿佛罗

^① 基托说“这一黑暗时代是彻底黑暗的”。基托:《希腊人》,第23—24页。

狄忒。帕里斯一次去希腊做客,在阿佛罗狄忒的帮助下,把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妻子、世间最美的女子海伦拐回特洛伊。希腊人对特洛伊人和平交涉不成,于是以墨涅拉俄斯的兄长、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为统帅,组成联军,包括忒提斯和佩琉斯的儿子阿基琉斯等著名希腊英雄,进军特洛伊,从而开始了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地处欧亚海陆交通要冲,繁荣富庶,曾屡遭毁灭,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真正原因显然是为了获取财富和奴隶”^①。《荷马史诗》不仅给后世留下了那个时代美丽的故事,而且提供了详细的史料,使我们能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古希腊文明深刻的内涵。不要忘记,这是欧洲,特别是巴尔干半岛文化的起源。

荷马时代的确打破了“黑暗时代”的阴霾,这一“突如其来而又难以解释的荷马发出的光辉”正是“欧洲文明与艺术的奇迹般的首次繁荣”的前兆^②,我们在这里对此进行概括的叙述有助于理解爱琴文明是如何转变成为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古典希腊文明的过程。首先,我们大体了解的经济生活状况是这样的:他们生活的环境并不适于农耕,多石的山地大概只适合种植果树,而并不丰厚的水草可能适合放牧,在属于家庭或家族所有的小块土地上耕种的小麦和果树常常被突发的洪水卷走,“丰产的葡萄园的围墙也无力抵挡,突来的激流用宙斯的雨水发起的冲击,人们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被洪水冲毁”^③。因此,畜牧业逐渐成了比农业更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好一些的土地经过划分被贵族占有,但是普通的农民仍然是自由人,他们既不受制于地主也不屈从于国王,靠自己的土地满足最简单的生活。各种牲畜家禽为各个阶层的人提供主要的食物,战士和富人常常大块吃肉,而穷人则以谷物和海鱼为食。“希腊的鳏夫如今可以靠一条面包和很少几颗橄榄过几天,他的祖先在古典时代同样节俭。大麦、橄榄、一丁点葡萄酒,弄点鱼调调味,遇上重

① 荷马:《伊利亚特》,第2—3页。

② 基托:《希腊人》,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112页。

大节日才吃肉——这就是他们的正常食谱。……它与希腊正常活跃的户外生活一起,养育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类种族”^①。《伊利亚特》中也提到了国王的“御地”,但那是属于整个社区的,是一个公开的牧场。希腊人生活的土地既不适于农耕,也缺乏金属矿,因此象征荣誉的重大奖品可能只是一块铁,阿基琉斯就宣布:“谁想赢得这件奖品,请站出来!即使他的肥田沃土离家宅很远,有了这块铁他五年不用担心缺铁。如果他的牧人或耕夫需要铁用,他们用不着进城去取,就存在手边。”^②他们的吃穿住用都十分简朴,两块挂在肩上的麻布和一根腰带可以使用好几年,多亏了爱琴海的好天气。每个家庭都以自给自足为骄傲,自制家具、马鞍、皮靴,甚至马掌是一种时尚,纺织刺绣活计更是女眷们展示其心灵手巧的女红手艺。所有的金属和牛羊都是交易中的“金钱”。其次,自给自足的原始家庭小生产决定了家庭和家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由家庭构成的部族遵从共同的祖先和神灵,在部族中实行习惯法,族长必需通过自由部族民大会来决定所有重大事务,但部落贵族有权对决定提出动议。由部族长会议确定的国王可能是他们中最强大者和最高的军事统帅,但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因为任何人包括国王都必须遵守和服从由公民会议、贵族会议和国王本人定下的“法律”。与后来的国家不同,他们没有庞大的政府机构,因此不需要强制征税,只需要“贡品”和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当然,他也要和普通战士一样参加战利品的分配。甚至希腊联军的统帅阿基琉斯也无可奈何地宣称:“我们不知道还存有什么公有的财产(即战利品),从敌方城市多获的东西已分配出去,这些战利品又不宜从将士那里取回。”^③现代社会的公民大概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从国王到普通农夫之间的“平等”关系,在战时,这些自由人可以与国王公开讨论战利品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再者,这个时代希腊社会结构尚未出现复杂的等级阶层,家庭中

① 基托:《希腊人》,第36页。

② 荷马:《伊利亚特》,第618页。

③ 同上书,第6页。

的奴隶或奴仆与主人关系亲密而友好。奥德赛就目睹了高贵的公主瑙西卡娅与宫中的女仆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玩耍^①。如同人类社会普遍出现过的情况一样,在这种血缘家庭为主的宗法社会里,父权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权力,也是维系家庭和家族正常生活的最主要的权力。父亲虽然拥有控制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和维护家庭尊严的天责,但那只是为了保持温馨家庭环境的需要。要保持和睦的家庭生活,家庭主妇就要担当起主要的家务和教育子女的责任。重视家庭生活的一系列风俗习惯也在希腊社会中成为重要的传统,亲情友情在人类天赋的社会组织——家庭中得到培养和传承。为了友情,希腊人像为了荣誉一样可以不惜生命。《伊利亚特》第16章描写帕特罗克洛斯为友情出战的事迹感人至深,而阿基琉斯因挚友帕特罗克洛斯阵亡痛不欲生的情景更是催人泪下,“阿基琉斯一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用双手抓起地上发黑的泥土,撒到自己的头上,涂抹自己的脸面,……他随即倒在地上,摊开魁梧的躯体,弄脏了头发,伸出双手把它们扯乱”^②。希腊人强健伟岸,身材与克里特人不同,他们气度不凡,重武轻文,崇尚勇武而视死如归,视荣誉重于生命。也许正是长期征战的生活造就了希腊人的男子气概。最后,我们要提到这个时期的希腊人喜好诗歌和金属加工艺术,但是自由人和上等人不屑与抄书匠和商人为伍。兵器盔甲和武器盾牌制造直接促进了金属加工技术。更多的文化生活可能被视为过度奢侈,对于简朴的物质生活而言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以至于这个英雄时代留下的文化遗物并不多,使很多学者误认为那是个文明倒退的时代。如果说放弃了线形文字、纵酒歌舞和穿金戴银是一种倒退的话,那么从纳税的臣民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转化,从王政向城邦转化,从原始的王权专制向城邦民主制转化却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进步为此后几个世纪希腊文化的辉煌拉开了序幕。

多种文明的碰撞交融为古典希腊文化的兴起搭好了舞台,这个舞

① 荷马:《奥德赛》,第116—121页

② 荷马:《伊利亚特》,第476页。

台有两大基础:其一是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建立起的庞大“希腊世界”和极为广泛的文化联系;其二是通过内政改革确立的城邦体制。殖民时代的希腊社会物质开发虽然迅猛,但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各种消费物质需求急剧扩大,各地物质供求矛盾冲突加剧。因此,自然而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对外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对内则调整各层次的关系,一方面其内部强化了城邦组织形式以维护地区利益,另一方面出现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运动。

对于这两点,基托都有精到的分析:“我们对这场开始于约公元前750年并延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大范围殖民运动的起因与过程的了解极端贫乏。要说人口过剩是其首要原因差不多是讲得通的,虽然其他因素也起着作用:如政治动荡,以及外来的灾祸。”其实在荷马时代以前,希腊人的流动性就很突出。起初,“在这些早期的殖民地中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们都不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而兴建的,它们不是‘工厂’。……殖民者所寻求的是土地。希腊的农民没有多少盈余,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日子。家庭农田的划分很快就到了临界点……贫困的农民或许会放弃他母邦的那小块被蚕食或抵押的土地,到海外去捞一块无人耕种的土地”^①。随着殖民运动的开展,各地物产的交流刺激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进而带动了手工业的兴盛。殖民运动的成果是显著的,向东迁徙建立的希腊殖民城邦在前辈人的基础上抵达小亚细亚沿海内陆,向西则越过意大利、西西里和科西嘉,达到高卢和西班牙,向南到达了北非和埃及,向北进入马其顿、色雷斯和黑海北岸。这些殖民城邦虽然并不是母邦的扩展和“飞地”,在经济政治生活上也不依赖母邦,但是它们与母邦保持割不断的文化与宗教联系。“独立的希腊城邦的数目大量地增加了,也意味着故乡的同情和争执传得越来越远”。同时,这些殖民城邦也把来自整个地中海盆地的非希腊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因素带回了母邦,德尔菲不仅成为所有希腊人求取神谕的中心,而且是汇集

^① 基托:《希腊人》,第98—99页。殖民时代希腊的人口数量增加迅速。

来自四面八方信息的中心,它被形象地称为“殖民地研究局”^①。这种广泛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是古典希腊文化于百花丛中一枝独秀的重要条件,是它吸纳百家最终成就地中海诸文明集大成者伟业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城邦民主制是这个时期希腊人的又一伟大成就,而且是更加伟大的成就。“对何为城邦,它对希腊人有何意义这样的问题缺乏明确的概念,是不可能正确理解希腊历史,希腊人的心灵以及希腊人的成就的”^②。从表面上看,城邦只是以一个政治宗教所在地的“卫城”为中心,连带其周围的农村组成的国家,但其内涵却极为丰富。当外敌入侵时,城邦即成为抵御入侵的堡垒和公民的避难所,平时城邦是公民共同利益的协调机构。由于城邦包含全部的公共生活,因此它既有经济、政治、宗教的功能,也有文化、道德、教育的功能^③。那个时代的希腊哲人和政治家无不对此深入探析,诚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时为此透露的自豪感:“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把全世界的产品都带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对于雅典人而言,享受其他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的奢侈品一样。……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④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

① 同上书,第101页。

② 基托在“城邦”一章的开篇就指出:“这是个坏译名,因为一个正常城邦并不太像城市,而更像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希腊人称为 polis 的东西,因而我们没有确切的对译词。”基托:《希腊人》,第78页。这里,我们还是采用通常的译名,将这个学术争论问题留给专家们去斟酌。

③ “部落联合之日,也就是城邦形成之时。……可以肯定的是,使新团体发生结合的力量仍是宗教崇拜。”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这种将城邦归结为宗教信仰的意见眼下不大流行了。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37、41节。

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①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可能更为冷静:“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达到足以自给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②希腊人理解的城邦是建立在小国寡民的宗法社会基础上的,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每个城邦的规模应该控制在5000公民左右,也就是说居民相互认识。那么希腊的城邦为何维持如此小的规模而没有发展成为大的政治单位?一是“在希腊没有很多的经济依赖,在这个国家各部分之间也没有足以将希腊人拉出小社区的相互间的动力”^③。二是自然地理如大海、山脉的阻隔,使他们很难形成大范围的共同利益。这不仅是希腊地区的特点,也是整个巴

①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卷,第420节。《理想国》又被译为《国家篇》。《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卷,第270页。

②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卷,第1、2节。奇怪的是同一段翻译竟有相当大的区别,请看:“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城市社团。……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卷,第1、2节。

③ 基托认为,希腊的城邦公民人数都在两万公民以下。基托:《希腊人》,第80、83页。

尔干半岛的特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其他古代文明形成的中央集权式大帝国的现象。然而也有人认为,“真正的解释在于希腊人的性格”,他们愿意生活在城邦的自由制度下,“城邦的全部生活,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极其容易把握,因为所有事物都在这个小范围里。……公共生活具有一种直接性和具体性”,进而他们能够从城邦制度获得其日常琐碎的私人生活中的正义。每个私人的正义和幸福在城邦制度下汇合成为祖国的崇高和尊严,私利和公益得到了最完美的融合。总之,“城邦是一种生活共同体,基于血缘关系,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假想的——一种扩展的家庭”^①。

由中心城堡和周围的农村构成的各个城邦在理论上具有独立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是在实践中强大的城邦控制弱小的城邦。古典时代希腊政治上出现过雅典、斯巴达、提比斯、科林斯和阿尔哥斯等大城邦,其中只有少数城邦公民人数超过两三万。雅典和斯巴达所代表的两种古典希腊政治制度是人们一直热衷探讨的话题,学者们对此著书立说从未感到厌倦。包括葡萄酒、橄榄油、陶器和手工制品在内的希腊产品,从周围世界交换回大量的粮食、金属、原木和毛皮。公元前7世纪末,希腊城邦在商业贸易中普遍使用金属货币。商业活动使地中海世界物质交流活动空前的活跃,缓解了人口分布不均造成的地区性消费物质供求矛盾,基本维持了各地区城邦间物质消费的平衡,进而带动了整个希腊地区文化的繁荣,希腊文化逐渐进入其“黄金时代”。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明逐步进入古典时代。文化发展首先表现为“思想解放”,最靠近东方的小亚细亚地区伊奥尼亚开始兴起“伟大的理智运动”,那里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这“也许得之于伊奥尼亚人比欧洲希腊人更具个人主义色彩”。活跃的物质交流和充足的物质生活促使这里的希腊人迅速提高其精神生活的质量,他们注重发展格调优雅的文学和思维深邃的哲学,古典时代的古希腊文字也由

^① 基托:《希腊人》,第88、94页。

此开始形成,诗歌和戏剧迅速发展,与之同时兴起的是音乐和舞蹈。“优雅与魅力是伊奥尼亚艺术的标志,正如力量与美是多里安艺术的特征。要认识这一点,只需比较伊奥尼亚建筑与多里安建筑:伊奥尼亚风格普遍的轻盈,点缀着伊奥尼亚柱头的迷人的旋涡形头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个人抒情诗差不多都出自伊奥尼亚……与同时代的斯巴达和雅典诗人不同,他们写他们作为个人感兴趣的题材”。与伊奥尼亚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不同是斯巴达人近乎严酷的文化风格,“伊奥尼亚和多里安代表着两种相反的生活观——动态的与静态的,个人主义的与公社制的,离心的与向心的——我们如今依然可以在东西方看到这种对立。在雅典,这种对立曾经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调和,由此开始了伯里克利时代阿提卡文化的完善”^①。文化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是由何而生,是斯巴达人的天性吗?答案还要从他们生存的物质环境中去寻找。斯巴达人在为缓解人口过剩压力而进行的征服活动中将自己与被征服民众隔离开来,并组成了高度军事化的独立群体,集体统治和剥削被征服的“边民”和希洛人。“一切优雅迷人的东西都从斯巴达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整座城市开始表现出人们所熟悉的兵营面貌”。没有娱乐,没有私人生活空间,他们终身过着职业军人的生活,斯巴达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努力维护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一中心,而法律是实现这一中心目标的关键工具,“吕库尔古斯法律并不旨在统治希洛人,而是要创造理想的公民。……斯巴达的法律是如此彻底地做到了希腊人所理解的法律的最高功能”^②。这大概是斯巴达人对古典希腊文明最大的贡献。

“这种凄凉而消极的生活方式产生于斯巴达决定靠希洛人的劳作为生,其僵化的特性最后终于证明在道德、理智和经济上都是毁灭的,而靠掠夺希洛人而维持的生活必定是沉闷无趣的”。雅典人创造的生活与此恰成鲜明对照,那里的公民在充分施展个性的同时将雅典城邦

① 基托:《希腊人》,第103、105—106、108页。

② 同上书,第110、114页。

推上了历史发展的顶点,个体创造性和积极性的高度发挥使其整体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单单这一个城市对希腊和欧洲文化所作的贡献是相当惊人的……应该说公元前480至前380年的雅典显然是有史以来最为文明的社会”。雅典人取得的这些业绩证明了“一个民族在自然天赋上极端富有,此外,它还暗示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东西,即这些天赋能够发展并完满地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①。根据基托的观察,“在雅典人的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对公共利益、共同语言的关注,这在希腊是罕见的,在现代希腊、现代欧洲同样是罕见的。……雅典人有这样一种观念,公益比党派的利益更为重要”。这种为求得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体和集体利益的调和精神在处理城邦内部事务中就产生了德拉古法律和梭伦改革的成果,庇西斯特拉图短暂的僭主统治仍然“小心地维护了梭伦的中庸的民主宪政的形式”,克利斯提尼改革则从程序上进一步加强了雅典民主制,“贵族出身的克利斯提尼沿着梭伦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并且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就这样,雅典的政制乃是人类的天才所能创立的最为民主的政体”^②。

希腊古典文化最杰出的代表雅典城邦是在反抗波斯人入侵的斗争中兴起的。波斯人属于印欧语系人种,公元前2000年进入伊朗高原,长期处于米底人统治下。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在反抗米底统治斗争中崛起,并迅速成为中亚强国。新兴的波斯人在向地中海方向扩展其势力过程中,寻找借口入侵希腊,挑起希波战争。在战争中,希腊人从“民主”分散的城邦关系向以雅典为领导核心的联系比较紧密的组织形式过渡。特别是对抗波斯人的海上进攻,雅典建立发展了强大的舰队,这为日后雅典以提洛同盟为工具建立爱琴海海上霸权奠定了基础。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希腊人取得了胜利,波斯势力被逐出爱琴海。战争的胜利不仅强化了希腊人共同利益的意识,而且促进了雅典帝国的形成。而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各地物质资源通过“帝国体制”源源不

① 基托:《希腊人》,第112、117页。

② 同上书,第119、123、128、130页。

断输送到雅典,从而为雅典文明发展到古代世界巅峰提供了物质条件。“其结果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文化既有优秀布尔乔亚社会的严肃与团结,也有贵族制的优雅、精细与方正无偏”^①。

我们根本无法用一段文字全面概括叙述雅典取得的巨大文化成就,其丰富的内涵可以满足多卷巨著的需求,而且,与其用外行的语言生硬地把它压缩进人为的叙述框架,还不如再度大段引用基托的总结:“在政治方面,她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抗衡的海上同盟的领袖,并且人们能够为这样一个事实而骄傲:那就是他们的城邦所做到的一切,靠的不是那些凭其声名行事的强有力的官员们,而是所有参与有着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的普通雅典公民。在智力方面,整个思想和知识的世界在此开启,这得多多地感谢他们在伊奥尼亚的近亲。在贸易和工业方面,雅典迅速赶上了那些起步比她早得多的城邦;……在艺术方面,同样,一个新世界敞开了,青铜和大理石之间的长期争夺,将建筑和雕塑带到了古典艺术中近乎完美的境地。同时,将伊奥尼亚的优雅同多里安的力量相结合是那些近乎一贯为城邦工作的艺术家的任务。雅典的陶工和画家正在接近成功的巅峰;悲剧,这最为雅典化的艺术日臻成熟并越来越激动人心;与此同时,从一种滑稽的乡村狂欢中,一些非常有趣的可能性被发现,事实上,这使阿里斯托芬及其同僚们的辉煌而充满智慧的喜剧得以诞生。”^②正是在这个理性与激情同时活跃的地方,古代世界的一切知识都得到系统的归纳和总结,而艺术创作所必需的激情使雅典的艺术家们达到了人类在造型艺术领域的极致,后人再也无法企及更无法超越。丰富的精神生活不仅反映在诗歌文学方面,也充分体现在陶绘艺术中,陶瓶表面的图案更加生动,神话人物和故事场景的图案形成了雅典陶器绘画的独特风格,阿提卡(雅典所在半岛的名称)“红陶”或“白陶”驰名地中海世界,显然同时售出

^① 基托:《希腊人》,第131页。对于希波战争的胜利,基托认为是自由制度战胜了东方的专制,“自由和理性战胜了专制和恐惧”。见该书第142页。

^② 同上书,第143—144页。

的是当地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石雕艺术也渐入佳境,特别是大理石雕刻艺术品和公共建筑成就了雅典千古不朽的美名,它们也成为巴尔干半岛千古不朽的文化遗产。

但是,缺少了外敌压力的希腊人再度陷入内讧,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冲突日益激烈,最终于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又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是希腊城邦史的转折点,实质上是城邦制度的终结。而城邦制度终结的原因十分复杂,“正是发展打破了城邦制。地中海的开发以及商业的发展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商业竞争立刻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对爱琴海的)控制是不能与城市国家系统和谐并存的”。特别是,“既要保持城邦制又要能与这样一支(职业)军队抗衡,这是不可能的”^①。战争结局表面上看雅典失败了,从此衰落,但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希腊由此失去了往昔的和平,内战频仍、强权割据、僭主并立、争权夺利、血腥杀戮、人民涂炭、流离失所、经济崩溃、商业凋敝、精神颓废、思想危机,古希腊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②。

希腊人的内战及其必然的衰落为马其顿人的兴起提供了机会。马其顿人属于希腊北方部族,早在希波战争期间,他们表面上投降波斯人,暗中支持希腊人,并乘希腊人内战之机,利用其特有的农业资源积极发展,扩充实力。公元前359年,23岁的菲利普二世成为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他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机智,首先消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建立强大的军队,而后通过征服伊利里亚人、安菲波利斯城邦和奥林图斯城邦,逐一扫描掉其南下统一希腊道路上的障碍,征服了整个希腊。公元前337年菲利普二世主持召开的希腊城邦大会标志其统一希腊事

^① 基托:《希腊人》,第206、209页。

^② 基托在分析古典希腊衰变原因时说:“至少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那就是持续了一个世纪或更长久的战争使希腊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消耗殆尽。在这样的状况下,一切都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城邦连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方式也无力提供。”基托:《希腊人》,第201页。

业的成功。事实上,早在公元前4世纪初爆发的科林斯战争和底比斯战争等希腊内战已充分暴露出希腊城邦制度的弊端,人们迫切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为他们带来安宁的强权,菲利普二世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①。菲利普二世被刺杀后,其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推行强权政治,无情镇压反叛势力,并于公元前334年率兵进入亚洲,发动大规模的东征战争。他充分继承了其父创立的“马其顿方阵”等军事艺术,多次以少胜多,兵锋所向,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仅用10年时间就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这个被后人称作“亚历山大帝国”的军事实体,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印度河流域,南抵尼罗河河谷,范围不可说小,但是其结构松散,各地社会生活差异悬殊,民族各异,信仰不同,语言不通。因此,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疟疾后,帝国迅疾瓦解,分裂为几个王国,分别由其部将统治。这些王国的存在只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尾声,它们相互攻击,争夺土地,逐渐形成了托勒密、塞琉古和安条克三个王国。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王国经过“希腊战争”再度瓦解了反叛的希腊人联盟,但是,此时的马其顿王国实力已不可与昔日相比。它对希腊各城邦不断的反叛穷于应付,在与托勒密王国的长期较量中不断消耗,直到被崛起于西地中海的罗马人征服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马其顿人进入历史舞台,巴尔干半岛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基本是以爱琴海和东地中海为主要活动区域,其文化影响尚未深入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区,或者说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区的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达吉亚人还没有全面卷入古希腊人的活动。而兴起于希腊北方的马其顿人第一次从军事战略安全的角度,将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纳入关注的视线。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尚无法了解菲利普二世在马其顿内陆地区经营的细节,但是,他那位雄才大略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在多瑙河地区进行的胜利战役对巴尔干半岛史具有特殊的意义,至少他已经把巴尔干半

^① N. G. L. Hammond and G. T. Griffith, *A History of Macedon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II, pp. 125—155.

岛北部地区当作自己的后方。还有一点要提及,胜利的马其顿人似乎没有鄙视被征服者的文化^①,他们虽然比雅典人拥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在精神上自感粗俗,毕竟自由公正、典雅悠闲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共同向往的,而大量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杰作对人类智能的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他们虽无新的创造,但能虚心学习并将古希腊文化传播四方。“希腊化时代”之所以如是定名,就是因为“希腊化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是把希腊文化传播到古老的近东各地,传播到新兴的罗马世界”^②。

天才的古希腊人在其绚丽多彩的生活中创造了杰出的精神文明,并使这个文明能千古不朽,成为巴尔干半岛、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遗产^③。概括而言,古希腊文化的精髓表现在人的理性和人文精神方面,前者创造出万物一体和天道可知这样具有深邃哲学意味的希腊精神,后者则创造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积极性的公共生活方式,进而将当时已知的所有人类知识纳入理性的框架,创造出无数空前绝后的杰作。就本书的主题而言,由这种文明开始,巴尔干半岛多元文化融合的积累揭开了其漫长过程的序幕。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克里特文化、迈锡尼文化,还是古典时代的斯巴达和雅典文化,甚至地中海上诸如古埃及文化、腓尼基文化,都在这个过程中添加了各自的因素,都在巴尔干半岛文化发展中施加了自己的影响。特别是巴尔干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多种文化融合之地。

① 亚里士多德受聘担任亚历山大的教师,并随其远征军游历世界,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②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83页。该书对于希腊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有细致的探讨,并对吴于廑、杨巨平、沈坚、颜海英和作者本人等从事该课题研究的我国学者及其作品作了介绍。

③ “这是两种文化之典型特征的融合——希伯来人的宗教热忱和希腊人的理性及人文精神——这一融合形成了后世欧洲文化和基督教的基础。”基托:《希腊人》,第2页。

古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东侵战争中得到广泛传播^①,从爱琴海、东地中海一隅扩展到整个欧亚非核心地带,从遥远的我国西域地区一直延伸到西班牙,从尼罗河中游地区一直扩展到俄罗斯冰原。直到罗马征服战争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形势的时期,情况才发生了新的重大改变。

第二节 古罗马东扩与行省建制

罗马时代,巴尔干半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巴尔干半岛被罗马军队以暴力强制纳入罗马行省体制,尽管罗马人对半岛各个地区进行的征服残暴程度不同,半岛各个地区屈服于罗马统治有先后之分,且半岛被分划为不同的行省,但是整个巴尔干半岛第一次被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权力下。相对而言,古希腊时代半岛北部和西部地区人迹罕至的现象得到了改变。与古希腊时代外部世界物质资源大量涌入半岛的情况截然相反的是,征服使巴尔干半岛成为罗马统治剥削的对象,资源外流,地区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其次,巴尔干半岛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区北移,从半岛南部、爱琴海和东地中海迁移到半岛中、北部,其原因是罗马征服彻底改变了半岛的政治版图。巴尔干地区原有的中心区,如阿提卡、伯罗奔尼撒、马其顿,都丧失了曾有的地位,半岛作为罗马统治的殖民地和附属部分,按照罗马行政当局的行省规划重新布局。从意大利半岛向东,自伊庇鲁斯经马其顿和色雷斯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线成为最重要的中心区,因为这条路线是罗马进军西亚各“东方”行省的咽喉要地。最后,随着拉丁人政治统治地位的确立,古希腊时代的宗教和文化也退居到次要地位。这里,我们使用“退居”一词是要表达两层含义,其一,古希腊文化从此失去了主流文化的

^① 有的学者认为,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化不仅仅指希腊文化的传播,而且“是希腊与东方观念融合的,尤其通过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工作,它传遍东方”。R. H. 巴洛:《罗马人》,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地位,以希腊语为媒介、以宙斯为主神的神话体系与宗教信仰也被全面拉丁化。其二,古希腊文化并未消亡,也没有被连根拔起,像犹太宗教与文化那样背井离乡,流浪异地。古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化继续在东地中海地区民间代代相传,并与犹太教结合形成了新的世界宗教:基督教。

当罗马人开始兴起于亚平宁半岛之际,古希腊城邦就已陷入衰落中。甚至当罗马人开始向东地中海扩张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已经日薄西山分崩离析了。罗马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干涉活动开始于公元前230年,当时正值罗马人对西地中海征服战争的关键阶段。为了清剿亚得里亚海上的海盗,罗马人一度扫荡海盗老巢伊利里亚地区,并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建立了据点^①。但是,此时罗马人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布匿战争中,无暇过多顾及东地中海事务。对罗马人的威胁,希腊的有识之士呼吁停止内战,注意“西方升起的乌云”^②。然而,为了在内战中占得先机,一些希腊城邦请求罗马人帮助。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控制希腊联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公元前231—前179年)在迦太基杰出将领汉尼拔一度取得布匿战争主动权时,错误判断形势,贸然在公元前215年与后者结盟,企图借助迦太基的力量阻遏罗马人的崛起^③。罗马人则支持菲利普的敌人埃托利亚同盟坚持了10年内战,这极大地消耗了交战双方的力量。而后的半个世纪,罗马人更深的卷入巴尔干半岛事务。公元前197年,罗马人在埃托利亚同盟帮助下在西诺塞发利战役中击溃菲利普五世,迫使后者交出海军,赔款,退回马其顿,将占领的土地交还希腊人,希腊各城邦获得独立自由。罗马人对菲利普五

① John Wilkes, *The Illyrians*,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1992, pp. 185—196.

② J. C. Robertson and H. G. Robertson, *The 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Victoria Colle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J. M. Dent, Ltd. 1928, p. 135.

③ 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卷,第1节。事实上,这是复杂的外交技巧的角逐,阿庇安就此做了详细记载,菲利普五世不仅与腓尼基人而且也与罗马人谈判订立和约的事情,“这是两者之间第一次试探实力的结果,双方都不相信这是一个稳定的和约,或者是以善意为基础的和约”。见同书,第3节。

世的胜利和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被后代学者认为是“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的结果^①。

罗马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在巴尔干半岛推行其削强扶弱、均衡希腊各派势力的政策,而希腊各城邦间争斗不止也为罗马人提供了机会。罗马人支持其盟友阿亥亚发展势力,利用希腊—罗马联军迫使斯巴达同意阿尔哥斯城邦退盟而转入阿亥亚同盟,并最终吞并该城邦。由于希腊各城邦对罗马人的干涉深表不满,埃托利亚同盟企图联合希腊各派势力,特别是受到罗马人打击的马其顿反抗罗马。恰在此时,西亚新兴势力塞琉古王国国王安条克三世也积极介入希腊事务^②。当时,塞琉古王国在安条克统治下国势强盛,向四边扩张,曾进击波斯和大夏,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威胁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甚至在布匿战争中战败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也希望借助塞琉古王国的力量东山再起,于公元前195年逃亡到安条克三世新建的陪都伊弗所^③。安条克三世借口赫勒斯滂海峡及其以西地区应归其所有,在埃托利亚同盟的请求下,于公元前192年,在罗马军队撤回西地中海后两年进兵希腊,进入巴尔干半岛东部色雷斯地区。塞琉古王国势力的西扩必然与罗马人发生冲突。次年,罗马进兵希腊,在古战场温泉关击败安条克三世,而后继续追击,在科里库斯海角歼灭塞琉古海军,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亚再次大败安条克三世。塞琉古王国由此衰败,罗马人在地中海东岸又少了一个对手。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又以罗马人的胜利结束,而此时罗马人扩张力量还没有达到极限,巴尔干半岛不可避免地将被吞并。

① Peter Wells, *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5—46.

② E. R. Bevan, "Antiochus III and His Title 'Great - King'",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22 (1902), pp. 241—244. S. M. Sherwin - White, "Babylonian Chronicle Fragments as a Source for Seleucid History",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4 (Oct., 1983), pp. 265—270.

③ D. W. Thomson Vessey, "Silius Italicus: The Shield of Hannib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96, No. 4 (Winter, 1975), pp. 391—405. H. H. Scullard, "Carthage",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2, No. 3 (Oct., 1955), pp. 98—107.

公元前171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此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已经去世，其子拜尔修斯继承王位。拜尔修斯希望重振马其顿王国的雄风，不仅强化内政改革，增强实力，而且积极发展对外关系，扩大势力。他与巴尔干半岛主要势力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结盟，企图联合抵制罗马人对半岛事务的干涉。他还通过政治联姻加强与塞琉古王国的关系。罗马人始终密切关注巴尔干半岛形势的变化，对于拜尔修斯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深感不安，于是根据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的停战协议，要求拜尔修斯解散武装力量，并借口后者违反协议出兵巴尔干。经过4年的战争，罗马军队于公元前168年在皮德纳战役中击败拜尔修斯，迫使其投降。为了彻底消除反抗势力，罗马军队在半岛地区大肆抢掠，仅伊庇鲁斯一地就有70座城市被摧毁，15万人被卖为奴隶。希腊和色雷斯地区也遭到空前的劫掠，不仅大批财富作为战利品被运往罗马城，而且众多人口被变卖为奴，许多青壮年被押解到罗马训练为角斗士，妇女儿童成为奴隶。巴尔干半岛地区大批受到怀疑的人士作为人质被送往罗马，所有军事设施都被平毁。阿亥亚同盟的1000名贵族被扣押在罗马当作人质。马其顿王国起初被分割为4个附属于罗马人的小国，它们相互间不得从事贸易等活动，只能与罗马人进行交易。可以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结果是罗马人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了残暴统治^①。

罗马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残暴统治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公元前149年，马其顿地区首先爆发了人民起义，得到了其他地区人民的支持。起义领袖安德里斯克自称为前国王拜尔修斯之子，率领起义军多次击败罗马人，势力一度向西推进到希腊中部地区。希腊地区也同样爆发了反抗罗马残暴统治的人民起义，阿亥亚同盟为首的各希腊城邦在希腊中部和南部联合作战，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强大的陆军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为了战争的需要，同盟征收富人税，并将当地的奴隶征召入

^① Peter Wells, *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World*, pp. 132—146.

军队。但是,长期分裂的希腊本身就缺乏与罗马对抗的力量,更因为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以降罗马人统治对当地的破坏,起义军在罗马人强大军队压力面前不堪一击,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军队镇压。罗马执政官穆米乌斯将起义中心科林斯彻底摧毁,夷平城池,杀死所有男子,将妇女儿童悉数变卖为奴。罗马人宣布解散所有同盟,并下令此后禁止建立任何类似组织,违抗者处以极刑。希腊半岛个别支持罗马的城邦如雅典、斯巴达等虽然被允许自治,但是也被强制取消了民主制,代之以寡头独裁制。罗马军队于公元前148年再度出兵巴尔干半岛,残酷镇压了起义,并取消了马其顿小王国的附属国地位,将马其顿地区变为罗马的行省。缺乏统一领导的巴尔干半岛就是这样被正处于扩张旺盛时期的罗马人征服,第四次马其顿战争的结果也最终确立了罗马人在半岛地区的主宰地位^①。

第四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元老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重新组建希腊省区,将希腊变为罗马的附属国,马其顿则继续成为罗马的行省。所谓“行省”,是指罗马人在征服地中海战争中,在被征服地区建立的统治制度。最初,建立行省的目的是出于稳定征服地区的考虑,当地政治军事权力集中由罗马军队控制,后来由最高军事指挥“元首”控制,而当被征服地区不需要更多的军事力量时,行省就转归元老院控制。行省既可以等同于以往的省,也可以包括几个省,其范围完全根据征服后罗马人统治的需要而定。特别是在元首制建立后,所有需要驻军的省都成为元首控制的行省,而那些已被征服、政局稳定的省就成为元老院控制的行省。在巴尔干地区,因局势动荡、罗马军队活动频繁,伊利里亚行省成为元首省,后来更一分为二,成立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两

^① 征服马其顿的罗马将军被罗马史家记载遭到神明的报复,“当鲍鲁斯的幸运达到这样的顶点的时候,神明嫉妒他的昌盛。他的四个儿子中的两个大的,马克西马斯和西庇阿,过继给别的家族了;两个年纪小点的,一个死于他举行凯旋之前三天,另一个死于他举行凯旋之后五天。……他说:‘我战胜了柏修斯,征服了马其顿。……现在灾祸降在我身上,我突然丧失了我的两个儿子’……人人同情他。他不久之后就死了。”阿庇安:《罗马史》,第9卷,第19节。

个行省^①。

行省制是罗马人的一项重大发明,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希腊人确立的城邦制。城邦制是公民个体天赋自由发展并汇集成强大的整体力量的制度,而行省则是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强制整合在一个大帝国框架内的体制,惟有行省制才能将数十乃至上百个被武力征服的民族都变作一个以地中海为内海的统一帝国的组成部分。行省的首脑为总督,产生自任满的执政官或行政长官。属于元老院的行省总督由元老们在卸任后5—10年的资深执政官中选举产生,任期5年;属于元首的行省总督由元首任命“代行政长官”,一般为3年^②。所有的行省按照军事扩张上的重要性和面积的大小分为三级,巴尔干半岛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行省属于第一级^③。无论是元老院管理的还是元首管理的行省,实质上都是罗马军事征服的结果,因此,它们均属于罗马人残暴剥削的对象。在巴尔干半岛,罗马人长期保持军事上的高压态势,在上述两行省分别驻扎一个军团,随时镇压人民起义。在经济方面,罗马人通过机构完备的军事官僚体系,对半岛地区征收重税,摊派各种劳役,并以商业垄断的形式全面控制各行省的贸易和物流活动。在政治上,罗马人任命的最高地方首脑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他们只对罗马元老院或元首负责,其职责主要是贯彻执行罗马中央政府的决定。罗马当局

^① John Wilkes, *The Illyrians*, pp. 205—221.

^② 总督原本也受到一定的制约,但作为地方的“太上皇”,他们“拥有至上权,即与本土执政官拥有相同类型的权力,然而却没有同僚掣肘;制约他的手段就此只有:a)总督任期为一年;b)与其毗邻的行省的总督拥有同等的权力,尽管这后一条更多的是起到令其恼火而非收敛的效果。但是,罗马人民自己取消了短期任职这一约束机制,他们投票同意一个又一个将军长期任职,将他们提拔为名分显贵的总司令官,要求他们在所有场合都扮演大众英雄的角色,由此削弱了尚存的惟一制约机制,即某些针对治理不当的法律以及促使此类法律实施的起诉活动”。R. H. 巴洛:《罗马人》,第58页。

^③ 关于罗马行省制度的系统研究除了大量专题论文外,《古代罗马史》第9章,第3节,第一部分“对行省的统治”中有全面系统的论述,李雅书和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4—259页。该书一些部分是以杨共乐的《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1994年)相应部分为基础改写扩充而成。

还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法规,禁止半岛地区各种集会结社,禁止各城市相互联系或结盟,取消言论自由,对反对罗马人统治的言行施以极刑。为了方便运输军队和传达政令,罗马人在行省各地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建立了完善的邮驿制度。在文化方面,罗马人残酷镇压迫害非罗马信仰的宗教,大肆宣传和支持罗马多神教信仰,特别是宣传对元首的崇拜。例如,基督教在产生的最初300年间受到过残酷迫害,教产被没收,信徒被流放,他们的书籍被禁止和焚烧,史称“十次大迫害”^①。又如,犹太教也受到残酷镇压,其殿堂被平毁,信徒被屠杀。可以说,行省统治既是罗马军事征服的结果,又是维护罗马在被征服地区统治的有效方式。巴尔干半岛在罗马人长达数百年的统治下,遭到严重的破坏,自然资源环境严重恶化,人口持续低迷不升,半岛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被彻底打破。

巴尔干半岛在罗马统治初期曾深受米特拉达梯战争的影响。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罗马人与本都人的冲突。本都王国(Kingdom of Pontus)的中心在黑海南岸、小亚细亚东北部地区,最初为亚历山大征服战争中建立的王国,首都阿马塞亚。公元前2世纪,本都王国在米特拉达梯五世及其子统治时期逐渐进入全盛,势力迅速扩大。公元前121年,米特拉达梯五世去世,由其子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adates VI,公元前132—前63在位)即位,与其母和兄弟共掌王权。年轻的国王在位期间强化王权,囚禁其母,杀害其弟,与其妹妹结婚,发展王国实力,并大肆对外扩张,到公元前88年时已囊括了黑海沿岸、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小亚细亚。本都王国的西扩必然与罗马人的东扩发生冲突^②。为了与罗马人作战,米特拉达梯六世对外修好对内强兵,积极发展与邻国埃及、

^① L. H. Canfield, *The Early Persecutions of the Christian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13, pp. 25—46.

^② 阿庇安关于米特拉达梯战争记载得极为详细,他认为是罗马人挑动本都王国的邻居尼科美德首先发动战争。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战争是两大势力争夺控制范围的结果。阿庇安:《罗马史》,第12卷,第12—14节。

叙利亚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扩充军队,作好战争的各项准备。当罗马人忙于意大利战争时,他乘机进军小亚细亚,占领罗马的小亚细亚行省,开始与罗马军队发生正面冲突。公元前88年爆发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在西向进军中,米特拉达梯全面废除罗马人的统治,宣布所有希腊城邦独立,享有5年的免税权,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清除罗马势力的活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深受罗马人统治之苦的小亚细亚人民热烈欢迎米特拉达梯,将他当作“解放者”。而后,米特拉达梯继续西进进入巴尔干半岛,首先占领了色雷斯和马其顿,以此为基地进军希腊。希腊各城邦纷纷脱离罗马控制,倒向本都。至公元前87年,本都王国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全境和爱琴海所有岛屿^①。

本都王国的扩张直接损害了罗马人在东方的利益,庞大的罗马军队和奢华的罗马城市生活就是建立在征服和掠夺东方资源的基础上。因此,罗马人立即对本都王国的扩张作出反应,他们决定在意大利战争后对本都王国发动战争。公元前87年,罗马将军苏拉在镇压清洗了马略党人并稳固了对罗马城的控制后,亲率大军对本都王国进行征讨。希腊各城邦慑于罗马人的军事压力,争先恐后派遣使节向抵达希腊的苏拉致敬。他对于继续效忠米特拉达梯的雅典人无情打击^②,占领雅典后,接连击败本都王国军队。公元前86年,罗马军队乘胜追击,从希腊攻入小亚细亚,迫使连遭败绩的米特拉达梯求和。此时,罗马发生了政治动荡,苏拉的对手马略派重新控制政权^③,他因此急于从东方战事中脱身。罗马人和本都人订立和约,规定本都王国放弃其占领的一切土地,交出战舰,支付赔款。而后苏拉领兵回意大利。

第二次本都战争是在罗马人经历了几年内战后开始的,罗马将军

^① 阿庇安:《罗马史》,第12卷,第22—23节。

^② “罗马人冲入城内。跟着在雅典城内发生了残酷无情的大屠杀。居民因为缺少营养,无力逃跑,苏拉下令,不分青红皂白大加屠杀,妇女和小孩也不饶恕”。阿庇安:《罗马史》,第12卷,第38节。

^③ “马略宣布他为罗马人民的公敌,破坏了他在罗马城内以及乡村的房屋,杀害了他的朋友们”。阿庇安:《罗马史》,第12卷,第51节。

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106—前48年在位)原为苏拉的部将,凭借血腥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和马略骑士党人声名大噪。公元前66年,庞培经元老院授权获得对本都王国战争的指挥权。经过3年战争,罗马军队再次击败本都王国,将米特拉达梯赶出本都王国,并最终迫使其自杀,结束了米特拉达梯战争。庞培在被征服土地上建立罗马人的本都和比提尼亚行省,还进一步扩张到叙利亚,将整个东方当作其根据地。公元前62年,庞培得胜还朝,其军队满载战利品和大量掠夺来的物资在罗马城举行盛大凯旋仪式^①。但是在随后的罗马内战中,庞培失利,于公元前49年逃往东方。他在次年的巴尔干半岛法萨卢战役中败于恺撒。

罗马人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在公元初年前后一直卷入罗马将领争权夺利的血腥战争,一些重大战役就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及其周围海域。例如公元前48年,恺撒(Julius Caesar)与庞培在希腊中部塞萨利的法萨卢进行决战,后者战败逃亡到叙利亚,被克里奥帕特拉的弟弟托勒密设计杀害^②。又如公元前42年,罗马“后三头”政治同盟的安敦尼(Mark Antony)和屋大维(Octavian)联合出兵,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交界处腓力比击败共和派将领卡西约(Gaius Cassius Longinus)和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后两者被迫自杀。再如公元前31年,“后三头”分裂,安敦尼和屋大维决战于希腊西海岸的亚克兴海角,前者因贪恋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 VII, 公元前69—前30年在位),在阿克提乌姆海战的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导致全军大败,最终在埃及自杀^③。

① 通常人们认为米特拉达梯服毒自杀身亡,但事实上“毒药对他没有效力,因为他惯常不断服食了其他药品,以防止他人给他下毒药的”,所以他请求其手下名叫毕都伊塔斯的军官将自己杀死。获胜的庞培当时只有35岁,“他被授予一个凯旋式,其显赫豪华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阿庇安:《罗马史》,第12卷,第111、116节。

② 有些历史教材说庞培是被迫自杀的,这不对。事实上是托勒密“国王的教师狄奥多图也在场,他提出了一个不名誉的建议,说他们可以设一个圈套杀死庞培,以讨好恺撒。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当庞培转过身去的时候,他马上刺他第一刀,其余的人跟着他刺”。阿庇安:《罗马史》,第14卷,第84—85节。

③ 阿庇安:《罗马史》,第593页。

罗马人在巴尔干半岛被征服地区又新建了几个行省,如以科林斯为首府的阿亥亚行省,包括塞萨利地区在内的马其顿行省和色雷斯行省,前两者由罗马元老院直接控制。这些行省和小亚细亚及西亚设立的一批行省成为罗马统治当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主要对象,大批的生活消费品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意大利,为罗马人豪华淫荡的城市生活提供物资供应^①。

为了保持北部疆界,罗马人将其 28 个军团中的 7 个部署在多瑙河前线。同时,在罗马正规军团外还设立辅军,他们和正规军团的将士一样后来在驻扎地定居下来。多瑙河前线的所谓罗马军团事实上大多由当地居民组成。罗马帝国建立之初,奥古斯都确定了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帝国欧洲领土的自然边界线。“从此时开始,军队的功用是保卫边疆。约 20 万罗马公民组成的 25—30 个军团,在由人数大致相当的当地所征兵员所组成的‘辅助部队’的协助下,驻扎在那些可能遭受境外威胁的行省,或那些其居民尚未罗马化的行省;因为,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罗马军队是一股强大的教化力量”^②。巴尔干半岛北部多瑙河南岸地区是罗马帝国军队重点清理与防卫的区域,因为多瑙河上游的凯尔特人常常袭击和抢掠罗马人。在大约 15 年的清剿战争中,罗马军队经历了艰苦的山区作战,最终将凯尔特人赶出河南地区,并在征服地区重建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两个行省^③。可以说,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是在奥古斯都时期确定为罗马帝国的领土,从此该地区逐步纳入半岛政治体系中。

① G. L. Duncan, *Coin Circulation in the Danubian and Balka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A. D. 294—578, London: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1993, pp. 34—45.

② R. H. 巴洛:《罗马人》,第 97 页。多瑙河下游出土的石碑铭文证明边疆居民组成了这类“辅助部队”,铭文称:“第五马其顿军团的老兵 C. 瓦勒里乌斯·普登,定居点的行政长官 M. 乌尔庇乌斯·莱昂西乌斯,以及市政官图卡·奥勒留将这份礼物献给生活在第五马其顿军团驻扎地区的老兵和罗马公民(眼下他们无疑都是商人)。”R. H. 巴洛:《罗马人》,第 102 页。

③ Ernst Jackh, "The German Drive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6 (Nov., 1939), pp. 763—783.

此后数百年间,巴尔干半岛在罗马帝国统治下逐步得到开发,也发生了多方面变化。

首先,由于频繁的地震和恶劣天气,许多城市和农村受到破坏,皇帝提比略(Tiberius, 14—37年在位)下令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工作,特别是在东方行省按照罗马人的设计重建12座城市,在罗马帝国早期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①。

提比略死后第10年,罗马帝国为加强巴尔干半岛的安全,防范北方“蛮族”的入侵,建立了色雷斯行省和莫埃斯亚行省,前者所辖区域包括保加利亚南部和希腊爱琴海沿岸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后者则包括了色雷斯行省以北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山区以及多瑙河下游地区。这使整个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都纳入到罗马边防体系中,使这个地区维持了几代人的安定状态。107年,罗马人更进一步在多瑙河以北的喀尔巴阡山南麓达吉亚地区设立了行省,以为拱卫多瑙河中下游的前哨,从而确保巴尔干半岛北部安全。这样,罗马帝国就完成了其全部疆域的行政建制,而在总共43个行省中,巴尔干半岛的行省对罗马国防务体系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是连接罗马所在的意大利半岛与东方各行省的战略要地。无论是发自首都罗马的命令和派遣镇压东方各行省叛乱的军队,还是从东方征服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和强制征收的税赋都要经巴尔干半岛通过。那条东西横贯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埃格南底亚大道”几乎就是罗马帝国庞大身躯的主动脉。当皇帝戴克里先决定推行将帝国一分为二的“四帝共治制”因而切断了这条大动脉时,罗马帝国西部衰败的命运就确定了。

皇帝马库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 161—180年在位)统治期间,巴尔干半岛南部爆发大规模瘟疫,并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19世纪的古典历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认为,古代地中海世

^① Walter M. Hayes, "Tiberius and the Future",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55, No. 1 (Oct., 1959), pp. 2—8. R. Shaw - Smith, "A Letter from Augustus to Tiberius",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18, No. 2 (Oct., 1971), pp. 213—214.

界居民遭受严重损失,以后也未能从这次瘟疫打击中恢复,进而为日耳曼人成功征服罗马帝国创造了条件^①。

其次,在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中产生了基督教,这个新宗教与犹太教有重要区别,它不仅继续坚持一神信仰,而且扩大了选民的范围,使它从民族宗教向世界宗教发展。其信仰得救和基督救赎的理论不仅在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民众中获得广泛欢迎,而且为此后打破阶级界限、从民间宗教向官方宗教转变确定了方向^②。特别是在保罗派改革过程中,保罗多次到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传教,到过希腊的雅典、腓立比、尼亚波利、塞萨洛尼基、哥林多等地,并在《圣经·新约》中留下了许多写给巴尔干居民的书信,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加前书”、“帖撒罗尼加后书”等篇章。

再者,一些罗马皇帝出于奢侈生活的需要,注意发掘希腊古典艺术,例如,尼录(Nero,54—68年在位)曾长期逗留希腊,到希腊各地巡回演出,亲自上台说拉弹唱,并获得1800个竞技表演的桂冠。他高度赞扬:“希腊人是唯一懂得如何欣赏的民族”,因此宣布希腊人为自由人,即在经济上降低了税收^③。同时,他下令开凿科林斯地峡,以方便从亚得里亚海到爱琴海的航行。又如塞维鲁皇帝(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时期,大力支持朱丽亚(Julia Domna)开展文化活动,后者从希腊聘请许多学者和艺术家,推动希腊罗马文化的融合^④。

最后,罗马人强化了 in 巴尔干半岛的军事统治,建立和完善了统治

① P. H. Reill, "Barthold Georg Niebuhr and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1 (Feb., 1980), pp. 9—26.

② 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③ 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册,第15卷,该卷主要描写尼禄的种种行为,特别是他热衷于表演,不仅“选择了那不勒斯这座希腊城市”,而且“在那里初试锋芒之后,就可以渡海到(希腊的)阿凯亚,通过歌唱在竞赛中赢得光荣的和长久以来受到人们尊敬的桂冠,这样就可以增加自己的荣誉,从而取得国人的赞美了”。引自第33节。

④ Richard Brilliant, *The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in the Roman Forum*,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967, pp. 210—234.

管理体制,镇压半岛地区被征服民族的反抗。其中最突出的是皇帝图拉真(Trajan, 98—117年在位),他大力推行罗马人对外战争的政策,于101—106年两度发动对东方安息(帕提亚)王国的战争,为此他在巴尔干半岛实行军事高压统治,以保证其东方前线的战事顺利进行^①。

罗马人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使半岛地区土著居民长期进行的开发活动被纳入帝国的政治框架,也使得巴尔干半岛逐渐参与到帝国上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半岛北部多瑙河边防地区的军队开始扮演罗马帝国政治角逐的重要角色,并为4世纪罗马帝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埋下了伏笔。例如,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政治斗争中,多瑙河军团和东方军团就起而反对莱茵河军团拥立的皇帝,拒绝服从其命令,同时拥立韦斯帕芎(Vespasian, 69—79年在位)为帝。69年,多瑙河兵团向意大利进军,击溃莱茵河军团,12月占领罗马,迫使元老院承认韦斯帕芎为皇帝,当时后者尚未回到罗马^②。总之,随着罗马人在巴尔干半岛统治的加强,该地区在罗马帝国晚期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罗马人涉足巴尔干半岛的500余年的历史,是充满了暴力征服和残酷剥削的历史。尽管如此,罗马人在此期间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对巴尔干半岛文化发展施加了一定影响,换言之,罗马人对巴尔干精神文明建设也作出了某些重要的贡献。

首先,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文化,诚如理查德·詹金斯所说:“罗马人是第一个把从另一个文化继承来的遗产变成他们文明核心的民族。”罗马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接受古希腊文化,“大量的希腊思想被他们纳入其务实而充满活力的精神中,通过他们的转化,并以——经过罗马人统治下的诸民族的改变而被用于日常生活——某种样式流传下来”^③。雪

^① B. F. Harris, *Bithynia under Trajan: Roman and Greek Views of the Principate*, Auckland: the University 1964, pp. 38—42.

^② Kenneth Scott, "The Role of Basilides in the Events of A. D. 69",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24 (1934), pp. 138—140.

^③ 理查德·詹金斯编:《罗马的遗产》,晏绍祥、吴舒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莱以诗人特有的激情歌颂道：“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如果没有希腊，罗马这个我们的导师、征服者和我们祖先的家园，将没有什么光明可供播撒，我们也许还是野蛮人和偶像的崇拜者。也许比这还要糟……处在停滞而又可悲的社会制度的统治下。”^①这里，古希腊文化不是仅指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城邦的政治经济生活，也不是仅仅意味着自伊奥尼亚的荷马到公元2世纪的希腊作家琉善等众多杰出作家及其作品，“而应理解为一种广布于东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一种不断回首伟大的雅典时代以汲取其大部分灵感的文化”^②。

其次，罗马人保留下一个政治上集权的帝国政治框架，“罗马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下的民族，并把这个大帝国维持了好几个世纪，这是他们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希腊人为我们创造了民主制、君主制、僭主制等有关政治理论的名词，但罗马人在政治实践方面的影响更大。……当然，罗马遗产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君主制度，因为在那之前已经有过许多君主国了。它的贡献在于它把绝对专制主义与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结合了起来”^③。基托也说：“我们知道雅典帝国存在了五十年，而罗马帝国则有五百年……在产生一次次大混乱的间隙，罗马也为组织并保护其成员的生活作了许多努力：我们不能忘记在公元一世纪，欧洲——地中海世界比其他任何时候（无论古今）都平静，易于组织。”^④大帝国的理想、政治框架、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机构、维系帝国的制度等等，不仅成为此后以巴尔干半岛为腹地的拜占廷帝国政治家和教会领袖们尽心竭力千方百计追求的目标，而且影响整个欧洲近两千年，从查理曼大帝到奥托一世，从伊凡四世到默罕默德二世，直到19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阴魂还没有完全消逝。

① 转引自理查德·詹金斯编：《罗马的遗产》，第1页。

② R. H. 巴洛：《罗马人》，第61、59页。

③ 理查德·詹金斯编：“罗马的遗产”，《罗马的遗产》，第3—4、5、8页。

④ 基托：《希腊人》，第119页。

巴尔干半岛在漫长的“帝国梦魇”下经历着痛苦的煎熬。

第三,罗马人在军事扩张中使其承自古希腊和马其顿军队的军事传统得到高度发展,其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交通系统后来在巴尔干半岛政治与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长远的作用。“罗马军团代表了西方传统军事技术成就的完美顶点。它取代了早期希腊小型冲突和决定性大战役的作战传统,并配合以从马其顿军队继承下来的一体化和多样性的遗产。功利的罗马人找到了力量和优雅之间的奇妙平衡。……近5个世纪的岁月中帝国军队努力保持了严明纪律和优良技术的传统并因此保持了希腊—罗马的战场优势。……在西方,罗马的军事遗产也继续流传了800年”^①。为了保证军事机器高速运转,罗马人完善了古代的邮驿系统,修建了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从而为帝国内部物质和人员的交往提供了流通渠道。“道路的修建最初是出于军事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它们随需要而发展,并最终为战争和和平、贸易和交通等各种目的服务。……他们依靠出色的工程技术,修建‘之’字形的道路贯穿亚平宁和阿尔卑斯多山地带,但在穿越平原地带时,他们选择最短的线路……路面由不同的材料层悉心填平,路基直到今天还在。许多排水沟和污水渠同样精致而耐久”^②。巴尔干半岛正是在罗马统治期间,形成了完善的公路网,这对此后半岛的发展意义重大。

第四,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产物。“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它是在新宗派、新宗教、新先知数以百计地出现的时代,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在巴勒斯坦产生的”^③。而当时的

① 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101页。

② 吉本估计罗马帝国的公路长度总计为4080罗马里,相当于3740英里(约为2324公里)。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1, vol. I, p. 67. R. H. 巴洛:《罗马人》,第149页。汤普逊正确评价了罗马公路的作用,“这些公路主要是为着军用,但附带地也大大地便利了贸易”。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上册,第16页。

③ 恩格斯:《启示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卷,第11—12页。

巴勒斯坦正是罗马帝国采取最为残暴统治的地区,那里的民众“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①。而罗马帝国为基督教的崛起搭建了一个合适的历史舞台,“最明显的事实是:罗马和平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上统一的地域。更进一步的思考会使我们发现,罗马文化创造了一个基督教可以填补的真空。对于人们心灵上的饥渴,罗马宗教不能贡献任何东西,因为它缺乏伦理和神学内涵……只有基督教把哲学和秘仪崇拜精神上的吸引力结合了起来,它有入门式、宗教经典、伦理法规、信条体系以及可以和其他信徒一起进行崇拜活动的场所。基督教的胜利仍然是个历史上最神秘的事件之一,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它在罗马世界没有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②。诚然,罗马帝国统治者对早期基督教采取了残暴的镇压,“用各种残酷之极的手段惩罚他们……他们的创始人基督,在提贝里乌斯(即提比略)当政时便被皇帝的代理官彭提乌斯·彼拉图斯(即彼拉多)处死了”^③,但是,镇压只是加强了基督教徒的团结,加速了其在地中海世界的传播,塔西佗的《编年史》就记述了这一事实。

第五,罗马人为强化帝国统治,发展出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其完善的程度达到上古欧洲地中海世界的顶峰。塔西佗对罗马法的起源做过精彩的历史分析,认为其成就是地中海一系列早期法律发展的结果。“当公正不复存在,野心和暴力取代了谦逊和克己的时候,专制制度就在许多国家成了永恒的现象。有一些城市,或者从最初的时候起,或者是在对国王的统治感到厌倦之后,决定改行法治。最早类型的法治是头脑简单的人的朴素的创造物,其中最著名的可以举出克里特的米诺斯、斯巴达的李库尔古斯和雅典的梭伦所制订的法律。在我们这

①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卷,第333—334页。

② 理查德·詹金斯编:“罗马的遗产”,《罗马的遗产》,第10页。

③ 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下册,第15卷,第44节。

里,罗木路斯的专制统治结束之后,努玛把宗教的束缚和一部天命的法典加到我们头上。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发现是图路斯和安库斯作出的。然而最早制订法律的人却是谢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就是国王们对自己所订的法律也是服从的”^①。

第六,罗马人出于多种目的对巴尔干半岛大量处女地进行了开发,并大体按照半岛地理地形特点作了行政区划。例如,囊括巴尔干半岛西部大部分地区的伊利里亚行省不仅是罗马人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前哨阵地,而且是连接帝国东西两半部分的中心区,后来由此发展出来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两行省成为北方防务重点地区。又如,控制整个半岛东部地区的色雷斯行省不仅在战略上控制诸海路交通和两大洲陆路交通的咽喉要点,而且因其地势平缓而被开发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农耕区,嗣后成为拜占廷帝国的京畿腹地。这些地区在罗马统治当局的组织下,生产技术得到推广,从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和荒野变成居民点。例如,包括色雷斯行省以北直到多瑙河下游的整个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山区被划定为莫埃斯亚行省,在罗马时代得到真正的开发建设。更为典型的是达吉亚行省,它的设立使多瑙河以北的喀尔巴阡山南麓从此进入文明化的阶段,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都因被迫纳入罗马行省而逐渐摆脱了原始状态。色雷斯地区直到公元18年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由当地土著的两个国王控制,罗马皇帝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取得了控制权^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在各个行省的要害之处,按照罗马人的设计规划建立了一系列城市,以为各行省的统治中心,而这些首府成为巴尔干半岛全面发展和内部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镇^③。例如,阿亥亚行省首府科林斯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部两地的商业集散地,马其顿行省的首府塞萨洛尼基则是整个半岛面向

① 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册,第2卷,第26节。

② 同上书,上册,第2卷,第64—67节。这两个国王分别是科提斯和列司库波里斯,前者屈服于罗马人,后者抵制罗马人并最终被害。

③ 仅希腊一地就兴起了950座城市,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第257页。

爱琴海进而进入东地中海最重要的海港,直到近年来进行的科索沃战争期间,这里还是美国运兵上岸的唯一港口。我们今天所知的半岛大城市都是罗马人建立或扩建的城市^①。

第三节 巴尔干半岛的古典文明遗产

古典的希腊罗马世界在巴尔干半岛留下了诸多遗产,奠定了巴尔干半岛此后 1800 年历史发展的基础。

罗马帝国经历了 200 年的辉煌时期后,“三世纪危机”成为帝国历史的转折点。这场深刻的危机使罗马帝国社会生活陷于混乱,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几乎陷于瘫痪,令无所出,军阀割据,各地军队随意拥立皇帝,曾一度出现“三十僭主”并立的局面。军事贵族集团和显贵奴隶主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使整个帝国政治上四分五裂,意大利半岛,特别是帝国首都罗马城成为军阀角逐的战场。“三世纪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连专家们都感到说不清楚,他们承认“事实上我们也难以确定其中哪个因素优先于其他因素;它们相互作用”。此后,虽有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16 年在位)实现的暂时统一,但是未能挽救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戴克里先的策略——由君士坦丁完成——没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组建或规划帝国安全保障的伟大尝试”^②。汤普逊在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问题时,至少列举了各家著名学者提到的 20 多种原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怀疑的。拜占廷帝国……和后期的罗马帝国似乎没什么两样,但是,它继续存在了千年之久”^③。

① 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提到一批城市的名字,说它们“最初都是罗马人建立的。目前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大多数港口,也是这样。……都是由罗马人打下基础的”。见该书,第 19 页。

② R. H. 巴洛:《罗马人》,第 184、189 页。

③ 他因此悲观地认为,即便古希腊神话中保护史诗和历史的神祇克利奥也回答不了这个历史之谜。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 68 页。

无论如何,“三世纪危机”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是“帝国的重心正在东移。皇帝在何处,何处就是罗马,而他最多的时候是呆在亚得里亚海以东的地区。巴尔干半岛是罗马化最晚的地区”,但如今却逐渐成为帝国的中心区^①。在动荡的形势中,东罗马帝国(也称作拜占廷帝国)保持着相对稳定,巴尔干半岛逐渐摆脱了西部统治势力的控制,不仅不再是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附属区,而且,其地位逐渐超过了罗马城为中心的西部帝国,成为帝国新的政治中心,意大利很快就跌落到行省的地位了。早在“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于330年正式启用之前,皇帝戴克里先就长期居住在东方尼科米底亚行宫,而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更是将首都迁往巴尔干半岛东部古城拜占廷。东罗马帝国从此就以巴尔干半岛为腹地了。

324年,君士坦丁一世(311-337年在位)先后击败政敌马克西米安(286-305年在位)、马克辛迪乌斯(306-312年在位)和李锡尼(311-324年在位),成为罗马帝国的惟一皇帝,而后下令兴建新都。到330年,在古城拜占廷旧址上新建的“新罗马”被正式启用,标志东罗马帝国新的政治中心的出现。“新罗马”因其建立者而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它不仅丝毫不比鼎盛时期的旧罗马逊色,而且享有与古都罗马同等的政治地位。此后,新都便发挥了上千年的政治中心的作用,巴尔干半岛的重要性也因此更加凸显。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三世纪危机”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命运。被罗马人全面开发并整合为多个帝国重要行省的巴尔干半岛,从此成为以东地中海为主要疆域的拜占廷帝国的核心地区。同时,这个以巴尔干半岛为主要舞台的拜占廷帝国与以罗马城为首都的罗马帝国开始分道扬镳,逐渐地成为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的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如果从政治上分析,两者就有了很大区别。自从戴克里先推行行政改革之后,皇权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在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

^① R. H. 巴洛:《罗马人》,第187页。

中日益加强。至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四帝共治”制度被取消,以单一皇帝为权力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确定下来,君士坦丁一世首创的拜占廷帝国血亲世袭继承制度(主要是父死子继)王朝由此开始。这与此前罗马帝国实行的皇帝继承制度有本质差异^①。此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拜占廷帝国最初强化专制君主制度有关。虽然元老院对皇权仍然有一定的约束,民众干预国家政治的“民主”传统也还存在,但是拜占廷帝国的皇权已经开始其专制化的过程,皇帝逐步成为拜占廷君主专制主义的最高代表,并被神化为法律和国家意志的最高主宰,集政治、军事、司法、宗教等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在皇帝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下,形成了一个只对皇帝个人负责的、严格区别于一般民众的庞大官僚阶层。他们不再像古罗马时代的官吏那样作为公民的代表和“公仆”,而是由皇帝任命,对皇帝宣誓效忠并领取薪俸的专职官僚。他们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政府机构,等级森严。此外,帝国军队也通过皇帝任命的军官效忠于最高统帅皇帝,帝国司法机构也以皇帝为最高立法者和法律解释人。形成这样一整套完备的国家机器无疑是皇权专制化的结果。古典时代在巴尔干半岛留下的政治遗产就是最初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来在拜占廷帝国得到全面发展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就是皇帝专制统治^②。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与巴尔干半岛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经济背景。诚如前述,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经济区在罗马帝国数百年的经营中逐步形成,这个大体以黑海、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为主轴线、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为中心的经济区不再是西罗马帝国经济的附属部分,而是一个有其内部独立结构和外部鲜明特征的经济体系。首

^① 有关拜占廷皇权继承制度问题,读者可以参考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拜占廷政治问题研究”。

^② 雅各布·布克哈特对于晚期罗马帝国皇权变化有细致的研究,他认为“皇帝的特征和功能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衰落期间不断产生变化”,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宋立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三章“三世纪的皇权”,第1—25页。

先,自“三世纪危机”爆发以来,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即出现了较大的经济差异。西罗马帝国经济萧条,城市败落,人口锐减,其衰亡之势已成定局。而东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经济原来就不似意大利半岛那样发达,同时并存着多种形式的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就土地占有制而言,东罗马帝国不仅存在着农村公社占有制、自由农占有制和隶农制,而且其奴隶主控制的大庄园也没有采取西部大庄园普遍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奴隶制,同时,土地的兼并也没有西部那样严重^①。多元经济结构使东罗马帝国的社会生产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特别是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埃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早就出现了隶农制这种在此后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生产制度。这不仅对稳定东部帝国的经济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此后拜占廷帝国进一步的经济变化打下了基础。其次,活跃的商业贸易是东地中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此后维系巴尔干半岛的拜占廷帝国各重要城市的重要经济手段。一方面,自古代世界开始的海外商业传统有助于4世纪前后东地中海贸易活动的发展,特别是东西方贸易商道的开通使该地区占有举世无双的经济地理优势。另一方面,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帝国东部区域相对稳定和安宁,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地区在军事战略上具有的优势,也为这里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明显的方便条件。自330年以后直到13世纪,在整个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和城市能够像君士坦丁堡一样从国家商业贸易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以至于马克思形象地将这个城市比喻为“沟通东西方的金桥”^②。再者,东部帝国在这个时期已经集中了原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生产劳动力,人口数量超过西部。人口问题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测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三世纪

① “如果我们了解到有的议员一个人的收入就比得上5世纪西罗马帝国整个国库收入的1/40时,就可以估计出私人所有者的财富是多么大了”。M. M. 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中世纪的农业生活》,郎立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卷,第106页。这段文字中提到的“议员”应该译为“元老”,这样的误译还有一些,再版修订时应予改正。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卷,第263页。

危机”之后,西部帝国城市的衰败和人口的大量减少早已为学者们所注意,并被视为反映整个经济恶化的一个侧面。这种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局势动乱。逃亡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流亡到相对安定的东部地区。欧洲西部地区生产性人口,特别是通晓农业技术的人口虽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仍然未能恢复到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以前的水平。中世纪西欧最大的城市米兰和威尼斯在13世纪发展的鼎盛时期,人口不过20万,巴黎仅有10万。但是在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已经达到50—100万^①。精确地确定330年时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人数是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但是,从西部帝国人口不断减少和东部帝国人口不断增长的两种趋势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东罗马帝国经济发展的情况^②。

地中海世界政治中心东移,以“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疆域相对稳定,这是古典的希腊罗马世界留给后世的另一个意义深远的遗产。巴尔干半岛成为拜占廷帝国活动的主要舞台。公元2—3世纪之时,罗马帝国的边疆地区即受到日耳曼民族的侵扰,日耳曼各部落越过莱茵河、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到4—5世纪,这些入侵者不仅分散定居在帝国西部各地,而且多次洗劫罗马城,迫使帝国首都先后迁往米兰和拉文纳,直到476年西部皇帝罗穆洛被废黜。同一时期,东罗马帝国虽然也遭到了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入侵,阿瓦尔人、匈奴人等也曾多次扫荡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后来从北、东两个方向大举侵略,特别是后者曾进抵波斯普鲁斯海峡,甚至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拜占廷人依

^① 学者们对于君士坦丁堡人口问题持有不同的估计,其中估计人口数最高的达到100万,最低的25万。参见仁西曼:《拜占廷文明》和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相关部分。

^② 有学者估计,公元200—600年间,欧洲是全球人口下降最剧烈的地区,从4400万降低到2200万,这两千多万人口的一半以上可能集中在拜占廷帝国的土地上。马西姆·利维巴茨:《世界人口简史》,郭峰、庄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拜占廷经济史家斯坦因推测,6世纪拜占廷人口达到3000万,罗塞尔认为拜占廷人口在350年时达到2400万,而特利德格尔德推断拜占廷人口在540年时达到2600万,其中1900万在东部。Angeliki E. Laiou,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Washington, D. C. 2002, vol. I, pp. 47—48.

靠半岛地区的资源和地理优势,以及强大的城防工事和海军新式武器,多次瓦解外敌入侵,一直保卫了这座千年古都,不仅抵抗住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入侵,而且彻底打败波斯人,击溃阿拉伯人的入侵。拜占廷帝国边界虽然时有变动,但是作为帝国核心地区的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马其顿、希腊,及小亚细亚西部区域始终是帝国的“老巢”。直到拜占廷帝国最终灭亡,古典世界的薪火才从巴尔干半岛北迁至莫斯科^①,并西传至意大利。

正是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廷帝国领土上,自330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希腊人和希腊化的斯拉夫人、伊苏里亚人和小亚细亚人为主的拜占廷人。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代,东地中海沿岸是帝国的行省,当地居民在罗马帝国军事暴力统治下成为罗马帝国的臣民,他们将罗马人视为敌对的外族,把罗马当局看作是外族统治,因此,民族矛盾始终尖锐激化。民族问题一直是罗马帝国社会生活中主要的矛盾之一。东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后,巴尔干半岛居民和小亚细亚人成为社会主要成分,其主要人口构成是讲希腊语的“东方人”,他们不再是被外来的“拉丁人”统治的民族。这个时期官方文件虽然继续使用拉丁语,但是,希腊语拥有广泛的民族基础,是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语言”^②。它不仅在民间流行,而且很快成为官方语,并最终取代了拉丁语的正统地位。新国家的居民或是希腊人,或是希腊化的小亚细亚人,他们占据着拜占廷国家的统治地位。拜占廷帝国以这些居民为主体,不断融合新的成分,例如斯拉夫人和亚美尼亚人等,逐渐形成了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这个帝国与以拉丁人为统治阶层主体的罗马帝国在民族构成上有很大区别。

基督教是古代世界的产物,是古典文化与古希伯来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产生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1—2世纪期间,

^① Michael Chemiavsky, "Ivan the Terrible as Renaissance Prince", *Slavic Review*, vol. 27, No. 2 (Jun., 1968), pp. 195—211.

^② 最有力的证据是《圣经·新约》,其原始文本为希腊语。

其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其社会基础、基本教义、教会组织和礼仪节日均发生变异,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民众的民间宗教逐渐发展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日益与罗马帝国政府合流。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政治角逐中,为扩大巩固自己的势力,将基督教作为实现其政治计划的精神支柱。313年,他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而后多次发布诏令,授予基督教教会以多种特权,其中包括由国库支付神职人员的开支,豁免神职人员的劳役和租税等。321年,他又特别批准教会享有接受遗产的权力。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亲自主持召开了尼西亚宗教大会^①,强行确立“三位一体”为正统教义,通过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尼西亚信经》,并划定教区,明确皇帝与教会的关系,规定皇帝是基督教的最高首脑,拥有召集宗教大会和解释教义等权力。尼西亚会议是原始基督教质变的标志,表明基督教已经成为统治当局的官方机构,实质上已经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国教,并为392年进一步成为排斥其他宗教的正统国教作了准备^②。基督教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东罗马帝国,当时出现的“五大教区”,除罗马教区外,其它如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等教区大都集中在帝国东部境内。而罗马教区大主教也必须服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期。随着君士坦丁堡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迅速提高,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逐步

① 关于君士坦丁支持和大力扶植基督教的动机问题,学界历来争论不休,连布克哈特也确信他是出自真诚的信仰,虽然布氏合理地否定了“神迹”的说法,见雅各布·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240—251页。但是,本书作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作为帝王的他最可能从政治上考虑问题。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二次印刷版,第86—92页。

② 吉本认为基督教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五个:“I 基督教徒的一成不变和——如果我们大胆这样说的话——毫不容人的狂热情绪,这种情绪虽确乎出自于犹太教,但清除掉了那种非但不设法诱导,反而阻碍非犹太教徒接受摩西戒律的狭隘的不友好的精神。II 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这一教义更由于一些能使这一重要真理增加分量和影响的新情况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III 一般传说原始基督教教会具有的神奇力量。IV 基督教徒纯真、严谨的品德。V 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它在罗马帝国的中心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日益壮大的国家。”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册,第234—235页。

上升到东正教世界最高地位,在拜占廷帝国各教区中,与罗马教区主教地位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罗马主教。作为古代正统基督教的继承者,拜占廷人将巴尔干半岛发展成为东正教世界的核心地带,这种特殊地位的奠基时代就在古典希腊罗马时代的后期。

由于拜占廷帝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以及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一可靠的中心区的形成,古典文化遗产成为此后巴尔干半岛文化发展的基础。拜占廷文化以希腊和希腊化的拜占廷人为主体的,以希腊语为传播媒介,以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兼收并蓄古代东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拜占廷文化不仅在哲学和神学、史学和文学方面见长,而且在教育和科技、艺术和建筑、道德风俗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独具特色。其高度发展使之得以在中世纪地中海世界发挥重要作用,它以中古基督教的特殊方式保护古典文化不为历史的尘积所埋没,通过传教的方式启蒙了整个斯拉夫世界,极大影响了中古东地中海沿岸各民族文化和西欧文化的发展,并给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珍贵的文化素材和资源,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表达新思想的理想方式,因而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难想像,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堡提供的军事保护,没有巴尔干半岛这个历史舞台,拜占廷文化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也注定要遭到西罗马帝国文化的恶运。同样,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堡繁荣的经济提供的雄厚物质基础,拜占廷文化也必定因为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而难以发展。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堡创造出来的崇尚知识的风尚、浓厚的学术气氛和优雅舒适的环境,那么地中海世界的知识分子也不会被吸引到这个文化中心来,拜占廷文化也必然失去其发展的骨干力量。可见,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与拜占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而这种中古时代的文化恰恰是连接古典世界与近现代世界的文化桥梁。

总之,古典时代丰富的遗产为巴尔干半岛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 哥特人与匈奴人

第一节 哥特人的起源和迁徙

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58年前后,恺撒(Julius Caesar)在征服高卢期间就与日耳曼和凯尔特人发生军事冲突,并两度渡过莱茵河打击日耳曼部落,“日耳曼人终于被形势所迫,也把他们的军队开出营寨来”,并“很快就按照他们的习惯,结成方阵来迎接我军的剑击,这时,发现我军中有许多人都跳到敌人的方阵上去,用手拉开盾,从上向下刺伤敌人”^①。公元前55年,恺撒统帅罗马军队为解救莱茵河西岸的乌皮人,通过在莱茵河上架设的木桥进攻河东的日耳曼人,并“在莱茵河对岸度过了十八天之后”,退回高卢疆土。现在他计划对不列颠用兵,“因为他发现差不多在所有的高卢战争中间,都有从那边来给我们的敌人的支援”^②。显然,日耳曼各个部落之间相互支援,共同对付罗马军队。公元前12—9年,罗马军队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全线出击,过河攻击日耳曼人。

通过恺撒的记载,我们了解到当时日耳曼人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他们没有祭司替他们主持宗教仪式,对祭祀也不热心”。因为他们信仰的是原始宗教,“他们视作神灵的只有那些他们能直接看到的,或者能够明明白白从它们的职能取得帮助的,即:日神、火神、月神等等,至于其余的他们全不知道,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他们基本上过着

① 恺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卷,第52节。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9节。

原始的渔猎生活，“他们的全部生活只有狩猎和追逐战争”。为此，他们需要保持强壮的体格，“从孩子时代起，他们就习惯于勤劳和艰苦。……一个人二十岁以前就有关于女性的知识被认为是极可耻的事情之一。……男男女女同样都在河中洗澡，身上掩蔽的同样只是一片兽革或一块鹿皮遮羞布”。“他们对农耕不怎么热心，他们的食物中间，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也没有一个人私人拥有数量明确、疆界分明的土地，官员和首领们每年都把他们认为大小适当、地点合宜的田地，分配给集居一起的氏族和亲属，一年之后，又强迫他们迁到别处去”。对于这种抵制农耕生活的原因，恺撒列举了四点理由，其中首要的是日耳曼人尚武好战，他们“认为能蹂躏自己的边境，使本国外围有一圈愈大愈好的荒地包围着，是一件最最光荣的事情”。而他们的社会组织也适应这种战争需求，“遇到战争时，不管是别人对他们进犯还是他们把战争加诸别人，总是选出握有生杀大权的首领来指挥战争，和平时期，他们就没有这种掌握全面的领袖，只有各地区和部落的头头，在他们中间主持公道、解决纠纷。……抢劫事件如果是在各国自己的疆界以外做的，就不以为耻”^①。《高卢战记》告诉我们，公元前的日耳曼社会尚处于原始部落发展阶段，他们还没有或刚刚开始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

事实上，恺撒记载的这些日耳曼民族，其祖先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由于旱灾和饥荒的影响，被迫进入罗马帝国内”^②。公元前2世纪前后陆续离开波罗的海南下进入中欧地区。他们在恺撒拓展高卢疆域的时代还处于文明发展的初期^③。根据古罗马作家塔西佗（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在1世纪末年的记载，日耳曼人已经定居在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地区，塔西佗说他们是“一种土著，从来不曾

① 恺撒：《高卢战记》，第6卷，第21—23节。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21页。此书引述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意见，认为古代日耳曼人迁徙的动机是其游牧民族的习性和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

③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1, vol. I, pp. 301—311. 吉本对哥特人早期的历史作了精辟的描述。

和外来的或亲善的异族混杂过”。他们的一些部落迁徙到黑海北部地区,其活动的地理范围大约以上述两条河为西部和南部界限,向东到达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一带,其北“则为一片大洋所围绕,那片大洋环抱着许多广阔的半岛和庞大的岛屿”。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整个说来是一片密树参天、泥泞满地的地区;而靠高卢的一边雨暴尤严;靠(多瑙河中游的)诺利库姆和潘诺尼亚的一边,风势特劲”^①。可见,原始的日耳曼人由于欧洲生存环境的变化,经历了漫长的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其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自中欧腹地直到中亚,正像汤普逊所说:“蛮族世界包括莱茵河以东、多瑙河和尤克辛海以北的全部北欧,并无限地延伸入亚洲。在这广大地区的人种、民族和部族的波动里,最重要的是日耳曼族、斯拉夫族和匈奴族的历史。”^②这个过程此后继续进行,公元2世纪下半叶,日耳曼民族整体南下,他们沿中欧和东欧河谷不断扩张定居地,其中哥特人进入南俄罗斯草原,后越过多瑙河侵入东罗马帝国。

在迁徙过程中,日耳曼人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哥特人(Goth)作为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分支,是本书最关注的部分,因为他们将与巴尔干历史发生诸多联系。塔西佗那部史料价值极高的《日耳曼尼亚志》中说:他们生存的“这一带地方谷物颇丰,而不宜于果树;这儿的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硕。就是当地的牛类也不如寻常牛类的美观,其额部不够方阔”。随着以潮湿阴冷湿地沼泽为主的欧洲中部地区逐渐干燥,日耳曼人开始在这里垦殖拓荒,他们“没有一个部落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就是个别的住宅也不容许彼此毗连。他们零星散落地逐水泉、草地或树林而居。他们的村落和我们这种屋舍栉比的村落形式不一样;他们在每座房屋的周围都留着一片空地;要不是为了预防火灾就是不善于建筑。他们甚至不会使用石头和瓦:一切营造均用原木,不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节。我们关于日耳曼人的知识主要来自塔西佗的记载。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08页。

另加工,也没有装饰或娱目的地方”。“他们还喜欢在底下掘窖,窖上覆盖一层粪土,作为冬天藏物之用,因为地窖里可以杀寒。同时当敌人来到的时候,地面上的东西纵被蹂躏,埋在地下的窖藏或不致为敌人所发现,或者就因为敌人懒得搜寻而可幸免”。在广袤的土地上,日耳曼人的“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贵贱分给各人。土地的广阔平坦使他们易于分配。他们每年都耕种新地,但他们的土地还是绰有余裕;因为他们并不致力于种植果园,圈划草场和灌溉菜圃,并不用这些方法来榨取土地的肥沃资源。他们所求于土地者唯有谷物一种;他们甚至也不像我们这样分一年为四季。他们对于冬、春、夏三季的意义都能了解,而且也各赋以一个名称;但既没有秋季的名称也不了解秋季有丰收的意义”^①。由此记载,我们知道他们已经走出原始发展阶段,从游猎转变为定居,出现了村庄,并且把土地视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些都是恺撒时代没有出现过的。

与这样的物质生活环境相适应的是,他们的社会组织 and 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由国王统治,虽较其他日耳曼部落稍受约束,但仍不妨于他们的自由。……这些部落的特殊标志为圆形的盾、短剑和对于他们国王的忠顺”^②。哥特人早期社会生活的细节我们了解不多,但大体与其他日耳曼部落一样,在《日耳曼尼亚志》中都有生动的描述。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当于部落联盟,因为“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选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但此外如死刑、囚禁、甚至鞭笞等种种事务都只有祭司们才能执掌,因为他们并不把这些视为刑罚或是将军的军令;……他们从树丛中将他们所崇拜的图腾标志取出来伴同作战。他们的军阵的编制并非随意排列,而是按照各个家庭和血缘关系编制的,最足以激发他们勇气的一个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5、16、26节。

② 同上书,第44—45节。

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站在自己身边的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这里有着每个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视的旁观者”。“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会议的日期是固定的，或在新月初上的时候，或在月盈的时候；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个时候处理事务最吉利了；但若有紧急事务则不在此例。……当召集会议时，他们不能立即集合，而需要费两三天时间才能召集，这倒是他们自由的一个缺点了。他聚合了相当多的人以后，会议便开始，大家都带着武器就坐。祭司们宣布肃静，在这时候，他们有维持秩序的权力。于是在国王或酋帅们之中，或以年龄、或以出身、或以战争中的声望、或以口才为标准，推选一个人出来讲话；……如果人们不满意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啧啧的叹息声；如果大家很满意他的意见，就挥舞他们的矛；这种用武器来表示同意的方式，乃是最尊敬的赞同方式”。公民大会决定战和大事，也决定严重惩罚。“他们还在这种会议上选举一些长官，到各部落和村庄里处理诉讼事件；每一个长官都有一百名陪审者，他们是由人民中选出来作为他的顾问的”^①。恺撒描述的那种原始部落酋长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凌驾于各个部落之上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但这个时期的“国王”仍然不具有罗马王的权力。

战争是日耳曼人最重要的活动。塔西佗以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了他们的军事组织、尚武精神、武器装备、战争伦理，以及许多相关的习俗。“一般来说，他们的步兵较强，所以步兵总和骑兵配合作战。从全体壮丁中挑选出来的矫捷的步兵列在最前排，他们是很适宜于配合骑兵作战的。步兵的数额是固定的，每部出一百人，因此他们被称为‘佰’，这本是一个数字，后来倒成了一个名号和光荣的头衔了。……丢掉了自己的盾是一件奇耻大辱的罪行，犯了这种罪的人不许参加宗教仪式，也不能出席大会。许多在战争中苟全性命的人，都以绞首来结束他那不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11页。

名誉的生命。……他们把自己的创伤带到母亲和妻子面前，而她们也毫不畏惧地要求看一看和数一数那些伤口”^①。“一个酋帅如果能罗致为数很多而且孔武有力的侍从，那他不仅在本部落中，而且在邻近的部落中都会享有盛名；像这样的酋帅会受到外族派来的使臣的称誉，会受到馈赠之荣，而仅凭他的威名就足以慑服敌人。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们则为酋帅而战斗。……侍从从慷慨的酋帅那儿可以得到战马和无比锋利的长矛。筵席饮宴是他们的唯一的报酬，饮食虽然粗陋，但供设却甚为丰富。这些恩典的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要想劝他们像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②。这种来自原始部落的尚武精神仍然强烈，并不比恺撒时代有所减弱，其原因在于，迁徙扩展或定居守土的日耳曼人，无论在对罗马人还是在对其他部落同胞的关系中，仍然以武力决定最终结果，他们还没有学会“文明”处理争端的方式。

公元9年，罗马军团在战事中第一次受到日耳曼人的重创，损失了3个军团。但是，罗马人在与日耳曼人的对抗中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公元15年罗马军队渡河进入日耳曼人区，“烧掉了这个民族的首要地区玛提乌姆，随后又蹂躏了原野，”而日耳曼人对于“罗马的笞棍、斧头和长袍，绝不能容忍下去。没有经受过罗马统治的其他民族从来没有领教过他们的惩罚和勒索，”他们起而反抗，但遭到镇压^③。公元28年，日耳曼人再度爆发了起义，塔西佗指责他们“是出于贪婪”，但事实是罗马人向当地日耳曼人征收军用的“欧罗克野牛的皮，作为贡赋的标准。对于任何一个部落来说，这都是一项苛刻的要求，而在日耳曼就更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6节。

② 同上书，第12—14节。

③ 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1卷，第56、59节。

加难以忍受了：因为在那里的森林中虽然有许多巨大的野兽，但驯养的牲畜却都不是很大”。镇压此次起义的罗马第五军团遭到失败^①。但是，直到1世纪下半叶，罗马军队继续控制着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疆。

公元69年，驻扎在罗马边境地带的4个日耳曼军团因为高卢行省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备感失落，几乎酿成了兵变，因为他们“感到愤恨和恼怒，而在大量军队都有这种情绪时，这确是十分危险的事情”^②。不仅如此，那些以日耳曼人雇佣兵为主力的罗马行省军队积极参与内战。也是在69年，驻扎巴尔干北部疆界多瑙河中游地区的第13军团和附近的第7军团准备班师进军罗马，在那里的“各个行省，到处都是准备他们所需要的舰船、军队和武器的一片备战声”。而“美西亚和潘诺尼亚的兵力的结合使得(巴尔干半岛西部的)达尔马提亚的军队也学了他们的样子，虽然统治行省的那些前任执政官并没有带头发动叛乱”^③。公元168年，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部落开始再度侵入罗马帝国边疆地区，马可曼尼人、汪达尔人大举扫荡帝国东北地区，巴尔干半岛首当其冲。当时罗马帝国尚在强盛阶段，有能力将“蛮族”入侵阻挡在自然边界以外的地区。为了有效地阻遏源源不断的蛮族入侵，罗马人将战败的日耳曼人安定在边境地区，作为罗马人的边防军和雇佣兵。“有几万，也许有几十万日耳曼人和平地进入了罗马帝国，并居住那里。……各日耳曼部族以‘同盟者’的名义居住于边境各省内。他们类似以前的罗马退伍兵那样；他们在战争时应服军役的条件下，领取了土地赠与来耕种”^④。

“3世纪危机”极大地削弱了罗马人的军事力量，哥特人开始从巴尔干半岛东北地区入侵帝国。罗马当局最初在巴尔干半岛设立的伊利亚行省不断扩大防区，从沿海狭长地带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中、西部大

①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4卷，第72节。

② 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卷，第8节。

③ 同上书，第2卷，第84、86节。

④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19、120页。

部分地区。哥特人迁徙半岛以前,巴尔干各地在罗马统治下保持其承自古代的名称,包括雷提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达吉亚、莫埃西亚、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分别由服从罗马行省统治的当地贵族控制,他们享有程度不等的自治权。哥特人正是从乌克兰方向进入达吉亚地区的,一路上他们没有遭遇抵抗,“军纪败坏的罗马军队放弃了他们驻守的那些至关重要的哨所,其中大批将士因担心受到严厉惩处而投向哥特军队”^①。由于半岛山脉多呈南北走向且坡度较缓,很难形成阻挡外敌入侵的自然屏障。大批哥特人从多瑙河以北袭击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沿岸地区的城市和乡村,起初以抢劫为主。此时,罗马帝国政局动荡,军阀割据,各地军团不断发动军事叛乱,并拥立军事将领为皇帝,大约平均3、4年,就有新皇帝取代旧皇帝。巴尔干半岛集中了罗马帝国大量军队,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军团一样,成为半岛地区内战的主角,因此也不能担当起抵抗外族入侵的重任。哥特人发动的战事是从最初的以抢劫为主的袭击逐渐发展为占领土地举族定居的征服战争,这些外敌入侵和内战共同构成了3世纪巴尔干半岛历史的主要内容。

南下的哥特人,作为日耳曼各部落中活动范围最靠东方的一个部落,其足迹已经抵达黑海北岸,并逐渐定居在自顿河到多瑙河入海口地区。在这广大地区的中部,德涅斯特河将哥特人一分为二,河东地区的哥特人称为东哥特人,河西地区的哥特人称为西哥特人。根据拜占廷史学家瓦西列夫的研究结果,当哥特人迁徙到黑海北岸地区时,当地社会生活和文化水平早已经在希腊人的商业殖民城邦文明影响下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富有的波斯普鲁斯王国控制整个地区。哥特人占据了 this 富有的地区,也同时接受了更为成熟的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因此“作为这些影响的结果,当哥特人后来出现在西欧时,他们在文化上就显得比所有其他日耳曼部落更文明,因为后者是以完全野蛮状态

^①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1, vol. I, p. 312.

进入西欧开始其政治生活的”^①。文明的影响除了战时的学习,主要是通过贸易完成的。“由于原在运输中落下的零碎琥珀的‘发现物’,我们发现了一条古代商路。这一条路是上行维斯杜拉河或尼门河,再从那里下行第聂伯河或第聂斯德河以达尤克辛海”^②。在这条商路上,哥特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连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都提到,哥特人是从事琥珀贸易的。我们相信贸易活动在哥特人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十分巨大,“罗马文化影响、罗马商业、甚至罗马行政制度,的确深入到日耳曼的内陆,深入到按正式边疆我们不会猜想到的地方。……从碑刻方面,我们可知道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商业的重要性。尽管这些地方不像南方诸省有很多庙宇、戏院、凯旋门,然而,在那里罗马遗迹还是重要的,……未来这样的奢华享受,大量的商业资财一定是不可少的”^③。

如同日耳曼其他部落一样,哥特人进入晚期罗马帝国的形式有和平与战争两种方式。前者的典型方式是,“日耳曼人通过参加军队,极其容易地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他们数以千计地编入罗马军队,被称为“哥特人军团”,其首领担任军团的重要军官,“以致高贵出身的罗马人竟拒绝在蛮族军团里服役”^④。直到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主力部队中还有数万人组成的哥特军团,当统一帝国的战争结束后,他调集4万哥特军人参与“新罗马”的建设。与此同时,大量的哥特人举族定居在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带,以“同盟者”的身份与罗马人和平相处。日耳曼人之所以源源不断进入罗马帝国的重要原因是其人口持续增长,仅在中欧腹地就聚集着23个部落的百万之众^⑤。战争是哥特人进入帝国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最初,他们发动入侵的目的多在抢劫财物,特别是生活物资,后来则主要为了寻找生存的土地。拜占廷作家曾记载了哥特

① A. A. Vasile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1970, vol. I, p. 84.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15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117页。

④ 同上书,上册,第119页。

⑤ 同上书,上册,第122页。

人为了生存南下迁徙的历史图景。当哥特人迁徙的先头部队进入第聂伯河流域危险的沼泽地时，“在动荡的沼泽地里，因为水陆两种因素混淆在一起，自然界使人不能进到这里”^①。3世纪时，占据黑海北部地区的哥特人开始其海上和陆地扩张抢劫活动。他们控制了克里米亚地区和波斯普鲁斯王国，并利用熟悉海上航行的波斯普鲁斯王国战船进行大规模海盗活动，经常洗劫高加索和小亚细亚沿海的富裕地区。他们甚至沿黑海西海岸南下，或进入多瑙河下游地区，或渡海进入波斯普鲁斯海峡，一度通过无人防守的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并经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古城拜占廷、赫里索堡、西兹库斯、尼克米底亚和爱琴海的许多岛屿也遭到他们的抢掠。

有文献记载，他们抢劫的最大范围曾到达以弗所、塞萨洛尼基、阿尔哥斯、科林斯和雅典，连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塞浦路斯岛都数度遭劫。他们大多采取抢了就走的方式，常常满载抢劫来的战利品返回其在黑海北岸的定居地。在海上抢劫的同时，哥特人也发动陆上袭击，进攻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他们进入半岛，袭击城市乡村，如入无人之境，盖源于罗马帝国陷于重大危机，无力组织抵抗。皇帝戈尔狄亚努斯(Gordianus, 238—244年在位)被迫向哥特人支付年贡，但无法满足哥特人的要求，他们继续袭击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

公元250年前后，大批哥特人在其王菲利(Philip)的率领下进攻半岛内地，兵临马尔西安努堡(今保加利亚 Prebislaw)城下。由于罗马军队无法及时救助，该城居民向哥特人缴纳了大笔金钱，换得入侵者暂时退兵。但是，金钱赎买的和平非但难以维持，而且极大地刺激了哥特人的胃口。不久，哥特王克尼瓦(Cniva)再度率领部下数万之众越过多瑙河，除主力部队7万人外，其家眷入住定居在整个莫埃斯亚地区^②。这

^① Jomandes, *The Gothic History*, Cambridge Speculum Historiale, N. Y., Barnes & Noble 1966, cha. 16

^② Jomandes, *The Gothic History*, Cambridge Speculum Historiale, cha. 16 记载，该地区分为两个行省。

些由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构成的军队直扑尼科堡和色雷斯地区重镇腓力普堡,据说这个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建立的。当罗马皇帝戴修斯(Decius, 249—251年在位)率领罗马军队准备围堵这支蛮族军队时,克尼瓦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突袭罗马军队大营,迫使罗马皇帝仓皇逃窜。在夺取了腓力普堡后,哥特人进行了大屠杀,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①。251年,戴修斯皇帝重新调集军队作战,沿多瑙河重建被破坏的要塞,并自信满满期待着以一场决战战胜哥特人,进而获得图拉真式的“不朽光荣”,但是,罗马人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和军事上的相互掣肘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他不仅被哥特人击败而且阵亡^②。罗马人则被迫“补偿了赤贫的野蛮人,赋予他们荣誉,并重新确认了日耳曼人的忠诚”^③。这是哥特人在历史上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

瓦勒良(Valerianus, 253—260年在位)和伽利埃努斯(Gallienus, 260—268年在位)皇帝在位期间,哥特人与罗马人的冲突不断,“多瑙河一线一直不停地受到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侵扰,不过罗马人倒也以异乎寻常的坚决做到了始终寸步不让。那些战祸连年的省份还能罗马军队提供无穷无尽的兵源;而且这些伊利里亚的农民中不止一两个表现出将军的才能,并实际达到了将军的地位”^④。同时期,哥特人从亚速海南下,袭击和抢劫沿黑海东岸地区的罗马城市皮提乌斯,并因该城曾顽强抵抗而将其彻底摧毁。随后,哥特人从海上大举进袭距离皮提乌斯300英里的特拉布宗。该城市原为希腊人的殖民城邦,后得

①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D. 354—378), trans., by Walter Hamilton, N. Y. Penguin Books 1986, pp. 1931, 5.

② Jornandes, *The Gothic History*, Cambridge Speculum Historiale; N. Y., Barnes & Noble 1966, c. 16—18. 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 by Ronald T. Ridley, Sydney: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 I, 1, p. 22. 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记载了这次战役,但是,后者错置了战役的地点。

③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p. 317.

④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p. 327.

到哈德良 (Hadrianus, 117—138 年在位) 皇帝的资助, 扩建了海港和城区, 逐渐成为罗马人在黑海西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虽然罗马人在此有重兵把守, 但是, 驻军纪律松弛, 警戒形同虚设。哥特人使用大量成捆的柴火做为登上城墙的梯子, 乘夜攻克城池。“大屠杀旋即开始, 守城将士弃城而逃, 神圣的庙宇和辉煌的建筑都付之一炬”^①。哥特人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和战俘奴隶返回他们在亚速海的老巢。尝到了海上袭击甜头的哥特人不久又对黑海南岸发动抢劫, 他们沿黑海西岸近海区南下, 其军队数量远胜其第一次远征, 他们的舰队则在南下过程中不断抢夺各种船只而迅速扩充。面对哥特人的攻势, 罗马帝国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中, 大批守军放弃前线要塞, 或者一触即溃。拜占廷古城隔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察尔西顿城很快丧失于哥特人, 而后, 哥特军队在罗马奸细的指引下夺取了尼科米底亚^②。这个 300 年未遭受战乱的地区很快就陷入被哥特人洗劫的灾难, 尼斯、布鲁萨、阿帕米亚和基乌斯等城镇都成为哥特人抢掠的对象^③。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第三次海上远征也发生在伽利埃努斯统治时期, 据斯特拉波提供的每只船只能容纳二三十人的数字估计, 其 500 条船构成的军队人数在 15000 人左右。这一次, 哥特人舰队不仅入侵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 而且进抵爱琴海, 洗劫了这个地区重要的城市和海岛, 举凡雅典、科林斯、阿尔哥斯和斯巴达无一幸免于难, 希腊全境在哥特人的铁蹄下痛苦无助地呻吟。其间只有雅典的一小支民兵偷袭了哥特人停泊在比莱夫斯的舰队, 其他城市和地方任凭哥特人的洗劫。最终, 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罗马皇帝的诱惑下加入罗马军队, 其中一位首领瑙洛巴图斯被委任为执政官。其余的哥特人满载而归, 按原路返回^④。在归途中, 他们继续一路烧杀抢掠, 将古代遗留下来的许多历史名城尽行捣毁, 无数文化杰作化

① Zosimus, I, 1, p. 32, 33.

② Zosimus, I, 1, p. 32.

③ Zosimus, I, 1, p. 33.

④ Zosimus, I, 1, p. 35.

为灰烬,因为,“波罗的海的无知的野蛮人完全没有欣赏优美艺术的情趣,他们厌恶一种外国迷信带来的精神上的恐惧”^①。

皇帝克劳狄(Claudius, 268—270年在位)统治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三世纪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军队却在巴尔干半岛北部重镇尼斯重创哥特人。公元269年,哥特人在黑海西岸建造了庞大的舰队,据说其数量达到6000艘^②。当哥特人庞大的舰队涌入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缺乏大规模海上作战经验的哥特人陷入混乱,强大的海流加剧了舰队的混乱,各种船只或者拥挤一团,相互碰撞,或者破损严重,失去控制,大一些的船只撞沉了小一些的船只,更多的船只偏离主航道,触角沉没。当落水的哥特人勉强爬上岸,他们立即遭到附近罗马军民的攻击。只有一小部分舰船冲出海峡,顺海流进入爱琴海,好歹停靠在附近阿索斯圣山附近的海面上,还有一小部分则继续南下至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岛。这样,哥特人的舰队在投入战斗以前就遭到完全破坏,他们只好转向陆地作战。以往罗马人的失利大多在于哥特人袭击的突然性和罗马军队备战不足。此时,克劳狄重整军备,在哥特人必经之地做好了战争准备。他首先避开彪悍的哥特人部队,在尼斯附近的山口关隘处理下伏兵,而后突然从背后攻击哥特人,取得大胜。这一仗歼灭哥特人5万将士。罗马皇帝没有对失败的哥特人赶尽杀绝,对此他在致元老院的信中说:我们“知道共有32万哥特人侵入帝国领土。如果我征服了他们,你们就会对我克尽职守感激万分。如果我失败了,请记住我只不过是伽利埃努斯的继承者。整个共和国已经疲惫不堪,精力耗尽”,为避免激起哥特人绝望的反抗,应该采取明智的做法^③。于是,他将大批经过挑选的身强力壮的哥特战俘编入罗马

①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p. 336.

② 这是 Zosimus 提供的数字,还有一种说法是 2000 艘。

③ 转引自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p. 357.

军团,将不合作战的妇女和伤残战俘分配给参战的罗马将士,把他们一并安置在边境地区垦殖荒地。据说,每个罗马军士都分到了两三个哥特妇女作为奴隶。最后,还有一部分残余哥特人被强制集中在达吉亚行省的山区里,当年冬季他们中的大部分就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冻饿而亡,而次年春季的瘟疫几乎将他们全部消灭光^①。

事实上,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雇佣野蛮人士兵的情况,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普遍,乃至发展成为一种政策。这一政策在军事上具有“以夷制夷”的作用,在经济上则增加了罗马的税户。克劳狄的去世引发了哥特人新一轮的反叛起义,特别是当驻守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口的罗马军队转向内战撤离边防后,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联合起事,再度从乌克兰进攻巴尔干半岛多瑙河下游地区。一度统一了罗马帝国的奥勒良皇帝(Aurelianus, 270—275年在位)因无力彻底解决哥特人问题而放弃武力镇压,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罗马人同意不追击撤退的哥特人,并为他们提供平等的交易市场,开放多瑙河地区贸易,而哥特人则为罗马人提供包括大批骑兵在内的2万士兵。为了加强对哥特人的控制,奥勒良皇帝将大批哥特人贵族子弟做为人质,名义上对他们施以罗马式教育,实质上控制住哥特人的动乱。据说,在后来发生的500名哥特人骚乱中,将其中骨干分子全部残酷处死的不是罗马人而是哥特贵族。合约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罗马人放弃了对达吉亚地区的控制,将达吉亚居民悉数迁移到多瑙河中部南岸地区^②。奥勒良认为,这个多山地区的行省贫瘠荒凉,既无开发价值也很难防卫,与其花大笔经费支持那里的罗马军队,不如利用骁勇的哥特人,而罗马人需要做的是改善与这些蛮族的关系。保持一支友好的哥特人驻防军队远比维持罗马边防军更容易。特别是正当协议签署之际,莱茵河畔的另一支日耳曼人部落的2万骑兵侵入高卢行省,奥勒良急需将多瑙河

^① Zosimus, I, 12, p. 638.

^② Hist August, p. 222.

前线军队调往西部边疆^①。奥勒良之后的皇帝普洛布斯(Probus, 276—282年在位)推行大规模雇佣野蛮人士兵的政策,以至于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推行将野蛮人定居在罗马的土地上”。仅在色雷斯一地,就有10万哥特人定居下来,他还征召1.6万哥特士兵分编进罗马军团^②。

值得注意的是,哥特人在公元3世纪期间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由于缺乏必要的史料,他们皈依基督教的最初情况尚不得而知。根据学者推测,哥特人是从那些从小亚细亚被俘的基督徒那里开始了解新宗教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正是当时在这个地区十分流行的基督教阿里乌派信仰。325年皇帝君士坦丁召集第一次基督教主教会议时,哥特人基督徒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其主教塞奥非鲁斯(Theophilus)还在会议决议上签字。后来担任多瑙河地区哥特人主教的乌尔非拉(Ulfila)曾在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多年,被阿里乌派大主教任命为哥特人主教后,在哥特人中长期宣传该派教义,并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创造了哥特字母,将《圣经》翻译为哥特语言,以便在本民族中传播福音。

第二节 哥特人退出巴尔干历史舞台

拜占廷帝国统治初期,哥特人举族移居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成为拜占廷统治者们面临的最主要的外交问题。造成哥特人整体西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受到东汉帝国打击的匈奴人向西迁徙,引发了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浪潮。他们首先攻占了位于德涅斯特河和顿河之间的东哥特人的定居地,使得

^① Zosimus, lib. , 1, p. 43.

^② 当时的祭司萨尔维安(Salvian)尖刻地抨击说:“所有商人的生活除了忙于狡诈欺骗外没有别的,元老们除了不干公正事别的也干不了,官吏们则只会尔虞我诈,而士兵们只会干抢劫的营生。”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Amsterdam 1966, pp. 31—32.

后者被迫向西进入西哥特人地区。西哥特人在匈奴人的烧杀抢掠下,不得不进入多瑙河以南的拜占廷帝国。据文献记载,大批哥特人在多瑙河对岸高声号叫,恳求拜占廷人允许他们过河,成为纳税的帝国臣民,并为帝国军队提供兵员。他们还派出代表团,面见皇帝,陈述理由。东罗马帝国文武大臣均对哥特人的请求表示欢迎,因为他们认为接受哥特人有利于帝国边防和增加国库收入。一方面尚武的哥特人在边境地区形成一道防御力量,并可以提供兵员补充帝国军队,另一方面,被免除了兵役的农民交纳的“兵役税”将是帝国的一大笔收入。君士坦丁一世及其父亲都接收了大批日耳曼人,他本人一次就允许30万日耳曼人定居在罗马帝国边境地区,而其统一帝国的主力军队中包括数万哥特人军团,后来他在修筑新罗马城时投入了4万哥特士兵^①。

公元322年,大约经历了两代人和平的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重新集结在哥特人的战旗下,向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进军,直指多瑙河中游的康波纳、马古斯和波诺尼亚(即莫埃斯亚地区首府维丁)^②。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在其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协助下,亲自统率罗马大军,通过图拉真时代建造的多瑙河大桥,进军达吉亚行省。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罗马军队很快占据了战场优势,反叛的哥特人贵族遭到惩处,忠实于罗马人的贵族得到扶植。新订立的合约确定,哥特人将为罗马皇帝提供4万士兵,但军需由罗马皇帝供给^③。326年,哥特人挤压其近邻萨尔马提亚人从其活动的区域即维斯杜拉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向西出击,随行的有大批牛车和棚车运载的家眷,萨尔马提亚人善骑射,其骑兵来去迅捷,曾对东罗马帝国边防构成严重威胁^④。他们首先占据了原罗马帝国的达吉亚地区,定居在沿多瑙河的平原地带,据说

①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Amsterdam 1966, vol. I, p. 32.

② Zosimus, I, 12, p. 93, 94.

③ Jornandes, c. 21.

④ 不知吉本为何十分憎恶地称他们为“人类最难缠的种族”。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p. 259.

这里是早期哥特人定居过后来放弃的地带,那里以捕鱼为生的居民被外来的野蛮人驱赶进喀尔巴阡山南麓。起初,这支野蛮彪悍的军队屈服于哥特人的残暴无情,随时与哥特人联合起来进犯多瑙河南岸地区。但是,在长期的军事行动中,他们的勇敢和先进的军事技战术相结合,并不断吸收进汪达尔人,逐渐与哥特人发生冲突。为了避免在实力更为强大的哥特人打击下举族灭亡,萨尔马提亚人向君士坦丁皇帝请求保护。当时,哥特人领袖阿提拉刚刚成为东罗马帝国边防的大敌,他不仅放弃了数年前与“罗马人”订立的合约,而且借口罗马皇帝喜欢哥特人而率领大批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一侧。时年已经53岁的君士坦丁皇帝亲自披挂上阵,率军迎敌^①。经过双方激烈的战斗,特别是皇帝长子的有力增援和黑海北岸民族的支援,东罗马军队击溃哥特人,迫使他们从多瑙河南岸全面退却,逃入多瑙河北岸山区。据说,他们在那里因冻饿而亡的人数多达10万之众。君士坦丁在其最后一场辉煌的胜利后,与阿提拉订立合约,并将阿提拉的长子扣押在宫中作为人质。同时,受到哥特人威胁的萨尔马提亚人被允许定居在潘诺尼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意大利,总数超过了30万人^②。

然而,个别有为皇帝对哥特人的胜利并未根本解决问题,也不能完全阻遏数量不断增长的日耳曼人迁徙的浪潮。在日耳曼人各个部落源源不断涌入西罗马帝国的同时,哥特人继续其对巴尔干半岛的进攻或反叛。4世纪中期,日耳曼各部落越来越频繁地越过西罗马帝国自然疆界莱茵河和多瑙河侵入帝国,袭击西部的高卢行省。355年,皇帝朱利安(Julianus, 361—363年在位)受命抵抗日耳曼人入侵。朱利安是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同父异母兄弟朱利乌斯之子,5岁时,其父涉嫌卷入

^① 吉本说他“年迈”,不知依据是什么,如果说83岁的查士丁尼“年迈”倒在情理。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p. 262.

^② Socrates, *The Armenian Adapt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by Robert W. Thomson, Leuven, Belgium Sterling, Va. Peeters 2001, I, 1, c. 18.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by Photius, I, 1, c. 8. Zosimus, I, 2, p. 108. Jormandes, c. 22.

宫廷叛逆活动,遭到全族抄斩的迫害,但他幸免于难。朱利安青少年时在帝国东方学术中心尼科米底亚和雅典接受教育。25岁时,他被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召进宫,任命为副皇帝,受命前往帝国西部高卢行省作战。当时,入侵高卢的法兰克人(Franks)和阿拉曼尼人(Alemanni)多次击败罗马军队,洗劫城市和农村,屠杀当地居民,抢劫他们认为有用的财物和牲畜。朱利安虽然从未指挥过军队作战,但却成功地组织帝国军队反击日耳曼入侵,在今斯特拉斯堡附近大败法兰克人,恢复了高卢地区的和平。朱利安将其驻扎地设在今巴黎塞纳河岛屿上,有效地指挥军队抵抗住3次法兰克人大规模的进犯,在其中最成功的战役中,他捕获2万日耳曼人。在朱利安担任高卢军队指挥的6年期间,罗马帝国暂时阻止了日耳曼人的入侵。

4世纪期间,东罗马(拜占廷)人面对哥特人的迁徙浪潮,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即不仅接受哥特人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和军队,而且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各级军官。当时的作家记载,有大约40—50万哥特人被允许进入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其中半数可以充军^①。各霸一方的罗马将领都大量使用哥特人充实军力,后来统一了整个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就建立了数万人的哥特军团,并利用其强大的战斗力战胜了各路对手,甚至在战后扩建新都时将4万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程。拜占廷政府还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哥特人保持其农村公社制度。这一政策的经济意义在于巩固了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拜占廷农业经济基础。

动荡不安和艰苦异常的生活环境是哥特人长期流动进而在巴尔干

^① A. A. Vasil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1970, vol. I, p. 86. 事实上,皇帝普洛布斯(Probus, 276—282年在位)时期就开始大规模使用日耳曼士兵,他曾在色雷斯安置了10万外族移民,并强迫16000名蛮族士兵加入罗马军团。君士坦丁大帝还将30万萨尔马提亚人安置在帝国内。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 p. 32.

北部地区造成威胁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持续不断来自中亚的其他民族的挤压,或周期性恶劣气候对山地脆弱生态环境的改变,还是东罗马地方官员的敲诈勒索都可能成为哥特人“一而再再而三”骚乱反叛的理由。另外,作为一个实力不断壮大和文明发展越加成熟的民族,哥特人不能满足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他们寻求独立的愿望与日俱增,更加迫切。赫尔曼里克(Hermanric)就是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时代涌现出的一位哥特人领袖。这位东哥特人王利用定居在拜占廷领土上的哥特人对拜占廷官员贪婪剥削和种族歧视的仇恨,领导了多次起义,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哥特人武装,他本人则成为维护哥特人利益的民族英雄,被称为“哥特人的亚历山大”^①。赫尔曼里克实力的增长还有赖于日耳曼人其它对立部族的加入,包括西哥特人在内的12个部族都承认了他的大王地位,各个部族领袖均自愿或被迫成为其指挥下的“法官”。据说,赫尔曼里克活到了110岁,在其长期的铁腕统治下,从多瑙河到现代波兰北部的整个中欧地区都成为哥特王国的疆域,并构成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巨大威胁^②。公元366年,赫尔曼里克治下的3万西哥特人及其1万辅助部队越过多瑙河,直捣巴尔干半岛腹地,蹂躏了色雷斯地区各个省区。早就得到通报的帝国军队已经做好了迎战准备,因此在最初的交锋中占了上风,哥特人被迫要求和谈,请求恢复以往与“罗马人”建立的友好关系,自愿成为皇帝的臣民。心高气盛的皇帝瓦伦斯(Valens, 364—378年在位)在其兄弟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us II, 364—375年在位)的鼓噪下拒绝继续和谈,也听不进其骑兵指挥维克多和步兵指挥阿林赛乌斯明智的劝说,执意鲁莽进兵。他指挥军队在冬季即将来临的时候北进,并要求部队冒着雨季连绵不断的阴雨渡过多瑙河,对慌乱中的哥特人进行清剿。在战争的最初3年里,东罗马军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促使哥特人内部发生分化,西哥特领袖阿萨纳里克

①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p. 125.

② Ammianus, 31, 3.

(Athanaric)被迫与瓦伦斯在多瑙河上签署和约,送交人质。瓦伦斯得胜班师回君士坦丁堡,北部边因此防保持了6年宁静^①。

多瑙河前线和平的再度破坏主要是因为来自中亚的匈奴人对东欧地区的入侵引发的。匈奴人自公元前在远东地区遭到我国汉朝军队打击分裂后,其西匈奴向西流窜迁徙,长期活动在中亚草原上。公元89年,北匈奴为汉将窦宪所破,被迫西迁,与郅支部匈奴合为一股,继续沿威海北岸向西迁徙,到达伏尔加河流域。正是由于在伏尔加河东岸地区两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匈奴人日益强大。360年,这部分匈奴人挺进到顿河中下游地区,于370年又从顿河流域向西攻击河西的阿兰人,迫使后者降服归顺。当瓦伦斯享受着与哥特人的平时,匈奴人于375年发动了对东哥特人的侵扰。凶悍残暴的匈奴人迅速进入东哥特国王赫尔曼里克控制下的疆域,他们的骑兵战术和无情杀戮使已经在定居生活中“文明化”的哥特人丧失了抵抗能力,庞大的哥特人“帝国”迅即瓦解。面对匈奴人的压力,一部分哥特贵族首先屈服,罗克舍拉尼人首领投向匈奴,使狂怒的赫尔曼里克将其家眷野马分尸,以儆效尤。但是,这次严厉的惩罚也遭致贵族的仇恨,他最终丧命于复仇的罗克舍拉尼贵族短剑之下。接任他的国王维塞梅尔(Withimer)虽然极力阻止抗战,但最终战败被杀,东哥特人屈服于匈奴人。阿萨纳里克虽然勇敢地组织西哥特人利用河流为自然屏障抵抗匈奴骑兵的进攻,但是,恐惧心理摧毁了将士们的意志。西哥特人全线退却,希望退守多瑙河南岸,利用这条大河阻挡住匈奴铁骑,还有一小部分则退入喀尔巴阡山丛林^②。惊恐万分的西哥特人拥挤在多瑙河北岸,高声哭喊,并派遣使节面见瓦伦斯,请求东罗马人保护,允诺将为帝国开发色雷斯北部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成为缴纳赋税的臣民。瓦伦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同时提出他们必须解除武装,并将全族儿童交由东罗马人送往小亚细亚地区集中进行教育。各种船只投入到运送西哥特人的工作,经过几个昼夜的

^① Ammianus, 27, 5. Zosimus, I. 4, pp. 211—214.

^② Ammianus, 31, 3.

奋斗,上百万西哥特人最终被摆渡过河,除少数将士留在河对岸监视匈奴人动向外,全体进入巴尔干半岛定居^①。皇帝的两项条件只有第二条被立即执行,第一条则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被拜占廷的贪官污吏改变了,因为哥特人的尚武传统使他们不愿意放下武器,同时以缴纳赎金或金钱贿赂的方式他们也可以保留自己的刀剑。据说,大部分拜占廷官兵因此大发横财,甚至得到了不少异族美女和奴隶。

东罗马将士的腐败远不如色雷斯地方官员乘人危难大肆敲诈勒索来得凶猛。色雷斯军政府的两名主要官员鲁庇西努斯(Lupicinus)和马克西姆斯(Maximus)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他们正为个人和地方增加财政收入而大伤脑筋。于是,公开的讹诈立即在整个地区流行开来,每磅面包的价格难以置信地涨到了几镑黄金,各种动物的尸体都被当作鲜肉摆上了市场,不论它们是病死或腐烂,其高昂的价格甚至比一个奴隶的价格还贵。西哥特人的不满随着东罗马人的贪婪迅速增长,那些一直领导西哥特人的贵族领袖们不动声色地聚集着没有解除武装的部下,缓慢地向马尔西安堡集结。同时,他们与尾随而至的东哥特人秘密联系,暗中准备起义,因为被“罗马人”敲砸勒索的西哥特人和被拒绝入境的东哥特人几乎都将不满化为了愤怒和仇恨。战争被一个无足轻重的争执点燃了,哥特人立即在佛里提格恩(Fritigern)领导下爆发起义。佛里提格恩原是在鲁庇西努斯卫戍部队中服役的哥特人军官,由于被误判死刑而起事。他率领的哥特起义军在莫埃斯亚首府马尔西安堡附近9英里处大败鲁庇西努斯统领的拜占廷军队,“这个胜利的日子结束了所有‘野蛮人’的痛苦与不幸,也结束了‘罗马人’的和平与安宁:从这一天起,终止了外邦人背井离乡的动荡生活的哥特人获得了公民与主人的身份,他们从此拥有了掌控自己土地的绝对权力,把以多瑙河为界的帝国北部诸省尽行控制在自己手里”^②。起义军立即得到半岛各地哥

^① 这一重大事件被许多拜占廷作家所记载,但记载的过河人数多有区别。Zosimus, I. 4, p. 223—224. Jormandes, c. 25, 26.

^② Jormandes, c. 26.

特人的响应,他们中既有刚刚逃离匈奴人追杀又落入拜占廷人压榨的新来者,也有早先在拜占廷军中服役的反叛者,他们都在起义军的旗帜下找到了生路,也在本民族同胞中得到了尊严和理解。驻扎在色雷斯首府亚得里亚堡城外的哥特军官苏埃里德(Suerid)和克里亚斯(Colias)的反叛对拜占廷人震动极大,因为此城扼守着通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它若失守则京城危在旦夕。瓦伦斯被迫从安条克驰援色雷斯前线,并从东方边境和西部帝国紧急调集军队。双方在萨利塞斯地方进行决战,连续厮杀了多日,未分胜负,但死伤惨重。多年后,发生萨利塞斯战役的原野仍然覆盖着战死者的白骨,给历史家留下深刻的印象^①。公元378年,瓦伦斯再度出征,未等西部援军到达就贸然出击,在亚得里亚堡附近战役中战败,被哥特人杀害,随之阵亡的有帝国步兵总指挥、骑兵总指挥、两员宫廷高官、35名将领以及三分之二的罗马军队^②。亚得里亚堡战役标志着东罗马防务体系的彻底瓦解,标志着哥特人掌握了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此后,哥特人仍然在多瑙河以南广大区域流窜抢劫,但逐渐在山区和平原定居下来,建立根据地。

自古典时代以后,巴尔干半岛虽然屡遭外族入侵,但是还没有被“野蛮民族”控制的经历,哥特人是第一个一度主宰半岛命运的外来民族。思想家和历史家对哥特人取得胜利的原因作过长期的探讨,给出的答案也各不相同,其中为人们普遍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哥特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尚未完全摆脱“三世纪危机”影响的东罗马帝国实力下降,但是哥特人面临的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压力。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前者并没有后者那样的紧迫感,因此在巴尔干半岛狭小的舞台上没有表现出殊死拼搏的态势,相反,哥特人则因没有退路而必然拼死斗争,取胜之势不可阻挡。就此而言,瓦伦斯

^① Ammianus, 31, 7.

^② Zosimus, lib. 4, p. 230. Jornandes, c. 27. Socrates, lib. 4, c. 38. 关于瓦伦斯阵亡的细节,史家记载多有不同,或认为他中箭而亡,或记述他被烧死在藏身的农舍里,但此役拜占廷军队惨败细节的描述大体一致。

允许哥特人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政策并无不当^①。其失策之处在于，陈旧腐朽的国家机器没有得到改革调整，因此不能正确地执行既定政策，并导致新的矛盾不断爆发。皇帝本人在应对紧急情况时缺乏掌控能力，并由于一次军事上的失误，全盘皆输，进而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格局。换言之，如果拜占廷最高统治者能够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采取合理的措施保证其正确的战略方针得到贯彻，则总形势还会发生逆转。巴尔干半岛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而改变拜占廷帝国劣势地位的皇帝是塞奥多西一世皇帝(Theodosius I, 379—395年在位)。

塞奥多西一世出身于西班牙地区，曾长期服役于帝国军队，屡立战功。他继任皇帝后，改变以武力镇压哥特人的方针，推行任用哥特人的政策，不仅积极支持哥特人的基督教化，组建哥特人军团，将防守帝国北部疆界的军事职责交给哥特将领，而且任命哥特军事贵族担任帝国高级军官和行政官吏。这一政策不仅使哥特人接受了比较成熟的战争艺术，促使他们迅速发展成为拜占廷帝国可以借助的军事势力，而且暂时化解了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日益严重的对立情绪，将四处流窜的哥特人安定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在其统治的16年间，他分化了哥特人势力，将其中以阿马里人贵族为主的一部分哥特人生力军纳入东罗马军队，又与以阿萨纳里克为代表的哥特人订立和约令其保持中立，孤立了以阿拉里克(Alaric)为首的哥特人，并巧妙而充分地利用哥特军团的作战力量，击败肆虐半岛地区的哥特人，逐步清除了他们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老巢和流窜抢劫的哥特匪帮。他首先在巴尔干半岛中心区马其顿首府塞萨洛尼基建立司令部，而后强化全岛军事要塞和城镇的防务体系，修缮公路系统，整顿军纪，调整拜占廷军队，密切监视哥特人起义军的动向，并适时出击，在不断的胜利中消除了亚得里亚堡战役失败的负面影响。对于多瑙河北岸的东哥特人，塞奥多西采取了坚决消

^① 吉本批评瓦伦斯将野蛮人放入巴尔干半岛是重大失误，这种意见带有罗马帝国正统主义的偏见。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pp. 166—169.

灭的政策,设计在他们为大举入侵半岛而渡河的过程中,从上游派遣舰队顺流而下发动攻击,一举歼灭东哥特人主力军。巴尔干半岛安定局势得到恢复,拜占廷历史作家左西莫斯(Zosimus)庆幸地写到:塞奥多西的胜利使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地区重新实现了和平,因为在那里一直肆虐的野蛮人已经被清除了”^①。

由于拜占廷当局更加依赖哥特人的军事力量,重用哥特人军事将领,导致哥特贵族与拜占廷贵族之间利益发生冲突,矛盾日益激化。塞奥多西一世去世后,其长子阿尔卡迪奥斯(Arkadius, 395—408年在位)与次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 395—423年在位)继承皇权,分别统治东、西罗马帝国。阿尔卡迪奥斯统治时期,巴尔干半岛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西哥特人发动起义,一时成为帝国心腹地区最大的威胁。西哥特人在塞奥多西一世生前就已定居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395年,其领袖阿拉里克(395—410年)乘塞奥多西一世去世之机率领族人发动起义,向周围地区扩张势力,并大肆抢劫^②。他们首先袭击了拜占廷帝国在多瑙河中游的领土,而后攻击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直接威胁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皇帝紧急调遣驻扎在意大利的拜占廷主力部队,但是,这支由汪达尔人将领斯提里克(Stilicho)统领的军队故意拖延对巴尔干半岛的救援。斯提里克暗中与阿拉里克勾结,以种种借口迟迟不向东发兵,听任哥特军队在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③。阿尔卡迪奥斯皇帝被迫委派重臣鲁非努斯(Rufinus)为首的拜占廷使团前往首都西郊的阿拉里克大本营进行外交斡旋,劝说后者改变进攻计划,但是没有取得成功。事实

^① Zosimus, lib. 4, p. 30. 现代拜占廷学者也高度评价他的成功。A. A. Vasil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vol. I, p. 87.

^② Zosimus, lib. 5, p. 292.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 p. 64 提出,他们起义的原因是新皇帝未按老皇帝的规矩办事,未向他们提供允诺的金钱,同时也未任命阿拉里克为总司令。

^③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 p. 65. 布瑞详细地分析了斯提里克与阿拉里克勾结的疑点,认为从意大利到巴尔干半岛根本不用10个月时间,但他最终承认“这个结论仍然只是推测。”

上,鲁非努斯并不真心帮助阿尔卡迪奥斯,因为他原打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的计划刚刚被皇帝的宠臣尤特罗比乌斯(Eutropius)破坏,使其控制朝政的企图落空^①。只是由于君士坦丁堡城防坚固,阿拉里克无心恋战,故而横扫马其顿平原后,继续南下,通过希腊中部塞萨利地区进入希腊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

斯提里克率领的帝国军队接到增援命令后,在路途上耽误了10个月,当他到达希腊北部时,阿拉里克已经被拜占廷军队击败,在希腊半岛各地流窜。根据拜占廷作家左西莫斯的记载,当时的希腊人还保持着古代的遗风,虽然基督教已经被宣布为国教,但是希腊人仍然固守着多神教的崇拜仪式,沿用祖先的法律和生活习俗,各地城乡中的民众还没有完全接受新的信仰,因而成为古典希腊文明最后的守护者。与此同时,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起义军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们在进军中毫不留情地破坏异教徒的一切^②,似乎有借口执行着基督教皇帝的命令。这遭致希腊军民更加顽强的抵抗。阿拉里克进入希腊地区大肆破坏,但是未能攻克雅典。虽然当时的雅典已经衰败,但阿拉里克领导下的西哥特人缺乏攻城作战的经验,只是占领了雅典附近的比莱福斯港口。根据民间传说,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准备进攻雅典时,遭遇全副武装的雅典娜(Athena)和特洛伊战争英雄阿基琉斯(Achilles)的幻象,被迫放弃攻城^③。事实上,早在瓦勒利阿努斯(Valerianus, 253—260年在位)统治时期,就修复了雅典的城墙,阿拉里克在雅典城下如同他们在围攻首都君士坦丁堡时一样,面对城墙仍然感到束手无策。尽管如此,西哥特人还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肆意破坏,古城科林斯、阿尔哥斯、斯巴达等皆不能幸免。此时,斯提里克从意大利的萨罗那起航,在

① 鲁非努斯后来被斯提里克的部下盖那斯所杀,碎尸,其头颅被游街,其右手被钉在城门上。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 66.

② Zosimus, lib. 5, p. 293—295. Socrates, VII, 10.

③ 据说,阿拉里克本人还受到雅典人的热情款待。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 67.

希腊西部登陆,首先占领科林斯地峡,截断阿拉里克向希腊中部退却的道路。根据学者们的分析,他完全有能力也有机会消灭阿拉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但是,却没有发动进一步的攻击,而是退回了意大利。布瑞认为,斯提里克再次登陆希腊后,与阿拉里克秘密达成协议。首先,前者与后者没有利益上的矛盾,甚至有共同利益。其次,前者一直策划着凭借手中的兵权将其子尤赫里乌斯(Eucherius)扶植上台,取代阿尔卡迪奥斯成为皇帝。允许阿拉里克领导的西哥特军队定居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并随时向马其顿和色雷斯方向发动攻击,显然对实现其建立日耳曼人帝国的梦想十分重要^①。西哥特人此后继续向西北移动,进入伊庇鲁斯山地,边抢劫破坏边与阿尔卡迪奥斯讨价还价,并最终获得了有利的条件,而后转向西方,渡海进攻意大利。被宦官控制的阿尔卡迪奥斯无力控制西哥特人,遂采取“祸水西引”的政策,任命在伊庇鲁斯地区疯狂破坏的阿拉里克为伊利里亚军事总督,并授权后者向西进攻亚平宁半岛^②。

自从塞奥多西一世推行重用哥特人政策后,随着拜占廷帝国在军事上更加依赖哥特人,许多哥特人将领占据了帝国军队要职,一些哥特人甚至进入朝廷,被委以重任。这就导致希腊军事和官僚贵族的极大不满,他们眼见哥特人势力在帝国权力机构中迅速增强,意识到本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秘密策划,准备清除哥特人势力。当时在拜占廷帝国首都酝酿着骚动不安的阴谋,三种势力公开和暗中进行你死我活的较量,随时可能爆发动乱。最初,斯提里克率领部队重返意大利前,任命和派遣其部下哥特人盖那斯(Gainas)统领哥特军队。这支占据军事优势的异族武装,在盖那斯领导下取得了皇帝的信任。盖那斯利用权力网罗了一批哥特人和亲日耳曼人的拜占廷官员,力图控制朝政。

①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 68.

② 据称他是带着远大的抱负前注意大利的。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p. 345. 经过300场胜利,他最终实现了将其军旗插上罗马城头的理想。

这就与大宦官尤特罗比乌斯(Eutropius)为首的朝廷宠臣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后者认为朝廷一直是其控制的范围,不允许其他势力染指。而这一派基本上由聚集在尤特罗比乌斯身边的朝廷宦官贵族构成,他们在皇帝身边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密布阴谋,与朝廷中其他势力联合,与哥特人军事集团展开激烈的较量^①。除了这两派外,由首都市长奥列利安(Aurelian)控制的政治势力也对拜占廷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其主要成员多为元老贵族、朝廷高官和教会上层人士,他们一直不满皇帝重用宦官的做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反对哥特人这一点上,后两派不约而同地形成共识,他们有时会将有矛盾的矛盾暂时搁置在一旁。

拜占廷帝国驻北非的官员西奈修斯(Synesius)上奏皇帝的书信最能代表拜占廷教、俗贵族对哥特人势力增强而生的忧患意识。西奈修斯出生于北非西雷尼城贵族之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崇尚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后皈依基督教。他于399年受委派赴京上朝,请求中央政府减少对其家乡的税收。后来,他被任命为北非托勒迈斯城主教。他在京城3年期间,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目睹了哥特贵族与拜占廷贵族的矛盾冲突,深感拜占廷贵族面临哥特人的严重威胁,作为外省的拜占廷贵族,他大胆向阿尔卡迪奥斯皇帝进言。他在信中指出:“武装的野蛮人会抓住一点点借口增强权力,成为罗马公民的统治者。那么没有武装的人将被迫奋起反抗那些军事上训练有素的人。他们这些外邦人应首先被清除出指挥岗位,并剥夺他们的元老贵族官阶;由于这些外邦人的影响,古代罗马人最为尊崇的荣誉已经变成了耻辱。正如在许多事情上看到的一样,我在这方面也十分惊讶我们的愚蠢。我们在所有多少有些富裕之家都能够看到斯基泰(指哥特人)奴隶;他们只能干大师傅和上酒人的活儿;还有那些背着板凳沿街流浪为其他想要在露天坐下休息一下的人提供服务的也是斯基泰人。就是同一种浅色毛发的野

^① 尤特罗比乌斯是前朝老宦官,在宫廷中势力强大,他在排挤了鲁非努斯并安排了皇帝和法兰克血统的官女尤多西亚的婚事,权倾一时,控制了皇帝。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 p. 63.

蛮人,这些有着尤比克发式私下里当别人奴仆的野蛮人,竟然成了我们政治生活的主宰,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皇帝应该把他们清理出军队,如同我们把谷壳和其他杂物清理出种子一样,因为如果任其发展,必定损坏良种。您的父亲(即塞奥多西一世)大慈大悲,好心仁慈宽宏大量地接收了他们(这些野蛮人),赐予他们盟友的地位,让他们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和荣誉,还慷慨地捐助他们以土地。但是,这些野蛮人完全不把这些高贵的行为当作仁慈的善举,而把它们说成是我们软弱的表现,这使得他们变得更加狂傲不逊、高人一等。您应该大力征召我们本土士兵,以此加强我们自己人的军队,增强忠勇,应该在全帝国继续完成那些必须去做的事情。对付他们这些人必须表现出坚定执著,或者让他们像古代迈森尼人(Messenians)一样放下武器作为奴隶为拉斯迪蒙尼人(Lacedaemonians)劳作,奴隶般地耕种土地,或者让他们哪来的哪去,按来的原道滚回去,以此向住在(多瑙河)对岸的那些人表明,罗马人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仁慈,他们正被高贵的年轻皇帝所统治!”^①从这封信中,清楚地反映出当时拜占廷贵族对哥特人的憎恶。他们希望皇帝通过清理军队中的哥特人、剥夺哥特人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降低哥特人的社会地位、强制哥特人重新成为拜占廷人的奴隶等措施,最终解决哥特人问题。如果哥特人不接受这样的整治,拜占廷人就将他们重新驱逐出拜占廷帝国边境。可以看出,当时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

盖那斯凭借哥特人控制的军权,不断向尤特罗比乌斯为首的官宦集团施加压力,并最终控制了宫廷斗争的主动权^②。当时,定居在小亚细亚菲利吉亚地区的哥特人在首领特里比吉尔德(Tribigild)煽动下发动起义,对其周围地区的城乡进行大肆破坏和抢劫,并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尔卡迪奥斯皇帝被迫派遣盖那斯前去镇压,而后者利用这一机会,暗中与特里比吉尔德勾结,设计使拜占廷军队被击溃。而后,

^① A. A. Vasil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1970, vol. I, pp. 92—93.

^② Zosimus, lib. 5, p. 300.

两位哥特人公开勾结,联手威逼皇帝惩治尤特罗比乌斯,要求罢免这个宦官总管,并交由他们处置。尤特罗比乌斯的失败在于树敌太多,他自恃皇帝的宠幸,不顾与哥特人矛盾的激化,又放弃了与元老贵族集团的联合阵线,不仅对市长奥列利安发起挑战,鼓动皇帝采取设立邮政大臣等措施削减后者的权力,而且推行严重损坏元老贵族集团利益的措施。这使得皇后尤多西亚(Eudoxia)和市长奥列利安领导的元老贵族、朝廷高官和教会上层人士集团对宦官集团的骄横跋扈更加不满,与哥特贵族集团共同要求皇帝罢免尤特罗比乌斯^①。阿尔卡迪奥斯皇帝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解除了尤特罗比乌斯,并于399年将其流放海岛。然而,盖那斯与特里比吉尔德仍感到其心头大患并未消除,故而继续威逼皇帝将尤特罗比乌斯关押在首都,并最终将其处死。这一事件表明,哥特人的势力不仅控制了军队,而且左右朝廷,干预皇权。

盖那斯凭借武力取得宫廷斗争的胜利后,更加不可一世,威逼皇帝将其政敌奥列利安及其主要党羽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和皇后尤多西亚的朋友约翰尼(Johannes)交给他关押,以此彻底清除对立派。同时,他扶植自己的亲信,罗马贵族提弗斯(Typhos)担任帝国第一高官。此后半年,盖那斯率领的哥特军团进驻首都,为所欲为。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其所作所为正在为其可悲的下场做好了准备,他们的种种恶行已经招致拜占廷帝国各阶层的普遍仇视,民众中反哥特人为代表的外族势力的怒火即将爆发。当他要求皇帝批准开放首都的一所教堂,为信奉阿里乌派异端信条的哥特人举行礼拜仪式时,立即引起坚持正统尼西亚信经的大多数拜占廷民众的反对,希腊贵族们趁机鼓动反哥特人的民众骚乱。以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赫里索斯托姆(389—404年)为首的教会上层对此公开指责,并代表整个帝国的正统基督教信徒支持皇帝抵制哥特人的无理要求。这个时期,阿尔卡迪奥斯皇帝也对哥特军事将领感到不满,特别是在特里比吉尔德起义以后,深感哥

^① “人们可以这样推测,这全部事件就是斯提里克与拜占廷党派事先安排好的”。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 p. 66.

特人对帝国皇权统治的威胁,力图摆脱其控制。因此,他利用拜占廷教会和元老贵族集团势力,拒绝了盖那斯使用首都教堂的要求。深感处境危险的盖那斯不敢坚持自己的要求,但同时与提弗斯密谋占领皇宫,废黜皇帝。400年7月11(或12)日,大教长约约翰·赫里索斯托姆利用拜占廷人普遍对哥特人的不满和敌视情绪,抓住盖那斯带着一小队亲兵出城的机会,以“勤王”为口号,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人民起义。拜占廷民众紧闭城门,疯狂屠杀当时逗留在首都的8000名哥特人,后者因群龙无首,在突然发生的袭击面前无力反抗,束手被杀。盖那斯闻讯返回,但为时已晚。阿尔卡迪奥斯对突发的民众起义表示支持,并派遣忠实于自己的另一个哥特亲信佛拉维塔(Fravitta)领兵捉拿盖那斯。盖那斯见大势已去,遂仓皇向小亚细亚逃窜,企图投奔特里比吉尔德,暂避风头,以便东山再起。正当他准备渡海峡时,佛拉维塔的追兵赶到,迫使他转而逃奔色雷斯地区。在这里,盖那斯被侵入该地的匈奴人捕获。401年初,匈奴人将其头颅送到君士坦丁堡,作为礼物赠送给阿尔卡迪奥斯^①。聚集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的哥特人残余势力不久也随阿拉里克渡亚得里亚海西去,拜占廷帝国政治和军事生活中存在的哥特人势力由此遭到沉重打击。

5世纪时,活跃在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和来自于小亚细亚的伊苏里亚人再次成为拜占廷国家新的威胁。这里所说的哥特人是指4世纪下半期屈服于匈奴人的东哥特人。如前所述,匈奴人于375年发动了对东哥特人的侵扰,迫使其屈服,作为匈奴人的同盟者参与对东欧地区的征服战争。453年,匈奴王阿提拉去世使整个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几乎所有被迫屈服的民族立即于次年宣布独立,纷纷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其中最大的一支力量是东哥特人。当时瓦拉米尔(Walamir)、塞奥迪米尔(Theodemir)和维德米尔(Widemir)三兄弟共同统治东哥特人,他们与拜占廷皇帝签约,作为拜占廷帝国边防军定居在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

^① Zosimus, lib. 5, p. 350. Socrates, VI, 6.

地区。摆脱匈奴人控制的东哥特人旋即成为东欧的战争根源，他们对周边民族发动攻击。瓦拉米尔在与苏维汇人的战斗中阵亡，维德米尔率所部西进意大利，而塞奥迪米尔则向巴尔干半岛西部扩张。后者在与拜占廷皇帝利奥(Leo I, 457—474年在位)交手中并未占得先机，被迫于461年订立和约。为确保东哥特人履行协约，塞奥迪米尔的儿子塞奥多里克作为人质被送交拜占廷宫廷。10年后，塞奥多里克脱离拜占廷人控制，领导其族人在多瑙河流域打败萨尔马提亚人，并与其父汇合。拜占廷人很快就认识到放虎归山的恶果，因为他们父子二人共同指挥下的东哥特人成为巴尔干半岛的祸根。他们不仅将东哥特人占据的土地扩张到潘诺尼亚地区以外的多瑙河下游，而且迫使篡位的拜占廷皇帝瓦西里库斯(Basiliscus, 475—476年在位)承认他们对马其顿地区的占领^①。为了获得合法的地位，“文明化”的哥特人迫使皇帝承认其为帝国将军。

然而，拜占廷人对塞奥多里克的让步引发了另一个同名的哥特人的不满，此人早在拜占廷军中任将军，而且一直觊觎军队总司令的职位，新的竞争者的出现有可能使其愿望落空。于是，后者于473年派使节面见利奥皇帝提出要求，当其要求遭到拒绝后，立即起兵反叛。他对色雷斯首府亚得里亚堡的围攻再次危及帝国首都的安全，利奥不得不同意其要求，而且被迫向反叛的哥特人提供2000磅黄金^②。但是，拜占廷当局的“绥靖政策”并未换来预期的和平，反而开启了哥特人以武力要挟达到要求的恶劣先例。此后，拜占廷帝国的这两个同名的哥特人将军对皇帝展开了轮番压榨，并随意洗劫巴尔干半岛，或兵临首都城下。479年，两个塞奥多里克识破了拜占廷皇帝泽诺(Zeno, 474—491年在位)挑动哥特人之间火并的阴谋，联合攻击拜占廷人。他们还派出使节，向拜占廷皇帝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高职高官而且要求大笔金钱和大块土地。而后，其中一位塞奥多里克挥兵西进，抵达迪拉

^① Jormandes, c. 46.

^②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 p. 263.

修姆海港城市,这里是通航意大利的最重要的港口。在皇帝的特使阿达曼提乌斯(Adamantius)的说服下,后来主宰亚平宁半岛的塞奥多里克(Theodoric,471—493年在位)带领一部分哥特人前住意大利,代表皇帝平息西哥特人的反叛。因为,当时意大利的西哥特人在奥多亚克(476—493)领导下灭亡了西罗马帝国,自立为帝。公元488年,塞奥多里克率东哥特人横渡亚得里亚海击败西哥特人,成功入主意大利。另一个塞奥多里克则丧命于族内争权夺利的阴谋,被其子害死,其所部数年后消亡。这样,最后一支哥特人从此离开了巴尔干半岛,也由此退出了巴尔干半岛的历史舞台。东哥特人后来在意大利建立了王国,它一直存在到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代,并在查士丁尼发动的西地中海统一战争中被灭亡。这样,到6世纪下半期,这个民族便从地中海历史中消亡了。

第三节 匈奴人和“阿提拉帝国”

匈奴人入侵欧洲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这个中亚游牧民族自东向西的征战活动尽管只是建立了一个寿命仅有数十年的“阿提拉帝国”,尽管一些现代学者命名为“阿提拉时代”的时间跨度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似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以及在欧洲中古史上显得极为短暂,但是,匈奴人西侵却以其空前的残暴留下了不朽的痕迹。而这一入侵过程首先始于匈奴人对东欧地区的进犯,巴尔干半岛首当其冲,这也是本书不能不特别关注匈奴人的原因之一。

根据一般的说法,匈奴人起源于蒙古草原,自公元前3世纪以后,活动在我国北方的大漠地区达300年之久。《史记》和《汉书》记载,匈奴人于我国两汉时期与中原地区交往密切,频繁入侵大漠以南地区,曾遭到汉朝军队的沉重打击,后分裂为东匈奴和西匈奴两部。其中后者于公元1世纪从漠北西迁中亚,前者再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南匈奴进入今内蒙古地区后逐渐与当地农耕民族融和,北匈奴则因屡

犯中原遭到致命打击后分裂。其中一部被鲜卑所并，而势力较小的一支沿传统迁徙路线向西流窜，与威海北岸的匈奴人汇合继续西进。西进匈奴人中的一部迁徙到里海东部的苏格底亚纳大平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定居农耕文明中。与本书有关的正是向西迁徙的另一支匈奴人。他们辗转中亚草原，沿威海、里海、黑海诸海北岸的路线，逐水草而行。经过两个世纪的游牧，匈奴人于3世纪到达伏尔加河流域东部地区。他们与占据该地区的阿兰人发生激烈的战争，最终占据了这个地区^①。该地区水草丰厚，气候适宜放牧，因而，匈奴人牲畜兴旺，人口增加，实力迅速强大起来^②。

匈奴人的来源和族属一直是学术界探讨争论的问题，由于现有史料没有提供更加确切的依据，因此学者的各种意见大多属于推测。但是，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证实了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即认为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③。他们在西迁的游牧生活中，或因战争或因贸易，与中亚地区广大土著民族发生联系和交往，并与之发生部分融和的现象并不奇怪，因此通过混血改变部分体质形态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在现代人类各民族中，纯粹单一血统的古代民族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在交往频繁的欧亚大陆上所有的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融和的历史，匈奴人这种流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更是如此。与匈奴人族属问题一样棘手的是匈奴人西迁的原因。匈奴人受到汉朝追击向西流窜引发连锁反应的说法有之，游牧民族习惯逐水草而生的说法有之，落后的游牧民族被先进的

① 这个时期的史料很少，记述不详。Ammianus, 31, 2. Jordanes, c. 24.

② 吉本概括总结了匈奴人的活动范围，即西从多瑙河东到日本海的5000英里长，南启北纬40度线向北1000多英里。他认为到达伏尔加河的匈奴人大约有5万户。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p. 151, 160.

③ 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入侵欧洲之匈奴人与汉朝北方之匈奴人体质形态似有不同，他们是否为同一民族而与其他民族融和而有所改变，或不同史料记载的文化背景不同而语焉不确，诸多疑点有待专家深入探讨。吉本认为匈奴人是斯基泰人。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p. 149.《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农耕文明所吸引的说法有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诸多意见都有一定的根据^①。但是,这些说法均难以全面回答这个难解的历史之谜。如果说匈奴人从大漠西迁是因汉朝军事压力所致尚在情理,那么已经定居在伏尔加河东岸数代之久的匈奴人入侵东欧就说不通了,而“游牧生活习惯”和“文明差异”的说法无法解释匈奴人周期性的扩张现象,难道匈奴人在定居伏尔加河流域的近两个世纪期间丧失了其“习惯”,消除了“文明差异”?他们发动大规模入侵欧洲的迁徙运动一定还有更深层次且不为我们所知的其他原因。笔者斗胆推测,匈奴人大范围的迁徙一定是由于他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某些周期性的重大变动,以致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通过暴力手段抢夺其他民族生存之地,而不断自东向西迁徙的小股匈奴部落成为引发整个匈奴民族西进移民运动“大雪崩”的初始动力^②。

360年,匈奴人开始新一轮的迁徙,他们首先抵达顿河中下游地区,而后又从顿河流域向西移动,征服了那里的阿兰人,进而于375年发动了对东哥特人的进攻。匈奴人举族皆兵,行动迅捷,来去匆匆,使得以骁勇善战的东哥特人也无力应对,国王赫尔曼里克控制下的庞大的哥特人“帝国”迅即瓦解,东哥特人被迫屈服于匈奴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参加匈奴人的征服战争。位于东哥特人西部的西哥特人利用河流等自然屏障暂缓了匈奴骑兵的进攻速度,但是,无力阻止蜂拥而至的移民浪潮。特别是恐惧匈奴人的心理促使西哥特人全线退却到巴尔干半岛北部多瑙河南岸地区。此后,匈奴人和哥特人联手进攻拜占廷人,得手后向北返回多瑙河北岸。395年,匈奴人的一部分翻越高加索山脉,入侵

^① 在谈到匈奴人迁徙的原因时,吉本如是说:“匈奴人的骁勇只能从追寻南方帝国的财富和奢华得到报偿。”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p. 153.

^② 吉本正确地推测出,一定存在着促使匈奴人不断西迁的动力,但他认为这种动力来自东方更强大部落的挤压。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p. 160.

拜占廷帝国东方行省,在幼发拉底河上游遭到沉重打击^①。

当时,整个巴尔干半岛居民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各种消息在民间流传,将匈奴人描述成食人生番的怪兽。在巴勒斯坦从事教会活动的拜占廷教士杰罗姆(St. Jerome)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匈奴人入侵的情况:“正当我为这样一位女士(其朋友发比奥拉)寻找一个合适住处的时候,就看到突然疾驶而来的信使四处传报,说从遥远的迈奥底斯,从冰天雪地的顿河地区和蛮荒之地马撒格提,大批匈奴人已经铺天盖地涌来,席卷各地,他们到处烧杀,令人谈之色变。亚历山大大帝在那些地区如高加索山崖上建立的要塞一直阻遏抵挡着这些野蛮民族,现在整个东部帝国都被他们带来的消息震撼了。而那时罗马军队恰好在意大利忙于内战不在东方。……耶稣将会保护罗马世界不受这些蛮人袭击吗?当人们还没有想到他们时,这些野蛮人就已经遍布各地,他们快如疾风,比传播他们袭来的消息还快;他们逢人便杀,不分信仰、地位和年龄;他们对啼哭的婴儿也毫无怜悯。那些尚未长大开始生活的儿童竟被杀害;当他们落入敌人的魔爪,面临刀剑杀戮的威胁时,对突然降临的邪恶灾难还不知晓,脸上还带着天真的微笑。到处流传着同样的说法,敌人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对那个城市的黄金抱着贪得无厌的欲望,匆匆赶往那里。在和平时期被人们无意间忽视的城墙都得到修缮加固。安条克正在成为一道屏障。蒂雷城巴不得与干枯的土地隔绝,设法像古代时一样成为一个孤岛。而我们也被迫躲到船上去,呆在海岸附近,防备敌人袭击。虽然风急浪高,但沉船的恐惧也比不上对野蛮人的惧怕,千方百计躲避不仅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更是为了我们童贞淑女的贞洁”^②。欧洲古代作家对于匈奴人的

^① 数年后,匈奴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因为我们从左西莫斯的记载获知401年初,匈奴人乌尔德斯在这里将拜占廷叛将哥特人盖那斯抓获,并将其头颅送给阿尔卡迪奥斯皇帝作为礼物。Zosimus, lib. 5, p. 350. Socrates, VI, 6.

^② St. Jerome, *The Letters*, trans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 N. Y.: Newman Press 1963, IXXVII, 8.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 69.

记载大多如此,可以反映出当时普通民众和朝廷贵族的一般认识水平。这样的记载是否真实地反映出匈奴人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呢?

事实上,匈奴人的游牧生活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许多不同于欧洲游牧民族生活的特点,既不同于沙漠民族的游牧生活,也不同于山区民族的游牧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娱乐都在马背上,是真正的“马背上的民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他们“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就此而言,《汉书·匈奴列传》的记载也大略如此,说他们“路有遗物,腐不敢取。……其人逐水草畜牧迁徙,无城郭常居,无耕凿之业不粒食,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刻木为期度。儿能骑羊则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饮口酪。自君长至奴婢均多寡,同饮食,衣皮革,被毳毳。以毳为庐屋,俗皆能为弓车铠刀鞍勒,士能弯弓尽为甲士,耐饥冻习劳苦,往往猿臂善射。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其畜多马牛羊,其奇畜则羸驼、驴、羸、馱馱、胸馱、驛、驛马,尤骏健,日馱常数百里,有至千里者。”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匈奴人以放牧和狩猎为主要的的生活方式,以骑射为主要的技能,所有匈奴人从小到大都以马上生活为主,这与定居或半定居的民族形成较大反差。采集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原本就有明显的脆弱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高,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任何不利的灾害都可能改变原有的社会生活关系,激化其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迫使他们通过暴力寻找出路。匈奴人的生存环境显然更加艰难,他们既缺乏古代阿拉伯人拥有的那种过境贸易优势,也没有日耳曼人那种原始农业的生产条件,因此他们的游牧生活得不到其他经济来源提供的必要补充。艰苦生活不仅造就了他们更加突出的尚武好天的天性,也养成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本色,特别是在匈奴人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习俗都使欧洲人难以理解。凶悍的作战

方式来源于对生存资源争夺的需要,同时也受其长期形成的习俗的影响。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匈奴人习俗(包括习惯法)也很有特点,“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铍。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辄,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汉书·匈奴传》涉及匈奴人的习俗也说,“其人重约信,虽数千里远出岁年不愆其期,以兵为常故,皆识虚实见兵势,善为诱兵以包敌斡腹出”。“大抵无正兵,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恤礼义,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困,败则靡奔瓦解矣。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其所得卤获因以与之,得人以为奴婢,故人自为战以趋利,深入拼命而不惮也。以名为号不讳无字。尊巫医坐于东上,诸大人入见则令巫占之火前,谓之过火门,凡命官出军则烧羊髀视其吉凶。俗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馀。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妻妻之,主死而无子及亲族者奴即有其家,战而扶辇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尤畏雷震,马牛羊震则举群弃之。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不封树,则驰马践其上,又周驰其旁不可复识,而后已丧制不以尊卑见新月,从吉始死号哭,众以酒酪饮之,谓之添淚,杀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谓之烧饭,所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妇事夫如事舅姑,口酪毳皮革车服器用皆妇人为之,男子朝出妇为捉马加鞍勒执弓矢”。“男女皆自食力生,长于兵,无单家而众以强”。这些风俗习惯都是在其艰苦单一的游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生活中的平均主义是物质极度匮乏的结果,缺乏礼仪不敬老弱是宗法关系淡漠的表现,而强烈的宗法观念只能在农本社会中产生出来。欧洲古代作家对匈奴人的误解大多源于基督教徒对远方民族和异类文明的不了解,同时也有以讹

传说的成分,特别是那些来自战败者和被征服者的传闻^①。

布瑞曾翻译了448年作为拜占廷皇帝使团成员の普里斯科斯出访阿提拉帝国的笔记,他对当时匈奴人的生活情况有真实生动丰富可靠的记载^②。根据他的亲眼见闻,匈奴人当时已经采取半游牧办农耕的生活方式了,不仅定居在村庄了,而且种植大麦、粟米、亚麻,食用蜂蜜酒,当然,他们的主食还是来自放养的牲畜。阿提拉也并非总是住在帐篷里,甚至在其巡视治下各个部落时,也常常住在木质宫殿里,只不过他的房屋“建立在比其他的房屋都高的高地上”,行宫还设有高塔。贵族的房屋都用木栅栏围起来,有的还建造了奢华的游泳池。匈奴人的日常生活远比那些充满偏见的作家记载的要好,普里斯科斯记述了他在匈奴人社区遇到的一个拜占廷人的说法,“他认为他在斯基泰人(拜占廷人对匈奴人的称谓)中的新生活比他在罗马人中的旧生活好得多,他说了以下的理由:战争过后,斯基泰人过着安逸的生活,享用着他们得到的一切,毫无顾虑,自由自在,或者只有一点点忧虑。但是,罗马人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容易遭受涂炭,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安全的希望系于他人,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的暴君不允许他们使用武器。而使用武器的人又被那些完全不懂如何控制战争的将领们所伤害”。总之,这个拜占廷人认为无论在司法和行政方面,匈奴人都比拜占廷人更为公平,因此,匈奴人生活的更为惬意。

匈奴人西侵对巴尔干半岛最大的影响是促使人数众多的哥特民族迁徙到拜占廷帝国境内,进而改变了半岛地区的政治地图和民族结构,加剧了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政治动荡,半岛经济生活倒退。进入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匈奴人大多是以雇佣兵身份出现的,他们并没有建立自

^① Zosimus, Sozomen, Jornandes 和 Ammianus 等欧洲古代作家的记述均存在这样的偏见,连吉本都注意到,哥特作家记载的“那些故事充满了恐惧与荒诞,完全笼罩着哥特人随意产生的仇恨,但他们越是以此解恨就越是增加了自己的恐惧”。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p. 163. 相比而言,《史记》、《汉书》这类古代记载出自胜利者之手,因此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匈奴人的情况。

^②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p. 213—223.

已独立的定居区,也未长期活动在半岛狭窄的空间里,毕竟这里已经涌入了上百万的哥特人。我们注意到匈奴人的许多部落开始在东欧广大区域内的分散活动:378年,哥特人起义中就有来自匈奴人和阿兰人的军事援助^①;395年,匈奴人从巴尔干半岛进入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区;400年前后,匈奴人的一个部落侵入多瑙河流域,其首领乌尔德斯所部抓获正在逃窜中的哥特将领盖那斯,并于次年初将其杀害,把后者的头颅作为礼物送给拜占廷皇帝阿尔卡迪奥斯;408年,拜占廷皇帝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登基之初即加强防务,并在多瑙河前线一举击溃上述匈奴人首领乌尔德斯的袭击。此后,塞奥多西注重巴尔干半岛北部各地城市和军事要塞建设,特别是加强多瑙河舰队建设,同时,增设首都城防,使半岛北方前线出现了十余年难得的和平。

但是,多瑙河北岸的匈奴人并未停止对拜占廷帝国的骚扰,因为当时的匈奴人并不像哥特人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其诸多部落相互争斗,强权经常变换。424年,取代乌尔德斯的匈奴人王鲁吉拉(Rugila)控制了多瑙河下游地区,并迅速将势力扩展到多瑙河中游平原(即潘诺尼亚,相当于今匈牙利地区)。同时,他对河对岸的拜占廷人展开攻势,迫使拜占廷皇帝以重金换取和平,每年缴纳350金镑的年贡^②。433年,鲁吉拉软硬兼施迫使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us III,425—455年在位)承认其对潘诺尼亚地区的占领,使匈奴国家合法化。434年,鲁吉拉去世,他的两个外甥贝雷达和阿提拉继位。可以说,鲁吉拉统治时期的匈奴王国为其后的阿提拉帝国奠定了基础。

阿提拉(Attila)比贝雷达年轻,但更有野心和魄力。后者于同年意外死亡并由前者任国王后,阿提拉立即加大了对拜占廷帝国的武力威胁,如愿以偿地将拜占廷人提供的年贡数额翻了一番,变为700镑。作为一个更具远见和谋略的匈奴人统治者,阿提拉不仅通过武力进攻保

① Ammianus, 31, 8, 9.

② Ammianus, 35, 18, 10.

持对拜占廷人的压力,维持其在多瑙河流域的根据地,而且通过精明的外交与西罗马帝国边防将领埃提乌斯(Aetius)建立友好关系,减少军事对立面。他还与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Gaiseric)联系密切,当后者侵入北非建立独立王国时,他趁拜占廷人防范汪达尔人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之机^①,于435年大举入侵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威胁巴尔干半岛腹地马其顿和色雷斯两地,迫使拜占廷人与之订立长期和约。442年,当和约到期后,阿提拉再度进犯,兵抵色雷斯重镇亚得里亚堡,迫使拜占廷政府提高年贡。而后,他又利用拜占廷军队忙于西部和南部防务的机会,对巴尔干半岛发动了新的攻势。当时,阿提拉发动战争的借口有三:其一,指责拜占廷人不按约定准时足额交纳年贡;其二,指责拜占廷人迟迟不送交匈奴人背叛者;其三,拜占廷政府慢待其使节。他从多瑙河下游北岸出发,首先围攻达吉亚地区重镇拉提亚利亚。拜占廷皇帝即刻派使节到匈奴人大营,抗议后者撕毁协议破坏和平。就此,阿提拉怒斥拜占廷使者,指责拜占廷人主教马尔古斯进入匈奴人领土并偷挖匈奴人先祖墓,盗走墓中的宝藏,要求拜占廷人送还宝藏,交出叛逆者,否则不会罢兵。谈判进行之际,阿提拉就攻克了拉提亚利亚,而后沿伊斯特尔河向西北进攻,夺取了沿河城市,使整个多瑙河河曲地区陷入烧杀抢掠的灾难之中。旋即,他又纵兵杀人摩拉瓦河流域,包围了达尔达尼亚省首府尼斯。虽然,该城军民奋力抵抗,但是在阿提拉使用的攻城机械和大量火弹的猛烈攻势下失守。而后,匈奴军队继续挺进色雷斯平原,夺取了该平原北部的腓力普堡和阿尔卡条堡等重要城市,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阿塞拉斯要塞^②。此后,阿提拉四处分兵,多向袭击。其中进攻马尔古斯城的匈奴人是唯一遭到失败的部队,该城军民

^① 汪达尔人是唯一拥有强大舰队的日耳曼人部落,他们曾主宰地中海霸权,威胁该地区贸易航路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皇帝塞奥多西曾派遣庞大的帝国舰队由阿里奥宾努斯统领前往西西里征讨,以夺回地中海霸权。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p. 162—3.

^②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noted by Harry Trutledov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5942.

顽强抵抗,力保城池不丢,同时还抓住时机出击,重创敌军,解救出大批被俘的拜占廷士兵。但是,阿提拉亲自率领的匈奴部队接连取胜,并于次年迫使拜占廷人一次性缴纳年贡6000金镑^①。

4年后,阿提拉军队再度袭击拜占廷帝国,侵入伊利里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不仅夺取了马尔西安堡,而且在乌图斯河战役中,击毙拜占廷将领阿内吉斯科鲁斯。一时间,整个瓦尔达河流域告急。450年,拜占廷皇帝马尔西安(Marxian,450—457年在位)拒绝继续支付年贡,再度引发双方的战争。但是,阿提拉进兵伊利里亚地区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可能主要是因为习惯平原作战的匈奴人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和森林中倍感吃力而屡次受挫。因此,阿提拉调转兵锋,率部向西侵入意大利,对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西罗马帝国进行最后的打击^②。

451年,阿提拉进攻高卢,包围了卢瓦尔河中游重镇奥尔良。他“所以能如此方便地进入高卢腹心地带,既得力于他的阴险的策略,也得力于他的强大的兵力”。整个西罗马帝国都被阿提拉的入侵震惊了,西罗马贵族阿维图斯(Avitus)游说西哥特人首领塞奥多里克(Theodoric),联合日耳曼各个部落,联合抗击匈奴人。双方在附近的平原上进行了一场“毁灭整整一代人的”决战,共投入数十万兵力,最终阿提拉兵败^③。“高卢远征的失败,不论是对阿提拉的精神,还是力量,还是名声,都没有造成任何损伤”。452年,他又挥兵向南侵入意大利,阿奎利亚、阿尔

① Ammianus, 40, 12, 19. 同时,双方还不对等地交换了叛逆者,即拜占廷人无条件引渡匈奴叛逆者,而匈奴人则以10个索里德一人的人头费交换拜占廷叛逆者。

② 布瑞将阿提拉突然离开巴尔干半岛的原因归结为匈奴骑兵不习惯山地和森林作战,可能有一定道理。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 166.

③ 吉本比较详尽地描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进程,他主要依据哥特史家 Jormandes (c. 36) 的记载。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V, pp. 17—25. 但是关于这次战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史学界仍然在继续探讨。通常的说法是发生在7月,特鲁瓦附近的平原上(吉本误以为发生地为沙隆),战役中共有16—30万人战死。这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学者们的推测。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 177. 布瑞还高度评价了西罗马人和哥特人联合抗击匈奴的行动,认为这是罗马人和哥特人首次联合抗击共同的敌人。(p. 180)

提努姆、康科第亚、帕迪亚、米兰、帕维亚等亚平宁半岛北部平原和沿海城市都被占领或征服。正当他准备进军意大利中部和罗马以便继续蹂躏被征服地区的城乡、抢劫无数的财宝、并与新娘举行婚礼的时候，阿提拉突然死于一次谋杀^①。

阿提拉的去世并未完全消除匈奴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威胁，占据了多瑙河中部潘诺尼亚平原的匈奴人虽然因失去好战的领袖而开始过渡到定居的农耕生活，但其好战的本性和靠抢劫为生，以武力定输赢的习惯使他们不时进攻拜占廷人。但是，总的看来，匈奴人在阿提拉时代以后没有对巴尔干地区造成太大麻烦，他们大多是以雇佣兵的身份出现在拜占廷人的史料记载中。527—528年，活动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匈奴王哥达斯(Gordas)造访君士坦丁堡，并受洗接受基督教信仰，查士丁尼亲自作为他的教父。而后，他带着大量贵重礼物回到自己的国家。查士丁尼拉拢他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他作为拜占廷帝国皇帝的教子和盟友，可以在帝国北部的克里米亚地区保护拜占廷人的利益，特别是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能够为拜占廷军队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他以武力强行要求其臣民皈依基督教时，遭到了激烈的反抗，特别是他将本民族原来崇拜的神像融化铸造货币时，被愤怒的臣民杀死。其兄弟坚持本民族信仰，受到臣民的拥戴，并被推上王位。起义民众进而迁怒于拜占廷人，认为是他们引诱了哥达斯，并进兵波斯普鲁斯海峡。拜占廷人意识到其宗教外交的失败，为了维护其在黑海地区的利益，派遣大军和舰队沿黑海北岸水陆并进攻击克里米亚地区，迫使匈奴人向北退却。这是拜占廷人唯一进攻黑海北岸的军事活动，以恢复拜占廷帝国在当地权力为结束。

拜占廷人对匈奴人的传教活动比对斯拉夫人的传教活动早数百

^①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V, pp. 34—35. 吉本叙述阿提拉之死时，并未说他死于谋杀，其名著中文版将“面纱”翻译为“匕首”实在容易产生误解。但是，我们在 Ammianus Marcellinus 的记载中得知，一名叫科尔内利(Comeille)的女刺客混入阿提拉的行帐将其手刃。

年。535年,大约在哥达斯受洗后7、8年,亚美尼亚主教卡杜查特(Kardutsat)带领7名教士前往高加索北部匈奴人定居区传教。这部分匈奴人在这里的大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不时对周边地区进行抢掠,拜占廷帝国东方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屡遭侵扰。这次传教显然是拜占廷军事外交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宗教文化传播,消除边患。卡杜查特一行在当地坚持传教7年,信徒人数持续增加,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他们还将《圣经》福音书翻译为当地语言,他们的传教活动受到拜占廷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曾一度得到朝廷派送的给养物资。据记载,由30匹骡子组成的运输队,驮载大量面粉、葡萄酒、橄榄油、亚麻布和教会举行礼仪的金银器皿,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在卡杜查特的继任者马库(Maku)传教期间,他们还在当地君主的支持下,“建立了砖瓦教堂,种植植物,播撒各种各样的种子,制作标志,对许多人施洗”^①。这次成功的传教活动表明,拜占廷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以和平的方式达到战争的目的,通过传教使游牧民族逐渐向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从寻求信仰和文化上的认同达到消除敌对势力以保证边境和平的目的。而这种方式后来成为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上扩大其影响和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

早期匈奴人活动的区域十分广泛,部落众多,其中的一个部落后来被称为欧诺古尔人(Onogurs)。根据最早的史料,他们原属于西伯利亚西部地区的保加尔人,即西突厥语族,与库特里格斯人(Kutrigurs)和乌提格尔人(Utigurs)血缘相近^②。他们在大草原上放牧,逐水草而生,后来因躲避严寒天气而迁徙到亚速海东岸的库班河谷地区。查士丁尼时代,库特里格斯人和乌提格尔人已经定居在多瑙河中、下游地区,并不

^① Zachariah of Mitylene, *The Syriac Chronicle*, trans. F. J. Hamilton, London 1899, pp. 329—331.

^② 奥伯林斯基认为他们的起源目前还有争论,见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62. 有的史家将他们归属于匈奴人。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 477.

时侵袭拜占廷人控制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为了遏止库特里格斯人的入侵,查士丁尼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派遣使节游说,挑动他们之间的矛盾。为此,他首先以重礼说服乌提格尔人首领珊蒂赫尔(Sandichl)发动对库特里格斯人的进攻,同时派出2000哥特雇佣兵助战,大败库特里格斯人,平毁了他们的老巢,将其家眷全部变为奴隶。但是,查士丁尼还是允许2000名库特里格斯人雇佣兵留在了色雷斯,以防乌提格尔人的入侵。558年冬季,东山再起的库特里格斯人在首领扎巴尔干(Zabergan)的率领下渡过冰冻的多瑙河,再度侵入色雷斯,以报拜占廷人和乌提格尔人联手打压之仇。他分兵三路,进攻希腊、色雷斯和君士坦丁堡,造成巨大破坏。拜占廷史家记述说:“由于其进军未遭遇任何抵抗,因此他们无情地蹂躏和抢劫所有东西,获得了大量战利品,俘获了大批俘虏。……整个帝国军队应有64万5千将士,但实际上其总数不足15万人,而他们又分兵驻扎在意大利、非洲、西班牙、……和波斯前线”^①。帝国首都在匈奴人的围攻下几乎失陷,幸而著名老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临危受命,力保城池不丢,并最终战胜扎巴尔干,迫使库特里格斯人退回多瑙河北岸。而后,查士丁尼再度挑动乌提格尔人乘机落井下石,重创库特里格斯人残部。事实上,两支匈奴人的实力都被削弱了。

619年,欧诺古尔人酋长奥尔加纳(Organa)及其外甥科夫拉特(Kovrat)和部落贵族一行访问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拜占廷帝国君臣的隆重欢迎。拜占廷帝国大教长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在其《边民史》中记载了这次活动,并认为拜占廷君主此举的目的是利用与这些野蛮人的友好关系,保持拜占廷帝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安定,支援其在波斯的战事,并防止巴尔干半岛北方的敌人入侵。到访的欧诺古尔人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洗礼,皈依基督教信仰,伊拉克略皇帝成为他们的教父,一些欧诺古尔人还与拜占廷人结亲。按照拜占廷朝廷的习俗,他们

^① Agathias, *The History*, trans 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N. Y.: De Gruyter 1975, v. ii.

还得到了大量贵重礼物,包括黄金白银、纺织品、珠宝和宗教仪式必需的礼器。他们被授予“罗马帝国的贵族”称号后,心满意足地返回家园^①。科夫拉特后来深得伊拉克略的器重,受到拜占廷皇家教育,成为匈奴人的重要建筑家和基督教君主,并与拜占廷皇帝结下了终生的莫逆之交。尼基乌城主教约翰记载道:“他接受了洗礼后,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并通过圣洗的善功美德教化所有野蛮人和原始人。”^②

7世纪期间,拜占廷人为了消除巴尔干半岛北方阿瓦尔人的威胁,极力扶植已经迁徙到高加索北方草原的欧诺古尔人。皇帝伊拉克略一世(Herakleios I, 610—641年在位)频繁派遣使节前往该地,加强与欧诺古尔人的友好关系,同时策动尚处于阿瓦尔人控制下的其他匈奴人部落发动起义,脱离阿瓦尔人的控制。奥尔加纳去世后,科夫拉特接任酋长,统治到642年。在其统治后期的635年,科夫拉特曾成功地发动了反阿瓦尔人的起义,将后者驱逐出其定居地。而后,他派遣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觐见伊拉克略,并被授予“罗马帝国的贵族”称号。由于受到拜占廷帝国的扶助和文化影响,科夫拉特治下的匈奴人实力增强,活动范围扩大,其最强盛时期的势力范围东起高加索,西到第聂伯河下游。在拜占廷史料中,科夫拉特统治下的匈奴人国家被称为“老大保加利亚”。在7世纪上半叶相当长时期里,拜占廷人和欧诺古尔人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巴尔干半岛北方民族也因受到欧诺古尔人牵制,未能发动大规模入侵。

自6世纪中期开始,匈奴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已经减弱,代之而起的是南下的斯拉夫人,他们后来成为巴尔干半岛真正的主人。

^① Nicephorus Patriarcha, *Opuscula Historica*, ed. De Boor, Leipzig 1880, p. 12.

^② John of Nikiu,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trans. R. H. Charles, London 1916, p. 197.

第四章 早期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

453年匈奴汗王阿提拉(Attila)死后,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形势即发生重要变化。其北部疆域虽然恢复了暂时的安宁,但是,在阿提拉帝国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处于原始发展阶段的民族,他们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在独立发展中走上了历史舞台。其中在5世纪末,在俄罗斯大草原上逐渐形成的保加尔人(Bulgars)是由残留的匈奴人构成,他们向西迁徙,从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路线进入多瑙河下游地区。而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属于日耳曼人分支的格庇德人(the Gepids)和伦巴第人(the Lombards)则逐渐定居下来,分布在提斯查河东西两岸,他们控制了潘诺尼亚平原,这里曾经是匈奴人帝国的心腹地区。到了500年时,在日耳曼人和保加尔人之间,又插入了斯拉夫人。这个民族日后对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半岛

斯拉夫人是在公元6世纪中期开始从他们原来的活动区域大批进入巴尔干半岛的^①。斯拉夫人起源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而没有最后结论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他们起源于古代的斯基泰人。斯基泰人是东欧古代民族,西方最早的史料大概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其中第4卷有许多文字涉及该民族起源、活动地理范围和社会生活状况^②。也有

① 东欧斯拉夫学者认为其祖先进入多瑙河流域的时间应该提前到公元300年。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16.

②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卷,第17、18节。

人认为他们是黑海北岸地区古安特人的后代。6世纪作家乔尔达尼斯记载,最早的斯拉夫人在黑海北岸活动,分为三支,维奈塞人在维斯杜拉河下游地区,安特人在德涅斯特河和顿河之间地区,而斯科拉文尼人则在维斯杜拉河和多瑙河之间地区^①。12世纪成书的《往年纪事》是俄罗斯最早的古代历史,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只是说:“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斯拉夫人定居在多瑙河流域。”这大约指5世纪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这段文字仍然无助于解开斯拉夫人起源问题的谜团^②。近年来,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考古工作获得了较大进展,大量证据表明,他们最初活动在一个范围很大的地区,北部自尼门河上游和维斯杜拉河下游地区起,南抵东欧喀尔巴阡山脉,东到第聂伯河中游,西至易北河。其西向迁徙的最初时间大体为5世纪中期,但是迁徙的具体原因仍然不清^③。5世纪特别是5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笼罩在匈奴人入侵的恐怖下,阿提拉帝国骑兵几乎抵达大西洋海岸,而东欧地区就是匈奴人的主要活动区。进入提斯查河的斯拉夫人最初是作为匈奴人的臣属定居下来的,而后沿着古代道路继续南下,到达多瑙河北部的穆拉瓦河流域和潘诺尼亚平原。此地向西南可进入意大利,向南则进入巴尔干半岛。南下的斯拉夫人与匈奴人不同,他们并非以整个民族迁徙的方式而是各个小部落分散行动,逐渐在多瑙河中下游南部地区“悄悄地”定居下来,最初,可能是作为匈奴人的奴隶渗透进当地社会,并开始与控制巴尔干半岛的拜占廷人发生接触。最早记载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史料出自马尔西林努斯的《编年史》,其中提到斯拉夫人于493

① T. Mommsen,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tr. By C. C. Mierow, Princeton 1915, pp. New York 1960, p. 119. 朱寰先生将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战记》中提到的安特人理解为斯拉夫人的祖先。朱寰:《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布瑞认为希腊罗马作家有将古代名称与未知名称混用的习惯,因此误将斯拉夫人当作巴尔干上著居民。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p. 16.

② 《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③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42.

年入侵色雷斯,击败当地拜占廷驻防军将领朱利安^①。

斯拉夫人定居在多瑙河入海口的多布罗加地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关于其社会生活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十分有限,学术界还不得而知,目前得出的结论大多为推测意见,不足为凭^②。从斯拉夫人早期史的迁徙过程看,当时,他们逐渐从多瑙河下游定居地向西南移动,其中一部分留在定居地,另一部分则努力跨越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区,进入拜占廷帝国疆界。阿提拉帝国建立的匈奴人强权瓦解后,斯拉夫人成为拜占廷帝国的新邻居。但是,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没有形成早期国家,因此其迁徙过程中没有出现与其他强权对抗的事件。我们在匈奴人西侵欧洲的历史中,几乎找不到斯拉夫人的踪影。502年、512年和517年,散居的斯拉夫人又伙同其他北方民族侵入塞萨利和马其顿地区,大肆抢劫后离去。他们如同活跃在帝国境内的土匪,不时出现在防务薄弱的地区,或者因为他们来去匆匆,使帝国军队防不胜防。布瑞认为,阿纳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us I, 491—518年在位)于512年修建的色雷斯“长城”就是为了防范神出鬼没的斯拉夫人强盗^③。除了非法侵入巴尔干半岛外,斯拉夫人还以雇佣兵的身份合法进入半岛。史料记载,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期爆发的维塔利安(Vitalian)起义军就使用了包括匈奴人、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在内的外族雇佣兵。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Procopius)提到拜占廷军队中曾雇佣过斯拉夫人士兵。

拜占廷人对斯拉夫人的了解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普罗柯比记载

①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D. 354—378), trans by Andrew Wallace-Hadrill, N. Y.: Penguin Books 1986, 20, 11.

② Francis Dvornik, *The Slavs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4—59. Florin Curta, *The Making of the Slav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Lower Danube Region, c. 500—7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2—135. 布瑞甚至推测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也有斯拉夫人血缘。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p. 17, n. 1.

③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 p. 295.

说：“在博鲁斯城和港口失陷以后 12 天，马提努斯和瓦莱利安又来了，他们率领着 16000 人的骑兵，其中大多是匈奴人、斯科拉文尼人和安特人，后者定居在伊斯特尔河附近地区。”他又在《哥特战纪》第 7 卷中详细叙述了他们与拜占廷人的交往，包括战争、使节来往、对色雷斯地区的入侵等^①。专门从事斯拉夫历史研究的奥伯林斯基认为，古代记载中涉及的斯拉夫人活动范围很大，他们是更早时代这个地区原始部落居民的后裔，融合了许多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民族。原先定居在整个多瑙河下游地区的斯科拉文尼人和在伊斯特尔河附近地区的安特人，是斯拉夫人最先侵害的小民族，他们后来都成为斯拉夫民族的一部分。其中，斯科拉文尼人一度臣服于俄罗斯南部的伊朗高原民族萨尔马提亚人，而在更北方的安特人后来成为俄罗斯民族祖先的一部分。奥伯林斯基明确指出：“必须牢记斯科拉文尼人和安特人之间的明显区别，因为他们在 6 世纪期间地理上的分布毫无疑问使前者成为巴尔干斯拉夫人的祖先，而后者，至少生活在多瑙河三角洲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安特人则组成了东斯拉夫人，亦即后来人们所知的俄罗斯人社区。”^②

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安特人和斯科拉文尼人起源为同一祖先，因为“这两个野蛮民族自古就有着相同的制度和习俗。他们信仰同一个神，即光明创始者，是万物唯一的主宰。……这两个民族还有着相同的语言，绝对野蛮的发音。另外不但如此，他们在外貌上相互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斯科拉文尼人和安特人在遥远的古代只有一个同样的名称”。他还比较详细地谈到斯拉夫人最初的生活状况，“由于斯科拉文尼人、安特人这些民族并非由一个人统治，他们自古就生活在一种民主制下，因此，任何涉及到其战争的事情，无论好坏，都要由人民决定。……他们向光明神奉献牲畜和所有其他牺牲，至于命运，他们从来不了解，也没有丝毫想法相信它对人有什么威力。但是当死亡临近

^① Procopius, *The History of the War*, tran. By H. B. Dew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V, xxvii, 2, VII, xiv, vii.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43.

他们时,或是因疾病的折磨或在战争之前,他们都许愿说,如果逃过一死,活着回来就直接向神祇献祭,……他们崇拜河流和女神,以及某些神灵,并向所有神祇献祭,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些牺牲联系在一起。他们住在小茅屋里,相互隔的很远,一个普遍现象是,他们每个人总是不断变换居住的地方。当他们投入战斗时,大多数人步行打击敌人,手中持有小盾牌和标枪,但从不要穿铠甲。……他们都是非常高大强壮的人,身体和毛发既不是金发碧眼的白色,也不是完全偏黑,而是都有些发红。……他们占据大片土地,一个民族就占了伊斯特尔河北岸绝大多数地方”^①。

根据巴尔干学者的研究,早期斯拉夫人最大的政治特点是他们的独立性,他们不接受王朝统治,喜欢自由,生活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只是在出现了外族敌人的进攻时才联合起来。因此,他们对巴尔干半岛的入侵也是无组织的、分散的,很容易被拜占廷军队击溃。他们的家庭是部落的基础单位,由最年长的成员控制,而部落酋长则从各个家庭的家长中选出。拜占廷人说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十分好客。其主要经济活动是畜牧和农耕,农作物主要为粟子和蔬菜。家庭经济为主,由家长控制下的家庭主妇进行管理。部落中几乎没有穷人,因为只有犯罪受罚的人才受到部落的排斥,也因此受穷,穷人就等同于坏人。作为山地民族,斯拉夫人熟悉丛林作战,常常以伏击和偷袭的方式发动进攻,而对大规模平原作战和正规决战十分陌生。正因为如此,在哥特人和匈奴人入侵巴尔干半岛期间,斯拉夫人多以雇佣兵的身份参与入侵者和防御者的战争^②。

东地中海的政治形势在6世纪下半叶基本上是由拜占廷帝国控制。查士丁尼一世发动的大规模征服战争使西班牙沿海、意大利、北非、西西里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重新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属地,而波斯

① Procopius, *The History of the War, Secret History, Buildings*, trans by Averil Cameron, N. Y.: Twayne Publishers 1967, VII, xiv, 23—30.

②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pp. 18—19.

人一直未能改变两国的基本疆界,因此,拜占廷人似乎是地中海这个内陆海的主人。作为古希腊人反对波斯入侵胜利、古代罗马帝国统一世界的正统继承者,查士丁尼受到当时有教养阶层的有力支持,社会思潮倾向于恢复古代世界的光荣。然而,一些潜伏的危机正在形成,拜占廷帝国强大的对手正在悄然兴起,威胁正在逼近。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多瑙河前线。因为,就这个时代拜占廷帝国的外敌而言,主要是东方的波斯、西方的日耳曼部落民族和北方的斯拉夫人,其中波斯人远在幼发拉底河前线、日耳曼人远在波河前线,只有斯拉夫人近在多瑙河前线,极为接近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帝国的腹地。当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威胁降低以后,斯拉夫人在他们留下的空间里代之而起^①。可以说,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既是拜占廷帝国的生命所系的根本地带,也是其最容易受到打击的软肋和命门。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地区的定居和发展因此成为拜占廷外交和内政史上最大的问题之一。

6世纪初,活跃在多瑙河北部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查士丁尼王朝第一位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 518—527年在位)统治时,斯拉夫对半岛地区的抢劫就变得越来越频繁。普罗柯比曾就此写到:“伊利里亚(Illyria)和整个色雷斯,即从爱奥尼亚湾到君士坦丁堡的郊区,包括希腊和加里波利半岛,自从查士丁尼接管罗马帝国以来几乎每年都遭受匈奴人、斯科拉文尼人(Sclavini)和安特人(Antes)的蹂躏;他们对那里的居民犯下了无法容忍的罪行。因为在每一次这样的侵袭中,我敢说超过20万罗马人遭到了杀戮或奴役,以至于所有这些地区都成了如同斯基泰(西徐亚)一样的荒漠。”^②他还提到,查士丁尼皇帝专门任命了一个名为西尔布迪乌斯(Chilbudius)的人作色雷

^① 布瑞认为,正是哥特人和匈奴人势力的衰落为斯拉夫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p. 20.

^② 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tran. By H. B. Dew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XVIII, 21.

斯地区将军，“巡逻在伊斯特尔河畔，以常年监视这一地区的蛮族过河，因为匈奴人、安特人和斯科拉文尼人已经多次过河，对罗马人进行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西尔布迪乌斯在艰难防御三年后，战死沙场，“此后，伊斯特尔河门户洞开，蛮族随时随意过河袭击，罗马人的生命财产轻易受到洗劫，整个罗马帝国再也找不到一个敢于面对完成这一艰难任务的人了”^①。

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入侵像世界历史上所有原始民族的迁徙，特别是北方民族的南下一样，其原因大体不外乎：他们原来生存地区的环境发生了自然的或人为的变迁，或是为其他更为强悍的民族所占据，或是因地球周期性的气候变化而变得不适宜生存，此其一；如果上述情况没有发生，其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必定强化了由于生产能力低下造成的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和居民消费总量增加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一部分人口必须向外流动，此其二。这种流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初，斯拉夫人只是从他们的定居地区南下向半岛地区进行抢劫，通过对生活物质的暴力搜刮，满足本部落的物质需求，缓解消费物质不足和需求增加之间的矛盾。他们在6世纪前半叶的50年里，通过这种方式几乎是单向地进行双边交流，拜占廷人只是进行防守。如果认真地计算一下史书中有关的记载，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样的抢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频度加强，换言之，斯拉夫人对拜占廷帝国的洗劫越来越频繁。据拜占廷作家马拉拉斯记载，530年、534年和540年侵袭巴尔干半岛的北方民族就包括斯拉夫人^②。这样的物质交流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即斯拉夫人从抢劫来的物质中发现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本能更激发了他们抢劫的欲望。最初那种满足生活需求的抢劫逐渐演变为部落贵族对奢侈生活必需品的抢劫。因此，到了公元550

① Procopius, *The History of the War*, VII, xiv, 4—6. 这里，史料并未提及西尔布迪乌斯是否死于斯拉夫人之手。

② Malalas, *The Chronicle*, trans by Elizabeth Jeffreys, Michael Jeffreys and Roger Scott, Melbourn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6, p. 437, 19.

年时,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的抢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的抢劫不仅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抢劫的过程越来越长,他们也不再惧怕拜占廷军队,甚至开始大胆攻击拜占廷军队的要塞,并把洗劫的对象从农村扩大到城市,所有拜占廷人都成为他们“发财”的目标。一些被洗劫过的城市还被占领。在此过程中,他们和先期到达多瑙河下游地区的保加尔人逐渐联合,并接受了后者比较成熟的作战经验。根据学者的研究,大约在6世纪40年代,被拜占廷作家称为库特里格斯人(Kutrigurs)的保加尔人(匈奴人的一支)就与斯拉夫人洗劫了伊利里亚地区,夺取了32座军事要塞,还对直到君士坦丁堡郊区的整个巴尔干半岛北部大肆抢劫。根据最早的史料,库特里格斯人与后来被称为欧诺古尔人(Onogurs)和乌提格尔人(Utigurs)血缘相近,他们原属于西伯利亚西部地区的保加尔人,属西突厥语族^①。他们在大草原上放牧,逐水草而生,后来因躲避严寒天气而迁徙到亚速海东岸的库班河谷地区。查士丁尼时代,库特里格斯人和乌提格尔人已经定居在多瑙河中、下游地区,并不时侵袭拜占廷人控制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②。545年,斯拉夫人在库特里格斯人的协助下,攻击色雷斯地区,但是遭到纳尔西斯(Narses)将军率领的拜占廷军队的反击,被迫退回巴尔干半岛北部和西部山区,其中一部分于548年抵达半岛西部的迪拉修姆地区。另一部斯拉夫人则在550年再度侵入巴尔干半岛中部,抵达尼斯河流域,而后沿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大道南下,兵临拜占廷首都西部战略重镇亚得里亚堡,引起朝野恐慌。斯拉夫人的这次进兵被阻止在君士坦丁堡外围城防要塞,而后因瘟疫流行被迫全体后撤至多瑙河以北地区。

① 关于该民族起源问题目前还有争论,见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62. 也有史家将其归属于匈奴人。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1, p. 477.

② 布瑞推测,被误称为匈奴人的保加尔人此时被斯拉夫人所征服,他们对7世纪莫基的保加利亚王国毫无贡献。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pp. 21—22.

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期间,斯拉夫人发动的最大一次攻势发生在558年冬季。库特里格斯人在首领扎巴尔干(Zabergan)的率领下入侵帝国,次年3月,斯拉夫人与匈奴人联合进军,首先越过尚未解冻的多瑙河侵入下游的莫埃斯亚地区,而后翻越巴尔干山脉进入色雷斯地区^①。在此,他们分兵三路,一路向东挺进君士坦丁堡,兵临城下,并大肆洗劫拜占廷帝国首都郊区,迫使农村居民涌入城市避难^②。第二路先后横扫马其顿地区和塞撒利地区,直达希腊中部,最终遭到当地拜占廷守军的顽强抵抗,遭到重创,其残部被迫北撤。第三路向西进攻加里波利半岛,也遭到失败。斯拉夫人配合匈奴人的大规模进攻造成的物质破坏远没有对拜占廷人心理打击严重,各地守备部队习惯于正规作战,在以散兵单人作战为主的“野蛮人”进攻下,拜占廷军队经历了最初阶段的慌乱。关于匈奴人和斯拉夫人野蛮无情和食人生番的种种传说,使很多居民纷纷就近躲避到城市要塞,或逃入偏僻山区。“逃亡者的报告夸大了那支糟蹋修女、把新生儿拿来喂鹰和狗的敌人的数目;……查士丁尼浑身发抖;那些仅见到衰迈的皇帝的人会高兴地假想,他必是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果断和魄力。他下令把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带甚至郊区的教堂里的金银器皿全都收缴到城里来;防御工事的胸墙后面站满了发抖的窥视者”^③。年迈的查士丁尼无奈之下,再度请已经受到冷落的著名战将贝利撒留(Belisarius)出任总指挥。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不仅在正面抵御中粉碎了匈奴人和斯拉夫人的进攻,而且派出军队攻击他们的后路,并急调拜占廷舰队沿多瑙河巡逻,切断敌人退路。同时,查士丁尼挑动

① “扎巴尔干带领保加利亚人的骑兵出动,大批杂乱的斯克拉文尼人也很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这里,吉本将他们称为“Bulgarians”和“Sclavonians”,前者学界有争议,后者目前已有共识。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V, p. 537.

② 扎巴尔干率领的第一路军造成的破坏最严重,尤其是有关他们对妇女儿童的血杀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巴尔干半岛居民的恐惧心理。Agathias, *The History*, trans 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N. Y.; De Gruyter 1975, v. ii.

③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V, p. 538. 吉本的生动描述主要根据 Agathias, v. ii 和 Ammian, 30, 11 两位作家的记载。

另外一支北方民族乌提格尔人从侧翼进攻敌军根据地。库特里格斯人眼见形势不妙,慌忙与拜占廷人议和退出战争,撤退到多瑙河以北其原来的定居地。残余的斯拉夫人则作鸟兽散,在巴尔干半岛各地与拜占廷人逐渐融合。据普罗柯比说,正是在抵御斯拉夫人入侵的过程中,查士丁尼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前线建立了600座要塞碉堡和瞭望台,仅在多瑙河下游就建立了52个要塞,对这一记载,一些学者提出疑问,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计划可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而现代考古学也肯定了这些学者的否定性意见^①。

历史学家通常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当作早期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半岛的阶段。事实上,完善的防务体系、杰出的军事将领和精明的外交策略,使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期间牢牢地控制着巴尔干半岛的军事政治形势。正是由于查士丁尼“东和波斯西征蛮族”政策使得巴尔干半岛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关注点,多瑙河前线的防务也因此提升为其半岛军事活动的核心,而防范和抵御斯拉夫人和库特里格斯(保加尔)人的入侵是其军事活动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拜占廷人不仅认真建设巴尔干半岛内的防御体系,而且调动多瑙河以北和俄罗斯草原上的其他“野蛮”民族的力量,有效地保护了巴尔干半岛的安全。与古代罗马帝国防御体系不同的是,拜占廷人将边防前线变为防御网络。一方面,使原来沿多瑙河一线建立的要塞得到了系统整修加强,另一方面,在巴尔干半岛主要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建立起新的哨所,增加了防御体系的纵深感,以适应小股斯拉夫人随时深入半岛各地的新情况。各地要塞除了军事作用外,还被周围的拜占廷居民当作临时避难所。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的防御体系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边防体系,以原罗马帝国的边防要塞为主,主要分布在多瑙河沿岸,其中、下游地区就建立了近百个要塞。从今天的贝尔格莱德直到多瑙河进入黑海的河口,包括诸如欣基顿努(即贝尔格莱德)、维明纳修、奥古斯底、诺瓦埃、德罗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45.

斯托隆、诺维奥顿努等城镇,它们大多建立在多瑙河南岸地区。查士丁尼皇帝对这些罗马旧要塞进行了修缮。第二部分是在边防体系防卫区域南部建立的防线,它横跨原罗马帝国在巴尔干半岛设立的达吉亚、上、下莫埃斯亚、小斯基泰诸省,即今天的塞尔维亚北部、提莫克河谷、保加利亚平原和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平原。根据记载,查士丁尼皇帝在这些地区建立了107座要塞哨所,仅其家乡达尔达尼亚就修建了69个要塞,其中9个是他新建的。这一防务体系凭借东西走向的巴尔干半岛诸山脉,成为抵御北方外敌入侵的第二道屏障。特别是在翻越山脉的各个隘口,拜占廷军队设下重兵,屯兵指挥中心分别为尼科堡和马西亚努堡。第三个防御地区建立在半岛内地,横亘在第二防区的南部,包括色雷斯、马其顿、伊庇鲁斯山区和希腊中部地区,其战略核心在亚得里亚堡和腓力普堡,此外还有奈苏斯、塞尔迪亚和达尔达尼亚、迪拉修姆和瓦罗纳诸城。在这三大防御体系中,拜占廷人的防务重点分布在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大道周围,显示这里是斯拉夫人入侵的主要通道。拜占廷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防务体系受到后代学者的质疑,原因是在6世纪最后25年,斯拉夫人大举入侵过程中并没有遭到顽强的抵抗,似乎非常顺利南下至希腊南部。但是从巴尔干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正是查士丁尼的苦心经营使巴尔干半岛真正成为拜占廷帝国的核心地区,从此改变了晚期罗马帝国将其当作东方战略的辅助部分的布局。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拜占廷人的改造,巴尔干半岛不再延续晚期罗马帝国将其一分为二、分由帝国两个大区各自统辖的行政体制,开始其统一的历史。

拜占廷帝国强化其在巴尔干半岛的行政管理是与斯拉夫人和其他北方民族入侵同时发生的,作为半岛的主宰力量,拜占廷统治者还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拜占廷帝国皇帝在完善防御体系的同时,充分运用外交计策,采取分化瓦解或各个击破的方式,减少斯拉夫人和其他北方民族侵扰的破坏。这些武力以外的手段包括:保持军事压力和战略进攻态势,政治离间分化策略,即在斯拉夫人和其他北方民族不同部落

间制造矛盾,经济收买、威胁诱骗和宗教宣传活动等多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分化的典型事例是,查士丁尼收买斯拉夫人部落酋长,即普罗柯比记载中的西尔布迪乌斯,并任命他为色雷斯地区将军,据学者考证,他的部落原在多瑙河下游地区。拜占廷帝国利用他抵抗其他北方部落的入侵,取得了成功。拜占廷人还于545年以大笔金钱收买当时定居在多瑙河以北的安特人,授予他们同盟者地位,条件是抵御库特里格斯人(保加尔人)的攻击。在拜占廷人的分化挑拨下,“安特人和斯科拉文尼人变得相互敌对起来,并爆发了战事,相当惨烈,以至安特人被对方杀败”^①。551年,当库特里格斯人(即保加尔人)大肆洗劫巴尔干半岛时,拜占廷人秘密派遣特使,以重金贿赂定居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乌提格尔人(Utigurs),西进渡过顿河,打击库特里格斯人。与此同时,拜占廷人将乌提格尔人西进的动向通报库特里格斯人,迫使他们急忙撤退到多瑙河北岸定居地。愤怒的乌提格尔人部落汗王珊蒂赫尔对拜占廷人的卑鄙行径大加指责,为此,查士丁尼皇帝亲自写信道歉,进行辩解,并许以大笔金钱和礼物,最终不仅平息了珊蒂赫尔的怨恨,而且似乎加强了双方的关系,几年后,拜占廷人再度与乌提格尔人在俄罗斯南部联合行动。为了牵制多瑙河流域的库特里格斯人,拜占廷帝国一直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保持着与乌提格尔人的友好关系,不断派遣使节,赠送礼物和钱财。在559年斯拉夫人和库特里格斯人联合进攻巴尔干半岛过程中,这一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乌提格尔人乘库特里格斯人后方空虚之机,向西挺进。双方惨烈的厮杀对这两个原始民族都造成了严重伤害,而策划和挑动战争的拜占廷人从中渔利^②。

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外交政策对稳定巴尔干半岛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查士丁尼皇帝对战争的结果可能十分满意,他在法令中不无得意地宣称:“如今,在上帝的帮助下,国家的领土已然得到了增加,多瑙河

^① Procopius, *The History of the War*, VII, xiv, 19—20.

^② Agathias, v, 24—25.

两岸布满了我们帝国辖制的城镇。”^①对于查士丁尼治理巴尔干半岛的成就,当时的拜占廷作家梅南德(Menander)大加赞扬,他夸张地写道:“假如他活的更长久一些,那他用不着使用战争,而只以其运筹帷幄的韬略就足以摧毁那些野蛮人了。”^②但是查士丁尼同时代作家普罗柯比对此不以为然,持批评态度,他尖刻指责说:查士丁尼“让所有蛮族彼此残杀。而且他还无缘无故地派人请来匈奴酋长,以白痴一般的慷慨给予他们大量的金钱,宣称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友谊”。“他对那些不论是居住在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甚至远至不列颠,以及所有有人烟地方的野蛮人次次都赠予大笔的金钱;以至于我们现在有机会了解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民族,看到了他们的大使。因为当他们听说了这个家伙的愚蠢之后,便成群结队地从世界各地涌到君士坦丁堡,面见他。对此,他非常高兴,每天都让所有的蛮族人抱着满满的礼物满载而归,他认为耗尽罗马人的财产,将它们抛给野蛮人或投入海浪中是他的好运”^③。

6世纪期间,拜占廷帝国对外战争频繁,大规模的远征不断,这些战争对于拜占廷社会发展的意义究竟如何?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学者的难题。奥波林斯基认为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外交活动产生了两个负面影响,其一是战争的巨大开支和支付给各野蛮民族的金钱增加了国民的税收负担,进而导致臣民的不满甚至反抗;其二是以慷慨赠礼和钱财收买野蛮民族的做法刺激了这些民族的胃口,他们定期索取免战赎金,不断增加金额要求,以至于这成为斯拉夫民族后来持续入侵的主要动力^④。他的这一分析显然依据普罗柯比的评论,后者明确指出:查士丁尼的做法“也鼓励了他们中的其他人掠夺可怜的罗马人;而且每次掠

① *The Civil Law*, tran. By S.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Novella, II, iii, p. 94.

② Menander,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trans by R. C. Blockley, Liverpool: F. Cairns 1985, I, p. 443.

③ 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y*, xi, 7—8, xix, 13—14.

④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48.

夺后他们都从慷慨的皇帝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奖赏。就是用这种方式,所有的匈奴人,且不止其中的一个部落,不断地蔓延,把罗马帝国变成了一片废墟。由于蛮族是由许多不同的酋长所率领的,又多亏查士丁尼的毫无意义的慷慨,战争一直持续不断”^①。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普氏的这一评价带有强烈的贵族政治倾向,他对于农民出身的查士丁尼皇帝抱有极大的阶级成见,特别是对后者没收贵族财产极为仇视,并全面贬低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内外政策。

查士丁尼的巴尔干半岛政策充分体现出一个有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纵观查士丁尼以前的晚期罗马帝国皇帝,除君士坦丁大帝外,大多没有认清地中海战略发展的态势,对帝国在地中海的地位把握不准。最初,帝国的政治中心在亚平宁半岛,但是左右帝国政治势力走向的却是东方行省。晚期罗马帝国时代,君士坦丁大帝为代表的个别政治领袖敏感地洞悉了东西罗马帝国分化的趋势,并果断地将帝国政治中心东移,建立了新的统治区域。这个新区是以东地中海为主,以爱琴海、马尔马拉海和黑海为轴心,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此时,地中海东、西两部分的地位发生了颠倒。但是,自君士坦丁大帝后的统治者面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变动和变化不定的新形势大多无所作为,或者穷于应付内外危机,或者穷奢极欲胡作非为,或者平庸无为安于现状。直到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帝国才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础上构建出更加稳固的基础,或者说,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战略框架内为帝国确立了巴尔干半岛这一中心,从而完成了帝国政治中心从亚平宁半岛东移至巴尔干半岛的过程。如果说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移到君士坦丁堡是奠定拜占廷帝国未来发展走向的战略举措的话,那么查士丁尼的巴尔干政策就完成了这一战略布局的构建。无论现代史家如何看待这个时期拜占廷历史的发展,无论后人如何评说查士丁尼皇帝的功过是非,人们不能不承认巴尔干半岛战略地位的变化,至少不能否认

^① 他在其不同著作中表达出的完全相反的政治态度,使后代学者怀疑其作品的真实性。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y*, xi, 9.

此后巴尔干半岛在拜占廷帝国历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自6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的疆域不断缩小,先是丧失了包括巴勒斯坦、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西亚领土,而后丧失了包括北非、西班牙、意大利中部和西地中海各大海岛的领土,帝国控制权回缩到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其中巴尔干半岛成为核心地区。此后,拜占廷历史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在巴尔干半岛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的。

6世纪最后25年,多瑙河流域被新兴的阿瓦尔人控制,他们以其定居地(潘诺尼亚地区)为根据地扩张势力,对多瑙河下游地区的斯拉夫人进行严厉控制,实行利用和打击的两手政策。577年,沉寂数年的斯拉夫人发动了对拜占廷帝国的新攻势,10余万斯拉夫人大举渡河侵入色雷斯和伊利里亚两个地区,对那里的城市和乡村大肆抢劫,当地居民纷纷逃离家园,或者涌入城市,或者逃往尚无战祸的地区。由于拜占廷军队大多集中在东部前线,因而斯拉夫人几乎未遇抵抗。他们除了运载大量战利品返回多瑙河下游北岸地区,还有相当多的斯拉夫人留居在被占领的地方多年^①。“我们正是从这个时候算起,确定斯拉夫人因素开始大规模侵入巴尔干半岛”^②。面对斯拉夫人的攻势,拜占廷帝国再度采取查士丁尼皇帝曾推行的“以夷制夷”的政策。伊利里亚大区长官约翰(John the prefect)请求阿瓦尔人援助,而阿瓦尔人也乘机要镇压胆敢不服从其霸权的斯拉夫人。于是,6万阿瓦尔人组成的军队在柏严率领下于578年搭乘拜占廷人的船只渡河,而后对多布罗加地区的斯拉夫人进行残酷的屠杀。阿瓦尔人大获全胜,不仅消灭了反叛的斯拉夫臣属民族,而且还夺取了斯拉夫人从拜占廷领土上抢夺的财物,同时,进一步全面控制了多瑙河流域。而斯拉夫人因此元气大伤。

然而,阿瓦尔对拜占廷人的援助是有其自身目的的,他们最终还是

^① 当时的史家记载,有约10万斯拉夫人停留在被洗劫的地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Menander, fr. 47. 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tran. By R. Smith, Oxford 1860. vi. Cap. 25.

^②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pp. 117—118.

要乘拜占廷人无力北顾之机进攻巴尔干半岛。阿瓦尔人与拜占廷人的交战再度引起斯拉夫人的骚乱,他们也同时南下巴尔干半岛内地,这次入侵既有阿瓦尔人强迫斯拉夫人助战的因素,也有斯拉夫人以此报复拜占廷人并重新通过抢劫补充财富的因素。巴尔干半岛因此陷入巨大的动荡。当阿瓦尔人大举南下巴尔干半岛期间,斯拉夫人也乘半岛混乱于581年发动大规模袭击,大批斯拉夫人的散兵游勇及其家眷深入半岛内地定居。当时的拜占廷作家以弗索主教约翰记载了6世纪最后20年巴尔干半岛和整个拜占廷帝国黑暗的日子,他写道:就是在查士丁尼皇帝去世3年以后的那一年,斯拉夫人大举入侵蹂躏巴尔干半岛,洗劫了整个希腊地区、塞萨洛尼基郊区和色雷斯地区,“夺取了许多城市,攻陷无数要塞,并把它们平毁烧掉,役使人民为奴,在整个国家称王称霸。他们以大军占据领土,好像那原本就是他们的土地一样,毫无惧怕地居住下来”。由于拜占廷军队都在东方波斯前线,斯拉夫人竟然在占领的土地上过起舒坦的日子,还不断向周围农村和城市出击,抢劫拜占廷人的财物和妇女,任意霸占别人的土地。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打到首都的外围,驱散了总数在数千匹的皇家马群,抢走了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直到现在(584年),他们还驻扎定居在那里,没有任何焦虑和恐惧地安宁地生活在罗马人的土地上,留下的是荒芜和焦土,而他们自己却富有抢来的金银、马群和武器,并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罗马人作战,以前他们可是粗俗的野蛮人……”^①。

现代学者分析认为,这段史料中所说的斯拉夫人可能包括了阿瓦尔人,因为就这段文字反映出的斯拉夫人的军事技术和战斗能力显然大大高出他们应有的水平,故而判断其中必有阿瓦尔人参与,斯拉夫人是吸收接受了后者的经验,可能在后者的帮助下,才获得如此大的战

^① John Ephesus,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tran. By R. Payne Smith, Oxford 1860, pp. 432—433. 根据奥伯林斯基的分析,这里所谓的斯拉夫人包括了阿瓦尔人,因为“当时人的记述中并不是总能将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相互区分开”。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51.

果。斯拉夫人的战争能力在这个时期得到迅猛的发展和提高。这段史料还透露出,斯拉夫人在与阿瓦尔人的联合作战中,逐渐改变了以往抢劫为主的袭击战术,放弃了抢劫后就返回多瑙河沿岸的习惯,而是在被占领土上定居下来,从而开启了巴尔干半岛民族融合的特殊时期,从此,半岛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深刻持久的变化^①。

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内陆的斯拉夫人此期也蠢蠢欲动,与北方南下的同胞一起为害乡里,对于这些已经定居的斯拉夫人,拜占廷作家大多难以作出区分。他们报道说,这些斯拉夫人在584年和585年间多次遭到拜占廷将领科门条鲁斯(Comentiolus)的打击,特别是在亚得里亚堡附近大败入侵者^②。但是,自从斯拉夫人卷入巴尔干半岛事务就注定了半岛不会再有和平与安宁,因为,斯拉夫人总是源源不断地从北方南下,他们粉碎了拜占廷人任何一劳永逸的战略计划。592年,多瑙河下游以北的斯拉夫人死灰复燃,再度大举南下,侵入色雷斯平原。他们在阿达加斯特(Ardagast)率领下大肆抢劫拜占廷人。莫里斯皇帝指示普里斯科斯(Priskos)放弃与斯拉夫人的周旋,直接进军他们在多瑙河下游的老巢。于是,拜占廷军队直接进抵多瑙河,在与阿瓦尔人协调后^③,由普里斯科斯的副将亚历山大指挥的部队进入斯拉夫人聚集的沼泽地,在混迹于斯拉夫人中的奸细的帮助下攻入其隐藏在沼泽地深处的中心地带,对反抗的斯拉夫人进行了大屠杀。而后普里斯科斯将5000名斯拉夫战俘送交阿瓦尔汗王为奴隶,以缓与和妒火中烧的柏严的关系,因为后者明确要求分得一部分战利品。皇帝对普里斯科斯擅自处理斯拉夫战俘非常不满,故而解除了他的指挥权,另任命自己的弟弟彼

① 斯拉夫人迁徙巴尔干半岛的影响问题是个十分敏感的学术热点。德国学者法尔梅拉耶尔(Fallmerayer)代表了一种极端的看法,他说:“在现代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没有一滴纯粹的无混杂的古希腊人的血液。”这种意见招致希腊学术界的广泛抨击,他们坚持“融合说”,反对“替代说”。Hopf, *Griechische Geschichte*, p. 91.

② Theophylactus, *The Explanation*, House Springs, Mo.: Chysostom Press 1992, I, 8.

③ 拜占廷人的进军引起阿瓦尔人的抗议,认为拜占廷人违反协约。普里斯科斯解释说拜占廷人的目标是斯拉夫人而非阿瓦尔人,从而化解了矛盾。Theophylactus, I, 8.

得为前线指挥官。这一任命几乎使军队将士对皇帝的不满演变为一次军事叛乱,拜占廷士兵纷纷撤出兵营,多亏彼得临时采取哄骗措施才稳定了局势。

593年,拜占廷军队从多瑙河下游过河扫荡斯拉夫人,常常与数百人组成的小股斯拉夫匪帮相遇。根据记载,这些斯拉夫人在遭遇拜占廷军队时,立即将车队围成一圈,其男性战士在装满抢劫赃物的车上,手持投枪、长矛、战斧和刀剑等武器严阵以待,而妇女儿童则在圈内看管俘获的奴隶。如果战事不利则首先杀死战俘奴隶,而后保护赃物逃跑,最后拼死搏杀。由此可见,直到6世纪末,斯拉夫人还保持原始部落的作战方式。如果说这个时期拜占廷军队与斯拉夫人发生过军事冲突的话,那么其性质也至多是帝国军队为维持半岛秩序而采取的清剿匪邦的作战。然而,即便是对付斯拉夫人的原始战斗方式,拜占廷军队还是需要杰出的将领采取正确的作战方法。彼得在随后的战争中表现出真正的无能,不仅治军无方,军纪涣散,而且战术失误不断,导致拜占廷军队经常丧失刚刚取得的胜利,莫里斯不得不将其免职,重新任命普里斯科斯指挥前线战事。6世纪末拜占廷军队清剿多瑙河斯拉夫匪帮老巢的军事行动,引发了阿瓦尔人与拜占廷帝国之间的冲突。在直到7世纪初的战事中,斯拉夫人继续以部落为单位在巴尔干各地发动袭击,或者以掠夺财物为目的,或者以占领土地为目的。他们成为拜占廷人和阿瓦尔人两大势力角逐巴尔干半岛争夺、利用、镇压、压榨的对象,正是在此过程中,斯拉夫人成为半岛地区的永久居民。

第二节 阿瓦尔人入侵巴尔干半岛

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兴起与另一个中亚游牧民族阿瓦尔人在该地区的命运有密切关系,正如被哥特人灭亡的匈奴人一样,“阿瓦尔人昙花一现的强大势力在7世纪初被斯拉夫人推翻,这片土地因而就

为后者腾空了”^①。阿瓦尔人入侵巴尔干半岛的时间大体相当于库特里格斯人扎巴尔干入侵帝国的时期,这一时期,拜占廷人忙于应付侵入半岛的匈奴人和斯拉夫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大约在557年,拜占廷帝国派遣到高加索地区的军队接到当地山区居民阿兰人的请求,要求与拜占廷人结为联盟,并寻求后者的军事保护,以抵抗阿瓦尔人的攻击。地方将领不能擅自处置重大外交事务,遂将阿兰人的请求呈送中央政府^②。

阿瓦尔人(Avars)是来自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其祖先由蒙古人和突厥人构成,由于他们遭到中亚地区更为强大的突厥部落的攻击,被迫从草原地带向西迁徙进入山区。在西进途中,他们首先与高加索北部的阿兰人(Alans)发生冲突。558年,阿瓦尔人的使节来到拜占廷首都觐见皇帝,受到老迈的查士丁尼亲自接见。当头上甩着长辫子,衣裳肮脏,散发着臭味的阿瓦尔人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首都的街头时,拜占廷居民中产生了一阵小小的波动,围观的人群发出惊讶的议论声。其实,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外族的“野蛮人”,只不过这是他们见到的最远方的民族。他们得到了拜占廷皇帝通常给予外国使节的待遇,对于用黄金包裹的马鞭、马鞍、丝袍和精美的靠枕等“珍贵”的礼物感到十分满意,带着双方缔结的协议离开了,而这份协议只是一些没有实质内容的保证,即拜占廷帝国愿意保持双方的友好关系,同意阿瓦尔人帮助帝国与其敌人作战。狡猾精明的查士丁尼和他的外交官对阿瓦人提出的年贡和领土要求避而不答,只是用礼物、款待和空洞的允诺进行搪塞。对此,梅南德分析说:“无论阿瓦尔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罗马人都将是获利者。”^③而普罗柯比的意见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罗马人民的钱财“都被查士丁尼很快耗尽了,或是在其海边大兴土木实施愚蠢的建筑计划,或是慷慨地赠送给蛮族;……正如我所说过,它们

①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114.

② Theophylactus, vii, 8.

③ Menander, I, p. 443.

还在查士丁活着的时候就被查士丁尼挥霍光了”^①。

但是,拜占廷人对这个远方盟友的估计完全失误了。当他们很快抵达帝国边界地区,并按照协议征服斯科拉文尼人、安特人、库特里格斯人和乌提格尔人以后,并未按照协议离开巴尔干半岛,而是从多瑙河下游地区转向南方。561年,首批阿瓦尔人侵入多瑙河河口的多布罗加地区,次年又进军色雷斯地区,并明确拒绝查士丁尼为其提供的潘诺尼亚定居区的建议。由于双方利益的直接冲突,过去的盟友遂转变为敌对关系,拜占廷人和阿瓦尔人交往的历史进入新阶段。按照阿瓦尔酋长的计划,他们将继续南下进入色雷斯平原,这样既可以最终找到定居地,结束流动生活,同时也可以借助拜占廷人的力量自卫,防止曾遭到他们侵害的各北方民族的报复。这一计划显然与拜占廷帝国的想法相悖。565年,阿瓦尔人特使专程赴君士坦丁堡商谈土地问题。刚刚即位登基的查士丁二世(565—578年)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接见特使,不仅要求来使按照拜占廷礼仪对他行跪拜大礼,而且傲慢地拒绝了查士丁尼时期的允诺,也没有给予阿瓦尔人金钱和礼物。阿瓦尔人对查士丁的敌对政策极为失望和愤怒,准备与拜占廷人兵戎相见。正在此时,中欧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阿瓦尔人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其他方面。

此时,定居在多瑙河中游北岸的潘诺尼亚平原的伦巴第人(Lombards)准备向西南侵入意大利北部,他们为减少后方敌对势力,寻求与阿瓦尔人结盟,以便联合灭亡吉庇德人(Gepids)。当时的吉庇德人在昆尼蒙德(Cunimund)大王统治下正处于势力的强盛时期,对伦巴第人和阿瓦尔人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567年,伦巴第王阿尔伯因(Alboin)和阿瓦尔汗王柏严(Bayan)都在算计着如何消除吉庇德人的威胁,因此两人一拍即合,商定灭亡吉庇德人后,由阿瓦尔人占领其地,而伦巴第人则占领其征服的北意大利地区,如果后者失败则阿瓦尔人归还其潘诺尼亚平原。事实上,阿瓦尔人在南下色雷斯平原计划受挫后,迫切需要

^① 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y*, xi, 7—8, xix, 6—7.

找寻一个定居地,因此接受了伦巴第人的邀请。568年,两个民族按照计划灭亡了吉庇德人,阿瓦尔人进入潘诺尼亚平原南部定居,进而以此为王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向周围地区扩张。而后占领了整个潘诺尼亚平原及其周边地区^①。伦巴第人则毫无后顾之忧地侵入意大利,后来成为亚平宁半岛的主宰。当阿瓦尔人最终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多瑙河下游地区时,他们就不仅成为中欧地区新的主宰,而且成为拜占廷帝国巴尔干半岛北部前线最主要的敌人了。此后30年,阿瓦尔人不断跨过多瑙河入侵拜占廷帝国,深刻影响斯拉夫人向半岛地区迁徙的频率,也影响着拜占廷帝国对半岛事务的政策。

获得定居地并逐渐由游牧改变为农耕生活方式的阿瓦尔人,充分利用潘诺尼亚平原丰富的农业资源,实力迅速壮大。在柏严汗王统治时期,阿瓦尔人占据整个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地区,并控制多瑙河下游地区的斯拉夫人,他们联合发动对拜占廷人的进攻。阿瓦尔人首先把拜占廷帝国设立在多瑙河中游的战略要地西尔缪姆城确定为攻击目标,企图以此作为进一步进攻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前哨站。然而,由于这座罗马时代即开始经营的战略要塞城防坚固,阿瓦尔军队久攻不下,被迫放弃计划,只是对达尔马提亚地区洗劫一番,最终于574年与拜占廷人议和。但是,拜占廷皇帝宝座易主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提比略(Tiberius, 578—582年在位)成为皇帝后,立即发动了对阿瓦尔人的战争,但是却打了败仗,被迫达成停战协议,同意缴纳8万金镑的年贡^②。该协议使双方友好关系维持了数年,也使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北部前线获得数年的安定。正是在阿瓦尔人控制下,多瑙河沿岸的斯拉夫人、安特人、库特里格斯人也暂时放弃了入侵活动。当斯拉夫人对拜占廷帝国发出威胁时,阿瓦尔人就协助后者平定骚乱。578年,6万阿瓦尔人的军队在拜占廷人的帮助下渡过多瑙河,沿河南地带的罗马大道直扑

① Theophylactus, viii, 5, 2.

②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V, pp. 111—125.

下游的多布罗加地区,对不服从阿瓦尔人控制的斯拉夫人进行镇压^①。这次行动虽然是拜占廷人挑唆所致,但也有阿瓦尔人消灭异己的成分在内。这次行动不仅使得多次受到斯拉夫人洗劫的色雷斯地区恢复了秩序,保护拜占廷人的生命财产免受劫掠,解放了大批被俘为奴的居民,而且使柏严汗王“杀一儆百”,惩罚了不听管束的附属民族,他还将斯拉夫人从拜占廷领土上抢夺的财物归为己有,据说,他早已从探子的密报中了解到,斯拉夫人将大量战利品运回其定居地。

阿瓦尔人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镇压了企图摆脱其控制的斯拉夫人,而且乘机将其军队开进多瑙河流域南岸,获得了对整个巴尔干半岛北部的控制权。巴尔干半岛暂时的安定对于拜占廷人来说,无异于与狼共舞。虽然,拜占廷宫廷应阿瓦尔人之邀,派多名工匠帮助柏严建筑带有罗马浴池的宫殿和城堡,以及横跨萨瓦河的桥梁,但是,不久野心勃勃的汗王就开始着手实现其以前未能实现的计划,即从拜占廷人手中夺取西尔缪姆城。他首先切断了该城与其他拜占廷边防城市的联系,而后悄悄地在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使之成为孤城。当一切准备完成后,他公开提出对西尔缪姆城的主权要求,并派兵围困该城。当时的拜占廷皇帝提比略正以主要精力对付东方波斯人的进攻,无暇顾及巴尔干事务,对于柏严的无理要求只能采取拖延策略,提出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汗王,这个城市将作为嫁妆陪嫁。但是,老奸巨滑的汗王已经看穿了拜占廷人的拖延策略,并也领教过拜占廷人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计谋,因此乘拜占廷人无力北上之机,不理睬拜占廷人更具诱惑力的允诺,加紧围攻西尔缪姆城,并最终于582年迫使弹尽粮绝爆发饥荒的孤城投降^②。在那些艰难困苦顽强抵抗的日子里,驻守该城的拜占廷

^① 当时斯拉夫人酋长达乌伦提乌斯(Daurentius)公然杀死了阿瓦尔汗王柏严的使者。Menander, fr. 48.

^② 582年,莫里斯皇帝登基,将年贡增加了2万金镑,以换取阿瓦尔人退兵,但遭到后者拒绝。据说,皇帝还附赠送给柏严一头大象和一张金床,均被后者立即退还。Theophylactus, I, 3.

军民陷入绝望的境地,他们呼向上帝的救助:“我主基督啊,帮帮这个城市吧,请痛击阿瓦尔人,眷顾罗马人和我这个刻碑人。阿门!”^①584年,拜占廷人被迫与阿瓦尔人签订协议,不仅承认阿瓦尔人对多瑙河战略重镇的占领,而且将年贡又增加了2万金镑。

585年,阿瓦尔汗王柏严借口拜占廷人庇护了调戏奸污其妻子的斯基泰行游魔术师,要求莫里斯皇帝(Maurice, 582—602年在位)交出罪犯,给予赔偿。同时,柏严发动对拜占廷人的进攻。鉴于阿瓦尔人的敌对行动,莫里斯扣押软禁了来使,并立即调动军队准备迎敌。586年,阿瓦尔人协同斯拉夫人大举深入巴尔干半岛,夺取半岛北部城市拉提亚利亚、德罗斯托隆、扎尔达帕、波诺尼亚、马尔西安堡等^②。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恶化迫使新皇帝将注意力转向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6世纪80年代以后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变化极大地刺激了拜占廷人,特别是他们对前此实行的以金钱换和平的政策进行了调整,认识到通过赠送礼物、提供年贡和结亲的方式不能保证多瑙河前线的安全,遂决定转而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对来自多瑙河方向的侵入者,包括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进行坚决的剿灭。587年,莫里斯皇帝派遣伊利里亚区总督克门条罗斯(Komentiolos)主动出击进犯的阿瓦尔人。拜占廷军队分三路,分别由卡斯图斯(Castus)、马丁(Martin)和克门条罗斯本人指挥,取得了多场胜利,特别是在撒布伦特战役和西色雷斯战役中重创阿瓦尔人,柏严本人侥幸逃脱^③。在亚得里亚堡战役中,阿瓦尔人也遭到失败,被迫将残部撤退到多瑙河北岸。自此,巴尔干半岛除了有小股斯拉夫人侵袭,大体享受了几年的和平。

① J. Brunsmid, *Eine griechische Ziegelinschrift aus Sirmium*, Eranos Vindobonensis, Viena 1893, p. 331. 西尔缪姆城发现的一段砖刻希腊文铭文,转引自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51.

② Evagr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by Michael Whitb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 vi, 4. Phrantzes, *Chronikon*, trans by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pp. 398—402.

③ Theophylactus, ii, 15—17. Evagrius, vi, 4.

拜占廷军事政策的转变发生在莫里斯皇帝统治时期。作为拜占廷历史上战功显赫的统治者,莫里斯是近二百年来又一位军事将领型的拜占廷皇帝^①。他特别注意强化帝国的军队建设,注重战略战术的研究,大胆起用菲里比科斯(Philippikos)、普里斯科斯(Priskos)和克门条罗斯等一批将领,成功地遏制了波斯人的进攻。他利用波斯帝国宫廷争夺王位的内乱,支持年轻的侯斯罗伊斯二世夺取了王权,并在591年与之订立了有利于拜占廷人的和平协议,根据该协议,有争议的亚美尼亚地区重新归属拜占廷人^②。而后,拜占廷军队的作战重心西移,一方面在意大利北部对抗伦巴第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在巴尔干半岛展开清剿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入侵者的战事。

591年,拜占廷军队胜利结束了对波斯人的战争后,莫里斯皇帝亲自率领拜占廷军队向半岛北部进军,其中一部分主力在普里斯科斯将军指挥下转战巴尔干地区,其战略目标包括,收复多瑙河下游被斯拉夫人占领的多布罗加地区,并沿河向西推进,争取将与北方民族的战场引到多瑙河北地区;其次,拜占廷军队还要在整个半岛地区开展大规模清剿入侵的北方民族的战事,争取在被野蛮人占据的土地上恢复拜占廷帝国的统治权力,重新加强帝国在各地的政府机构。此时,不甘失败的阿瓦尔人强迫斯拉夫奴隶打造战船,而后乘船过河,再度向多瑙河重镇西尔缪姆城发动围攻,但遭到顽强抵抗。攻城失败后,汗王柏严挥师东进,在提马乌斯附近的普罗克拉纳山口处与拜占廷“欧洲将军”普里斯科斯的副将萨维安(Salvian)相遇,后者指挥的数千骑兵经过激烈厮杀,击退阿瓦尔人。次日清晨,近万名阿瓦尔人再度被萨维安所部骑兵阻击在隘口。只是当狂怒的柏严亲自指挥全军出击,才迫使拜占廷人退却。从多瑙河到色雷斯平原北部,阿瓦尔人举步维艰,攻城战几乎全

^① “他准备亲自领兵上阵,使朝野震动,因为自塞奥多西大帝以后帝国再也见不到善战的皇帝了”。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124.

^②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1956, p. 73.

部失利,还不时遭到拜占廷人的打击,一个多月未取得重要战果。最终,莫里斯皇帝以偷袭阿瓦尔人老巢的计谋迫使柏严仓促撤军^①。

592年,由普里斯科斯指挥的拜占廷军队进攻斯拉夫人的老巢,在奸细的帮助下攻入其隐藏在沼泽地深处的中心地带,得到了大量战利品和战俘。拜占廷人对斯拉夫人的进军,引起阿瓦尔人的抗议,他们认为拜占廷人违约进攻多瑙河。但是,普里斯科斯辩解说拜占廷人打击的目标是斯拉夫人而非阿瓦尔人,而斯拉夫人是不包括在协议中的。但是,拜占廷人打败斯拉夫人后,柏严大为恼怒,明确要求分得一部分战利品。为了缓和与妒火中烧的柏严的关系,普里斯科斯将5000名斯拉夫战俘送给阿瓦尔汗王为礼物^②。593年,拜占廷军队在新任前线指挥官彼得率领下,从多瑙河下游进军中游地区,途中与阿瓦尔人控制下的保加尔人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未分胜负。这一事件导致阿瓦尔人过河进攻拜占廷帝国,他们可能在第二年夏季发动攻势,兵锋抵达爱琴海,于597年围困了爱琴海北岸港口城市塞萨洛尼基,而后,更进一步侵入伊庇鲁斯山区,并南下塞萨利和阿提卡地区^③。

6世纪末,经过数年的努力,巴尔干半岛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拜占廷人的方向发展,后者逐渐实现了主动出击,将战争引向多瑙河流域的战略目标。普里斯科斯指挥的拜占廷军队和柏严率领的阿瓦尔人军队再度交手于多瑙河流域。首先,普里斯科斯在整顿军队消除彼得指挥期间留下的弊端后,出兵解除了阿瓦尔人对西尔缪姆城(即今贝尔格莱德)的围攻,收复了这个拜占廷人在多瑙河前线最重要的战略中心城市。而后,他派遣部下古德温(Gudwin)统领2000骑兵跟踪追击侵入伊利里亚地区的阿瓦尔人,全歼入侵之敌。阿瓦尔人迫于拜占廷军事压力,退回多瑙河北岸,并于600年与普里斯科斯订立和约,重新承认拜占廷帝国在多瑙河边疆地区的主权,而拜占廷人则同意以金钱换和平,

① Theophylactus, ii, 18.

② Theophylactus, i, 8.

③ Theophylactus, vii, 6. 自594年至597年的战事,史料记载的不详细。

每年定期向阿瓦尔人提供2万金币。但是,拜占廷人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和约成为一纸空文。601年,普里斯科斯指挥军队越过多瑙河,将战争推进到阿瓦尔人的定居地,年迈的柏严不得不率族人北撤到潘诺尼亚北部山区。乘胜追击的拜占廷军队在潘诺尼亚北部山区继续作战,多次打击阿瓦尔人残部。普里斯科斯两度渡河,在多瑙河北岸重创阿瓦尔主力,击毙柏严的另外4个儿子。这是自古代罗马人东征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区域^①。可以说,7世纪初,拜占廷帝国基本上恢复了巴尔干半岛的正常秩序,除了小股流窜的斯拉夫人匪帮外,为祸最大的阿瓦尔人被击溃,难以对巴尔干半岛造成新的威胁。

第三节 巴尔干半岛失去控制的年代

莫里斯皇帝在巴尔干半岛恢复的秩序是建立在军事胜利基础上的,维持拜占廷帝国对半岛控制权的主要力量是军队。因此,当军队因厌战和军饷不足时,军事将领就会比较容易地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莫里斯皇帝统治晚期就受到了这样的困扰。他于600年派往多瑙河前线的将领科门条鲁斯就因为部下军心涣散拒绝执行命令而被阿瓦尔人打败,仓皇逃离战场。柏严汗王一路追击,夺取了德利兹派拉城,只是由于阿瓦尔军中爆发鼠疫被迫撤军,首都君士坦丁堡才幸免围困^②。而柏严将丧子之痛发泄到俘获的1.2万拜占廷士兵身上,将他们全部杀害,理由是莫里斯拒绝为他们支付赎金^③。也许后者真的希望以此激起拜占廷军队将士对阿瓦尔人的仇恨,提升士气。但是,这一决定暴露

① 奥伯林斯基和奥斯特洛格斯基对莫里斯在巴尔干半岛的战绩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前者认为这是全面恢复秩序的时代,后者认为“在多瑙河上进行的长期战争毫无成果”,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p. 76.

② 有关阿瓦尔军队中爆发的这次瘟疫的细节,后人知之甚少,但是,汗王的7个儿子在同一天病死的记录表明该瘟疫来势猛烈,造成阿瓦尔士兵的重大损失。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139.

③ Theophanes, p. 86.

了莫里斯皇帝轻视臣民性命的无情,也为其后来倒台埋下了伏笔。为了巩固多瑙河边防,莫里斯皇帝下令前线部队在多瑙河河北地区驻扎下来,特别是严防北方民族利用严冬越过封冻的河流发动入侵。然而,习惯于地中海气候和生活习俗的士兵对巴尔干半岛北方边境地区的严寒环境完全不能适应,他们原本希望击溃野蛮人就重返南方温暖的家园的打算落空了。军队里不满情绪迅速蔓延,这种军心动摇的状况及时地被一个野心勃勃的将领所利用。602年,边防司令福卡斯在包括普里斯科斯在内的众多将领支持下发动兵变^①,多瑙河前线驻军拔营南下,直扑首都。莫里斯皇帝毫无防备,在他能够调动其他部队救援以前,就被福卡斯(Phocas, 602—610年在位)推翻了。此后,拜占廷帝国爆发了数年的内乱,致使多瑙河前线门户洞开,几代皇帝精心建立和被莫里斯皇帝重新加强的边防体系自行瓦解,从而揭开了巴尔干半岛动乱年代的新一页。

斯拉夫对巴尔干半岛的全面持久的占领是从福卡斯皇帝统治开始的,这种占领与早期斯拉夫人的洗劫有所区别,与普里斯科斯将军在半岛恢复秩序以前的短期占领也不同。在各种因素中,对此后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是,斯拉夫人从此定居在半岛各地,在与当地原住民的交往和共同生活中,融入拜占廷帝国社会,并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主体民族,这就为继续保持其古老称号和习俗的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有关斯拉夫人定居细节的史料十分缺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勾画出这一时期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

斯拉夫人重新发动的攻势几乎是在阿瓦尔人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进行的,但是从总的过程看,前者后来在被占领土上分散定居,而后者则携带着战利品返回其潘诺尼亚平原。他们以军事征服为先导的迁徙运动大多是以拜占廷人防务体系瓦解为前提的。综观这一时期巴尔干半岛的形势,人们大体将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的入侵路线分为三个方

^① 普里斯科斯后来成为福卡斯的女婿。M. Esposito, "A Ninth - Century Commentary on Phoca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13, No. 3/4 (Jul., 1919), pp. 166—169.

向,其一指向西南方向的亚得里亚沿海地区,其二指向南方爱琴海沿岸地区,其三指向东南方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附近马尔马拉海沿岸地区。西南路入侵者以阿瓦尔汗王为首,一路抢劫,直抵亚得里亚沿海的达尔马提亚地区首府萨罗纳。该城是这一地区经济和行政重镇,始建于罗马帝国时代,后来发展成为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军事中心。612年以后的3年内,该城遭到以阿瓦尔人为主的北方民族多次袭击,城郊农村几乎成为荒土。入侵这个地区的斯拉夫人在其盟主阿瓦尔人携带抢劫来的赃物返回潘诺尼亚平原后,继续占据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他们分散活动在从贝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之间、多瑙河以西、德里纳河以西和萨瓦河流域,直到伊庇鲁斯山区广大的农村地区,不时积聚起人马攻击城市。拜占廷帝国行政当局在当地的控制能力只限于城市,例如依亚德(Iader,今 Zadar)、特拉古流姆(Tragurium,今 Trogir)、斯帕拉顿(Spalatum,今 Split)、拉固萨(Ragusa,今 Dubrovnik)阿科卢维乌姆(Acruvium,今 Kotor)、布图阿(Butua,今 Budva)、利苏斯(Lissus,今 Ljes)和迪拉修姆等,它们都成为拜占廷人聚集以避战乱的地方,还有一些斯拉夫人难以接近的近海岛屿也是农民和渔民躲避野蛮人的避难地。南路入侵者则沿传统的大道快速进击,直到爱琴海北岸。阿瓦尔人以夺取战利品为主要目标,斯拉夫人(包括保加尔人)则以占地夺财为目标,这就使整个马其顿地区在7世纪前25年间被斯拉夫人所占据,该地区首府塞萨洛尼基城多次遭到围困,只是由于该城筑有高大坚固的城墙才保证其未落入敌手。东南路入侵者则完全控制了色雷斯地区,不仅蹂躏洗劫当地农民,而且兵锋直指首都君士坦丁堡,使拜占廷帝国首都面临自扩建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当时,远在拜占廷帝国埃及属地的尼基乌城主教约翰写道:“据说这个年月的君主们都被搞得焦头烂额,野蛮人、外国人和伊利里亚人摧毁基督教的城市,掠走其居民为俘虏,除了塞萨洛尼基以外,没有一个城市能幸免,只因为这个城市城墙特别坚固,并有赖

上帝相助,那些民族才不能占据她”^①。

伊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610—641年在位)夺取拜占廷皇位后,将主要精力放在波斯战争上。为了保证东线战事能够不受巴尔干半岛事务干扰,为了能集中精力彻底打败波斯人,他接受阿瓦尔汗王的提议,于619年前往伊拉克略城附近的塞林布里亚,诚心诚意准备与汗王订立和约,因为,他计划中的波斯战争即将开始,拜占廷人需要稳固后防,调集全部人马到东部作战。为表示诚意,拜占廷人打算举行一个盛大的会晤仪式,宫廷官员们千方百计设计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宫廷仪仗队和各種复杂表演,皇帝本人也暂时放弃军务提前来到会晤地点塞林布里亚精心准备热情接待汗王。但是,他们不知道阿瓦尔人并无谈判和签约的诚意,汗王早已经得到波斯战争即将打响的情报,因此想通过“鸿门宴”配合波斯人灭亡拜占廷帝国。当阿瓦尔汗王选派精兵埋伏在附近山林里的情报传到拜占廷大营时,伊拉克略方知是计,立即脱下皇袍换上便装,在御林军亲兵护卫下逃回君士坦丁堡,并紧急下令城防戒备。阿瓦尔人见计谋败露,快马追击,一路跟踪到拜占廷首都城下,大肆洗劫城郊农村,烧毁了几座教堂。伊拉克略丢弃在会晤地的皇袍连同27000名从事准备工作的拜占廷人都成为阿瓦尔人的战利品。与莫里斯不同的是,伊拉克略花重金将被俘的拜占廷人全部赎回^②。阿瓦尔人自知理亏,且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也无计可施,很快便退回多瑙河北岸。为了尽快摆脱阿瓦尔人的纠缠以便整军备战投入波斯战事,伊拉克略使出各种招数取悦阿瓦尔人,甚至将其儿子阿萨里克(Athalaric)与侄子和几名贵族送交阿瓦尔人宫廷作为人质,不久两国即签订了合约。伊拉克略的行为似乎缺乏拜占廷帝国皇帝的威风,但是就当时的

^① John of Nikiu,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trans. R. H. Charles, 《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注释整理》,巴黎1883年,第175—176页。该城的守护神迪米特里总在危急关头出现扰敌,保护城市不丢,这样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

^② Nicephorus, *The Life of St. Andrew the Fool*, ed by Lennart Ryden, Stockholm; Distributor,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95, p. 15.

情势而言,他采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正确行动。因为,就巴尔干半岛的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与兵抵波斯普鲁斯海峡的波斯人对比^①,与前者战事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后者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技术看,拜占廷人还难以抗衡。因此,迅速结束巴尔干半岛战事,立即准备对波斯人作战是正确的选择。622年复活节过后数日,伊拉克略启程前往波斯前线。

626年,正当伊拉克略皇帝亲自领兵在东方前线与波斯军队作战并节节获胜之际,阿瓦尔汗王指挥下的北方各民族特别是斯拉夫民族联军发动了对拜占廷帝国大规模的进攻,同年夏季7月29日,入侵者的前锋抵达帝国首都。这支8万之众的军队包括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和吉庇德人,他们配合波斯人的新战略对拜占廷京城发动陆地猛攻。当时,伊拉克略率领的拜占廷主力部队远在东方的亚美尼亚前线。事实上,这正是波斯国王的计策,他派遣著名战将沙赫尔·巴兹(Shahr Barz)领精兵突击君士坦丁堡^②。但是,洞悉波斯人阴谋的伊拉克略不为所动,只是分出小股部队驰援首都,而将主力留在东方前线,继续贯彻其战略方针。此时,首都驻军面对4倍之敌,且在皇帝尚未成年的儿子指挥之下^③。形势特别危急的另一个原因是,波斯人在经历了伊拉克略最初的打击后,调整了战略,避开亚美尼亚地区的拜占廷军队主力前锋,从小亚细亚南部直插波斯普鲁斯海峡,企图与巴尔干半岛北方各民族联合作战,攻陷拜占廷首都,或者至少将伊拉克略的主力部队从东方吸引到西线。按照汗王和波斯将领的计划,陆上攻击以北方各族为主,攻击重点在连接水陆部分的城墙,而波斯人则负责从水上攻击城防薄弱部分,由阿瓦尔人控制下的斯拉夫人负责使用船只运送波斯人跨过

① 617年,波斯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察尔西顿,并对京城发动过水上攻击,但遭到善长海战的拜占廷军队反击,损失了4000人和全部船只。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6111 A. M.

② Theophanes, 6117 A. M.

③ 有的记载说,拜占廷人守城部队只有12000人。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239.

海峡。伊拉克略皇帝将首都防务委托辅佐幼主的重臣伯努斯(Bonus)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塞尔吉乌斯(Sergius),其本人则继续坚持在波斯前线指挥战争。在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中,攻守双方各施计谋,多种攻城机械纷纷亮相。但是,拜占廷军队以逸待劳,准备充分,特别是其水师发挥了大船的攻击力,阻断了东西两方面敌人联合攻击的计划,重创斯拉夫人的原始船只,并依靠高大的城墙成功抵挡住陆上进攻。8月3日的战斗异常惨烈,斯拉夫船队在“金角湾”北端全军覆灭,水面上漂浮着船只的碎片和尸体,河水被鲜血染红。面对失败的阿瓦尔汗王自度无力夺取君士坦丁堡,怏怏撤军,在冬季来临前回到潘诺尼亚平原。波斯人一直盼望斯拉夫人的船只,但是等来的是失望,最终也只能无奈地仓皇撤退,因为拜占廷军队在其盟友哈扎尔人的帮助下已经南下幼发拉底河,直捣波斯王行宫泰西封,可能截断其退路。

一些学者将拜占廷人在626年的胜利归功于坚固的“君士坦丁堡陆上城墙、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和高效率的军事艺术”^①。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够全面深刻。拜占廷人军事胜利的实质是其战争的防守性和波斯与阿瓦尔人战争的侵略性,防守的一方为了生存做困兽之搏,且当时的拜占廷帝国气数未尽,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这些对手还不够强大。而波斯人入侵拜占廷帝国,特别是对后者欧洲区进犯的企图已经大大超出了其能力范围,其势已成“强弩之末”,劳军伤财,人心必反,最终波斯国王被厌战的部下推翻杀死。

虽然拜占廷帝国取得了波斯战争的胜利,但是,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的主权却遭受到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极大的破坏,半岛地区曾经繁盛的农耕和畜牧生活遭到扰乱,古典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被严重损毁,文明社会发展水平大大降低。巴尔干半岛主要城市无一幸免于战乱的冲击,有些甚至彻底毁灭,同时各地农民因躲避斯拉夫人侵袭而大量逃亡,一些重要地区的农村遭到入侵者反复洗劫,人口稀少,土地荒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54.

荒,为外来的斯拉夫人留出了定居的空间。但是,习惯于原始农耕生活的斯拉夫新居民还不能很好地经营肥沃的农田,致使全岛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样的大城市郊区,农业生产一直难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特别是自626年以后,摆脱了阿瓦尔人控制的斯拉夫人长期占据巴尔干半岛农村地区,并对半岛内陆的中小城镇不断袭击抢劫,部分地破坏了自罗马时代就逐步开始形成的商业贸易网络。斯拉夫人定居巴尔干半岛内陆的正面影响是为劳动力短缺的拜占廷社会输入了大量有生力量,正是这些能够吃苦耐劳的斯拉夫人和其他斯拉夫化的北方民族将人类生存的范围扩展到偏远的山区和沼泽地带,增加了半岛物资来源的总量,进而扩大了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

斯拉夫人深入半岛各地定居的情况被许多中世纪旅行家和香客的记载所证实。7世纪初的拜占廷作家伊塞多利(Isidore of Seville)就提到在伊拉克略统治初期,“斯拉夫人从罗马人手里抢走了希腊”,而8世纪的香客维里巴尔德(Willibald)从西欧前往巴勒斯坦朝圣,经过伯罗奔尼撒南部沿海城市蒙南瓦西亚后,记载说这个城市“淹没在斯拉夫人的土地上”,10世纪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913—920年,945—959年)在其作品中也写道:746年大瘟疫后,“整个国家都斯拉夫化了,都成为野蛮人了”^①。事实上,斯拉夫人在与当地拜占廷人共同生活中,通过通婚、接受基督教信仰、放弃原有的生活习俗、改变礼仪习惯等方式,为拜占廷社会所容纳,或者以我们今天通用的说法是被拜占廷文化所“同化”,当然这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②。战争和暴力一直是古代各文明之间碰撞的方式之一。它带来的结果主要是破坏性的,其影响是消极的。

① Isidore of Seville, *Chronicon*, PL, trans by Stephen A. Bar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xv, I, p. 93.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thematibus*, ed. A. Pertusi, Vatican 1952, p. 91. 转引自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55. 法尔梅拉耶尔就是根据这句话说出来那句极大伤害希腊学者的话,对这种极端看法,布瑞提出合理的分析意见。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p. 455—457.

② L. Brehi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N. Y. 1977, p. 37.

巴尔干半岛在斯拉夫和阿瓦尔人入侵后,破坏极为严重,正如普罗柯比记载的,“战争一直持续不断。结果,罗马的版图上没有一个地方,一座山脉或一处洞穴,亦或没有任何一处在此期间未受损害,许多地区被劫掠五次以上”。“因为在每一次这样的侵袭中,我敢说有超过二十万罗马人遭到了杀戮或奴役,以至于所有这些地区都成了如同斯基泰一样的荒漠”。“这些蛮族像敌人一样蹂躏罗马帝国,奴役那里的罗马人;而后,这些罗马人的朋友和同盟者满载着战利品和俘虏返回各自的家乡。而这些地区的一些农民们由于日夜想念他们被掠走为奴的妻子儿女,便结队袭击匈奴人,杀了许多野蛮人,俘获了满载着掠夺物的马匹;但是他们胜利的结果却是不幸的”^①。“斯拉夫人开始其大规模占领。无数斯拉夫和阿瓦尔人群落散布在整个半岛上,西从亚得里亚海沿岸,东、南到爱琴海沿岸。……新来者相当强大,占领了整个马其顿和莫埃斯亚(即多瑙河南岸——译者)地区,还使色雷斯直到君士坦丁堡城墙下的地带一片荒芜”^②。在古代社会人类生产能力相对低下的时代,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破坏可能使某一地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经济上除了物质财富的缓慢积累、正常生活结构的恢复、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需要远比现代社会更多的时间。此后,拜占廷帝国在农村基层的统治管理体系、基督教各个层次的教会组织系统,尤其是普通居民间的协调关系经历了几百年才逐渐重新建立。

7世纪上半叶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半岛的迁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于战争动乱年代保留下的史料极为缺乏,这一时期的历史造成的后果也模糊不清,引起现代学者诸多争论。一些学者断言,正是由于这个时期斯拉夫对巴尔干半岛的全面占领,使当地民族成分发生根本性变化^③。这导致巴尔干半岛民族成分的复杂化,也是延续至今半岛

① 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y*, xi, 9, xix, 14, xxi, 28—29.

②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p. 84.

③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2, I, p. 171—172. 瓦西列夫夫人虽然回避对此作出明确判断,但也承认此期“半岛发生了深刻的人种变化”。

民族关系纠缠不清之“死结”的历史开端。这个时期巴尔干半岛动荡局势的后果非常复杂。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够充分说明7、8世纪巴尔干半岛历史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非常少。后代历史家所谓巴尔干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即是指这一时期,其含义不仅是说当时半岛社会生活的混乱,也是说现有史料不足以完整描述真实状况^①。可以说,正是由于斯拉夫民族通过暴力手段强行进入巴尔干半岛,并且是以极大的数量优势改变当地的民族成分,才使巴尔干历史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这一时期斯拉夫民族迁徙对后世产生的各种后果中,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半岛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的深刻改变。

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是,斯拉夫人从此融入巴尔干半岛社会生活,他们不仅通过暴力手段占据了半岛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而且逐渐接受了当地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结束了原始渔猎和原始农耕生活,原始部落社会组织形式也逐渐解体。根据现代史家的考察,7世纪初以后,斯拉夫人不仅全面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各地,而且进入帝国政治和军事机构,其中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就是在皇帝伊拉克略时期成为拜占廷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空间范围而言,斯拉夫各个部落分别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北部、中部和部分南部,即从阿尔卑斯山到黑海和从亚得里亚海岸伊庇鲁斯山区到爱琴海之间广大地区,只将伯罗奔尼撒南部沿海个别地区、爱琴海上大多数岛屿和人迹罕见的部分山区留给了原有居民^②。

斯拉夫人迁徙定居巴尔干半岛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大批斯拉夫人从游牧转变为定居生活,从野蛮转向文明。随着保加尔人对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占领,仍然保留在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逐渐与新来的居民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55.

^② 今天人们还可以从这些地区的居民身上隐约看到古希腊人的身影。笔者为此考察了巴尔干山区各国和希腊沿海岛屿地区居民的体质和姓氏特征,大体得出这一结论。Sylvia Benton, "Notes on Cret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98, No. 2 (Aug., 1941), pp. 77—83. Maria Georgopoulou, "Late Medieval Crete and Venice: An Appropriation of Byzantine Heritage", *The Art Bulletin*, vol. 77, No. 3 (Sep., 1995), pp. 479—496.

融合为保加利亚居民的一部分,同时也加快了后者的斯拉夫化进程。而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其他部分地区的斯拉夫人,一直保留其原始的部落社会生活形态,直到9世纪尚未形成像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所形成的那种国家权力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他们长期保留着并逐渐适应了拜占廷国家在各地重新恢复起来的管理体系。他们虽然还部分地保持着过去的生活习俗,但是接受了帝国政治制度的束缚,逐步服从拜占廷法律和司法体制的管辖,他们的族长和部落民变成拜占廷皇帝的臣民。由于在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半岛过程中,统一的国家尚未形成,因而,斯拉夫各部落中也没有产生出领导全体人民的领袖,正像普罗柯比所说的,他们不是在“一个人领导下”,而是生活在原始民主制中。他们采取了与日耳曼人各部落不同的方式,以分散的部落群体融入拜占廷社会,其社会生活方式也按照拜占廷人的方式直接过渡到中古时代。

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也是他们开始逐步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过程。根据现有史料分析,斯拉夫人首先在军事技术和作战方法上深受拜占廷人的影响。他们的作战方式从最初的原始集群分散攻击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军团作战转变,从普罗柯比记述的那种赤膊上阵、群殴式的战争形式转变为有战略战术的军事行动,将简单地使用武力转变为战争艺术,因而,其战争的结果也从最初的屡战屡败转变为胜多败少,从袭击抢劫后即逃回多瑙河北岸转变为占领土地而后定居。他们在军事上一方面接受了发展更为成熟的阿瓦尔人的战争方法,另一方面从拜占廷人学习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主要是学会使用种类更多的武器,包括用途不同的骑兵和步兵武器,以及攻城机械。其次,斯拉夫人在渔猎生活中比较精通造船技术,这些原始技术也在与拜占廷人的接触中得到大幅度提高。史料记载,斯拉夫人曾经在多瑙河上架设由船只构成的浮桥供阿瓦尔人部队使用。当然,斯拉夫人通过战争接受拜占廷人的影响多半是在武力较量中进行的,或仿造缴获的武器,或利用抓获的俘虏。总之,斯拉夫人在7世纪能够立足巴尔干半岛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在军事上确有显著进步,换言之,斯拉夫人的进步

首先是从军事上开始的。

战争的结果常常能够折射出作战各方实力的高低,斯拉夫人军事上的进步也反映出其社会生活发生的重要变化,特别是在他们定居巴尔干半岛各地以后的一二百年间,斯拉夫人最终完成了从游牧渔猎生活向定居农耕生活的转变。事实上,当斯拉夫人刚刚以军事征服者的身份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土地上时,他们与周围的拜占廷邻居处于敌对状态,特别是那些家园被入侵者占据的拜占廷人一直企图重新夺回原有的土地。但是,整个部落的斯拉夫人定居后,特别是家庭之间的交往,妇女儿童之间的交往就使敌对的双方逐步改变了态度,从仇视到理解,从隔阂到沟通。尤其是当斯拉夫人放弃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惯和部落礼仪,转而在周围拜占廷农民学习农耕和畜牧技术以后,原来的敌对双方就变成了朋友。斯拉夫人的这种转变完全是在实际生活的对比中自愿完成的,因为,适应新环境的生活方式能够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创造更舒适的条件,能够使他们明显提高生活的质量。由于斯拉夫人熟悉渔猎生活,他们最初集中在巴尔干半岛各地的河流、湖泊和海滨,而后才逐渐向平原地区的农耕区扩展。当通婚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后,斯拉夫人和拜占廷居民的融合就最终完成了。古老的斯拉夫原始社会消失在拜占廷社会中,只留下一些神秘的传说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说古代斯拉夫人给拜占廷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活力的话,那么原始公社和部落时代的民主制还一直保留着遗迹,在拜占廷帝国此后的立法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是8世纪初成文的《农业法》,其中有许多内容反映了斯拉夫人融入拜占廷社会以后保留的原始民主制的残余^①。

斯拉夫人在伊拉克略王朝时代完成了定居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持续了70年大约3代人的时间。这次迁徙对巴尔干半岛居民分布格局的最终改变和形成的结果及其影响一直是人们关心的

^①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章第2节“拜占廷农业法研究”。

问题,也是学术界,特别是巴尔干国家学者争论的热点。对此,本书不作评价,只对公认的事实进行客观的介绍。

7世纪上半期,斯拉夫人已经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分布在多瑙河中游分支德拉瓦河流域的斯拉夫人由于与巴伐利亚地区山地居民发生冲突而南下到卡尼尔奥拉(或称克兰),逐渐控制了阿瓦尔人衰亡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区,包括莫埃斯亚西部、潘诺尼亚西部和达尔马提亚诸地,他们就是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祖先。他们曾在阿瓦尔人的控制下袭击半岛内陆的拜占廷人,他们在阿瓦尔人衰落后接受了基督教。与这些斯拉夫人比邻的是克罗地亚人,但是,根据克罗地亚人古老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现代匈牙利北部的白色克罗地亚人,统领他们的克鲁卡斯(Klukas)等5兄弟与具有匈奴人血缘关系的保加尔人的传说一致^①,因此,有学者推测早期克罗地亚人是斯拉夫化的保加尔人^②和被保加尔人征服的斯拉夫人共同构成的。这个事实恰好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现代学者提出的保加尔人斯拉夫化的假说。这样,早期克罗地亚人国家的领土就从塞提那河直到达尔马提亚中部,比现代克罗地亚国家大得多,其中波希米亚地区后来为塞尔维亚人占领。塞尔维亚人的4个部落分布在克罗地亚人南方:定居在塞提那河直到纳兰塔河之间的纳兰塔尼人、纳兰塔河到拉古萨城之间的扎赫伦人、拉古萨到卡塔罗之间的特拉沃尼人和卡塔罗到安提瓦利之间的杜克加尼人。他们占据的土地都散布在农村,拜占廷人则主要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城市里,其中一些城市是躲避斯拉夫人入侵的拜占廷居民建立的。分布在早期塞尔维亚人东南方向的斯拉夫人定居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平原,这两个地区在拜占廷帝国强盛时期能够有效地阻止斯拉夫人的入侵,但是,在6世纪末和7世纪最初20年,斯拉夫人乘拜占廷人内讧和波斯战争的混乱逐渐入主农村地区,只给拜占廷人留下了城市,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iii, p. 143.

^② 保加尔人的祖先传说中有类似人物,即克罗巴特(Krobat)及其五子。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275.

例如塞萨洛尼基、亚得里亚堡、马尔西安堡等。拜占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斯拉夫人定居帝国腹地的事实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将这些分散的斯拉夫人转变为皇帝的臣民,并利用他们希望摆脱衰落中的阿瓦尔王朝控制的迫切愿望^①,将他们组织在帝国抵抗北方民族入侵的防御体系中。莫埃斯亚东部和以塞萨洛尼基为首府的马其顿地区分布的斯拉夫人主要有斯拉维尼亚人构成,其中偏北部的7个部落受保加利亚人控制,而定居在马其顿平原的德罗古比特人、萨古达特人、维雷吉泽特人、伯泽特人和巴居奈特人名誉上是拜占廷帝国的臣民,但因得不到保护而实行自治和半自治。他们不仅定居在农村,而且逐渐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沿海地区及近海上。由此再向南也散布少量斯拉夫人,可以说,越向巴尔干半岛南部,斯拉夫人分布的越少且越分散。直到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南部地区,也存在斯拉夫人的踪迹。但是,总体看来,“斯拉夫化的完成如人们所说要到下个世纪”^②。

斯拉夫人此后大体循着两条线索发展,其一是作为拜占廷帝国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在拜占廷体制内活动,最终融合为“拜占廷人”;其二是作为独立于拜占廷人和其他势力控制的民族,保持自治和独立,最终形成独立国家,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但是,前者受到拜占廷文化的影响相当明显,其中大部分斯拉夫人逐渐放弃了原始的宗教信仰,接受了基督教。9、10世纪期间,融合进希腊社会的斯拉夫人在伊庇鲁斯、希腊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完成了逐渐被纳入拜占廷帝国统治体系的过程。同时,拜占廷朝廷通过军事高压和传教活动加强了对这些斯拉夫移民的改造,官府在这些斯拉夫人集聚区建立了更多教堂,设立了更多基层教区,完善了教会管理系统。特别是拜占廷人在斯拉夫人

① 阿瓦尔人于626年以后建立王朝,很快就被反叛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赶走,后来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C. A. Macartney, "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1, No. 2 (1944), pp. 266—275.

②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280.

中强制推行希腊语,逐渐消除了斯拉夫人与希腊人之间的隔阂,有利于两个民族间的沟通和融合。可以说,11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治理下的斯拉夫人完成了拜占廷化的过程,即政治上接受帝国政府统治,宗教上接受基督教信仰,文化上接受了拜占廷传统,生活习俗上放弃了斯拉夫人原始的部落生活方式。我们将在专门章节中叙述那些作为独立国家发展的斯拉夫人,这里仅简略涉及拜占廷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及其历史,这应该属于拜占廷帝国关于斯拉夫人的内政事务。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自7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廷中央政府对帝国内境的斯拉夫人主要采取怀柔政策,即允许他们继续保留传统的习俗和生活方式,有些地方除了要求他们向政府定期交纳一定赋税外,甚至许可他们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形式和贵族称号。但是,拜占廷政府对于反叛的斯拉夫人一直使用残酷镇压的手段进行无情打击。658年,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641—668年在位)就进行了一次征讨,镇压境内斯拉夫人的起义,强迫拒绝交纳税收的斯拉夫人履行臣民义务。事实上,生性自由的斯拉夫人一直反抗拜占廷人的统治,拒绝纳税只是一种消极反抗形式。还有一些斯拉夫人为了逃脱拜占廷贪官污吏的压榨,集体逃往或投奔临近的斯拉夫人独立国家,如保加利亚国家,或投奔阿拉伯人,664年,大约有超过5000斯拉夫人从巴尔干半岛逃过达达尼尔海峡,投奔阿拉伯人,他们声称宁可作哈里发的奴隶也不做拜占廷的臣民^①。同样,在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 685—695, 705—711年在位)统治时期,马其顿平原西北部不断爆发斯拉夫人起义,迫使他出兵镇压,将逮捕的3万斯拉夫人迁移到小亚细亚,其中大部分斯拉夫人后来被迫参加拜占廷人对阿拉伯人的战争^②。斯拉夫人问题在相当长时期里一直是拜占廷帝国棘手的内政难题,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拜占廷人对斯拉夫人的剥削压迫,因为拜占廷统治者不可能正确处理和善待斯

① 这些斯拉夫人被阿拉伯人收留,定居在叙利亚,后来还参加了对拜占廷人的战争。Theophanes, 6156 A. M.

② Theophanes, 6180 A. M.

拉夫民族,必然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675—676年爆发的两个斯拉夫部落起义就是拜占廷人暴政引发的,起义军甚至使用船只封锁了马其顿首府塞萨洛尼基的港口。这次起义还吸引来其他北方民族的人侵,这里我们再度看到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的身影,但是,史料并未说明他们与斯拉夫人起义的关系。

自晚期罗马帝国时代,巴尔干半岛就一直存在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6世纪中期以后,地中海世界爆发周期性大瘟疫,人口减员十分严重,从而加重了拜占廷帝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地中海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黑死病即鼠疫的第一次爆发发生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因此被冠以“查士丁尼瘟疫”。按照普罗柯比的记载^①,瘟疫在首都流行了4个月,其中3个月为瘟疫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每天死亡5000人,总死亡人数约45万人,按照现代学者对该城居民总数60—100万的估计计算,死亡率当为75—45%^②。有的学者根据其他史料推算,提出此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为57%^③。如果考虑到还

① Procopius, *The History of Wars*, V, 46, 5.

② 学者们对于君士坦丁堡人口问题持有不同的估计,其中估计人口数最高的达到100万,最低的25万。参见S.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London 1933, p. 124.《牛津拜占廷史》估计此次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1/3人口。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Oxford 2002, p. 49.《黑死病》推测在4个月内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40%,即是说死亡20万。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N. Y. 1985, p. 11.

③ P. Allen 依据当时的另一位作家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推算总死亡人口为23万,占总人口40万的57%。P. Allen, “The ‘Justinianic’ Plague”, *Byzantion*, 1979(49). Christine A. Smith, “Plague in the Ancient world; a study from Thucydides to Justinian”, *The Student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8 1996—1997, 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 4/5/2002 (<http://www.loyno.edu/~history/journal/2002—10—28>), p. 11. 布鲁宁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2/5人口。见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Thames and Hudson 1987, p. 120. 兰布则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一半。见H. Lamb, *Theodora and the Emperor*, N. Y. 1963, p. 153.

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没有感染瘟疫的话,那么病死率可能更高达80—90%^①。此后,“查士丁尼瘟疫”传染到其他地区,主要是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和军营,而且每隔若干年重复发作,因此其对帝国劳动力和兵源的破坏极其严重,当时的作家对此无不谈之色变^②。为了补充人力,拜占廷帝国政府多次迁徙人口,747年,拜占廷帝国将希腊各地的希腊人迁入京城,以增加人口数量,这样就将希腊大部分地区腾空,为斯拉夫人全面入主希腊提供了条件。但是,这个时期填补希腊“空白”的斯拉夫人已经是正在希腊化的斯拉夫人,他们已经部分地与拜占廷居民相融合,因此大部分能够顺利地接受拜占廷社会生活。

斯拉夫人难以融入拜占廷社会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其生产方式与拜占廷人有很大区别。据学者分析,斯拉夫人一直不接受拜占廷人采取的自由农耕作方式,他们长期保持着使用奴隶耕种的习惯,“斯拉夫人不理解‘隶农’这个词的意思,他们也不接受它”^③。拜占廷人力图在斯拉夫人定居区恢复被破坏了农业制度和税收征收体制,遭到斯拉夫人的顽强抵抗。最终,斯拉夫人将自己的部落村社制度保留在拜占廷人的农业制度中。对于这个有争议的问题,现代斯拉夫学者和西欧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俄罗斯和苏联学者几乎一致主张,6、7世纪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不仅为拜占廷帝国带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也为拜占廷社会经济制度注入农村公社特有的活力,斯拉夫农村公

① 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人类病毒性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版,第704页提出,1976年埃博拉出血热首次爆发时,病死率高达50—90%。那么,“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首次爆发的鼠疫,其病死率也可想而知是相当高的。

② 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 D. 431 to A. D. 594, 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 trans. by E. Walford, London 1854, IV, 29. 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tran. By R. Smith, Oxford 1860, vii. cap. 20. Agathias of Myrina, *Historiarum Libri V*, Bolin 1967, V, 10. 3. John Malalas, *Chronicle*, Chicago 1940, VIII, 13.

③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p. 420—421.

社的强大影响改变了拜占廷帝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①。这个意见遭到其他国家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不能过高估计斯拉夫对拜占廷农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拜占廷社会自身发展说”,这种意见将拜占廷社会传统经济模式作为主体,明确提出“早期拜占廷社会表现出来的特点仍然存在”^②。无论学者们对此提出的意见有多大分歧,他们都认为斯拉夫人融入拜占廷社会的过程经历了数百年。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材料,我们知道仍然有个别斯拉夫人部落坚持其生活传统,一直未能融入拜占廷社会,成为拜占廷帝国内的“独立自治区”。例如,13世纪下半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曾爆发了两次小规模斯拉夫人起义。他们是流亡逃避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端拉科尼亚湾东、北岸悬崖峭壁地区的斯拉夫人,被当地人称为迈林格人(Melingoi)和埃泽利泰人(Ezeritai)。他们坚持使用斯拉夫语言,保持传统的生活习俗,拒绝服从拜占廷官吏,抗拒税收制度。他们长期反抗拜占廷人,最终在12、13世纪期间获得自治权和携带武器权。显然,这是拜占廷当局对他们无计可施,任由当地官员裁定处理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并不是所有成熟文明都可以顺利地同化后起的文明,虽然就总体而言,前者一般能够消除后者的影响,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在同化的大趋势中,仍然存在许多特例和意外。人类历史的演变就是如此变化多端丰富多彩。

14世纪以后,随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恶化,土耳其军队从南向北逐步征服半岛各民族。在此期间,共同利益强化了拜占廷人和斯拉夫之间的友好关系和认同感,而共同的信仰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拜占廷人对斯拉夫人传统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在不同信仰的土耳其“野蛮”人面前,斯拉夫人成为其真正的兄弟。而斯拉夫各国民众也逐渐消

^① Th. Uspensky,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St. Peterburg 1914, vol. 1, p. 28, from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2, I, p. 245.

^② P. Lemerle,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Byzantium*, 1979, pp. 64—65.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1—93页。

除了对拜占廷人的对立情绪,真心地为拜占廷人祈祷。1402年,当蒙古大军在安卡拉战役中打败奥斯曼土耳其人,俘虏并处死苏丹巴耶扎德父子的消息传来,保加利亚编年史家在其作品中为君士坦丁堡庆幸,“因上帝的恩赐,圣城(指君士坦丁堡)现在真的从所有外敌中被拯救出来”。同样,隐居在修道院里的前拜占廷皇帝约翰六世在1367年接见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时说: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那些和他们类似的人都是我们信仰上的兄弟”。晚期拜占廷作家迪米特里(Demetrius Cydones)写道: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笃信上帝,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和我们分享同样的东西”^①。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257.

第五章 保加利亚人

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半岛主要的国家,该民族的历史自查士丁尼一世时代就开始出现在拜占廷作家的笔下,而其历史发展是半岛历史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近现代以来该民族国家对巴尔干半岛地区事务发挥的作用一样重要。作为一个自中亚迁徙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外来民族,保加利亚人经历了比其他外来民族更为复杂多样的历史,他们经历了“斯拉夫化”和“拜占廷化”两个过程,由最初的被征服被奴役的弱小民族发展成为决定巴尔干半岛命运的强大民族,并在近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获得一席之地,这都是其他巴尔干民族未曾有过的经历。

第一节 保加利亚人的起源

如同其他许多民族早期的历史一样,保加利亚人早期的历史也是学者们一直努力探讨但结论尚存争议的课题,如今,与此有关的任何一种意见,无论是出自保加利亚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之口,都还仅限于推测的阶段,全面系统且言之有据的看法还有待更多新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的出现。本书所述也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而已。有关保加利亚人起源和早期历史的史料多见于拜占廷作家,如本书多次使用的乔丹尼斯、塞奥法尼斯、马尔西林努斯等,但是,他们的记述零散且不够准确,如同任何古代作家对其他民族的描述一样,都掺杂着神话与传说。

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初的保加利亚人(又称保加尔人)属于活动区域十分广泛且部落众多的匈奴人,是其中的一个称为欧诺古尔人(On-

ogurs)部落的分支。他们原属于西伯利亚西部地区的西突厥语族,与库特里格斯人(Kutrigurs)和乌提格尔人(Utigurs)血缘相近^①。他们是中亚游牧民族,因躲避严寒天气而南下到亚速海东岸的库班河谷地区,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其名字就源于他们活动所在地的一条河流,而伏尔加河的名称则来自早期的保加尔人^②。公元500年,其中一部分保加尔人进入多瑙河出海口地区,成为这里早期斯拉夫人的奴隶。早期斯拉夫人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维斯杜拉河和喀尔巴阡山以东到伏尔加河都是他们纵横驰骋的天下,特别是当哥特人庞大的“帝国”瓦解以后,他们就逐渐向西推进到整个东欧地区。保加尔人就是在此期间与斯拉夫人一起成为欧洲的新客人^③。到6世纪中期,他们随库特里格斯人和乌提格尔人进入多瑙河中、下游地区,并侵袭拜占廷人控制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在此期间,他们与早期斯拉夫人一起受到阿瓦尔人的奴役,被迫参与后者对拜占廷帝国的入侵^④。阿瓦尔人式微后,他们于635年一度获得独立。

早期保加尔人的生活状况不为人知,我们只能从与其相近的欧诺古尔人略知一二。欧诺古尔人酋长奥尔加纳(Organa)及其外甥科夫拉特(Kovrat)曾于619年到访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国大教长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在其历史作品中记载过他们,他认为拜占廷皇帝计划发展与这些野蛮人的友好关系,利用他们保持拜占廷帝国东北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62. 保加利亚人“匈奴起源说”见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p. 477.

② 托勒密和马尔西林努斯称之为 Rha, 匈奴人称之为 Edcl, 亚美尼亚人则称之为 Thamar.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V, p. 446.

③ 据说早期斯拉夫人分为温登、安登和捷成三支,保加尔人就随其中一支活动,从喀山附近的保尔加鲁河西进。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V, pp. 445—446.

④ Theophylactus, *The Explanation*, House Springs, Mo.: Chysostom Press 1992, vii, 4, 1.

边境地区的安定,并阻止巴尔干半岛其他北方民族的入侵。据说到访的欧诺古尔人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洗礼,伊拉克略一世(Herakleios I, 610—641年在位)皇帝成为他们的教父,一些欧诺古尔人还与拜占廷人结亲,他们还得到了包括黄金白银、纺织品、珠宝和宗教仪式必需的礼器等大量拜占廷贵重礼物,其贵族还被授予“罗马帝国的贵族”称号^①。尼基乌城主教约翰记载道:“他(科夫拉特)接受了洗礼后,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并通过圣洗的善功美德教化所有野蛮人和原始人”^②。7世纪期间,拜占廷人极力扶植已经迁徙到高加索北方草原的欧诺古尔人,以消除阿瓦尔人从巴尔干半岛北方对拜占廷帝国造成的威胁。皇帝伊拉克略频繁派遣使节前往发展与欧诺古尔人的友好关系,同时策动其他尚处于阿瓦尔人控制下的匈奴人部落发动起义,其中包括保加尔人,脱离阿瓦尔人的控制。奥尔加纳去世后,科夫拉特接任酋长,统治到642年。635年,科夫拉特曾成功地发动了反阿瓦尔人的起义,将后者驱逐出其定居地。而后,他派遣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觐见伊拉克略,并被授予“罗马帝国的贵族”称号。由于受到拜占廷帝国的扶助和文化影响,科夫拉特治下的匈奴人实力增强,活动范围最大的时期东起高加索,西到多瑙河下游。在拜占廷史料中,科夫拉特统治下的匈奴人国家被称为“老大保加利亚”。在7世纪上半叶相当长时期里,拜占廷人和欧诺古尔人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在欧诺古尔人牵制下,巴尔干半岛北方民族很长时间未能发动大规模骚扰。

根据考古和有限的文献资料所反映,这个时期保加尔人居住的房屋是用从原始森林采伐的原木建造的,建筑技术粗糙而原始,他们的住地常常位于河流附近的树林里,易于躲避其他部落和野兽的袭击。他们已经从游牧向半农耕半畜牧生活转变,各家都放牧牛羊等家畜,每个部落有大群家畜,并使用斯拉夫人家奴耕种土地,种植的谷物包括粟子和野小麦,主要用于烘制面包和采用粟子花泡奶茶。他们信仰至高的

① Nicephorus Patriarcha, *Opuscula Historica*, ed. De Boor, Leipzig 1880, p. 12.

② John of Nikiu,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p. 197.

雷电之神,相信万物有灵,也崇拜河神。由于各个部落之间独立生存,常会爆发战事,因此他们尚武好战,但是,家长、长者和德高望重的人受到普遍的尊重,成为部落议会的主要成员,决定整个部落的重大事务。他们的战争方式比较原始,不穿铠甲,使用盾牌、刀剑、弓箭、毒矢、长矛、战斧和长绳^①。他们一直保留某些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例如男女都穿宽大的裤子,女性以面纱蒙面,男性用头巾缠头,实行一夫多妻制以适应战争对人口的需要。由于缺乏农耕生活,故而手工业和贸易极不发达,交易中以牲畜为媒介。总之,早期保加尔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7世纪上半叶,拜占廷人和欧诺古尔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因科夫拉特(Kovrat)的去世而终止。“老大保加利亚”国家也失去了往昔的强盛,在亚洲游牧民族哈扎尔人(Khazars)的打击下,迅疾瓦解,重新倒退到各个部落分散活动的状态。哈扎尔人原居住地在中亚,后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他们在半农耕半游牧生活状态中,依靠武力控制着多瑙河和黑海北方的广大地区。“老大保加利亚”瓦解后,科夫拉特的5个儿子分别控制一部分部落。其一以亚速海为主要活动区域,后来并入哈扎尔人的部落联盟;其二西迁进入中欧多瑙河中游地区,后并入阿瓦尔人国家;其三更向西迁徙,融合在伦巴第人(Lombards)中;其四则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后并入蒙古人部落;其五是后来势力极为强大的阿斯巴鲁赫(Asparuch, 642—691年)。在多瑙河以北众多分散活动的部落中,阿斯巴鲁赫领导下的保加利亚部落联盟迅速强大起来,人数增加,军力强盛,很快征服了定居在这里的斯拉夫人“七部落”,于670年以后控制了多瑙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区^②。

① 关于早期保加利亚史和这部分保加利亚人有不同说法,吉本认为,他们与最初来到欧洲的保加人不同,后者败于塞奥多里克领导的东哥特人后从历史上消失了,前者才是来自伏尔加河的保加人。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VI, p. 256.

②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6160 (p. 296—299).

处于从游牧向农耕社会转化中的欧诺古尔人,在拜占廷史料中被称为“保加利亚人”,他们急于南下到巴尔干半岛寻求更适合农耕生活的定居地,同时,也躲避来自东方大草原的袭击。阿斯巴鲁赫领导下的保加利亚人部落在多瑙河入海口多布罗加地区定居后,立即与拜占廷人订立友好条约,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同意给与保加利亚人一定的经济援助,以防后者南下色雷斯平原。在最初的接触中,双方友好相处,但不久便为争夺各自利益而导致战争。因为对于拜占廷人而言,结好一个北方民族更有利于稳定多瑙河边防,但是,他们不能允许北方民族进入多瑙河南岸。据《保加利亚编年史》记载^①,初来乍到的保加利亚人曾被拜占廷帝国接纳为盟友,居住在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地带,条件是为帝国守护多瑙河边疆,防止其他民族过河进入帝国。但是,帝国官员对保加利亚人的无耻欺压和横征暴敛导致他们从小规模的反抗发展为有组织的全国作战。“在阿斯巴鲁赫的率领下,与统率‘斯拉夫七部落联盟’的当地斯拉夫贵族达成了协议。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斯拉夫—保加利亚国家,并为抵御拜占廷人和其他敌人新的侵袭而采取了措施”^②。新王国的首都最初设在瓦尔那(Varna),后设在普里斯拉夫(Preslav)。

为了将保加利亚人的威胁消灭在萌芽阶段,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 668—685年在位)亲自率领军队水陆并进。庞大的舰队从首都出发,沿黑海西岸北上,骑兵则出色雷斯平原,同时攻击多瑙河下游平原。而保加利亚人则充分地利用了地理优势,避开拜占廷军队主力前锋,展开游击战,首先向多瑙河以北的沼泽地和盐湖滩地退却。当拜占廷军队因君士坦丁四世突发中风而向多瑙河河南撤兵的时候,保加利亚人乘机出动,在拜占廷人渡河过程中进行袭击,使后者遭到很大损失。保加利亚人由此重新占领了多布罗加地区。这次胜利

^① David Marshall Lang, *The Bulgarians from Pagan Times to the Ottoman Conquest*, London and Boulder, Colorado; Thames and Hudson and Westview Press 1976, pp. 25—40.

^② 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上册,第23页。这里,作者显然是站在保加利亚民族立场上写历史。

被保加利亚历史学家视为原始保加利亚人的第一场关键性胜利。因为第二年,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四世不得不与保加利亚人订立和约,同意向阿斯巴鲁赫每年纳贡。这一协议也被认为是拜占廷帝国被迫承认保加利亚人国家的合法性的历史性文件,标志斯拉夫—保加利亚人国家在巴尔干半岛的正式存在,这是继斯拉夫人大举进入巴尔干半岛后的又一重大发展。奥伯林斯基就此着重指出:“这是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巴尔干半岛重要部分的主权让渡出去。按照中世纪拜占廷编年史家的说法,681年和约确实是‘罗马人的耻辱’”^①。

阿斯巴鲁赫汗王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国家^②控制着黑海北岸和多瑙河下游广大地区,南面进入到巴尔干山脉,北界到达德涅斯特河,相当于今天的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等国的领土范围。他还在莫埃斯亚东部地区的普里斯卡(Puliska)建立首都,这里曾经是罗马帝国多瑙河边防的战略要地,东可监视多瑙河下游的多布罗加地区,南可控制通向多瑙河的道路,并直达君士坦丁堡。

在新占领的定居地,保加利亚人与当地已经先期定居的斯拉夫人融合。作为军事征服的胜利者,阿斯巴鲁赫汗王将斯拉夫人变为臣民。他将大部分斯拉夫人迁移到保加利亚汗国的边境,作为抵御拜占廷人和其他北方民族入侵的军事力量。例如,他将属于斯克拉文尼人的塞维利人(Severi)从多瑙河北方迁移到保加利亚王国的东部,在靠近黑海地区的拜占廷人控制区附近构筑起防线。同时,他将斯拉夫七部落联盟迁徙到保加利亚汗国的南部和西部,以防止来自拜占廷人和阿瓦尔人的袭击。如前所述,当时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斯拉夫人尚处于军事民主制发展阶段,其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结构难于抵御西方的阿瓦尔人攻击和南方的拜占廷人的同化。这部分斯拉夫人与保加利亚人的融合不仅使其自身利益得到保护,而且也在民族构成和国家建设方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64.

^② 或被称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现代保加利亚国家由此得名。*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1993, vol. 2, p. 620.

面有利于保加利亚人的发展。在与斯拉夫人的融合过程中,保加利亚国家日益“斯拉夫化”了。许多现代学者认为,他们虽然保持原有的名字,但是在10世纪中期时,已经完全成为斯拉夫人了^①。在这一过程中,保加利亚人不断增强实力,逐步发展成为巴尔干地区的强国,是唯一能与拜占廷帝国相抗衡的势力。

阿斯巴鲁赫建立的保加利亚王国(因其王称“汗”或可称汗国)的领土范围基本奠定了该民族嗣后发展的基础,成为其国家的核心地区,直到10世纪以后才进一步向南扩张,发展成为近现代保加利亚国家。保加利亚王国建立后的200多年里,他们与被征服的斯拉夫人更进一步地融合,“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同时缓慢地征服着他们的征服者”。这个所谓的保加利亚人的“斯拉夫化”主要通过上层贵族接受斯拉夫人更“文明”的举止礼仪,也允许一部分斯拉夫贵族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下层民众则逐渐放弃其更“野蛮”的风俗习惯,采取斯拉夫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更多使用斯拉夫语言,以便于同其他巴尔干北方民族交流;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定居农耕的生产方式,斯拉夫人在这方面恰好成为主要的教师。“这样,今天的保加利亚人就成为纯粹的斯拉夫人了,除了其名称和少量的匈奴人的血缘外,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古代传统了”^②。保加利亚人的兴起和对巴尔干半岛的入侵,彻底改变了半岛地区的政治格局。此后,巴尔干半岛进入了两强对抗和群雄逐鹿的历史阶段。

第二节 拜占廷—保加利亚关系:冲突与融合

保加利亚汗王实行专制统治,其下有贵族会议,由6位大贵族“伯雅”组成。他们仍然保持着凶悍的作战传统,在拜占廷帝国北方形成了

^①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p. 66, 92. 奥伯林斯基认为,保加利亚人的“斯拉夫化”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数量优势造成的。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65.

^②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335.

严重的威胁。689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拒绝继续履行其父皇君士坦丁四世允诺给保加利亚人交纳的年贡,意图挑起战争,以便拜占廷人收复被斯拉维尼亚人占据的罗德比山西部地区。当时,斯拉维尼亚人已经臣服于保加利亚人,因此收复其住地意味着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为此,他将拜占廷人驻扎在小亚细亚的部队调往色雷斯。次年,拜占廷军队首先击败保加利亚人,而后向西进攻塞萨洛尼基西方的斯拉维尼亚人。取得大胜后,查士丁尼二世将俘获的3万斯拉夫人迁移到小亚细亚的奥普西金军区。对于拜占廷人的进攻,阿斯巴鲁赫似乎没有进行大规模报复,可能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

保加利亚汗国在阿斯巴鲁赫的继承者特耳维尔(Tervel, 691/704—718年)统治下,发展迅速,实力大增。695年,拜占廷帝国皇室发生内乱,皇帝查士丁尼被废黜,流放到黑海北方的克里米亚半岛。不甘失败的查士丁尼逃出流放地,经过哈扎尔人控制的凡纳格利亚城(Phanagoria),逃亡到保加利亚汗国控制下的多瑙河下游地区,向当时在位的汗王特耳维尔求援^①。特耳维尔立即抓住这个可以干涉拜占廷国家内政的大好时机,答应帮助查士丁尼恢复皇位,并派遣保加利亚—斯拉夫人大军进军君士坦丁堡。705年,保加利亚军队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正当保加利亚人面对高大的城防工事一筹莫展时,对君士坦丁堡十分熟悉的查士丁尼派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从输水渠道潜入城内,打开城门,协助保加利亚人攻陷了首都,重新夺取了皇权。作为回报,查士丁尼二世邀请特耳维尔汗王到君士坦丁堡,并授予其恺撒称号。这是保加利亚君主从拜占廷帝国获得的最高称号,比其前人科夫拉特更加荣耀。而恺撒称号在当时的拜占廷帝国也是皇帝之下地位最高的贵族称号,一般由皇帝继承人承担。特耳维尔汗王得到的这个称号实际上并不具

^① 哈扎尔王暗中答应拜占廷篡位皇帝提比略的要求,准备加害查士丁尼,后者得到消息后,立即潜逃,乘船秘密潜回多瑙河地区,得到保加利亚人的帮助。Theophanes, 6197 A. M. (704—705).

有实际权力,只是表明查士丁尼对保加利亚君主的谢意^①。但是,查士丁尼在705年对特耳维尔汗王的款待产生了两个深远的后果。首先,它标志着拜占廷人再次确认保加利亚国家在巴尔干半岛的合法存在,承认了这个国家与拜占廷帝国的平等地位。其次,以特耳维尔汗王为首的保加利亚—斯拉夫贵族对君士坦丁堡富足奢华的城市和皇宫生活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强化了他们南下的欲望。事实上,保加利亚人并没有打算入主拜占廷首都,特耳维尔汗王也无意成为拜占廷君主的臣属,他们只是对拜占廷的财富垂涎三尺,这让他们寻找借口等待时机准备大肆敲诈一笔。

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末期,曾多次大举兴兵,讨伐黑海北岸的车绳,以报复当年他流亡此地受到的虐待,但总是出师不利,一直未能得手。当他最终请保加利亚人派3000援兵与他一起前往黑海讨伐车绳时,遭到兵变将士的袭击,被杀身亡,连其幼子也未能幸免^②。保加利亚人终于等来了机会,他们借口为查士丁尼报仇,于查士丁尼被杀后第二年,即712年,发动了大规模军事入侵,再次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并大肆洗劫了这个都城的郊区。当时,拜占廷军队受到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的两面夹击,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当时的皇帝塞奥多西三世被迫安抚保加利亚人,消除巴尔干半岛方面的威胁,以全力对付东方的阿拉伯人。716年,塞奥多西与特耳维尔订立协议,规定从黑海的保加利亚湾到梅里奇河中部一线为两国边界,这条线相当于从今天的布尔加斯港直到普罗夫迪夫,由此,保加利亚人顺利占领了色雷斯北部平原。这一条款表明,保加利亚人不仅实现了向巴尔干半岛内陆扩张的梦想,占领了拜占廷帝国控制巴尔干半岛的战略枢纽,而且切断了拜占廷帝国首都与多瑙河前线的联系,其中包括黑海的水路联系和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大道的陆路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保加利亚汗国利用

^① Theophanes, 6198 A. M.

^② Theophanes, 6203 A. M. 史家记载说,不到6岁的小提比略被反叛士兵“像杀一只羔羊一样被砍断了喉咙”。

拜占廷帝国内外危机取得的利益比阿拉伯人的进攻具有更大的威胁,因为,他们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拜占廷帝国心腹地区。同一协议的另一条款规定,两国必须进行定期国际贸易活动,换言之,此后保加利亚商人将取代拜占廷商人,控制拜占廷帝国各大中城市的谷物进口和手工制品的出口^①。这是老谋深算的特耳维尔取得的经济权利,其意义甚至比军事利益更重要。

巴尔干半岛两大强国实际利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拜占廷人在暂时处理了阿拉伯人对小亚细亚的进攻后,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保加利亚人。当时,许多亚洲居民因战乱被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地区,并与保加利亚人发生争夺土地的冲突。保加利亚汗王以此为借口,要求增加年贡,遭到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 741—775年在位)的拒绝。保加利亚人对此极为不满,立即起兵入侵色雷斯南部地区,烧杀抢掠,再度兵进君士坦丁堡城下^②。保加利亚军队虽然十分骁勇,但是,使用的仍是原始兵器和原始作战方法,因此,他们在高大坚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下无计可施,只能望城兴叹,而后对附近的村庄抢劫泄愤一番作罢。为了对付保加利亚人,拜占廷人沿保加利亚汗国边境地区修筑了许多屯兵要塞,同时,联合被征服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土著番王,将大批小亚细亚地区居民迁入色雷斯军区北部,以拱卫边境地区^③。

同时,君士坦丁五世发动水、陆联合进攻,在连续九场重要战役中接连取胜。根据后人的分析,君士坦丁五世的战略目标是消灭保加利亚汗国,重新建立多瑙河防线,再现莫里斯皇帝将战场推到多瑙河以北的计划。因为,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发展证明,以和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30, pp. 235—236.

^② Theophanes, 6258 A. M.

^③ 这次移民计划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当时爆发的大瘟疫造成人口大量减员有关。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p. 452—455.

平谈判和金钱无法阻止北方民族对半岛内地的侵占。若要维持拜占廷帝国在半岛地区的主权就必须以武力驱逐和军事镇压保加利亚汗国。战争的初期,双方争夺的要点在色雷斯北部山区,因为要进入多瑙河中下游的多布罗加和莫埃斯亚地区,必须首先翻越巴尔干山脉。保加利亚人起初在山区和山口以重兵设立防线,成功地阻止了拜占廷军队的北向进兵。但是,战争经验更为丰富的君士坦丁五世立即改变进军路线,绕过保加利亚人布防的山区,从伊斯格河运兵至多瑙河中游的小镇苏塞达瓦和诺瓦埃,而后,顺流直下莫埃斯亚和多布罗加地区,出其不意地从保加利亚军队防务最薄弱的背后登岸,而后向南进军,沉重地打击了保加利亚军队,迫使其防线全面瓦解。保加利亚军队在战争艺术和武器装备上远逊于拜占廷军队,他们遭到的连续失败,特别是763年的失败几乎使汗国瓦解^①。

战败导致保加利亚人内部分裂,各部落首领纷纷要求重新选举新汗王,保加利亚汗国因此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内讧。君士坦丁五世乘机干涉其内政,对保加利亚人各派实行分化瓦解政策,并以仲裁人身份调解裁定其争端。精明狡猾的君士坦丁五世还指派拜占廷人大肆收买许多心存不满的保加利亚人作为眼线,随时向拜占廷帝国密报保加利亚人的动向。正是根据这种密报,拜占廷军队在黑海的布尔加斯湾港口城市安西亚罗斯城附近击溃偷袭色雷斯地区的特雷特斯将军指挥的保加利亚人部队,生擒大部。为了庆祝胜利,君士坦丁五世在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举行的万人庆功祝捷大会上,将保加利亚俘虏全部处死^②。

773年,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汗国的和平条约到期,汗王特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谈判续约问题。恰当此时,君士坦丁五世又接到坐探密报,称保加利亚人准备起兵进攻帝国。君士坦丁因此推测,这名使节实际上是前来窥探军情。于是,他将计就计,用歌舞酒肉款待来使,

① Nicephorus, *A Partial Account*, trans by Joseph A. Munitiz, Leuven: Spicilegium Sacrum Lovaniense 1988, p. 66.

② L. Brehi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p. 59.

假装对保加利亚军队的阴谋浑然不知,暗中却密令色雷斯军区作好准备,同时从亚洲调集8万精兵和配有长矛的重装兵团火速增援色雷斯军区。当保加利亚使节对此略有察觉时,君士坦丁五世哄骗他,称说这支部队是调往阿拉伯前线。保加利亚人不知是计,派出万余人军队袭击色雷斯地区。在巴尔干山脉南麓的利索色利亚,保加利亚军队遭到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大量战俘被处死在君士坦丁堡赛车竞技场。保加利亚人的实力由此被极大地削弱。而君士坦丁五世则因屡败保加利亚人和残酷无情地屠杀保加利亚战俘,而被冠以第一位“保加利亚屠夫”^①。

这一时期,整个巴尔干半岛定居的斯拉夫人与当地居民进一步融合,拜占廷作家因此哀叹道:“当这场瘟疫(746—747年)传遍整个世界时,伯罗奔尼撒全岛逐渐斯拉夫化了,都变成野蛮人的天下”^②。特别是在拜占廷帝国发生了自上而下的毁坏圣像运动和宫廷内部爆发的一连串争权夺利的阴谋之后,极大地削弱了拜占廷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斗争实力^③。摄政王后伊琳尼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废黜并刺瞎其双眼,自己登上皇帝宝座。拜占廷皇室和朝廷的无能,不仅使巴尔干半岛形势恶化,而且极大地削弱了拜占廷帝国对欧洲的影响。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大帝于800年圣诞节加冕为帝,其宫廷作家阿尔屈安写道:“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存在过三个尊贵的人。第一个是在其宝座上统治着圣彼得世界的教宗,而圣彼得是公使徒的首领。……另一个是尊贵的皇帝和第二罗马帝国世俗的拥有者,但是这个帝国统治者相当可悲地被他自己的臣民而不是被外国人废黜,这一消息到处传闻。第三个是皇家之尊的您,我主耶稣基督的意愿就是使您成为基督教民众的统治者,您比其

①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p. 150.

②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Thematibus*, trans.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I, 53—54. Theophanes, 6266 A. M.

③ 毁坏圣像运动严重地削弱了拜占廷人与西欧基督教信徒的关系。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0—212页。

他两位统治者更有杰出的权威,更卓越的明智,更高尚的王者之尊。您是万般罪行的惩罚者,是误入迷途众生的引路人,是痛不欲生者的救星”^①。可见,当时西欧人对拜占廷皇权的看法相当鄙视。

保加利亚人的再度兴起是在科鲁姆国王(Krum,约802—814年)统治时期。科鲁姆国王早年活动不详,记载仅仅提到,他原为保加利亚潘诺尼亚部落首领,勇猛善战,足智多谋,曾协助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Charlemagne,768—814年)击溃控制多瑙河中游的阿瓦尔人,占领了潘诺尼亚东部地区。796年,查理大帝向东南方向出兵多瑙河,进攻独霸潘诺尼亚地区的阿瓦尔人。阿瓦尔人霸权此时已经衰落,不断遭到其控制下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起义的困扰,查理便与这些反叛力量建立联系,立即得到渴望摆脱阿瓦尔人控制的保加尔人的响应。科鲁姆帮助查理将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伊斯特尔河,同时借助法兰克人的势力不断发展保加利亚民族的实力,控制范围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山区发展到多瑙河下游地区^②,击败占据统治地位的旧保加利亚贵族,夺取了王位。

科鲁姆国王势力的发展引起拜占廷帝国的极大恐惧,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向色雷斯地区的扩张直接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当时,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山脉一线建立防务系统,以抵抗保加利亚人对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的进犯。但是,习惯于山区作战的保加利亚军队常常撕破拜占廷人的防线,袭击巴尔干半岛中部各大城市,包括战略要地塞尔底卡、腓力普堡、亚得里亚堡等。每次洗劫都使当地农村变为一片焦土。拜占廷作家尼基弗鲁斯在涉及这个问题的记载中仍然心有余悸地写道:“他们恐怖的喧嚣声常常划破夜空,与疾驶而来的马蹄声一起打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p. 266.

^② 这些地区的一些地名至今保持着法兰克人的传统,特别是在当时的教士通信中可以反映这一史实。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515. 布瑞甚至认为,君士坦丁对多瑙河地区的用兵,目的主要不是征服保加利亚人而是要削弱法兰克人的影响。

碎人们的美梦,接着就是烧杀抢掠,死神顿时降临到毫无防备的人们头上。”^①

为了对抗保加利亚人的抢掠,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802—811年)于807年发动了对保加利亚的战争。在战争的初期阶段,拜占廷军队在其皇帝的亲自统率下直接打击色雷斯北部地区的保加利亚军队,迫使科鲁姆退入山区。不久,拜占廷军队发生内讧,尼基弗鲁斯一世无功而返。此后,保加利亚军队大举入侵,在斯特里蒙河畔成功地伏击了拜占廷军队。接着科鲁姆乘胜占领了色雷斯地区西部重镇塞尔底卡城。尼基弗鲁斯一世立即组建由拜占廷帝国欧洲和亚洲各军区精锐部队组成的新军,拒绝了科鲁姆提出的和谈要求,直接攻入保加利亚人心腹地带莫埃斯亚地区,洗劫保加利亚人的首都普利斯卡,焚烧了科鲁姆国王的宫殿,夺走金银财宝。家园虽然被毁,但科鲁姆国王没有与拜占廷军队正面决战,而是在其归途必经之地设下埋伏,等尼基弗鲁斯一世及其军队全部落入伏击圈后,立即使用树墙封闭其前后道路。拜占廷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损失惨重,全军覆没,尼基弗鲁斯一世在战斗中阵亡,他的儿子斯大乌拉修身负重伤,侥幸逃回君士坦丁堡。胜利后的科鲁姆国王兴奋至极,命令部下用尼基弗鲁斯的头骨制作酒碗,并在庆功会上用来为各位大臣将军轮流把盏^②。保加利亚军队从此攻城夺地,先后占领色雷斯地区黑海沿岸重要城镇德维尔多斯、安西亚罗斯和马其顿地区的重镇腓力普堡等城市。为了一洗心头之恨,他所到之处,平毁城池,烧毁房舍,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将农村变为焦土,整个巴尔干半岛在保加利亚人的军刀下颤抖。正如拜占廷史家瓦西里所说:“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成为拜占廷帝国的两个最可怕的敌人。”^③

新任皇帝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Rangabe, 811—813年在位)即位

① Nicephorus, p. 68.

②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VI, p. 260.

③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70, p. 240.

后,形势仍然没有改变。他接受了科鲁姆国王的和谈建议,但是,却拒绝了科鲁姆国王要求交换叛逃告密者的建议。科鲁姆国王以此为由,再次举兵进犯,疯狂地摧毁了另一座黑海沿岸重要城市麦森布里亚城。米哈伊尔一世并非行武出身,不善作战,因此,当他亲自统率拜占廷军队与保加利亚军队在色雷斯首府、梅里奇河中游的亚得里亚堡附近平原正面决战时,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科鲁姆国王。这一仗使拜占廷军队遭到了比尼基弗鲁斯一世更大的失败。皇帝米哈伊尔一世侥幸逃脱,退却到首都,凭借高大坚固的城墙坚守不出。科鲁姆国王乘胜追击,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并亲手将长矛扎在城门上,实现了他曾经立下的誓言:“把我的矛插在君士坦丁堡黄金门上。”^①然而,胜利的保加利亚人虽然横刀跃马于君士坦丁堡城下,却无法攻破城池。正当此时,米哈伊尔去世。原亚美尼亚军区大将军利奥五世(Leo Armenian, 813—820年在位)接任皇帝,并提议和谈。当科鲁姆应邀前往“金角湾”附近的会谈地点时,遭到利奥派出的刺客的袭击。他受骗上当,受了重伤,遂决心与拜占廷人血战到底。满怀仇恨的科鲁姆一边疗伤一边积极备战,打算来年再战。但是,814年春季,科鲁姆突然死于脑出血。保加利亚战争也因他的去世而结束^②。

第三次保加利亚战争使拜占廷帝国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遭到巨大破坏,巴尔干半岛正常的社会生活被彻底打乱,各族人民对战争极为厌倦。特别是战争双方的君主,也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皇帝利奥五世和保加利亚新任国王奥穆塔格(Omurtag, 814—831年在位)于816年订立30年和约。该和约恢复了一百年前的边界线,即东起保加利亚湾西到梅里奇河中游。此后,直到9世纪末的80余年期间,两国基本无战事,巴尔干半岛因此得到近三代人的长期和平。在巴尔干半岛中部和南部地区,定居下来的斯拉夫人逐渐融入拜占廷社会。而由保加利亚人控制的半岛北部地区也在稳定发展中仿造拜占廷帝国建立起国家机

① Nicephorus, p. 69.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ed. de Boor, 503.

② S. Runcce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51—70.

构。在保加利亚人国家的西侧则逐渐形成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国家,这就基本奠定了现代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格局和国家边界。由于拜占廷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多方面影响的存在,包括保加利亚人在内的半岛地区的斯拉夫人逐渐进入拜占廷帝国政治文化体系中,到10世纪时,“巴尔干半岛大部分民族就成为东欧各国中世纪社会的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被称为拜占廷世界”^①。

第三节 巴尔干半岛的和平局面

816年签订的利奥—奥穆塔格30年和约标志着巴尔干半岛进入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局面。拜占廷帝国的实力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在半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持续扩大。9世纪初,由于军区制在全国普遍推行,农业经济形势好转,拜占廷帝国实力增强,特别是大批斯拉夫人移居拜占廷帝国各军区,不仅补充了短缺的劳动力,而且稳定了边防。新移民和当地的拜占廷农民一起构成了军区制下的农兵,也充实了与农兵并存的小农。诚如皇帝利奥六世(Leo VI, 886—912年在位)在其法令中提出的:“朕以为有两种职业对国家长治久安至为重要,一为农民,一为兵士。朕以为此二业当在各业之首。”^②皇帝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I, 920—944年在位)也明确指出:“此种小土地占有者予国利甚巨,因其缴纳国家税收,提供军队服役之故。倘若此类农民数量减少,其利必失。”^③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平安定的环境更为商业贸易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最明显的表现是国内外贸易活动日益活跃,特别是对东欧地区的商业相当繁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许多城市在7世纪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等北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69.

② Leo III, *Jus graecoromanum*, Athens, Ekdotikos Oikos Georgiou 1931, XI, 2.

③ I. Zepos, *Ius Graeco-Romanum*, Athens, Ekdotikos Oikos Georgiou 1931, vol. 2, p. 209.

方民族入侵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但是此时却相继获得重新发展的机会,它们一度被破坏的郊区也随着城市的发展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拜占廷帝国实力的增强也使边防得到加强,沿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边界的要塞哨所工事得到修整,从小亚细亚征召的军队被调集到巴尔干半岛执行巡逻任务。

巴尔干半岛和平局面还得益于拜占廷帝国在东部前线对阿拉伯人战争取得的暂时性胜利。自7世纪中期以后的两个多世纪期间,拜占廷人一直忙于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综观拜占廷—伊斯兰教国家关系史,在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兴起和扩张中,拜占廷人始终处于守势。在哈里发时代和公元661年倭马亚王朝期间,阿拉伯穆斯林军队不仅持续向东、西、北方向进军,攻克伊朗高原,占领中亚地区,横扫北非和马格里布地区,占据迦太基,征服摩洛哥的柏柏尔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夺取西班牙,而且袭击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属地,并向拜占廷帝国首都赖以生存的粮仓和兵源所在地小亚细亚地区发动进攻。虽然拜占廷人进行了拼死的抵抗,阿拉伯军队仍然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控制了自两河流域源头地区至黑海的大亚美尼亚地区,迫使拜占廷人全线后撤,并于655年、674年和717年多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其舰队一度洗劫了塞浦路斯岛和爱琴海沿岸地区。“从适当的背景来观察,伊斯兰教的扩张,标志着从荒凉的沙漠地区逐渐渗入附近肥沃的新月地区这一长期进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是闪族最后一次大迁移”^①。655年,阿拉伯舰队首次重创拜占廷帝国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641—668年在位)亲自指挥的帝国舰队,这场被阿拉伯作家称为“船桅之战”的战役对刚刚建立的阿拉伯海军具有重要意义,也深深影响了拜占廷帝国的发展,因为战役的结果是切断了拜占廷帝国首都与外界的水上联系^②。阿拉伯人的目的在于尽快清除阿拉伯帝国扩张的障碍,灭亡拜占廷帝国,使西征和北征的两路大军早日在欧洲会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上册,第169页。

② 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240页。

师。面对阿拉伯军队的攻势,君士坦斯于660年突然离开首都前往意大利,并计划向亚平宁半岛迁都,贵族和官吏也纷纷准备西逃。但是,倭马亚王朝争权夺利的内讧暂时中断了阿拉伯人对拜占廷帝国的进攻。特别是拜占廷人利用新式武器,即被阿拉伯人称作“希腊火”的“液体火焰”,消灭了678年夏季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海军^①。此后,双方展开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拉锯战,互有胜负。这些外部的动荡也影响着巴尔干半岛的地区形势。因为,只有东方前线恢复和平,拜占廷人才能将战略重心从东方转移到西部巴尔干半岛地区。9世纪末以前,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先后建立了10个军区,即色雷斯军区、希腊军区、马其顿军区、伯罗奔尼撒军区、塞萨洛尼基军区、迪拉修姆军区、凯法利尼亚军区、尼科堡军区、达尔马提亚军区、斯特里蒙军区^②,它们是重新恢复拜占廷帝国地方权力的重要成果,对于维持半岛和平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拜占廷世俗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复兴”也弱化了巴尔干半岛不同民族间的对立情绪,特别是毁坏圣像运动强化了以皇帝为首的世俗权力对文化和宗教事务的控制,有助于拜占廷人利用这些精神武器征服巴尔干半岛其他民族。“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运动发生在8、9世纪,其性质是拜占廷教、俗统治集团发动的禁止使用或崇拜圣像的社会斗争,最终以皇帝为首的世俗统治集团彻底击败

① 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希腊火是一种以石油为主体、混合了易燃树脂和硫磺等物质的粘稠油脂。它容易点燃,但不具备爆炸力,因此便于携带和运输。其性状如油,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而且容易附着于物体表面。士兵们通常使用管状铜制喷射器将它喷洒向敌人,然后点燃希腊火。根据一部古书中的插图,拜占廷海军派遣轻便小船引诱敌军大船出击,在诱敌过程中将大量“希腊火”洒在水面上,点然后借助风力烧毁敌船。希腊火的发明被归功于叙利亚建筑师瓦利尼科斯,其新贡献在于将相当比例的易燃物质加入石油,使其可燃性变为易燃性。C. 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N. Y. 1924, vol. II, pp. 209—210. James Riddick Partington, *A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34.

② Speros Vryonis, ed., *Byzantine Studies: Essays on the Slavic World and the Eleventh Century*, New Rochelle, N. Y.: Aristide D. Caratzas 1992, pp. 130—140.

教会势力为结束。这场运动涉及面广,影响极大。学者们以这场运动标志当时的历史,称运动发生的一百余年为“毁坏圣像时代”^①。这场运动以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 717—741年在位)于726年夏季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为开端,至843年幼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842—867年在位)统治时期,摄政皇后塞奥多拉于同年3月在首都举行的会议上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为止,持续了117年。这场运动对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拜占廷帝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上,即更加重视传教和文化传播。特别是在皇帝塞奥非鲁斯(Theophilus, 829—842年在位)统治时期,文化繁荣,成果显著。他大力支持官方整理古典作品的工作,因此出现了专门整理抄写古籍的作坊,一种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文本使古籍整理规范化,为保存失传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字体一直使用到印刷体出现。他还恢复了朝廷对君士坦丁堡大学的支持,不仅由官方任命教授,将他们列入国家官职,而且由朝廷支付其高额薪俸,使这座由君士坦丁堡大帝于4世纪建立的欧洲最早的大学重新焕发生机。拜占廷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如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利奥、神学和哲学家弗条斯、神学家和文学家君士坦丁,都应皇帝的亲自聘请,前来任教并主持大学的学术和教育工作,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正是在利奥(Leo)任校长期间,他的两位高徒弗条斯(Photios)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主持古典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后来,弗条斯被皇帝任命为教会最高首脑大教长,他亲自筹划了对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国家的传教活动,并亲自选定君士坦丁为皇帝的传教特使^②。

在9世纪的长期和平期间,拜占廷帝国加强了对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文化与宗教传播,并取得了巨大进展。首先,拜占廷帝国的御用文人在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广大被斯拉夫人占据的地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234.

^② Photios, *Epistolae*, ed by Johannes N. Baletta, Jildesheim: G. Olms 1978, 2, No. 34, pp. 20—25.

方借助传教活动推行拜占廷文化,传播拜占廷人的价值观,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其中色雷斯、阿提卡、伯罗奔尼撒、伊庇鲁斯南部、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等地区先后出现了许多东方基督教教堂,帝国在这些地区的政府机构得到恢复,大量古代文献被输送到保加利亚和斯拉夫国家的王宫里^①。而后,沿着梅里奇河和瓦尔达河等河谷交通路线,文化和传教活动逐渐向北发展。而在沿海地区的农业和渔业地区的传教方式也逐渐转变为适应巴尔干半岛北部农业和牧业的传教方式,例如沿海以橄榄油、鱼肉和面包为宗教仪式的材料,进入半岛北方就改变为其他植物油和面包为主,特别是由于半岛北方气候寒冷,教堂建筑也因地制宜地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在半岛南部以希腊语为主的传教活动适应当地希腊人占多数的情况,到半岛北部以斯拉夫人为主要的环境中也就必然进行相应的调整。正如俄国著名拜占廷专家乌斯本斯基所说:“毫无疑问,基督教开始传遍保加利亚的时间更早些。……甚至早在8世纪君主宫廷里就有许多基督徒”^②。

拜占廷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势力不仅在巴尔干半岛中部和南部地区逐步恢复,也对奥穆塔格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事实上,两国的和平是建立在双方实力平衡基础上的,其前辈血腥战争的记忆并没有丧失,民族对立心理仍然长期存在。从保加利亚人方面来说,其上层贵族既希望通过接受拜占廷人的政治模式以保持对统一国家的统治,并从拜占廷人的生活方式中得到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方法,但是,他们又担心拜占廷人通过宗教文化渗透实现其政治控制的目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作为从北方入侵并定居在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人的后代,拜占廷人不仅没有忘记他们祖先之间的战争,而且一直将他们视为外族入侵者,一直在寻机消灭保加利亚国家或至少要把他

^① John Wilkes, *The Illyrians*,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1992, pp. 234—250.

^② 转引自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282. George Ostrogorsky, "The Byzantine Background of the Moravian Mission",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19 (1965), pp. 1—18.

们变为拜占廷帝国的臣民或附属国。而那些参加过早期入侵战争的老战士和贵族,更是将拜占廷人视为保加利亚人的世仇夙敌,这些人对保加利亚国家政策影响极大。这些决定保加利亚国家政策的阶层尤其注意坚持本民族的古老习俗和原始信仰,即保加利亚人从伏尔加河流域大草原游牧生活中保留的风俗习惯,以及对最高战神及祖先的崇拜。他们将这些视为保持政治独立和民族特性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当拜占廷人利用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文化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时候,这就显得越发关键。奥穆塔格及其后继者曾经采取了反基督教措施,强制要求数万拜占廷战俘和被掠居民宣誓放弃基督教信仰,遭到拒绝,其中一些宗教领袖例如亚得里亚堡主教曼努埃尔(Manuel)甚至因此被处死。奥穆塔格的接班人、其子马拉米尔(Malamir, 831—836在位)为阻止基督教影响的蔓延,被迫处死接受洗礼并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亲兄弟恩拉沃塔斯(Enravotas)^①。

奥穆塔格及其后继者正是抱着这种深刻的疑虑采取了一些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他们在统治中不得不采用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制度,使用希腊语记录和对外交流。另一方面,他们对基督教在保加利亚人中的传播极为恐惧,禁止保加利亚人接受基督教信仰,迫害传教士。尽管保加利亚上层采取抵制拜占廷文化影响的政策,但是,这种影响却越来越强烈。首先是保加利亚君主需要拜占廷工匠建筑王宫和其他纪念物,以向臣民显示专制权威、赫赫武功和其他丰功伟绩,树立其绝对权威。现代考古学的诸多发掘证明,许多纪功碑的石刻和墓志铭文都是奥穆塔格时代留传下来的,其中个别的铭文是使用希腊字母拼写古保加利亚语言,但绝大多数是直接使用希腊民间语^②。这说明当时的保加利亚

^① 事实上,信仰问题只是保加利亚宫廷内部争夺最高王权的一个借口,马拉米尔处死恩拉沃塔斯的政治目的是翦除一个政治对手,正如君士坦丁以保护基督教徒而攻灭其妹夫李锡尼一样。Will S. Monroe, *Bulgarian and Her People*, Boston: The Page Co. 1914, pp. 12—23.

^② John Beddoe, "On the Bulgarians",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8 (1879), pp. 232—239.

人有民族语言而没有独立的文字体系,他们还不得不使用希腊语言文字,在相当长时间里将希腊语用作官方语言。不仅如此,他们还借用拜占廷帝国的行政组织建制和官职名称,在首都普里斯卡设立朝廷,连汗王奥穆塔格为他本人建造的陵墓也仿效拜占廷皇帝的铭文,“人是要死的,即便他尊贵地活过,其他的人则要出生;让新生的人注视着这座陵墓,记住它的建造者。这位君王的名字是奥穆塔格大汗,神赐予他长命百岁”^①。再者,战争时代被保加利亚人关押的大量战俘和掠夺的拜占廷俘虏,此时也通过婚姻和其他形式融入保加利亚人社会,他们人数众多,成千上万,成为拜占廷文化最好的传播者,因为无论是当奴隶还是君主的奴仆,他们保持的生活习俗和基督教信仰比保加利亚人原始信仰和习俗更有吸引力。保加利亚人各个阶层,甚至王族成员也逐渐接受了拜占廷人的影响,这个过程可以被视为“拜占廷化”,类似于他们经历过的“斯拉夫化”。

保加利亚人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拜占廷文化和基督教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原因的。首先,保加利亚人在入侵和定居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从半游牧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其生活风俗的改变是心理观念改变的结果,必然引起他们原始的社会制度的改变。他们必须放弃在草原地带流动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必须使其原有的多神教信仰转变为一神教信仰,以适应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需要。其次,保加利亚人与斯拉夫人的结合,即保加利亚人经历的斯拉夫化过程,使他们在9世纪大体接受了斯拉夫人的文化,而当时在保加利亚人中已经有相当多斯拉夫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和那些因战争而进入保加利亚社会的拜占廷人一起,对保加利亚人产生广泛影响。再者,随着拜占廷帝国实力的恢复和对巴尔干地区控制力的加强,保加利亚人感到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同时,在保加利亚人的西北部,存在多个民族,其中威胁最大的是法兰克王国。如何在几个大国之间寻求生存

^① 引自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p. 82.

的机会,对于保加利亚汗王也是敏感和难于把握的问题。832年,马拉米尔汗王和法兰克加洛林帝国的皇帝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 814—840年在位)订立和约,确定了两国沿多瑙河中游和蒂萨河的边界。此后,伯利斯一世(Boris I, 852—889年在位)任沙皇时期,保加利亚国家更推行了亲法兰克人的外交政策,同时借助后者的势力向东部扩张^①。

当时,拜占廷人对法兰克人的东扩也深感忧虑。为了避免与法兰克人的直接冲突,拜占廷人采取积极的宗教和文化政策,与法兰克人争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巴尔干半岛北部民族。这一时期与法兰克人保持亲密关系的教皇也积极支持法兰克人,教廷向保加利亚人派遣特使,劝说他们皈依罗马教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拜占廷皇帝大力支持弗条斯选派饱学善辩之士前往保加利亚传教,而君士坦丁兄弟也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进行传教的。

在9世纪拜占廷人传教活动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对长期为敌的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传教。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虽然已经定居巴尔干半岛并与拜占廷人长期接触,但是直到9世纪中期其社会文化发展仍然相当落后,尚未形成本民族文字,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斯拉夫人定居区称为“文化真空”地带^②。在与拜占廷人的接触过程中,他们逐步开化,特别是当其大举扩张势力范围期间,他们在被征服地区感受到先进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优越性,因而迫切希望引进外来宗教文化,弥补社会精神生活的不足,以适应建立大国和强权的需要。9世纪中期,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为了扩大各自的影响,千方百计争夺当时尚未开化的保加利亚人,而自称为“沙皇”的伯利斯一世为了在斗争中击败政治对手,也积极观察和选择强大的靠山。拜占廷教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这一结果的最初原因还与摩拉维亚人有关。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②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282.

摩拉维亚人原属阿瓦尔人的一支,阿瓦尔人被击溃解体后,他们于9世纪初兴起,主要活动于巴尔干半岛北部潘诺尼亚地区。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Rastislav, 846—870年在位)统治时期,其发展达到顶峰阶段。在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 843—876年在位)的扶植下,摩拉维亚大公国发展迅速。但是,实力强大羽翼丰满的摩拉维亚大公国不甘心受人摆布,力图摆脱法兰克王国的控制,积极向拜占廷帝国和教皇寻求支持^①。同时,摩拉维亚人还对强大的保加利亚人存有戒心,担心保加利亚人与法兰克人联手从南、西两面夹击,因为伯利斯一世和法兰克人于860年重修和约,并允诺请法兰克传教士到保加利亚。862年,拉斯迪斯拉夫请求皇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842—867年在位)派教士帮助他们建立独立教会,并使用斯拉夫语言传教。这一要求显然带有政治目的,即建立与拜占廷帝国的联盟以对抗保加利亚和法兰克人之间的联盟。对此,米哈伊尔三世心领神会,立即指派大教长弗条斯物色和挑选了学识渊博的君士坦丁兄弟两人为传教特使。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选择非常正确。因为,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具有政治外交意义以及通过扩大拜占廷文化影响缓解巴尔干半岛民族关系的外交活动,所以担负传教使命的人必须精通基督教神学和古代哲学,掌握拜占廷帝国外交政策和帝国历史,以及熟悉保加利亚和斯拉夫人历史和民俗,且信仰坚定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这些素质恰好集中在君士坦丁身上^②。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 826/7—869年)和麦瑟迪乌斯(Methodios, 819—885年)生于拜占廷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高级官员之家,其先人可能具有一些斯拉夫人血统。君士坦丁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年轻时求学于君士坦丁堡,深得大学者数学家利奥和

① S. Runciman,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 104.

② Edward G. Farrugia, et. al, *Christianity among the Slavs: the Heritage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 by Pontifical Oriental Institute, Roma; Pont. Institutum Studiorum Orientalium 1988, pp. 34—45.

神学家弗条斯的赏识,学业大进。他学成后任神甫,供职于圣索非亚教堂,后担任哲学教师,曾出使哈扎尔汗国,在汗王的朝廷上与穆斯林阿匍和犹太教拉比进行过激烈的神学辩论,其雄辩的口才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受到广泛赞誉,也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名声^①。他在一封信中谈及不同信仰时说:“我们的帝国是基督的国度,正如先哲所说‘天上的神将建立一个永远不毁的王国,它不会被留给其他的民’,而将化作许多部分,并同化所有的王国,而它将万世永存”^②。麦瑟迪乌斯的学术天赋虽然不如其胞弟,但是其突出的组织能力使他仕途发达,曾官至省长。但是,他后来厌倦了官场生活,进入小亚细亚的一所修道院成为修道士和修道院院长。

863年,君士坦丁(也称希利尔)和他的兄弟麦瑟迪乌斯应邀前往摩拉维亚传教,受到拉斯迪斯拉夫的热情欢迎。为了完成用斯拉夫语传教的任务,他们使用希腊字母为斯拉夫方言拼音,创造了一种为斯拉夫人所理解的文字。这种文字包括43个字母,其中除了希腊字母外,还有他们自创的字母。事实上,他们自幼便生活在流行斯拉夫语的环境里,他们对这种语言的熟练掌握有利于后来的创造,但是,对新文字的创造也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史料表明,早在他们出发前数年,极有语言天赋的君士坦丁就在其学生的帮助下,已经创造出新的文字体系,并将传教中最常用的一些圣经篇章翻译为希利尔文字。他们的行为曾遭到拜占廷教会内保守派的指责,因为拜占廷人一直怀有深刻的文化优越感,认为除了拜占廷人以外的其他民族都是野蛮的、缺乏教养、需要启蒙和教化的民族,因此绝不能使用野蛮人的语言传教。教会上层保守派的意见除了有其来自古希腊时代的文化优越心理的深刻根源,还包含着对由希腊教士控制教职的垄断性被打破的担忧。但是这种反对没有酿成公开的争端,特别是以皇帝为首的世俗贵族从外交需要上

① 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南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相关段落。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73.

坚决支持的态度,使新文字最终形成。这种最早的斯拉夫文字也被称为“希利尔文字”,成为此后各种斯拉夫文字继续发展的基础,长期流行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住区和马其顿地区,直到18世纪,仍为克罗地亚人使用,对斯拉夫文明化和斯拉夫文化的独立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①。根据11世纪上半叶基辅洞穴修道院修道士涅斯托尔(Нестор)《往年纪事》的记载:“这二兄弟到达目的地后,首先是创造斯拉夫字母,翻译《使徒行传》和《福音书》。斯拉夫人用自己的语言听到颂扬上帝的伟大,感到欣喜万分。后来他们又翻译《圣诗集》、《八重唱赞美诗集》,以及其他一些典籍”^②。此后,他们留在宫中专门从事《新约》等宗教经典著作的翻译。在此过程中,拉斯迪斯拉夫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组织聪明好学的年轻人在新建立的学校中跟随君士坦丁学习,帮助他进行古希腊文书的整理注释。同时,他们还积极培养斯拉夫夫人教士,推动独立教会的成立。

听命于罗马教皇的法兰克人传教士当时也在摩拉维亚传教,和君士坦丁兄弟展开竞争,他们同样将拉丁教会的祈祷仪式和弥撒词翻译为斯拉夫语的拉丁文字,但是这种文字缺乏系统,难于掌握,最终被淘汰。而君士坦丁创造的文字更符合斯拉夫人的语言传统,特别是他们兄弟及其弟子翻译的大量基督教经典、早期教父作品、当代拜占廷神学著作和古希腊文史哲杰作不仅能满足信仰而且能满足文化上的需要,从而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奠定了斯拉夫语言发展的基础。君士坦丁兄弟两人翻译的作品,不仅译文精确传神,而且合辙压韵,其翻译水平无人可比。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们对于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两种语

^① 今天使用的多种斯拉夫语言文字仍以希利尔文字为基础,但是有一些变化,例如俄语有32个字母,保加利亚语有30个字母,乌克兰语有33个字母,塞尔维亚语有30个字母,其中俄语变化最大。这些国家的东正教会至今仍然使用希利尔文字印刷。目前,有关希利尔创造的文字问题存在争论,主要意见认为他创造的文字体系是更为复杂的格拉哥里提克文字,而目前被称为希利尔文字的文字体系是后来由麦瑟迪乌斯的学生根据希腊安色尔字体创造的。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p. 139—140.

^② 《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言文字都极为精通,且文学功底深厚,对基督教神学素有研究。由于君士坦丁兄弟早期翻译文本质量极高,因此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它们成为所有斯拉夫知识阶层的标准读本,也成为新一代斯拉夫学者的学术语言和整个东欧斯拉夫世界的国际语言。在君士坦丁兄弟的所有成就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希利尔文字的形成,在大约一代人时间里,这种文字体系更加完善,成为斯拉夫文明化的重要工具。此后陆续开展的翻译基督教经典、古希腊文献,开办学校等活动都被认为是斯拉夫文明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事件,而这一时期也被后人当作斯拉夫文明化的开端。

对拜占廷帝国抱有极大敌意的伯利斯一世与东法兰克王国重修和约的消息传到拜占廷首都后,立即引起拜占廷朝野的震动,因为这意味着法兰克人的势力将直接深入巴尔干半岛,直达色雷斯平原。皇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842—867年在位)立即调动军队,于864年向色雷斯北部边界地区运动,同时派出一支舰队沿黑海西岸北上。此时,保加利亚国内发生饥荒,军事上也未作好迎战的准备,因此在拜占廷军队逼近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与法兰克人达成的协议。864年,伯利斯一世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使节,明确表示放弃与法兰克人结盟,并同意接受拜占廷传教士。次年9月,伯利斯一世受洗皈依基督教。拜占廷人则停止军事行动,并许可一些保加利亚人到巴尔干半岛南部定居。这一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保加利亚人是被迫接受基督教信仰,而非自愿主动邀请拜占廷传教士;其二,接受洗礼的保加利亚沙皇伯利斯只是在宗教上皈依基督教,在文化领域接受拜占廷文化,政治上仍然保持独立,而没有成为拜占廷帝国的附属国^①。

伯利斯一世接受基督教信仰和强制推行基督教化的政策引起保加利亚保守派即氏族贵族的反抗,他们企图发动全国范围的起义,刺杀伯

^① 对于拜占廷作家关于保加利亚人因此成为拜占廷帝国附属国的记载,现代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那只是“拜占廷人政治哲学”的推理。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p. 84—85.

利斯,恢复保加利亚传统的古代信仰。为此,他采取高压手段强制推行新的国教,残酷地镇压了反对派贵族,下令处死策动起义的52名反叛者及其子女^①。据说,他后来对这次无情的判决心生悔意,并将错误归罪于其宫廷中的希腊传教士。但是,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中,伯利斯一世采取的强制措施无疑强化了中央集权,扫清了此后希腊文化和宗教继续传播的障碍,并最终引导保加利亚人走上了文明发展的道路。而后,他邀请君士坦丁的大弟子克莱蒙特到保加利亚传授文化,积极支持他建立独立教会和发展文化的活动。伯利斯一世因此被后人尊为保加利亚文化的奠基人^②。

欧洲国家关系的变动也影响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教活动。变动主要发生在摩拉维亚,因为这个国家毕竟远离拜占廷帝国,而他们的直接威胁来自西部近邻法兰克人。就在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到摩拉维亚人国家传教的第二年,虔诚者·路易就派遣大军入侵摩拉维亚地区,并迫使拉斯迪斯拉夫降服。随着摩拉维亚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动,君士坦丁兄弟的传教工作也变得更加艰难起来。罗马教廷支持下的法兰克人传教士采取排挤希腊教士的措施,使用希利尔文字编写的宗教仪式包括祈祷词和弥撒词原本适用于摩拉维亚人,此时都被更换为拉丁文本。因为,罗马教廷和希腊教会支持使用其他民族文字传教的习惯不同,教皇不允许任何民族使用拉丁语以外的其他民族语言传教或举行宗教仪式。显然,拜占廷教会传教活动的成功不仅靠君士坦丁这样出色的传教士,而且需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缺乏摩拉维亚人君主的保护,他们的活动就陷入困境。特别是当支持他们的拜占廷帝国与保加利亚人进入战争状态,他们所属的希腊教会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与争执时,他们的处境就更加艰难。拉斯迪斯拉夫尽其所能,支持他们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195页。

^② 现代学者就此提出质疑,究竟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是对拜占廷人有利还是对保加利亚人有利。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3.

的活动,但是迫于法兰克人的军事压力,不能继续给与他们如同以前一样的支持。不久,欧洲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动,极力扩大教皇权的尼古拉斯一世与德意志人发生矛盾,他对日耳曼人传教士在世俗君主支持下,靠军事力量不断向东扩张势力范围表示不满。为了制约日耳曼人传教士势力的发展,他对君士坦丁兄弟表示公开支持,并于867年邀请他们到罗马访问^①。

君士坦丁兄弟离开摩拉维亚后,首先在潘诺尼亚地区的斯拉夫夫人中逗留了几个月,继续扩大希腊教会的影响。他们所到之处受到斯拉夫夫人的热情欢迎,后者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一些屈服于法兰克人军事压力的斯拉夫君主也如拉斯迪斯拉夫一样,热情款待他们,组织贵族听取他们使用斯拉夫语进行布道或参加他们主持的宗教仪式。同年,兄弟二人到达威尼斯,当地拉丁教会立即组织教士对他们进行围攻,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在摩拉维亚遭遇的反对。这些罗马教士咒骂他们是“落在鹰群里的乌鸦”,指责他们违背基督教只能使用希伯来、希腊和拉丁三种语言传教或主持宗教仪式的传统,攻击他们使用斯拉夫语讲经,嘲笑他们发明了什么新文字。君士坦丁兄弟发挥其擅长“舌战群儒”的特长,引经据典证明所有的语言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上帝恩准使用所有语言传播其福音。当拉丁教士指责他们是“使用三种语言以外传教的异端”时,君士坦丁引用《圣经》的话“那说方言的(指希伯来文),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造就,那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若

^① Edward G. Farrugia, et. al, *Christianity among the Slavs: the Heritage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 pp. 241—246.

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①其雄辩的口才使拉丁教士接连败下阵来。其保加利亚弟子甚至提出了更为激烈的反驳,认为只有斯拉夫语言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圣人创造的,是上帝的恩赐,而拉丁教士坚持的“三种语言”都是异教徒创造的,他们的理论依据显然来自他们的老师。

876年冬季他们到达了更加温暖的罗马,受到新教皇哈德良二世的热情款待。此时,教廷已经与摩拉维亚公国的邻国保加利亚达成默契,保加利亚准备接受罗马教会传教,因此,教皇也希望通过君士坦丁兄弟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斯拉夫世界。他们在罗马受到了空前规格的接待,因为他们随身带来了早年被拜占廷皇帝流放到克里米亚地区并客死他乡的罗马主教克莱蒙特(St. Clement)的遗骨。教皇没有涉及使用何种语言传教的争论,而是充分肯定了他们在斯拉夫国家四年的传教成就,高度赞扬了他们作为福音传播者和基督教学者的声望,而教皇热情接待他们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们在东欧和中欧地区斯拉夫人中的威望以及这些地区君主对他们的支持扩大教廷的影响。事实上,当时罗马教皇与德意志(即东法兰克王国)君主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为争夺对欧洲教会事务的主导权矛盾逐渐升级。在这一中古国际关系转变的大背景下,哈德良二世对君士坦丁兄弟的支持是深谋远虑的行动,因为否定他们使用斯拉夫语传教有可能把这个地区的广大斯拉夫基督教徒推入德意志教士一边,而支持他们则会扩大教廷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当然,这种支持也具有一定的危险,因为他们毕竟开启了使用其他民族语言传教的先例。最终,哈德良二世颁布了允许君士坦丁兄弟使用斯拉夫语举行基督教仪式的特许状^②。

① 他在辩论中还质问:“难道来自上天的雨水不是同样地落到所有人的头上吗?难道阳光不是一样普照所有人吗?难道我们不是一样呼吸空气吗?”为什么斯拉夫语言就低一等。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51. 经文引自《圣经·新约》(中国基督教协会中文版),哥林多前书,第14章。

② Edward G. Farrugia, et. al, *Christianity among the Slavs: the Heritage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 pp. 250—252.

869年2月14日,42岁的君士坦丁积劳成疾,因偶感风寒病逝于罗马。根据麦瑟迪乌斯的请求,他被下葬在圣克莱蒙特教堂。临终前几周,他宣誓成为修道士,取名希利尔。此后,麦瑟迪乌斯继续从事斯拉夫教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工作,并争取教皇正式批准他成为潘诺尼亚地区的大主教和教皇在该地区的代表,其管辖范围包括潘诺尼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一部分。870年,当麦瑟迪乌斯回到摩拉维亚公国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支持他们兄弟传教的拉斯迪斯拉夫被其侄子斯瓦托布鲁克(Svatopluk)推翻,后者篡夺了大公权力后,宣布承认虔诚者·路易的宗主权,摩拉维亚公国遂成为德意志王国的附属国。他还支持德意志教士剥夺了麦瑟迪乌斯的大主教权,在虔诚者·路易的授意下,借口麦瑟迪乌斯篡夺了当地的主教管辖权,将其逮捕并移交东法兰克王国,关押在士瓦本监狱中达两年半之久。直到873年,新教皇约翰八世(John VIII)干预此事,说服虔诚者·路易和巴伐利亚主教释放了麦瑟迪乌斯。但是,麦瑟迪乌斯在当地的处境并没有好转,特别是在神学上面临“和子句”产生的难题,因为作为拜占廷教会的传教士,他坚决反对东法兰克教士在神学上的错误^①,使他一直陷于和敌对教士的争论之中,而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同时,其管理教会事务的工作完全处于当时中欧地区变幻无常的政治动荡中,无论斯瓦托布鲁克还是教皇对他的态度都是时而支持时而冷淡,特别是来自教廷的变动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约翰八世在880年致斯瓦托布鲁克的

^① “和子句”filioque 是指西欧教会在5、6世纪时将《尼西亚信经》中“圣灵自父出来”一句改为“自父和子出来”,故名“和子句”。这一改动遭到希腊教会和其他东方教会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对全基督教共同认可的信条作了篡改,而且涉及当时拜占廷教会和罗马教会的关系。9世纪时“和子句”纠纷逐渐升级,引发一系列斗争,成为中古时期东、西欧洲基督教争论的重要神学问题。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

信中还在为他们以斯拉夫语传教辩护^①，而约翰八世的继任者就公开反对以其他民族语言传教和举行宗教仪式了。

麦瑟迪乌斯于881年回到阔别18年的家乡，应瓦西里一世的邀请访问了君士坦丁堡。这次访问是在拜占廷帝国与罗马教廷关系缓和以后安排的，因为接受了教皇任命的麦瑟迪乌斯在此之前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大教长几乎断绝了联系。很多法兰克教士对此幸灾乐祸，认为这位由拜占廷人安排的希腊传教士肯定得不到弗条斯的原谅，原因是弗条斯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大教长职位一直没有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而由他一手安排并大力支持的麦瑟迪乌斯竟然接受了教皇的任命。皇帝瓦西里一世和弗条斯大教长热情接待了他，并大力支持他继续在斯拉夫人中开展教会工作。他的弟子和得力助手有的留在君士坦丁堡收集翻译宗教文献，有的被派往其他地区的斯拉夫人中传教。事实上，拜占廷皇帝和教会也希望利用麦瑟迪乌斯在斯拉夫人中的巨大声望扩大帝国的宗教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利用其成功的传教经验和斯拉夫语言文字的宗教文献对其他斯拉夫国家展开传教活动，毕竟在拜占廷帝国北部存在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斯拉夫人国家，他们的基督教化和对拜占廷文化的认同将有利于帝国的安全。几年后，当麦瑟迪乌斯的弟子和门徒被威尼斯人扣留时，瓦西里皇帝还亲自派遣使节将他们解救出来。此后，麦瑟迪乌斯以主要精力翻译基督教经典和拜占廷立法文献，他不仅仔细修改了他协助君士坦丁翻译的基督教宗教仪式祈祷词和《圣经·新约》，而且在其本人学生的协助下翻译注释了《圣经·旧约》的部分章节、希腊教父作品、拜占廷历代法典和皇帝法令中涉及教会的条款、拜占廷帝国著名法典《法律选编》。885年，麦瑟迪乌斯不堪法兰克教士的骚扰，在缺乏世俗君主保护和教皇支持的情况下，病

^① 约翰八世在信中指出：“用斯拉夫语唱弥撒，或阅读翻译注释准确的《新旧约全书》中神的教诲，……肯定不违背信仰或信条，因为上帝既创造了希伯来、希腊和拉丁三种主要的语言，也创造了他自己赞许和荣耀的其他所有语言。”J. P.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Paris 1844, p. 126.

逝于摩拉维亚。他死后,斯瓦托布鲁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主要的弟子打入大牢,其中包括他指定接任其大主教职位的哥拉兹德(Gorazd)、劳伦斯(Laurence)、安格拉留斯(Angelarius)、克莱蒙特(Clement)和纳乌姆(Naum)。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被驱逐出摩拉维亚,流亡到保加利亚。

对于拜占廷人积极支持君士坦丁兄弟传教活动的意图,学者多有分析。他们认为,这些活动的“目的完全符合皇帝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一世的外交政策”^①,而9世纪中期也是拜占廷帝国将单纯军事外交调整为宗教文化传播相配合,对巴尔干半岛文化扩张最频繁活跃的阶段。君士坦丁兄弟的传教活动是最重大的事件,对巴尔干半岛历史与文化发展走势影响极为深远,故本书给予极大关注。

由于拜占廷教会结束毁坏圣像运动后重新恢复正常活动,并与世俗君主关系更加融洽,因此以大教长弗条斯为首的教会决策层得以更为积极地参与国家的外事活动。在大约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一工作成就十分显著,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哈扎尔人也被拜占廷使节说服,允许在其人民中进行传教活动。君士坦丁兄弟在摩拉维亚传教活动的巨大进展,保加利亚人皈依了基督教信仰,塞尔维亚人也开始接受福音书传播,俄罗斯人首次接受了从君士坦丁堡派遣的主教,这一系列政治和宗教外交活动最终结出了拜占廷历史上对巴尔干半岛施加影响最丰硕的成果,其空前绝后的灿烂成就凸显出其重要意义。无论当时的拜占廷人是否意识到这些活动的重要性,也许活动的组织者对此始料未及,但是其客观上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应该加以肯定的^②。拜占廷时期东正教体现的民族平等思想也是其能够在东欧地区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50.

^② 米哈伊尔三世可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些活动的重要性,他在附有希利尔文学的信中对拉斯迪斯拉夫说:“接受一种比金银宝石和暂时财富更加伟大珍贵的礼物,……将使你也能够名列那些以自己的语言报答上帝荣耀的伟大国家之林”。F. Dvornik, *The Makin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 373.

一,其一贯主张的各民族基督教徒使用本地语言传教和举行仪式的惯例也是它与罗马教会的一个重要区别。

保加利亚人接受基督教和拜占廷文化的意义极为深远。然而,围绕是否继续坚持接受拜占廷文化问题,在保加利亚国内出现了思想反复,甚至伯利斯一世本人也发生了动摇。显然,任何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要经历一番斗争。

伯利斯一世接受基督教信仰后不久即收到拜占廷大教长弗条斯的来信,弗条斯在信中详细谈到基督教仪式问题,特别强调伯利斯的基督教政策的英明正确,可以与欧洲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相比。作为拜占廷大学者和大教长的弗条斯,事实上没有必要写这样一封阿谀奉承的信件,其真实目的在于坚定伯利斯一世的信仰,因为他已经接到这位君主迫于国内压力而发生反悔倾向的报告^①。当时,伯利斯尽管采取了平息叛乱的措施,但是贵族和臣民中对拜占廷人的反感并未因此而缓解,对他采取的基督教政策的不满也在保加利亚各个阶层中扩大。特别是拜占廷传教士们的活动常常超出了宗教范围,他们在宣讲教义和主持宗教仪式中,有意无意地表示出明显的效忠拜占廷皇帝的政治倾向,这对于保持保加利亚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维护民族特性危害极大。因此,为了防止保加利亚国家被拜占廷政治同化,同时又要使其基督教化政策有利于保加利亚民族发展,伯利斯一世一方面坚决清除反叛势力,另一方面向拜占廷皇帝提出建立保加利亚独立教会的请求。866年夏季,他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其理由是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已经存在的五大教区并不包括保加利亚人,罗马教区管理罗马帝国西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教区管理罗马帝国东部,只有巴尔干半岛北部尚未划归任何教区,因此独立的保加利亚教区可以承担这一管理职责。这一要求显然与拜占廷人的计划相悖,因为他们认为保加利亚人是入侵帝国的野蛮民族,对他们进行的基督教

^① Photios, *Epistolae*, 2, No. 36, pp. 120—125.

化只是实现其最终政治征服的一步。鉴于当时拜占廷帝国缺乏武力征服的能力和与罗马教会及法兰克人争夺保加利亚人的需要,拜占廷皇帝和大教长对伯利斯一世的要求避而不谈。

伯利斯一世显然对拜占廷人的表现很反感,他立即决定恢复与法兰克人的联系并接受罗马教会的传教士。同年夏季稍晚,他派遣特使前往皇帝虔诚者·路易的宫廷,要求重修友好关系。同时,他向罗马教廷派遣特使请求教皇派传教士来保加利亚。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 858—867年在位)抓住这一时机,立即派了两位高级教士到普里斯卡卡面见伯利斯,并呈上教皇的亲笔书信。教皇在信中详细回答了伯利斯提出的106个问题,清楚地指出了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的区别,着重分析了拜占廷人利用基督教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危险,并表明了从道义上同意保加利亚人建立独立教会的要求。可以推测的是,伯利斯的这类问题大概也同样向弗条斯提出过,但是,后者可能认为它们太过琐碎而未逐条答复,只是笼统地谈论了基督教的神学和礼仪问题。根据弗条斯的回信,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大多涉及日常宗教生活要求的细节,诸如没有带腰带是否可以领受圣餐、礼拜三和礼拜五是否可以洗澡之类^①。这两种不同的回答方式,在伯利斯看来,反映出教皇对他的尊重和拜占廷人对保加利亚人的蔑视,特别是教皇对拜占廷人的政治目的的看法完全符合他本人的意见。

事实上,伯利斯一世提出的问题反映了保加利亚国家基督教化过程中产生的深刻社会变化,以及保加利亚人对这种重大变化产生的疑虑。问题涉及大量保加利亚人因基督教化而引发的日常生活习俗的变化。例如,其中涉及饮食习惯的问题包括是否可以吃宦官宰杀的动物肉?哪些动物和飞禽可以允许基督教徒宰吃?在斋戒期过后的早晨何时吃饭等等;涉及日常行为的问题包括礼拜三和礼拜五是否可以洗澡?礼拜天是否可以性交房事?礼拜日和斋戒期人们是否可以工作?涉及

^① Photios, *Epistolae*, 2, No. 36, pp. 126—128.

保加利亚人原始信仰的公平习惯的问题如普通信徒为什么不能进行公共祈雨仪式？普通信徒在就餐以前为什么不可以在餐桌上画十字祝圣？涉及继续使用原始习惯法的问题如是否可以接受叛乱的非基督教徒的悔罪？基督教如何对待谋杀、偷盗、通奸罪行，这些重大罪行都可以得到宽恕吗？还是只要忏悔不要惩罚？罪犯在教堂里就可以获得庇护权吗？涉及原始部落尚武习俗问题如是否可以用马尾当作旗帜？战前是否可以占卜或举行唱歌舞蹈仪式？是否可以穿长裤和对刀剑起誓，或带护身符作战？士兵逃离战场或拒绝服从军令应如何对待？跨国变节背叛的士兵难道不应被判处死刑？士兵在战前没有作好武器和马匹等应做的准备该如何处罚？显然这些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都因为引进基督教而受到触动，特别是拜占廷传教士对这类社会生活的干预引起保加利亚人普遍的反感。同时，他提出另一类涉及宗教事务的问题，例如没有带腰带是否可以领受圣餐？信徒在教堂里站立是否要把双手交叉抱在前胸？一年中的斋戒期共有几天？大斋期圣餐礼仪是否每天都可以举行？妇女是否必需带头巾方可进教堂？提出这些涉及宗教仪式的问题表明，保加利亚人不仅不能适应新宗教的习惯，而且抱着普遍的抵触情绪，以至他们怀疑拜占廷传教权力的合法性。伯利斯一世就此明确提出如下问题：世界上总共存在多少真正的教区主教？罗马主教之下谁是第二位的主教？在教堂里举行基督教圣事时使用的圣油是否只能从君士坦丁堡生产并运往各地？希腊教会圣传崇拜是否有效？他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可能是希望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由于他面临社会变革产生的巨大压力，伯利斯一世准备改变初衷，断绝与拜占廷人的宗教联系，因此他也提出了相关问题，例如基督教国家如何对待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的？如何对待异教偶像崇拜？强制推行基督教信仰是否正确？与友善民族结盟的正确方式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教国家撤消与另一个基督教国家订立的约定该怎么处理？基督教国家是

否可以与非基督教国家签约等等^①。

尽管教皇没有答应其提出的保加利亚教会独立的要求,伯利斯一世反复斟酌后,决定接受教皇的传教。比较拜占廷人避而不谈的态度,他认为教皇提出的首先设立保加利亚总主教,而后根据教皇特使的报告再决定是否设立独立教会的建议更为可行。于是,他在866年下半年,接待了教皇特使和高级传教士,同时下令将希腊传教士驱逐出保加利亚国境。拜占廷人对此的直接反映是,大教长弗条斯立即向东部各教会发出通知,准备就保加利亚人的信仰变化召开宗教大会。他在通知中指出罗马教会在宗教礼仪和信条方面的诸多错误,分析了保加利亚人在拉丁教会的误导下采取的错误行动及其严重后果。这个事件也造成拜占廷基督教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关系紧张,教皇尼古拉斯甚至宣布开除弗条斯的教籍,而大教长弗条斯完全不理睬教皇的命令,在皇帝米哈伊尔支持和主持下于867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宗教大会,并正式决定开除教皇尼古拉斯的教籍,将罗马教会的信条和仪式指责为异端^②。这个足以导致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的事件却由于东、西教会的变故而发生戏剧性转折。同年,拜占廷朝廷发生宫廷政变,瓦西里一世(Basil I, 867—886年在位)登基,建立了马其顿王朝,同时将前朝宠臣弗条斯罢免,任命伊格纳条斯(Ignatios)为新的大教长。几乎同时,教皇尼古拉斯去世,867年12月由哈德良二世(Hadrian II, 867—872年在位)接任教皇。两大教会的新领袖私交甚好,故改变前任的政策,恢复友好关系^③。

伯利斯对事情的最新进展可能感到失望,特别是对军人出身的拜占廷新皇帝感到不安,于是重新对拜占廷教会示好。特别是当教廷拒

① 这封信件保存在梵蒂冈档案馆。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p. 87—93.

② Despina Stratoudke White, *Patriarch Photios of Constantinople: his Lif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Brookline, Mass.: 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 1981, p. 87.

③ Despina Stratoudke White, *Patriarch Photios of Constantinople*, pp. 230—256.

绝了他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保加利亚总主教,并要求他将任命提交教廷决定时,伯利斯更加坚定了倒向拜占廷人的决心。他派出保加利亚代表团参加了870年2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基督教世界宗教大会,听候大会对保加利亚人的决定。参加会议的多数主教站在拜占廷教会一边,而教廷的代表势单力薄。虽然后者一再重申,保加利亚教会归属教廷管辖的古代伊里里亚地区,因此应将其教会划归教廷,但是希腊教会和其他东方教区代表众口一词地辩驳说,巴尔干半岛都属于拜占廷帝国,因此保加利亚教会事务归君士坦丁堡教会管理。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皇帝瓦西里亲自下令接受保加利亚人的请求,允许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①。大会之后,保加利亚国家重新聘请回拜占廷教士,将罗马传教士赶出国境。大教长伊格纳条斯还亲自任命了保加利亚教区大主教,委任后者相对独立地负责保加利亚教会事务。保加利亚总主教虽然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隶属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但是其地位仅次于伊格纳条斯,位在其他主教之上。这就部分地满足了伯利斯的要求。此后,保加利亚教会根据伯利斯的意愿划分各地教区,由主教负责各教区事务。最初,这些主教也是由拜占廷人派任,大批随行教士和学者则充当了传播拜占廷文化的使者。许多保加利亚青年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学习,并在拜占廷修道院修炼,而后才能回国任教职。在这些年轻人中就有伯利斯的儿子西蒙^②。

晚年的伯利斯一世继续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其邻国摩拉维亚大公国当时已经调整了外交政策,转而亲近法兰克人,885年,麦瑟迪乌斯去世后,他们驱逐了拜占廷传教士,其中包括麦瑟迪乌斯的弟子克莱蒙特(Clement)和纳乌姆(Naum),他们在君士坦丁堡869年病故后继续坚持在

^① Stanislaw Turlej, *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the migration of the Slavs and church conflicts in the Byzantine sour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9th century*, trans by Marta Dabrowska, Cracow: Towarzystwo Wydawnicze 2001, pp. 198—204.

^② Adam Smith Albion, *Symeon, Tsar of Bulgaria (893—927), as seen through Byzantine Lens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pp. 23—45.

摩拉维亚大公国的传教活动。被驱逐后,克莱蒙特一行沿多瑙河顺流而下,来到保加利亚,受到热烈欢迎,被从边境护送到首都普里斯卡。伯利斯一世亲自召见他们,并坐而问道达一整天,仔细探讨基督教神学如何与保加利亚斯拉夫人的传统相结合的问题,显然,伯利斯仍然思考着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并使其民族文明化的同时,不引起巨大的社会反抗,使其民众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些外来事物。886年,克莱蒙特被派往保加利亚西部的马其顿地区,即今天的阿尔巴尼亚东部奥赫里德湖周围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还得到君主授权,在当地建立教堂和修道院,设立学校培养保加利亚神职人员。他在当地使用希利尔文字翻译希腊教会文献,使用斯拉夫语言传教,工作成就显著,信徒人数急剧增加,很快就使奥赫里德地区成为巴尔干半岛西部最重要的基督教圣地和斯拉夫文化中心^①。与此同时,纳乌姆被派往保加利亚东北地区的普里斯拉夫,并在那里建立了古代斯拉夫文学学校,在伯利斯一世及其儿子西蒙的大力支持下,培养了许多著名的斯拉夫学者。893年,克莱蒙特被任命为奥赫里德地区主教后,纳乌姆又受命前往协助他管理当地教会事务。

保加利亚国家的基督教化似乎可以确定其未来的进程了。然而,反复辟的斗争还没有结束。889年,身心疲惫的伯利斯一世主动退位,将沙皇的权力交给其长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889—893年在位),而后进入修道院,准备在平静中度过晚年。但是,弗拉基米尔辜负了他的愿望,这个儿子性格优柔寡断,生活放荡荒淫。那些曾在伯利斯一世统治时期受到无情镇压的旧贵族及其后裔乘机复辟,他们聚集在弗拉基米尔宫廷中,一方面满足其声色犬马的需求,另一方面鼓动他改变其父亲的政策。在弗拉基米尔统治的四年里,拜占廷基督教再次受到排挤,希腊传教士遭到迫害。弗拉基米为了与日耳曼王阿尔努夫(Arnulf of

^① Matthew Spinka,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Chicag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1933, p. 256.

Germany, 896—899 年在位) 签约而废除了与拜占廷人的和约^①。这一系列复辟活动和反基督教的政策损害了保加利亚的利益,特别是打乱了保加利亚人文明化的进程,有可能导致新的内乱。退位沙皇伯利斯一世对弗拉基米尔极为失望,特别是担心自己一生的事业可能毁在这个不肖儿子手里。893年,他从修道院直接来到首都普里斯卡,召集忠心的重臣贵族,重新执掌皇权,宣布废除弗拉基米尔,并按照拜占廷法典处以瞽目重刑,将其打入死牢。同年,他召集保加利亚各地贵族大会,决定由其第三个儿子西蒙接替皇位,确定斯拉夫语言文字取代希腊语为保加利亚官方语,迁都至普里斯拉夫^②。这是保加利亚旧贵族和复辟势力最后一次反扑,此后,新沙皇西蒙忠实执行伯利斯一世制定的国策,继续推行斯拉夫文明化,加强中央集权和斯拉夫文化建设,引进拜占廷政治和经济制度,极大增强了保加利亚的国力。伯利斯则重回修道院,直到907年病逝。

保加利亚人基督教化和文明化的进程昭示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融合是促进巴尔干半岛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其积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远远超过武力冲突方式的后果。正是由于拜占廷人采取的这一新的方式,才使巴尔干半岛开始进入宗教与文化整合的新阶段。但是这一过程充满了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甚至是流血的斗争。勿庸讳言,拜占廷文化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伴随着武力、杀戮、冲突和流血,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战争,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文明和理智战胜了野蛮和愚昧。而新生的斯拉夫国家及其文明又为巴尔干半岛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

^① Ian Grey, *Boris Godunov: The Tragic Tsar*, N. 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pp. 125—129.

^② Stephen Graham, *Boris Goduno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 210—215.

第四节 巴尔干半岛两大强国的对抗

10 世纪初的巴尔干半岛,在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后,国家间关系大体稳定。但是,巴尔干半岛内初步形成的政治关系还不稳定,尽管其宗教与文化纽带已经确定。换言之,巴尔干半岛经过拜占廷人与斯拉夫人之间最初的武力冲突后,逐渐完成了宗教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一个以拜占廷首都为中心的东方基督教世界和中古拜占廷文化圈初步形成,但是,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政治主宰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国家将展开新的斗争,以确定巴尔干半岛最高霸权的归属问题。

拜占廷帝国在完成了对半岛中部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宗教、文化征服后,比较牢固地控制着北纬 42 度以南地区,包括色雷斯平原的大部分、马其顿平原的东部和南部、塞萨利、阿提卡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伊奥尼亚沿海和亚得里亚沿海岛屿。拜占廷帝国还重视与北方各斯拉夫人国家保持良好关系,除了继续发展对保加利亚的宗教和文化控制外,进一步扩大对塞尔维亚人国家和蒙特内哥罗人血缘部落的传教活动,使他们先后接受了拜占廷教士传播的基督教信仰。作为拜占廷帝国的友好民族,塞尔维亚人和蒙特内哥罗人还派兵支援拜占廷军队收复被阿拉伯人占领的意大利南部领地的战争。同时,作为拜占廷帝国的附属国的威尼斯,则积极发展与拜占廷人的商业贸易,维护着亚得里亚海航路的安全^①。

在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下,斯拉夫文化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中重要的典型例证是保加利亚人的文化发展。伯利斯一世开始的事业,在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兄弟及其弟子克莱蒙特和纳乌姆积极参与下,由西蒙继续向前推进,保加利亚首都普里斯卡成为斯拉夫文化发

^① Peter Lauritzen, *Venice: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N. Y. : Atheneum 1978, pp. 24—35.

展的中心。保加利亚新沙皇西蒙(Symeon of Bulgaria, 893—927年在位)是伯利斯一世第三子,早年曾被具有远见的父王送往当时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之都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就学于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大学,不仅学习宗教理论,而且研究古典哲学,接受了系统的教、俗文化培养,因为“对知识的渴求引导他玩味古人的书籍”^①。直到30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拜占廷帝国首都,对拜占廷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有幸亲眼目睹拜占廷帝国皇宫宏伟浩大的气势和皇家贵族高官威严尊贵典雅豪华的生活,造就了他振兴保加利亚民族的文化素质。但是,其父亲伯利斯一世最初打算让他的哥哥弗拉基米尔接任沙皇,而安排他主管保加利亚教会,因此他遵照父命进入修道院,为担任保加利亚主教重任作好全面的准备。

然而,接任沙皇四年的弗拉基米尔因背叛父皇的事业而于893年被废黜,伯利斯一世遂将西蒙召回国,接替其兄。同年,西蒙宣布放弃修道誓言,取代弗拉基米尔担任沙皇。他继任保加利亚沙皇后,继续其父的政策,全面整顿国家,强化中央集权,在退隐修道院的伯利斯一世的帮助下,平息了旧贵族的分裂势力,统一保加利亚各个派别,同时大力发展过境贸易,使保加利亚成为拜占廷帝国与欧洲其他国家联系的中介国,成为巴尔干半岛、黑海和多瑙河沿岸国家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家实力迅速增强^②。西蒙长期生活在拜占廷首都,拜占廷文化的熏陶和本民族的现实使他明显感到巨大的差距,他不能容忍保加利亚国家的落后,特别是不能忍受祖国首都的寒酸。为了改变首都的环境,创造大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他继续伯利斯一世时期开始实行的措施,大力聘请拜占廷建筑师和艺术家,不惜重金全面规划建设普里斯卡,力图把保加利亚的首都建设成第二个君士坦丁堡,努力打造像君士坦丁堡一样的第二个人间天堂,以此强化保加利亚国王的尊严和富有。为了营造

^① Nicolai Mystici, *Epistola*, XX. 转引自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316.

^②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134—139.

帝王生活氛围,他不仅以身作则,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继续保持其在拜占廷宫廷留学时学来的言谈举止,而且严令其他王公贵族在宫廷中遵守温文尔雅的礼节,他自己则全面仿效拜占廷帝王的穿戴。大主教约翰记载,西蒙在宏大豪华的皇宫里,“身着织了金线的长袍,带着金光灿灿的金项链,腰间扎着紫色(拜占廷皇家色)的腰带,双肩披挂着珍珠饰物,还佩带着黄金宝剑”^①。

西蒙特别重视斯拉夫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他全力支持保加利亚境内的各项文化活动,特别注重将拜占廷文化与保加利亚的传统习俗相结合,极力使引进的拜占廷文化斯拉夫化。他一方面继续支持克莱蒙特和纳乌姆在马其顿地区的传教活动,出资在当地兴建教堂和学校,培养斯拉夫族的教士和翻译人才,另一方面在首都普里斯卡和附近的皇家修道院圣潘特雷蒙(St. Panteleimon)修道院,设立官办文学研究院,专门从事整理古斯拉夫口传文学和将古典希腊罗马教、俗文学作品翻译为斯拉夫语的工作。例如,斯拉夫教士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907年翻译了4世纪拜占廷著名的亚历山大主教阿纳斯塔修斯(St. Athanasius)的作品《批驳阿里乌派》,他因工作能力突出,后来担任了保加利亚主教^②。该学院的领军人物之一大主教约翰(John the Exarch)则整理翻译了拜占廷著名神学家大马士革人约翰(John of Damascus)的许多作品以及另一位神学家瓦西里(St. Basil)的作品,而西蒙本人亲自确定和校对约翰·赫里索斯托姆(St. John Chrysostom)著作节选本的翻译初稿,包括当时拜占廷语法学家乔治(George Choeroboscus)关于散文写作的论文在内的当代拜占廷作家的许多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被整理翻译为希利尔文本,成为斯拉夫人能够阅读的文献。除了翻译引进外,第一批由斯拉夫作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的书籍也出现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大主教约翰的斯拉夫语法书,修道士克拉布尔(Khrabr)的斯

^① John the Exarch, *Shestodnev*, ed. R. Aitzetmuller, 转引自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04.

^②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145—156.

拉夫语言教材^①。

这个时期保加利亚文化活动体现出几大特点：其一，当时从事斯拉夫文化创建事业的几代学人都是拜占廷文化的热爱者，他们都自称为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兄弟及其弟子克莱蒙特和纳乌姆的弟子；其二，当时的文化活动无一例外地受到包括伯利斯一世、西蒙在内的保加利亚统治阶层的保护和支 持；其三，这一时期文化活动的影 响极为广泛深刻，以至推动形成了波及整个东欧地区的拜占廷文化传播和斯拉夫文化建设的国际热潮，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各个民族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无论他们与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如何，都先后接受并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斯拉夫文化。西蒙时代的文化建设是斯拉夫文化发展史的奠基时代的最高峰，也是保加利亚文化发展的顶峰，以至后人把这个时代称为“保加利亚文化的黄金时代”^②。

西蒙早年的经历和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不仅要把保加利亚国家建设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强大国家，而且有朝一日自己也要成为拜占廷帝国首都的主人，建立一个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新的庞大帝国。他的政治抱负与 现代人所理解的“民族主义”有很大区别，正如奥伯林斯基指出的：“9世纪时，并不存在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族主义；至少在东欧，政治理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普世帝国的理想。”^③为此，他积极发展保加利亚国家实力，伺机扩张势力范围。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拜占廷帝国皇帝利奥六世(Leo VI, 886—912年在位)的警觉，拜占廷帝国和新兴的保加利亚王国这两大势力的较量日益频繁，争夺巴尔干半岛主导权的冲突不可避免。此后两国关系的恶化以至最终爆发长期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西蒙政治野心的膨胀和保加利亚国家与拜占廷帝国争夺巴尔干半岛的霸权。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158—165.

② George Ostrogorsky, "The Byzantine Background of the Moravian Mission",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19 (1965), pp. 1—18.

③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05.

双方的较量首先表现为贸易利益的冲突。当时,保加利亚人控制着拜占廷人对欧洲其他地区的陆上贸易通道,这种过境贸易在保加利亚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从保加利亚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谷物、牲畜、亚麻和蜂蜜,出口范围遍及巴尔干半岛各地,从而挤占了拜占廷商品原有的份额。从拜占廷帝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各种手工业制品,其中染色丝绸织物最为贵重。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贸易路线中最重要的摩拉瓦—瓦尔达河流域的商道受到冲击,这条道路的大部分通过保加利亚人所在的马其顿西部地区,自9世纪以后,便为保加利亚人控制。因此,拜占廷人在这个地区的商业作用有所下降,进而影响了塞萨洛尼基的商业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保加利亚和拜占廷两国实现和平,使得另一条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商道迅速繁盛热闹起来。但是,从贝尔格莱德到当时欧洲和地中海最大市场君士坦丁堡集市的道路也大多通过保加利亚人区域,因此沿这条商道的许多保加利亚城市,如西里斯特拉、瓦尔纳、普里斯卡、普里斯拉夫、尼斯、索非亚、腓力浦堡等,很快繁荣起来。其他商道也是如此,如半岛东部商路和沿黑海西岸的近海航道都在保加利亚人控制中^①。保加利亚人从这些商业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意味着原来属于拜占廷人的商业利益被保加利亚人夺走。

为了摆脱困境并遏制保加利亚过境贸易的发展,利奥六世指派两个希腊商人垄断对保加利亚的贸易,并将对保加利亚的贸易中心转移到拜占廷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这两个商人在朝廷支持下,不仅规定保加利亚人的商品必须在塞萨洛尼基商业货站进行交易,而且在贸易规定上大作手脚,处处为难保加利亚商人,不仅提高了保加利亚商品的税收,而且通关手续更加复杂,质量要求更加苛刻。拜占廷人的这一做法目的明确,就是摆脱保加利亚人对拜占廷国际贸易中间环节的控制。拜占廷人一方面将保加利亚人强制赶出君士坦丁堡市场,另

^① H. Charles Woods, "Communications in the Balkan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47, No. 4 (Apr., 1916), pp. 265—290.

一方面在塞萨洛尼基的实际管理中,暗中指使地方官员联合希腊商人限制保加利亚商人的活动。这在西蒙看来是拜占廷人的有意刁难,而且其对保加利亚经济的重大打击是他不能接受的。当双方的贸易争端提交拜占廷朝廷时,保加利亚商人自然受到冷落,而希腊商人得到偏袒。西蒙认为这是开启战争最好的借口,于是于894年首先派兵侵入色雷斯地区,大败拜占廷边防军队^①。

色雷斯平原东部正是拜占廷帝国的腹地,西蒙的入侵直接威胁首都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拜占廷帝国主力部队正在东部边防与阿拉伯人作战。利奥六世立即采取拜占廷人惯用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联合新兴的“马扎尔人”(Magyars)牵制西蒙继续南下作战。“马扎尔人”属于保加利亚北方的游牧民族匈牙利人的一支,在这个时期的拜占廷文献中被称为“马扎尔人”。此时,他们恰好刚刚从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西迁至多瑙河下游三角洲以北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与保加利亚人领土仅一河之隔。马扎尔人在重金诱惑下同意与拜占廷人结盟,从北方进攻保加利亚。利奥遂命令拜占廷帝国舰队从黑海进入多瑙河三角洲,将马扎尔人运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野蛮凶猛的马扎尔人军队因此顺利地进军多布罗加地区,大肆蹂躏保加利亚人腹地,洗劫城乡,直逼保加利亚首都普里斯拉夫,将城郊农村变为焦土^②。马扎尔人的入侵迫使西蒙草草结束对拜占廷人的作战,回军救援。

最初,西蒙经不住匈牙利军队散兵式作战的打击,多次失利。为摆脱两面受敌的困境,他假意向拜占廷帝国求和,以争取反击时间。精明的西蒙要求利奥派使者谈判,但是却将拜占廷使节利奥·赫埃罗斯发克特扣押软禁起来,不与之面谈,而是通过信件进行谈判。根据现在保留下来的14封信件,西蒙采取故意拖延时间的办法,或避重就轻只谈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198—206.

^② 这是“马扎尔人作为一个最文明民族的盟友第一次出现在欧洲战争的舞台上”。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316.

交换战俘问题,而不涉及交战和利奥做其教父的问题,或在遣词造句和标点符号上争论不休。事实上,他利用这个议而不决的谈判,阻止拜占廷军队北上。在维持南部前线的停战状态的同时,西蒙于895年至896年集中精力打击马扎尔人,迫使他们退回多瑙河北岸。为了彻底消除后患,他派遣使节携带重金出使位于马扎尔人东方的另一个游牧民族潘臣涅格人(Pechenegs),联合攻击马扎尔人。潘臣涅格人此时活动在第聂伯河流域,在保加利亚人的请求下,继续向西迁移,进入马扎尔人此前占领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使丧失了根据地的马扎尔人被迫向西翻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潘诺尼亚平原。西蒙在解决了马扎尔人的威胁后,立即集中兵力打击拜占廷军队,并继续进军色雷斯东部,进一步向君士坦丁堡逼近,迫使帝国释放所有保加利亚战俘。在保加罗菲格城战役中,西蒙取得了决定性胜利,896年双方订立了有利于保加利亚人的和约,拜占廷人被迫割地赔款,向保加利亚人提供丰厚的年贡^①。

但是,野心勃勃的西蒙对这些胜利成果并不满足,他要成为统一巴尔干半岛的拜占廷帝国皇帝。他不仅向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频频用兵,将这两个地区和阿尔巴尼亚尽行囊括在大保加利亚王国版图内,而且决心征服君士坦丁堡。912年,他首先向塞萨洛尼基进军,借口拜占廷人没有履行其提高年贡的承诺。但是,当他进抵离塞萨洛尼基城下仅20公里的地方,传来了利奥六世去世的消息,这似乎是上天为他提供的一个机会,可以实现其政治抱负。当时,能够继承拜占廷皇位的只有利奥年仅7岁的儿子,就是为了这个儿子的合法继承权,利奥与教会发生了严重冲突。为了名正言顺地成为“罗马帝国皇帝”,西蒙强迫当时担任摄政王的大教长尼古拉斯(Nicholas Mysticus)同意他的女儿与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etos, 908/945 - 959年在位)的婚约,从而名正言顺地成为拜占廷帝国皇帝的国丈。尼古拉斯此时为应付宫廷内争权夺利的斗争而焦头烂额,以军队总司令杜卡斯家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317.

族的君士坦丁为首的军事贵族集团阴谋叛乱,虽然叛乱失败,但是拜占廷人已经丧失了抵抗西蒙进攻的能力。913年8月,西蒙亲自率领大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其派出的其他军队也分别到达达尼尔海峡和科林斯地峡。但是,西蒙在此遇到了与其祖辈同样的难题,保加利亚军队在君士坦丁堡高大坚固的城墙下,找不到攻陷它的办法,和百年前的科鲁姆大王一样,他缺乏从海上攻击城防薄弱点的庞大舰队,只能望城兴叹。他能够严密封锁君士坦丁堡对外的陆地联系,但无法攻破城池。他能够选择海上的进攻方向,但缺乏海军力量和船队。西蒙被迫放弃武力进攻,主动提出谈判,企图通过谈判实现其战略目标。

拜占廷人的代表是大教长尼古拉斯,他全权负责与西蒙率领的保加利亚人谈判。根据现存的912—924年间他们两人间的信件,尼古拉斯严厉指责西蒙是欺负拜占廷年幼皇帝的“暴君”,是违背上帝意旨的“篡位者”,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进攻,将遭到上帝严厉的审判,将受到开除教籍的惩罚。而当西蒙兵临城下后,尼古拉斯只能好言相劝,奉劝他领兵回府。可能在此期间,尼古拉斯答应了西蒙的要求,同意两国王室联姻。913年9月,尼古拉斯还为西蒙加冕为“保加利亚人的皇帝”^①。西蒙认为,他将作为拜占廷小皇帝的国丈入主君士坦丁堡,其政治理想即将变成现实,他们主宰巴尔干半岛的时机即将到来,因此撤军。临行前,他会晤了尼古拉斯,再次重申了与拜占廷人友好和睦相处的意愿和两国结亲的安排。但是,两人都没有预计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打乱了他们的安排。

一直受到尼古拉斯排斥的邹伊皇后(Zoe)于914年初控制摄政大权后,立即拒绝和废除了西蒙提议的婚约。消息传到普里斯拉夫后,西蒙深感愤怒和屈辱,在确认邹伊皇后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后,他立即发

^① 10世纪拜占廷作家有关这次事件的记载称,当尼古拉斯为西蒙加冕时,他戴在西蒙头上的不是皇冠而是他自己教冠上的黑布,因为西蒙的无知,误以为这就是皇冠。因此当时的拜占廷人认为沙皇被大教长戏弄,这是一次无效的加冕。Leo Grammaticus, *Chronographia*, ed. I. Bekker, Bonn 1842, p. 292.

动新的军事进攻,于914年9月占领亚得里亚堡,再度威胁进攻君士坦丁堡。邹伊皇后无力正面抵抗入侵,只能重新使用外交手段,派老资格外交使节约翰·伯加斯(John Bogas)前往俄罗斯南部草原,重金贿赂潘臣涅格人,请他们从背后袭击保加利亚人,并答应由拜占廷人提供渡过多瑙河的船只。西蒙在这场收买潘臣涅格人的竞争中失败,陷入两面受敌的被动境地。于是,他撤回两国结亲的建议,提出只要拜占廷人承认其君主权,保加利亚人即撤兵。这一要求遭到拜占廷人拒绝后,西蒙不得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双方经过认真备战,准备于917年进行决战。但是,潘臣涅格人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拒绝登上拜占廷舰队渡河作战^①,致使拜占廷军队再次遭到失败。西蒙的军队重新杀入色雷斯,并进逼君士坦丁堡。他在给尼古拉斯的信中,谴责尼古拉斯愚蠢误事,并告诫拜占廷人,曾经是阿瓦尔人奴隶的保加利亚人并不想统治为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并为他们带来自由的人,而是要惩罚欺骗他们的人。917年,拜占廷人又派遣迪拉修姆军事总督前往达尔马提亚地区,说服塞尔维亚君主彼得(Peter of Serbia)出兵援助,从西面进攻保加利亚人。这引起塞尔维亚人的内讧,反对彼得的派别立即向西蒙通报消息,并勾结保加利亚人提前进攻塞尔维亚。918年,彼得战败被俘,被关押在保加利亚人的监狱里。拜占廷人的外交努力失败后,巴尔干半岛一时落入西蒙主宰之下,尤其是巴尔干半岛中部更是保加利亚人的天下,其军队肆意打击敌对势力,又多次横扫色雷斯平原,光顾君士坦丁堡郊区。不仅拜占廷人难成其对手,而且其他北方民族也无法与其对抗。他还攻入塞尔维亚人地区,严厉惩罚那些胆敢与拜占廷人勾结并敌视保加利亚人的贵族。918年,保加利亚军队前锋部队甚至进抵希腊的科林斯

^① 据《往年纪事》记载,“潘臣涅格人首次进攻罗斯国家,在与伊戈尔缔结和约后,向多瑙河方向行进。当时,西蒙正深入色雷斯地区。希腊人向潘臣涅格人派遣使节求援。潘臣涅格人前来。当他们双方聚集合兵向西蒙发动进攻时,希腊将领却发生争执。潘臣涅格人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纠纷,引军离去。保加利亚人同希腊人展开一场混战,歼灭大量希腊人”。《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第88页。

地峡^①。

实事求是地分析,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实力决不在保加利亚王国之下,其所以在两国冲突中屡次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拜占廷宫廷内讧过于频繁激烈,几派势力轮番左右皇权,军队士气低落。919年3月25日,拜占廷帝国海军司令罗曼努斯控制了朝廷,同年5月,他精心安排并亲自主持了其女儿海伦和14岁的君士坦丁七世的婚礼,次年12月17日,便以国丈的身份爬上了皇帝宝座,与他的女婿共同治理帝国,称为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I, 920—944年在位)。而后,他在朝廷和军队中安插亲戚,对两个儿子委以重任,并加封他们为共治皇帝,全面控制皇权,企图建立新的王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计划引起朝野上下强烈反对,过去支持和反对君士坦丁七世合法地位的教俗贵族集团联合起来,最终推翻了罗曼努斯家族的统治,罗曼努斯被流放,成为修士,其儿子们被监禁、流放,最终被处死^②。在位期间,这位行武出身具有军事天赋的皇帝全面整顿国防,加强军队建设,进行了反击北方保加利亚人的战争,发动抵抗意大利南部萨拉森人的远征,并继续进行对阿拉伯人的战事。在东方前线,拜占廷人屡战屡胜,收复失地,重建幼发拉底河军区,并乘阿拉伯国家内乱,夺取塞浦路斯、克里特和罗得诸岛,而后水陆并进收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几乎重新恢复了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旧疆界。在西部前线,拜占廷海军控制了亚得里亚海域,迫使威尼斯人臣服,恢复了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权力,重新控制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的许多据点,如巴里,并将阿拉伯萨拉森海盗从伊奥尼亚群岛及附近海域全部清除。在北方前线,罗曼努斯的主要对手是保加利亚人。尼古拉斯在致西蒙的信中,承认拜占廷皇后的错误,但是同时再次指责西蒙发动战争的罪过,希望他停止基督徒之间血腥的厮杀。从其信中可以看出,为了对抗保加利亚人,拜占廷人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230—241.

② Steven Runciman, *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and his Reig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p. 245—250.

与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阿兰人、潘臣涅格人结成反西蒙联盟。同时，拜占廷人还继续玩弄联姻的手段，希望建立西蒙家族与罗曼努斯家族间的和亲关系，甚至提出以金钱、皇家丝袍和边境土地换取和平的建议^①。

924年秋，西蒙率领保加利亚军队最后一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他原计划与控制埃及的法蒂玛(Fatimid)王朝哈里发派出的海军联手攻击拜占廷人，因为，西蒙在与拜占廷人长期的军事外交较量中，深感仅靠保加利亚的陆军很难征服拜占廷人，他需要强大的海上力量帮助才能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一年早些时候，西蒙与法蒂玛王朝订立反拜占廷同盟，相约两国同时向拜占廷人发动进攻，保加利亚人从陆地、法蒂玛人从海上袭击拜占廷首都。但是，前往签约的阿拉伯特使和陪同的保加利亚使节在途中被拜占廷人劫持。拜占廷人将保加利亚使节关押在狱中，但却热情款待法蒂玛特使，不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且给予慷慨的贵重礼物，指派能言善辩之士反复劝说以动摇其志，通过大笔贿赂打动其心，终于使法蒂玛王朝放弃了进攻拜占廷人的打算。而后，罗曼努斯派使节赴法蒂玛王朝，说服哈里发单方面解除与保加利亚人的盟约，彻底粉碎了西蒙的计划^②。年迈的西蒙最终被迫放弃以武力征服拜占廷人和成为罗马人皇帝的梦想，主动要求和谈。924年12月，西蒙和罗曼努斯在君士坦丁堡北部金角湾临时搭建的码头上举行正式面谈，订立停战和约，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西蒙同意归还占领的拜占廷人土地，而罗曼努斯一世同意向保加利亚提供数量可观的年贡。在西蒙用蹩脚希腊语发表讲话后，罗曼努斯说道：“我听说你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但是我看你的行为并不符合你的言

^① J. P.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Series graeca*, Paris 1857—1936, ep. 27, col. 176.

^② Yaacov Lev, "Army, Regime, and Society in Fatimid Egypt, 358—487/968—109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9, No. 3 (Aug., 1987), pp. 337—365.

论:一个虔诚的人热爱和平和仁爱,因为据说上帝就是仁爱的化身,只有不纯洁和不虔诚的人才喜欢杀戮和非正义的流血。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我们早就知道你是个基督徒),那就停止你那非正义的杀戮和使人流血的犯罪,和我们这些基督徒建立和平,因为你自称是个基督徒。你是个终有一死的人,你也等待着死亡、死后灵魂复活、最后审判和上帝的报应;今天你活着,但明天将归于尘土;……当你面见上帝时,你将如何为你邪恶的杀戮回答上帝的问话?你将如何面对可怕而正义的审判呢?”^①

西蒙回到普里斯拉夫后,沮丧的心情一直困扰着他,一生奋斗的政治理想的破灭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虽然他在925年初开始自称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人的皇帝”,但是他再也没有出兵进攻色雷斯东部平原。此后,除了两国边境上的零星冲突外,巴尔干半岛似乎又恢复了和平。西蒙死于927年。临终前,他与拜占廷皇帝有过多次数书信往来^②。从这些书信反映出,不仅西蒙本人想结束与拜占廷人的战争,而且其臣民也厌倦了长年进行而无结果的流血冲突。罗曼努斯在信中郑重要求西蒙归还他在913年发动战争以后占领的所有拜占廷帝国领土,而他自称的“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并不属于他,相反,这个称号是属于拜占廷人的,甚至作为拜占廷皇帝的他(罗曼努斯)可以被称为“保加利亚人的皇帝”,因为保加利亚人就是在拜占廷帝国土地上。或者西蒙可以使用保加利亚沙皇的头衔,但那只适用于保加利亚国家。罗曼努斯提出,他们最好是平等相待,以兄弟相称,在基督教信仰的共同追求下和平相处。没有资料表明,西蒙晚年是如何理解拜占廷人提出的道理,但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从此停止,直到927年5月27日西蒙因心

^① Theophanes Continuatus, *Chronographia*, ed. I. Bekker, Bonn 1838, vi, 15, pp. 405—409.

^② 他还与尼古拉斯通信,后者在信中晓之以情,“不是用墨水而是用眼泪”写就了大量信件。Nicolai Mystii, *Epistola*, V.

脏病去世^①。

西蒙统治时期保加利亚人与拜占廷人的战争给半岛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也使该地区的正常发展遭到严重干扰。一些学者认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的争夺^②。这种意见不够深刻。事实上,在对“罗马皇帝”称号争夺的背后存在着对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争夺。当保加利亚人作为新的因素加入到巴尔干半岛国际政治漩涡中时,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拜占廷人来说,都意味着半岛传统政治格局的变动。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地区是以分散的社会组织状态定居下来的,他们后来被拜占廷化了,即政治上接受拜占廷帝国统治管理,文化上逐渐被拜占廷文化同化,宗教上皈依基督教信仰,生活习俗渐渐融合到希腊社会中。但是,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却一直保持统一国家的组织形态,他们是在早期斯拉夫人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其独立发展进程的。当他们以独立国家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时,必然与原来控制这一地区的拜占廷人发生冲突。由于拜占廷帝国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政治混乱,保加利亚人得以以独立国家形态定居成功,并获得拜占廷帝国统治者的承认。但是,拜占廷人并没有认识到,对其主权的认可意味着对自身原有利益的放弃。换言之,拜占廷人和保加利亚人都需要经历对巴尔干半岛实际利益重新分配的调整过程,巴尔干半岛半壁江山的自然资源、商业贸易的丰厚利润、来自农牧林渔各业的税收等等,都成为双方自觉或不自觉争夺的对象。这种对实际利益的争夺关系到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宗教传播和文化扩张只是这一核心斗争的辅助手段。保加利亚人在接受了基督教和拜占廷政治文化以后,仍然不因同为基督教信徒而放弃实际利益的争夺,这充分说明了,西蒙战争的性质是巴尔干半岛新兴民族向传统民族争夺生存空间和最高权力的最终形式。也许拜占廷人直到战争结束也

① Ivan Dujcev, "On the Treaty of 927 with the Bulgarian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32 (1978), pp. 217, 219—295.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13—114.

没有真正了解这一点,从皇帝到大教长还不厌其烦地大讲“基督教兄弟之间不开战”的道理。但是,保加利亚民族(不仅仅是西蒙个人的好战)的战争行动充分证明,他们就是要从拜占廷帝国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条件,为此就必须夺取巴尔干半岛霸权。西蒙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保加利亚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不仅在巴尔干半岛站稳了脚跟,而且一度成为半岛的新主人。拜占廷人是西蒙战争中的失败者,他们不仅没能维护其原有的领土,而且最终认可了保加利亚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在对巴尔干半岛实际利益的争夺中他们是弱者。

西蒙对“皇帝”称号的争夺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如果我们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甚至还包括以后与拜占廷人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看作巴尔干半岛的外来民族,那么对“皇帝”权力的争夺包括了两方面的意义。其一,这些外来民族在定居巴尔干半岛过程中承认了这个称号的表征意义,而这种承认又是以接受基督教信仰和拜占廷文化为前提的,表明他们对巴尔干半岛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可,否则,他们不必跟从拜占廷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同时,这一斗争也反映出这些外来民族大体承认了巴尔干半岛的政治传统,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统一帝国的政治理念和对统一巴尔干半岛的“大帝国”的承认,皇帝是这个帝国的象征。谁坐上皇帝的宝座,谁就代表了统一帝国,谁就拥有了号令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权力,也就拥有了占有、使用、分配巴尔干半岛所有利益的权利。西蒙梦寐以求的不是小小的保加利亚沙皇,这在其父亲时代已经得到了,他一再争夺的是君士坦丁堡皇宫里那个皇帝的宝座。这表明统一帝国的政治思想已经深入保加利亚人。其二,拜占廷人对待这些外来民族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最初,当斯拉夫民族大举迁徙定居巴尔干半岛时,拜占廷人认为他们是外来的野蛮人,因此千方百计加以排斥,或者是以武力将“野蛮人”赶到多瑙河以北,或者是在无力对抗的情况下逃避到其他地方,不与这些“野蛮人”接触。但是在争夺“皇帝”称号的斗争中,拜占廷人或自愿或被迫地接纳了这些外来的民族,特别是在不能将他们赶出巴尔干半岛

的情况下,通过宗教和文化传播,改造了“野蛮人”,并最终接纳了他们,将他们视为巴尔干半岛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把他们当作“基督教兄弟”。这种情况与数百年前,拜占廷人敌视哥特人并最终把他们赶出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证明,西蒙对“皇帝”称号的争夺促进了巴尔干半岛整体意识的形成,巴尔干半岛一体化的进程由此开始,后来进一步扩大到东欧世界。如果历史是可以假设的话,西蒙最终成为皇帝将有利于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融合,也有利于巴尔干半岛一体化的发展,巴尔干地区可能出现类似我国以黄河为中心的民族融合的局面,巴尔干半岛整体意识就将进一步发展。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是,拜占廷帝国没能担负起彻底整合巴尔干半岛的领导责任,致使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独立发展,他们在狭小的空间将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一切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顽强地保持至今,使这里多种矛盾在深层和浅层中酝酿积累,不能化解,巴尔干半岛遂成为欧洲的“火药桶”。

西蒙战争证明,拜占廷人推行的基督教化在前、文化同化在后、最终实现政治统治的政策是失败的。按照拜占廷人的这种设想,进入巴尔干半岛定居的新民族循此就能成为拜占廷帝国皇帝的臣民。但事实是,西蒙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完整的拜占廷式教育,一定获得了一套拜占廷贵族应该得到的系统知识,也一定懂得了拜占廷人的政治意图。而当他回到保加利亚后,实际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使他还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发展本民族的强大实力,进而才能体现出沙皇的权威。由此说明,信仰一致和文化认同只是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附属物,它们不能取代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当现实的利益冲突,特别是涉及民族生存的矛盾爆发时,它们不能解决核心问题,而只能发挥辅助性调解作用,或成为实质性行动的借口。一些学者对于西蒙的“自相矛盾”的举动感到不解,甚至认为这是所有纳入拜占廷政治文化轨道的民族领袖共同的特点,他们越是开化就越是为本民族的文化 and 政治独立

而担忧^①。事实上,西蒙战争表明,在现代国际法出现以前,只能以政治军事手段解决民族现实利益冲突,在涉及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占有、利用和分配问题上,惟有实力和强权能够作出最后的裁决。拜占廷人推崇的宗教文化解决方式只是他们军事外交手段的辅助方式,或者是他们采取的权宜之策。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无意中主动地扩大了拜占廷帝国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和生活方式各个方面的影响,从而造成了一个东欧世界。这个结果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西蒙战争还证明,巴尔干半岛的核心地带仍然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地区。这个地区由于多种因素而长期占据半岛发展的主导地位,至少在13世纪初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前,这种格局没有改变。在地理上,东部地区控制着北自黑海西岸,经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南至爱琴海和地中海东岸,以及这一地带附近几个富庶平原,包括多布罗加地区、色雷斯地区,从而占有巴尔干半岛农、牧、渔、林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带。在军事战略上,这个地带也比半岛中部和西部更重要,不仅便于大规模用兵,而且由于扼守交通命脉而获利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从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以后,历代拜占廷君主的经营也使君士坦丁堡成为东部的核心,而巴尔干半岛居民数百年努力精心打造和人力财力物力的积累使这座城市的核心地位更加牢固,在军事上牢不可破,经济上繁荣昌盛,生活上富丽奢华,政治上帝王之气,文化上灿烂辉煌。当时,不论来自何方的客人在这里都会自惭行秽,都不由自主地感到自身的粗俗。凭借这个城市多方面的优势,即便是无能之辈也可以维系对巴尔干半岛的主导权。西蒙如同其前辈和阿拉伯人一样,其政治理想和军事计划都在这个城市面前碰得粉碎。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14—115.

第五节 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兴起与灭亡

西蒙去世后,巴尔干半岛恢复了和平。927年10月,拜占廷帝国与保加利亚人订立和约,西蒙的接班人彼得(Peter,927—969年在位)与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的孙女玛利亚(Maria)结婚,并被拜占廷皇帝正式任命为保加利亚沙皇,同时彼得任命的保加利亚教会大教长也得到拜占廷人的承认^①。尽管拜占廷朝廷内对罗曼努斯的和亲政策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巴尔干半岛两大强国间的联姻为半岛地区带来了稳定的和平,这是两国人民期盼和欢迎的。玛利亚成为保加利亚沙皇皇后就为两大国家君主的相互沟通提供了稳定的渠道,她可以随时传达其祖父和丈夫的信息,避免因误解导致矛盾升级。对于拜占廷人来说,承认沙皇的地位早已是既成事实,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彼得的父亲西蒙就是沙皇。而现在的保加利亚沙皇不仅与拜占廷人保持友好关系,而且更因联姻关系使保加利亚国家成为拜占廷帝国实质性的附属国。在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中,保加利亚沙皇的地位排列在包括高加索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潘臣涅格人、马扎尔人、俄罗斯人等外国君主之前,但是在法兰克人和伊斯兰国家君主之后^②。由于彼得成为罗曼努斯的教子,那么他不仅在亲戚关系上低于后者,而且不能像其父亲那样处于与罗曼努斯平等的“基督教兄弟”的地位,而是像其祖父伯利斯与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三世一样,是教父和教子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在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中得到证实。在庆祝签署和约的庆典上,拜占廷宫廷书记塞奥多利(Theodore Daphnopates)宣读了拜占廷皇帝的贺信,高度赞扬是兄弟般的仁爱 and 宽厚使保加利亚国家与拜占廷帝国亲如一家,称西蒙自封的“罗马人皇帝”是一个错误,而彼得的行爲纠正了这个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245—250.

^②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cerimoniis*, trans. J. J. Reiske, Bonn 1829, pp. 686—692.

错误,并使保加利亚人最终摆脱野蛮,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①。

保加利亚人与拜占廷人之间的和平使巴尔干半岛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两国间通过多种渠道在多个层面上和平交往。首先,彼得注意克服朝廷内的反对力量,在登基第二年(928)就挫败了西蒙战争时代的老臣和强硬派贵族的政变阴谋,将其中的骨干分子流放国外,没收其家产。事实上,彼得对阴谋反叛贵族的政策比其前辈温和得多,因为支持其和平政策的社会基础非常广泛,各阶层对长期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犹新,而战争造成的破坏还没有修复。特别是从伯利斯一世以后几代人信奉基督教信仰后,保加利亚人逐渐认同了拜占廷文化。当拜占廷人承认保加利亚政治独立和国家自治的权力后,多数保加利亚民众认为没有战争的理由,厌战情绪在保加利亚朝廷内占了上风,即使保守的旧贵族也没有人再坚持古代保加利亚人对战神的原始信仰^②。其次,彼得继续推行扶植基督教的政策,在保加利亚全国普及斯拉夫语言文字的基督教文献和使用斯拉夫语传教,他还支持兴建了大量教堂和修道院,许多贵族也在王室的表率作用鼓励下资助基督教建筑,在色雷斯北部山区、马其顿山区出现了多个基督教中心,全国范围的朝圣活动也日益频繁。这些基督教中心从此都成为深入传播基督教思想和拜占廷文化的据点。彼得继续坚持伯利斯的基督教政策,推进自上而下的基督教化活动,使之逐渐转变为深入农村山区普通民众的教化运动,使基督教影响在大众中普及。此前,拜占廷传教活动大多集中在城市和上层社会。与之相比,新的传教高潮有两点不同,一是农民和普通民众成为传教的主要对象,二是保加利亚本民族传教士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在各级官员的支持下,以各地兴起的教堂和修道院为中心,基督教在民间影响迅速扩大,并与保加利亚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③。再者,保加利亚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 252.

②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255—265.

③ Done Ilievski, "The Macedonian Orthodox Church: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Slavic Review*, vol. 38, No. 2 (Jun., 1979), pp. 341—342.

经济获得发展,农村小土地生产发展迅速,同时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个别靠近拜占廷帝国的平原地区如多布罗加地区还出现了类似拜占廷大地产贵族的大土地主。但是,小农仍然是保加利亚农业经济的主体,拜占廷帝国的《农业法》在保加利亚各地流行,表明这部适合于小农生产生活的法律符合保加利亚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学者们认为:“11世纪后半叶,保加利亚还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大庄园、农民对大地主的经济依附、大地产主获得的免除税收和公共义务的特权”^①。事实上,早在西罗马时代,在少数个别地区就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长期的战争和年景不佳加速部分小农破产,将土地出售给附近的大地主以寻求保护。彼得统治初期的大瘟疫(927—928年)推动了土地兼并的发展。但是,保加利亚朝廷效仿拜占廷人采取了限制土地兼并和保护小农的政策。这些措施,对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保加利亚国家在融入拜占廷帝国政治文化体系过程中注意仿照后者的制度,采取拜占廷帝国的财政经济政策,对保加利亚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拜占廷人的重税政策在欧洲国家中闻名遐迩,但是这一政策在巴尔干半岛特别在保加利亚的消极影响特别突出,因为保持相当多农村公社平等残余习俗的保加利亚农民还不能彻底适应重税政策。而民间反抗剥削的斗争一般具有披着宗教外衣和反对拜占廷神学的特征,这是因为在一般保加利亚人看来,这种重税政策来自于拜占廷人。彼得在位期间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ct Lecapenus)关系密切,信件往来频繁,其中不仅探讨神学问题,而且涉及保加利亚的社会现实问题。由于塞奥非拉克特是皇帝罗曼努斯的幼子,因此他的回复意见也多代表拜占廷皇帝的看法。例如,彼得问及如何处理其国内新近兴起的异端,基督教法律如何处置这些异端,塞奥非拉克特在高度赞扬彼得笃信基督教和与其侄女的美满婚姻后,明确提出对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18.

于顽固坚持其异端学说的首要分子应处以死刑,而对其他异端分子尽量用缓和的手段劝说他们改变错误立场。在其罗列的异端言行中包括坚持善恶二元论信仰者、否认《圣经·旧约》者、反对基督化体说(即不承认基督的人性)者、反对婚姻和生育子女者,他指责这些言行都属于“混杂着保罗派异端学说的摩尼教”^①。这里清楚地表明,保罗派当时已经在拜占廷和保加利亚两国逐渐兴起。事实上,保罗派在传入保加利亚以前,已经在拜占廷帝国的亚洲领土上死灰复燃,保罗派信徒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向西发展,与入侵拜占廷帝国的阿拉伯人联合作战,一度将势力扩大到爱琴海东岸地区。8世纪期间,君士坦丁五世为加强拜占廷帝国北方前线,征召调集亚洲部队时,将保罗派信徒引进巴尔干半岛。872年,瓦西里一世出兵击溃阿拉伯军队,同时也将保罗派在亚美尼亚的根据地彻底清除。但是,该派信徒却在保加利亚人中悄然兴起,在下层民众中传教,并借助与拜占廷传教士宣讲的教义相似的机会,扩大保罗派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因为普通信徒很难区分他们在神学上的细微差别。保罗派坚决反对拜占廷文化和贪官污吏经济剥削的教义深得保加利亚下层农民的拥护。该派强调对使徒保罗的特别尊崇,强调其教义建立在福音书基础上^②。但是,保罗派作为基督教异端,其主要骨干力量基本上来自亚洲,是作为保加利亚国家中的外来移民,因此该派的活动大体局限在宗教领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下层农民的呼声,而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或农民运动。保罗派的历史作用在于,它直接促进了保加利亚本土发展起来的伯格米派运动。

“伯格米”(Bogomilism)一词为古斯拉夫语,意为“敬爱上帝的人”。

① Theophylactus, *The Explanation*, House Springs, Mo.: Chysostom Press 1992, II, 18. “保罗派”是5世纪流行于今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派别,以其领袖撒摩沙塔人保罗命名,反对教会等级制、禁欲隐居修道和崇拜圣像,主张善恶二元论神学,7世纪流行于西亚,10世纪在保加利亚发展到顶点。摩尼教由摩尼创立于3世纪,吸收基督教和佛教思想,形成二元论神学,对后世影响广泛。

② Janet Hamilton and Bernard Hamilton, ed., *Christian Dualist Heresies in the Byzantine World*, c. 650—1450, N. 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2—116.

这一派别于10世纪彼得统治时期产生在保加利亚。该派受保罗派影响,持两元论神学,认为撒旦和耶稣都是上帝之子,前者代表了堕落和邪恶,后者代表了正义和善良,善、恶相互对立斗争,誓同水火,不可调和。伯格米派认为压迫和剥削是“恶”的产物,最终将被“善”所消灭,提出“消灭一切压迫”的口号,呼吁社会公平和正义,同情下层受苦的民众,反对教会的特权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要求没收教产,平均分给穷苦人民。该派不仅反对国王、贵族和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压迫下层人民的特权阶层,而且在宗教领域主张废除教会等级、教阶制,主张废除除了婚礼外的其他一切教会礼仪,并针对基督教禁止离婚的教条,主张可以自由离婚,清除圣像、圣物、十字架,关闭教堂和修道院^①。很显然,伯格米派并非要求恢复古代保加利亚人的原始崇拜,也不主张复兴古老的生活习俗,而是以宗教为外衣提出下层人民的要求,代表受剥削被压迫者的心声。当时保加利亚教会作家哥斯马斯(Cosmas)是这样描写他们的,“他们把所有存在的东西都说成是魔鬼的意志:天空、太阳、星辰、空气、人、教会、十字架,他们把所有来自于上帝的东西都归因于魔鬼,他们在信仰中认为地球上所有活动的东西,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属于魔鬼”,而魔鬼低于上帝,并最终服从上帝,因为是上帝创造了可见的世界和人的灵魂,人是上帝的造物,其灵魂来源于上帝,但是其肉体被魔鬼所控制。他接着写道:“我们许多人都听到‘上帝怎么会允许撒旦攻击人?’这样幼稚天真的问题”,伯格米派认为,这是因为现实万物是撒旦创造的,因此,灵魂的得救需要抛弃物质世界,甚至教堂和修道院等教会建筑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表面上,这群异端们像是受难的羔羊,彬彬有礼、谦和文静,由于虚伪的斋戒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不尚空谈,也不大声说笑,甚至不让他们自己大喘气。他们总是躲避人们的视线,偷偷地做事,以便使人看不出他们与正统的基督徒有什么区别。一些人以为他们特别谦卑,认为他们是正统教徒,可能会给他

^① Dmitri Obolensky, "The Bogomils; A Study in Balkan Neo-Manichaeism",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64, No. 253 (Oct., 1949), pp. 537—538.

们指出得救的途径,因此会接近和询问他们‘如何拯救其灵魂’。他们象一只扑食羔羊的恶狼,先是低垂下眼睛,以谦卑姿态回答问题。……无论他们在哪里遇到随便一个单纯的或没有教养的人,他们都会散布其有害的说教,亵渎辱骂神圣教会的传统和教规”^①。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伯格米派提倡的原始宗教伦理主张,例如禁欲、平等、守贫等都与保加利亚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相近,他们提出的反对剥削压迫更符合下层人民的愿望,而他们将下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归罪于拜占廷人也符合保加利亚人的民族心理。该派的广泛传播,使众多保加利亚下层人民对上层统治和剥削阶层的不满逐步演化为反抗的实际行动。他们不仅反对正统教会坚持的教义,而且反对教会特权,不承认教士等级,并公开斥责一切家庭生活和婚姻,最终否认一切现行法律,与政府对抗,不服从自己的主人,放弃任何工作。一些伯格米派的激进分子发动反对沙皇的武装斗争,抢劫富贵人家的财物,攻击贵族和地主,呼吁和鼓动下层人民打乱现存的政治秩序^②。这些记载受到现代学者的质疑,因为按照这一派宣传的教义,他们事实上只是消极的躲避世俗生活,逃避撒旦的诱惑,等待上帝的拯救。他们只是表达下层人的心愿,而没有付之行动,更没有发动社会革命。保加利亚朝廷和拜占廷教会对于该异端可能产生的威胁有共同的敏感性,他们对伯格米派信徒进行了迫害,流放了一些骨干分子,没收了一批财产。此后伯格米派从保加利亚传入马其顿,又在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传播,甚至在拜占廷首都和其他城市也出现了该派信众。最终,该派经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传入意大利和法国南部^③。事实证明,拜占廷人的基督教信仰和文化传播不能掩盖拜占廷式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产生的弊

^① M. G. Popruzenko, *Kozma Presviter*, bolgarsky pisatel' X veka, Sofia 1936. 引自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p. 122—124.

^② Janet Hamilton and Bernard Hamilton, ed., *Christian Dualist Heresies in the Byzantine World*, c. 650—1450, pp. 213—216.

^③ Janet Hamilton and Bernard Hamilton, ed., *Christian Dualist Heresies in the Byzantine World*, c. 650—1450, pp. 233—240.

端,相反,它们可能成为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和外衣。特别是当下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处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以宗教信仰为掩护的反抗斗争就越发激烈。

一直保持对拜占廷帝国友好政策的彼得沙皇,经过近40年的和平建设,使保加利亚国力大为增强,为了修订即将到期的和约,他在朝廷上与保加利亚贵族商讨。此时,好战的军事贵族自认为实力强大,暗中策划争夺巴尔干半岛霸主地位,并迫使爱好和平的彼得向拜占廷皇帝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时,彼得的妻子玛利亚已经去世,他缺少了一个与拜占廷人沟通的重要渠道。因此,965年他向拜占廷皇帝派出使节,要求续修927年和约和增加年贡数额的举动,被拜占廷人误以为是公开的挑衅^①。此时,统治拜占廷帝国的是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Nicephorus II, 963—969年在位),他刚刚在东方战场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收复了被阿拉伯人占领的克里特、塞浦路斯、西西里和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因此对保加利亚人的“无理”要求非常愤怒。立即调兵遣将,陈兵色雷斯边境。同时,他派遣特使,携带重金前往基辅,收买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Svyatoslav, 942—972年在位),请求罗斯人派兵攻打保加利亚人。半岛局势骤然紧张。

967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率罗斯人军队侵入多瑙河下游地区,向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多布罗加的中心地区发动进攻,并战胜保加利亚人,夺取多瑙河下游许多城市。他还在多瑙河入海口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城市佩列雅斯拉维茨自立为王,同时向拜占廷人索取贡赋。罗斯人企图定居巴尔干半岛是拜占廷人始料未及和无法接受的,于是暗中活动,收买潘臣涅格人进攻基辅。968年冬季,斯维亚托斯拉夫接到潘臣涅格人

^① Janet Hamilton and Bernard Hamilton, ed., *Christian Dualist Heresies in the Byzantine World*, c. 650—1450, p. 245.

包围基辅的消息后,匆忙撤出巴尔干半岛回国救援^①。然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如同其以前的历代罗斯君主一样,继续推行南下政策,因此不久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南方地区更加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极大地吸引着他们不断冒险,长期推行南下政策。969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其母去世后,再度南下巴尔干半岛,率万余名士兵侵入巴尔干半岛东北地区,其中包括巴尔干半岛以北和俄罗斯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目的是抢劫财物和定居被征服地区。969年,他们占领了保加利亚首都普里斯拉夫,次年,夺取腓力普堡,并洗劫色雷斯北部地区。而后,他继续挺进色雷斯南部平原,迫使拜占廷人调集10万军队抵抗斯维雅托斯拉夫的人侵。斯维雅托斯拉夫以少战多,但在夺取战利品和新领土的巨大诱惑下,罗斯军队野蛮拼杀。战争进行的十分激烈残酷,最终斯维雅托斯拉夫取得了胜利。拜占廷人撤退后,斯维雅托斯拉夫继续追击,沿途大肆破坏,所过之处一片废墟,并一度攻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②。当时在位的皇帝约翰一世为争取备战时间,提出议和时,遭斯维雅托斯拉夫的拒绝。

971年,完成反击准备的拜占廷人大举反攻,皇帝约翰一世(John I, 969—976年在位)派遣300艘战舰从黑海逆多瑙河而上,同时亲自率领配备了“希腊火”火器和攻城器械的陆军,发动反击。他采用奇袭战,夺取罗斯人尚未来得及把守的巴尔干山脉隘口,从正面强行攻击罗斯人,并联合保加利亚人夺取了普里斯拉夫。同年4月,两军在普里斯拉夫以西的西西斯特利亚平原展开决战。拜占廷军队装备最为精良的重装骑兵彻底击溃原始装备的罗斯步兵阵营,而后趁胜追击,将斯维雅托斯

①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潘臣涅格人的行动与拜占廷人有关,但“很难免除是保加利亚人或是拜占廷人把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召唤来的嫌疑”。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29.

② A. A. Vasiliev, "Was Old Russia a Vassal State of Byzantium?", *Speculum*, vol. 7, No. 3 (Jul., 1932), pp. 350—360. R. J. H. Jenkins, "The Supposed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907: Evidence of the Pseudo-Symeon", *Speculum*, vol. 24, No. 3 (Jul., 1949), pp. 403—406.

拉夫围困在西斯特利亚城。陆地和水上的严密封锁持续了3个月，罗斯人陷入饥荒，被迫接受和谈条件。斯维雅托斯拉夫保证退出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以北地区，撤回本国，并保证不进攻拜占廷帝国在黑海北岸的领地，根据拜占廷人提出的要求，罗斯人同意在战时出兵帮助拜占廷人。而拜占廷人则同意，为罗斯士兵提供食品，开放封锁的多瑙河通道，并保证不唆使潘臣涅格人袭击撤退的罗斯人。在971年的保证书中，斯维雅托斯拉夫保证不再染指巴尔干半岛，“因此，我决不对你们国家抱有企图，决不强兵压境；决不覬覦你们的任何民族、你们的国家和希腊支配下的国家；决不覬覦赫尔松国和它的所有城市，也不覬覦保加利亚国”。“如果我和我的某个人，以及我的部下不遵守这些以前的条文，我们会遭受信仰的神——别伦和畜牧神沃洛斯的诅咒，犹如打碎的黄金板，将丧命于我们自己人的武器”^①。斯维雅托斯拉夫在撤退回国途中遭到潘臣涅格人袭击，后者拒不接受拜占廷人劝告，不想放虎归山，因此将斯维雅托斯拉夫击毙。这次战争再度粉碎了罗斯人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梦想，也导致保加利亚国家衰落，而使拜占廷帝国的北部疆界再次推进到多瑙河一线。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格局再度发生了变化。

当皇帝约翰一世凯旋回到首都，教俗贵族和全城百姓为之举行盛大入城仪式时，在他的俘虏中还有保加利亚沙皇和贵族。以皇帝和大教长为首的全体拜占廷贵族在城门列队，不仅向他授予皇冠和君主节杖，而且特意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仪式，用皇帝的御驾运送约翰一世从保加利亚人首都夺回的圣母像，由四匹白马牵引，同时命令保加利亚沙皇伯利斯二世跟随着马车，以示服罪。此时的沙皇是以战俘和罪人身份出现在拜占廷人的凯旋庆典上。在圣索非亚教堂举行的数千人的仪式上，皇帝将保加利亚沙皇的皇冠作为头号战利品供奉在神坛上，以表

^① 《往年纪事》的说法与拜占廷史料不一，它把停战的原因说成是“希腊人给他送去贡赋”，将斯维雅托斯拉夫撤出巴尔干半岛的原因说成是“回到罗斯去，带来更多的扈从队”。这些记载显然带有遮掩罗斯人占领保加利亚人国家进而定居巴尔干半岛计划失败的意图。王钺译注，第136—139页。

示对上帝的保佑拜占廷人收复失地的谢恩。在皇家教堂 50 米高的大厅下,面对巴尔干半岛两大强国数千高官显贵,伯利斯二世宣布放弃沙皇称号,取消保加利亚独立教会,接受拜占廷皇帝授予的“地区总督”官职,并成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辖区^①。971 年举行的这场盛大仪式标志着拜占廷人最终驯服了为害巴尔干半岛 3 个多世纪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拜占廷统治者借宗教谢恩活动,向巴尔干半岛各民族显示拜占廷帝国在半岛地区的主权,而保加利亚君主在这场仪式中扮演了屈辱性的角色,他们被迫承认在争夺巴尔干半岛霸权的斗争中的失败,承认拜占廷人仍然是半岛的主宰。这次仪式也是向其他民族表明,外来的“野蛮”民族从此纳入拜占廷帝国霸主权力的管辖下,迫使他们不仅承认拜占廷人的宗主权,而且接受拜占廷皇帝的任命,进而成为拜占廷帝国中高人一等的皇帝的特殊臣民。

在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中,保加利亚人目睹拜占廷人和罗斯人为争夺各自的民族利益而在自己家园里大打出手,保加利亚人实际上并非败于拜占廷人而是被俄罗斯人击败,而拜占廷人则是乘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战争疲弱之机收复失地。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拜占廷人仍然凭借其重新恢复的有限实力和传统的外交计谋坐收“渔人之利”,继续控制着半岛局势。这次战争涉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生活在半岛中部特别是马其顿北部地区相当大部分的保加利亚人并未受到战祸的涂炭,正是这些保加利亚人将成为拜占廷人更大的祸害,也正是在这里,正在兴起一支斯拉夫—保加利亚人的新兴力量。由马其顿总督尼古拉斯的儿子沙木埃尔领导的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再度成为巴尔干半岛的重大事件,争夺半岛霸主的斗争尚未得出最终的答案。

马其顿地区的保加利亚人是在拜占廷朝廷十余年内乱期间重新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虽然也称为保加利亚人,但在血缘上属于在小亚细亚地区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斯拉夫人部落,他们很可能是拜占廷政府

^① Andrew Blane and Thomas E. Bird ed., *The Ecumenical World of Orthodox Civilization, Russia and Orthodoxy*,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1974, vol. I, pp. 125—129.

为补充人力资源的不足,于7世纪末年迁入奥普西金军区的7万斯拉夫人的后裔,或762年迁入小亚细亚军区的21万斯拉夫人的后裔^①。这些斯拉夫人为躲避当地战乱而纷纷迁移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在远离保加利亚沙皇政治经济中心的多布罗加(Dobrudja)和莫埃西亚(Moesia)地区的偏远山区定居。10世纪期间,在部落联盟酋长尼古拉斯(Nicholas)的带领下迅速发展,势力扩张远到伊庇鲁斯(Epirus)和阿尔巴尼亚山区,先以普雷斯帕湖为根据地,后以奥赫里德湖周围地区为中心,并以奥赫里德为都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史称“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尼古拉斯去世后,他的4个儿子继续扩大保加利亚王国的势力。其中最小的儿子沙木埃尔(Samuel,973—1014年在位)统治时期,第一保加利亚王国进入强盛阶段,势力范围包括过去保加利亚国家和塞尔维亚人的疆域,即从黑海西岸到亚得里亚海东岸,萨瓦河以南到伊庇鲁斯山区和希腊中部地区,其总面积甚至超过了西蒙时代的保加利亚国家^②。沙木埃尔自称为保加利亚沙皇以后,首先争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Otto I,936—973年在位)的承认,而后重新宣布保加利亚教会独立,并得到罗马教皇本尼迪克特七世(Benedict VII,974—983年在位)的承认。

在拜占廷人看来,沙木埃尔的一系列行动不过是其附属民族的一次反叛,因此,他们拒绝将沙木埃尔称为沙皇,而叫作“保加利亚专制独裁者”^③。此时,军人出身的杰出皇帝约翰已经去世(976年),拜占廷宫廷内讧斗争正酣,东方前线也因为阿拉伯人乘机入侵而吃紧。拜占廷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权力在动摇,半岛局势出现失控趋势。980年,沙木埃尔向希腊中部进军,夺取希腊南北交通咽喉要地拉里萨(Larisa),

① Theophanis, II, 432.

② 关于沙木埃尔时期保加利亚王国的来源也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他本人宣称是西蒙的后人和继承者可能只是出于其统治权来自正统沙皇的政治考虑,不足为凭。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31.

③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p. 340—349.

打开了通往希腊地区的通道,揭开了保加利亚入侵战争的序幕。在随后数年内,他挺进塞萨利、维奥蒂亚、阿提卡各平原,一路未遭遇抵抗,而后占领科林斯地峡,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997年,他的一支部队在温泉关被击溃。而后,他将扩张方向转移到西部山区,从伊庇鲁斯山区北部出击,进军达尔马提亚地区,严重威胁了拜占廷帝国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中心城市迪拉修姆。沙木埃尔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和南部的扩张与西蒙时代相比,面积似乎更大些,但是,其对拜占廷帝国统治的威胁却要小得多,因为,西蒙的扩张是在半岛东部,并直接从色雷斯平原威胁拜占廷首都。

最初,拜占廷人曾经试图“清剿”保加利亚人,他们并没有重视这些反叛的“野蛮臣民”,也未动用主力部队,而是多由地方军队进行围剿,因此吃了败仗。当时,26岁的年轻皇帝瓦西里二世围攻马其顿中部城市萨尔迪卡时,因准备不足,久攻不下,且在其率军撤退途中遭到退入山地的保加利亚人的攻击,被迫遗弃辎重和火器逃亡,退守色雷斯战略要塞。沙木埃尔以为最终的胜利几乎就是囊中之物,他似乎可以再现西蒙时代保加利亚人的辉煌了。但是,他有所不知的是,这个瓦西里二世生性好战,他将难以成为其对手。不久,拜占廷人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整军备战。瓦西里也在东、西征战过程中逐渐成长为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正是他后来成为令保加利亚人闻风丧胆的常胜将军,并最终灭亡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

瓦西里二世(Basil II, 976—1025年在位)是罗曼努斯二世(Romanus II, 959—963年在位)的儿子,5岁时其父病故。因年幼无法即位,被军事将领以摄政王身份夺权。他早年虽不掌权,但经历了皇室内争权夺利的风风雨雨,在走马放鹰的生活中培养了刚烈果敢残酷无情的性格。少年时代,他无心向学,而对军事问题格外感兴趣,这对他一生独身,从军作战,可能有某些影响^①。在他18岁独立掌握皇帝大权以前的

^① John B. Bury, "Roman Emperors from Basil II to Isaac Komneno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 No. 3 (Apr., 1969), pp. 366—381.

13年里,母后塞奥发诺(Theophano)为保住他们母子的地位曾两度再婚,皇帝权力由继父福卡斯家族的尼基弗鲁斯二世(Nikephoros II, 963—969年在位)和约翰·吉米斯基控制。在此期间,他目睹了皇室内讧造成国家衰弱和外敌欺侮的现实,深刻地认识到充分行使皇权和加强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因此,即位之后,他立即摆脱大贵族的控制,强化中央集权。当时,帝国朝政把持在大贵族瓦西里·利卡潘努斯(Basil Lecapenus)和抵抗俄罗斯人入侵的功臣大将军巴尔达斯·斯卡莱卢(Bardas Sclerus)手中。瓦西里二世长大成人后,他们不仅继续左右朝廷大事,而且力图篡夺皇权。因此,瓦西里二世首先将巴尔达斯·斯克莱卢将军调任亚洲军区大将军,剥夺了其宫中职务,以阻止其对朝政的干预。巴尔达斯于是发动叛乱,自立为帝,进军小亚细亚地区,揭开了持续15年之久的内战^①。正是这场内战使年轻的瓦西里二世得到了锻炼,一改过去寻欢作乐、不务正业的生活,他身着深色服装,不配带首饰,专心于军国政务,亲自指挥军队和判决案件,甚至为此终身不娶。为了能够胜任从军作战和指挥战争的职责,他努力锻炼,成为优秀的骑兵和驾驭官兵将士的能手;为了充实国库,他不耻下问,学习财政知识,很快就成为理财的专家。法国拜占廷学家路易·布莱赫尔描写他:“有着战士的秉性,又是伟大的军事将领,而且兼有统治管理才能”^②。此后,瓦西里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皇权的措施,首先解除了大贵族瓦西里·利卡潘努斯摄政王的职务,将其囚禁于修道院,并没收其财产。而后,他罢免了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禁卫军司令的职务,把他流放到安条克。最后,他于988年平息了巴尔达斯·福卡斯和巴尔达斯·斯科莱卢发动的军事叛乱。在内政方面,瓦西里二世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巩固军区制、提高农兵地位和打击削弱大地产贵族的措施。996年1月1日,他颁布了著名的保护小农立法,该法废除了农兵必需服役

① Andrzej Popp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the Baptism of Rus'; Byzantin - Russian Relations between 986 - 89",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30(1976), pp. 195—244.

② L. Breni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P. 147.

40年方可拥有军役土地所有权的法令,规定所有自922年以后以任何方式从农兵手中获得的军役土地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土地原来的主人。他在这部立法的前言中,严厉指责诸如福卡斯等大土地贵族以非法手段大量占有小农土地的行为,例举大贵族地主非法占有土地近百年的丑闻^①。他亲自严厉处理违法的贵族,例如将朝廷命官菲洛卡利斯(Philokales)贬为庶民,没收其非法聚敛的大量家产;他还在讨伐巴尔达斯的途中,将盛情款待他的大贵族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 Maleinus)押解回君士坦丁堡,将其家产全部充公。为了使小农摆脱困境,他不顾大贵族的反对,强制推行税收改革,大幅度提高贵族纳税额度,减免无力纳税的小农税收劳役。这些措施使拜占廷国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加强,也为他进行对外军事征服与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兵源基础。

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廷军队几乎同时在4条战线上作战,即保加利亚人活跃的巴尔干半岛北部战线、阿拉伯人持续骚扰的叙利亚前线、高加索人蠢蠢欲动的黑海东南部前线,以及意大利前线,其中对拜占廷人威胁较大的是保加利亚人。瓦西里二世早就充分认识到保加利亚王国对拜占廷帝国的威胁,但是,由于国内叛乱的掣肘,无暇它顾。当沙木埃尔直取南方经济中心科林斯城(Corinth)时,他没有正面阻击,而是于994年向塞萨洛尼基以西数百里的维尔西亚(今韦里亚)和沙木埃尔王国中央地带的特利亚狄察(今斯特鲁加)派出两支奇兵,作出切断沙木埃尔军队后路的态势,迫使保加利亚军队急速退出希腊战场,后撤进入塞萨利山区^②。这一仗虽然没有取得显赫战绩,但是,瓦西里二世的战略才能初露锋芒,在初次较量中胜了一筹。但是,保加利亚人更

^① Kenneth M. Setton, "On the Importance of Land Tenure and Agrarian Taxat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the Fourth Century to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74, No. 3 (1953), pp. 225—259. G. Ostrogorsky, "The Peasants' Pre-emption Right: An Abortive Reform of the Macedonian Emperor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37, Parts 1 and 2 (1947), pp. 117—126.

^② R. Browning, *Byzantium and Bulgaria: a comparative study across the early medieval frontier*, London: Temple Smith 1975, pp. 167—169.

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10世纪末,保加利亚军队已经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夺取了通往意大利的海港底奥克利(Dioclea),并准备进攻拜占廷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这就迫使瓦西里二世平息内乱后立即亲临该城,整顿防线,制定反击战略,并于994年亲自指挥部队在该城西北大败沙木埃尔军队,夺取通往西北方保加利亚王国内地的要塞。而后,瓦西里二世率数千轻骑昼夜兼程,人不卸甲,马不去鞍,一周内穿越小亚细亚地区,突袭叙利亚南部,推动东线战事发展。沙木埃尔闻讯,再次进兵塞萨洛尼基,在城外会战中,击毙拜占廷总督塔隆尼狄斯(Taronites),而后,挺进科林斯地峡^①。但当他得到瓦西里二世回兵西进的消息后,急忙撤退。在归途中,保加利亚军队遭到拜占廷西线总司令尼基弗鲁斯(Nikephorus)的沉重打击,仓皇逃入品都斯山区,其部下拼死营救才得以安全退回伊庇鲁斯基地。这样,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处于相持状态。

第二阶段战事开始前,瓦西里二世集中精力解决亚洲战场问题。他指挥拜占廷军队连续数年进攻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北部,连续获得胜利,将边界推到巴勒斯坦的凯莎利亚城。而后,他乘高加索地区乔治亚王国(the Georgia Kingdom)内乱的机会向黑海东部高加索地区扩张。拜占廷军队到达东部边境城市麦利迪尼(今马拉蒂亚),受到亚美尼亚附属国王公的隆重欢迎。而后,强行渡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进入和并吞了乔治亚王国。他在当地任命拜占廷官员,强迫地方王公向他宣誓效忠,并将大批人质带回君士坦丁堡。这一胜利产生了强烈反响,法蒂玛王朝(the Fatimids,909—1171年)闻讯,派特使到拜占廷帝国首都主动结好,双方订立了和平条约^②。

亚洲战场的胜利使瓦西里二世得以转向巴尔干战场,自1001年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p. 351.

^② Seta B. Dadoyan, *The Fatimid Armenian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in the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1997, pp. 149—152.

后,他便开始集中力量进攻保加利亚王国。他将大本营设在爱琴海沿海地区、临近奈斯多斯海湾的莫森诺堡(今亚历山德鲁波利斯附近),在此,他建立了由优秀军事将领组成的司令部,反复推敲,精心谋划所有的进攻计划,确定出最佳的战略和战术方案,即每年多雨的冬季休整部队,春季发兵,争取在旱季取得阶段性作战目标。瓦西里二世在战争中,注意分割敌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其打击的首要目标是保加利亚王国首府,为此,他将通往巴尔干山脉以北和多瑙河南岸的山口作为攻击点,以扫清进军障碍。同年,拜占廷骑兵奇袭索非亚平原,夺取了伊斯格河上游的萨尔迪卡(今索非亚),从而将保加利亚国土东、西部一分为二。同时,拜占廷军队控制了进军保加利亚的要道,为实施下一步战略计划创造了条件。1002年,瓦西里二世亲率大军扫荡被分割的多瑙河下游地区,夺取了巴尔干山脉北麓的重要城市普里斯拉夫,进而占领马尔西安堡(今保加利亚的舒门),封锁住保加利亚军队进入色雷斯地区的出入口^①。这样,拜占廷军队在彻底征服多布罗加和莫埃斯亚地区后,即夺取了保加利亚王国的半壁河山。这次作战由于保加利亚主力军队南下,拜占廷人几乎没有遭遇抵抗。瓦西里二世在被征服领土上重新建立拜占廷地方政府,任命心腹官员总揽当地大权加以管理。同时将大批保加利亚人押送到梅里奇河河口平原地区开垦农田,为大部队提供粮草。为了尽快完成战略计划,减少抵抗,瓦西里二世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对投降的保加利亚王公贵族加以重新任用,封授爵位和名号。但是,被俘虏的保加利亚人怀着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经常违背效忠誓言,或出尔反尔,当面表示投降,背后立即倒戈,从而迫使瓦西里制定和推行残酷的迫害战俘政策,即以酷刑使所有被俘的保加利亚人致残。

1003年,拜占廷军队经过休整,决定以主力部队与沙木埃尔主力进行决战。但是,此时的保加利亚士兵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一经交锋,便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319.

争先恐后地逃入山林,决战时机迟迟无法把握。因此,拜占廷军队沿马其顿地区爱琴海沿海快速向西推进,扫清了塞萨洛尼基周围的敌军,而后,进军阿利阿克蒙河流域各城,攻击此地保加利亚军队进军希腊的前哨基地,迅速夺取维尔西亚、科利德罗(今科扎尼)和奥林波斯山西麓的塞尔维亚地区各城,将已经进入希腊中部的保加利亚军队前锋和主力分割开来,并全歼保加利亚人前锋部队。拜占廷军队放过退入伊庇鲁斯山区的沙木埃尔主力军队,回师向北直取窝狄纳(今埃泽萨附近),在此进行休整,以待来年进攻保加利亚人的西北中心区^①。第二年,瓦西里与匈牙利国王斯蒂芬结盟,获得了匈牙利军队的援助。而后,他亲自指挥拜占廷军队直取多瑙河畔的保加利亚国王行宫维丁,对该城展开为期8个月的围攻,并同时扫荡大摩拉瓦河流域的敌军,夷平城堡,摧毁要塞,征服保加利亚王国全境。沙木埃尔无力与瓦西里正面交锋,因此,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进攻色雷斯地区重要城市亚得里亚堡(今埃迪尔内),以图引拜占廷军队救援。但是,瓦西里二世对此置之不理,因为他坚信沙木埃尔军队没有能力夺取该城。果然,沙木埃尔攻城未果,不敢久留,只能退军,一路上放任部队大肆抢劫。1004年,两军相遇在西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郊外,满载战利品的保加利亚军队被彻底击溃,被迫逃进山区^②。斯科比亚城总督,前保加利亚沙皇彼得之子罗曼努斯(Romanus)投降,被瓦西里任命为拜占廷帝国驻当地的总督和阿比杜斯(Abydus)军区“将军”。次年,拜占廷军队占领亚得里亚海沿岸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地区,控制了重要海港城市迪拉修姆(Dyrrachium)。

这样,沙木埃尔仅剩残余部队,躲进地势险恶的伊庇鲁斯山区和奥赫里德湖、普里斯帕湖地区。在此后10年左右,瓦西里二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意大利事务中,而对保加利亚人采取清剿和防范相结合的政策,同时等待时机,寻求与保加利亚主力部队的决战,给予他们以最后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 320.

^②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240页。

的致命打击。1014年7月,瓦西里二世根据秘报获悉,沙木埃尔重整旗鼓,派主力部队在拜占廷军队每年夏季进山围剿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于是决定增派军队与保加利亚人决战。7月29日,拜占廷军队前锋进入瓦拉西察山坎(Οροζ Βαλλασπιτζα)巴隆古山谷(Παλλουγου),沿斯特利蒙河西进,行至山谷克莱第翁隘口,被沙木埃尔部队设下的层层木栅栏阻挡住去路。拜占廷军队有备而来,立即喷射出“希腊火”发起攻击,从正面冲击保加利亚人阵地,同时策动尼基弗鲁斯·科西菲亚斯(Nicephorus Xiphias)率领的保加利亚军队侧翼倒戈,从而冲破敌军防线,致使保加利亚军队全线溃退,1.5万人被俘,沙木埃尔只身逃离战场。瓦西里二世下令将全部俘虏的眼睛剜出,每100人分为一组,其中一人仅保留一只眼睛作向导引路,放回保加利亚王国。身心疲惫的沙木埃尔因此受到严重刺激,突发中风,脑血管崩裂,两天后不治身亡^①。他死后,由其子拉多米尔(Gabriel Radomir)于1014年10月6日继承王位。

瓦西里二世趁胜追击,继续挥军横扫罗德比山脉以西山区,彻底捣毁保加利亚残余力量的根据地,先后占领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地区所有重要城市,1014年底占领麦尼克、维托拉、普里来普和依斯提普。1016年,拜占廷军队进攻帕拉格尼亚地区(the Pelagonia),夺取莫哥来那,促使保加利亚王国发生内乱,拉多米尔被其侄子约翰·弗拉迪斯拉夫(John Vladislav, 1015—1018年在位)杀害。在拜占廷军队攻占保加利亚国家首都奥赫里德城和卡斯托利亚(Castoria)之际,约翰·弗拉迪斯拉夫向瓦西里二世投降。但是,1018年,保加利亚末代国王再度起兵,在迪拉修姆战役中阵亡,这样,拜占廷人就彻底消灭了残余的保加利亚军队,征服了保加利亚人,沙木埃尔战争以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灭亡和拜占廷帝国的军事胜利而告结束^②。拜占廷帝国在整个巴尔干半岛上恢复了主权,建立起军区行政管理机构,使半岛霸权重新为拜占廷人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夫斯基:《拜占廷帝国》,第241页。

^② 关于这次战争的详细进程布莱赫尔的《拜占廷帝国兴亡》有详细叙述,见该书第157—160页。

所控制。

第六节 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兴起与灭亡

巴尔干半岛重新恢复了和平。拜占廷人在整个半岛上重建统治机构,取消了保加利亚独立教会,并在半岛西部恢复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的附属国自治地位,任命当地君主单独管理。拜占廷帝国马其顿王朝在妥善处理与阿拉伯人、罗斯人、潘臣涅格人和西欧人关系的同时,对被并入拜占廷帝国的保加利亚人领土重新规划,建立了几个新军区,包括以斯科普杰为首府的保加利亚军区,除了辖制保加利亚平原外还管理马其顿山区。第二个军区是以西里斯特利亚为首府的帕里斯特隆军区,辖制多瑙河下游流域到巴尔干山脉之间地区,而最新考古发现确定了西里斯特利亚是在约翰一世取得971年大捷后建立起来的。第三个军区是以西尔缪姆为首府的同名军区,辖制多瑙河中游和萨瓦河下游地区。为了加强这些军区的实际管理掌控能力,瓦西里二世下令将保加利亚王室的所有男性成员全部迁移到拜占廷帝国首都,安排他们与拜占廷人结婚,而后任命他们担任小亚细亚边远地区的地方小吏。设立在奥赫里德的保加利亚人独立教会也被降格为主教区,并由拜占廷皇帝亲自任命^①。

巴尔干半岛周边,特别是南面的海上形势也逐渐好转。马其顿王朝统治初期,阿拉伯人已经在其征服的广大领土上建立稳固的统治,并以此为基地继续扩张,迫使拜占廷军队面临来自北非和西亚两方面的军事骚扰。当时,阿拉伯海军渡过突尼斯海峡占领了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并侵入南意大利沿海地区。拜占廷皇帝瓦西里一世被迫与法兰克国王路易二世(Lewis II, 854—875年在位)结盟,联手反击入侵的阿拉伯人,最终收回了被阿拉伯人占领的马耳他岛和西西里岛。但是,在利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p. 349—351.

奥六世统治时期,阿拉伯军队再次夺取了墨西拿海峡东岸城市卡拉布里亚,他们与活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沿岸地区的阿拉伯海盗经常洗劫巴尔干半岛沿海地区。10世纪初,这些阿拉伯人与叙利亚和克里特的阿拉伯海军联合行动,控制了东地中海霸权。904年,阿拉伯海军对拜占廷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进攻使该城损失严重^①。10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帝国逐渐解体,形成许多相互厮杀的小王朝,这就缓解了其对拜占廷帝国东线边境和地中海上岛屿造成的威胁。马其顿王朝统治中期,拜占廷军队发动全面反击,从罗曼努斯一世到瓦西里二世时期,拜占廷人大体上收复了亚洲的失地。拜占廷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将领约翰·库尔库阿斯(John Kourkougas)在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连续击败阿拉伯军队,将拜占廷帝国东部边界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东岸和耶路撒冷附近。在海上,拜占廷军队也发起强大反攻,收复了东地中海的主要岛屿和西里西亚及西亚沿海广大区域,特别是塞浦路斯岛的收回对拜占廷人重新建立东地中海控制权具有重要意义。拜占廷军队在东部前线取得的胜利一度改变了西亚的政治格局,对各个弱小的地方政权产生强烈的震撼,当时的阿拉伯作家安条克人亚赫雅(Yahya of Antioch)记述到:拜占廷军队的进攻“成了其战士们愉快的旅行,因为,没有人袭击他们,也没有人抵抗他们。他(尼基弗鲁斯二世)可以向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进军,也可以摧毁任何他想攻击的地方,而遭遇不到任何穆斯林,或其他任何企图阻挡和遏止他实现其意愿的人。没有人能够抵抗他”^②。可以说,正是阿拉伯人的衰落为马其顿王朝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之可以全部精力投入巴尔干半岛事务,并在击败保加利亚人这个半岛地区的头号强敌后,重建半岛秩序。

拜占廷统治阶层注意缓和战后保加利亚民族矛盾,在11世纪期间,允许保加利亚人部分地保持原有的地方官府,并允许保加利亚农民交纳有限的实物税,大体上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稷粟、葡萄酒即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210页。

②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309.

可,而普通的拜占廷农民必须交纳货币税。同时,在教会事务中,拜占廷人允许保加利亚各地教会服从奥赫里德大主教的管理,而奥赫里德大主教则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还享有多种特权。拜占廷人的目的显然是通过对保加利亚教会的宽容减少其政治和军事高压引起的反抗。而对这种宗教宽容政策,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后来的历史中表现出来^①。

但是,1025年瓦西里二世去世后大约半个世纪,拜占廷帝国形势大变,进而直接导致巴尔干半岛形势的恶化。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拜占廷社会内部深刻的矛盾不断发展,大地产的兴起,小农经济的瓦解,大贵族势力对中央集权政治的破坏,军区制的衰落等问题逐渐暴露,日益严重,逐渐发展成为无法克服的社会固疾,使拜占廷帝国社会内部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深刻转变^②。拜占廷军事化社会结构的瓦解是11世纪以后巴尔干半岛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军区制的衰落和大贵族势力的迅速兴起,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即是明显的标志。7世纪开始推行的军区制曾加速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化,使拜占廷国力得到一定恢复,军事实力有了较大的提升,有力地保证了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为中心的拜占廷帝国疆域的稳定。但是,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在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阶层兴起的同时,以大地地产主为核心的军事贵族也悄然崛起。军区内的小农经济十分脆弱,随着大地地产主的兴起,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大大加速。11世纪以后,小农日益沦为大地主的农奴,拜占廷国有小农逐渐消失。大贵族势力的兴起直接瓦解拜占廷中央集权制,成为拜占廷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的主要因素,地方贵族参与王室内讧,有些军区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尤其是军事贵族形成的政治势

^① 奥伯林斯基还是肯定了这种政策。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11. 现代人仍然从人道主义的概念去理解这种宗教宽容政策,事实上,如果拜占廷人采取其他民族对待弱小民族的强硬政策的话,经过一个多世纪5代人以上的改造,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正是由于拜占廷人放弃了这一有利时机,巴尔干的历史才变得更为复杂。

^②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第98—115页。

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他们之间的较量构成了晚期拜占廷政治生活的主线。官僚贵族控制皇权后,极力打击军事贵族,限制地方军区将领的权力,将原有的军区分划为更多更小的军区,以便加强控制。例如在原亚美尼亚军区境内就分划出10个小军区^①。同时,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利,使军、政权利重新分离,恢复了军区制以前的军政两元化领导体制。至12世纪,军区制被完全取消,“军区”和“将军”等有关军区制的名称从文献中几乎完全消失。

军区制的衰败对拜占廷武装力量产生极为不利的影晌,以本国兵源为主体的农兵日益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罗斯人和诺曼人雇佣兵。晚期拜占廷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多成为这些雇佣兵的军饷。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肆虐于拜占廷腹地。12世纪诺曼人雇佣兵的反叛就给拜占廷中心地区的巴尔干半岛造成持续数十年的兵祸^②。至13世纪初,拜占廷几乎到了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的地步,只能依靠外国雇佣兵。这样一来,拜占廷国家出现了大批土耳其人、诺曼人、斯拉夫人、瓦兰吉亚人雇佣兵,在拜占廷境内造成兵匪横行的局面。军区制原本是早期拜占廷经历长期动荡,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演化的结果,是拜占廷统治阶级通过种种尝试从事的成功的改革。但是,军区制从推行之初自身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拜占廷统治者为了通过推行军区制有效地应付外敌入侵,就必须依靠和重用军事贵族,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壮大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和军事贵族的兴起,小农土地必遭吞并,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败,从而瓦解了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拜占廷王朝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保证中央集权统治,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他们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

①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第59—66页。

② David C. Douglas, *The Norman Fate, 1100—1154*,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210—220.

地方分裂、大地产和小地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

拜占廷帝国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动,首先在保加利亚地区产生动荡。1040年,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四世(Michael IV, 1034—1041年在位)的亲信约翰(John the Orphanotrophus)下令取消了保加利亚人交纳实物赋税的惯例,强令保加利亚人交纳货币税,这对商业贸易受到严格限制而极度缺少货币的保加利亚人来说无异于被推入绝境。保加利亚人对此强烈反抗,巴尔干北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前保加利亚国王沙木埃尔的孙子彼得·德尔严(Peter Delyan)利用这一时机,在贝尔格莱德自立为保加利亚沙皇。起义军迅速发展,攻城掠地,占领了尼斯、斯科普里、迪拉修姆、塞尔迪卡和尼科堡等中小城市,挺进到希腊中部塞萨利地区,并计划夺取拜占廷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但是,由于起义军内部缺乏最高权威,领导层意见分歧,保加利亚人的起义于次年被平息。这次起义揭开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反抗拜占廷帝国压迫剥削起义的序幕。1072年,保加利亚人又发动了起义,参加起义的不仅有保加利亚人,还有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①。虽然起义被镇压下去,但各地反对拜占廷统治的情绪持续高涨。而拜占廷政府对付起义的唯一手段就是武力镇压。

这一时期,拜占廷人尚有能力控制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因为从约翰一世直到瓦西里二世时期在北方地区建立的军事防御体系也同时发挥着镇压人民起义的作用。近年来,罗马尼亚考古学家在多瑙河下游图尔恰县的考古发掘证明,10世纪末在多瑙河三角洲地区建立的用以防范罗斯人和潘臣涅格人的海军基地,在11世纪初以后大多改建为陆地要塞,显示出其军事功能的改变,进而表明11世纪初半岛北方形势的变化,即游牧民族开始新一轮的入侵高潮^②。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351—354.

^② Katherine Verdery, *Transylvanian Villagers: Three Centuri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thnic Change*,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35—41.

拜占廷帝国对保加利亚人实行的宗教文化同化政策也具有强大影响力,现代学者对此也给予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拜占廷人征服保加利亚人后,尽其所能进行了宗教和文化清理工作,企图彻底消灭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他们一方面通过在被征服的保加利亚王国建立行政机构,将各地保加利亚人像斯拉夫人一样纳入拜占廷人的政治统治体系内,另一方面,派遣拜占廷官员到各地任职,以彻底消除民族分裂倾向。同时,教会高级职务也由拜占廷希腊人担任,瓦西里二世任命的保加利亚大主教不久于1037年换成了希腊人^①。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同化政策在基层悄然进行,教会活动和文献中拜占廷希腊语逐渐排斥希利尔文字,宗教仪式中的希腊语越来越普及,大有取代斯拉夫语的可能。但是,由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及其弟子们建立起来的斯拉夫文字和斯拉夫人长期的文化传统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特别是在保加利亚人占有被征服地区居民多数的情况下,希利尔文版本的斯拉夫文献广泛流传,并逐渐形成了斯拉夫古代教会文本,这些文本文献成为斯拉夫文明发展的重要奠基石。

事实上,拜占廷人对斯拉夫人一直抱有深刻的偏见,把他们视为野蛮落后丑陋肮脏的民族。1090—1109年期间担任奥赫里德大主教区主教的塞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在其传于后世的大量信件中,生动反映出他作为拜占廷人教士在“外国”信徒中遭遇的种种问题。由于他与拜占廷皇室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不仅被委以重任,控制保加利亚人的宗教事务,而且得以与拜占廷帝国上层高官频繁联系,直接汇报请示,甚至对一些热点问题坦诚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他并不认同皇帝和大教长对他的任命,因此在信中不时地抱怨他生活在“充满羊皮臭味的肮脏野蛮的斯拉夫人”中是如何艰难,后悔当初接受这个偏远山区的苦差事,自比为宙斯的鸟和鹰,却要在癞蛤蟆里虚度一生。他把保加利亚主教区称为“污秽的沼泽”,将保加利亚人称为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16.

“妖怪”^①。同样,12世纪被派往雅典教区的大主教米哈伊尔(Michael Choniates)也是牢骚满腹,为当地斯拉夫信徒的无知而叹息,认为这些野蛮人丝毫不了解他们生活的地方曾经是多么伟大的城邦,称自己“由于长时间生活在雅典而正在变为野蛮人”^②。他们以这种文化优越心态处理日常事务,或以高人一等的傲慢态度对待保加利亚人,致使保加利亚人一直保持着畸形的民族自尊心。1185年,保加利亚人在彼得(Peter)和阿森(Asen)领导下再度发动起义,并击败拜占廷军队,迫使皇帝依沙克承认其独立政权,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拜占廷人对保加利亚人169年的统治也因此宣告结束。

1185年底保加利亚爆发的起义表现为拜占廷帝国的内战,但其实质是保加利亚人摆脱巴尔干霸主控制,争取独立并进而夺取巴尔干半岛主导权的战争。彼得(塞奥多利)和阿森兄弟的出现表明,拜占廷帝国在被征服的保加利亚领土上的权力纽带相当松弛,拜占廷人并未真正掌握巴尔干半岛霸权。彼得(塞奥多利)和亚森兄弟最初要求拜占廷人授予他们土地,被拜占廷帝国政府拒绝,将他们的要求弃之一旁,这促使事态急转直下,他们在被税收压榨激怒的保加利亚人中发动民众起义,并最终击溃前来镇压的官军,宣布保加利亚脱离拜占廷帝国控制,建立“第二保加利亚帝国”。事实上,在拜占廷帝国统治的近两个世纪期间,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因素已经削弱,这些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拜占廷化趋势,外族因素不断增强,出现了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库曼人等其他民族。他们大多聚集在塞萨洛尼基周围,库曼人则定居在多瑙河中游,瓦兰吉亚人则活动在今天罗马尼亚所在的多瑙河中下游和马其顿、塞萨利地区。在彼得和阿森兄弟领导的起义中,库曼

① Theophylact of Ohrid, *Epistolae*, P. 35 J. P.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 Paris 1857—1936, cols. 308—309.

② Kenneth M. Setton, "A Note on Michael Choniates, Archbishop of Athens (1182—1204)", *Speculum*, vol. 21, No. 2 (Apr., 1946), pp. 234—236.

人和瓦兰吉亚人成为起义的主力军^①。当时的巴尔干半岛还有一批受雇于拜占廷帝国的诺曼人，他们曾受命前去镇压起义，但是中途倒戈，致使形势更加混乱。1186年夏季，皇帝依沙克亲自率兵进军保加利亚，大败起义军，彼得和阿森带领少数亲随逃往多瑙河北岸地区。不久，他们招募大量游牧民族雇佣兵，率领一支强大军队卷土重来，重新杀入巴尔干半岛，色雷斯地区战火重新燃起^②。1186年10月，双方在色雷斯北部地区发生遭遇战，拜占廷人遭到顽强抵抗。1187年春季，依沙克发动新的攻势，最终抓住战机，设法诱使保加利亚—库曼联军与之决战。他设法从萨尔迪卡的侧翼包围了起义军，并赢得了战事胜利。但是，战争未能取得决定性结果，一方面，拜占廷帝国缺乏从事长期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起义的保加利亚人得到塞尔维亚人大王斯蒂芬·奈曼加的支持，同时，拜占廷人还必须调集主力应付小亚细亚爆发的起义。依沙克二世被迫立即结束保加利亚战事，提议与彼得和阿森谈判停战，但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小弟弟卡罗赞(Kalojan)送交帝国为人质^③。该和约标志着拜占廷帝国失去了对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之间地区的控制，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国家再度得到拜占廷帝国的承认，保加利亚人的特尔诺沃大主教区也获得合法地位，阿森沙皇还接受了特尔诺沃圣迪米特里教堂的保加利亚大主教的加冕^④。拜占廷帝国主宰巴尔干半岛的时代从此结束。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最终摆脱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

拜占廷帝国丧失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的主要原因是其实力的衰

① Robert Lee Wolff,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 *Speculum*, vol. 24, No. 2 (Apr., 1949), pp. 167—206.

②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32—333页。

③ Robert Lee Wolff,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 pp. 167—206.

④ 圣迪米特里是塞萨洛尼基城的保护神，据传说，该城失陷于诺曼人后，这位神仙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到特尔诺沃去保护保加利亚帝国的首都去了。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33页。

落,但同时也是巴尔干半岛地区外部形势复杂化的结果。自11世纪末开始的西欧十字军东侵运动将各种拜占廷帝国的敌对势力引入巴尔干半岛的历史舞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西欧移民运动中,拜占廷人不得不面对各种心怀鬼胎的西欧和中欧骑士领袖。其中德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是最危险的人物,他不仅对拜占廷帝国怀有公开的敌意,而且与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对手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结盟。1189年,德国骑士借道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夺取色雷斯重镇亚得里亚堡,准备联合这两个斯拉夫人国家进攻拜占廷首都。拜占廷皇帝依沙克二世被迫于次年与德国皇帝签署协议,答应巴巴罗萨的所有条件,并以宫廷贵族为人质,履行条款。巴巴罗萨意外死亡后,拜占廷人立即挥师进军色雷斯地区,依沙克二世不仅要收复失地,而且要惩罚与德国人勾结的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不久,后者即臣服于拜占廷人软硬兼施的计策,不仅与拜占廷人订立和约,而且两国王室还联姻建立联盟^①。然而,拜占廷人在与保加利亚人交锋中却未能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其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也遭到失败。尤其严重的是,拜占廷宫廷在此关键时刻,再度爆发内讧,正准备出征保加利亚的依沙克二世被推翻,保加利亚人不战而胜。

这个时期不仅对拜占廷人来说说是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对保加利亚人来说也是艰苦异常的动荡岁月。一方面,由于外部势力的干预,保加利亚第二王国的王位几易其主。另一方面,在巴尔干半岛狭小的空间里,保加利亚人要为民族生存争取更多的土地。1196年,保加利亚贵族伊凡科(Ivanko)在拜占廷人支持下暗杀了国王阿森,自立为王。但是,拜占廷人没能按照约定派遣援军,这迫使伊凡科逃出保加利亚首都特尔诺沃,投奔了君士坦丁堡。然而,接替阿森为保加利亚国王的彼得也未能保住王位,于1197年被暗杀。接替他担任国王的是两位起义领

^① 塞尔维亚国王奈曼加的次子斯蒂芬(Stephen)与拜占廷皇帝的侄女尤多西亚(Eudocia)结婚,并被授予“大贵族元老”的头衔。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35页。

导者的幼弟卡罗赞(Kalojan, 1197—1207年在位)^①。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巴尔干半岛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场,占据半岛西北部山区的是塞尔维亚人,占据半岛中部的是几支保加利亚人的势力,在拜占廷人控制下的其他地区则游弋着来自欧洲各地的散兵游勇,其中伊凡科在罗德比山下建立了独立公国,保加利亚人赫里苏斯(Chrysus)在多瑙河下游自立为王。局面如此混乱的原因在于控制巴尔干半岛霸权的拜占廷人丧失了足够的实力,多种势均力敌的势力需要时间进行重新整合,半岛新的霸主要在各派力量较量中产生出来。不久,这个新霸主出现了,他就是保加利亚沙皇卡罗赞。

沙皇卡罗赞曾一度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充当人质,对拜占廷政治相当熟悉。在其强有力的领导下,保加利亚迅速崛起,取代拜占廷帝国成为巴尔干半岛最重要的强国,进而成为左右东南欧命运的地区霸主。精明的卡罗赞首先设法争取罗马教皇对其合法地位的认可,以便名正言顺地主宰半岛事务。经过长期谈判,卡罗赞正式承认罗马教皇的宗主权,并于1204年11月7日由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派遣的枢机主教为保加利亚大主教加冕,次日又为卡罗赞加冕^②。由于拜占廷帝国首都都被西欧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攻陷,拜占廷朝廷流亡小亚细亚,保加利亚帝国趁势占据了巴尔干半岛霸主地位。但是,当时入主拜占廷帝国首都的拉丁骑士并不认可保加利亚人的最高权力,而且认为只有占据君士坦丁堡的人才是半岛的合法主人。于是,保加利亚人与拉丁人又展开了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战争。

拉丁帝国是按照西欧典型的封建结构建立起来的,封建骑士们各自保持大小不一的独立领主权。拉丁帝国中央政府统治极为衰弱,既没有拜占廷国家的集权体制,也没有严格的主从关系,因此这个强加给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怪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短命的未来。拉丁帝国皇

^① Robert Lee Wolff,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 pp. 167—206.

^②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37页。

帝鲍尔温(Baldwin)只控制很小一部分领土,其他大部分领土由威尼斯和皇帝的封臣骑士们分割。巴尔干半岛被这些西欧骑士和拜占廷帝国遗族国家所分裂,小王国、公国、专制君主国、骑士领地比肩而立,大小封建主各自割据,相互间不时爆发争执和武力冲突。这个松散的政权在1204—1261年近半个世纪期间不仅无法统一内部力量,而且还要应付来自北方保加利亚人和来自西方以及东方拜占廷人的进攻。其中,保加利亚沙皇是最危险的敌人,而尼西亚的拜占廷帝国流亡政府则是其掘墓人。

保加利亚沙皇卡罗赞在13世纪前半期是巴尔干半岛真正的霸王,他不仅掌握着拉丁帝国的生杀大权,而且直接左右尼西亚拜占廷人和伊庇鲁斯拜占廷人的争斗。1205年,保加利亚人入侵拉丁帝国控制下的色雷斯,在亚德里亚堡附近击溃拉丁军队,4月14日的一次战斗中,卡罗赞率领的保加利亚人和库曼人军队给予拉丁骑士军队以致命打击,鲍尔温本人在战斗中中俘,十字军主力被彻底消灭,拉丁人的权力实质上已经瓦解^①。1206年底,接替鲍尔温的亨利皇帝再度兴兵进攻小亚细亚,但因卡罗赞沙皇的干预而被迫放弃计划。1207年10月,沙皇卡罗赞再度发动对塞萨洛尼基的围攻,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的拜占廷民众因此遭受涂炭。为了报复二百年前拜占廷皇帝“保加利亚人屠夫”瓦西里二世对保加利亚人的羞辱,他采用同样残酷的刑罚对待战俘^②。这一行动反映出沙皇卡罗赞缺乏统一并主宰巴尔干半岛的战略洞察力,标志保加利亚人掌控半岛霸权图谋的失败,此后,他只能陷入半岛地区“三族四方”的混战之中。

创立了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的拜占廷皇室遗族米哈伊尔·安荏利(Michael Anglius)于1215年前后,由塞奥多利(Theodorius)接任,后者从

^① Robert Lee Wolff, "Romania: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Speculum*, vol. 23, No. 1 (Jan., 1948), pp. 1—34.

^② David Marshall Lang, *The Bulgarians from Times to the Ottoman Conquest*, London and Boulder, Colorado: Thames and Hudson and Westview Press 1976, pp. 167—171.

伊庇鲁斯地区进攻拉丁帝国,在阿尔巴尼亚山口处截获了拉丁人皇帝科尔特内的彼得(Peter of Courtenay),沉重打击了这个脆弱的政权。尔后,他出兵控制了西欧骑士建立的塞萨洛尼基王国的领土,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色雷斯地区,占领了亚得里亚堡,快速进军君士坦丁堡。正当他接近胜利的目标时,保加利亚沙皇约翰·阿森二世(John Asen II, 1218—1241年在位)出面干预^①,因为后者统治下的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正当鼎盛时期,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保加利亚—拜占廷帝国,他担心塞奥多利的胜利会破坏自己政治抱负的实现。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出现在1228年,当时拉丁皇帝罗伯特(Robert)去世,皇权由其年幼的弟弟鲍尔温二世(Baldwin II)接替。苟延残喘的拉丁帝国不得不请保加利亚君主为小皇帝的摄政,阿森二世为了名正言顺地入主君士坦丁堡,特地安排拉丁小皇帝与沙皇之女海伦(Halen)之间的婚姻。这个计划中的婚姻显然触动了塞奥多利·安苴利复辟拜占廷帝国的计划,于是,塞奥多利立即解除了他与阿森二世订立的联盟,向保加利亚人公开宣战。1230年春季,双方在马里卡河流域的克罗科特尼卡兵戎相见,塞奥多利统领的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他本人被保加利亚沙皇俘虏并被瞽目^②。此后,阿森二世顺利地取得了塞奥多利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占领的领土,以及阿尔巴尼亚地区,他还扶植其女婿弗拉迪斯拉夫(Vladislav)控制了塞尔维亚地区。这样,几乎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阿森二世勒石著文宣称,他征服了从亚得里亚堡到迪拉修姆之间所有的土地,除了拉丁人控制的君士坦丁堡外,但“即便是这些地区也屈服于朕的权力”,因为拉丁人“没有皇帝只有我,他们服从我的意志,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③。保加利亚人的霸主地位不同于拜占廷帝国时期,它只是由武力威胁维系的短暂的臣服关系,缺乏政

① Geoffrey Neale Cross, *Epir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p. 111—132.

②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70页。

③ A. Pogodin, *A History of Bulgaria*, 87. 转引自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71页。

治文化内涵,因此也是短命的。正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说:“阿森二世在巴尔干半岛表面上没有对手的权威带有很大的欺骗性。”^①阿森二世的胜利只是使拉丁人摆脱了一个对手,他们不必再担心塞奥多利的威胁,因而也不必依赖保加利亚人了。拉丁帝国新皇帝布林奈的约翰(John of Brienne)于是转而成为阿森二世新的对手,保加利亚人被迫对拉丁人宣战,并与尼西亚皇帝约翰·瓦塔基斯订立反对拉丁帝国的拜占廷—保加利亚同盟。为了稳定同盟关系,阿森二世经过长期谈判,促使尼西亚教俗当局同意恢复保加利亚独立教区,而保加利亚则重新承认尼西亚教会大教长的最高权力。1235年,拜占廷—保加利亚双方在拜占廷人刚刚占领的加里波利签署联盟协议,并在兰普萨库斯为皇帝之子塞奥多利二世(Theodore II Lascaris)和沙皇之女举行婚礼^②。

缺乏远见和谋略的保加利亚沙皇此时再次改变了主意,他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尼西亚拜占廷人,而后者对他来说才是更危险的对手。保加利亚人出尔反尔,中断了与尼西亚帝国的联盟,转而与拉丁人和库曼人订立同盟。老盟友与其新盟友之间的战争开始了,尼西亚帝国在色雷斯地区的主要据点都遭到围攻。这时,保加利亚首都特尔诺沃爆发了瘟疫,笃信上帝的沙皇认为其妻儿和保加利亚大主教的病故是上帝对其背信弃义行为的惩罚。1237年底,他撤兵并恢复了与尼西亚帝国的和约^③。1241年,阿森二世去世。同期蒙古人的入侵使保加利亚人势力迅速瓦解,巴尔干半岛控制权重新落入尼西亚帝国皇帝之手。一度称雄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人此时沦为蒙古入侵者的臣属,继承阿森二世的克罗曼(Koloman,1241—1246年在位)突然于12岁时去世,其异母弟弟米哈伊尔(Michael,1246—1256年在位)继位后,保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71页。

② Matthew Spinka,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Balkans. A Study in the Spread of Byzantine Culture among the Slavs*, Chicago: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1933, pp. 167—181.

③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73页。

加利亚国家更加衰弱。瓦塔基斯乘机夺取了保加利亚人占领的领土，控制了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巴尔干半岛霸主再度易手^①。

但是，争夺巴尔干半岛领导权的斗争还在继续。长大成人的新沙皇米哈伊尔·阿森出兵占领了曾被约翰·瓦塔基斯占领过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大部分地区，但不久遭到重创，被迫于1256年签订了对尼西亚帝国有利的和约。为了最后夺回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开展了多头联姻外交，1257年，奈曼加王朝的后人君士坦丁·提奇（Constantine Tich，1257—1277年在位）与尼西亚王室公主伊琳尼（Irene）结婚，尔后，伊庇鲁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二世的儿子尼基弗鲁斯（Nikephorus）与尼西亚公主玛利亚（Maria）结为夫妻。这就为拜占廷人于1261年入主君士坦丁堡做好了准备。

但是，拜占廷帝国末代王朝只是恢复了对帝国首都的控制，它并未真正恢复对巴尔干半岛霸权的控制。尽管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VIII，1259—1282年在位）努力改善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于1260年和1262年趁保加利亚内乱占领了黑海西岸重要港口城市安察鲁斯和麦森布里亚，并设法扩大了其势力范围，但是，安茹的查理等西欧势力的介入使巴尔干局势更加恶化。保加利亚沙皇君士坦丁·提奇和塞尔维亚国王乌罗斯一世都加入了西西里国王组织的反拜占廷人阵线，这就迫使拜占廷人寻求教皇的支持，1272年米哈伊尔八世在法令中剥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自治地位，强制将南斯拉夫教会归属于奥赫里德的希腊大主教区^②。同年，保加利亚沙皇因米哈伊尔八世食言拒绝向保加利亚人交还拜占廷人于1262年占领的黑海港口城市安塞亚鲁斯和麦森布里亚，双方爆发了战争。但是，入侵拜占廷帝国领土的保加利亚军队却在拜占廷人的盟友蒙古人的威胁下被迫撤退，放弃了对有争

① 瓦西列夫认为，蒙古人侵欧洲使得“尼西亚皇帝（瓦塔基斯）得以对巴尔干半岛采取重大行动”。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I, p. 531.

② Done Ilievsky, *The Macedonian Orthodox Church: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trans by J. M. Leech, Skopje: Macedonian Review Editions 1973, pp. 101—120.

议城市的主权要求。保加利亚人也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他们向蒙古表示臣服,请求后者大败拜占廷人,并对色雷斯地区大加蹂躏,当地农村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于“无论是耕牛还是农夫都看不见了”^①。然而,引狼入室的保加利亚人不久自食苦果,其都城特尔诺沃又遭到蒙古人的掠夺。内忧外患的保加利亚社会冲突激烈,暴力革命多次爆发,从而为拜占廷人的武装干涉提供了借口,后者出兵镇压了伊瓦杰罗(Ivajlo)领导的起义,于1279年扶植伊凡·阿森三世成为保加利亚沙皇。1280年,拜占廷人的傀儡伊凡·阿森三世的短命统治被库曼人后裔乔治一世·特尔特尔(George I Terter,1280—1292年在位)推翻,随后出兵向拜占廷帝国发动进攻。

拜占廷帝国末代王朝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不仅成为多种外部势力角逐的战场,而且帝国本身也已经分崩离析了,即便保加利亚已经衰落,拜占廷人也无力重新整合半岛。对于拜占廷皇室瓜分帝国领土的事件,当时的作家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写道:“这个计划将要做的事情真是难以置信。这正是她的想法,皇帝的儿子不是按照古代罗马的习惯作为君主统治帝国,而是按照拉丁人的方式统治一些罗马的城市和地区。这样,她的每个儿子都可以统治一个个别的部分,而这原本为皇帝一个人所有,这些单独部分也将服从于私有财产法,好像它们是从其父母那里世袭继承来的,因此也能够移交给他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了。”他不无调侃地解释说:这个皇后的出身“是拉丁人家庭,她从拉丁人那里学来了这种新习惯,又把它介绍给罗马人”^②。

自13世纪末年已经公开屈从于蒙古统治的保加利亚人分裂为几个小王国,但是在塞奥多利·斯维托斯拉夫(Theodore Svetoslav,1300—1322年在位)统治时期重新走上复兴之路。1299年,斯维托斯拉夫趁金帐汗国内乱而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他利用拜占廷帝国内外交困的有利时机,将其疆界扩大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地区,占领了多个城市要塞

① Nicephorus Gregoras, I, 101.

② Nicephorus Gregoras, I, 243.

和黑海沿岸地区的港口城市,其中包括海军基地麦森布里亚和安奇亚鲁斯,迫使拜占廷人于1307年与保加利亚沙皇签订和约,确定了沙皇对其占领土地的权力^①。拜占廷人之所以屈服于保加利亚人,主要是因为当时肆虐色雷斯地区的加泰隆军团残暴抢劫,据说连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山各修道院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最终于1308年被击溃于塞萨洛尼基城下。不久,这两个巴尔干半岛小国之间的战争于1327年春季再度爆发,参与混战的不仅有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而且还有拜占廷内战的两个主角,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后者与保加利亚沙皇米哈伊尔·西斯曼(Michael Sisman)结盟,前者则与塞尔维亚人结盟。正当安德罗尼库斯三世胜利在望时,沙皇西斯曼突然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多亏了后者及时说服保加利亚沙皇,才保证其顺利攻占君士坦丁堡,废黜了自己的祖父。

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就是在这种小国林立、相互争夺的动荡中,名义上由拜占廷人控制着,但是,这种实质上的“霸权真空状态”进一步强化了各派势力之间的对立和各个弱小民族之间的仇视,给新的强大势力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廷人时而变换盟友和敌人,1330年,拜占廷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携手反对塞尔维亚人,同年7月28日两军在维尔布兹德(或称库斯坦迪尔)爆发决战,保加利亚全军覆灭,沙皇米哈伊尔·西斯曼本人则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胜利的塞尔维亚国王扶植其妹妹安娜和她的儿子伊凡·斯蒂芬成为保加利亚沙皇^②。这场战役标志着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它决定性地将保加利亚人排挤出巴尔干国家争霸的斗争,同时,使塞尔维亚人占有马其顿地区,进而奠定了塞尔维亚人称霸欧洲东南地区未来几十年的基础。此后,巴尔干半岛的新霸主不仅参与了拜占廷人的内战,而且继续打压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廷人,挺进色雷斯、爱琴海北部岛屿、塞萨洛尼基和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419页。

^② John Cantacuzenus, *The History*, trans by Robert H. Tron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79, I, 402.

伯罗奔尼撒。保加利亚人的衰落并没有影响阿森二世的后人以那个时代的大王国主人自居。他们仍然自比为“第二帝国”的沙皇,并按照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体制和税收制度建设本国官僚机构,甚至连官职的名称、修道院免税特权、依附农民的义务、税收杂役都仿照拜占廷人已有制度。保加利亚人还模仿拜占廷宗教、文学艺术,完全跟随着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和阿索斯圣山的风格不断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出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宗教文化影响深入保加利亚社会,使斯拉夫—拜占廷传统逐步成熟并表现出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保加利亚国家衰落的现状,它必须将自身捆绑在历史传统深厚的拜占廷国家上才能体现出其存在^①。根据现存梵蒂冈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两份14世纪保加利亚古代文献插图,清晰地表现出当时保加利亚沙皇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 1331—1371年在位)完全模仿拜占廷皇室的时尚,他不仅头戴拜占廷式皇冠和身着皇帝服装,而且有基督为之祝福,有天使为之加冕,这幅插图几乎完全是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画像的翻版。另一幅插图则表现沙皇及其皇后和两个儿子,他们均身着盛装,头上有象征神圣的光环,这又是典型的拜占廷皇家画像的翻版。显然,约翰·亚历山大不像他的祖先西蒙和阿森二世靠武力树立天下之主的形象,而是通过自封为“保加利亚和希腊人沙皇”,幻想自己成为巴尔干半岛甚至东正教的最高权威,那个在4世纪从意大利迁移到波斯普鲁斯海峡的辉煌的罗马城,已经再度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保加利亚沙皇的首都特尔诺沃,他真的以为保加利亚成为“第三罗马帝国”了。这种近乎病态的思维方式出现在几乎所有没落时期君主的身上,也许正是由于对败落无力拯救的现实才导致他们在虚幻的思维中寻求出路。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廷人一样,当时只是巴尔干半岛二等小国,他们在现实中的软弱地位确实需要在精神上得到弥补。

杜珊去世导致塞尔维亚帝国彻底解体后,保加利亚的地位没有得

^① 很多现代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人就是“拜占廷人的教子”。F. Dolger, *Byzanz und die europäische Staatenwelt*, Ettal 1953, pp. 156—157.

到改善,内部四分五裂,经济极度贫困,宗教争端不断。当土耳其人进军巴尔干半岛时,保加利亚人就在土耳其人入侵压力下,成为半岛地区第一个臣服于新霸主的国家。1364年,拜占廷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又起摩擦,保加利亚军队遭到败绩,拜占廷皇帝胜利地占领了安塞亚鲁斯,从而证明了保加利亚人是半岛最弱的民族。但是,不论塞尔维亚人还是拜占廷人都无法阻止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1371年9月26日发生的马里卡河科诺门战役中,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完胜,巴尔干各国纷纷降服,被迫承认苏丹的宗主权,向苏丹缴纳贡金,提供军事服役^①。这次战役开启了南斯拉夫各国被征服的历史,也使保加利亚人进一步臣服土耳其人。土耳其人进入欧洲只有20年的时间,包括拜占廷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沦为其附属国。奥斯曼军队于1383年占领塞里斯,于1385年夺取索非亚,于1386年攻克尼斯,于1387年攻陷塞萨洛尼基,于1388年攻入特尔诺沃,1389年6月15日打响了科索沃战役,最终扑灭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反抗,土耳其征服者横扫整个巴尔干半岛,确立了巴尔干半岛新的霸权。尔后,在1396年9月25日进行的尼科堡战役中,土耳其军队彻底击败欧洲联军,使其巴尔干半岛霸主地位得到巩固。从此,保加利亚人如同巴尔干半岛其他民族一样,沦为奥斯曼帝国的奴仆。1393年7月17日,苏丹巴耶札德一世率军占领保加利亚首都特尔诺沃,这标志着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灭亡。此后,土耳其人攻城掠地,占领了保加利亚全境,并使保加利亚人臣服了5个世纪。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451页。

第六章 俄罗斯人与匈牙利人

今天的俄罗斯并不在巴尔干半岛,但是,这个神奇的民族与巴尔干半岛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其文明化始于以巴尔干半岛为腹地的拜占廷帝国,其发展则离不开巴尔干半岛东侧的黑海。反之,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的诸多重大事件都有俄罗斯人的参与。因此,探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文化就不能不涉及俄罗斯民族。

第一节 早期罗斯人与俄罗斯文明化

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人,他们是由早期斯拉夫人发展而来的新兴民族。根据 11 世纪上半叶基辅洞穴修道院修道士涅斯托尔(Нестор)《往年纪事》中的传说,斯拉夫人是诺亚之子雅弗的后代,“在这 72 支民族中,有一支属于雅弗的后裔——斯拉夫民族。它被称为诺里基人,也就是斯拉夫人”^①。目前,斯拉夫人起源问题仍然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而没有最后结论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们起源于古代的斯基泰人^②,也有人认为他们是黑海北岸地区古安特人的后代^③。吉本根

① 《往年纪事》,第 15 页。

② 斯基泰人是东欧古代民族,西方最早的史料大概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其中第 4 卷有许多文字涉及该民族起源、活动地理范围和社会生活状况。希罗多德:《历史》,17、18。

③ 6 世纪作家乔尔达尼斯记载,最早的斯拉夫人在黑海北岸活动,分为三支,维奈塞人在维斯杜拉河下游地区,安特人在德涅斯特河和顿河之间地区,而斯科拉文尼人则在维斯杜拉河和多瑙河之间地区。T. Mommsen,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Princeton 1915, pp. New York 1960, tr. By C. C. Mierow, p. 119.

据早期罗斯人使用的两种语言推测其祖先的两种来源^①。《往年纪事》又说：“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斯拉夫人定居在多瑙河流域”，这大约指5世纪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这段文字仍然无助于解开俄罗斯人起源问题的谜团。近年来，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考古工作获得了较大进展，大量证据表明，他们最初活动在一个范围很大的地区，北部自尼门河上游和维斯杜拉河下游地区起，南抵东欧喀尔巴阡山脉，东到里海和第聂伯河中游。根据朱寰教授的意见，东斯拉夫人活动在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德维纳河和伊尔门湖地区，他们分为30个部落，其中以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为中心的波良人、以伊尔门湖附近的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诺夫哥罗德斯洛文人、以第聂伯河上游的斯摩棱斯克为中心的克里维奇人等发展较快。

他们从6世纪开始形成部落联盟，这种组织只在战争期间发挥作用，战争结束后就自行解体。平时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组织分为部落、氏族和家庭公社，部落和氏族均有各自的土地，他们之间保留许多空地、森林和草地，相互间没有明确的界线。氏族又由家庭公社组成，后者通常相当于大家族，各自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活动在林地丘陵地区的部落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为主，沿河靠海濒湖的部落以渔猎采集为主，而草原地区的部落以牧业和农业为主。直到9世纪，在开垦林地的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农村公社，即以地域经济关系取代血缘纽带关系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被称为“维尔福”。“8、9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制度日益解体，原始奴隶制也有所发展，但是它始终没有越过‘家长制奴隶制’的范围”^②。

《往年纪事》记载了许多早期俄罗斯人社会生活的有趣细节。“这

^①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VI, p. 279.

^② 朱寰先生将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战记》中提到的安特人理解为斯拉夫人的祖先，并对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生活有概括性的描写。朱寰：《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151页。

时的波良人还分散地居住,各自管理着本氏族。那是因为在几兄弟之前,波良人已经出现,而且以氏族为集团生活在自己的地盘里,各自为政。……他们建设一座城堡,以长兄的名字命名,称为基辅。城堡四周环绕森林和大松树,可以从事狩猎活动。他们是睿智、贤德的人,被称作波良人。他们的后代就是至今生活在基辅的波良人。……波良人具有自己祖传的温顺和沉静的性格,对待自己的儿媳、姐妹、母亲和父亲,举止稳重;在婆母和丈夫的兄弟面前,十分端庄。他们的嫁娶习俗如下:新郎不前去迎亲,而是由新娘自己前一天晚上登门,第二天(男方)再送来彩礼和聘金”。但是,“德列夫利安人的生活习俗犹如禽兽,居住条件猪狗一般。彼此相互仇杀;食物肮脏不洁。他们实行抢婚,而不讲婚嫁礼仪。……(其他人)有共同的习俗:像野兽一样住在森林里,吞食各种不洁的东西。在父亲或儿媳面前,口吐秽语。他们也没有婚仪,而是在村落间聚会欢乐,通过嬉戏、舞蹈和唱各种各样引诱挑逗的歌。在这里,取得对方的同意后,可携女而归。他们允许有两个或三个妻子。如果死了人,先要为他举行追荐亡魂的祭礼。然后,堆造一座大木架,把尸体放在上面,点燃焚烧,收敛骸骨,盛入小容器,放在设置在路旁的木桩上。……(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戒律的存在,只好根据自己的习惯,创造出的一套自己的规矩”^①。

关于早期俄罗斯人建国,《往年纪事》记载:859年,“来自海外的瓦兰吉亚人,向楚德人、斯拉夫人、麦良人和所有的克里维奇人征收贡赋。哈扎尔人向波良人、塞维利人和维亚吉奇人征收——每灶交纳一块银币和一张灰鼠皮”。862年,东斯拉夫人“把瓦兰吉亚人驱逐到海外,不再向他们交纳贡赋,同时开始自己对自己的管辖。他们彼此之间再无正义可言,各个氏族相互争雄,内讧不休,战乱频仍。他们相互商议:‘我们为自己寻求个王公吧,由他来治理我们,根据法律裁决(我们的纠纷)。’……这些人也(称为俄罗斯人)。……来到斯拉夫人这里。长兄留

^① 《往年纪事》,第25、32—33页。

里克坐镇诺夫哥罗德，……正是由于这些瓦兰吉亚人的缘故，才出现了‘罗斯国家’这个名称。诺夫哥罗德人指的是出身于瓦兰吉亚氏族的（诺夫哥罗德市民），而（诺夫哥罗德市民）以前指的是斯拉夫人。……留里克独自掌握一切权力……全都受着留里克的统治”^①。留里克于879年去世，其亲戚奥列格继续统治诺夫哥罗德，而后南下第聂伯河，一路烧杀，3年后征服基辅，并在基辅建立留里克王朝的基辅公国。基辅公国继续扩张，征服了俄罗斯平原上所有的斯拉夫部落，形成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瓦兰吉亚人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罗斯国家。

现有的资料证明，早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兰吉亚人侵入波罗的海至黑海的广大地区以前，分散居住在此的东斯拉夫人就已经开始开发这一地区。他们在6—9世纪数百年期间，以部落为单位，在包括哈扎尔人在内的外族统治下奠定了基辅公国的基础，也开辟出今天俄罗斯欧洲部分发展的历史舞台。瓦兰吉亚人的入侵和暴力统治所起的作用是将分散的东斯拉夫人联合成为具有共同地域利益的国家。而占统治地位的瓦兰吉亚人，与他们之前的哈扎尔人一样，在人数众多的东斯拉夫人中只是“少数派”，因此逐渐被融合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斯拉夫人中。客观而言，波罗的海至黑海的贸易路线也是瓦兰吉亚人以武力开辟出来的，这条路线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促使俄罗斯欧洲地区共同经济利益的形成，进而形成了地缘政治的共同利益，奠定了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共同基础。此外，研究表明，尽管东斯拉夫人是波罗的海至黑海之间广大平原的主体民族，但不是唯一的民族，在这一地区最初几个世纪的发展中，还有哥特人、匈奴人、哈扎尔人、潘臣涅格人、芬兰乌戈尔人、马扎尔人、犹太人、瓦兰吉亚人和阿兰人等，他们都是俄罗斯草原上的放牧者和耕种者。可以说，今天俄罗斯民族的欧洲部分是古代中世纪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的成就，人们在充分关注主体民族的同时，也不

^① 《往年纪事》，第43—45页。

能忽视他们的贡献^①。

古代罗斯留里克王朝统治者以战争和贸易为主要活动,通过战争掠夺各地斯拉夫人的生活资源,包括毛皮、蜂蜜、蜂蜡和奴隶,而后通过贸易活动出售给拜占廷人,换取丝绸、呢绒、金银器皿、香料和其他奢侈品。两个民族的贸易往来多在春夏季节进行,大多是罗斯人使用独木舟组成的船队,沿第聂伯河进入黑海,经近海航道到达君士坦丁堡。为了防止罗斯人造成的麻烦,拜占廷人限定其入城人数每次不能超过50人,并且不佩带武器。其他罗斯人则在首都城外指定的圣母河码头等待交易完成,入冬前返回罗斯。在拜占廷史料中,瓦兰吉亚人第一次是以入侵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是据更早的法兰克史料称,839年时,有一个自称为罗斯人的使团从拜占廷帝国进入法兰克王国,要求国王虔诚者·路易为他们提供返回其北欧家园的方便,因为他们如果取直线回家,必经法兰克领地。不巧的是,当时法兰克人经常遭到北欧海盗的袭击,恼怒的虔诚者·路易遂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②。这个事件并不见于拜占廷史料,因此很可能是北欧商人伪托使团之名,不想弄巧成拙。大约是在同一时期,瓦兰吉亚人还曾袭击过拜占廷人在克里米亚的车绳城乡,不久还抢劫了黑海南岸的阿马斯特利城。

860年7月18日,由200艘船组成的瓦兰吉亚人船队首次进攻到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③,当时,拜占廷舰队正巧在地中海与阿拉伯人作战,而陆军也在皇帝亲自指挥下前往亚洲前线。首都防务空虚,恐慌情绪弥漫京城,特别是许多人在城墙上目睹野蛮人对城郊

① 奥伯林斯基将早期罗斯人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北欧的瓦兰吉亚人占领并统治诺夫哥罗德为第一阶段,奥列格南下第聂伯河征服基辅,并在基辅建立留里克王朝的基辅公国为第二阶段,而后再将诺夫哥罗德和基辅联合为一个国家是第三个阶段。哈扎尔人的衰落是自第二阶段开始的,灭亡则是在斯维雅托斯拉夫时期。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81.

②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VI, p. 274.

③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278.

农村和王子岛的无情蹂躏,以及对拜占廷俘虏的酷刑杀戮,这使君士坦丁堡居民人心惶惶。大教长弗条斯和首都市长担负起领导民众抵抗瓦兰吉亚人的任务,他在皇家教堂圣索非亚教堂发表演讲:“这是什么?这痛苦而沉重的打击和暴虐是什么?为什么这可怕的霹雳从最遥远的北方落到我们头上?……一批人从北方席卷而来,好像是在攻击另一个耶路撒冷。……我万分悲痛,因为我看到一个狂暴野蛮的部落肆无忌惮地蜂拥而来,抢劫城郊,洗劫农村,摧毁一切,蹂躏一切,田地、房屋、载物的家畜、妇女、儿童、老人、青年,他们的刀剑刺穿了所有的东西,他们对什么都不怜悯,什么都不留下。……噢!几乎统治整个世界的城市啊,尽管军队无首,谦卑的风尚盛行,但是仍然视你们为奴婢”^①。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842—867年在位)得到首都告急的战报后,立即从卡帕多西亚率领军队返回增援。最终,瓦兰吉亚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退却。关于退却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拜占廷世俗作家认为瓦兰吉亚人船队遭遇暴风雨,船只损害严重,导致失败。而拜占廷教会史作家认为是圣母显灵,奇迹般地击溃了敌人的攻击,他们把瓦兰吉亚人的突然出现视为上帝对拜占廷人违背天意的惩罚,而在瓦兰吉亚人攻城的紧要时刻,大教长率领民众高举圣母像,围着城墙祈祷,凡是见到圣母的敌军纷纷退却,致使瓦兰吉亚人损失惨重。事实上,当时的瓦兰吉亚人在军事上还比较落后,不具备攻陷城市,特别是像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大城市的能力和技术。而拜占廷东方远征军的驰援和海上天气的变化可能是瓦兰吉亚人退却的关键因素,毕竟他们使用的船只大多是用巨大的原木制造的原始战船,无法抵御“希腊火”的焚烧和拜占廷人的防守反击。瓦兰吉亚人对拜占廷的攻击或许还带有不满意拜占廷人歧视他们的态度,或者是企图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个富有的城市。

^① Photius, *The Homilies of Phot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By C. Mango, Cambridge, Mass., 1958, pp. 102—103. 弗条斯举行的多种祈祷仪式从此成为君士坦丁堡在面对敌人攻击时必然采取的宗教活动,一直到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君士坦丁堡保卫战时仍然如此。参见陈志强:《君士坦丁堡陷落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总之,这次瓦兰吉亚人指挥下的罗斯军队染指巴尔干半岛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可能是因为瓦兰吉亚人的袭击,使皇帝米哈伊尔三世于同年底,派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出使哈扎尔汗国,并加强了两国的联盟关系^①。

拜占廷人先前的可靠盟友哈扎尔人在其他原始游牧民族两面夹击下衰亡后,其居民被新兴民族同化。为了保持黑海北岸地区和高加索山区的战略平衡,拜占廷人转而注意与代之而起的罗斯国家和来自中亚的潘臣涅格人部落民族建立友好关系。860年以后,罗斯公国的使节定期访问拜占廷帝国,其中一些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难怪弗条斯在大教长致东方各地大主教的通谕中自豪地宣称,罗斯人以前总是野蛮地攻击其他民族,现在却归附于拜占廷帝国教会,成为帝国的盟友^②。874年,罗斯人和拜占廷人还缔结协议,同意拜占廷教会向罗斯人派遣主教。我们大概不能过高估计这份通谕传达出来的信息,它也许只是表明拜占廷传教士被允许在当地传教,而作为整个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基督教国教的事件是发生在百余年以后,或者把这个时期基督教在罗斯人中的传播视为后来事件打下的良好基础。

879年,留里克(Ruric,862—879年在位)去世,“临终,将自己的公国委托给族人奥列格,又把儿子伊戈尔交到他的手里”。907年,“奥列格让伊戈尔留守基辅,自己前去进攻希腊人。他率领大批波良人、斯拉夫人……还有担任译员的吉维尔人。他们全都被称为‘大斯基泰人’。奥列格率领所有这些人,或骑马或乘船出发。他们的船只是2000艘。奥列格抵达沙皇格勒(指君士坦丁堡)城下。希腊人封锁舒特湾(即金

^① 有关这次出使活动的细节请参见本书土耳其一章的第二节,另见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南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8,237—243页。

^② Theophanes Continuatus, *Chronographia*, ed. I. Bekker, Bonn 1838, iv, 33, p. 196. J. P.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 Paris 1857—1936, 102, cols. 736—737.

角湾),紧闭城门。奥列格登陆上岸^①,在城郊展开军事行动,大批杀戮希腊人,毁掉许多宫殿,焚烧教堂。他们抓获的战俘,或砍杀,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杀,或抛入海涛。罗斯人对希腊人还犯下许许多多的罪行,正像通常对待敌人的所作所为那样。”据说,奥列格的远征军人数达到8万以上。拜占廷人无力抵抗,被迫求和,答应满足奥列格的各项要求,包括2000艘战船上8万士兵的费用,“为罗斯各城市发放贡赋,首先是基辅,其次是切尔尼哥夫……,以及其他城市。因为这些城市驻着拥戴奥列格的王公”。“罗斯人来到后,对于使节,按其需要供应口粮;对于商人,供应6个月的月粮:面包、酒、肉、鱼、水果。他们如若提出,还得安排沐浴。罗斯人离去,返回家园时,从皇帝那里可以得到旅途中所需要的食物、锚、缆绳、帆,以及其他需用品。希腊人接受上述条件。两位皇帝和全体大贵族还宣布:‘如果罗斯人不是前来经营商业贸易,不能得到月粮。对于来到我们这里的罗斯人,王公必须亲自明令,禁止他们在我国城乡作恶。凡到来的罗斯人必须住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们要在皇帝的差官陪同下,经过同一座门进城,不得携带武器,每次限定为50人。他们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事贸易,不交纳任何税收。……奥列格携带大量的黄金、丝绸、水果、酒和各种贵重物品,返回到基辅”^②。根据约定,由900人组成的罗斯兵团曾参加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远征^③。

奥列格(Oleg,882—912年在位)是继留里克之后第二位企图染指

① 据说,罗斯人船队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为了对付拜占廷人在水面上设置的铁链封锁,特地设计了带有轮子的战船,并借助风力可以在地面行驶,令拜占廷人大为惊讶,被迫求和。但是这种水陆两栖的设计没有流传下来,只保存在民间传说中。《往年纪事》,第64页。但是,据说这种战术后来被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模仿,在1453年4月22日用木板加黄油的方法将战舰拖过铁链封锁线。陈志强:《君士坦丁堡陷落记》,第139页。

② 《往年纪事》,第65—68页。对于这次战事以及对罗斯人极为有利但带有一些侮辱性规定的商约,有些学者提出疑问,因为在同一时期的拜占廷史料上没有相关记载。

③ 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记载的数字与罗斯古籍不同,他记载为700人。Constantine, *De ceremoniis*, trans by A. Vogt, Paris, Societe d'edition "Les Belles letters" 1935, II, 44.

巴尔干半岛的罗斯君主,这次入侵也是古代罗斯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尝试。就战争目标而言,奥列格所代表的古代罗斯人尚未形成明确的意图,他们只是采取其传统的“索贡巡行”的方式,以抢劫财物和奴隶为主,但是,不能排除的是,假定他们真的占领了温暖富有的君士坦丁堡,就将把自己的首都南迁到此,因为,他们在882年征服了基辅后就将其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一些学者把这次战争视为商业战争,认为战争的结果是双方订立了对罗斯人有利的商业优惠条件的协议。但是,从史料记述的内容看,协议涉及拜占廷人以金钱换取和平、对罗斯商人的贸易方式等两项内容。前者是拜占廷人一贯的作法,在他们看来,拜占廷帝国及其首都非常富有,用些许小钱儿和物品打发走野蛮人不仅无损于帝国的实力,而且可以使帝国的威望远播,这与向野蛮人赠送礼物没有本质区别。协议内容涉及的是停战赔款,而不是年贡,因为赔款的数额是按照参战人数确定的一次性支付,大约相当396.6—155.4吨白银。考虑到《往年纪事》记载中的夸大因素,这个协议实际上只是拜占廷人对付北方民族袭击的惯例,没有引起拜占廷人的重视,因此在同时代拜占廷人的许多作品中都没有记载。至于“免税”问题,似乎也不能以后世人甚至现代人的概念去理解,因为在拜占廷——罗斯贸易中,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罗斯人几乎不是拜占廷人对等的贸易伙伴。从协议条款看,拜占廷人是把这些野蛮人的所谓贸易看作“乡下人进城的消费”,故而既限制了他们进城的人数和行动,又规定了他们消费行为的资格和方式。所谓免税,可能就相当于免收他们的“消费税”。过高地估计或评价奥列格战争行为和907年协议,可能都缺乏对当时实际情况理解的历史感^①。

奥列格于911年又派遣使节赴君士坦丁堡再订和平条约,共有15

^① 有关这个历史事件的史料目前尚无旁证,“尽管没有任何其他史料,无论是拜占廷的、西方的或东方的,提到这次远征和奥列格的名字,但是,这个涉及事件细节的《往年纪事》的记述是依据真实的历史事件”。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p. 320—321.

条。其中1、2条款涉及签定和约的意图，“承蒙罗斯大公及其荣耀的大公所隶属的大贵族的派遣，代表他的麾下的所有罗斯人，遵照我们王公的意愿，维护基督徒和罗斯人之间多年来保持的友好关系，前来谒见你们……。我们的大殿下高于一切的愿望，就在于巩固和加强为人们所皆知的，上帝加以庇护的，基督徒和罗斯人之间的友谊。我们这种不止一次存在过的友谊是根据公道和正义得出来的，它已不再是口头上的，而是要用文字写下来的，且要以自己的武器发出坚定的誓言，这种友谊还要以我们的信仰和法律加以普遍的确认”。“我们将竭尽全力，今后永远保持和你们的友好相处，决不发生动摇、半途而废。……在今后永久的岁月里，必须保持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友好”。第3、4条涉及凶杀犯罪，即如何确定案情，如何判刑，如何罚款。在确定案情时重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则重誓言。对于杀人者要处以极刑，“就在行凶现场处死凶手”，或“抓获后予以处死”。至于罚款则“应该根据法律的规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赔偿给受害人的近亲”。第5、6、7条涉及伤害、施暴和偷盗罪，这些罪行的惩罚以罚款为主，但是惩罚不以伤害的程度而以犯罪行为本身为依据，如以器物伤害他人，“那么，根据罗斯的法律，对于砍砸或打击行为，应该交纳白银5升”。“如若行凶者没有财产那应尽其所有交出全部的东西，以致包括脱去他身上穿的衣服”。对于被打者，“应予3倍的赔偿”。而对于偷盗者，因拒捕而被打死，“那么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罗斯人，不应因打死窃贼而被交付审判。受害者还要取回自己被偷盗去的财物”。对束手就擒的窃贼则罚款3倍的价值。第8条涉及海难船舶及其运载货物的处置，即无论是罗斯船只在拜占廷领域还是拜占廷船只在罗斯领域失事，都采取物归原主的原则，或“将它重新遣送回基督徒的国家”，或“要将遇难的船舶送返罗斯国”，船上的货物仍归原来的主人。第9、10、11条涉及招募对方国民士兵和战俘问题，“如若需要招募士兵，而这些人也希望报效尽忠你们的皇帝，愿意这么做，并且根据自己的愿望，想要留在你们皇帝的身边。对此应该予以满足”。而对于战俘“将要予以出售，那么无论是罗斯人还是希腊人，而

且确实证明他们是罗斯人或希腊人,应该将被出售者送回自己的国家。……他的身价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予以支付”。“对于所有这些人应以20佐洛特尼克(指金币)的价格予以赎买”。第12、13、14条涉及财产纠纷,如遗失财产、继承财产、债务财产等,也实行物归原主和物归原国的原则,丢失的钱财“应该予以归还所有者”,遗产或“根据死者的遗嘱,把财产给予他要给的人”,或送还他的国家,而欠债还钱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后一条确认条约文本的双方、时间、誓言和生效办法^①。

从条约文本看,它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对拜占廷帝国“屈辱性的条约”,而是就双方贸易活动提出的具体法规。首先,这个条约是双方平等条件下提出的,任何一方都未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提出不利于对方的条件。其次,它的目的很明确地写在条款中,为了罗斯人“今后永远保持和你们的友好相处,决不发生动摇、半途而废”。它没有强制拜占廷方面必须接受和平,因此也没有“屈辱”的意味,甚至提出“我们将依据自己民族的信仰和习俗,且不破坏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订立的和平条约的内容和友谊,对你们的受命于创造万物的上帝的皇帝,举行发誓”。即便以外交辞令来理解,我们也很难产生“屈辱”的感觉。再者,条款大多是针对贸易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在跨国贸易活动中经常涉及的债务问题、财产丢失或海难问题、商人死亡后财产的归还问题等。这是非常易于理解的,在讨价还价中的争吵、打斗乃至杀人都是经常发生的。在有限的条款中,就最容易发生的行为做出规定,正是这一条约落实“和平”的实际步骤和措施。最后,对犯法行为处理的原则也不含有任何不平等的因素,例如战俘、伤害的赔偿是对等的,并无歧视性条款。在具体的规定中,无论是犯罪主体和受害一方,还是定罪方式和惩罚量刑,都没有因为其民族属性而有所区别。对比拜占廷人与其他北方入侵民族的条约而言,这个条约是非常公平的。只有

^① 《往年纪事》,第70—80页。

当我们以大帝国的眼光来分析这些条款,将罗斯人视为野蛮人,从而先人为主地设定拜占廷人应该高人一等的話,才可能产生“屈辱”的感觉。应该说,奥列格时期,俄罗斯民族与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特别是拜占廷人保持平等的贸易关系。根据这个条约,俄罗斯人于同年派出700人的军队参加了拜占廷海军将领伊梅留斯(Admiral Himerius)指挥的克里特岛战役,收复被阿拉伯海军占领的这个东地中海重要的战略据点。

912年,奥列格去世,留里克之子伊戈尔(Igor,913—962年在位)即位,他继续保持罗斯国家的传统,实行索贡巡行的统治方式,并不时对外抢劫扩张。事实上,这种传统是早期瓦兰吉亚人在征服东斯拉夫人过程中形成的,罗斯贵族一直依靠武力维持留里克王朝历代君主的统治。每年收获季节后,大公率领的军队即开始到各地抢劫收缴各种农副业产品,通过强制征收贡品,罗斯王公保持国家开支,维持专制统治。由于古代罗斯人尚无自己的文字和国家管理系统,因此在相当长时期里,他们只能靠这种野蛮的掠夺方式施行国家权力。941年,伊戈尔率领万艘战船和数十万士兵洗劫本国农村后,趁拜占廷帝国海军远在爱琴海而陆军远在亚美尼亚,突袭博斯普鲁斯海峡,远征拜占廷帝国首都,“罗斯人水陆并进,在维菲尼亚(黑海与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小亚细亚)地区发生战斗”,沿黑海南岸直达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地区,一路烧杀抢掠,“把抓获到的人们,或钉死在十字架上;或作为箭靶射杀,或反缚双臂,以铁钉楔入头顶。他们将许多教堂、修道院和村落付之一炬”。他们甚至进兵至君士坦丁堡郊区,被紧急增援的拜占廷军队“团团包围……”。罗斯人经过商计,决定武装反击希腊人。于是双方之间发生激烈战斗。希腊人勉强赢得个上手。傍晚,罗斯人向自己的扈从队集结,准备趁夜色掩护,登舟逃遁。费奥凡(拜占廷贵族)率配备火器的船舰,迎击敌人,利用导管向罗斯人船舰施放烈焰,恐怖可怕的奇迹场面顷刻展现在眼前。罗斯人看到燃起熊熊大伙,争先恐后地纷纷跳入大海,妄图活命。侥幸生存下来的人,返回本国。这些回到自己家园的人,无不向乡亲讲述个人的历险遭遇和喷火的船。‘犹如天空的闪电’他们说。

‘希腊人将自己拥有的这种东西喷放出来，焚烧我们。因此，我们没有战胜他们’^①。伊戈尔舰队如同860年和907年的罗斯舰队一样，遭受沉重打击，被海军将领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指挥的帝国海军拦截，舰队遭到毁灭性的损失。

伊戈尔损失惨重，但是不甘心失败，经过准备，于944年再度“以船舰和马匹分路挺进希腊，为的是替自己报仇雪耻”。“皇帝得知这些情况后^②，委派几位身份很高的显贵去恳求伊戈尔：‘请不要来吧。我们交纳贡赋，数量如同奥列格索取的那样，我还可以进一步增加贡赋的数额’。皇帝同时向潘臣涅格人馈赠珍贵的丝织物和大量的黄金，请求他们从侧翼攻击俄罗斯人^③。这时，伊戈尔已经进军到多瑙河畔，他召集扈从队，发表谈话，把皇帝的请求告知众人。伊戈尔的扈从们说：‘如果真像皇帝说的那样，不战而可以赢得黄金、白银和珍贵的丝织物的话，我们还再有什么奢求呢？难道谁能未卜先知预测胜负的是我们还是他们？再说谁同大海有缘？我们不走陆路就得跨涉深海——无一不意味着死亡(的危险)’。伊戈尔听完扈从队的意见，……携带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黄金和丝绸，率领人马向后撤退，返回到自己的基辅国家”^④。同年，拜占廷人向基辅派遣了两名使节，而伊戈尔也派使者回访。次年，双方订立新的和约。这是留里克王朝第三次染指巴尔干半岛的企图，也因拜占廷人的军事外交活动而流产^⑤。

945年的和约共16条，基本内容是重新确认911年和约的条款。

① 《往年纪事》，第81—85页。这一事件在拜占廷史料中也有记载。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p. 322—323.

② 拜占廷帝国驻车绳地方官在向皇帝呈送的紧急报告中称：“我看到俄罗斯人乘无数船只蜂拥而来，他们的船只覆盖了整个海面。”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88.

③ 拜占廷作家的记载与此不同，据说拜占皇帝严厉斥责伊戈尔。Leo the Deacon, *History*, trans by Alice - Mary Talbot, Washington, D. C. :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5, VI, 9.

④ 《往年纪事》，第91—95页。

⑤ Constantine, *De Cermoniis*, II, 46.

对比两个和约,人们不难发现新和约有几个特点。首先,它委婉地承认俄罗斯人发动入侵的错误,“罗斯方面若有人试图破坏这种友好关系,他们要是施洗者,必将遭受到万能的上帝的惩罚,死后打入地狱,万劫不复;他们若是未受洗礼者,必将失去来自神祇和别伦的庇护,得不到自己盾牌的保护,丧命于自己的剑、矢和其他的武器,永生永世沦为奴隶”。这样的诅咒并非针对双方,而仅仅限于俄罗斯人,可见该和约为重修条款提出了前提条件。其次,它对俄罗斯人使节和商人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资格限制,不仅“使节携带金印,商人携带银印”,还要“携带你们王公差派他们前往我们国家和皇帝这里来的文牒”,并规定了书写格式和内容,“便于我们通过这些文牒得知,他们是抱着和平的意图而来的”。对于违反规定的“将被予以扣押和监护,……而若反抗的话,将杀死他们。对于他们的死亡,你们的王公不得予以追究”。再者,和约对罗斯商人的贸易活动进行了更加苛刻的要求,不仅确定了价格,如“每个切良金(货币单位)2匹丝绸”,而且限定了数量,如“罗斯人进入城市后,也无权购买超过50佐洛特尼克(指金币)的丝织品。如果有人购买了这些丝织品,应拿给皇帝的官吏,让其加盖验章后再归还他们”,否则出关时予以没收。为了约束罗斯人,条约要求“应明令禁止他们在乡村以及我们国家各地胡作非为”。最后,它赋予拜占廷人司法特权,因此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如规定“如果我们帝国权力管辖下的希腊人,犯了某种罪行,(罗斯人)无权惩罚他们。但是,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将根据我们帝国的命令给予惩罚”,而罗斯人却不享有同样的司法特权。同时,它在涉及刑罚时强调“按照希腊的习惯和罗斯的法律和习惯予以惩罚”,这是过去和约中没有的。另外,第8、11条专门提出拜占廷人对黑海沿岸克里米亚地区到赫尔松国家的保护权,表明拜占廷帝国在黑海区域占据的优势地位^①。

如同奥列格一样,10世纪的罗斯君主均致力于南下进攻拜占廷帝

^① 《往年纪事》,第97—108页。

国的军事活动,在一个世纪期间,至少发生过5次大规模的人侵战争,其中3次是以君士坦丁堡为进攻目标。战争的目的是明确的,即南下掠夺生活消费物质财富。事实上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原始民族各个部落均南侵欧洲大陆地区,不仅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而且在泰晤士河和塞纳河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民族迁徙战争,拜占廷人、法兰克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都受到北欧海盗民族的攻击^①。关于战争或迁徙的深层原因的问题,还有待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才能得出答案。无论战争造成了多少人员损失和财产破坏,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却是参战各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原始民族在迁徙入侵过程中逐渐开发了欧洲大片的无人地带,将冻土地带的民族与地中海世界的传统联系起来。同时,战争结束时采取的谈判方式和订立的和约使一种更加文明化的方式,逐渐为原始民族所接受。特别是通过战争和各方的人员,如使节、传教士、商人、乃至参战的将士,更加文明的精神和价值不断被传播,其影响不断扩大^②,从而为欧洲在中世纪期间的整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此,早期俄罗斯国家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十余年后,拜占廷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争却为罗斯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几乎使这种努力获得成功。

11世纪以前,几乎所有古代罗斯人王公在位期间,都要发动对拜占廷帝国的袭击,只有伊戈尔的妻子奥丽加(Origa)是个例外。945年,伊戈尔在每年一度的索贡巡回抢劫中,被德列夫里安人抓获,并被捆绑在

^① 北欧海盗民族南下的情况清晰地表现在《剑桥插图中世纪史》提供的地图上。罗伯特·福西耶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陈志强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518页。

^② 《往年纪事》,第81页记载:“皇帝利奥向罗斯使节馈赠大量的各种礼品——黄金、绛罗绸缎,以及珍贵的纺织品,且使他们享受到荣誉,指派自己的大臣带领他们去领略教堂的美景,欣赏黄金的宫殿,还有它们里面收藏的众多财宝——巨额的黄金、精美的织物和宝石,以及主耶稣蒙难的遗物一冠、钉和沾染血的衣袍,圣徒的尸骨,从而向他们传播自己的信仰,展示自己的合乎真理的信仰”。这样的活动是拜占廷人接待其他民族使节必不可少的内容,带有明显的宣传意图。

两棵树上撕裂而亡。当时,其子斯维雅托斯拉夫(Svyatoslav)尚年幼无知,其妻奥丽加(945—969年在位)继续统治国家。她首先残酷镇压了杀害伊戈尔的德列夫里安人,据记载,她答应德列夫里安人君主马尔使者请求改嫁马尔的要求,而后把全部使团成员活埋在她的宫殿外。接着她请德列夫里安人的大批贵族前往基辅迎接她下嫁,但却设计将他们全部烧死在浴池大堂里。在消息还未传到德列夫里安人地区时,她亲自率领部队以酒宴为名又屠杀5000名德列夫里安人。次年,她在攻打德列夫里安人中心城市伊斯科罗斯坦时,久攻不下之际,欺骗德列夫里安人以每户交纳3只鸽子和3只麻雀为停战的代价,而后利用放归这些鸽子向城内放火攻陷城池。她在疯狂报复后,夷平该城,当地居民被杀或卖为奴隶。

奥丽加在稳定了罗斯国家统治后,于955年出访拜占廷帝国,抵达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隆重欢迎。“皇帝见她长得异常美丽和聪明,又为其智慧所折服,便对她说:‘你应该和我在这座城市里共同君临皇位’。她理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便回答皇帝:‘我是多神教信徒。如果你想让我接受洗礼的话,必须亲自为我洗礼,否则我不接受领洗’。皇帝和大牧首共同为她举行洗礼。受洗之后,奥丽加身心两个方面都感到十分愉快。……洗礼后,皇帝会见她,对她说:‘我想娶你为妻’。她回答:‘你为我洗了礼,称我为女儿,怎么又能娶我为妻子呢?基督教徒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呀。这点你清楚’。……皇帝送给她大量的礼物:黄金、白银和丝织品,以及各种器皿,称她为自己的女儿,让她离开”^①。这样,奥丽加就成为古代罗斯国家第一位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也是唯一一位以和平方式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拜占廷人接待的俄罗斯君主。但是,她在国内推行基督教化政策的计划遭到其子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反,直到33年后才由弗拉基米尔大公利用巴尔干半岛局势动荡的机会变为现实。

^① 《往年纪事》,第121页。

对于奥丽加出访拜占廷首都一事,拜占廷人也有详细记载,但是没有关于皇帝暗示求婚的内容。事实上,根据拜占廷社会严格实行的基督教婚姻法^①,《往年纪事》的相关内容纯属杜撰。君士坦丁七世写道:奥丽加在皇宫里首先拜见了皇帝和皇后,而后,她就和皇帝一家坐下来亲切交谈,而这种会见方式“是应她的要求安排的”。当天晚上为她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她被安排在皇后旁边,由拜占廷帝国高级贵族妇女陪伴,她们都来自当时帝国最高贵族的6个等级,只有她们才享有与皇帝同餐的特权。餐后的甜点则由皇帝一家陪同。这种高规格的接待,只是用于对类似俄罗斯君主这样的首次来访者,而奥丽加接受基督教信仰则意味着皇帝成为她的教父^②。

965年,保加利亚贵族为争夺巴尔干半岛霸主地位,迫使沙皇彼得向拜占廷皇帝提出续修927年协约,同时增加年贡数额的要求。拜占廷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Nikephorus II, 963—969年在位)断然拒绝,因为拜占廷人此时实力增强,并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故对保加利亚人的无理要求加以回绝,同时调兵遣将,陈兵两国边境。拜占廷人还派遣特使,携带重金前往基辅,收买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Svyatoslav, 942—972年在位)派兵攻打保加利亚人。这一要求正中斯维亚托斯拉夫下怀。967年,罗斯人派军队进入多瑙河下游地区。《往年纪事》就此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向多瑙河的保加利亚人用兵。两军交战,斯维亚托斯拉夫制胜保加利亚人,夺取多瑙河沿岸的80座城池。他在佩列雅斯拉维茨称起了王公,同时向希腊人索取贡赋”。佩列雅斯拉维茨即今天多瑙河入海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城市图尔恰,为多布罗加地区的战略要地。正如留里克当年将首都从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南迁第聂伯河流域的基辅一样,斯维亚托斯拉夫计划从基辅迁都多瑙河南岸的佩列雅斯拉维茨,他“对自己的母亲和波雅尔(罗斯贵族统称)说:‘我不欣赏基辅,而想住在多瑙河畔的佩列雅斯拉维茨。那才是我的国家

① 参见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129页。

② Constantine, *De cerimoniis*, ii, 15, pp. 594—598.

的中心,一切财富都集中到那里:来自希腊的黄金、丝绸品、美酒,以及各种水果;来自捷克和乌戈尔的白银和马匹;来自罗斯的毛皮、蜂蜡、蜂蜜和切良金”^①。968年冬季,斯维亚托斯拉夫闻报潘臣涅格人包围基辅,匆忙撤出巴尔干半岛救援,“很难免除是保加利亚人或是拜占廷人把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召唤来的嫌疑”^②。

可见,历代罗斯君主推行着不断南下的政策,他们不仅将政治中心南移,而且对拜占廷帝国发动的军事行动规模越来越大。其根本原因是物质资源更加丰富、生存环境更加舒适的南方地区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长期采取基本相同的南下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是罗斯人的一贯政策,而且成为所有北方民族的迁徙规律。可惜的是,尚无本民族文字的多数原始民族未能留下相应的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这段话真实地表达了所有北方民族的心理,也道出了北方民族普遍的愿望,可以成为破解世界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南人侵和占据南方农耕民族生存地的不解之谜的答案,进而也可以说明古代世界的农耕民族何以总是被动防御而草原游牧民族始终主动进攻的基本原因。

969年,79岁的奥丽加病逝,临终前,她对儿子说:“安葬了我,再去你想去的地方。”斯维亚托斯拉夫在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安排其私生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掌管罗斯国家政务,而后于夏季领兵再度南下巴尔干半岛。弗拉基米尔是奥丽加宫廷心腹贴身女奴玛露莎和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其舅舅是军事将领多布雷尼亚,因此他在军政两界影响都很大,后来成为新的罗斯君主。斯维雅托斯拉夫再度率1万士兵进犯巴尔干半岛,并准备定居于此。但是,拜占廷人已经控制了保加利亚地区,巴尔干北部地区已经恢复了和平,所以,罗斯人的入侵就使当地再度陷入战争。969年,罗斯军队占领普里斯拉夫,次年又夺取腓力普堡,洗劫拜占廷人的色雷斯地区。根据《往年纪事》的记载,

① 《往年纪事》,第129—132页。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29.

“斯维雅托斯拉夫来到佩列雅斯拉维茨,保加利亚人紧紧地关闭城门,而且以武力对抗斯维雅托斯拉夫,双方战斗激烈,……傍晚,斯维雅托斯拉夫转败为胜,发起冲锋,占据城市”普里斯拉夫。而后,他继续挺进色雷斯平原,拜占廷人“派出10万大军对抗斯维雅托斯拉夫。斯维雅托斯拉夫向希腊进军,希腊人出兵迎击罗斯人”,以少战多的罗斯军队在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鼓舞下,奋起拼杀,“于是,罗斯人武装起来,激烈地、残酷地奋战搏斗。斯维雅托斯拉夫取得了胜利,希腊人撤退逃跑。斯维雅托斯拉夫一路战斗,一路破坏城镇,向首都挺进。那些城市至今荒芜人烟”^①。罗斯军队一度攻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大肆破坏城郊农村。当皇帝约翰提出议和时,遭到骄横的斯维雅托斯拉夫的拒绝,他回答说:“如果罗马人不想付钱,那就让他们从欧洲滚蛋去亚洲好了,这里可不应该属于他们。否则,罗马人和罗斯人之间永无宁日”^②。事实上,拜占廷人正在争取时间进行决战前的准备^③。

971年,善于奇袭作战的皇帝约翰一世(John I, 969—976年在位)派遣300艘装备了“希腊火”的战舰从黑海逆多瑙河而上,同时率领配备了火器和攻城器械的陆军,在罗斯人尚未来得及封堵巴尔干山脉隘口之前,强行翻越山脉,联合保加利亚人夺取了被斯维雅托斯拉夫占领并当作首都的普里斯拉夫。同年4月,两国军队在普里斯拉夫以北的西西斯特利亚平原展开决战。装备精良的拜占廷骑兵经过13次冲锋,击溃原始装备的罗斯步兵阵营,迫使斯维雅托斯拉夫退回多利斯托隆。拜占廷人趁胜追击,又将斯维雅托斯拉夫围困在西西斯特利亚城3个月,迫使他接受和谈条件,保证退出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以北地区,撤回罗斯国,并保证不进攻拜占廷帝国在黑海北岸的领地,还要根据拜占

① 《往年纪事》,第133—134页。

② Leo the Deacon, *History*, vi, 10.

③ 皇帝约翰一世斥责斯维雅托斯拉夫说:“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令尊伊戈尔失败的教训,他曾签署了誓言和约,还以重兵和无数船只侵袭帝国京城”,结果遭到惨败。Leo the Deacon, *History*, vi, 10.

廷人提出的要求,在战时出兵帮助拜占廷人^①。斯维雅托斯拉夫提出的条件是,拜占廷人为其饥寒交迫的士兵提供食品,在被拜占廷人封锁的多瑙河上为罗斯人撤退放开通道,保证不唆使潘臣涅格人袭击撤退的罗斯人。根据《往年纪事》所载 971 年和约分析,斯维雅托斯拉夫是在战败的情况下被迫签定保证书,因为它只有 4 条,其主要两条是罗斯人保证不再企图染指巴尔干半岛,他表示“我决不对你们国家抱有企图,决不强兵压境;决不覬覦你们的任何民族、你们的国家和希腊支配下的国家;决不覬覦赫尔松国和它的所有城市,也不覬覦保加利亚国”。“如有谁企图反对你们国家,我也将与之敌对,同它作战”。其他两条都是表达其执行保证书的决心,“我,以及我的贵族和全体罗斯人已经对希腊皇帝宣誓:我们遵守以前的条约。如果我和我的某个人,以及我的部下不遵守这些以前的条文,我们会遭受信仰的神——别伦和畜牧神沃洛斯的诅咒,犹如打碎的黄金板,将丧命于我们自己手中的武器”^②。斯维雅托斯拉夫发动的战争延续了 3 年,造成保加利亚人一度衰落,但是他败于拜占廷人以及被迫于 971 年写下的保证书使拜占廷帝国的北部疆界再次推进到多瑙河一线。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格局因此再度发生变化。

971 年,在巴尔干半岛战败的斯维雅托斯拉夫率残部退回基辅,次年在归途中被潘臣涅格人伏击身亡,死于非命,其头盖骨被制成镶金边的酒碗。其 3 个儿子为争夺大公位发生多年内讧,最终由弗拉基米尔 (Vladimir, 980—1015 年在位) 于 980 年继承罗斯大公权。他强化中央集权和思想控制,稳定政权后,再度将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沿岸国家作为扩张抢劫的目标。985 年,弗拉基米尔和其舅舅布雷尼亚将军率领罗斯

^① Andrzej Popp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the Baptism of Rus'; Byzantine - Russian Relations between 986—989",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30 (1976), pp. 195—244.

^② 《往年纪事》的说法与拜占廷史料不一,它把停战的原因说成是“希腊人给他送去贡赋”,将斯维雅托斯拉夫撤出巴尔干半岛的原因说成是“回到罗斯去,带来更多的扈从队”。这些记载显然带有遮掩罗斯人占领保加利亚人国家进而定居巴尔干半岛计划失败的意图。《往年纪事》,第 136—139 页。

军队进攻保加利亚人,而后“弗拉基米尔与保加利亚人缔结和约,相互举行宣誓”^①。此后,他将进攻的目标锁定在拜占廷帝国。按照传统说法,当时,拜占廷帝国内乱严重,发生了福卡斯叛乱。皇帝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在位)请求弗拉基米尔出兵援助。作为出兵的条件,弗拉基米尔请求和拜占廷公主安娜结婚。987年,弗拉基米尔应拜占廷人的邀请,派兵援助拜占廷人平息了叛乱。暴乱平定后,拜占廷人迟迟不履行诺言,致使弗拉基米尔于989年出兵占领了拜占廷在克里米亚的领地。同年秋季,安娜公主在贵族和教士的陪同下出发去克里米亚,随同带去赠给弗拉基米尔的王冠和基督教圣物。安娜与弗拉基米尔结婚后,基辅公国将其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归还拜占廷人,并协助拜占廷清剿哈扎尔匪徒,两国继续保持同盟关系。

这则传说似乎不合情理,因为以婚约为代价出兵一事本身就十分离奇,而战争的原因又是拜占廷人不履行婚约,这就更使人感到不解。事实上,《往年纪事》没有这样的记载,在涉及这段历史时,该书记载说,弗拉基米尔于985年与保加利亚人订立和约后返回基辅,而后致力于罗斯国家的文明建设。他先后对伊斯兰教、犹太教、来自中欧的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进行考察,详细听取了各个教会的信仰和礼仪禁忌,选择与罗斯人社会生活最相融的教会。“弗拉基米尔邀集自己的贵族和城市长老,告诉他们说:‘情况是这样。先是保加利亚人来对我讲:请接受我们的信仰。接着,德国人来了,极力赞誉他们自己的信仰。继他们之后,犹太人来了。最后来的希腊人诋毁所有人的信仰,而颂扬自己的信仰,为此侃侃陈词,由世界的起源说到整个世界的创造。……对这些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准备怎么回答?’他们都主张派人前去调查,“于是挑选出10名出身高贵、睿智的臣僚”,去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最终选择了拜占廷教会,因为使节们说:在那里,“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是置身于天上还是地下,因为地面上从没有这样的景色和美丽的地方,甚至连故事

^① 《往年纪事》,第140页。

里也不可能想象得到。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人和神浑然合为一体,他们的祭祀礼拜仪式独占鳌头,绝非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贵族们回答:‘如果希腊人的信仰不好的话,你的那位智慧超群,绝顶聪明的祖母奥丽加也就不会接受它了’”。“989年,弗拉基米尔统率军队进攻希腊人的城市赫尔松。……赫尔松人因干渴而疲惫不堪,只得投降。弗拉基米尔率领自己的扈从队进入城内”。拜占廷人为阻止罗斯人继续南下,采取惯用的联姻方法,并提出罗斯人接受基督教的条件。“弗拉基米尔听完陈述,对皇帝派来的使臣说:‘去告诉你们的皇帝,我将接受洗礼,因为还在这以前,我已经考察了你们的习俗。你们的信仰和祭祀令我感到赏心悦目。我们派去的臣属对我讲过了这方面的事。’……皇帝听到禀告后,遂派遣自己的妹妹同几名大官和神甫前往。……弗拉基米尔(在赫尔松)受洗后,和公主举行了婚礼”^①。据学者考证,他是在车绳接受的洗礼,并以拜占廷皇帝瓦西里为教父,改用基督教名瓦西里。

事实上,早在奥丽加时期,俄罗斯人就面临选择信仰的问题。959年时,也就是在她访问拜占廷首都并接受希腊教会洗礼后4年,她派出使者晋见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Otto I),希望他派遣传教士到俄罗斯。两年后,奥托派出主教团前往基辅,但终未取得成就。对于奥丽加“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她不能忍受拜占廷人对她的慢待,特别是她在进入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廷人禁止其随行亲兵入城,使她耿耿于怀。个人的因素可能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古代俄罗斯人在文明化进程中如何融入欧洲,在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中,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前者已经在大部分斯拉夫人中站稳了脚跟,而后者则将东欧以外的欧洲教区控制在罗马教廷权力下,并在波兰建立了布拉格教区。显然,俄罗斯人的选择是慎重的,也是漫长的,最终完成选择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

^① 《往年纪事》,第198—201页。

史料证明,罗斯国家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主动实行了基督教化,其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过程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全面对比考察后审慎作出的。和其他斯拉夫人国家的基督教化比较,这一过程在罗斯国家表现出几个突出点。其一,此时基督教已经斯拉夫化,即使用斯拉夫语言传教,使用希利尔文字的经典和宗教文献,有相当多的斯拉夫人信徒和斯拉夫人神职人员,其礼仪节日等基本融入了斯拉夫社会,从而使俄罗斯国家基督教化的起点比较高,进展比较顺利。其二,由于罗斯人在接受新的宗教过程中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并在各种已经存在的比较成熟的宗教中选择了基督教,因而其基督教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特别是弗拉基米尔与贵族和重臣的讨论分析表明,他在推行基督教化政策中把思想工作巧妙地做到前面,获得了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基础^①。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此后的历史得到证明,即罗斯人基督教化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复。其三,以上述两点为基础,罗斯人基督教化更为主动和坚决,他们并没有像保加利亚人那样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同时对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影响顾虑重重,也没有像塞尔维亚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接受拜占廷人的宗主权,更没有像摩拉维亚人接受拜占廷传教后不久又放弃了希腊教会的信仰,而是开展了自上而下建立基督教国教的工作。可见,弗拉基米尔推行的基督教化政策不是战争中的一个偶然行为,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但是其中最明确的目的是国家的文明化建设,是弗拉基米尔推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罗斯人基督教化的相关工作开始在前,而弗拉基米尔与安娜公主的联姻在后,强调这一点可以有效地消除对罗斯人基督教化重大历史事件的误解,进而正确评

^① 根据记载,弗拉基米尔也像哈扎尔人汗王一样,请伊斯兰教、西欧基督教、犹太教和希腊基督教的传教士讲解各自的教义、禁忌、礼仪和习俗,最终为希腊教士说服。《往年纪事》,第156—198页。事实上,选择相近民族语言宗教是基督教在这场竞争中最终占了上风的重要因素。对于这场竞争,奥伯林斯基也表示怀疑。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94.

价俄罗斯民族文明化的历史。如果说这两个事件有其内在的联系的话,那么推行以基督教化为核心的文明化是个必然的过程,而联姻是个偶发事件。

对于这个偶发事件,读者最好也从历史资料所形成的信息链条中形成客观的看法。988年初,拜占廷帝国爆发大规模军事叛乱,以巴尔达斯·福卡斯为首的军事贵族控制了小亚细亚,并进军首都。危急情况下,瓦西里二世根据早先与罗斯人订立的和约,请求后者援助。同年春,6000名瓦兰吉亚雇佣兵到达君士坦丁堡,协助瓦西里二世平息了叛乱^①。作为强化友谊的手段和报赏,拜占廷皇帝决定实行两国联姻。而瓦兰吉亚兵团大多留在拜占廷皇宫,成为皇帝的护卫。根据拜占廷皇室的习惯,弗拉基米尔在结婚前接受了基督教,并分两次完成了受洗的过程。对于这次联姻,后来的君士坦丁七世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各自的法律制度,并将与其有关的事物结为一体,将从同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出与其生活融合的联合体。正像每一种动物都与自己的种类相配一样,每个民族也应该只同本民族和讲相同语言的人结婚同居,而不能与其他民族和讲别的语言的人结婚同居”^②。这种拜占廷人血统高人一等的思想一直保存在他们的意识中,但是,从历史上看,为了外交需要,拜占廷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与“野蛮”民族通婚的政策,可能正是民族之间的通婚才促进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融合。

988年,弗拉基米尔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废除了原始的战神偶像,取消了古代罗斯最高神战神别伦(Perun)和畜牧神沃洛斯(Voles)信仰^③,

① Andrzej Popp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the Baptism of Rus: Byzantine - Russian Relations between 986—989",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30 (1976), pp. 195—244.

②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 13, p. 74.

③ 弗拉基米尔在成为大公后不久的980年,“在山岗上的眺望楼旁边,树立偶像:银头、金髻的木雕别伦,其次是沃洛斯,……人们供奉它们为神祇,祭祀牺牲,甚至献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这种原始的多神崇拜以别伦为主神,实行人祭。《往年纪事》,第149页。

“下令推倒那些偶像,或者砸碎,或者焚烧掉。他还下令将别伦的偶像绑在马尾上,从山上沿着波利耶夫斜坡,一直拖到鲁奇耶河,并派去12名臣僚用权杖敲击它。……这样做为的是凌辱魔鬼,它以这种方式来欺惑人们,以便从中获得报偿。……人们拖拽着,把别伦投入第聂伯河。……接着,弗拉基米尔派人到全城各处传达指示:‘明天,谁要胆敢不到河边去,无论你是富人或穷人,还是乞丐、奴隶,一律将是我的敌人!’”他以强制手段,强迫全体居民和他一起皈依基督教。“翌日,弗拉基米尔率领公主和赫尔松的神甫来到第聂伯河……举行祈祷仪式”^①。此后,弗拉基米尔积极支持基督教,聘请拜占廷建筑师在各地建立大量教堂,并按照拜占廷帝国的行政税收制度改造基辅公国。两国一直保持持续的商业和文化宗教往来,基辅罗斯公国的主教在此后200年间均由拜占廷教士担任,而俄罗斯教会也从属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②。弗拉基米尔还按照拜占廷教会的模式在全国各地组建教区,任命各地主教,波罗的海至黑海地区的所有城市都先后成为主教驻地。同一时期,拜占廷帝国为了满足传教需要,还建立了专门的斯拉夫文学中心,或组织翻译整理文献,或培养相关的专门人才。

俄罗斯人的文明化有利于其历史发展,同时,也对巴尔干半岛局势的平稳发展产生了有利影响,因为,不仅俄罗斯人此后将本民族的发展中心确定在大草原地区,减少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多民族冲突因素,而且他们在北方地区还牵制了诸如潘臣涅格人等巴尔干半岛北方民族,从而也减轻了后者对半岛地区的入侵压力。

^① 《往年纪事》,第215—216页。

^② 对于学术界提出的几种推测,即认为早期俄罗斯教会可能是独立的,或从属保加利亚教会,或从属于罗马教会,奥伯林斯基认为“都经不住客观考证的检验”。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98.

第二节 俄罗斯与巴尔干半岛

1015年,弗拉基米尔去世,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俄罗斯君主权展开血腥的内战。其长子斯维雅托波克(Sviyabok)害死了几个亲生兄弟,夺取基辅罗斯大公权力。“斯维雅托波克却在构思着非法的行径,决定采取该隐的做法,他派遣使者去对博里斯说:‘我想同你保持友好,增加你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领地’。可他这是在欺骗弟弟,为的是想个办法杀死对方”。而后,他指派心腹贵族刺杀了亲弟弟。“正当格列布这样痛哭流涕地祷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斯维雅托波克派来刺杀他的人。……格列布的厨师托尔钦举刀斩杀了他,如同屠宰无辜的羔羊”。“罄竹难书和邪恶的斯维雅托波克又杀害了斯维雅托斯拉夫。当时,斯维雅托斯拉夫已经潜逃到乌戈尔,斯维雅托波克仍派人在乌戈尔刺杀了他。这时,斯维雅托波克考虑:‘干掉所有的兄弟,我一个人统治罗斯国家’”^①弗拉基米尔的另一个儿子雅罗斯拉夫,在诺夫哥罗德人民的支持下,经过4年内战,取得胜利,重新统一国家。在他统治(1019—1054年在位)期间,俄罗斯发展成为东欧的军事大国。

1023年,哈扎尔人在雅罗斯拉夫的弟弟姆斯季斯拉夫率领下进攻基辅等地,并在南俄称王。次年,罗斯军队前往南俄地区,在一场遭遇战中被哈扎尔人击溃,退守基辅。为了发展实力,雅罗斯拉夫镇压重新抬头的多神教,在各地建立城市和教堂,同时,扩大军队数量。1036年,雅罗斯拉夫指挥军队击败潘臣涅格人。“在雅罗斯拉夫已得到全部权力,却尚在诺夫哥罗德的时候,潘臣涅格人保卫了基辅。雅罗斯拉夫征集众多的军队,……率军队出城,部署武装扈从队和瓦良格人在中央,基辅人在右翼,诺夫哥罗德在左翼。他们列阵在城前。潘臣涅格人发动凶猛的攻势,双方的军队逐渐靠近,终于在现在的圣索非亚教堂——

^① 《往年纪事》,第238—247页。

罗斯总主教驻地展开战斗。当时,这里还是城市荒郊。……潘臣涅格人向四面逃窜,却又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向何处去,有的人落入谢托姆河,有的人淹溺在其他河流,其余的终夜盲目乱窜,直至天亮”^①。失败的潘臣涅格人此后离开南俄地区,继续向西迁徙,构成了巴尔干半岛新的威胁。

古代俄罗斯国家与拜占廷国家存在许多不同,它是靠武力建立和维持的松散的军事政治联合体,维系这个联合体的纽带是各地均承认的基辅大公的权力,而收取贡赋是这种权力的表现形式。整个罗斯社会仍然保持着古代部落组织。乡村的土地、森林、草场、荒地、河流都是原始公社的财产,农民使用田地和草场的权力是祖上传下来的。随着财产的增加,氏族公社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小土地占有和大土地并存。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人们千方百计获取的对象,享有特权的氏族王公贵族逐步强占了尚未分配的共有土地,大贵族都控制着大片土地和庄园,出租给小农,后者拥有独立的经济实体。正如史料记载的那样,农民有马匹、土地和财产,“我很奇怪,你们只舍不得农民用以耕田的马匹,而为什么不想当农民开始耕田的时候,波洛伏齐人一来用箭射死他,夺去他的马匹,继而进入村中劫走他的妻室儿女和全部财产呢?”^②由于古代俄罗斯国家并不具有拜占廷式的国家机器,因此,各地经济形态多样化,在国家组织中保留大量原始公社的成分,社会阶级构成也十分复杂^③。正是这种原始国家的松散性,使俄罗斯国家在1054年雅罗斯拉夫去世后陷入长期的分裂,各个地方王公对外也采取不同的政策。

由于古代俄罗斯人接受了基督教希腊教会的信仰,各地王公也逐步

① 《往年纪事》,第263—264页。

② 《拉夫连季编年史》,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0页。

③ 成文于11—12世纪的《罗斯法典》反映了相关的现象,参见该书,王铨译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接受了拜占廷人的政治理念,即拜占廷皇帝具有辖制全世界基督徒的最高权力,罗斯王公与拜占廷皇帝不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他们公认的基辅大公在罗斯人中的最高权力来自于留里克王朝和弗拉基米尔,来自于神圣的上帝。拜占廷皇帝作为基督教东正教会的最高首脑,具有统领各民族君主的地位。为了强化基督教的政治意义,罗斯君主“衷心倾慕《圣经》,抄写了大量书籍。它们被他供奉在自己建筑的圣索非亚教堂内,他用黄金、白银和教堂的器皿装饰它们。……还在其它的城市和地方建设教堂,安置教士,从自己的财产里为他们支付俸禄。他命令这些由上帝挑选的人去教导民众,并且常常访问教堂”^①。拜占廷宗教文化传统通过罗斯国家使节、两国商人、拜占廷教会派驻基辅的主教及其助手、拜占廷建筑师、圣像画家和修道士源源不断传入俄罗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赫尔松、特姆托罗坎和阿索斯圣山,这些地方成为拜占廷宗教文化的中心。例如11世纪在阿索斯圣山兴建了一些修道院,其中包括俄罗斯修道院,这里成为整个东正教的圣地和朝拜中心。

俄罗斯国家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商业往来越来越频繁,有文献记载的物品就涉及来自俄罗斯的粮食、原木、皮毛、蜂蜜、蜂蜡和来自巴尔干地区的珠宝、纺织品、贵金属、珐琅工艺品、玻璃制品、香料、橄榄油、酒、水果、圣像、宗教仪式用品和贵族王公使用的奢侈品。在双边贸易活动中,冲突也时有发生。例如,11世纪上半叶,罗斯人希望利用重新修订与拜占廷商业军事条约的机会扩大其在巴尔干和黑海的权利,但遭到拜占廷人的冷遇。1043年,一名诺夫哥罗德富有商人在拜占廷圣母城的基辅罗斯商业区被害,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以此为借口,要求拜占廷政府给予财政赔偿,又遭到拒绝^②。于是,雅罗斯拉夫派遣军队在其子弗拉基米尔(Voladimir)的统率下水陆并进,挑起战争。罗斯军队400艘战船在黑海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海面上封锁航道,这支主要由北

① 《往年纪事》,第266页。

② Michael Psellus, *Chronographia*, ed by Vrasidas Karales, Athens 1992, IV, 143—147.

欧海盗组成的舰队洗劫沿海城乡,威胁将进军君士坦丁堡,迫使拜占廷人提议和谈。和谈失败后,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下令将拜占廷帝国内的所有罗斯商人和瓦兰吉亚人全部投入监狱^①,没收其财产,并亲自指挥拜占廷舰队使用“希腊火”重创罗斯海军。大批罗斯战俘在拜占廷人庆祝胜利的仪式上,按照拜占廷人处理反叛者的刑罚,被砍掉了右手,它们被血淋淋地钉在城墙上示众,另有 800 名战俘被挖掉双眼。丧失了战船的罗斯人残余部分,企图登岸从陆路返回基辅,但遭到拜占廷人设立在黑海西岸的帕里斯特隆军区部队的斩杀。罗斯人逃回黑海北部地区,1046 年,双方订立和约,战争结束^②。为了维持和平,君士坦丁九世的女儿还打算嫁给雅罗斯拉夫的幼子弗拉基米尔。这次冲突可能是罗斯人与拜占廷人最后的直接对抗。

1113 年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Vladimir Monomakh,1113—1125 年在位)即位,“总主教尼基弗鲁斯率领各主教和全体基辅居民,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他”^③。罗斯国家分裂割据的状况得到暂时改变,但是,各地王公不久再度兵戎相见,相互战争,至 12 世纪中期,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诺夫哥罗德和斯摩棱斯克等地区纷纷摆脱罗斯公国。拜占

① 瓦兰吉亚人自此以后长期作为拜占廷人的雇佣兵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们以军事为生,多次参与拜占廷人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对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战事。他们源源不断地补充拜占廷军队中的瓦兰吉亚兵团,成为拜占廷人重要的兵源。11 世纪期间,拜占廷人在西西里、叙利亚、小亚细亚、保加利亚地区的驻军都包括瓦兰吉亚兵团,特别是拜占廷皇帝近卫军几乎都是由他们构成的。根据当时拜占廷作家的记载,他们个个身材高大魁伟,手持战斧和双刃长剑,作战勇猛,为人忠诚。这种形象反映了拜占廷人对他们的欣赏,与早期俄罗斯人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弗拉基米尔在 10 世纪末致拜占廷皇帝的信中说:“一群瓦兰吉亚人到你那里去了,千万别让他们留在京城。否则,会像在我这里一样,闹出乱子来。把他们遣散到各地,不要让一个人留在那里。”《往年纪事》,第 148 页。

② 《往年纪事》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远比拜占廷史料简单,称其失败的原因在天气,“遭遇猛烈风暴,罗斯船队损失沉重,……在那里,许多罗斯人被弄瞎了眼睛”。《往年纪事》,第 269 页。“这次远征是俄罗斯人在中古时期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击”。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323.

③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99.

廷人一直善于利用别国内讧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曾与苏兹达尔等罗斯王公接触,还款待收容一些流亡的罗斯贵族,1130年,拜占廷皇帝亲自接待罗斯贵族伯洛克,1162年,罗斯贵族安德列甚至得到拜占廷朝廷赠给的庄园。1169年,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的孙子安德列联合各地诸侯,攻陷基辅,大肆破坏,从此结束了基辅作为俄罗斯人政治文化中心的光辉历史。罗斯国家分裂为13个独立的公国,他们因内部血腥征战而实力衰落,最终无力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于1243年臣服于拔都建立的金帐汗国。

俄罗斯国家在被蒙古人征服前,逐渐融入了欧洲,特别是与巴尔干半岛联系密切。首先,拜占廷和罗斯两国皇室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弗塞维沃罗德一世(Vsevelod I,1078—1093年在位)娶拜占廷公主为妻,他的儿子即后来即位的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后者的儿子维塞沃罗德也娶拜占廷公主为妻。当然,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家的贵族王公与欧洲多国王室联姻,例如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娶英国国王哈罗尔德(Harold)的女儿为妻,他的叔叔与波兰国王之女结婚,他的3个姑姑伊丽莎白(Elizabeth)、安娜(Anna)、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分别嫁给了挪威国王哈拉尔德(Harald Haardraada)、法王亨利一世(Henry I)和匈牙利国王安德列(Andrew),他的长子姆斯提斯拉夫(Mstislav)娶瑞典国王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嫁给了匈牙利国王,他的孙女与拜占廷科穆宁王朝结亲。12世纪俄罗斯君主与欧洲各国,特别是与拜占廷帝国和巴尔干地区王室联姻,为正常的联系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联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显然是基辅大公借助外来势力震慑国内分裂割据力量的措施。

罗斯王室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姻并不表示他们在宗教信仰上的变化。自10世纪末弗拉基米尔强制推行基督教国教政策以后,几乎历代罗斯君主都继续推行支持基督教的政策,除个别主教外,其总主教均由拜占廷皇帝和大教长任命希腊教士担任。拜占廷帝国朝廷和教会上层出于外交需要,有时愿意满足罗斯君主挑选本国教士担任总主教的愿

望,他们只是保持名义上的批准权。1051年,拜占廷人就曾同意了罗斯君主雅罗斯拉夫选定的本地教士伊拉隆(Hilarion)任总主教,并同意雅罗斯拉夫主持召开罗斯主教大会。1147年,伊兹雅斯拉夫(Iziaslav II, 1146—1154年在位)未与拜占廷人协商就自行任命博学的修道士克莱蒙特(Clement)任罗斯总主教,并召集主教大会。这次事件是与当时巴尔干半岛正在发生的外交较量相关,因为拜占廷皇帝为了抵御匈牙利人和诺曼人的进攻,拉拢部分罗斯君主从侧翼和北方牵制匈牙利人。这些外交活动也引发罗斯人内部的争端,伊兹雅斯拉夫遂采取了敌视拜占廷人的政策。支持拜占廷教会的一派,包括那些拜占廷教士和反对伊兹雅斯拉夫的教会人士,坚持认为这一任命缺乏教会法根据,是无效的任命。直到1154年伊兹雅斯拉夫逝世后,拜占廷人重新派遣的总主教才被罗斯教会所接受。1164年,双方就总主教的任命问题再起争端,基辅大公罗斯提斯拉夫(Rostislav)以拜占廷人事先没有征求其意见为借口,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任命的总主教,并当着拜占廷特使的面威胁说,将通过一项禁止拜占廷大教长任免罗斯总主教的法令,这一任命将由罗斯大公主主持下的主教会议选举确定。只是由于拜占廷人频繁派遣使节,反复劝说才使这项任命最终得到承认。这些事件表明,在俄罗斯人基督教化和基督教俄罗斯本土化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意识不断高涨,俄罗斯东正教也日益独立,为其最终占据东正教世界领导地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往年纪事》终止于1117年^①,后人对于12世纪俄罗斯人与巴尔干半岛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了解甚少。大约在1140年代,俄罗斯人在半岛北部地区的政治作用有所增强。此时的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发展,已经从基辅大公治下的松散军事联盟逐渐过渡为中央集权制国家,各种国家机构渐趋完善。基辅公国核心地区第涅伯河中游流域逐渐衰落,国家政治中心北移。其政治中心北移的原因是由于来自中

^① 《往年纪事》最后提到俄罗斯的一个部落“进攻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国王给他们送去放入毒药的饮食,他们食用后……全部被毒死”,见1117年,第466—467页。

亚的库曼人(Cumans)的攻击,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俄罗斯南部草原的主人^①。这支部落属于中亚突厥游牧民族,11世纪时,进入原潘臣涅格人在黑海北岸的活动区域,迫使潘臣涅格人西迁。他们还攻击基辅的俄罗斯人,在一个多世纪期间,他们对俄罗斯人发动了50多次大规模袭击,使第涅伯河中游遭到严重破坏,该地区各个城市受到频繁洗劫,一些失陷于游牧部落的城市完全荒废。1150年前后,传统的波罗的海与黑海贸易商路由于库曼人而中断,因为该商路南线必须通过库曼人地区。为了阻止库曼人进一步北上,同时为了开通基辅至黑海和巴尔干半岛的通道,俄罗斯人在12世纪发动了多次对库曼人的战争,力图将这支游牧民族驱逐出黑海北部和第涅伯河下游地区。在抵抗库曼和其他游牧民族中,俄罗斯南部地区形成了两个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其一在基辅东南的伏尔加河下游,即原来哈扎尔人中心区,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的后人在这里建立起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和弗拉基米尔等重要城堡要塞,使之成为中古时期俄罗斯人抵抗草原游牧民族的边疆,后来是南俄罗斯的主要中心区。另一个中心区在基辅西南方,位于第涅伯河与普布鲁特河之间,喀尔巴阡山脉东南,直到多瑙河三角洲地区。雅罗斯拉夫的后人在这里建立了加里查等重要城市^②。这个地区与拜占廷人设立在多瑙河下游的帕里斯特隆军区接壤,控制着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传统商路,这个地区的俄罗斯公国与拜占廷人来往最为密切。

作为巴尔干半岛政治的主导力量,拜占廷人与俄罗斯各个公国保

① 库曼人在1222—1237年间被蒙古人征服,其中大批库曼人涌入小亚细亚,拜占廷人在尼西亚的流亡皇帝约翰三世曾在1241年安置了万余名库曼人,使他们分散定居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地区。1259年,他们在拜占廷军队中构成长矛兵主力,并在帕拉格尼亚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库曼人从13世纪以后即逐渐融入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廷人社会。“匈牙利和拜占廷人称他们为库蛮人,俄国人称他们为波洛伏齐人”,又被翻译为库曼或古曼人。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37页。

② George Vernadsky,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Russian Campaigns in the Black Sea Area",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8, No. 1 (Feb., 1949), pp. 1—9.

持程度不等的友好关系,并把他们作为其外交计谋的工具,因为这一时期,拜占廷人与西西里的诺曼人、中欧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处于复杂的外交与军事较量。加里查、基辅、苏兹达尔都与拜占廷人频繁往来,甚至建立了军事同盟。1150—1167年间为争夺多瑙河流域的控制权,拜占廷人与匈牙利人正处于战争边缘状态,拜占廷人企图利用俄罗斯人牵制匈牙利人,故主动与位于匈牙利北方的俄罗斯建立同盟。但是,拜占廷人也因此无意中卷入俄罗斯王国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①。占据基辅的伊兹雅斯拉夫以其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孙子的身份与其叔叔尤里(Yury Dolgoruky)和表兄弗拉基米尔克(Vladimirko of Galicia)进行较量,后两者分别控制苏兹达尔和加里西亚。伊兹雅斯拉夫联合匈牙利人与拜占廷人为敌,尤里和弗拉基米尔克则作为拜占廷人的盟友,弗拉基米尔克甚至承认了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然而,俄罗斯国内军阀割据势力经常变动,他们与周围国家的关系也随时更改。1152年,倾向于拜占廷人的弗拉基米尔克去世,其子雅罗斯拉夫(Yaroslav)改变外交政策,倒向匈牙利人。同样,1154年伊兹雅斯拉夫死后,尤里趁机从苏兹达尔出发占领了基辅,拜占廷人在南俄地位得到改善。但是,1157年尤里去世,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其继承人罗斯提斯拉夫(Rostislav)因宗教问题与拜占廷人反目^②。

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1143—1180年在位)统治时期,巴尔干半岛局势混乱。拜占廷帝国不仅面临第二次西欧十字军东征的骑士的骚扰,而且还要应付诺曼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引起的外交问题。1164—1165年间,曼努埃尔一世与俄罗斯人有过密切的外交活动。当时,其表兄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因策动宫廷阴谋被打入监狱,后越狱逃出君士坦丁堡,投奔与拜占廷人为敌的雅罗斯拉夫。后者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借口帮助安德罗尼库斯登上帝位,

^① S. F. Platonov, *History of Russia*, trans by E. Aronsberg, N. 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5, pp. 67—89.

^② S. F. Platonov, *History of Russia*, trans by E. Aronsberg, pp. 96—112.

联合匈牙利人准备进攻拜占廷人。曼努埃尔一世立即使用“以夷制夷”外交手段,一方面与俄罗斯人和解,另一方面向安德罗尼库斯让步,劝说后者返回首都。1165年,他再次向俄罗斯人派出高级使团,由皇室亲王带队,前往基辅与罗斯提斯拉夫订立盟约。根据约定,罗斯提斯拉夫将根据拜占廷人的需要派遣军队支援,接受拜占廷大教长委派的总主教。拜占廷人则向他提供大量金钱和礼物,并在决定总主教时与之协商^①。这种关系的确立,足以对加里西亚的雅罗斯拉夫构成威胁,因为他正好处于拜占廷人和基辅的罗斯提斯拉夫之间。因此,当拜占廷使团从陆路回国途中,路过加里西亚,说服雅罗斯拉夫放弃了与匈牙利人的同盟,转而与拜占廷人结盟。此后,拜占廷人和俄罗斯人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良好关系,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新的敌对事件。

直到13世纪初,无论是拜占廷帝国还是俄罗斯国家都面临外敌入侵的严重局面,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因皇室内讧而失陷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拜占廷宫廷流亡小亚细亚。大约同一时期,俄罗斯人也被蒙古大军征服。但是在蒙古军事征服前,俄罗斯与巴尔干半岛的经济政治和宗教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作为巴尔干地区主要国家的拜占廷帝国需要俄罗斯人多方面的援助。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农林原材料产品成为拜占廷人主要的原料来源,而俄罗斯对拜占廷人政治地位的承认也对巴尔干半岛局势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宗教领域,俄罗斯人的拥戴对于拜占廷大教长维持其在东正教世界的最高地位至关重要。事实上,尽管其政治衰落趋势十分明显,拜占廷国家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东欧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对于这一点,俄罗斯人与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一样没有异议。

13世纪,当拉丁骑士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以后,蒙古军队则在卡尔卡河流域打败俄罗斯诸侯联军。1237年,蒙古统帅拔都领15万精兵侵入

^① Paul Magdalino, *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41—348.

俄罗斯^①, 攻占里亚赞、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 1240 年占领基辅^②, 并于 1242 年以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为首都建立了金帐汗国。“这些罗斯公国的领地支离破碎, 便利了蒙古人的征服”^③。从此, 蒙古对俄罗斯开始了 200 多年的统治。蒙古王公利用俄罗斯君主之间的矛盾, 通过册封制度分化控制俄罗斯人。1257 年, 蒙古统治者通过户籍调查, 强制完善了征贡制度, 并以八思哈(意为“镇守官”)军事行政组织作为保障。这一组织机构将俄罗斯人编制在由蒙古军官统领的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单位中, 以此保证各公国完成税收和服从统治^④。由于这一制度遭到俄罗斯各地人民的持续反对, 14 世纪初以后被废除, 改为俄罗斯王公代表蒙古人施行。经济政治上的部分自主权也使俄罗斯各地王公能够开展对外贸易和其他活动。

蒙古人统治期间, 俄罗斯对巴尔干半岛贸易活动被热那亚人所控制。热那亚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热那亚湾海滨, 4、5 世纪开始发展, 7 世纪以前为拜占廷帝国属地。642 年, 伦巴第人占领热那亚, 拆除城墙, 使该城市遭到严重破坏。10 世纪初以后, 该城再度兴起。11 世纪时, 热那亚逐渐发展成为地中海强国, 其舰队击败阿拉伯人, 控制了撒丁岛, 自此逐渐掌握了西地中海制海权。此后, 热那亚人参加了十字军东征, 其 13 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主要攻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沿海地区。1155 年, 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为遏制威尼斯人势力, 授予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以北建立商业特区等项贸易特权, 从而挑起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和比萨人为争夺拜占廷商业权益展开的激烈斗争。曼努埃尔对热

①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第 336—338 页。

② “他们从立窝尼亚席卷到黑海, 莫斯科和基辅这些古代也是现代都城都被夷为废墟”。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VII, p. 129.

③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第 338 页。

④ 蒙古人入侵的破坏相当严重,《史集》记载:“凡是他们在途中所遇到的城堡和地区, 都攻下来并加以破坏。”拉施特主编:《史集》, 余大钧、周建奇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第二卷, 第 38—40 节(第 66 页)。

那亚人的支持,使他们在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并逐步控制了黑海贸易^①。1201年,热那亚特使奥托伯尼代表热那亚从拜占廷国家获得新的特权,但是由于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占领君士坦丁堡而化为乌有,威尼斯人取代了其在地中海和黑海的地位。拉丁帝国统治时期,热那亚与尼西亚的拜占廷流亡政府关系密切,秘密侵消威尼斯人的海上利益。1261年,两国再订尼姆菲条约以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同年,拜占廷人收复君士坦丁堡后,热那亚人遂取代了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地位。1284年,热那亚舰队击溃比萨海军,成为东地中海最强大的势力,并控制了地中海和黑海贸易,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多瑙河中下游流域、黑海和爱琴海都建立了商业殖民地。其在克里米亚南部沿海港口城市卡法和索代亚建立的商业据点成为俄罗斯商品出口最重要的集散地。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毛皮、蜂蜜和蜂蜡在此装船运往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半岛各口岸,而拜占廷纺织品、武器和意大利纸张则由此输往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大城市。顿河河口城市塔那在商业贸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转运站作用。1379年的一份商人记录表明,从莫斯科经顿河到塔那渡过亚速海后,从卡法和索代亚出发到君士坦丁堡的旅途总共两个半月^②。

同一时期,在这些商路上还往来着前往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和圣城耶路撒冷朝拜的香客。不仅民间朝拜为拜占廷人和巴尔干地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俄罗斯君主还慷慨捐助修缮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使1346年大地震造成的破坏得以修复。1398年,俄罗斯君主再度向处于土耳其人围困中的拜占廷人伸出援助之手,送来大笔金钱用于抵抗土耳其军队。两年后,根据拜占廷大教长的请求,俄罗斯人又慷慨解囊,资助拜占廷人。俄罗斯人资助拜占廷人绝非仅仅出于宗教

① Gerald W. Day, "Manuel and the Genoese: A Reappraisal of Byzantine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2 (Jun., 1977), pp. 289—301.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08.

信仰或文化传统上的考虑,而且还是他们在蒙古人统治下争夺俄罗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古代俄罗斯国家的分裂是蒙古人得以建立数百年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俄罗斯人需要建立集权国家。1147年,莫斯科公爵尤里和车尔尼戈夫公爵会见,标志着莫斯科的奠基^①。此后,莫斯科公爵安德列迅速发展实力,扩大领地,与俄罗斯中南部的基辅大公国发生利益冲突。蒙古统治者利用册封制度,以弗拉基米尔大公权位为诱饵,挑动俄罗斯君主内部斗争。莫斯科大公在俄罗斯王公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逐步兴起,因此,为了获得与其政治地位相应的宗教和文化地位,他们常常对拜占廷教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4世纪,俄罗斯各地王公争夺最高权位的斗争白热化,莫斯科公爵尤里和特维尔等俄罗斯王公相互攻击,讨好蒙古汗王,特别是伊凡一世·卡里达利用蒙古大汗的信任和权力,强化中央集权,奠定了莫斯科公国强盛的基础^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大主教的驻节地从基辅迁到莫斯科。可以想象,花一些金钱换取拜占廷大教长和君士坦丁堡对莫斯科地位的承认,这在俄罗斯王公争夺权力斗争中不仅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措施,特别是蒙古统治者为减少民间对立情绪而采取的对东正教的宽容政策也迫使各地俄罗斯王公,特别是莫斯科大公对拜占廷君主和大教长进行笼络。另一方面,统一的信仰对于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也大有助益,据说1380年莫斯科大公迪米特里统帅的数十万大军在库里科沃平原大败蒙古军队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胜利,并巩固了莫斯科大公拥有的全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政治地位^③。

事实上,对于蒙古统治下的俄罗斯王公之间的斗争,拜占廷人非常明了,特别是始终致力于东欧教会建设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密切关注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变化。按照传统,俄罗斯教会大主教的驻节地从10

① S. F. Platonov, *History of Russia*, trans by E. Aronsberg, pp. 112—116.

② S. F. Platonov, *History of Russia*, trans by E. Aronsberg, pp. 115—119.

③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62. 作者认为东正教在库里科沃战役胜利中的作用被教会夸大了。

世纪末就设立在基辅,随着基辅势力的瓦解和莫斯科势力的增强,拜占廷大教长面临新的选择,以便保持东正教对俄罗斯全境的控制。首先,他必须确定是继续保持俄罗斯单一大主教教区,还是像处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教会那样设立几个教区。其次,他还必须确定是否将大主教驻节地迁往新的政治权力中心,而要在政治斗争变数极大的俄罗斯确定这个中心位于何处的确也是个难题,特别是当14世纪中期莫斯科、立陶宛、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几大势力较量趋势不明时更是如此。1309年,当基辅衰落已成定局时,俄罗斯大主教的驻节地便从基辅迁到弗拉基米尔,大主教彼得(Peter)宣称是根据拜占廷大教长的指示进行迁徙的^①。当立陶宛君主一时得势,俄罗斯大主教的驻节地曾准备再度向北迁徙到其领地。大约在此前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凭借权谋控制了最高权力,俄罗斯大主教的驻节地便迁往莫斯科,使之成为全俄罗斯的宗教中心,莫斯科大公提出的大主教人选阿莱克修斯(Alexius)也在1354年被拜占廷皇帝约翰六世和大教长卡里斯图斯(Callistus)任命为“基辅和全俄罗斯大主教”。此后,莫斯科大公利用蒙古人阿伯都刺汗和繆里德汗的内讧混战,发展实力,消灭或征服了其他公国^②。1377年和1378年,迪米特里大公领导的俄罗斯军队两度打败蒙古军队,标志莫斯科公国已经确立起其领导俄罗斯人民摆脱蒙古统治斗争的地位,其政治领导地位也不可动摇。1378年,俄罗斯大主教阿莱克修斯去世后,莫斯科大公派遣特别使团以重金说服拜占廷人任命塞普里安(Cyprian)为新任全俄大主教。为了强化俄罗斯东正教与拜占廷教会的联系,14世纪末拜占廷大教长安东尼四世(Antony IV)写信,批评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Basil I of Moscow)在俄罗斯教会中使用的双折板画

① 有的学者认为,“教会都主教彼得于1326年很快把教会总部从弗拉基米尔城迁移到莫斯科城。从这时起,莫斯科便成为所有都主教的驻地,成了整个罗斯的宗教中心”。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② 利用基督教强化封建中央集权是莫斯科大公长期关注的重要事务,当诺夫哥罗德出现宗教分离倾向时,“莫斯科王公进行军事干预之后,莫斯科都主教的权力才得以恢复”。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士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0页。

上缺少了拜占廷皇帝的名字。他针对后者宣称的“我们只有同一的教会而没有同一的皇帝”，指出“基督教徒不可能只有同一教会而没有同一皇帝，因为教会和帝国拥有一个伟大同一的统一体，任何人都不能将它们彼此分离。……神圣皇帝之尊绝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什么君主或统治者，……他被施以涂圣油礼，被尊崇为罗马人和基督徒的国王和皇帝”。而“那些被别的民族胡乱称为国王”的其他君主只拥有地方权力，惟有拜占廷皇帝是“全天下的主子和主宰”，是“天赋之王”，其法律和秩序为整个世界所接受^①。直到拜占廷国家灭亡前一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在写给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信中承认：“您已经接受了伟大的帝王之尊和祖传的遗产，以便坚定您帝国所有东正教基督徒的信仰，并给予我们俄罗斯王国和我们所有地区以巨大的帮助”^②。显然，这种密切的宗教联系对于衰亡中的拜占廷人和兴起中的俄罗斯人都有极大的助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君主对拜占廷人的支持还有其更深层的打算。莫斯科大公此时已经获得了全俄罗斯最高政治地位，并在此后逐一消除敌对势力进而统一整个俄罗斯的斗争中确立起政治中心的地位。莫斯科王公不仅希望获得与这种政治地位和政治领导作用相适应的宗教地位，而且在拜占廷国家日益衰落的情况下希望担负起东正教世界的领导责任。马克思在分析这一时期莫斯科公爵对蒙古统治者的政策时说：“伊凡·卡里达的政策不外是这样：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鞑靼人讨好献媚，厚颜无耻地阿谀逢迎，频繁地前往金帐汗国朝见，低声下气地向蒙古公主求婚，对汗的利益显示无限的热忱，寡廉鲜耻地执行汗的诏令，恶毒地诽谤自己的亲族，一身而兼任鞑靼人的刽子手、佞臣和奴隶总管”^③。这个分析也同样适用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64.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66.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内幕》第5章，《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第7页。

于莫斯科王公从拜占廷大教长和皇帝那里争取最高宗教权的政策。因此,面对拜占廷大教长安东尼四世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没有因此感到屈辱而恼羞成怒,而且十分顺从地将拜占廷皇帝的名字添加到宗教仪式中,及时“纠正错误”,并不断向危难中的拜占廷人提供经济援助,从而赢得了拜占廷教会、世俗君主的信任。莫斯科的宗教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拜占廷君主于1439年7月6日与西欧罗马教会签署的“和解协议”又为俄罗斯君主提供了提高宗教地位的机会。根据这个协议,拜占廷教会不仅承认在长期宗教争论中的错误,接受罗马教会的信条和宗教礼仪形式,而且接受罗马教皇对东正教的管辖权,从此摒弃1054年“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以来两大教会之间的分歧^①。拜占廷皇帝约翰八世签署这个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罗马教廷发动新的十字军战争,以救助被土耳其军队包围的拜占廷人。但是,这个协议遭到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反对,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人民认为它违背了自己的信仰,全国各地君主也认为罗马教皇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再组织新的十字军。莫斯科大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显示其东正教捍卫者的立场,他首先对1436年由拜占廷人任命的“基辅、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主教”伊西多利(Isidore)进行公开斥责,认为后者参与并支持“和解协议”是对东正教的无耻背叛,指责后者因此担任罗马红衣主教是一种犯罪,并下令将其逮捕投入死牢。后来,在俄罗斯王公的秘密授意下,监狱当局于1440年听任伊西多利“逃亡”到西欧。这样,俄罗斯君主就获得了东欧教会的普遍尊重,承认其在东正教教会中的中坚地位^②。俄罗斯首席主教于1451年公开贬低拜占廷人,“皇帝并非是正确的皇帝,大教长也不是正确的大教长”^③。

1441年,瓦西里二世(Basil II,1425—1462年在位)致信拜占廷大教长,提出改变传统的由拜占廷大教长任命全俄首席主教的方法,而由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464—465页。

② S. F. Platonov, *History of Russia*, trans by E. Aronsberg, pp. 154—155.

③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68.

俄罗斯各地主教集会选举新的首席主教。由于拜占廷首都此时已经陷入奥斯曼土耳其大军的重重包围,战争动乱遍及巴尔干半岛,所以拜占廷大教长也无暇顾及俄罗斯人的要求。1448年12月,瓦西里二世主持召开了全俄主教会议,选举其亲信伊奥纳(Iona)为俄罗斯首席主教。这一选举标志俄罗斯教会脱离了拜占廷人的控制。但是,俄罗斯君主十分明了在其尚未完成中央集权化过程和最终摆脱蒙古统治的时候,必须保持与拜占廷大教长充分的合作关系。因此,瓦西里二世于1452年再度致信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我们恳求您神圣殿下,不要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自大傲慢,也不要责备我们事前没有向您尊贵殿下请示。我们这样做确实出于急迫的需要,而不是骄傲自尊。我们遵从一切古代东正教传给我们的信仰,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时间的尽头。我们俄罗斯教会,即神圣的俄罗斯大教区请求和寻觅神圣的、普世的、全基督教的和先知的圣索非亚教会,上帝智慧的教会给我们以祝福,并服从她符合古代东正教信仰之一切。我们的教父,伊奥纳首席主教,基辅和全俄大主教,同样请求她的各种祝福……”^①。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因坚持古代传统信仰而获得了东正教领导地位,这一地位更由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得到肯定。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其他东正教民族曾因在历史上向异端或异教屈服而玷污了自身,只有俄罗斯人始终坚持东正教传统,因此直到今天,莫斯科大主教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同样享有东正教最高领导权。

第三节 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可能属于芬兰乌戈尔人(Finno-Ugrians),进入欧洲以前为游牧部落,在迁徙流动中与土耳其人(Turkeys)的祖先融合,因此也带有一些后者的血缘。837年,当他们的一个部落在多瑙河入海口与拜占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69. 这封信由于君士坦丁堡战争而一直没有发出,至今保存在莫斯科国家档案馆中。

廷人发生接触后,便首次出现在拜占廷文献中,被称为“马扎尔人”(Magyars)^①。9世纪末,该民族从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大举西迁至多瑙河下游三角洲以北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当时,拜占廷人与保加利亚沙皇西蒙的战争正在进行,拜占廷皇帝利奥六世因主力部队尚在阿拉伯前线,故向马扎尔人发出邀请,获得同意。马扎尔人从多瑙河以北地区进攻保加利亚人。为避免两面作战,西蒙与拜占廷人假意和谈,维持南部前线的停战状态。同时,他于895—896年集中精力打击马扎尔人,迫使他们退回多瑙河北岸。为了牵制马扎尔人,西蒙派遣使节携带重金出使在马扎尔人东方的另一个游牧民族潘臣涅格人(Pechenegs),联手攻击马扎尔人。潘臣涅格人此时活动在第聂伯河流域,在向西迁移过程中,进入马扎尔人此前占领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迫使马扎尔在其酋长阿尔帕德(Arpad)率领下于896年向西翻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潘诺尼亚平原,并在这片平原上,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地区建立了匈牙利国家。“因此,这个中世纪王国的兴起是保加利亚的西蒙和拜占廷政府在南俄罗斯平原上外交智谋较量的直接结果”^②。

定居在潘诺尼亚平原上的马扎尔人占据着原来由阿瓦尔人和摩拉维亚人控制的地区,实力不断壮大,并在位于其西方的日耳曼人帮助下将摩拉维亚人彻底挤出潘诺尼亚平原。这支习惯于草原马上生活的民族很快就显示出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943年,他们趁保加利亚人一度衰落之机进攻色雷斯地区,此后,他们在对外扩张和抢劫中与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意大利人都发生了冲突,只是955年曾在勒斯非尔德被奥托一世(Otto I)打败过。10世纪中期,马扎尔人也对巴尔干半岛进行过多次抢劫,袭击了色雷斯和马其顿平原,他们的马队来去如风,主要是在农村地区造成破坏和恐慌,而很少攻击城市。根据拜占廷作家的记载,他们于934年和959年两度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抢劫后便迅速

① 在欧洲古籍中,马扎尔与阿瓦尔两个名称常常混杂使用。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Amsterdam 1966, vol. III, p. 492.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06.

撤走。当时控制他们必经之路的保加利亚人也无可奈何。936年，一队马扎尔人骑兵匪帮甚至抵达阿提卡半岛^①。巴尔干半岛居民中流传着关于他们的可怕故事，但是，拜占廷帝国统治者对他们并不感到担心，因为，他们只是在农村地区抢劫一些生活用品，而没有定居巴尔干半岛的意图。

拜占廷人除了使用军事外交手段解决北方民族入侵问题，还开展传教事业。大约在927年，传教士加伯莱尔(Gabriel)携带皇帝的书信出使拜见马扎尔人酋长，希望得到酋长的支持，允许他在马扎尔人中传播基督教，同时，他试图说服酋长再度出兵打击潘臣涅格人。也许是马扎尔人还记得几十年前进攻保加利亚人的教训，他们拒绝了拜占廷使节出兵的请求，但是，同意了加伯莱尔传教的要求。后来一些马扎尔人酋长和贵族到君士坦丁堡访问。在访问者中包括大酋长布尔克苏(Bulcsu)、阿尔帕德的长孙特尔迈克斯(Termacs)。布尔克苏在948年接受了基督教，由大教长为之洗礼，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成为他的教父，并接受了拜占廷皇帝授予他的贵族头衔。他在返回匈牙利时，携带了许多黄金和丝绸等贵重礼物^②。但是，他返回匈牙利后，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并对拜占廷人宣战，其原因不得而知。事实上，他并没有向南对拜占廷人作战，而是向西大肆洗劫日耳曼人农村，其残酷无情的杀戮和破坏使他在西欧中世纪居民中臭名昭著，最终于955年在勒斯非尔德被奥托一世打败，被俘，并被处死于雷根斯堡。952年，定居在南喀尔巴阡山脉的马扎尔人酋长贵于拉(Gyula)到访君士坦丁堡，不仅接受了大教长的洗礼，请君士坦丁七世成为其教父，而且也接受了拜占廷皇帝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p. 318—320.

^② Scylitzes - Cedrenus, *Synopisi historiarum*, ed. I. Bekker, ii, Bonn 1839, p. 328. 在马德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中世纪手抄本中，有一幅插图就是描绘布尔克苏受洗的情景，他坐在施洗盆前，大教长的手放在其头上，皇帝则立于一侧。

授予的贵族头衔^①。大教长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ct)任命修道士海洛塞乌斯(Hierotheus)为“匈牙利主教”,派遣他随同酋长贵于拉前往马扎尔人中传播基督教。当时的拜占廷作家记载道:“当他来到匈牙利后,就使许多人摆脱了野蛮的信仰,皈依了上帝。贵于拉一直信仰坚定,再也没有洗劫过拜占廷领土,并且对基督教囚徒关怀有加。”^②从这段历史看,当时的马扎尔人并非统一的国家,他们以部落的社会组织形式分散居住在多瑙河中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贵族在其最初定居阶段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海洛塞乌斯为主教的匈牙利教区可能包括了所有马扎尔人活动的区域,这个地区大体相当于此前约半个世纪由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及其弟子克莱蒙特(Clement)和纳乌姆(Naum)传教区的范围,因此可以比较肯定地推测,这个阶段的传教是以前基督教传教为基础的。在马扎尔人大举进入这个地区以前,麦瑟迪乌斯就与最早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的一个马扎尔人部落酋长进行过亲切友好的会面。而当他们整个民族西迁以后,马扎尔人必然与当地已经基督教化的斯拉夫人密切接触,深受斯拉夫化的基督教影响。匈牙利语中的“十字架”(kereszt)就来源于古斯拉夫语词根^③。由于缺乏必要的史料,早期马扎尔人基督教化的程度至今是个不清楚的问题。但是,他们在从游牧向定居社会转变过程中接受基督教,对匈牙利国家的形成和文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早期匈牙利基督教化的工作是由拜占廷教会完成的,然而,后来在东欧发生的政治格局变动中,匈牙利教会转向了罗马教会,特别是在1054年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分裂后,他们就一直属于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了。

① 在君士坦丁七世的记载中,赫然列着马扎尔人的名字,排在受礼遇的各巴尔干半岛民族之中。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by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ch. 41, p. 160.

② Scylitzes - Cedrenus, *Synopisi historiarum*, p. 328.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 40, p. 178.

③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56.

马扎尔人早期文明化的过程也比较缓慢,但是在基督教影响下,这一过程加快了。在贵于拉大力支持下,海洛塞乌斯主教的传教活动在蒂萨河流域和南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取得很大成果,建立了许多教堂,继续开办由早期拜占廷传教士建立的学校。在潘诺尼亚平原富饶土地上新的生存环境也使他们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大片的森林和丰富的水系为农耕和畜牧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资源。他们将放牧马群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当地斯拉夫人耕作生活方式结合起来,靠山吃山,靠河吃河,靠平原的则多种植农作物,加上渔猎采集活动,使早期匈牙利国家发展很快,人口快速增长,实力迅速增强。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在草原地带保留的尚武好战习俗也发生了转变,抢劫活动逐渐减少,特别是在955年勒斯非尔德战役以后,几乎停止了对西方国家的袭击,10世纪下半期也逐渐停止对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抢劫^①。最初,潘诺尼亚平原地区的农业种植活动主要由那些被俘的斯拉夫人和拜占廷人来完成,一些原来定居于此的斯拉夫人也以农业为主。后来,马扎尔人逐渐转向农耕生活,显然是由于农业生产具有更大的经济效益,其物质生活的更高质量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

物质生活的变化也引起早期匈牙利国家组织结构的发展。阿尔帕德(Arpad)时代的马扎尔人还处于原始部落联盟解体阶段,阿尔帕德不过是分散的部落联盟选举出的大酋长。此后,占领了潘诺尼亚平原和南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马扎尔人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他们只是在战争时统一行动,而在平时分散活动。这在拜占廷人的记载中被视为从事外交离间计谋的良好条件。各个部落内部分为氏族和家族,各个氏族的酋长构成了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组织,决定涉及整个部落的重大活动和宗教仪式。农业活动和定居生活使早期匈牙利国家逐渐形成了中央集权,特别是在大量外来战俘和土著居民与马扎尔人融合过程中,地域政治关系就逐渐取代了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因为

^① 领土扩张一直都在继续,11世纪末马扎尔人向亚得里亚海沿岸扩张就引起拜占廷人和威尼斯人的极大警觉。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I, p. 414.

新的社会公共权力可以处理大量氏族制度无法解决的日常问题。杰扎(Geza, 970—997年在位)君主时期,匈牙利国家权力得到强化,而其子斯蒂芬(Stephen, 1000—1038年在位)就成为第一位匈牙利国王,这标志着匈牙利王国的正式形成。

匈牙利人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进展的虽然十分顺利,在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朝廷的支持下,传教工作也深入各地农村,逐步建立了教会管理的组织机构网络。但是,在拜占廷人极力扩大其影响的同时,日耳曼人也在加强活动。杰扎君主时期,匈牙利国家面临确定国家教会的重大问题,他们需要在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之间作出选择,这一选择当然也包含着政治上的倾向。如果选择希腊—斯拉夫教会,那么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纳入拜占廷帝国的框架,反之如果选择了拉丁—日耳曼教会,那就必然在政治上倒向罗马教皇为中心的西欧。当时以蒂萨河为界,河东地区大体为拜占廷教会的势力范围,河西为罗马教会的活动空间。970年以后不久,来自帕骚的法兰克传教士为杰扎君主及其子瓦吉克(Vajk)和斯蒂芬施洗^①。斯蒂芬国王统治时期,确定匈牙利教会隶属罗马教皇管辖。这一决定最终将匈牙利国家的发展纳入西欧的政治范围。拜占廷教会影响终止于匈牙利国家还与当时中欧地区的国际政治大环境有关,特别是与摩拉维亚人关系密切。

摩拉维亚人原属阿瓦尔人的一支,他们于9世纪初兴起于潘诺尼亚地区。822年一则史料首次提到叫作摩拉维亚的斯拉夫国家,其创立者是莫杰米尔(Mojmir)。在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 843—876年在位)的扶植下,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Rastislav, 846—870年在位)使摩拉维亚大公国发展迅速,势力范围北到奥德河上游,南至德拉瓦河,控制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地区^②。但是,逐渐强

^① C. A. Macartney, *Studies on Early Hungarian and Pontic History*,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8, pp. 35—56.

^② Francis Dvorni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issions of Cyril and Methodius", *Slavic Review*, vol. 23, No. 2 (Jun., 1964), pp. 195—211.

大起来的摩拉维亚人置身于东法兰克王国和保加利亚国家之间,有被两强吞蚀的危险。860年,保加利亚君主伯利斯一世和东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重新建立了政治宗教联盟。为了保持独立,摩拉维亚人积极向位于保加利亚人南部的拜占廷帝国和西方的教皇寻求支持。862年,拉斯迪斯拉夫请求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842—867年在位)派教士帮助他们建立独立教会,并使用斯拉夫语言传教。这一请求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即摩拉维亚人利用与拜占廷帝国的联盟对抗保加利亚人和东法兰克人之间的联盟。863年,君士坦丁(也称希利尔)和他的兄弟麦瑟迪乌斯应邀前往摩拉维亚传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①。当然,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具有政治外交意义以及通过扩大拜占廷文化影响缓解巴尔干半岛民族关系的外交活动,是中世纪国际关系较量的结果。

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传教的过程在本书关于保加利亚人的章节中有详细描述。他们传教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他们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为斯拉夫人所理解的希利尔文字。其次是他们确立了用斯拉夫语传教的传统。再者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斯拉夫人独立教会逐渐形成。最后是他们在中欧地区的影响存在了数百年。然而,传教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离开了世俗君主的支持就难以持续。摩拉维亚人的国家毕竟不够强大,在大国和强大集团之间还缺乏保持独立性的实力,因此,欧洲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动也必然引起其宗教政策摇摆不定。拜占廷帝国、东法兰克王国、教皇国、保加利亚人国家都对摩拉维亚人的政治走向和宗教倾向产生过重要影响。864年,东法兰克王国的虔诚者·路易就派遣大军人侵摩拉维亚地区,迫使拉斯迪斯拉夫承认其宗主权,君士坦丁兄弟的传教工作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当拜占廷帝国陷入与保加利亚人的战争,或他们所属的希腊教会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与争执时,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危险。而当教皇尼古拉斯一世与德意志人发生

^① 有关君士坦丁传教的细节,参见本书第5章,第3节。

矛盾,并对日耳曼人传教士在世俗君主支持下,靠军事力量不断向东扩张势力范围表示不满时,他们又成为双方斗争的工具。教皇于867年邀请他们到罗马访问就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君士坦丁病逝于869年2月14日。麦瑟迪乌斯病逝于885年。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麦瑟迪乌斯最终获得教皇的正式批准,成为潘诺尼亚地区的大主教和教皇在该地区的代表,这一教会机构和教职后来也得到拜占廷帝国的承认。这样,他们建立的斯拉夫人教会传统就扩大到潘诺尼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甚至波兰南部地区。也许这是君士坦丁兄弟传教事业发展的顶峰。此后,情势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事业逐渐败落。870年,摩拉维亚公国大公拉斯迪斯拉夫被其侄子斯瓦托布鲁克(Svatopluk)推翻后,全面否定了前任大公的政策,使摩拉维亚公国成为虔诚者·路易的附属国^①。麦瑟迪乌斯被剥夺了大主教职位,后被逮捕移交东法兰克王国,被关押在士瓦本监狱中长达两年半。而后,他一直陷于和敌对教士的争论之中,其管理教会事务的工作也受到当时中欧地区变幻无常的政治动荡的影响。881年,他对君士坦丁堡的访问也是当时欧洲政治斗争的结果,因为拜占廷人希望利用麦瑟迪乌斯在斯拉夫人中的巨大声望扩大帝国的宗教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利用其成功的传教经验和斯拉夫语言文字的宗教文献帮助他们解决拜占廷帝国北部边境的安全问题。885年麦瑟迪乌斯去世后,他们终生为之奋斗的传教事业进一步滑入低谷。他的弟子被斯瓦托布鲁克关入监狱,或被驱逐出摩拉维亚,流亡保加利亚。他们虽然在保加利亚受到热烈欢迎,并在伯利斯一世大力支持下前往马其顿地区传教,后来还建立了教堂和修道院,设立了学校培养神职人员,但是,最终都没有取得其前辈的成就,其工作只产生了地区性影响。

^① Francis Dvorni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issions of Cyril and Methodius", *Slavic Review*, vol. 23, No. 2 (Jun., 1964), pp. 195—211.

早期匈牙利国家在占据了摩拉维亚人区域后^①最终转向西欧教会是欧洲政治势力重新组合的结果。由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开创的斯拉夫人教会和拜占廷—斯拉夫文化大约产生了两个世纪的影响,与此同时却在中欧地区逐渐消退。在摩拉维亚地区,斯拉夫教会仪式和希腊—斯拉夫文学大多保存在山区林带人迹罕至的修道院里。同样,在波希米亚地区,斯拉夫人的基督教传统也主要保留在深山老林中。马扎尔人摧毁摩拉维亚公国的过程同时也是清除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和文化传统的过程,在新兴的匈牙利国家,这种传统只保留下些许残余。926年斯瓦托布鲁克去世后,摩拉维亚公国的剩余部分彻底并入东法兰克王国的萨克森公国,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和文化传统尽管在相当长时期里还与拉丁教会并存,但是其消亡的趋势已定。据捷克古代传说,其第一位基督教君主、波希米亚大公伯利沃杰(Borivoj)就是由麦瑟迪乌斯亲自施洗,他和他的妻子路德米拉(Ludmila),以及其孙圣温西斯拉斯(Wenceslas)大公都是斯拉夫基督教徒的保护人,他们还支持斯拉夫人在布拉格附近的撒扎瓦修道院建立了发展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和文化传统的中心^②。尽管匈牙利后来转向罗马天主教,但是古代马扎尔人接受东正教的传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在匈牙利和俄罗斯修道院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波兰南部和捷克伏尔塔瓦河流域的个别地区直到11世纪末还保留着马扎尔人接受东正教的传统。直到11世纪,罗马教会出现了一批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的教皇,他们在东、西教会之间划分清楚的界限,以强化教皇权。教廷颁布了禁止使用斯拉夫语言举行宗教仪式的法令,而1054年基督教东、西教会的公开分裂强化了

^① 君士坦丁七世就此写到:虽然斯瓦托布鲁克“对其邻国非常凶残可怕”,但是马扎尔人“却完全摧毁了他们,并占领了他们的国家”。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ch. 41, p. 180.

^② Robert William Seton - Watson, *A History of the Czechs and Slovaks*,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65, p. 89.

中欧地区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分野^①。这一分野的界限大体以德拉瓦河、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为线。

对于东、西欧洲为何形成了不同的两个世界,学者们力图给出适当的答案。从地理因素上看,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和中心区域与中欧地区距离遥远,缺乏直接联系,与拜占廷政治势力范围相关的宗教和文化影响范围也大体保持与地理因素的一致性。在欧洲古代世界形成的几个重要文化区域都与其地理(包括地形地貌)特征基本吻合。例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特征都与地中海的地理特征相联系,而拜占廷帝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特征大体是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黑海、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地理特征相联系的。超越了自然地理因素提供的条件,拜占廷的影响,首先是政治影响就必然减弱。正如我们在摩拉维亚和匈牙利看到的情况,当地君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适应性很强的拜占廷—斯拉夫传统。摩拉维亚公国只有拉斯迪斯拉夫一位君主支持这一传统,其他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君主不是因为个人宗教信仰上的好恶决定排斥这个传统,而是这个传统达到了它本身内涵的空间上的极限。相对而言,保加利亚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尽管伯利斯一世时期也出现了是否接受拜占廷传教士的痛苦抉择,也发生了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但是这个巴尔干地区北部民族一直处于拜占廷—斯拉夫传统的地理范围内,最终必然要纳入这一传统的框架。从民族因素上看,东欧世界大体上是斯拉夫、希腊和少数西亚民族为主构成的,而中欧以西的欧洲部分则主要是日耳曼、罗马和其他少数土著民族为主构成的。他们在各自活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尽管会形成不同的特征,但是历史发展使他们在社会组织、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上形成了以东、西欧洲为分野的区别。当斯拉夫语宗教仪式在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受到普遍欢迎的时候,它却在日耳曼民族区域遭到广泛抵制。11世纪教廷颁布禁止斯拉夫语宗教仪式的法令

^① J. M. Hussey,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301—330.

是这种民族分野的必然产物,尽管个别教皇出于政治需求对它表示过支持。同样,1054年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件。从政治因素上看,中古欧洲存在过多种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拜占廷帝国式的专制集权在欧洲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出现,或者只是短时期或个别小范围存在的现象,它们无论在官僚体制的完善和帝国权力的势力范围方面都不能与拜占廷帝国相比。而拜占廷帝国政治权力影响的边缘就在中东欧地区。作为拜占廷帝国政治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文化传统与其政治影响也大体吻合。当拉斯迪斯拉夫于864年被虔诚者·路易击败时,拜占廷帝国无力或不愿意提供援助。同样,8世纪中期罗马主教向拜占廷帝国请求援助以抵抗伦巴第人进攻时,他也没有如愿,因此才被迫向法兰克人求援,最终形成了教皇国。古代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对宗教文化影响范围有决定性作用。君士坦丁和麦瑟迪乌斯在潘诺尼亚地区取得的成就,后来不得不随着当地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而消失,残存的拜占廷—斯拉夫传统也逐渐纳入巴伐利亚大公国和后来的萨克森王国模式中。事实上,拜占廷君主对多瑙河以北地区并不感兴趣,特别是10世纪以后,他们很少关心潘诺尼亚地区事务了。如果他们还不时对多瑙河以北民族派遣使节的话,那一定是出于牵制其在半岛上最危险的敌人的外交需要,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上的权宜之计。从文化因素上看,拜占廷人一直怀有深刻的文化优越感,认为除了拜占廷人以外的其他民族都是野蛮的或缺乏教养的民族,需要他们去启蒙和教化。这种来自于古希腊时代的文化优越心理,充分地反映在他们对希腊语的尊崇上。例如,米哈伊尔三世在写给教皇的信中,公开嘲讽拉丁语是“一种粗鲁和带有斯基泰人口音的语言”。雅典主教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Michael Choniates)挖苦说,拉丁人在理解希腊语言和谐优美方面甚至不如笨驴喜欢竖琴的乐声和蜣螂的香味^①。这种文化优越感产生的自傲清高情绪也在拜占廷人的东方世界和封建领主林立的西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52.

欧世界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心理隔阂。显然,匈牙利人转向西欧的因素比较复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匈牙利人从畜牧流动生活方式逐渐过渡到以农耕定居为主的生活后,其政治集权化更加明显,因为游牧民族以血缘关系为主要联系纽带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制度,难以适应定居以后出现的大量外族人口混居的问题。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新的社会结构要求公共权力更加集中。新型的政治集权制度也有利于国家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斯蒂芬国王于1000年按照罗马教廷的习惯接受了教皇的加冕,并宣布匈牙利教会归属罗马教廷管辖^①。

然而,971年拜占廷人击败保加利亚人以后,拜占廷帝国北部疆界再度推进到多瑙河和萨瓦河一线,与匈牙利人隔河相望。大约在此后两个世纪期间,两国共同的自然边界也成为加强联系的地带。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表明,10世纪下半叶到12世纪晚期,随着匈牙利国家实力的增强,其在半岛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往来更加频繁,关系也更加密切^②。拜占廷人凭借其宗教文化优势在971年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对匈牙利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拜占廷基督教对匈牙利人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强烈。在蒂萨河以东直到喀尔巴阡山脉西部的丘陵地区,当地统治者阿杰托尼(Ajtony)君主即是在维丁按照希腊教会的礼仪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他还在其首府马罗斯瓦尔建立了施洗者约翰修道院,聘请拜占廷修道士按照希腊教会的规定进行管理^③。显然,10世纪末前后,拜占廷人对多瑙河中游重镇维丁的控制,极大促进了向匈牙利人传教的活动。后来,匈牙利国王斯蒂芬统一了蒂萨河东部地区,击败阿杰托尼,后者被迫在他建立的希腊修道院里隐居,终老一生。

① D. G. Kosary, *History of the Hungarian Nation*, Danubian Press 1969, pp. 132—140.

② D. G. Kosary, *History of the Hungarian Nation*, pp. 140—152.

③ Gyula Moravcsik, "The Role of the Byzantine Church in Medieval Hungary",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 No. 3/4 (Dec., 1947), pp. 134—151.

匈牙利人与拜占廷人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其中首先是宗教联系。在国王斯蒂芬的宫廷里,拜占廷教士和德意志教士得到同样的保护,享有同等的特权,国王控制着两派之间的关系,保持两者的平衡。这里深刻地反映出匈牙利人外交政策的核心,因为势力强大的拜占廷人当时重新控制了多瑙河南岸地区,与其隔河相望,而野心勃勃的德意志人一直觊觎富饶的潘诺尼亚平原,他们不得不小心从事,精心维持着地区均势,不为任何一方提供借口。他一方面承认教皇的权力,另一方面还保持对拜占廷教会的支持。例如,他慷慨出钱资助在拜占廷首都建立修道院,还聘请许多拜占廷建筑师主持匈牙利王国境内的教堂设计与施工建设,至今人们可以在匈牙利看到许多拜占廷式的古老教堂。不仅如此,王室里的许多成员仍然接受了拜占廷教士的洗礼,并使用希腊教名。与德意志文化相比,拜占廷人继承的古希腊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其宫廷中一直弥漫着浓厚的拜占廷文化气息,不时地使用希腊语几乎成为匈牙利王公有教养的标志和上流社会的时尚。斯蒂芬在巴拉顿湖附近的维斯普雷姆地区建立的圣母女修道院,也是按照拜占廷教会的制度进行管理,其制订和遵守的规定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希腊语。斯蒂芬和他以后的几位国王在匈牙利境内建立了多所拜占廷式修道院,其中一些至今保持着希腊名称。这些修道院在传播和保持拜占廷—斯拉夫宗教文化影响和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匈牙利主教杰拉德(St. Gerard of Csanad)的作品中就存在大量拜占廷神学和希腊文学的内容,匈牙利基督教礼仪中至今保留着许多希腊教会的习惯。拜占廷圣徒传记也在匈牙利广泛流传,例如塞萨洛尼基城市保护神圣迪米特里(St. Demetrius)的传记就为匈牙利人所推崇,因为这个拜占廷帝国的著名基督教圣人据说出生在匈牙利人控制的西尔缪姆城,他的遗骨保存在该城圣迪米特里修道院^①。该修道院也是11世纪的拜占廷式建筑,当时隐居在此的主要是拜占廷修士和匈

^① Gyula Moravcsik, "The Role of the Byzantine Church in Medieval Hungary",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 No. 3/4 (Dec., 1947), pp. 134—151.

牙利修道士,还有一小部分斯拉夫修道士,他们的习俗一直保持到14世纪,那以后这所修道院就成为本尼狄克特教会(Benedictines)的财产了。

由于匈牙利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与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军事关系也十分微妙。匈牙利国王有时被迫卷入半岛事务。1004年,国王斯蒂芬就与皇帝瓦西里二世订立了反保加利亚人同盟,出兵帮助拜占廷军队打击桀骜不驯的沙木埃尔,占领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首都维丁。巴尔干半岛现代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也充分证明了11、12世纪期间匈牙利人与拜占廷人保持的密切政治联系。18世纪匈牙利农民在田地耕作时发现的所谓“君士坦丁·蒙诺马豪斯皇冠”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考古物证。该皇冠是典型的拜占廷式皇冠,其装饰物包括7块黄金珐琅图画,描绘了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蒙诺马豪斯(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 1042—1055年在位)与其共同执掌皇权的邹伊(Zoe, 1042—1050年在位)和塞奥多拉(Theodora, 1042—1056年在位)两位皇后,以及使徒彼得(Apostle Peter)和安德烈(Apostle Andrew),珐琅画上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学者们推测这顶皇冠制作的年代在1042—1050年间,可能是拜占廷帝国君主作为赠送其附属国君主的礼物,送给匈牙利国王安德烈(Andrew I, 1046—1060年在位)和其妻子的。根据匈牙利古代文献资料,这位安德烈国王特别擅长与周围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不仅与西欧国家而且与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拜占廷人维持密切的关系^①,他还在基辅接受了希腊教士的洗礼,并娶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Yaroslav)的女儿为妻。他下令建立的拜占廷式修道院是专门用于收留受到他保护的拜占廷—斯拉夫修道士的,直到13世纪,该修道院仍由希腊教士管理。一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蒙诺马豪斯皇冠”表明,当时安德烈国王可能承认了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②。按照拜占廷人

^① 史料记载,他还与塞尔维亚王室建立联姻关系,并协助后者争取政治独立。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I, p. 414.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59.

的政治理论,拜占廷皇帝将特制的皇冠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赠给帝国附属国君主和地位最高的皇家贵族,表示皇帝个人的特殊眷顾和对附属国行使宗主权的象征。

如果人们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另一件文物进一步肯定了这种推论。这就是专门为匈牙利国王加冕时使用的所谓的“匈牙利圣冠”。它的形制完全采用拜占廷皇冠顶部开放的惯例。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圣冠头圈部分的珐琅绘画,其中正面的画面是全能至高的基督坐像,其下站立着天使长米加勒和加百列,他们两侧分别为圣徒乔治、迪米特里、哥斯马斯和达米安^①。而在圣冠背面的图案中,头戴皇冠的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VII Coukas,1071—1078年在位)的胸像处于和正面基督同样的位置,他下面相当于正面天使长的位置则是其任命的共治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匈牙利国王盖扎(Geza)。如果仔细观察画面的细节,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更清楚地反映出来。米哈伊尔七世高高在上,象征着他是上帝在世俗人间的最高权力代表,其权力来自于神授就表现在他和他儿子、共治皇帝君士坦丁头部均有表示神圣的光环,这在基督的头部也可以看到,而盖扎作为拜占廷帝国附属国的君主就不享有这一荣耀。虽然他的地位可以与共治皇帝君士坦丁并列,但是他的头部没有光环,原因在于其权力是由拜占廷皇帝授予的。同时,表明他们各自身份的文字也使用了不同的颜色,按照传统,拜占廷皇帝的名称和称号均使用红色,而盖扎的名字和称号使用兰色,以示区别。尽管对于这件文物学者们还存在不同的解释,但是,透过“匈牙利圣冠”底座的画面,人们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认定匈牙利王国

^① 米加勒(Michael)、加百列(Gabriel)为《圣经》传说中的人物,乔治(St. George)、迪米特里(St. Demetrius)、哥斯马斯(St. Cosmas)和达米安(St. Damian)则是拜占廷基督教中的圣徒。参见梁工主编:《圣经百科全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相关词条。

在这一时期承认了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①。

拜占廷帝国和匈牙利王国的关系在12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104年,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一世(Ladislas I, 1077—1095年在位)的女儿皮罗斯卡(Piroska)嫁给了拜占廷帝国科穆宁王朝皇储约翰。这桩婚事是由拜占廷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Comnenus, 1081—1118年在位)一手促成的。当约翰(John II, 1118—1143年在位)于1118年即位后,皮罗斯卡顺理成章地成为拜占廷帝国的皇后,她后来改名为伊琳尼(Irene),生育了8个子女,其中就有未来的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1143—1180年在位)。

但是,两国关系并非完全由友好往来和联姻构成的,其中也伴随着偶发的对立乃至武力冲突。以匈牙利王国宗主身份自居的拜占廷人有意无意地参与匈牙利国内政治事务,科穆宁王朝力图将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变成现实,因此在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期间,虽然曾利用匈牙利军队对抗亚洲的敌人,但是他经常通过庇护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反对派贵族的方式干涉匈牙利王室内讧。也许他认为自己从血缘上就享有仲裁匈牙利人王室争端的权力,因此在位期间曾亲自或派遣军队侵入匈牙利达十余次^②。有学者认为,他的政治野心不是干涉匈牙利内政以求北部边境的安定,而是企图通过将匈牙利变为拜占廷帝国的领土以求扩张,将拜占廷帝国的边界推进到中欧。1167年,曼努埃尔一世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最后击败匈牙利国王斯蒂芬三世(Stephen III, 1161—1173年在位),迫使后者在西尔缪姆城签署了有利于拜占廷人的和约,规定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地区划归拜占廷帝国,匈牙利王国承认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1169年,他又单方面撕毁了六年前两国达成的联姻协

① 所谓不同的意见是指,“匈牙利圣冠”是12世纪盖扎三世为其妻子制作的,其装饰的法郎画则是从11世纪拜占廷人赠给盖扎一世王冠上挪用的。这一不同意见并不影响人们对当时拜占廷—匈牙利关系的结论。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p. 160—161.

② 其母为匈牙利公主皮罗斯卡。Paul Magdalino, *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 p. 350.

议。按照这个协议,匈牙利国王盖扎二世(1141—1161年在位)的儿子贝拉(Bela III, 1173—1196年在位)应作为人质被送到拜占廷帝国宫廷,并确定了他与曼努埃尔一世的女儿玛利亚(Maria)之间的“娃娃亲”。这个贝拉在君士坦丁堡以阿莱克修斯的名字接受系统教育,并被授予“专制君主”的称号,甚至还被确定为曼努埃尔一世的继承人,前提是后者将来无男性继承人。如果这个联姻成功,巴尔干半岛有可能继续保持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1169年曼努埃尔一世的幼子阿莱克修斯^①去世后,曼努埃尔立即改变了决定,不仅撕毁婚约,而且剥夺了贝拉已经被授予的各项名号和头衔,这一侮辱深深地埋在了贝拉的心头,也埋下了十余年后匈牙利人对拜占廷人进行疯狂报复的伏笔。

贝拉在拜占廷首都生活了十个年头,1172年他回到祖国,次年接替他的哥哥成为匈牙利国王。即位初期,他仍然保持着与拜占廷人的友好关系,表面上仍然承认曼努埃尔一世是他的教父,1176年还派遣匈牙利军队援助拜占廷人抵抗塞尔柱突厥人(Seljuq Turks)的进攻。这一年,拜占廷军队在迈里奥塞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ccephalon)遭到惨重失败,其损失不亚于百年前拜占廷人在曼兹克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的战败。但是,客观分析贝拉三世推行亲拜占廷政策的原因,人们还不能仅仅依据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十年经历,或以此断言他在宗教和文化传统上的背景决定了他的政策倾向。事实上,他如同保加利亚的西蒙一样,虽然接受了长期系统的拜占廷文化教育和熏陶,但是,一旦他执掌本国权力,必然要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当时,匈牙利君主并没有放弃干涉甚至入主巴尔干半岛的欲望,特别是在半岛地区缺乏强大国家的时候,这种欲望就变为实际行动了。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的去世为他提供了机会,因为篡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Andronikos I Komnenos, 1183—1185年在位)残酷屠杀了曼努埃尔家族的成员,其中

^① 这个阿莱克修斯后来于11岁即位,但是他自幼娇生惯养以至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恶习,甚至下令处死了对其管束的母亲玛利亚,最终被篡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勒死,抛尸大海。

包括小皇帝阿莱克修斯二世(Alexios II, 1180—1183年在位)。贝拉三世借口为教父一家报仇,联合塞尔维亚人,派军侵入巴尔干半岛,兵锋直指色雷斯平原,并夺取了大摩拉瓦河上游重镇尼斯和保加利亚平原地区首府索非亚。而后他声称要履行曼努埃尔一世最初确定他为拜占廷帝国继承人的承诺,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合法皇帝。为了名正言顺地成为拜占廷皇帝,他于1184年要求与曼努埃尔一世的姐姐塞奥多拉(Theodora)结亲,因为她的丈夫恰巧刚刚去世。但是,她已经发誓成为修女,要重新嫁人必需通过教会批准解除誓约,这使贝拉必须等待时日。他计划趁着拜占廷人普遍憎恨篡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时机,利用匈牙利大军兵临拜占廷首都城下的军事优势,在其众多朋友帮助下,登上拜占廷帝国皇帝宝座^①。但是他晚了一步,错过了这个时机。1185年,君士坦丁堡爆发人民起义,推翻了残暴的安德罗尼库斯一世,拥立依沙克二世(Isaac II, 1185—1195年在位)为新皇帝。在新皇帝干预下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决议,不允许塞奥多拉解除誓约,从而断绝了贝拉三世与她结婚的念头。此时,匈牙利军队将士厌战,军心浮动,思乡情绪严重,贝拉被迫撤军。

回到匈牙利后,贝拉三世认识到其夺取拜占廷帝国皇权和与塞奥多拉结亲的计划都难以实现,因此彻底放弃了这一野心。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间,他继续发展与拜占廷人的友好关系,特别是通过王室联姻参与巴尔干半岛事务。1187年,他将女儿玛利亚(Maria - Margaret)嫁给拜占廷皇帝依沙克二世。他还将象征拜占廷皇权的黄金权杖和宝球,以及皇室标志双十字架引进匈牙利王室。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分析的,东、西欧洲分离的趋势不是任何个人力量能够改变的,尽管贝拉三世倾向于纳入巴尔干半岛,并极力推行文武兼施的政策,但是在他意识到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后,于1186年与法国加佩王朝公主马格利特

^① Zoltan J. Kosztoľnyik, "The Church and Bela III of Hungary (1172—1196): The Role of Archbishop Lukacs of Esztergom", *Church History*, vol. 49, No. 4 (Dec., 1980), pp. 375—386.

(Margaret)结婚,并重新开始转向西欧。1196年他去世后,匈牙利王国与拜占廷帝国经历了250年的“蜜月期”遂告结束。

在十字军东侵期间,匈牙利人扮演着非常尴尬的角色。当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公开呼吁西欧君主发动新的十字军战争时,他急切地说:“我们的敌人欺辱我们说:‘你们的上帝在哪呢?他既不能从我们手中解救他自己也不能解救你们。’……我们将如何应对这种挑衅?我们怎么能对这样的欺辱无动于衷?”^①但是,西欧各国君主对此毫无反应,只有匈牙利国王响应,他无非希望以此拉近与西欧世界特别是罗马教皇的距离。然而,十字军并不领情。“由于他们不能支付运输船只的费用,因此同意(威尼斯)总督提出的帮助威尼斯夺取被匈牙利人洗劫的扎拉城以支付运兵船费用的建议。这是十字军偏离其原定目标的第一次转向。为了实现威尼斯的目的,十字军骑士对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人开战,尽管匈牙利国王本人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仍然不顾扎拉城居民在城头树起基督受难十字架,于1202年11月猛攻该城”,并大肆洗劫了该城^②。

14世纪下半期以后,土耳其人迅速进占巴尔干半岛要冲,基督教徒和奥斯曼军队之间的斗争逐渐白热化。当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军队于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失败后,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各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命运就注定走向灭亡。为了消除日益临近的威胁,匈牙利被迫参加巴尔干半岛各民族抵抗土耳其人入侵的战争。1395年,匈牙利人强力支持的瓦兰吉亚人在罗维尼平原战役中失败后,土耳其人就直接威胁匈牙利国土了。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特(Sigismund)挺身而出,担负起欧洲基督教徒反抗土耳其军队战争的领导责任。一支以匈牙利国王为统帅,包括法国军团、德意志骑士、英格兰士兵、波兰人、威尼斯水手、勃艮第人、热那亚人和拜占廷军队在内的“十字军”于1396年9月25日在尼科堡战役中与土耳其军队进行决战。由于匈牙利人和作

① Epistolae, I, 336. 转引自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I, p. 452.

②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40页。

为联军主力的法国军团之间缺乏协调合作^①，遭到彻底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国王西吉斯蒙特临阵逃脱，回到匈牙利后再也不敢露面了。巴尔干半岛从此放弃了最后的抵抗，除了伊庇鲁斯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外，全部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武力，半岛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① R. Rosetti,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1396)", *Slavonic Review*, 15 (1937), 629 ff.

第七章 塞尔维亚人、 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

第一节 塞尔维亚人

塞尔维亚人(Serbs)的起源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他们属于早期斯拉夫人的后裔,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属于高加索人,后在斯拉夫人西迁的过程中,逐渐与斯拉夫人融合^①。在斯拉夫民族大举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迁徙中,他们成为最后定居在半岛西北部的斯拉夫人。

塞尔维亚人从巴尔干半岛西北方向进入原属罗马帝国的伊利里亚行省,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拜占廷人的影响下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区,建立了塞尔维亚贵族统治集团,并服从拜占廷帝国政府的管理。事实上,塞尔维亚人最初活动在潘诺尼亚地区以北的山区,他们和其他多支北方原始部落民族,在严寒的逼迫下,南下威胁控制潘诺尼亚地区阿瓦尔人。当时,巴尔干半岛内陆面临阿瓦尔人南下的威胁,拜占廷人遂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请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从背后攻击阿瓦尔人。阿瓦尔人衰落后,塞尔维亚人得到拜占廷皇帝允许,在当地定居下

^① Sima M. Cirkovic, *The Serbs*, tran. By Vuk Tosic, Blackwi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4, pp. 2—13. Nevill Forbes, Arnold J. Toynbee, D. Mitrany, D. G. Hogarth, *The Balkans, a history of Bulgaria, Serbia, Greece, Rumania, Turkey*,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15, pp. 56—67.

来。他们定居在克罗地亚人以东,亦即今天塞尔维亚人分布的地区。由于塞尔维亚人是应拜占廷皇帝伊拉克略一世的邀请而来,所以从一开始即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并作为拜占廷帝国的臣民。当时,受拜占廷皇帝控制的罗马教区主教,按照皇帝的指令,派遣传教士到塞尔维亚人中间传教,使他们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不久他们又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恢复了其古代的宗教。

在阿瓦尔人入侵巴尔干地区的混乱时期,他们成为牵制阿瓦尔人以维持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地区安定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期,塞尔维亚人与拜占廷人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皇帝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统治时期,拜占廷人“利用基督教作为约束好战民族和保持其新臣民对帝国忠诚的手段”^①。这种关系维持了相当长时间,尤其在保加利亚人大举向南迁徙和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陷于战争动乱期间,塞尔维亚人所定居的地区倒成了“世外桃源”。准确地说,塞尔维亚人东部比邻保加利亚人,而保加利亚人的战略目标一直在南部,因此,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接壤的山区保持相对平静。塞尔维亚人虽然已经是拜占廷帝国的臣民,但是,他们的基层社会组织仍然是原始部落,这种居民社区称为“祖番”,分散在今天南斯拉夫西部波夫伦山、马连山、兹拉蒂博尔山、兹拉塔尔山、锡尼亚耶维纳山和戈利亚山之间的德里纳河、利姆河、塔拉河、皮瓦河、瓦兹河和西摩拉瓦河流域。这里的山区虽然山峦重叠,但是水系丰富,对于从半游牧向农耕畜牧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塞尔维亚人来说,生存条件极为适当。后来,随着塞尔维亚人数量的增加,蒙特内哥罗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狭长山区蕴藏的自然资源就无法满足需求,他们便逐渐向南部和西部扩张。

9世纪初以前塞尔维亚人早期扩张期间,他们征服了巴尔干半岛西北地区的诸多土著居民,其中包括戴克莱安人(Diocleians)、特布尼奥特人(Terbouniotes)、卡纳利特人(Kanalites)、查赫鲁尼人(Zachluni)、纳伦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60.

塔尼人(Narentani)等。这意味着塞尔维亚人向西进入今天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约包括从戈利亚山直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达巴尔谷地、波波沃谷地,从德里纳河流域到亚得里亚海沿海山脉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亚霍里纳山、别拉什尼察山、弗拉尼察山、拉杜沙山、迪纳拉山、斯维拉亚山和内韦西涅平原地区。他们甚至占领了亚得里亚海沿海的姆列特岛、列沙茨岛、科尔丘拉岛、赫瓦尔岛、布拉奇岛,控制了这一带的出海口。按照当时拜占廷作家的记载,这一地区此前属于拜占廷人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对当地土著民采取松散的管理。塞尔维亚人对这个地区原始部落居民的征服使“他们摆脱了罗马人(指拜占廷人)大帝国的控制,成为不服从任何人的自治和独立的社会”^①。

塞尔维亚人在扩张中强化了国家权力和官僚机构的发展,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850年,弗拉斯迪米尔(Vlastimir)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发生军事冲突,前者击败了后者的入侵。也许是在与保加利亚人的直接接触中,塞尔维亚人越发感到本地生活的落后和以拜占廷生活方式为代表的南部生活的巨大吸引力,毕竟保加利亚人接受了更多拜占廷影响,并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和拜占廷文化。于是,塞尔维亚君主向瓦西里一世的宫廷派遣特使,要求拜占廷人派传教士,希望重新回到基督教世界中。如果我们具体分析当时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形势,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正是保加利亚人放弃对罗马教皇的希望,重新接受拜占廷传教士的转折点,那么塞尔维亚人向拜占廷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明显带有保持政治平衡的目的。据君士坦丁七世记载,塞尔维亚人“向(瓦西里一世)皇帝派遣许多使节,要求他们也被许可为罗马人仁慈的权力和其大教长的权力所管束,……皇帝像宽恕其随意叛逆而心生悔改的回头浪子的慈父一样,接纳和允诺了他们,马上给他们派去教士,同去的还有外交官。当他们全都接受了神圣的洗礼,并回心转意忠实于罗马人后,皇帝就完全恢复对他们国家的权力了,而他明智地决定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 29, p. 124.

他们应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本民族的君主进行统治”^①。有关塞尔维亚人自上而下的基督教化是否像在保加利亚国家那样引发广泛的社会反映,目前没有充分的材料加以证明,但是,就他们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而言似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而且,9世纪后半叶,塞尔维亚人还以“清除反基督教势力”为借口,对活动在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的纳伦塔尼人残余势力进行过军事清剿。

塞尔维亚人对沿海地区的清剿行动对拜占廷人在亚得里亚海的航线十分有利,因为当时日益兴起的拜占廷—威尼斯海上贸易经常受到纳伦塔尼人海盗的袭击。在此之前,威尼斯人也曾试图通过传教或军事手段征服纳伦塔尼人,但是,由于后者控制沿海山区,令海上能力强于陆上作战的威尼斯人一直无法达到目的。只是由于塞尔维亚人从陆地方面清除了纳伦塔尼人的根据地,并切断了他们进入海洋的道路,最终迫使他们降伏,并成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最后一部分巴尔干半岛居民^②。

西蒙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人与拜占廷人发生过长期战争,在此期间,塞尔维亚人基本上保持中立。由于他们与拜占廷人之间阻隔保加利亚人国家,因此,他们虽然继续保持与拜占廷人的友好关系,但是,一直没有卷入战争。直到917年,拜占廷人无力抵抗保加利亚人的进攻,派遣迪拉修姆军事总督前往达尔马提亚地区,说服塞尔维亚君主彼得(Peter of Serbia)出兵援助时,他们才准备从西面进攻保加利亚人。西蒙培植的塞尔维亚人反对派立即向沙皇通报消息,使保加利亚人提前进攻塞尔维亚,并于918年将彼得击溃并俘虏,后押送关入保加利亚人的监狱。此后,塞尔维亚人新任君主扎哈里亚斯(Zacharias)在拜占廷人支持下登基,920年冬季从其留学的君士坦丁堡回到达尔马提亚地区。作为罗曼努斯一世任命的塞尔维亚君主,他一回国就受到反拜占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 45, pp. 291—292.

^② Patricia Fortini Brown, *Venice and Antiquity: the Venetian sense of the pa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18.

廷人势力的反对,被迫流亡^①。而保加利亚人支持下的塞尔维亚傀儡贵族势力迅速发展,促使扎哈里亚斯转向保加利亚人。三年后,西蒙强行任命扎哈里亚斯为塞尔维亚人君主。扎哈里亚斯深厚的拜占廷文化背景使他再次倒向拜占廷人,他断绝了与保加利亚人的联盟,重新恢复了与拜占廷人的关系,接受拜占廷皇帝为其宗主。西蒙极为恼怒,两度派兵洗劫塞尔维亚人国家,使其城乡遭到严重破坏。扎哈里亚斯在西蒙打击下,逃亡至克罗地亚王国,得到托米斯拉夫(Tomislav)的庇护^②。横行称霸的西蒙当然没有把克罗地亚王国放在眼里,认为胆敢收留扎哈里亚斯的托米斯拉夫是与保加利亚人作对,于是继续向克罗地亚人进攻。而此时的保加利亚人已经势同强弩之末,在潘诺尼亚平原遭到克罗地亚人的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次年5月,西蒙因心脏病去世。西蒙之死给巴尔干半岛带来了和平,塞尔维亚人也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

保加利亚新沙皇彼得是个文弱随和的人,他在位期间与拜占廷人一直保持良好关系,不仅于927年10月和拜占廷人订立和约,而且与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的孙女玛利亚结婚,并成为罗曼努斯的教子。拜占廷人则恢复了对塞尔维亚人的控制。曾被西蒙扣押在普里斯拉夫的前塞尔维亚君主查斯拉夫(Caslav, ?—950年在位),利用西蒙去世之后保加利亚的混乱,在拜占廷间谍的帮助下,越狱成功,返回塞尔维亚。为了感谢拜占廷人的救助,逃回祖国后他立即支付给拜占廷人大笔酬劳,并一直保持与拜占廷帝国的友好关系^③。

塞尔维亚人所在地区远离拜占廷帝国政治中心,但是,他们在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两国之间一直通过保持与拜占廷人的稳定关系来维持

^① George Christos Soulis, *The Serbs and Byzantium, during the reign of Tsar Stephen Dusan (1331—1355) and his Successors*, Athens: Ekaoseis Banias 1995, pp. 123—128.

^② Harold W. V. Temperley, *History of Serbi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9, pp. 354—358.

^③ Sima M. Cirkovic, *The Serbs*, tran. By Vuk Tosic, Blackwi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4, pp. 46—52.

自身利益,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在拜占廷人征服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后,塞尔维亚人进一步加强了与拜占廷帝国的友好关系。10世纪后半叶,他们成为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西部最忠实的盟友和附属国。拜占廷人也是通过塞尔维亚人实现对波斯尼亚地区的控制,而这个地区大体相当于德拉瓦河和萨瓦河上游流域。在拜占廷史料中,波斯尼亚被认为是塞尔维亚人辖制的地区^①。

11世纪期间,塞尔维亚人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巴尔干半岛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斯库台湖周围直到亚得里亚海滨的科托尔湾之间确立起第一塞尔维亚王国的中心地区,势力范围向南伸展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向东深入蒙特内哥罗山区。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塞尔维亚王国开始努力摆脱拜占廷人的控制,并与拜占廷帝国发生军事对抗。1042年,在拜占廷史料上被称为戴克莱安人或宰塔人(Zeta)国家的君主斯蒂芬·沃杰斯拉夫(Stephen Vojislav),经过几番较量,最终摆脱拜占廷人的控制,自立为独立王国国王。拜占廷朝廷闻讯,立即调兵镇压,由拜占廷帝国设立在半岛西部的迪拉修姆军区军事总督率军,但是被善于山地作战的塞尔维亚人打败^②。从此,塞尔维亚人开始了与拜占廷人的军事斗争。斯蒂芬·沃杰斯拉夫凭借击溃拜占廷军队的声势,继续扩张,兼并了特布尼奥特人和查赫鲁尼人地区。其子米哈伊尔(Michael,约1052—1081年在位)继承父业,向南扩张。为了名正言顺地进行领土扩张,他利用拜占廷教会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斗争,争取教皇批准,建立了安提瓦利教区,以取代迪拉修姆教区。后者原属于东正教教会,在巴尔干西部地区发挥重要的传教作用。新的变动使米哈伊尔强行将教会用语从希腊语改变为拉丁语,并强令周围其他教会服从统一管理。他还仿效克罗地亚国王迪米特里·兹沃尼米尔(Demetrius Zvonimir),于1077年正式接受教皇格里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 45, p. 293.

^② Harold W. V. Temperley, *History of Serbia*, p. 360.

特使的加冕,承认教皇的宗主权,成为教皇的附属国^①。独立后的塞尔维亚国王称为“克拉尔”(Kral),以斯卡德拉(Skadar)为都城。

米哈伊尔的儿子和继承人君士坦丁·伯丁(Constantine Bodin)还在1072年参加了保加利亚人发动的民族大起义,被起义军推举为保加利亚沙皇,定都普里兹伦。当然,这次起义不仅仅是民族起义,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为参加起义的不仅有保加利亚人,还有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反抗拜占廷当局的新税收政策。起义被镇压后,君士坦丁·伯丁作为俘虏被关押在拜占廷人的监狱中。1082年,他设法越狱,逃回祖国,并接任塞尔维亚国王^②。他继续保持与罗马教皇的友好关系,并扩张领土,将宰塔王国疆域扩大到拉斯卡和波斯尼亚地区。但是,塞尔维亚人的胜利取决于两个外部条件,一是拜占廷朝廷陷于长期的内讧,无能平庸之辈觊觎皇位,轮流坐庄,因此无暇西顾;二是保加利亚人尚未从瓦西里二世的沉重打击下恢复元气,陷于低迷衰落状态。然而,第一个条件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拜占廷帝国科穆宁王朝的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1081—1118年在位)夺取皇权后,全面整顿军队,进而清剿巴尔干半岛反叛势力。他首先击溃了入侵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的北欧诺曼人,重新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地区和邻近的伊奥尼亚群岛,恢复拜占廷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而后,拜占廷人发动了清剿塞尔维亚独立反叛势力的军事行动。1085年和1090年,伯丁被阿莱克修斯一世击败被俘,塞尔维亚王国被灭亡,被征服地区重新被划为拜占廷军区。伯丁建立的王国不久被拉斯卡的塞尔维亚人君主所控制。

拉斯卡曾是塞尔维亚人定居巴尔干半岛后的中心区,这个名称来源于该地区首府附近的拉斯城堡。首府诺维帕扎尔是当地塞尔维亚人部落大酋长的驻地。大酋长也称为“大族番”(Grand Zupans),是各部落联盟的首领。从11世纪末到1180年间,他们曾是拜占廷帝国的藩属臣

^① Voin Bozhinov and L. Panayotov, *Macedonia, Documents and Material*, Sofia 1978, pp. 125—129.

^② Sima M. Cirkovic, *The Serbs*, pp. 66—74.

民。在12世纪期间,这些塞尔维亚人利用拜占廷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战争,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向东抵达尼斯城,向南抵达马其顿北部,从而与拜占廷人发生了直接接触。这个时期的拉斯卡大族番多是本地人,但需要得到拜占廷地方政府的批准。在拜占廷人需要的时候,他还要派遣塞尔维亚人军队支援拜占廷军队。1172年,大族番斯蒂芬·奈曼加(Stephen Nemanja)发动起义,企图摆脱拜占廷人控制,被皇帝曼努埃尔(Manuel I, 1143—1180年在位)镇压^①。失败后,斯蒂芬·奈曼加被俘,赤足披头,被绳子牵着,押解到君士坦丁堡,拜见皇帝。他被迫左手持剑,跪拜在皇帝面前,并将刀剑奉献上缴给曼努埃尔,以示伏罪臣服。这是拜占廷人举行的盛大凯旋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当时的拜占廷作家记载下来^②。斯蒂芬·奈曼加认罪后被重新放回塞尔维亚。但是,他不甘心失败。1180年,曼努埃尔去世后,他再次效法保加利亚人起事反叛,利用匈牙利人和诺曼人进攻巴尔干半岛,拜占廷人无暇顾及边远地区的机会,宣布独立,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达尔马提亚地区。为了防止拜占廷人的打击,他支持保加利亚人起义,同时,结交德意志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当后者于1189年率领德意志骑士组成的第三次十字军路过塞尔维亚领土时,他在尼斯城盛情款待德意志将士。他和保加利亚人一样,利用这一时机与西方骑士结盟,并帮助德意志骑士与拜占廷人为敌^③。只是由于拜占廷人采取了精明的外交手段应付腓特烈,才使之为实现其进攻塞尔柱突厥人的总目标而置塞尔维亚人的亲善于不顾。

1190年,拜占廷皇帝依沙克二世(Isaac II Angelos, 1185—1195年在位)设法将德意志十字军送过海峡后,转而处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

① Paul Magdalino, *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7—73.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21.

③ Peter Munz, *Frederick Barbarossa: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56—361.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I, p. 443.

人的反叛行为。他首先派遣舰队从黑海沿多瑙河逆流而上,进入多瑙河下游地区,同时,指挥陆军从麦森布里亚进攻保加利亚北部地区。但是,拜占廷人再度于巴尔干山脉隘口遭到保加利亚人伏击,损失惨重。而拜占廷人进攻半岛西部塞尔维亚人的部队却获得了重大胜利,奈曼加的塞尔维亚人在摩拉瓦河战役中被击败。为了继续笼络斯蒂芬·奈曼加,拜占廷人与塞尔维亚人订立了有利于后者的和约,不仅承认了塞尔维亚人占领拜占廷领土的事实,而且也承认塞尔维亚人国家的独立。两国还建立了联姻关系,依沙克二世的侄女尤多西亚(Eudoxia)嫁给斯蒂芬·奈曼加的儿子小斯蒂芬(Stephen)。拜占廷皇室还赐予塞尔维亚国王最高级的贵族称号,享有穿戴皇室服装的尊贵地位^①。拉什主教区从属于奥林里德大主教区,后者属于拜占廷教会管辖。但是,斯蒂芬·奈曼加采取双重承认,即同时接受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的传教和洗礼,据记载,他在拉什接受过拉丁教士的洗礼,而后又在奥林里德接受希腊大主教的洗礼。尽管如此,斯蒂芬·奈曼加出于政治目的的宗教政策不能改变塞尔维亚人接受拜占廷宗教文化传统的趋势。1194年,斯蒂芬·奈曼加最喜欢的小儿子拉斯特科(Rastko)放弃祖国,私自投奔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圣山,在希腊修道院瓦托派底修道院出家,成为修士^②。这件事对斯蒂芬·奈曼加影响极为深刻,自从其幼子出走后,他完全改变了生活方式。1196年,他放弃了王位,安排另一个儿子斯蒂芬(Sebastocrator Stephen)继承王位,而后,他本人也追随小儿子拉斯特科前往阿索斯圣山修道,住进了他在当地修建的塞尔维亚人修道院,该修道院名为西兰达尔。他改名为西蒙(Symeon),拉斯特科改名为萨瓦(Sava),他们成为中世纪塞尔维亚文学和宗教事业中最重要的人物,该修道院也成为塞尔维亚文化发展的重要中心^③。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32—335页。

② Sima M. Cirkovic, *The Serbs*, pp. 78—84.

③ 该修道院至今仍是阿索斯圣山最重要的修道院。Andrew Aghioritis, *Holy Mountain, Bulwark of Orthodoxy and of the Greek Nation*, Thessaloniki 1980, pp. 88—96.

事实上,塞尔维亚人自7世纪以来已经逐渐融入巴尔干半岛形成的共同宗教文化传统中,直到13世纪以前,他们是真正开发巴尔干半岛西北山区的外来民族,也是最自觉纳入拜占廷政治文化体系的“本分”的斯拉夫人。他们主动而稳定地接受从拜占廷人和保加利亚人控制地区传入的强大影响,换言之,巴尔干半岛古典的、拜占廷的和斯拉夫的传统到13世纪时已深深扎根于塞尔维亚人社会。拜占廷—斯拉夫宗教文化影响从色雷斯西部平原和马其顿北部地区沿着摩拉瓦河、伊巴尔河传入塞尔维亚地区,逐渐在伊巴尔河流域和科索沃平原形成了中心区,这里也是拉斯卡国家的腹地。1018年,保加利亚灭亡后,塞尔维亚成为拜占廷帝国的邻国。如果,拜占廷帝国继续保持其强大的实力,塞尔维亚人将会继续保持与这个强大“靠山”的友好关系。但是,历史假设只存在于后人的推测中,拜占廷人未能持续其大帝国的盟主地位,因而也未能继续以强制手段完成巴尔干半岛的“一体化”。实力相当的民族之间最容易爆发冲突。当拜占廷人和保加利亚人衰落之时,塞尔维亚人不断兴起,他们逐渐成为争夺巴尔干半岛霸主的新力量,为此,他们加强反对拜占廷人的阵营,塞尔维亚遂与波斯尼亚、扎塔等小国结盟。

应该说,12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的衰落对巴尔干半岛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直接促进了塞尔维亚人的崛起。12世纪,塞尔维亚与匈牙利、威尼斯和基辅罗斯结成反拜占廷人同盟,其目的艰难自保多于争夺霸权。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设法重振帝国雄风,并一度将塞尔维亚再次变为拜占廷帝国的附属国。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夺取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廷人彻底丧失巴尔干半岛强国地位,塞尔维亚则趁势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王国,1217年,斯蒂芬(Stephen)成为塞尔维亚第一位由教皇加冕的国王,两年后,其兄萨瓦(Sava)则由拜占廷大教长加冕称王,拜占廷的尼西亚流亡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同时,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复杂的局势中,联合盘踞在伊庇鲁斯地区的拜占廷君主,对抗再度兴起的保加利亚人。13世纪期间,原本与拜占廷人保持长期

良好关系的塞尔维亚人在半岛局势失控、拜占廷朝廷流亡亚洲期间，曾出现了外交政策摇摆不定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必须在保加利亚、拜占廷、拉丁、匈牙利等各派力量中寻找靠山和盟友，以维护本国利益。在此期间，塞尔维亚人先后与伊庇鲁斯的拜占廷人、尼西亚的拜占廷人、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牙利人、西西里和拿坡里的安阁文人结盟。他们在文化上充当着拉丁世界和希腊世界的桥梁，正像斯蒂芬·奈曼加既接受罗马教会的洗礼，也接受希腊教会的洗礼，其双重洗礼的含义包括了政治和文化的多种选择倾向。塞尔维亚西部靠近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特别是杜布罗夫尼克、迪拉修姆、巴尔等城市，成为他们与意大利拉丁传统文化沟通的重要据点，而塞尔维亚腹地和东部则构成了与巴尔干半岛拜占廷—斯拉夫传统文化联系的核心地带。当拜占廷帝国强盛时期，他们更多依靠拜占廷人的保护，较多地接受巴尔干半岛的拜占廷影响，而当拜占廷人衰落、拉丁帝国控制巴尔干半岛时，他们自然与拉丁人保持更多联系。

1204—1261年间，流亡于尼西亚的拜占廷人主要通过教会对塞尔维亚人发挥影响。这一时期，塞尔维亚教区保持独立自治，并在教会内部实行拜占廷东正教传统制度。塞尔维亚王子萨瓦在传播拜占廷东正教影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去世后，其遗骨于1237年被迎接回国，埋葬在米雷塞瓦皇家修道院^①。这个修道院后来也是斯拉夫教会传统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他本人被尊崇为圣人，其弟子则在此写出大量诗歌和故事颂扬他的功德，这些文学作品对斯拉夫文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使塞尔维亚人始终没有脱离东正教的影响。与同一时期的保加利亚人比较，塞尔维亚人在接受拜占廷式的宫廷生活方面要逊色许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君主和贵族保持流动生活的习惯，常年在各地修道院或城堡间巡游，因而没有仿照拜占廷首都建设类似于君士坦丁堡式的政治中心城市。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贵族

^① Harold W. V. Temperley, *History of Serbia*, p. 362.

代表大会的场所,表明其国家权力中还保留诸多部落社会的残余制度。直到14世纪,塞尔维亚人国家中央集权才有长足发展,出现了正式的中央政府机构,由国王任命高级官吏和教士,并举行沙皇加冕、法律公布等重大活动的仪式,这些都更加接近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习惯^①。斯蒂芬·杜珊统治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发展最为完善,拜占廷皇帝制度成为他效仿的唯一榜样。

虽然塞尔维亚人深受拜占廷政治、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是,他们在造型艺术领域接受了不少拉丁人的影响。同样,由于这一时期巴尔干半岛局势的剧烈变动和塞尔维亚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他们在经济领域与拉丁人的联系也比较密切。13世纪下半叶,来自匈牙利的“萨克森矿工”在开发塞尔维亚地区银矿、铜矿、铅矿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正是在这个时期,这些有色金属矿藏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开始被发掘利用,并有力地推动了塞尔维亚人经济的发展。在塞尔维亚北部山区和科索沃东部地区,围绕着这些矿藏,兴起了一批城市,它们后来都成为塞尔维亚人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而在这些城市中实行的管理制度是拜占廷人所不了解的,一些学者推测,这些制度显然是来自“萨克森矿工”^②。

农业和手工业也在矿业发展的带动下获得进步,进而促进了内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大多不是与拜占廷人进行的,因为后者传统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用于社会上层的奢侈品,在这一阶段数量减少且质量下降。尤其是拜占廷人重新控制君士坦丁堡后,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东方贸易优势,意大利各个航海城市共和国已经取代了其东地中海霸主地位。塞尔维亚人的矿业产品大多通过亚得里亚海出口到西欧,这使得沿海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1186—1371年期间,科托尔

^① Harold W. V. Temperley, *History of Serbia*, pp. 363—366.

^② Angeliki E. Laiou,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2, vol. I, pp. 115—120.

因此成为塞尔维亚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政府在此设立了关税站和专门的官员及机构,每年的收入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这一地区的另一个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也因此兴盛起来,它自拉丁帝国时代直到14世纪中期,一直被威尼斯人控制,因此当地拉丁因素和斯拉夫因素联合发挥作用,成为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重要的进口商品集散地^①。拉古萨地区居民也因此成为塞尔维亚国家矿业和对外贸易最主要的骨干力量。这些城市和地区从此在连接巴尔干半岛与西欧世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商人和手工业者频繁往来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不仅促进了两地的经济繁荣,也在长期存在的拜占廷—斯拉夫传统中加入了诸多拉丁因素。

塞尔维亚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巴尔干半岛与西欧在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上联系最多的巴尔干斯拉夫国家,西欧文化,主要是艺术的影响最为突出。不仅如此,拉丁教会在塞尔维亚领土上也建立了诸多主教区,它们与13世纪中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东正教大主教区同时并存比肩而立。前者在宗教事务中接受罗马教廷的管理,并按照天主教的定制行事,而后者继续忠实于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正教大教长,实行希腊教会礼仪。尽管塞尔维亚国家教会大多属于东正教会,但是在沿海地区还存在3个拉丁教区,即巴尔教区、科托尔教区和特雷比涅教区。巴尔教区与罗马教廷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管辖若干小教区。科托尔教区则附属于意大利东部海岸的巴里教区,它管辖塞尔维亚内陆地区所有拉丁小教区,众多的矿业地区包括在其中。特雷比涅教区服从于塞尔维亚境外的拉古萨大主教区。这些教区分布在今天南斯拉夫黑山共和国沿海地区。这一地区还有许多来自西欧的本笃

^① Angeliki E. Laiou,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vol. II, pp. 771—806.

会修道院^①。在塞尔维亚君主的控制下,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同时存在,相安无事。大部分民众追随希腊教会,小部分归属拉丁教会。奥伯林斯基统计,1168—1371年间,塞尔维亚国家先后有10位君主,其中接受拉丁教士洗礼者1人,接受教皇特使加冕者1人,因娶法国妻子而深受教皇影响者1人,退位后皈依天主教者1人,口头表示接受教皇宗主权但尚未接受拉丁教会洗礼者3人^②,可见罗马教会的影响相当大。

塞尔维亚教会的“双重性”说明两个问题。其一,1054年基督教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分裂并非像今天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产生了范围广泛的强烈影响,至少在当时,基督教信徒普遍忽视这次分裂的实际意义。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甚至相当多的欧洲人,只是把这个事件当作东、西教会长期争夺基督教世界领导权斗争中的一次较量。因此,这次“分裂”并不影响信仰的归属,而是涉及权力的分割。巴尔干半岛地区大多数民众,包括其君主,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随意性和投机性。其二,宗教信仰及宗教事务在各个地区的状况完全取决于世俗权力的政策。在塞尔维亚国家,由于君主的宗教灵活政策,决定了天主教能够与东正教同时存在。而在拜占廷国家,由于朝廷控制能力的降低,即便同为基督教的不同教派也难以共存,甚至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为了在混乱的巴尔干半岛局势中获得更多利益,控制更广大的领土,塞尔维亚人利用拉丁人、保加利亚人衰弱的机会,向东南扩张,进入马其顿平原,直抵爱琴海沿岸。塞尔维亚人一度与保加利亚结成反拜占廷人同盟,而后与西西里王国结盟,但是,该同盟被拜占廷皇帝米哈

① 本笃会是天主教隐修院修会,由意大利人本尼迪克(Benedictus, 480—550年)建立于529年。该隐修院开西欧修道院之先河,影响广泛。其会规严格,强调自身修养,一般有独立经济,以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并重视文化活动。

② 他也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接受天主教洗礼和承认教皇宗主权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即“政治机会主义”,例如斯蒂芬一世是迫于第四次十字军胜利而接受天主教,斯蒂芬·杜珊承认教皇最高权威是为换取对方任命他为反土耳其人的“全基督教世界首领”。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50.

伊尔八世瓦解,塞尔维亚人不得不将其占领的斯科普杰等领土归还拜占廷人。此后,塞尔维亚发现银矿,国家财政迅速好转,在奈曼加的长孙米鲁廷(Stephen Uros II Milutin, 1282—1321年在位)国王统治时期,其军队向东南攻占马其顿大部分地区。这里原来就是塞尔维亚人和拜占廷人混合居住、权力犬牙交错、边境变动不定的地区。为了与塞尔维亚人结盟,拜占廷人采取和亲政策,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女儿玛利亚就嫁给塞尔维亚国王米鲁廷·斯蒂芬二世为妻^①。1330年,米鲁廷之子国王斯蒂芬三世(Stefan Uros Decanski, 1321—1331年)统治时期,塞尔维亚将军科拉尔击溃拜占廷—保加利亚联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将两国交界地带继续向东南推进,抵达萨尔山脉一线。

1331年,新国王斯蒂芬·杜珊(Stefan Uros Dusan, 1331—1355年)即位,塞尔维亚军队跨越萨尔山脉,进一步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包括德巴尔、维莱斯和什蒂普等城市在内的马其顿北部大部分地区,相当于今天马其顿共和国中部瓦尔达尔河上游、特雷斯卡河流域和雷加尔尼察河流域一线,并在此将斯科普杰发展为新的中心,从而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半壁河山。斯蒂芬·杜珊建立了拜占廷—塞尔维亚帝国,自称“希腊和塞尔维亚人皇帝”^②。这一军事占领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打破了巴尔干半岛力量平衡的局面,改变了半岛东部主宰西部的传统,使塞尔维亚这一半岛西部新兴力量成为控制半岛格局的关键力量。特别是,作为半岛西部国家,塞尔维亚人也从此改变了东西兼顾、两面平衡的外交传统,而以绝大部分精力投入整个巴尔干半岛事务。换言之,他们从此开始特别注重向东南发展,即重视对拜占廷国家的关系。事实上,这次军事占领使塞尔维亚人打开了通往爱琴海和半岛东部地区的道路,并可以借助瓦尔达尔河轻易到达爱琴海北部最重要的港口塞萨洛尼基。正是上述转变使塞尔维亚人将首都南迁至斯科普杰,这个具有重要战

① Harold W. V. Temperley, *History of Serbia*, pp. 366—370.

② George Christos Soulis, *The Serbs and Byzantium, during the reign of Tsar Stephen Dusan (1331—1355) and his Successors*, Athens: Ekaoseis Banias 1995, pp. 289—303.

略意义的古代要塞城市因此又增加了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重要性。当拜占廷国家逐渐丧失了海上强国地位后,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的重要性迅速降低,而塞尔维亚人在斯科普杰的发展,使这个半岛“地理上的中心”城市凸显出其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它不仅控制了传统的摩拉瓦—瓦尔达尔河传统商道,而且控制了从半岛东部色雷斯、保加利亚平原和丘陵地区通往西部山区和亚得里亚海岸的交通。塞尔维亚人经济上的发展既来自山区的矿业,也来自对不同地区进行的贸易商业。物质基础的扩大直接增强了塞尔维亚国家的实力,使之可以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希腊和塞尔维亚人帝国”。这个帝国不断扩张的重要结果是将更多的半岛资源纳入塞尔维亚人控制系统中,从而导致了这一巴尔干半岛新帝国发展的良性循环。塞尔维亚人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迅速发展,从巴尔干半岛历史长远发展角度看,填补了拜占廷人衰落后半岛“群雄无首”的空白,其形成的半岛政治格局一直保留到今天。

巴尔干半岛政治主角的转换并没有改变其宗教文化传统。就半岛地区宗教文化传统而言,东部强于西部,北部逊于南部。继承了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拜占廷文化和继承原始基督教传统的拜占廷东正教会,在中古时期的半岛地区一直是精神文明的主流。在拜占廷宗教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斯拉夫文化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13世纪已经成为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文明主体,其主导地位几乎已经不可动摇。正是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塞尔维亚人在政治和军事上崛起,其宗教文化的发展仍然继续拜占廷—斯拉夫传统。当时,塞尔维亚人在宗教上已经接受了斯拉夫古代教会传统,它是由拜占廷人、摩拉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通过多种渠道传入塞尔维亚人社会,并深深植根于社会基层和普通民众中。在塞尔维亚国家扩张和建立帝国过程中,拜占廷人的政治制度也被全面仿效,国家机构模式被全盘移植。特别是在塞尔维亚贵族和君主的宫廷生活方式上,这种“全盘拜占廷化”表现得最明显。有两份史料能够证明塞尔维亚人在此期间发生的明显变化。1266年,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为了与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Stephen Uros I)建立

和亲关系,即拜占廷皇帝的女儿和斯蒂芬之子米鲁廷之间的婚约,派遣使团前往塞尔维亚宫廷。这次外交努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他们留下了关于当时塞尔维亚人的报告。其中谈到,王公生活“简朴粗陋”,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甚至国王的儿媳穿着也是衣衫褴褛,肮脏发臭,忙于纺线编织。而塞尔维亚贵族君主对他们的到来也没有好感,完全看不惯拜占廷人个个衣冠华丽,奢侈铺张,特别是那些伺候女眷的宦官阉人更令他们感到恶心和不解^①。时隔30年后,以拜占廷著名政客塞奥多利·麦托西迪斯(Theodore Metochites)为团长的又一个使团却带回了关于塞尔维亚人的完全不同的报告。他们是作为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特使,专程办理皇帝的女儿玛利亚1299年嫁给塞尔维亚王子米鲁廷·斯蒂芬二世为妻事宜。为了隆重操办这次婚礼,拜占廷朝廷承认塞尔维亚人对马其顿地区的占领,把它作为“嫁妆”送给塞尔维亚国王。塞奥多利·麦托西迪斯在报告中描写了塞尔维亚人的宫廷状况:米鲁廷国王身穿像拜占廷人一样华丽的皇袍,上面装饰着珍珠宝石,宫廷里铺满贵重的地毯,到处是金银器皿,国王举行的盛大仪式之奢侈豪华程度绝不在拜占廷宫廷之下^②。也就是说,仅仅经过一代人时间,塞尔维亚人就完成了保加利亚人经过4代人完成的“文明化”。

同一时期的塞尔维亚人文献也显示出,其国王被宫廷诗人颂扬比喻为拜占廷历史上著名的皇帝,而其大主教则被比喻为东正教的首席教长。这个时期的塞尔维亚作家几乎都接受了拜占廷作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连写作风格也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塞尔维亚国家制度中,大量采用了拜占廷人的司法、官府机构、官职、税收等已有定制,甚至许多官职的称呼也直接采用希腊语的名称,另一些将希腊语名称翻译为斯拉夫语。1300年以后,塞尔维亚国家的所有制度均沿用拜占廷国家的制度,并按照拜占廷帝国的贵族头衔和等级加封塞尔维亚

^① George Pachymeres, *De Michaele et Andronico Palaeologo*, ed. I. Bekker, Bonnæ: Impensis Ed. Weberi 1835, v, I, pp. 350—352.

^② K. N. Sathas, *Μεσαιωνική*, Venice 1872, I, p. 173.

贵族。拜占廷社会土地制度也逐渐在塞尔维亚国家推行开来^①。曾在拜占廷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军区制瓦解后,拜占廷小农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类似西欧农奴制度的土地占有形式。根据学者分析,拜占廷国家在12世纪初以后出现的大土地占有制和“普罗尼亚”农民土地经营方式,于13世纪分别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泛流行,有关的证据反映在米鲁廷国王于同一世纪末颁布的法令中,这一法令授予斯科普杰附近修道院免税权,其中提到了普罗尼亚农民的经营方式。在斯蒂芬·杜珊统治的14世纪上半叶,这种土地占有和经营方式在更大范围广泛实行。行政、教会和军事官僚贵族占有大片土地山林,建立大庄园,土地的占有者对国家负有提供军役义务,但享有免除税收的特权。教会通过捐赠得到的土地不承担任何国家义务。而大土地所有者在其拥有的土地上实行自治管理,最初,他们只能终生占有土地,后来其土地可以世袭传之后人。大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租赁给普罗尼亚农民,他们控制后者的全部生产活动,收取大部分产品。根据学者研究,塞尔维亚的普罗尼亚农民与拜占廷普罗尼亚农民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前者不像后者一样交纳货币地租,而是提供劳役地租,此外,修道院控制的普罗尼亚农民数量也超过后者^②。

斯蒂芬·杜珊统治期间,拜占廷国家实力衰落,因此为塞尔维亚人的军事扩张提供了良机。斯蒂芬·杜珊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征服拜占廷人,夺取巴尔干半岛主宰权。面对塞尔维亚国家强权的迅速发展,拜占廷人毫无作为,只能向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求援,而保加利亚人已经衰落,土耳其人则尚未强大到与塞尔维亚人对抗。客观而言,拜占廷人虽然已经衰落,但是仍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实力还没有完全衰

^① Jadran Ferluga, *Byzantium on the Balkans*, Adlf M. Hakkert Publisher, Amsterdam 1976, pp. 341—365.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53. 作者认为,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塞尔维亚货币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于拜占廷国家,而后的权力也更为集中。

弱到难与塞尔维亚人抗衡的地步。只是,拜占廷国家上层贵族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了长期的内战,而内战各方分别投靠外部强权。斯蒂芬·杜珊正是乘此良机,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占领了除塞萨洛尼基之外的整个马其顿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和塞萨利地区,控制范围抵达希腊中部。杜珊凭借连续的军事胜利,将马其顿尽行囊括在塞尔维亚的版图中,这个胜利意义重大,因为该地区对拜占廷国家保持其在巴尔干半岛的主导地位具有决定作用,丧失了该地区就意味着彻底丧失了半岛的霸主地位。此时,斯蒂芬·杜珊决心建立塞尔维亚——拜占廷帝国,1346年4月,他让前此一年任命的大主教为自己加冕为“塞尔维亚和罗马人沙皇”,这清楚表明其吞并拜占廷国家的野心^①。在此之前,他于1345年11月曾仿照拜占廷皇帝,向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山各修道院发布命令,要求他们承认其对教会事务的至高权力,这一要求被接受,但是附加了一个条件,即在沙皇的名字前必须按照习惯加上拜占廷皇帝的名字。而后,塞尔维亚人进一步大肆扩张,又向东控制了色雷斯部分地区。拜占廷皇帝约翰六世无力抵抗入侵,1348年两度遣使谈判,遭到拒绝,故寻求土耳其的援助。1348年,拜占廷和土耳其两国订立同盟,共同反对塞尔维亚人。根据协议,土耳其派遣万余军队协助拜占廷人作战。1349年,在土耳其军队的帮助下,拜占廷人发动全面反攻,连续击败塞尔维亚军队,夺回维洛伊亚、斯科普杰等马其顿重镇。1350年,斯蒂芬被迫向拜占廷军队投降,双方订立和约,拜占廷人收复了色雷斯、马其顿和塞萨利的大部分地区^②。这一同盟虽然暂时缓解了拜占廷的北方边境危机,但是,却因为使用了大批有组织的土耳其军队而使拜占廷人陷入更大的威胁中。无论拜占廷人或塞尔维亚人没有

^① 这次加冕和沙皇对大主教的任命成为几年后东正教大教长卡里斯图斯(Callistus)开除杜珊和塞尔维亚人大主教教籍的主要依据。Slobodan Curcic, "The Role of Late Byzantine Thessalonike i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57, Symposium on Late Byzantine Thessalonike (2003), pp. 65—84.

^②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438—441页。

预料到,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此后在巴尔干半岛扩张势力,他们都在这个强大敌人的军事打击下沦为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

斯蒂芬·杜珊在其一度占领的拜占廷人土地上沿用原有的制度。1345年,他颁布的一项法令甚至使用希腊语。1349年,塞尔维亚帝国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解决行政管理问题,他根据各地官员反映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颁布了塞尔维亚人法典“扎科尼克”,该法典以拜占廷司法体系为主体,结合塞尔维亚习惯法,适用于全国。法典涉及国家机构的内容,几乎全部照搬拜占廷人的管理系统,不仅沙皇本人的一切与拜占廷皇帝相当,而且拜占廷贵族头衔、官职名都被引进塞尔维亚行政体系,他还封授其亲属为恺撒、专制君主等称号。拜占廷作家记载道,斯蒂芬·杜珊“宣布自己为罗马人皇帝后,逐渐改变野蛮人的生活方式为罗马人的方式”,他让自己的儿子“按照塞尔维亚人的习惯”统治斯科普杰以北和瓦尔达河流域地区,他自己则控制所有被征服的拜占廷人地区,并完全“按照罗马人(指拜占廷人)的习惯”进行统治^①。当然,此时其子年纪尚小,整个塞尔维亚国家的权力实际上还控制在杜珊手中。他在原拜占廷人土地上继续沿袭拜占廷人的制度,不仅反映其维护当地传统以稳定局势的策略,而且也反映出他逐渐推行全盘拜占廷化的倾向,以便为其取代拜占廷皇帝并真正控制巴尔干半岛做好准备。但是,斯蒂芬·杜珊于1355年的去世使塞尔维亚人的“伟大理想”再度受挫。塞尔维亚国家此后迅速瓦解,各地贵族纷纷独立,形成了众多的小国。这就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名义上仍然控制在拜占廷人手中,但是,实质上是各个弱小民族之间的征战,这就为土耳其人发展强大势力创造了机会。塞尔维亚人陷入与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廷人的战争,1330年,他们与拜占廷人和保加利亚人联军厮杀,夏季两军在维尔布兹德(或称库斯坦迪尔)爆发决战,全歼保加利亚军队,拜占廷人则在关键时刻撤出战斗。

^①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Bonnae: Impensis Ed. Weberi 1829—1855, xv, I, vol. ii, p. 747.

保加利亚沙皇米哈伊尔·西斯曼在战斗中受伤,胜利的塞尔维亚国王扶植其妹妹安娜及其子为保加利亚沙皇^①。这场战役最终将保加利亚人排挤出巴尔干国家争霸战,同时使塞尔维亚人奠定了称雄欧洲东南地区的基础。此后,这个巴尔干半岛的新霸主不仅左右拜占廷宫廷政治,而且夺城占地,挺进色雷斯、爱琴海北部岛屿、塞萨洛尼基和伯罗奔尼撒。1355年杜珊去世导致塞尔维亚帝国彻底解体,巴尔干半岛新霸主很快再度易位。作为未来巴尔干半岛新主宰的土耳其人顺利进军整个半岛,不论塞尔维亚人还是拜占廷人都无法阻止其扩张。

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后,遭遇到的真正强大对手是塞尔维亚人。斯蒂芬·杜珊统治时期的塞尔维亚国家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由于拜占廷人忙于内战和保加利亚人彻底衰败,其实际控制的领土范围包括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杜珊企图取代拜占廷国家,建立强大帝国的计划几乎获得成功。但是,他于1355年去世,使塞尔维亚人的“伟大理想”在接近实现的最后关头受挫^②。塞尔维亚国家此后迅速瓦解,各地贵族纷纷独立,形成了众多的小国。这就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继承斯蒂芬·杜珊沙皇权位的是其子斯蒂芬·乌罗斯(Stephan Uros V, 1355—1371年在位),后者在斯蒂芬·杜珊去世同年12月即位。但是,与其野心勃勃善弄权谋的父亲相比,斯蒂芬五世算得上是个“弱智”,他性格温柔,心地善良,完全没有能力控制朝中老臣和地方贵族。1346年4月他在其父加冕为“塞尔维亚和罗马人沙皇”的同时,被加冕为共治“小王”,并受命“按照塞尔维亚人的习惯”统治斯科普杰以北和

① John Cantacuzenus, *The History*, trans by Robert H. Tron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79, I, 402.

② 一些学者分析个中原因时指出,塞尔维亚人强于陆军而弱于水军,这是他们无法取代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霸主地位的主要因素,正如在他以前的多位斯拉夫铁腕领袖败于此一样。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56.

瓦尔达河流域地区,而实际权力则控制在其父亲手中^①。其父死后,他被国内蜂拥而起的分裂势力搞得焦头烂额,更无力处理复杂的宫廷斗争,于是任命大权在握的前朝重臣乌卡辛(Vukasin)为共治君主。各地贵族凭借军事实力在各自控制区域称霸一方,只承认他的名义上的宗主权。在原来统一的塞尔维亚王国领土上出现了扎赫鲁米亚、扎塔、塞尔里斯等独立小国。

斯蒂芬五世刚刚即位,他的叔叔西蒙·乌罗斯(Symeon Uros)就发动政变。西蒙虽然为塞尔维亚人亲王,但是因前辈人与拜占廷人结亲而具有拜占廷皇室血统关系,与拜占廷军事贵族杜卡斯家族和皇族帕列奥列格家族沾亲带故。其特殊身份使得斯蒂芬·杜珊沙皇也对他另眼看待,于1348年任命他的这位表兄弟为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并将其征服的伊庇鲁斯地区封授给他。1352年他与拜占廷人在伊庇鲁斯的藩属君主尼基弗鲁斯的妹妹托马伊(Thomais)结婚。当拜占廷人乘斯蒂芬·杜珊沙皇去世之机入侵塞尔维亚人在伊庇鲁斯的领土时,西蒙·乌罗斯被迫将首府从特里卡拉向北迁往卡斯托利亚。1356年,他欺斯蒂芬五世年少无能发动军事政变,在部下的拥戴下,自立为“罗马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沙皇”,领兵进犯塞尔维亚北部,企图夺取首都,推翻斯蒂芬五世,但是遭到其他贵族的反对。1357年,塞尔维亚贵族会议一致谴责西蒙的反叛,支持斯蒂芬五世,并联合抵抗西蒙的军事入侵。后者在连续吃了多次败仗后,转而向南扩张,借口继承拜占廷伊庇鲁斯藩属君主尼基弗鲁斯去世(1358年)后的遗产,夺取了整个伊庇鲁斯和塞萨利地区,建立独立国家。其统治直到1369年他去世为止。

扎赫鲁米亚国家位于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和内雷特瓦河流域的广大沿海地区,因其位于迪纳拉山脉和戈利亚山脉之间而得名,在塞尔维亚语中“扎赫鲁米亚”意为两山之间^②。该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民族构成,一直游离在各个巴尔干半岛强国之间,长期以来分别与

①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xv, I, vol. ii, p. 747.

②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33, 12.

拜占廷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结盟,或被他们统治。斯蒂芬·杜珊沙皇扩张期间,该地区被并入塞尔维亚人国家。杜珊一死,该地区立即宣布独立,脱离斯蒂芬五世的统治。

扎塔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同扎赫鲁米亚国家。这个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名称来自中心地区流淌的河流。11世纪中期,该地区以地方部落酋长沃伊斯拉夫(Voislav Diokletianos)为领袖,活动范围包括达尔马提亚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沿海岛屿。12世纪期间,扎塔国家在与拉斯卡(Raska)争夺塞尔维亚最高控制权的斗争中发展成为独立公国,后被并入塞尔维亚国家。斯蒂芬·杜珊沙皇扩张期间,该地区作为塞尔维亚人的根据地交给“小王”统治,并根据当地塞族人为主的实际情况采取与拜占廷被征服地区不同的制度。但是,1355年杜珊死后,该地区立即宣布独立,巴尔什奇(Balsici)三兄弟控制当地政权。他们一方面与附近同样宣布独立的扎赫鲁米亚国家结盟,另一方面利用塞尔维亚人忙于对抗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的机会,扩大领土范围。1371年,乔治·巴尔什奇(George Balsic)的统治范围从杜布罗夫尼克直到普里兹伦。扎塔国家虽然在后来反抗土耳其征服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最终屈服^①。

塞尔里斯或译为塞雷,是斯特利蒙河下游重要城市,在拜占廷历史和巴尔干半岛经济史上一直发挥重要作用。449年,该城主教即出席了基督教大公会议。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它在拜占廷和保加利亚战争中成为关键地点,战事多有发生。12世纪以后,它再度成为交战各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城市主权几度易手。1345年9月25日,斯蒂芬·杜珊占领该城,并将大本营迁到此地。10年后斯蒂芬·杜珊一死,其遗孀海伦娜在旧部拥立下,宣布独立。这里的军民以希腊人为主,因此希腊语为官方语,并沿用拜占廷旧制,同时,还与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东

^① 14世纪期间,扎塔国家更名为蒙特内哥罗(Montenegro),1444年巴尔什奇家族统治结束,出现了克尔诺杰维奇(Crnjevići)王朝,并承认了威尼斯的保护权,不久在土耳其人的军事压力下成为后者的藩属国。

正教圣地保持密切关系。1371年,拜占廷人重新控制该城。

与扎赫鲁米亚、扎塔、塞尔里斯等独立小国大体同时出现的还有塞尔维亚贵族割据势力,其中实力比较强盛的有君士坦丁(Constantine Dragas)。他和其弟约翰控制塞尔维亚东南部的马其顿地区,这里是他们从其父德坚(Dejan)那里继承而来的,而后者在斯蒂芬·杜珊时代即受封为“专制君主”,他们的母亲塞奥多拉—尤多西亚(Theodora - Eudokia)是斯蒂芬·杜珊的妹妹。1355年后,他们兄弟俩实行独立统治,斯蒂芬五世几乎不能干预其辖区内的事务。为了对抗土耳其军事入侵,他们积极发展与拜占廷人和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关系。1379年,其弟去世后,君士坦丁独自统治领地。1386年,他与特拉布宗的拜占廷公主、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妹妹尤多西亚(Eudokia Komnene)结婚,并于六年后将其长女海伦娜(Helena)嫁给了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二世。但是,作为巴尔干半岛的弱小势力,他无法抵抗土耳其人的入侵,在马里卡战役失败后,就承认了土耳其人的宗主地位,他死后,其领地被土耳其人吞并。斯蒂芬五世的软弱也为北方强国匈牙利人提供了机会,后者从多瑙河以北地区侵入塞尔维亚北方地区,控制了从贝尔格莱德南下的传统商路。1371年爆发的马里卡河科诺门战役,奥斯曼土耳其人又获得完胜,迫使巴尔干各国纷纷降服,被迫承认苏丹的宗主权,向苏丹缴纳贡金,提供军事服役^①。1389年夏季爆发的科索沃战役,土耳其军队最终扑灭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反抗,确立了其巴尔干半岛的霸权。1396年9月25日进行的尼科堡战役标志土耳其军队彻底击败欧洲联军,塞尔维亚人如同巴尔干半岛其他民族一样,沦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国。

塞尔维亚人国家的分裂使巴尔干半岛失去了最后一个能与土耳其军队抗衡的力量。1393年,土耳其人占领保加利亚人首都。而塞尔维亚人也在这一时期的两次战争中失利,1389年,其领土被土耳其人吞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451页。

并。作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藩属国的塞尔维亚末代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George Brankovic, 1427—1456年)目睹其国家被土耳其人一点一点地蚕食吞并,他死后三年,塞尔维亚人在多瑙河流域的最后据点斯迈德雷沃被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攻克,这标志塞尔维亚国家的灭亡。

第二节 克罗地亚人

克罗地亚人(Croats)的来源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但是比较公认的看法认为他们属于早期斯拉夫人的一个部落,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高加索的匈奴人,在与斯拉夫人一同西迁的过程中,与斯拉夫人融合,并最终成为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的分支。

7世纪初,他们进入巴尔干半岛西北地区,并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社区,这里曾经是原罗马帝国的伊利里亚行省。他们曾一度活动在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白克罗地亚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加里西亚、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地区。克罗地亚人应拜占廷人的请求,南下进入巴尔干半岛西北部,从西北方打击阿瓦尔人,当时阿瓦尔人正在进攻巴尔干半岛中部。而后,在拜占廷皇帝的允许下,他们定居在这个地区,牢固地控制了德拉瓦河下游到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直到今天,克罗地亚人仍然居住在这里,算来已有近1400年历史。定居巴尔干半岛后,克罗地亚人如同塞尔维亚人一样,服从拜占廷中央政府的统治管理,并在相当长时间里,与塞尔维亚人一起牵制阿瓦尔人,成为稳定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地区的重要力量。君士坦丁七世曾记载:“克罗地亚人接受洗礼后便订立了条约,并以使徒圣彼得的名义,亲手发誓确认和保证,他们绝不踏上外国的土地,也不与其战争,而是与所有希望和平的人和睦相处”^①。根据同一段史料记载,克罗地亚人南迁不久,便接受了基督教的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I, 148.

信仰。由于当时拜占廷皇帝还掌握着对罗马教区的控制权,因此他指令罗马主教派遣传教士到克罗地亚人所在地区传教,为他们施洗礼。克罗地亚人在政治上也如同塞尔维亚人一样归属拜占廷皇帝,成为拜占廷帝国的臣民。这一说法值得怀疑,因为拜占廷人远离巴尔干西北地区,其间阻隔强大的保加利亚人,即使他们有控制该地区的愿望,也只能采取让克罗地亚人高度自治的方式,大体类似拜占廷—塞尔维亚的关系。

克罗地亚人占据的地区在多瑙河中游西部支流萨瓦河和德拉瓦河之间,西高东低,多为平原和丘陵。其早期社会发展比塞尔维亚人更成熟,可能与他们的早期定居地主要在萨瓦河两岸有关,因为便利的交通使他们能够更多接触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定居的克罗地亚人大体分为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人和潘诺尼亚克罗地亚人两大部分,统一组成部落联盟。

由于克罗地亚人所在的巴尔干西北部正是法兰克人东扩进入半岛的通道,因此,定居初期的克罗地亚人面临周围强权的争夺压力,其早期的历史也充满了与法兰克、保加利亚、拜占廷、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人复杂关系的斗争。尽管最初他们接受了拜占廷人的政治统治和传教活动,但是,随着加洛林帝国皇帝查理曼大军控制了多瑙河中游地区,潘诺尼亚克罗地亚人首先被迫屈服,在8世纪末巴尔干半岛内乱动荡期间,他们接受了查理曼大帝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法兰克人的势力主宰了萨瓦河以北地区,直到多瑙河流域。803年,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人也慑于查理曼大帝的军事进攻而臣服。812年,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一世对巴尔干半岛北部用兵,为阻止法兰克人支持保加利亚人,他与法兰克人订立阿森协定,将克罗地亚人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城市和岛屿割让给法兰克人^①。

然而,克罗地亚人不能长期忍受法兰克人的统治,他们发动大规模

^① Roger Collins, *Charlemagne*, London: Macmillan 1998, pp. 124—130.

起义,并得到了拜占廷人的支持。正是拜占廷外交间谍的暗中活动,潘诺尼亚克罗地亚人君主留德维特(Ljudevit)于819年领导人民起义,争取摆脱法兰克人的政治控制。起义坚持多年最终于822年失败后,留德维特流亡塞尔维亚,法兰克人重新控制了潘诺尼亚克罗地亚人。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人随后也在其君主米斯拉夫(Mislav,835—845年在位)领导下发动反抗法兰克人的起义,由于得到拜占廷人的支持,他将首都迁移到拜占廷边境附近的克利斯,该城以南14公里有拜占廷人重兵把守的亚得里亚海重要海港城市斯普利特^①。瓦西里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廷人对克罗地亚人的影响持续增强。878年拜占廷人支持的克罗地亚人君主兹德斯拉夫(Zdeslav)夺取政权,并立即宣布承认拜占廷帝国为宗主国,接受拜占廷皇帝的政治权力和君士坦丁堡教区大教长的管辖。这似乎是对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西北地区权力的认可,意味着拜占廷帝国恢复了过去直到萨瓦河一线的边界。但是,兹德斯拉夫的行动缺少民族基础,在国内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反对派贵族乘机叛乱,他们在罗马教士的支持下,由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20年前建立的尼恩教区主教领导下,于879年发动起义,推翻并刺杀了兹德斯拉夫^②。新君主布拉尼米尔(Branimir)全面取消兹德斯拉夫的亲拜占廷政策,转而接受教廷的宗教管辖。从此,克罗地亚人摆脱了拜占廷人的影响,直到1102年被强大的匈牙利人并吞。拜占廷人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权力只限于沿海的个别城市和岛屿,这些城市和岛屿也在12世纪末脱离了拜占廷帝国。可以说,879年克罗地亚人的政变是此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克罗地亚从此成为巴尔干半岛上唯一倒向西欧的斯拉夫人国家。

克罗地亚作为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国家,在塞尔维亚人崛起的过程中,成为这个半岛新霸主的臣属民族。14世纪中期后,土耳其人开始逐

① Oona Ball, *Dalmatia*, London: Faber 1932, pp. 198—204.

② Stanko Gulděscu, *History of Medieval Croatia*, The Hague: Mouton 1964, pp. 2—5.
Muriel Currey, *Dalmat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30, pp. 134—140.

步控制巴尔干半岛,克罗地亚又臣服于这个新主人,并参与了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统治。

第三节 罗马尼亚人

尽管“罗马尼亚人”的提法首次见于9世纪的拜占廷作品,但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可能是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最古老的民族达吉亚人,他们作为当地土著人早在罗马征服以前就生活在该地区。根据历史、考古和语言学证据,达吉亚人是独立发展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土著居民。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代的奴隶市场上,就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此后在罗马的喜剧中也提到过达吉亚奴隶^①。尽管他们讲色雷斯方言,但是也深受古代斯基泰人的宗教影响,不仅相信灵魂不灭,而且崇拜斯基泰神扎尔莫西斯(Zalmoxis)。他们是巴尔干半岛色雷斯平原上最早的谷物种植民族,并且从很早就熟悉山区采矿,与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进行金、银、铁矿的贸易往来。罗马史记载,公元前112年、109年、75年,他们与其他土著居民联合反抗罗马军队的人侵,正是在反抗罗马人征服斗争过程中,公元前60—50年形成了达吉亚王国,国王布利比斯塔(Burebista)统治时期,该王国最强盛。公元前44年,朱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计划发动征伐达吉亚王国的远征,但因他被刺身亡而流产。大约同一时期,国王布利比斯塔也死于非命。达吉亚王国此后一分为四,其中达吉亚人继续反抗罗马的斗争。罗马行省统治期间,达吉亚人多次发动起义,罗马帝国皇帝多米提安(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曾亲自率领罗马大军进行镇压。公元85年,达吉亚人起义军杀死该地行省总督萨比努斯(Oppous Sabinus),迫使罗马人再度派军队镇压,多米提安虽然控制了局势,但是顽强的达吉亚人于87年全歼多米

^① Vasile Parvan, *Dacia, an Outline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of the Carpatho-Danubian Countries*, trans by I. L. Evans and M. P. Charleswor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 34—55.

提安部将科乃里乌斯·弗斯库斯(Cornelius Fuscus)所部罗马军队,弗斯库斯阵亡。次年,罗马皇帝多米提安为转移到帝国西部战场而与达吉亚人订立了有利于后者的和约,罗马人向他们提供津贴和工程贷款。101年,图拉真率领罗马大军进剿达吉亚,将该行省首府萨米泽吉图萨变为罗马驻军大营。105年战端再启,次年,达吉亚全境被罗马军队征服,大部分达吉亚人被迫迁移到北部山区,大部分金属矿被罗马人占领。此后,图拉真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和矿藏,凯旋罗马。为便于对达吉亚用兵,罗马人修建了通往该地的军事大道,萨米泽吉图萨和提塞尔纳等城市成为罗马人的殖民据点,由两个罗马军团驻守。此后,达吉亚地区被罗马人分为两个行省,不久,再分为三个行省,直到奥列良皇帝(Marcus Aurelius)统治的168年,才将整个达吉亚变为一个军区^①。在罗马帝国统治期间,罗马文化和宗教传统对达吉亚人产生了影响。

中古时代,达吉亚地区成为中亚游牧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入侵巴尔干半岛的主要通道。日耳曼人中的哥特人、吉庇德人、斯拉夫人、阿瓦尔人、保加人、哈扎尔人、马扎尔人、罗斯人、库曼人、潘臣涅格人等先后从达吉亚地区侵入多瑙河流域。其中,保加利亚人长期定居多瑙河下游地区,达吉亚人被迫定居在喀尔巴阡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山区。而9世纪,马扎尔人的入侵将古代的达吉亚人大批挤压进北方山区。正是在这个近千年的漫长时期,散布在喀尔巴阡山脉东部和南部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山区的达吉亚人和乌拉赫斯人(the Vlachs)发展成为现代罗马尼亚人。具体而言,多瑙河以北的达吉亚人被人侵入者挤压进喀尔巴阡山,而从色雷斯平原北移到特兰西瓦尼亚山区的达吉亚人后来发展成为乌拉赫斯人,他们共同组成了多瑙河以北的现代罗马尼亚人^②。

^① Thos. Hodgkin, "The Roman Province of Dacia",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5 (Jan., 1887), pp. 100—103.

^② A. J. B. Wace and M. S. Thompson, *The Nomads of the Balkans, an account of life and customs among the Vlachs of Northern Pindu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New York: Biblio & Tannen, 1972, pp. 124—129.

分布在这个广大山区的居民逐渐形成了摩尔达维亚和瓦兰几亚两个政治实体。可见,喀尔巴阡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山区是古代达吉亚人的避难地,也是现代罗马尼亚人的摇篮。11世纪时,这个地区被匈牙利人征服,1241年又遭到蒙古大军的蹂躏。13世纪末,乌拉赫斯人主要分两部分活动在摩尔达维亚(今天的摩尔多瓦)和瓦兰几亚地区。这样,现代罗马尼亚人就吸收和融合了斯拉夫人、蒙古人、库曼人、潘臣涅格人等多民族的因素^①。

14世纪中期以后,土耳其军队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也逐渐扩展到多瑙河北岸,喀尔巴阡山和特兰西瓦尼亚山区也部分地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第四节 阿尔巴尼亚人

阿尔巴尼亚人最早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古代的伊利里亚时代,根据历史考古和语言学研究,阿尔巴尼亚人就是伊利里亚人的直接后裔。伊利里亚人最初活动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如同半岛北部的达吉亚人一样,他们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开发山区里小平原的活动。直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青铜器时代,他们以原始部落社会组织形式分散活动在自萨瓦河上游到伊庇鲁斯的广大山地。至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铁器时代,伊利里亚人的原始部落进入定居生活方式,其中一部分定居在山区小平原的部落以农耕为主,而占据高地和山坡地的部落以畜牧业为主。前者比后者更为开放,发展也相对迅速。

古希腊时代,伊利里亚人定居的地区也受到希腊殖民运动的影响,希腊人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建立了埃比达姆斯和阿波罗尼亚等城邦。这

^① 18、19世纪,这个地区又迁徙来新的民族,这样,现代罗马尼亚就增添了土瓦本人、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等新移民。罗马尼亚语属于罗曼语系,显然是罗马时代的遗产,而其中混杂的土耳其语、阿尔巴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德语因素显然是这些民族进入罗马尼亚地区的结果。

些城邦成为希腊人与伊利里亚人贸易的据点,也是往来于亚平宁和巴尔干两半岛的商品集散地。同时,在经济活动的促进下,文化交往更加频繁,伊利里亚人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也逐步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社会组织因此发生了变化。公元前5—2世纪期间,伊利里亚人的部落联盟逐渐演化为王国,出现了恩卡莱耶、陶兰特、埃庇洛特和阿迪安奈王朝^①。他们在反对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一世的斗争中,王权得到强化,但是,却遭到东扩的罗马军队的打击。公元前229年,德乌塔(Teuta)女王领导下的伊利里亚人被罗马人击败,到公元前168年,进一步被罗马人征服。

此后大约600年间,罗马人建立了伊利里亚行省。由于该省处于连系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特殊地理位置,罗马人一直注重对该地区的建设,因此伊利里亚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迅速。意大利地区成熟的农业直接带动当地农业发展,手工业、矿业和贸易水平都得到大幅度提高。语言、文化的融合也十分明显。

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伊利里亚地区开始从古代罗马的行省转变为拜占廷帝国的省区,但是,具有独立传统的伊利里亚人借助山区的屏障作用,长期抵抗拜占廷帝国的统治。作为巴尔干半岛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伊利里亚人也逐渐融入帝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内,成为拜占廷帝国多民族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些伊利里亚人作为拜占廷社会的主体民族成员,进入拜占廷帝国上层政治生活,一些人成为贵族和商人,个别从军的将领甚至爬上了皇帝的高位,例如5、6世纪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查士丁尼一世^②。5世纪中期斯拉夫人大举入侵巴尔干半岛以前,伊利里亚地区先后遭到西哥特人、匈奴人和东哥特

^① Ramadan Marnullaku, *Albania and the Albanians*, trans by Margot and Bosko Milosavljevic, London: Hurst 1975, pp. 5—24.

^② Robert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N. Y.: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pp. 2—5. J. A. S. Evans, "Justinian and the Historian Procopius",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17, No. 2 (Oct., 1970), pp. 218—223.

人的侵扰。6—8世纪,斯拉夫人入主巴尔干半岛,将伊利里亚人驱散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山区里,从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直到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马其顿的广大贫困的山地都是他们躲避战乱的避难所。伊利里亚南部直到马其顿地区的伊利里亚人保持了更多古代的传统。正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现代阿尔巴尼亚人逐渐形成。这个原本只是用来指称一个“阿尔巴尼”部落的名字到11世纪就逐渐扩大为一个民族的名称^①。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地域、相同语言、文化传统和祖先,以及宗教信仰的群体。阿尔巴尼亚人最早从罗马教会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其教区也归属罗马教区,但是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为了惩罚对其毁坏圣像政策持反对态度的罗马主教和伊利里亚主教,将该教区的管辖权收归君士坦丁堡教区,由支持毁坏圣像政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加以控制。1054年基督教东、西教会分裂后,阿尔巴尼亚教会也分为南北两个教会,分属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区。拜占廷军区制在阿尔巴尼亚推行的结果是在发展小农经济的同时,使地方军事贵族势力坐大,托比亚斯、巴尔萨斯、什帕塔斯、穆扎卡斯等一批军事家族兴起并控制了该地区。他们之间的争斗削弱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实力,因此在拜占廷帝国衰落的同时,阿尔巴尼亚人分别遭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诺曼和威尼斯的奴役,特别是在14世纪被塞尔维亚人所统治。

阿尔巴尼亚人在抵抗土耳其征服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这个巴尔干半岛小民族闻名于世。1388年,土耳其军队第一次入侵阿尔巴尼亚,随即建立了军事统治权。当时,派驻阿尔巴尼亚科鲁亚城的军事长官是斯坎德培(Skanderbeg),此人为阿尔巴尼亚贵族出身,因不甘心忍受民族屈辱,于1443年发动民族起义。正像拜占廷人精心培养的西蒙后来成为保加利亚人反对拜占廷人的杰出领袖一样,斯坎德培曾在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宫廷军事学校接受长期培养,并以优异成绩

^① Joseph S. Roucek, "Albania as a N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32, A Challenge to Peacemakers (Mar., 1944), pp. 107—109.

学成回国。他利用土耳其人企图将其培养成为忠实于苏丹的战将的打算,不仅培养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暗中培植了本民族的反抗力量。1442年底,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遭到匈牙利人的沉重打击,斯坎德培趁机带领数百骑兵于次年发动反土耳其统治的人民起义^①。凭借其突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组织才能,斯坎德培迅速集中了阿尔巴尼亚民族反抗力量,夺取了许多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城市和乡村,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1444年3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全阿尔巴尼亚大公会议,建立了反土耳其联盟。此后25年间,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斯坎德培领导下多次击败土耳其军队的远征,特别是他充分调动人民的抵抗能力,使侵入阿尔巴尼亚的土耳其军队落入人民战争的陷阱,处处被动挨打,最终击溃苏丹穆拉德二世亲自率领的十万大军。斯坎德培的胜利打破了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不仅保卫了阿尔巴尼亚领土,而且鼓舞了巴尔干半岛人民抵抗土耳其征服的信心。可以说,正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其征服事业之际,正当整个半岛臣服于土耳其军事淫威之时,阿尔巴尼亚人民挺身而出,担当起抵抗外族入侵的重任,树立了弱小民族战胜强大民族的榜样,从而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尊敬。1468年,斯坎德培去世,阿尔巴尼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征服的事业由杜加勒继续到15世纪末,直到16世纪初,土耳其人才最终完成了对该地区的征服^②。

斯坎德培开始的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的斗争,促进了阿尔巴尼亚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的最终形成。

^① George P. Scriven, "The Awakening of Albani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 No. 2 (Aug., 1919), pp. 73—83.

^② L. Carl Brown ed., *Imperial Legacy: the Ottoman imprint on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N. Y.: Columb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3—45.

第八章 拉丁人

十字军东侵是11世纪以后欧洲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其爆发的原因与巴尔干半岛有密切关系,而其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不仅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半岛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维系半岛政治格局的制度框架,而且奠定了巴尔干半岛此后数百年发展的基础,埋下了其近现代复杂矛盾和混乱局面的祸根。十字军战争是巴尔干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影响巴尔干半岛未来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必要的描述。

第一节 拜占廷帝国的衰败和十字军战争的兴起

12世纪下半叶,拜占廷皇室内讧促使帝国加速衰落,也引起东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半岛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塞尔柱突厥人的迅速崛起,取代阿拉伯人成为西亚、北非的强大势力。同时,意大利各沿海商业城市共和国和诺曼人国家的兴起,逐步排挤了拜占廷帝国在东地中海的势力。塞尔柱突厥人(Seljuks)原是活动在咸海附近地区的游牧民族。11世纪前半期,他们向亚洲西部迁移,在小亚细亚东部地区与拜占廷军队发生接触。当时,拜占廷军区边防部队已经被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Monomachos,1042-1055年在位)撤消,所以对塞尔柱突厥人的入侵未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抵抗措施。11世纪中期,塞尔柱突厥人征服了阿拉伯人,逐步控制了过去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并在拜占廷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形成对拜占廷人的巨大威胁。1071年夏季,塞尔柱突厥军队在亚美尼亚东部幼发拉底河畔重镇曼兹

克特 (Mantzikert) 击败皇帝罗曼努斯四世 (Romanos Diogenes, 1068—1071 年在位) 亲自统率的拜占廷军队, 俘获皇帝本人。虽然, 拜占廷人允诺交纳 150 万金币作为罗曼努斯四世的赎金, 但是, 这次影响深远的失败促使拜占廷宫廷内讧加剧, 皇位易主^①。塞尔柱突厥人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占领了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大部分领土, 并于 1081 年在距离君士坦丁堡很近的尼西亚城 (Nicaea) 建立都城。此后, 在塞尔柱苏丹苏莱曼 (Suleyman Ibn Kutulmus, ? —1086 年在位) 和梅利克沙 (Malikshah, 1073—1092 年) 统治时期, 塞尔柱突厥人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 并夺取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城。

拜占廷人面对塞尔柱突厥人的强劲攻势, 只有招架之功, 而无反攻之力, 科穆宁王朝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慌忙向教皇求援。1095 年 3 月, 他派遣特使会见教皇乌尔班二世 (Urban, 1088—1099 年), 请求西方各基督教国家出兵援助, 反击塞尔柱突厥人^②。这一请求立即得到教皇的许可, 他公开敦促西欧各国封建主和广大信徒参加圣战, 帮助东方的基督教兄弟反对异教徒。同年底, 他再次号召发动圣战, 解放被穆斯林占领的圣地。教皇的鼓动很快在西欧各国引起强烈反响, 在法国南部克莱芒市举行的盛大集会上, 数以万计的狂热基督徒和数千封建骑士热烈响应教皇的号召, 高呼口号, 当即立誓出征^③。由于他们将十字标志缝在各自的服装和旗帜上, 所以被称为“十字军战士”。

教皇如此热情地支持西欧出兵和卖力游说西欧各国封建主, 并使后者积极响应的原因是复杂的, 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从欧洲范围看,

① Alfred Friendly, *The Dreadful Day: The Battle of Manzikert*, 1071, London, Hutchinson, and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1, pp. 231—240.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pp. 354—355.

② 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求援事件主要是西方人的说法, 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其中最有力者包括: R. L. Wolff ed., *The Later Crusad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2, p. 126.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 第 306—307 页。

③ Frederic Duncalf, "The First Crusade: Clermont to Constantinople", in K. M. Setto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5, pp. 220—250.

11世纪时经历了几百年社会变革与动荡的欧洲社会趋于安定,经济生活日益繁荣,人口急剧增加,土地等物质资源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西欧各国封建世袭领地制曾产生了一批以作战为职业的骑士,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他们失去了赖以谋生的战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频生事端,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欧上层封建领主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使他们已经加强了对农奴的剥削,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其过高的需求,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新的财源^①。封建制在西欧确立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西欧普遍的庄园化和农奴化,由于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日益加强,所受的剥削越来越重,因此大批下层农民迫切希望通过东侵改变现状。教皇的号召无疑是给西欧社会各阶层提供了机会,带来了希望,因为,多年来东西方贸易的展开使西欧人逐步认识了东方商品的魅力,了解到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富庶的生活。西欧各级封建主既希望有机会夺取拜占廷帝国的皇位,又想在圣战中夺取新的土地和无尽的财宝,骑士们希望在战争中一展身手,重新建立伟大事业,而深受剥削的农民则希望摆脱农奴制的压迫,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小家园。这些出发点各异的梦想迅速汇集成征服东方的狂潮,形成了延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

教皇作为十字军战争的发动者和罪魁祸首,除了在追求财富方面具有不亚于世俗封建主的热情和积极性外,还有其争夺基督教世界领袖地位、扩大宗教势力范围的特殊目的。这里,我们不能不对拜占廷帝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来做简单的回顾。拜占廷帝国从4世纪即继承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罗马帝国的遗产,5世纪时,罗马、拉文纳和米兰曾是帝国副皇帝的所在地,而蛮族入侵时代建立的日耳曼人哥特王国在名义上是承认帝国宗主权的附属国。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的西征部分地恢复了拜占廷帝国对意大利的直接控制,但是,伦巴底人的兴起使拜占廷人的势力缩小到北部威尼斯、拉文纳和南部西西里岛等地区,一直

^① 安娜公主从拜占廷人的角度一眼就看穿了西欧封建领主的动机,她说,这些人“就急于当上罗马人(拜占廷人)的皇帝”。Anna Comnena, *Alexiad*, I, xii, 5.

处于皇帝直接控制下的罗马教区则乘机开始摆脱拜占廷帝国。8世纪前半期,虽然伦巴第人夺取了包括拉文纳在内的意大利北部,但是拜占廷人却通过军区制加强了其对包括罗马在内的意大利中、北部的控制。直到法兰克王国侵入意大利,罗马教会才摆脱了帝国的控制,发展成为独立的教皇国。8、9世纪时,拜占廷、法兰克、教皇国、伦巴第和威尼斯各种势力结成反阿拉伯同盟,其中教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0世纪时,拜占廷人在意大利的军区不包括西西里岛和卡拉布利亚。此期,在亚平宁半岛复杂局势中,又加入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Otto I)的势力。到11世纪,新兴的诺曼人海盗国家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共和国就完全取代了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势力^①。12世纪是拜占廷帝国迅速衰落的时期,无论教皇还是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乘机向东地中海扩张其宗教和经济势力。罗马教皇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特别迅速,以致于教皇自认为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并与东方希腊教会为争夺最高宗教权发生激烈斗争。1054年,东西方教会相互开除教籍,导致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教皇认为拜占廷皇帝的求援请求是恢复东西教会统一和控制东方教会的天赐良机,因此,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至于意大利商人支持十字军东侵,其目的则是夺取东地中海的商业霸权。事实上,拥有强大舰队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人在10世纪时即获得了对拜占廷帝国的贸易特权,并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仅仅建立商业优势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希望垄断东西方贸易,因此,立即成为十字军东侵的拥护者和参加者^②。

1096年春季,法国穷修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和穷骑士瓦尔特(Warter)率领许多心存幻想的贫苦农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其他下层民众沿多瑙河向东进发,揭开了十字军东侵的序幕。从此直到13世纪

^① Horatio F. Brown, "The 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40, Part 1 (1920), pp. 68—88.

^② Horatio F. Brown, op. cit., pp. 70—88.

初,西欧英、法、德等国各级封建主发动了三次东侵。在此过程中,被蒙蔽和愚弄的广大下层十字军战士损失惨重而收获甚微,他们既没受过军事训练,缺少作战常识,又无军事装备和充足的给养,一路上露宿风餐,忍饥挨饿,全靠抢劫沿途居民为生,到了前线则被敌人大肆杀戮,生还者极少,大部分战争所得都被指挥十字军的封建主占有,他们仅得到少许战利品和在被占土地上重新过农奴式生活的权利^①。正因为如此,十字军战争表现出罕见的残暴性。首批“穷人十字军”几乎全军被歼,仅有1/10生还。1098年和1099年攻占安条克城和耶路撒冷城后,大谈以仁爱为本的基督徒十字军战士对穆斯林居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和十分彻底的大洗劫。在十字军征服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城市破败,农田荒芜,昔日繁荣的经济生活完全消失,西欧封建主在这一地区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The Kingdom of Jerusalem)、安条克公国(The Principdom of Antioch)等大大小小的封建国家均按照西欧的封建制度进行层层分封^②。

最初,塞尔柱突厥人对身着重甲、精于骑术和决斗的十字军骑士感到十分陌生,他们完全不熟悉汹涌而至的西方骑兵,更不了解其战术和作战方法,因此,在第一阶段交战中,十字军频频得手,仅用三年时间就夺取了东地中海沿海地区大片土地。十字军的暴行必然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埃及苏丹萨拉丁(Salah al-Din Yusuf ibn Aiyub, 1169—1193年在位)就成为近东地区反十字军斗争的领袖和杰出代表。他于1169年任埃及苏丹后,迅速扩张势力,发兵打击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王国,五年后便向北占领了直到大马士革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南部。1187年,萨拉丁军队在提比利亚湖附近大败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令西欧封建主大为震动,并再次组织东侵。事实上,十字军东征不仅给近东地区带来极大的灾难,而且,也使拜占廷帝国惨遭破坏,十字军历次进军

^① Charles M. Brand, "The Byzantines and Saladin, 1185—1192: Opponents of the Third Crusade", *Speculum*, vol. 37, No. 2 (Apr., 1962), pp. 167—181.

^②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06—309页。

经过的地区都被贪婪的西方骑士大肆抢劫,这是阿莱克修斯一世始料不及的^①。如果说他的这种引狼入室的行为尚属无知,那么其后的皇帝则是千方百计勾结西方势力参与帝国政治角逐,从而给拜占廷人带来更大的灾难。

阿莱克修斯一世去世后,拜占廷帝国又爆发了新的宫廷斗争。首先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领导的推翻她的兄弟约翰二世(John Komnenos, 1118—1143年在位)的宫廷政变,事发流产。而后是安德罗尼库斯一世(Andronikos Komnenos, 1183—1185年在位)利用首都民众对曼努埃尔一世(Manuël, 1143—1180年在位)和阿莱克修斯二世(Alexios Komnenos, 1180—1183年)推行亲西欧政策的强烈反感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紧接着,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重臣依沙克二世(Isaac Angelos, 1185—1195, 1203—1204年在位)反叛称帝。而依沙克二世之弟阿莱克修斯三世(Alexios Angelos, 1195—1203年在位)废兄夺权则将这个时期拜占廷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推到了顶点。阿莱克修斯三世曾是其兄依沙克二世的心腹战将,主持对斯拉夫塞尔维亚人的战事,1195年,他乘其兄亲临前线之机发动军事反叛,扣押了皇帝,以誓目的酷刑使依沙克二世成为残废,并投入监狱严加看管。在其无所作为的统治期间,阿莱克修斯三世一直面临依沙克二世之子、他的侄子阿莱克修斯(四世)颠覆皇权的挑战^②。阿莱克修斯在其叔叔废除了其父的皇位时,侥幸乘比萨人的商船逃离君士坦丁堡,并经意大利转路到德国找他的姐姐伊琳尼——德国国王士瓦本的非利浦(Philip of Swabia, 1198—1208年在位)的妻子,请求他们为父复仇。他还求助于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1198—1216年在位),恳求教皇批准十字军帮助他们父子恢复帝位。

拜占廷皇室内讧为覬觐君士坦丁堡已久的西欧各国君主,特别是

^① Charles M. Brand, op. cit., pp. 168—88.

^② Charles M. Brand, "A Byzantine Plan for the Fourth Crusade", *Speculum*, vol. 43, No. 3 (Jul., 1968), pp. 462—475.

威尼斯商人提供了入侵的理由,他们早有吞并富庶的拜占廷帝国之心,此时终于获得良机。西欧封建主和商人征服拜占廷人的愿望是从100年前第一次十字军东侵后逐步强烈起来。十字军东侵以前,西欧人对君士坦丁堡这个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不十分了解,只是耳闻拜占廷人富裕舒适的生活。东征的游历使他们亲眼目睹了壮丽雄伟的古都、豪华奢侈的皇宫、安逸闲散的市井生活和珠光宝气的贵族,东征的西欧人,无论是那些深藏冰冷阴暗的古堡中的君主,还是闯荡江湖的骑士,或是终年居住在低矮潮湿的茅草屋中的农夫,面对神话般的世界,惊讶得无以言表,当时人留下的许多记述无一不流露出这种心情^①。因此,十字军战士从一开始就把拜占廷帝国列入和异教徒领土一样的抢劫对象,他们一进入拜占廷帝国就肆无忌惮地洗劫沿途的农村和城镇,毫不留情地抢走任何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就必然引起拜占廷人和十字军的对立。

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初衷是,希望西方雇佣军帮助他保卫首都,而根本没有想到教皇会组织起十字军,更没有想到十字军竟然是一群散兵游勇,因此,他从一开始对十字军就抱有强烈的戒备心理。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明确指出:“但是,还有一些更老谋深算的人,特别像伯赫蒙德(诺曼国王罗伯特一世之子)及有类似想法的人,却另有秘不示人的目的,他们就是希望当路过这里时找适当的借口以某种手段夺取首都”^②。拜占廷人对这些乌合之众普遍反感,对这些帮助他们打击敌人的援军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和热情款待,相反,以驱除兵匪的态度将十字军押送到小亚细亚地区。为了有效地控制源源而来的十字军骑士,皇帝要求各路十字军领袖按照西方封建礼仪向他宣誓效忠并保证将夺回的帝国领土归还拜占廷人。这个要求与十字军将士的目的大相径庭,所以他们中许多人公开加以反对,甚至与拜占廷军队大动干戈,有

^①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by M. R. B. Shaw, Baltimore: Penguin 1987, p. 45.

^②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I, p. 404.

的则出尔反尔,把誓言视同儿戏。伯赫蒙德(Bohemund)即是如此,在夺取了安条克城后拒绝履行诺言,并与拜占廷人发生争执,于是,他返回意大利,招募了一支由法、意、德、英、西班牙等国骑士组成的军队进攻拜占廷,企图夺取君士坦丁堡,但是,在第拉修姆海港遭到拜占廷人的打击,他被迫订立屈辱的条约,承认自己是皇帝的封臣,不再与皇帝为敌,并归还过去属于帝国的领土^①。

这种对立情绪此后有增无减,特别是1124—1125年,威尼斯为重新获得商业特权派舰队大肆洗劫爱琴海岛屿及沿海地区,使希腊人对昔日的盟友深恶痛绝。1147—1158年,诺曼人舰队进攻拜占廷帝国,夺取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许多岛屿,抢劫沿海地区,摧毁了拜占廷帝国在希腊科林斯的丝织业中心,掳走大批技术工匠,使已经衰落的拜占廷经济雪上加霜,再次遭到沉重打击^②。1147年,由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Conrad of Hohenstaufen, 1138—1152年在位)领导的十字军在洗劫色雷斯地区时遭到拜占廷军队的打击,康拉德因此记恨拜占廷人。而受到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Komnenos, 1143—1180年在位)盛情款待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Louis, 1120—1180年在位)则恩将仇报,阴谋与德国骑士联手进攻君士坦丁堡。当他们在阿纳多利亚地区遭到土耳其人打击无功而返时,便迁怒于拜占廷人,声称后者与土耳其人勾结出卖了十字军。1189年,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 1152—1190年在位)在进军亚洲途经色雷斯地区时也无情地抢劫城市和村庄,兵临君士坦丁堡,他还写信给其子亨利六世(Henry VI, 1191—1197年在位),令其率领舰队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而同一时期的英、法十字军则毫不客气地从他们宣誓效力的“领主”依沙克二世手中夺取了塞浦路斯岛。1170—1176年,拜占廷人因拒绝威尼斯对帝国商业特权无止无休、得寸进尺的要求,与威尼斯人再度爆发战争,帝国又饱受丢城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08页。

② R. Ignatius Burns, "The Catalan Company and the European Powers, 1305—1311", *Speculum*, vol. 29, No. 4 (Oct., 1954), pp. 751—771.

失地的痛苦。

拜占廷人对西欧“基督教兄弟”的直接了解似乎就是从前三次十字军东侵开始的,他们从野蛮的十字军骑士身上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兄弟,而是闯入其家园的凶恶豺狼,认为这些打着圣战旗帜的西欧骑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掠夺财富和土地。他们对十字军、意大利人、乃至被统称为“拉丁人”的所有西方人充满了仇恨。这种愤怒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们不仅痛恨武装的十字军骑士,而且仇视狡猾的西方商人。1182年君士坦丁堡爆发的人民起义表明拜占廷人的仇恨与愤怒达到了顶点。在起义中,西方商人的商业区被愤怒的民众捣毁,商店被烧毁,住宅被焚烧,大批西欧人被杀害,甚至连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1159—1181年在位)的代表、红衣主教约翰也性命难保,他的头颅被砍下后系在狗尾巴上游街示众^①。拜占廷人对西方人各种形式的入侵采取的激烈反抗使西欧封建主耿耿于怀、寻机报复。1198年初,野心勃勃、梦想成为世界领袖的英诺森三世当选为教皇。上台之后,他便向西欧各国君主和基督徒发出举起圣战旗帜的号召,企图利用十字军达到控制东方教会的目的。他到处发表演说,向各国君主发寄信件,还派遣特使四处游说,信誓旦旦地保证所有参加者将被赦免一切罪孽。但是,对远征东方早已失去兴趣的民众对教皇的呼吁反应冷淡,而英、法等国君主正忙于国内事务,无暇他顾,因此,只有急于报仇的个别封建主和威尼斯人分外忙碌,到处游说,招兵买马,积极准备第四次十字军东侵。

第二节 第四次十字军战争

第四次十字军是由英诺森三世发动的。1198年初,野心勃勃、梦想成为世界领袖的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年在位)当选为教皇。上台之后,他便向西欧各国君主和基督徒发出通谕,号召基督徒

^① John Godfrey, *The Unholy Crusa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2—19.

举起圣战旗帜,为保卫圣地而战,企图利用十字军达到控制东方教会的目的。他公开威胁拜占廷君主,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将君士坦丁堡教会合并到罗马教廷,否则将对拜占廷人动用武力。

许多西欧学者认为第四次十字军的进程是偶然发生的,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厮杀也是教皇始料不及的^①。事实上,第四次十字军在准备阶段就已经将进攻君士坦丁堡作为主要议题加以讨论,事件的整个进程完全是有预谋、有组织和经过精心策划的。起初,英诺森三世的呼吁确实没有得到各国君主的支持,只有拜占廷帝国被废的皇太子阿莱克修斯多年不懈地往返于德、意、法三国,劝说他的妹夫德国国王士瓦本的菲利浦、菲利浦的表兄弟法国国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1165—1223年在位)和教皇帮助他恢复帝位。早在士瓦本的菲利浦成为德国国王以前,他的哥哥德皇亨利六世(Henry VI, 1165—1197年在位)就希望通过联姻获得拜占廷皇位继承人资格,并安排了菲利浦与拜占廷皇家的伊琳尼公主的婚姻。此时,士瓦本的菲利浦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想法,只是,德、法两国都忙于本国的事务,虽然对流落他乡的阿莱克修斯深表同情,但又抽不出身来,于是,力荐意大利蒙特菲拉特公爵伯尼法斯(Boniface of Montferret)于1201年担任第四次十字军首领。这位伯尼法斯公爵出身意大利贵族家庭,29岁时即开始其骑士游侠生涯,曾经陪伴其兄康拉德访问过君士坦丁堡,对拜占廷人的典雅生活早已垂涎三尺。1201年,在其表弟法国国王菲利浦的劝说下,积极担当起组织第四次十字军的重任,此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阅历复杂,老谋深算。这样的安排为进攻君士坦丁堡提供了组织领导方面的保证^②。

十字军的组织者为了掩人耳目,开始公开声称进攻的目标是阿尤布王朝(the Ayyoubids, 12—13世纪)的政治中心埃及,但是,私下却在

^① Donald E. Quell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1201—120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pp. 11—15.

^② Ernle Bradford, *The Sundered Cross: the 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 N. J.: Prentice-Hall, Inc. 1967, pp. 156—169.

积极策划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细节。他们对当时拜占廷帝国防务和军事力量的配置了解得十分清楚,为了避开相对强大的拜占廷陆军,从君士坦丁堡薄弱的水上防线进攻,伯尼法斯谎称巴尔干半岛北部山路难行,由陆路取道拜占廷帝国进军埃及,路途遥远,不如从海上直捣亚历山大。于是他在威尼斯集结部队,并与威尼斯人商讨具体进兵事宜。伯尼法斯深知威尼斯人对拜占廷人的仇恨和夙怨,也了解威尼斯商人急于夺取东地中海贸易垄断权和海上霸权的心情,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用威尼斯船只运送十字军的协议,至于把十字军运往何方以及十字军的作战目标,彼此都心照不宣。

教皇在第四次十字军东侵阴谋策划的过程中,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从理论上讲,他积极鼓噪和挑动起来的这次圣战应当以异教徒为征服对象,东正教信徒则是他们帮助和解救的兄弟。可是,他对于以武力征服拜占廷帝国的提议一直没有作公开的批评和否定,更没有发布明确的指示禁止进攻基督徒兄弟。事实上,教皇并非不了解伯尼法斯的野心和威尼斯的计划,他也不是在十字军攻入君士坦丁堡以后才听说这个消息,许多已经昭示天下的事实就是证据。首先,阿莱克修斯多次面见教皇,提出利用十字军恢复他们父子的皇帝地位,狡猾的教皇没有表示拒绝,但也没有表示同意^①。按理说,十字军用于基督徒内战是违背教义的,教皇没有必要吞吞吐吐,这表明教皇清楚地了解十字军领袖们正在策划进攻基督教兄弟的行动。其次,作为第四次十字军首领的伯尼法斯直接会见过英诺森三世,极力说服教皇同意他带领十字军帮助依沙克父子恢复帝位,教皇又没有明确表态。显然,英诺森三世确切了解这次十字军的进攻目标,他只是通过这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暗示其默许的态度,这符合当时四十多岁的教皇狡诈的行为方式^②。再

^① Palmer A. Throop, "Criticism of Papal Crusade Policy in Old French and Provençal", *Speculum*, vol. 13, No. 4 (Oct., 1938), pp. 379—412.

^② W. B. Bartlett, *An Ungodly War: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Fourth Crusade*, N. Y.: Sutton Publishing 2000, pp. 135—146.

者,就在十字军即将出发之际,包括德国国王菲利浦和阿莱克修斯(四世)在内的反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势力集聚威尼斯,这一动向明显地暴露出第四次十字军的作战方向,对此,消息灵通的教皇更不会一无所知,他不过是在玩弄手段,佯装不知。另外,英诺森三世在通过谈判使东方教会合并到罗马教会的努力失败之际,曾给当时的拜占廷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发出恐吓信,声称将以适当的方式恢复依沙克的皇位。英诺森三世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他既要保持其基督教世界领袖的清白名声,又想掩盖其利用十字军达到征服东方教会之目的的狰狞面目,他既要做圣人,又要做强盗,因此,采取模棱两可、听之任之的态度,同时,高举东西方教会联合、发动圣战进攻穆斯林、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旗号,以欺骗世人。在玩弄权谋方面,他经验老到,将德、英、匈、捷、保、波、丹、葡、瑞、挪等国君主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都成了他的臣属。

流亡皇太子阿莱克修斯(四世)在推动第四次十字军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活动中不遗余力,丑态百出,极尽摇尾乞怜、阿谀奉承之能事。为了复辟,他在教皇和德国国王菲利浦面前哭述阿莱克修斯三世对他们父子的迫害,恳求十字军帮助他不幸的父皇,他甚至让他的姐姐向菲利浦大吹枕边之风。她曾形容她的兄长“失去祖国、无家可归,像流星一样四处流浪,他一无所有,只剩下自己的肉体了”^①。为了赢得教皇的支持,他答应复位后,东方教会完全听命于罗马教皇,而对十字军首领伯尼法斯则大行贿赂,许以大笔钱财供十字军使用。按照他一厢情愿的计划,十字军在帮助他们父子复位后即离开君士坦丁堡,继续进军埃及。为了加强各位十字军将领的信心,他在十字军出发前从德国请来德国国王菲利浦,同往威尼斯,以策划攻打自己祖国的行动。

威尼斯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威尼斯位于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沿海,始建于公元421年,6世纪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时,威尼斯成为难民集散地。当时的威尼斯是拜占廷帝国在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I, p. 451.

意大利拉文纳总督管辖的区域,751年,拉文纳失陷后,威尼斯由君士坦丁堡直辖^①。810年,法兰克军队进犯威尼斯遭到失败,两国君主订立亚森条约,确定威尼斯为拜占廷领地。此后,威尼斯由地方贵族进行统治,承认拜占廷帝国宗主权,并由拜占廷政府官员实行监督。9世纪,威尼斯总督彼得·特里布诺依靠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逐渐摆脱了拜占廷人控制。独立后,威尼斯航海业迅速发展,首先控制了亚得里亚海制海权,垄断了海上贸易,并在反对阿拉伯人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威尼斯商人向拜占廷帝国进行经济扩张,逐渐控制了拜占廷人的谷物市场,并进行奴隶贸易。992年,拜占廷皇帝瓦西里二世给予威尼斯商人贸易特权,以换取威尼斯人的海上援助,1082年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为了同样的目的授予威尼斯更多的商业特权,使之从此获得在君士坦丁堡城北建立威尼斯商业区、征收部分关税以及在科林斯等拜占廷人重要海港自由进出的权利,这些特权对拜占廷人的国际地位和贸易利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②。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兴起引发了与拜占廷人之间的冲突,1171年,拜占廷皇帝曼努尔一世将威尼斯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就为热那亚和比萨等其他意大利航海共和国参与商业竞争提供了机会。威尼斯人因此对拜占廷人十分仇视,一直等待时机进行报复。

第四次十字军于1202年初秋,从威尼斯起航,首先按照威尼斯总督丹德罗(Dandolo,1192—1205年在任)的意愿出其不意攻陷由匈牙利国王控制的亚得里亚海滨城市扎拉(Zara,今扎达尔),平毁城墙,城内财物被洗劫一空。由于该城市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因此,教皇故作姿态,假惺惺地表示了一番谴责,而后就不了了之了^③。1203年5月,威尼斯

① Calogero Muscara, "The Right to Adap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 Venice and the Venetia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 No. 2, (1984), pp. 181—188.

② Patricia Fortini Brown, *Venice and Antiquity: The Venetian Sense of the Pa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4—45.

③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40页。

和十字军最后确定了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旋即拔寨起航,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第四次十字军的阴谋由威尼斯总督丹德罗、伯尼法斯和阿莱克修斯(四世)付诸实施,拜占廷帝国也因此经历了巨大的灾难。

十字军舰队经过一个月的航行,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直达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首先于1203年6月在城市北部郊区加拉大(Galata)商业特区登陆。这个区在黄金角湾北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面对君士坦丁堡,西方骑士们备感惊讶。一位参加过第四次十字军的法国骑士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此时你可以想象,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君士坦丁堡的人两眼直勾勾地仰望着它,他们看着那高大的城墙、环绕着城市的那些雄伟的塔楼、华丽的宫殿和巨大的教堂,简直不能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有的城市。城中教堂数量之多若不是亲眼所见,没人能够相信。城市建筑之高和占地之广超过所有其他君主的都城。你也能够想象得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不浑身颤抖,这毫不奇怪,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以来,没有任何人从事过如此伟大的事业”^①。

最初,虽然十字军猛烈攻击君士坦丁堡,但是,终因兵力不足和城防坚固而未果,直到7月份,才攻占了城市。无能的阿莱克修斯三世弃城而逃,携国库金银财宝而走,不知去向^②。阿莱克修斯四世(Alexios IV, 1203—1204年在位)“光荣”入城,瞎眼的依沙克二世重新登上皇位,他们同时成为皇帝,共同主持朝政。心满意足的阿莱克修斯四世以为,帮助他们父子恢复皇位的十字军已经完成使命,应继续南下进军埃及。但是,出乎其预料的是贪婪的威尼斯人和十字军早已另有预谋,他们正在寻找借口大开杀戒,他引入家门的西欧十字军已经举起了屠刀,准备洗劫富庶的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总督丹德罗首先要求阿莱克修斯

^①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p. 68.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I, p. 459.

^② 阿莱克修斯三世流窜到小亚细亚地区,参与过突厥人的军事活动,后来被蒙特菲拉特公爵伯尼法斯软禁起来,直到1209年投靠伊庇鲁斯的希腊人国家,最终被尼西亚政府逮捕,当时尼西亚帝国皇帝是其女安娜的丈夫,故饶其不死,关押在修道院,老死终生。

四世履行诺言,向十字军提供大笔金钱,以供他们继续东征。

此时拜占廷帝国国库一空如洗,仅剩的钱财也被阿莱克修斯三世尽数盗走,不知去向。阿莱克修斯四世清楚了解,如果向首都居民和教会临时征集新的捐税将导致人民起义,因为拜占廷帝国各阶层对阿莱克修斯四世引来十字军极为反感。因此,阿莱克修斯四世恳求十字军宽限时日,容他筹集金钱。这正好给十字军继续呆在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借口。这些武装的拉丁骑士积极准备夺取君士坦丁堡,同时他们在帝国首都和色雷斯地区为所欲为,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十字军骑士与拜占廷人民的矛盾日趋激化,摩擦日益增多。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阿莱克修斯四世采取措施将十字军营地迁往城外,但是,仍然不能平息人民的愤怒,他们认为阿莱克修斯四世把帝国出卖给了拉丁人。1204年初,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婿、杜卡斯家族的阿莱克修斯领导首都人民起义,推翻阿莱克修斯四世和依沙克二世的统治,将瞎子皇帝重新投入监狱,阿莱克修斯四世则被愤怒的民众杀死,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①。

阿莱克修斯五世(Alexios V, 1204年在位)决心依靠人民的力量守住君士坦丁堡,因此,上台后立刻着手巩固城市防务,同时,拒绝履行阿莱克修斯四世对十字军许下的诺言,以争取民心。丹德罗清楚地意识到,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时机到了。为了防止胜利后十字军内部因分赃不均发生内讧,他提议提前举行分赃会议,从而就以“商人精神”解决了瓜分拜占廷帝国遗产的问题。同年3月,分赃会议达成以下基本要点: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十字军将在城中建立拉丁人的政府;十字军各方将依照协议瓜分君士坦丁堡的战利品;组成威尼斯人和法国人各6名参加的委员会,负责选出治理新国家的皇帝;皇帝将占有被征服的首都的1/4,包括两个皇宫;其他3/4将由威尼斯和十字军对半平分;圣索非亚教堂和大教长的职位将属于威尼斯人;所有十字军战士都将获得或大或小的封地,并按西欧封授土地方式向皇帝宣誓效忠;只有威尼斯总督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41—342页。

丹德罗可以免除效忠式。

十字军各路将领达成分赃协议后,率各部全力投入攻城战斗,为了即将到手的财富,骑士们人人争先,个个奋勇。阿莱克修斯五世虽然有心御敌,但是无兵可用,危难之际微服出逃^①。4月13日,经过三天激烈战斗,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而后十字军纵兵三日,这座被誉为“万城之城”、“众城的女王”的城市完全落入杀人放火、抢劫盗窃的种种暴行之中,任凭西欧骑士蹂躏,高举圣战旗帜的十字军骑士和道貌岸然的随军罗马教士抛弃了伪装,展开了抢夺金银财宝的竞赛。几百年来君士坦丁堡积聚的来自拜占廷各地的珍贵艺术品和古代图书手稿,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奇石异物和各种金银器物都是他们洗劫的对象,教堂、大赛车竞技场、国家图书馆、公共会议厅和私人宅院是他们光顾的主要场所。据当时目击者的记载,这场抢劫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抢劫之残暴、手段之凶狠、洗劫之彻底、赃物数量之多都是没有先例的,甚至连突厥人军队对耶路撒冷的抢劫比之也大为逊色。十字军抢劫财物,坐地分赃,所有的骑士都分到了许多财宝。那位留下有关第四次十字军暴行记载的骑士惊讶地写道:“自从创世以来,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都不能得到这么多战利品!”^②许多封建主把分得的战利品纷纷运回本国,整个西欧被这些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珍宝和艺术品装饰一新,大部分西欧教堂都得到了抢来的宗教圣物,其中法国教会收获最大,因此,法国至今仍是拜占廷古代文物主要的收藏地。威尼斯也因此变得雍容华贵起来,君士坦丁堡大赛车竞技场上的装饰物“四匹铜马”被威尼斯总督丹德罗运回威尼斯,成为圣马可教堂正门入口的装饰物,至今仍在向世人炫耀。

十字军大肆掠夺金银财宝,还对拜占廷帝国领土和政治权利进行分赃。威尼斯总督丹德罗志在发展母邦威尼斯,无意争夺拉丁帝国皇

^① 阿莱克修斯五世在十字军破城之际携带家眷逃往小亚细亚,被俘后以叛国罪处以抛掷刑,摔死于塞奥多西石柱下。

^②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I, p. 461.

位,但是,他在选举皇帝的问题上再度起了主导作用。由于他的干预,最初的候选人蒙特菲拉特公爵伯尼法斯未能当选,这是因为一则伯尼法斯的领地十分接近威尼斯,有可能成为威尼斯的竞争对手,二则伯尼法斯身为第四次十字军的领袖,影响太大,将来有可能把新国家重新建设成为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商业竞争对手。心怀不满的伯尼法斯被迫接受拜占廷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作为领地。势力和影响较小的法兰德尔伯爵鲍尔温(Baldwin of Flanders, 1204—1205年在位)被推选为拉丁帝国的皇帝。5月3日,鲍尔温在圣索非亚教堂加冕称帝,拉丁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十字军对被征服土地的瓜分基本上是按照1204年3月“分赃会议”的原则进行的,但是在落实的过程中充满了勾心斗角的斗争。首都君士坦丁堡由鲍尔温和丹德罗占有,前者分得城区的5/8,后者分得3/8。鲍尔温作为拉丁帝国的皇帝还得到了色雷斯地区南部、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爱琴海上某些大岛,如莱斯伯斯岛(Lesbos)、萨莫斯岛(Samos)和休斯岛(Chios),也归皇帝鲍尔温占有。

威尼斯人除了得到富有的君士坦丁堡商业区和圣索非亚教堂外,还占有了亚得里亚海沿岸重要的商业地区,如通往意大利的枢纽迪拉修姆(今地拉那)和“沿海七岛”,以及爱琴海大部分岛屿和沿海地区,如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克里特岛、色雷斯沿海重要港口和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港口城市。与其他领主不同,他自称“专制君主”(the Despot),不隶属于鲍尔温的拉丁帝国(the Latin Empire),在历史上他的国家被称为爱琴海公国(the Duchy of the Archipaelago)。同时,占据了圣索非亚教堂的威尼斯教士选举威尼斯人托马斯·莫罗西尼(Thomas Morosini)为大教长。显然,威尼斯人控制了东地中海最重要的岛屿和口岸城市,占有了最富庶的商业区,而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与意大利之间的航线,就意味着掌握了东地中海贸易垄断权^①。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III, pp. 108—131.

伯尼法斯作为第四次十字军领袖,分得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塞萨利地区和马其顿地区,他以塞萨洛尼基为首府建立了塞萨洛尼斯王国(the Thessalonica Kingdom),并承认鲍尔温一世的宗主权。但是,伯尼法斯不满足他得到的战利品,因此,出兵攻击希腊本土,并于同年秋季在希腊建立了雅典和提比斯公国(the Athens Lordship),由他的封臣伯良底骑士奥松·迪·拉·利赫(Othon de La Roche)担任雅典和提比斯公爵。而后,他应法国骑士乔浮利·迪·威利哈冬(Villehardouin)之邀,继续向南进军伯罗奔尼撒半岛,将占领地分封给他的另一个封臣,来自香槟伯爵家族的法国骑士威廉(William),该领地称为阿塞亚侯国(the Principality of the Achaea)。除了第四次十字军新建立的国家外,前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沿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王国等大小封建国家也死灰复燃,重新打出拉丁帝国附属国的旗号^①。

教皇对十字军的胜利也十分高兴,只是因为起初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大为恼火。作为西欧基督教世界最高领袖和第四次十字军的发动者,他眼看着威尼斯人和伯尼法斯这些战争的直接领导者得到巨大的利益,甚至普通的骑士也获利不薄,他却并没有从十字军丰厚的战利品中分到一金半银,尤其是十字军领袖们在分赃中竟然没有考虑他的份额,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中,这是英诺森三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实。他先是给十字军发去一封措辞强硬、态度愤怒的信件,谴责他们违背上帝的,也就是他的意志,竟敢攻打基督徒兄弟,宣布开除全体威尼斯人和十字军将士的教籍^②。但是,当圆滑的鲍尔温一世因立足未稳、急需教皇支持、并以谦卑的口吻给教皇写信自称是教皇的臣属时,英诺森三世在回信中一改过去的态度,对十字军的行为大加赞扬,称赞他们攻陷君士坦丁堡是“上帝的奇迹”,是东正教背叛罗马教廷应得的惩罚,说什

①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III, pp. 205—236.

② 这封信件是为英诺森辩护的西方学者使用最多的证据,他们对此后的信件闭口不提,其袒护罗马教皇并进而维护天主教尊严的倾向十分明显。Robert Lee Wolff, *The Later Crusades 1189—131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2, pp. 153—155.

么“我以天主之名而感到欢心鼓舞”，称十字军的所作所为“使上帝的名得到颂扬和光耀，使教宗的宝座得到荣誉和利益，……使君士坦丁堡教会恢复对教廷忠实的尊敬，……使希腊帝国臣属圣座”^①。他还向所有教士、世俗君主和基督徒呼吁支持鲍尔温一世的事业，保卫拉丁帝国。显然，教皇终于达到了征服东方教会的目的，至于教皇是否从十字军的赃物中分得一匙半碗则是至今尚未解开的历史之谜^②。

十字军东侵战争是西欧封建领主在宗教旗号下发动的掠夺资源和生存空间的移民运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战争进行评说，可以从相同的历史资料中得出不同结论，并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行分析。本书作者认为，就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而言，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是半岛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其影响极为广泛深刻，至今保持在当地社会生活中。

首先，这次战争彻底粉碎了巴尔干半岛原有的社会结构，西欧骑士在拜占廷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拉丁帝国，并按照西欧分封制的原则改造了拜占廷社会结构，这是继十字军瓜分拜占廷帝国遗产后对巴尔干半岛社会更深刻的瓦解。拉丁帝国名为帝国，实为各自独立的西欧封建主的联合体。作为拉丁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被一分为二，由鲍尔温和丹德罗分别占有，各自管理。作为拉丁帝国皇帝的鲍尔温只控制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北部分地区，其它地区则出现了许多独立小国。这些小国在理论上附属于帝国皇帝，各个小国的君主均以皇帝为最高封主。在爱琴海上，除了莱斯伯斯岛、萨莫斯岛和休斯岛归鲍尔温占有外，大部分海域由威尼斯控制，如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克里特岛、色雷斯沿海和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所有重要商业城市都脱离了拉丁帝国皇帝的管辖。在巴尔干半岛，有伯尼法斯的塞萨洛尼基王

①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449页。

② 笔者在梵蒂冈地下宝库中参观时即发现了有关的证据，可惜因防范措施严密而未能拍照。2004年3月举行的第四次十字军国际学术研讨会揭示了许多新材料，读者可从会议网页上查询相关信息。参见 <http://www.cc.uoa.gr/4thcrusade>（2004年2月28日）。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尚未问世，本书无法使用。

国,势力范围包括马其顿和塞萨利地区;有伯尼法斯的封臣、伯良底骑士奥松·迪·拉·利赫统治的雅典和提比斯公国,控制阿提卡半岛及其沿海岛屿;有伯尼法斯的另一个封臣、法国骑士威廉为首的阿塞亚侯国,势力范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在亚洲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存在着安条克王国和耶路撒冷王国。

各小国内的各级封建领主又结成以土地分封为基础、以封建等级义务为纽带的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主从关系。君主和各级封建主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下属,并对附庸的土地财产和人身安全提供保障,同时,附庸要向领主宣誓效忠,承担军事、司法和其它若干义务。例如塞萨洛尼基王国的伯尼法斯国王分封威廉为阿塞亚侯国侯爵,后者又将侯国分封给12个贵族,而各个贵族再分封骑士。西欧大小贵族还在四分五裂的原拜占廷帝国土地上建造起西欧式的城堡,例如古代斯巴达遗址附近的米斯特拉城堡(the Mistra)便因此而闻名,而克莱蒙特城堡(the Clement)也建于此期,它们的军事作用直到希腊独立战争时期仍然没有消失。这些城堡就成为巴尔干半岛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的标志。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骑士建立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关系极为松散的西欧封建领主的联合体,在其七任皇帝57年统治期间,它不仅没能统一内部,也不能完全征服外部,“帝国”的称号虽然一直存在到14世纪,但是从一开始,拉丁帝国即名存实亡^①。在拉丁骑士们的领地周围还存在着大量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反抗西方入侵者的游击队,帝国各地有许多相互独立的希腊人政权,其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尼西亚帝国(the Nicaea Empire, 1204—1261年),它以古城尼西亚为中心,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直至卡帕多西亚地区。此外,在伊庇鲁斯山区有末代王朝远亲后裔米哈伊尔(Michael Angelos Comnenos)及其子塞奥多利(Theodore)建立的伊庇鲁斯君主国(the Despot of Epirus),在黑海东南岸有末代皇室血亲建立的特拉布宗帝国(the

^① 此后,西欧封建主义发动过四次十字军东侵,即1217—1221年的第五次、1228—1229年的第六次、1248—1254年的第七次和1270年的第八次,均以失败告终。

Empire of Trebizond)。

其次,第四次十字军东侵彻底摧毁了巴尔干半岛在此前数百年逐渐确立起来的政治格局,破坏了以拜占廷帝国为核心的半岛政治秩序,瓦解了传统的巴尔干半岛统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它把统一的帝国撕成大小不等的碎片,在原拜占廷帝国版图内分立起各自独立的帝国、王国、公国、专制君主国、骑士领地和自由城市共和国,它们相互攻讦,矛盾错综复杂,很难重新统一起来。它把西方封建制度引进拜占廷社会,瓦解了国家统一的社会基本结构,使晚期拜占廷帝国长期陷入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再也没有能力重新发展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国。换言之,当西欧经历了“蛮族”入侵后 500 年的封建割据战乱,开始走上各民族国家独立发展之路以后,西欧封建骑士却将西欧封建制度强行引进巴尔干半岛,迫使这里的各个民族重新经历他们走过的数百年的分裂历程。具体说,它促使巴尔干半岛其他民族脱离以拜占廷帝国为中心的体系,各自独立发展,强化各自的民族特色,进而导致巴尔干半岛地区共同利益和共性的减弱。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等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衡性进一步强化,各个民族特殊性得到加强。

拜占廷希腊人一直致力于推翻拉丁帝国统治的斗争,当时由占据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和据守伊庇鲁斯的安格罗斯家族两股力量构成了对拉丁政权的东西夹击之势,他们虽然没有统一指挥,但是,其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十分虚弱的拉丁人政权。拉斯卡利斯王朝首先致力于建立小亚细亚根据地,其军队在半个世纪期间的主要作战目标是肃清小亚细亚的拉丁骑士,并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夺取君士坦丁堡。1216 年 6 月,拉丁帝国皇帝亨利(Henry, 1206—1216 年在位)去世,皇位由亨利的妹夫、远在西欧的彼得伯爵(Peter, 1217—1219 年在位)继承,罗马教皇还为他举行了加冕仪式^①。但是,他在前往君士坦丁堡赴

^① Robert Lee Wolff, *The Later Crusades 1189—1311*, pp. 187—200.

任途中被控制伊庇鲁斯地区的拜占廷皇族军队俘获,投入死狱,不久病逝。尼西亚皇帝塞奥多利(Theodore I, 1205—1221年在位)乘机与彼得遗孀谈判,并计划嫁娶彼得之女,企图通过政治联姻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同时,他派遣以弗所市长尼古拉斯(Nicholas)与教皇的代表谈判东西教会消除分歧、联合统一问题,为名正言顺地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铺平道路。此后,塞奥多利又将女儿嫁给拉丁帝国皇帝,再度企图实现其“和平演变”的计划^①。但是,正当这一系列活动紧张进行之际,塞奥多利不幸去世,从而,中断了拜占廷希腊人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的美好梦想。但是,拜占廷希腊人并没有停止努力。在约翰·瓦塔基斯皇帝(John III, 1221—1254年在位)统治时期,拜占廷军队重新进入巴尔干半岛,占领色雷斯南部,迫使拉丁帝国皇帝签署了1225年协议,承认尼西亚帝国对小亚细亚的占领^②。瓦塔基斯在加强内部调整和建设的同时,频繁出击,先后攻占了爱琴海主要岛屿,如莱斯伯斯岛、希俄斯岛、罗得岛、萨摩斯岛和伊卡里亚岛。在此基础上,尼西亚军队深入色雷斯,受到希腊居民的热烈欢迎,几乎未遇抵抗地占领了色雷斯全境。与此同时,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的军队从西向东进攻,夺取塞萨洛尼基,灭亡了塞萨洛尼基王国。巴尔干半岛似乎即将回到拜占廷人手中。此时,如果两支拜占廷希腊军队联合作战,全力进军君士坦丁堡,则有可能提前完成光复大业。为此,瓦塔基斯也曾作过努力,可惜的是,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塞奥多利(Theodore)担心胜利后皇权可能落入拉斯卡利斯家族之手,因此,挑起内讧,希腊人之间为争夺反拉丁统治斗争最高领导权而兵戎相见。塞奥多利突然向尼西亚军队进攻,迫使瓦塔基斯退出巴尔干半岛,进而帮助了拉丁帝国皇帝,后者得以联合保加利亚沙皇阿森二世(Asen II, 1218—1241年在位)对希腊人进行反击,断送了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恢复拜占廷人在半岛权益的大好时机^③。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64—366页。

② Robert Lee Wolff, *The Later Crusades 1189—1311*, pp. 201—234.

③ Geoffrey Neale Cross, *Epir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p. 111—132.

形势的变化迫使尼西亚帝国必须首先进行统一希腊各派力量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尼西亚国家推行静观其变、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在巴尔干半岛各种力量的角逐中坐收渔人之利。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是由科穆宁王朝远亲后裔米哈伊尔(Michael)于1205年建立的。起初,他利用巴尔干半岛混乱局面控制了希腊西北部临近亚得里亚海的伊庇鲁斯地区,而后逐渐向马其顿地区扩张。1216年,第二任专制君主塞奥多利(Theodore,1215—1230年在位)派军队占领了拉丁骑士伯尼法斯控制下的塞萨洛尼基,并侵入色雷斯西部地区,与尼西亚军队发生冲突。塞奥多利为发展自己的实力,与保加利亚沙皇阿森二世结盟,企图称霸巴尔干半岛,控制希腊反拉丁统治各派力量。然而,阿森的野心是建立包括原拜占廷领地和多瑙河南岸地区的大保加利亚王国,他出尔反尔,视誓言为儿戏。特别是当“和平演变”的可能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毫不犹豫地背信弃义,放弃拜占廷人,而与拉丁帝国皇帝结盟,并将女儿许配给拉丁帝国小皇帝鲍尔温二世(1240—1261年在位),企图不动干戈,坐享皇权,成为巴尔干半岛新的霸主^①。于是,伊庇鲁斯军队便与保加利亚军队反目为仇,1230年双方在梅里奇河流域的科洛克尼亚战役中进行血腥厮杀,伊庇鲁斯军队全军覆灭,塞奥多利被俘刺瞎。保加利亚军队乘胜进军,夺取色雷斯、马其顿和伊庇鲁斯大部分地区。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从此势力急剧衰落,不久便被迫加入巴尔干半岛反保加利亚人大同盟,并承认尼西亚帝国的盟主地位。尼西亚的拜占廷人利用反保加利亚同盟,于1246年和1252年两度平息伊庇鲁斯复辟势力的反叛,并从南向北逐步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

保加利亚人在反保同盟打击下,节节后退,但是,作为这个时期巴尔干半岛强大的王国,它仍控制着半岛北部,遏制拉丁帝国与西欧母邦的陆上通道。为了实现建立大保加利亚王国的梦想,沙皇阿森二世先

^① Angeliki E. Laiou, *Constantinople and the Lati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dronicus II*,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LXXXVII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310.

与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结盟,后转而与拉丁帝国结盟,企图通过政治联姻吞并虚弱的拉丁帝国。当拉丁帝国意识到保加利亚人的阴谋时,立即中断盟约,采取了敌视保加利亚的政策,并积极促成巴尔干半岛各派力量反保大同盟,承认尼西亚帝国的盟主地位。尼西亚的瓦塔基斯皇帝则极力挑起巴尔干地区各派势力的相互斗争,以便从中渔利。他后来又与保加利亚人和新兴起的塞尔维亚人结盟,策动他们向拉丁帝国进攻。最终,反复无常的保加利亚人再度中断与尼西亚帝国的友好关系,准备向色雷斯进攻。这时,西征的蒙古军队侵入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俄罗斯、波兰、波希尼亚、摩拉维亚、匈牙利以及多瑙河下游地区全部沦陷,保加利亚人也被迫纳贡求和。善于利用时机的尼西亚拜占廷人立即主动结好蒙古人,利用保加利亚人势力衰落的机会,稳固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对拉丁帝国构成东西夹攻之势^①。这样,尼西亚的拜占廷军队已经具备了夺取君士坦丁堡的一切必要条件。

1261年,拉斯卡利斯王朝末代皇帝约翰统治时期,大权旁落,科穆宁王朝的后裔,帕列奥列格家族的米哈伊尔(Michael VIII, 1259—1282年在位)任摄政王。他为夺回君士坦丁堡作了充分的准备后,依靠热那亚舰队的帮助,下令阿莱克修斯将军率领的800人部队前往色雷斯前线地区侦察保加利亚人的动静。这支部队在完成任务返回尼西亚的途中,在首都拜占廷希腊居民的帮助下混进城门,意外地兵无血刃地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二世(1240—1261年在位)闻讯慌忙乘小船逃走。8月15日,米哈伊尔八世举行光荣的入城典礼。失陷了半个多世纪的君士坦丁堡重新回到希腊人手中,拜占廷帝国似乎重新站立起来。但是,这个重新建立的拜占廷国家十分衰弱,完全失去了帝国的实力,再也无法主宰巴尔干半岛的命运。虽然足智多谋、心狠手辣的米哈伊尔八世使出浑身解数,企图恢复拜占廷人的实力,重建帝国的威严,但终因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而未能有所建树。帕列奥列格王朝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71—372页。

(1261—1453)近200年的统治期间,拜占廷帝国已名不副实,国家政治混乱、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人心涣散、军阀割据,列强任意欺辱,外敌肆意蹂躏,成为在强国之间苟延残喘仰人鼻息的弱国,“它已经下降到二等小国的地位,是个处于守势的国家”^①。

第三节 重建巴尔干秩序的失败

1261年8月15日,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入主君士坦丁堡。这一天被人们视为拜占廷帝国“光复”的节日,也被后人看作是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拜占廷帝国的开端。而拜占廷帝国实力的恢复是重建巴尔干半岛秩序的关键。但是,这个时期的拜占廷国家已经不是“帝国”,其重新控制巴尔干半岛的努力也归于失败。

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期间,拜占廷国家面临西方和北方强敌的威胁,特别是刚刚被推翻的拉丁帝国残余势力和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的西欧骑士,千方百计企图复辟。对于立足未稳的拜占廷帝国来说,击溃复辟势力是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当时,复辟势力以西西里王安茹的查理(Charles I of Anjou, 1265—1285年在位)和被废的原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二世(Baldwin II, 1240—1261年在位)为领袖,他们联合对拜占廷末代王朝抱敌对态度的巴尔干国家,如塞尔维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残留在希腊的拉丁人小公国和希腊人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结成反拜占廷帝国同盟^②。经过精心准备,安茹的查理发动了第一次旨在复辟拉丁帝国的十字军,他们从意大利渡海,首先夺取了巴尔干半岛西部近海的科浮岛,准备以此为基地,进攻君士坦丁

^① Louis Brehi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Oxford: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p. 287.

^② D. Geanakoplos, *Emperor Michael Palaeologus and the West, 1258—1282*, Cambridge 1959, chap. 1.

堡^①。为了粉碎查理的阴谋,米哈伊尔八世以主动的外交活动积极应对。他一方面向教廷派遣使节,提出重新开始关于东西方教会统一问题的谈判,表示愿意领导东正教教会服从教皇,以此分化教皇和查理的关系^②。另一方面他主动遣使结好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 1226—1270年在位),并投其所好,馈赠大量希腊古代手稿和文物,同时,以谦卑的姿态请法王仲裁基督教东、西教会之间的争论,从而赢得路易的好感,促使法王出面阻止了其弟查理的东侵计划。

但是,1270年路易九世客死突尼斯使米哈伊尔八世的反复辟计划遭到重大挫折。失去约束的查理和鲍尔温进一步扩大反米哈伊尔八世同盟,将被后者废黜的尼西亚皇帝约翰四世(John IV Laskaris, 1258—1261年在位)^③和遭到米哈伊尔八世迫害的威尼斯人拉入同盟。查理和鲍尔温还结成儿女亲家,以政治联姻巩固同盟的基础。1276年初,全力支持东、西教会和解并与米哈伊尔八世关系密切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Gregory X, 1271—1276年在位)突然去世,更使拜占廷人的艰难处境雪上加霜。新教皇尼古拉斯三世(Nicholas III, 1277—1280年在位)和马丁四世(Martin IV, 1281—1285年在位)是查理的亲信,他们撕毁了1274年在法国里昂达成的东、西教会和解协议,支持并积极参加反米哈伊尔八世同盟^④。教廷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动使米哈伊尔八世必须寻求新的途径瓦解反拜占廷人同盟。他秘密推动与埃及苏丹和西班牙阿拉冈国王进行的谈判,支持阿拉冈国王彼特罗三世(Peter, or Pedro III,

①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I, pp. 594—595.

② W. Norden, *Das Papsttum und Byzanz*, Berlin 1903, p. 468.

③ C. Chapman, *Michael Paleologue restaurateur de l'empire byzantin 1261—82*, Paris 1926, p. 124.

④ W. Norden, *Das Papsttum und Byzanz*, p. 604.

1276—1285年在位)远征西西里,利用“西西里晚祷”^①事件出兵击败查理,使“梦想成为世界君主”的查理不得不放弃发动进军巴尔干半岛的十字军、实现其“夺取君士坦丁堡,占有朱利乌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王国”^②的计划,这就缓解了拜占廷帝国面临的危机,彻底粉碎了西欧拉丁人的复辟阴谋^③。

米哈伊尔八世一方面巧妙地周旋在西欧各种政治宗教势力之间,利用其相互矛盾和利害冲突,达到巩固新王朝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还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大胆开展对东方各国的灵活外交活动,为维护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西亚和东地中海的利益创造有利条件。当时,蒙古西侵大军横扫亚洲大部分地区,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塞尔柱突厥人的罗姆苏丹国。米哈伊尔八世立即遣使与蒙古军队统帅旭烈兀(Hulegu, 1217—1265年)主动结好。为了保持这种友好关系,牵制拜占廷帝国东线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米哈伊尔八世与敌视蒙古人的马木路克王朝(1250—1517年)巧妙周旋,既不对其提出的与拜占廷人结盟的要求作出明确答复,以免引起蒙古人的不满,又不断断回绝埃及人经海峡进入黑海地区的贸易请求^④,以防迅速兴起的马木路克军队对拜占廷帝国用兵。而后,当统治俄罗斯人的金帐汗国汗王别尔克(Berke, 1257—1267年在位)急于建立与马木路克王朝的经济和商业联系,对米

① 西西里人民不堪忍受安茹的查理的残暴统治,1282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在巴勒莫城郊教堂举行晚祷时,当地人民杀死侮辱他们的法国士兵,从而导致西西里全境大规模人民起义。阿拉冈国王彼特罗三世以恢复被查理推翻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在西西里的统治为借口,乘机进军该岛,从而引发了长达13年的战争。Steven Runciman, *The Sicilian Vesp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36—166.

②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ed by Hier Wolfii, Bonnae: Weber 1829—1855, I, p. 123.

③ 有关这一外交活动的细节请参见“米哈伊尔八世自传”(Autobiography of Michael Palaeologus),由格利高里整理,引自《拜占廷研究》,1959—1960年,总字第29—30期,第447—476页。Deno Geanakoplos,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and the Union of Lyons (1274)",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46, No. 2 (Apr., 1953), pp. 79—89.

④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I, p. 101.

哈伊尔八世的外柔内刚的外交计策十分恼火,并派心腹战将诺盖指挥保加利亚人军队进攻拜占廷人之际,米哈伊尔八世审时度势,确认旭烈兀的蒙古军队忙于内战,一时难以构成拜占廷帝国的直接威胁,而化解北方的外敌入侵是当务之急,故立即放弃与蒙古人的友好关系,转而与金帐汗国结好,并将其私生女嫁给诺盖,从而化敌为友,终止了保加利亚军队的进攻计划。进而,他与马木路克王朝和金帐汗国结成同盟,彻底消除了东方的后顾之忧,而将精力全部用于对付西方的威胁。这些外交活动对于稳定拜占廷国家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次十字军战争沉重打击了拜占廷帝国,也切断了巴尔干半岛及其周围地区的传统政治关系。然而,正是由于政治关系的改变,宗教联系比以前更为发展。拜占廷希腊教会在沟通希腊与斯拉夫世界、联系拜占廷人和其他东欧民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3世纪上半叶,罗马教会凭借拉丁帝国的支持,极力将东正教势力排挤出巴尔干半岛。1204年,即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同一年,保加利亚国王卡罗严(Kaloyan)由罗马红衣主教加冕登基,这表明保加利亚教会归属教廷管辖。事实上,保加利亚人对于罗马教廷也充满了疑虑,因为教皇英诺森三世迟迟不正面答复其称帝和建立独立大主教区的请求,而教皇也始终不能原谅并相信伯利斯一世后人的忠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塞尔维亚人中,因为,流亡各地的拜占廷人已经衰落,塞尔维亚人必须寻求新的强权以为保护。1200年,大族番斯蒂芬·奈曼加(Stephen Nemanja)的王位继承人斯蒂芬与其拜占廷公主离婚,而与威尼斯总督丹德罗(Enrico Dandolo)的孙女结婚。面临罗马教会强大的传教攻势,塞尔维亚人也像保加利亚人一样,积极开展与教皇的谈判,提出以塞尔维亚教会服从教廷管辖为条件换取教皇为之加冕。1217年,双方达成协议,教皇特使代表团为斯蒂芬正式加冕^①。甚至连处于蒙古人控制下的俄罗斯人也主动向英诺森三世示好,因为他们幻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66—368页。

想西方十字军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加里西亚君主丹尼尔(Daniel)就主动承认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宗主权,作为这一承认的回报,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53年派遣特使赠送王冠。

这些宗教活动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因为它们大多是为了达成政治联盟或缓和国际关系的权宜之计,而缺少宗教问题的讨论,在所有的谈判和外交信件中,各方对东、西教会关于信仰问题的争论只字不提,天主教和东正教礼仪方面的差异也都搁置一旁。在接受罗马教皇宗主权的东欧君主看来,更为正确可信的神学和信仰上的传统仍然是9世纪以后他们先人已经确定下来的东西,而承认教皇最高权力并不意味着在信仰和神学上放弃斯拉夫人的传统,因此,对他们本民族的教会而言,也没有拒绝东正教大教长的理由。他们甚至认为,即便接受了罗马教会的管辖,自己也拥有政治上的自由,完全可以根据本国的利益,随时加以改变。1205年,保加利亚国王卡罗平就丝毫不考虑宗教因素,在亚得里亚堡战役中彻底击溃拉丁帝国的军队,而此时距离他接受罗马教廷加冕还不到一年。流亡到尼西亚的拜占廷王朝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但是其宗教地位依然为东欧信仰东正教各民族所认可。作为东正教的最高领袖,虽然他随拜占廷帝国政府流亡到尼西亚,但是却因此降低其威信,他仍然被视为东正教合法的领袖,而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大主教一直得不到认可。

正是在这个时期,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等东正教主要教区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流亡尼西亚的拜占廷希腊教会的大教长,或者是出于对既成事实无奈的认可,或者是愿意通过这种认可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支持各地教区的独立发展^①。根据拜占廷希腊教会的一贯做法,东欧各民族教会一直被鼓励使用各自语言宣讲教义和举行宗教仪式,这一点是东正教比罗马天主教具有更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一些学者分析,拜占廷希腊教会此期的政策是与拜占廷流亡政府扩大

^① Alice Gardner, *The Lascarids of Nicea: the Story of an Empire in Exile*, London: Methuen 1912, pp. 213—240.

其正统合法政治权力的政策相一致的^①。如果从东正教发展的历史看,尼西亚时期的拜占廷希腊教会采取的“宽松”政策比罗马教廷的政策更加成功,这种表面的“宽松”增加了东正教的向心力,也奠定了此后东欧东正教世界各民族关系的基础,形成了他们后来处理教会事务的基本模式。换言之,东正教世界的信仰联系比政治联系更密切。1250年,加里西亚的俄罗斯君主丹尼尔派遣本地修道士希利尔(Cyril)前往尼西亚,拜见拜占廷希腊教会大教长,并被后者任命为基辅教区的总主教。他是基辅罗斯公国接受基督教信仰后两个多世纪后,第一位由俄罗斯人担任其独立教会的领袖^②。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由于拜占廷朝廷流亡尼西亚,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同样,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教会也获得了自治权。保加利亚国王伯利尔(Boril,1207—1218年在位)统治时期,重新将本国教会纳入东正教系统,他根据东正教习惯召集本国主教大会,并按照东正教而非罗马教会法规处理伯格米派问题。他的继任国王约翰·阿森(John Asen II,1218—1241年在位)最终宣布脱离罗马教廷管辖,解除教皇对保加利亚教会的任何权力,而重新归属东正教。1235年,阿森与尼西亚的拜占廷朝廷缔结协议,从名义上正式承认拜占廷东正教大教长的最高地位,而保加利亚教会也从此获得独立教会的地位。应该说,拜占廷人当时的政治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而皇帝约翰三世也希望通过宗教上的让步换取保加利亚人的支持,以壮大巴尔干半岛各国反拉丁人统治的联合阵线,同时,他还希望借助保加利亚人的力量削弱伊庇鲁斯希腊人的力量,以稳固其对拜占廷人反拉丁人势力的领导权。塞尔维亚人的情况与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大体相同,也是在同一时期获得了宗教上的独立自主。其教会于1217年从名义上正式归属罗马教廷,但在实际上仍然保持奥赫里德大主教区的管辖权,后者当时处于拜占廷皇室后裔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控制范围。塞尔维亚王国奈曼加王朝的出家王子萨瓦于1208年应其兄斯蒂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40.

② Alice Gardner, *The Lascarids of Nicea: the Story of an Empire in Exile*, pp. 242—250.

芬国王的请求,从阿索斯圣地修道院回国,劝说斯蒂芬改变亲罗马教廷的政策。在说服了斯蒂芬国王后,他于1217年返回阿索斯圣地修道院^①。两年后,在斯蒂芬国王的安排下,他访问了尼西亚,拜见了皇帝和大教长,获得后者支持,应允他建立塞尔维亚独立教会,以摆脱奥赫里德大主教区的管辖。皇帝塞奥多利支持这一要求的目的显然还在于削弱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的宗教影响。此后,萨瓦多次访问尼西亚,并致力于建立塞尔维亚教会工作,在王室的直接支持下,茨查成为塞尔维亚独立教会的首府,他建立的多所学校培养了大量塞尔维亚教会神职人员。

尼西亚的拜占廷教会在连续承认巴尔干半岛及其周围地区教会独立自主的同时,只强调承认其在东正教中最高地位这一点。1235年,为了使各地教会已经承认的事实变为制度,拜占廷教会大教长要求他们在举行宗教庆典仪式时应该首先提及他的名字。这个看似简单易行的要求,后来产生了深远的结果,直到今天,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大教长仍然保持着其在东正教中的最高地位。拜占廷东正教大教长作为整个东正教的精神领袖,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一种超脱世俗政治的性质,即使到13世纪后半叶,这种特殊的精神作用使其影响不断扩大,甚至扩展到多瑙河以北地区,罗马尼亚的部分教会也纳入了东正教范畴。在拜占廷帝国衰亡以后,这种作用更加突出。

拜占廷国家衰落时期的巴尔干半岛除了东正教维系着宗教统一外,局势动荡不定。拜占廷人虽然自视帝国,但是采取的活动基本上是弱国外交,使得半岛成为群雄逐鹿的舞台。拜占廷经济基础的全面崩溃和国力资源的全面枯竭,致使国家极度衰弱,使去了坚持以往帝国外交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国势衰弱是拜占廷末代王朝外交屡屡受挫的最主要原因。早期拜占廷帝国经历长期动荡确立的军区制是成功的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它有效地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危机,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66页。

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区自身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军区制使拜占廷军队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和财政保证,使拜占廷兵源世代不绝,并由于下级官兵自备武器、装备和粮草,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拜占廷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公元9、10世纪的年收入达58.4万金镑^①,为拜占廷历史上最高水平。正是这种强大的经济后盾使拜占廷人能够或靠武力或靠财力从事帝国外交。但是,10世纪末军区制的解体和以农兵为中心的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和迅速破产^②,以及11世纪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和12世纪军区制被彻底取消^③,对晚期拜占廷经济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一方面,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的消失使国家丧失了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土地税、人头税和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另一方面,军区制瓦解促使形势恶化,使拜占廷国际贸易迅速萎缩,对国家财政是最后的致命打击。学者们估计,晚期拜占廷帝国年收入只是军区制发展最完善时期的年收入的1/40^④。极为衰弱的拜占廷国家,既缺乏从事大国外交的经济实力,又没有维持小国外交的财力,因此,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1370年初,约翰五世因为缺少必要的金钱而使其以数年游说西方、千方百计达成的救援君士坦丁堡的协议在最后一刻化为泡影,并因无力偿还债务,受到传讯,被扣押在威尼斯达一年之久^⑤。土耳其人更是借口拜占廷不能按外交协议交纳贡赋而在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1453年,拜占廷人甚至因为不能支付匈牙利火器工匠乌尔班(Urban)足够的报酬,使他帮助土耳其人铸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

①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London: U. P. 1933, p. 96.

② Paul Lemerle,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Twelfth Century*, Ireland: Galway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10—240.

③ 乔治·奥斯特洛格夫斯基:《拜占廷帝国》,第368页。

④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p. 96.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I, p. 101. S.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83—91.

⑤ Louis Brehi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p. 321.

炮,土耳其军队因此装备了攻陷君士坦丁堡最关键的火器。

中古时代大国外交最重要的基础是军事实力。而军事因素是影响拜占廷人外交活动成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拜占廷帝国地处东地中海战略要地,为东、西方交往的结合部,长期成为兵家争夺之地。可以说,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军队的发展对于其生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区制曾使国家军事化,地方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战斗力明显提高。现代拜占廷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廷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①。军区制衰落以后,拜占廷军队一蹶不振,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雇佣兵逐步取代了农兵。雇佣兵不仅是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是晚期拜占廷动荡衰弱的重要因素。正因为缺乏国家武装力量作为外交活动的后盾,拜占廷的许多外交成果不能得到巩固。例如,1396年,巴尔干各国组成反土同盟,联合反击土军的扩张,并将粉碎土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封锁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之一,但是,曼努埃尔二世却未能提供一兵一卒配合这次行动。使土军获得胜利后将近半个世纪,巴尔干国家反土同盟再次遭到同样的失败,而拜占廷人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为自救作出任何贡献,错失了最后的机会。当数十万土耳其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面对的仅是数千拜占廷人组成的守城部队。

上述经济军事因素直接导致拜占廷国家的政治分裂,这对末代王朝的外交活动具有深刻的消极影响。在晚期拜占廷帝国,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势力对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有些军区将军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公元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构成晚期拜占廷政治生活的主线。13世纪以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86页。

后,拉丁帝国时期引进的西欧封建制加剧了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的混乱局面^①,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兵临首都城下,推翻当朝皇帝,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坎塔库震努斯自立为皇帝即是其中典型代表^②。各地军事贵族拥兵自重,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为了保全自己,极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相互厮杀之能事,使朝廷的军机要务和外交政策无法施行。与世俗贵族起着同样恶劣作用的教会贵族一方面无耻地搜刮财富,将国家仅存的金钱变为教产,另一方面对国家政务指手划脚,横加干涉,稍不满意,便煽动骚乱,制造社会动荡。当国家危亡在即之时,教会上层仍然不顾民族利益,反对东、西教会和解;在土军破城之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们宁可将金银埋在地下也不肯支援政府用于购买武器。作为约翰八世外交重要成果的“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就是由于教会的反对而流产,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公开宣称“宁可在都城内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意看到顶着三重教冠的拉丁人统治”^③。混乱的政治环境也产生平庸的统治阶层,人们注意到包括拜占廷皇帝在内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治家们普遍短视无能,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当时的皇帝、显贵、高官、将领,都对巴尔干半岛、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在外交活动中采取了许多短视行为,外交政策忽左忽右。他们不是将政策的重心放在整顿朝纲和内政改革方面,不是把外交确立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并使之为加强国力服务。以该朝最有作为的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为例,他的外交活动可谓活跃,但是其活动大多出于权宜之计,仅为应付迫在眉睫的威胁,对复兴国家力量毫无帮助。由于他们不能清醒地认识本国国情和周围世

① R. L. Wolff, *Studies in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U. P. 1976, pp. 45—56.

② D. M. Nicol, *The Byzantine Family of Kantakouzenos*, Washington, D. C. 1968, pp. 35—103.

③ Michael Duc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XXV.

界的形势,因此做了不少“不可为而为之事”,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外交措施。例如他们不能正确估计本国民众对罗马天主教反感的情绪和西欧各国内部动荡、无心东顾的局势,因此在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中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的精力太多,浪费的时间太长,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同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趋势和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扩张的政策,“精明的”约翰六世就是在对自己外交失误的悔恨和世人的唾骂中病逝的。

总之,巴尔干半岛在13世纪期间处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原有的民族构成与分布被打乱,政治力量的平衡被打破。占据巴尔干半岛中心地位的是软弱的拉丁帝国,它不仅没有实力将半岛各地区重新组织起来,相反引发更严重的分裂。因为,拉丁帝国是按照西欧中古封建制推行其政治经济“权力”的,在这种“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我的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制度下,拜占廷帝国式的中央集权荡然无存。而在目的各不相同、利益差异极大的西欧封建骑士中,拉丁帝国的皇帝原本就是最弱的一个,这是胜利后各路十字军将领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这对各级封建主最有利。此外,拉丁人(巴尔干半岛民族对西欧人的统称)进入巴尔干半岛中心地区,将拜占廷希腊人驱逐到半岛周围地区,伊庇鲁斯、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和特拉布宗聚集着拜占廷皇室和贵族,原本处于拜占廷人控制下的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因此获得了自由,阿尔巴尼亚地区和罗马尼亚地区大量山地少数民族也纷纷获得了独立。这些民族政治实体,相互较量,力图从混乱的巴尔干局势中为各自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生存空间。从此,巴尔干半岛再无宁日,其分裂状态使之再也无力为维护共同利益联合起来,抵御外来入侵。进而,当奥斯曼土耳其人侵入巴尔干半岛时,他们无力反抗,逐一束手臣服。如果说,现当代巴尔干半岛是“火药桶”的话,那么第四次十字军骑士就是打造它的第一批工匠。

第九章 土耳其人

第一节 早期土耳其人

巴尔干半岛地处欧亚两大洲结合部,与亚洲仅一水之隔,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形成的自然界线,自古以来就没有阻挡住两大洲之间的频繁往来,也没有成为阻遏其密切关系的屏障。而黑海沿岸特别是北岸直到多瑙河下游地区更为人员与物产交流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因此,考察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就不能不注意西亚和中亚的历史,而这里的游牧民族也确实对半岛历史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人(或称突厥人、塞尔柱人)自古就是不同民族和文化融合的人群,其祖先由蒙古人和突厥人构成,活动的区域分布在亚洲草原的大部分地带。“以政治史术语说,552年突厥可汗布民起义,推翻柔然帝国,标志着突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在这之前突厥人是柔然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①。最早与巴尔干地区发生联系的土耳其人是558年来自中亚地区的土耳其使节,他们访问了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据文献记载,他们自称国土辽阔,活动的范围从蒙古直到里海西岸^②。他们访问拜占廷人的原因是,突厥人内部各部落发生了冲突,其中一个被称为“阿瓦尔”(Avars)的部落遭到中亚地区更为强大的突厥部落的攻击,被迫从草原地带向西迁徙进入高加索山区。在西进途中,他们首先与高

① D. 西诺:“突厥帝国”,《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276页。

② 相关细节可参考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加索北部的阿兰人(Alans)发生冲突,被迫继续迁徙到俄罗斯南部草原,成为当地的游牧民族。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和考古文物史料,人们至今对他们迁徙的原因知之甚少,目前已经得出的结论也大多为推测。这里,笔者也斗胆提出一种推测,以为同人参考。

工业时代以前的古代(包括上古中古),人类生活方式主要有两种,即从植物采集中发展出来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和从动物驯养中发展出来的游牧方式,这意味着人类凭借不断发展的智力驯化了部分自然生存能力较弱的动物和植物,它们需要人类的“指导”和“保护”才能使种群不灭,而人类则从它们那里获得更稳定的生活资料^①。由于采用游牧和农耕两种方式的人类,形成了与自然环境不同的关系,并因其从自然资源中索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不同,决定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游牧民族利用的是土地“表层资源”,即草场,而农耕民族利用的是土地“浅层资源”,即农田。前者通过放牧牲畜将杂草转化为人类可以食用的动物蛋白,而后者通过犁耕土地和选育高产植物生产碳水化合物供人类食用。前者满足单个人生存需求的“表层”自然资源的面积比后者的需求大得多,而且脆弱得多。正是这种脆弱性造成了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草场自然生态状况直接决定了游牧民族的生存状况,持续不断的生存危机造成了他们总是不断扩大被视为“财富”的畜群数量。与之相比较,农耕方式从土地“浅层”自然资源获得生活资料更稳定,一者是因为植物的驯化远比动物的驯化更容易,被驯化的植物种类更多,二者农耕方式获得土地资源蕴涵的能量比游牧方式更易保存,干燥的种子和果实比肉和奶保存的时间长得多。这使得农耕民族普遍能将多余的产品转化为“财富”。特别重要的是,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决定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他们不断放弃固定的剩余产品,而被迫不断将“财富”转化为畜群。特别是流动生活直接限制了人类智能的发展,而这在农耕的定居生活中却形成了巨大的优势。

^① 有关分析可见陈志强:“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29—139页。

两种方式在“财富”积累的速度和方向上的区别又导致两者社会文化发展的种种差距。在农耕方式为主的民族中出现了比例相当高的“闲散”人群,其中智商较高的部分人因此有可能在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创造“文明”,特别是在开发、占有、利用、分配资源方面发展人类的智能。而在游牧方式为主的民族中“闲散人”的比例大为降低,其文明程度普遍低于农耕民族的原因主要在于此。农耕民族从自然资源中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或称劳动生产率,比游牧民族高得多。今天大气物理学研究告诉人们的有关气候周期性变化的知识,使我们了解了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同样变化^①。这种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对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大于农耕民族。在气候条件有利于植物生长的环境中,畜群数量的急剧增长也带动了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直接加剧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和生活消费总量上升的矛盾。于是在游牧民族中出现了争夺牧场和水源(地区霸权即是由对资源控制权转化而来)的内部战争,部落之间毁灭性的杀戮以及由此形成的其他“原始的”“残暴的”社会风俗因此长期保留。而当内部杀戮这种“自然性质”的人口平衡方式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时,对外战争便爆发了。这就是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一直不断爆发游牧民族“冲击”农耕民族、游牧世界不断“主动侵入”农耕世界的主要原因^②。

从这一观点思考我们的问题,可以推测,在公元4、5世纪曾经发生过大范围的气候变动,导致全球范围环境的变迁。脆弱的游牧民族首先感受到资源不足的压力,自然水源和良好的草场大量减少,牲畜持续死亡,畜群也随之缩小,各个部落被迫转移,寻求新的草场。在流动中,

^① 气候专家指出:气候“是自然界环境中的一个极为活跃的组成部分。这是由于气候在各环境成分中变化最大,至今人类了解最少,又缺乏有效控制手段的一部分”。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② 吴于廑先生对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作出了准确的定义,并将前工业时代游牧对农耕世界的入侵总结为“三次历时长久的迁徙和冲击浪潮”,可惜他没有涉及任何资源和环境的内容。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6页。

必然爆发为争夺草场或水源的部落战争。这种战争常常以极端的方式,即敌对部落灭绝为结果,而不会或极少出现双方和解的结果。于是,在生死存亡的选择上,弱小或失败的部落被迫迁徙。换言之,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不足的压力将部落之间的战争转化为民族对外扩张。阿瓦尔人的迁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只是还需要更丰富、多层面、多角度、多学科提供资料进行论证。当时,阿瓦尔人的使节觐见皇帝查士丁尼后,提出的要求主要是土地和消费物资,可见他们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不足。当然,拜占廷人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这种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也关系到拜占廷人的生存问题,所以查士丁尼和他的外交官对阿瓦尔人提出的年贡和领土要求避而不答,只是用礼物、款待和空洞的允诺进行搪塞。即便如此,当时的拜占廷知识分子还是感到不满意。普罗柯比认为,罗马人民的钱财“都被查士丁尼很快耗尽了,或是慷慨地赠送给蛮族;……它们还在查士丁尼活着的时候就被查士丁尼挥霍光了”^①。

最初一批突厥人作为拜占廷帝国的盟友在西进过程中,先后征服了斯科拉文尼人、安特人、库特里格斯人和乌提格人,561年,进入多瑙河下游多布罗加地区。由于双方利益的直接冲突,原来盟友变为敌人。568年,大约是同样的原因,另一支中亚突厥人部落的使节到访君士坦丁堡,他们代表汗王西尔兹布尔(Silzibul)向查士丁二世皇帝(Justin II,年在位)提出结盟的请求,希望以此保证通过其所在的西亚地区的丝绸之路贸易。当时,古老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其东段大体位于今天我国西部地区,从帕米尔山口到幼发拉底河的中段和继续向西直到拜占廷帝国境内的西段,路途艰难,沿途常受到土匪强盗袭击。土耳其人各部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带来的利益也经常发生冲突,他们都希望通过控制这条发财之路增强实力。早在查士丁一世皇帝(Justinian I, 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人就曾通过切断丝绸供

^① 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y*, tran. By H. B. Dew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xi, 7—8, xix, 6—7.

应对拜占廷人施加经济贸易压力,迫使拜占廷人从红海寻找出海航路,开辟新的丝绸贸易通道。波斯人一直利用提高过境贸易关税的方式获利或制裁敌对国家,因此不仅与拜占廷人而且也与中亚地区的突厥人发生严重对抗。在对付波斯人垄断丝绸贸易的共同利益推动下,拜占廷人和西亚突厥人部落达成了军事联盟协议,当时的拜占廷作家梅南德(Menander)对此记载:“突厥人国家就是这样成为了罗马人的朋友”^①。根据学者的研究表明,访问拜占廷人的突厥人是活动在今天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巴尔喀什湖南部沙漠地带的突厥人,他们可能控制着丝绸之路的北路东段。这条路线从我国天山北出俄罗斯草原,经过巴尔喀什湖、伊犁河流域、锡尔河,至咸海北岸,或经喷赤河、阿姆河,至咸海南岸,这两条线在里海北岸的乌拉尔河口汇合,继续沿里海西进,再经高加索到黑海东南岸特拉布宗及北岸地区,由此可以绕过波斯,进入拜占廷首都。由于这条路线分割了波斯人垄断的丝绸贸易利益,故常常受到波斯人的攻击。“突厥人通过自己的征服,此时控制了通向西方的大部分商路,他们的臣民索格底亚那人更使他们如虎添翼,从而希望从以前被吠哒人控制的丝绸贸易中牟取利益。……与丝绸的重要消费国拜占廷建立直接联系”^②。而维护丝绸之路北线符合拜占廷人和突厥人的利益,因此在此后数年间,双方外交往来频繁,仅拜占廷皇帝就在大约8年间向突厥人派遣了7次以上的使节,几乎每年都有正式外交联系。

576年,拜占廷帝国与突厥人的关系突然恶化,这一年,由瓦伦提努斯(Valentinus)率领的拜占廷使团在突厥汗王的宫廷上遭到公开的指责和嘲讽。继任西尔兹布尔的汗王吐尔克撒什(Tourxath)愤怒地指责说:“你们就是那些会说十种花言巧语但都是一种谎话的罗马人吗?”他把双手手指塞到嘴里,接着比划说:“就像我把十指都放在嘴里,你们就是这样说十种花言巧语,但是你们就想和我的那些阿瓦尔人奴隶一起骗

① Menander,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ed. C. de Boor, Berlin 1903, I, p. 452.

② D. 西诺:“突厥帝国”,《中亚文明史》,第280—281页。

我。你们用你们那些狡诈的言辞和反复无常的鬼点子,当面溜须拍马,欺骗所有民族,而对那些被你们设计牟利而陷入悲惨境地的人毫不关心。……你们的皇帝必须向我解释清楚他的行径,他一边对我大谈友谊,同时又一边和从其主人那里逃走的奴隶阿瓦尔人结盟。……嘿!罗马人,你们为什么总是让我的使节在前往拜占廷城时翻越高加索山脉,还告诉我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你们这样做还希望我会忍耐,以为我对罗马人领土一无所知吧。告诉你们,我非常清楚第聂伯河和多瑙河流到哪里去,也清楚梅里奇河。我对你们的势力范围也不是不了解,因为从日出到西界的天下都在我的掌控之中”^①。拜占廷使节面对狂怒的汗王无言以对,战栗而退。同年,突厥人军队从里海沿岸向西进攻,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横扫克里米亚半岛。

梅南德的这段记载和后来发生的突厥人西侵事件至少说明了以下问题。首先,汗王吐尔克撒什对拜占廷人与阿瓦尔人的关系感到恼火,他对拜占廷人与阿瓦尔人订立和约耿耿于怀,因为阿瓦尔人就是被征服后成为突厥人的奴隶,最终远涉他乡以免受奴役甚至灭绝之难。事实上,这表明由于地域相距遥远,突厥人对巴尔干半岛局势理解出现了偏差,或者说,他们不了解巴尔干半岛当时发生的重大形势变动。这一时期,阿瓦尔人在南下色雷斯平原的计划受挫之后,取代向西南迁徙的伦巴第人(Lombards)控制了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平原,并向周边地区扩张,先击败格庇德人(Gepids),后于568年占领了整个潘诺尼亚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最终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多瑙河下游地区。这种新变化使他们成为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前线最主要的敌人,并导致此后30年期间两国战争不断。574年,也就是在拜占廷使节出访突厥汗王以前两年,拜占廷人与阿瓦尔汗王柏严(Bayan)达成的停战协议是两国战争的产物,是阿瓦尔军队围攻多瑙河中游战略要地西尔缪姆城久攻不下后双方不得已议和的结果,它和拜占廷—突厥联盟的性质

^① 梅南德的相关记载可能依据拜占廷使节的报告。Menander,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pp. 205—206.

完全不同。其次,突厥人认为其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受到拜占廷人的欺骗,因为拜占廷人总是引导他们翻越高加索山脉,到克里木半岛后从车绳坐船去拜占廷都城,似乎拜占廷人隐瞒小亚细亚的路线。表面上看,汗王吐尔克撒什说的有理,但是,仔细考察这两条路线的地形地貌和拜占廷人对两地的利用程度看,这又是一个误解。突厥人控制的北线商路一般是从里海北岸的乌拉尔河河口出发,其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最近路线就是通过高加索山脉西部,过刻赤海峡进入克里米亚地区的拜占廷港口城市车绳。对于拥有黑海霸权的拜占廷人而言,从车绳沿黑海西海岸航行到首都远比其他路线方便舒适。而如果按照突厥人提出的从小亚细亚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方案,则不仅有翻山越岭的劳顿之苦,而且沿途多土匪强盗袭击。与海路相比,陆路旅行还绕了大圈,前者大体沿北纬47度线直行,而后者则从北纬47度绕道42度,且沿途要翻越高加索山脉中部最高点、东黑海山脉和阿纳多利亚高原群山。总之,拜占廷人认为最好的路线被突厥人误视为险途。这两点误解看似偶然,实乃必然。除了两国相距遥远,信息不畅,相互了解多为一知半解模糊不清外,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导致误解的重要原因。在拜占廷人这种崇尚智慧善玩权谋的国度里,人们也许认为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是合理的,而在突厥人的原始游牧部落国家中,诚信忠实讲求义气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准则,而且是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则。难怪汗王吐尔克撒什首先愤怒指责拜占廷人欺骗,他声称“对突厥人来说,撒谎真是荒诞不经,不是人干的事”^①。而拜占廷使节却是一头雾水,不明白突厥君主发脾气的原因。当他们向皇帝汇报事件经过和在朝廷上分析原因时,也把双方关系破裂的责任归结为野蛮人的无知粗俗和崇尚蛮力,这在梅南德和其他拜占廷人的作品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可见,在古代国际交往中,自然阻隔造成的相互误解是极为突出的,而文化差异又促使误解转变为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战争,拜占廷人自鸣得意的外交手

^① Menander,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I, p. 205.

段和策略在其他民族中早已臭名昭著,使原本就缺少的对话沟通,在古代君主普遍存在的自傲独尊情绪下转变为一种民族对立、敌视和仇恨。

本书对拜占廷—突厥关系详加分析的原因在于,这一关系直接影响着拜占廷—亚洲民族关系以及巴尔干半岛局势的发展。当时控制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拜占廷人、阿瓦尔人和保加利亚人都与中亚民族有各种联系,其中拜占廷人的关注点主要在丝绸贸易上,即如何保持这种对于拜占廷统治阶层宫廷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的供应,如何维持其合理的价格^①。这种纯粹经济利益的动因也造成拜占廷人缺乏更长远的外交战略,使他们不能充分利用突厥人这一似乎远隔千山万水的强大势力,牵制其邻近的亚洲对手,如波斯人和后来的阿拉伯人,进而取得对巴尔干半岛有利的外部环境。6世纪70年代初以后的巴尔干半岛形势混乱,阿瓦尔军队围攻西尔缪姆城和斯拉夫人的大举侵入使拜占廷帝国不得不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而无暇顾及突厥部落的联盟关系。在阵脚大乱的情形中,行棋的步骤和谋略全都被打乱,特别是在查士丁尼一世以后的几个低能棋手的控制下,满盘皆输是必然的。实际上,如果拜占廷帝国的外交高手直接向突厥人求援,做出请求他们援助对付阿瓦尔人的姿态,就不仅可以化解突厥人的疑虑,也可以保持与突厥人的盟友关系,进而对波斯人形成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因为当时突厥人控制着威海、里海北岸直到高加索山脉的广大地区,构成波斯人的北方威胁。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从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的基督教化事例中,人们还是可以大胆推测,如果当时在位的拜占廷皇帝是一位具有洞察力的君主,如果仍然有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大教长像弗条斯一样热衷传教事业的话,那么拜占廷人就不会轻易放弃“远交近攻”的策略,也会在突厥人中取得类似于在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中取得的成

^① R. S. Lopez, *Byzantium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78, pp. 35—56. Xinru Liu, *Silk and Religion. An Exploration of Material Life and the Thought of People A. D. 600—1200*,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99—208.

就。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大约就在同一时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在突厥人中迅速扩大影响,特别是在呼喇珊、阿富汗、撒马尔罕地区建立了稳定的教区,后来其传教士进入我国,在唐朝都城长安发展了大量教徒^①。

错失良机的拜占廷人此后不断遭受巴尔干半岛突厥人后裔的折磨,阿瓦尔人乘拜占廷人忙于波斯战争之机与斯拉夫人联合作战,入侵巴尔干半岛内地,使半岛陷入巨大的动荡达百年之久。阿瓦尔人在法兰克人、摩拉维亚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攻击下衰落以后,拜占廷人就很少与突厥人交往了,直到伊斯兰教在亚洲征服了大部分民族,新兴的突厥人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并威胁巴尔干半岛时,他们才再度碰面,但此时双方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第二节 哈扎尔人

581—587年,拜占廷人从突厥人手中重新夺取被占领的领土,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和黑海沿岸又恢复了和平。而后,拜占廷帝国再度向北发展势力,重新控制了克里米亚地区,这里是拜占廷人对俄罗斯草原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流的通道,意义十分重要。654年,罗马主教马丁(Martin)被皇帝流放到克里米亚的车绳,次年病死该地。他对当地生活的记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其中特别提到当地许多消费物资直接来自拜占廷帝国中心地区,比如面包就从君士坦丁堡运进,其他消费品也多从黑海南部港口泊来,价格自然十分昂贵,可以想象物质

^① 我国古籍中所称“大秦”“景教”即聂斯脱利派,起源于5世纪基督教的神学争论,因其倡导者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名字而得名,431年被宗教大会确定为异端。该派后得到波斯国王的保护,遂使其势力迅速发展,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亚,唐初传入我国。1994年底,教皇宣布取消对其异端判决。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

生活的匮乏。就是这一地区在7世纪末遭到哈扎尔人(Khazars)人侵^①,他们在695—711年间控制该地区的北部,迫使拜占廷人为继续维持对南部城市的控制权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外交活动,其影响直接关系到巴尔干半岛北部前线的战争发展进程和半岛东部海域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安全。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哈扎尔人也属于突厥民族的一个部落,6世纪末出现在高加索山脉以北的草原地带,附属于中亚突厥人国家,其最初的处境大约与阿瓦尔人类似,很可能是不堪忍受突厥汗王的压榨歧视而举族向西迁徙。他们首先进入顿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和林区,由于摆脱了突厥人的统治,因此实力发展迅速,并凭借不断壮大的军事力量加速西进。也是在西迁过程中,哈扎尔人形成了国家,并建都伏尔加河下游的伊提尔城。新的哈扎尔人国家已经摆脱了血缘关系作为唯一纽带的原始部落社会结构,逐渐过渡成为由多民族构成的社会,除了哈扎尔人外,还包括高加索部落民、犹太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由于他们控制着丝绸之路的北线和里海以及俄罗斯平原多条大河河道,因此从过境贸易中获利丰厚,更增强了经济实力。也正是由于哈扎尔人国家日益强大,在高加索山脉北方形成了阻遏阿拉伯军事扩展的屏障。同时,也是由于哈扎尔人在俄罗斯南部平原的发展,才使黑海北岸地区成为影响巴尔干半岛形势的特殊地带。

谈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简单叙述拜占廷帝国发生的宫廷政变。7世纪末,拜占廷帝国伊拉克略王朝末代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 685—695、705—711年在位)被希腊军区“将军”^②利昂提奥斯(Leontios, 695—698年在位)发动的军事叛乱推翻,削鼻流放到克里米亚地区的偏远边城。为了重新夺回皇帝宝座,他在当地拉拢哈扎尔人策划阴谋。

^① 哈扎尔人(Khazars)或被翻译为卡扎尔人,《哈扎尔词典》原文为 Le Dictionnaire Khazar。参见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南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拜占廷帝国实行“军区制”以后,按照军队编制重新组建政府机构,军区的最高首脑为“将军”。

但是,阴谋泄露,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新皇帝提比略二世(Tiberios II, 698—705年在位)皇宫后,后者下令刺杀查士丁尼。仓皇逃命到当地哥特人残余要塞的查士丁尼立即致信哈扎尔人汗王,请求庇护。控制克里米亚大部分地区的汗王希望利用他扩大势力,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而且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并将刻赤海峡东侧的费奥多西亚城分封给他定居^①。为了实现自己复辟的梦想,查士丁尼二世按照查士丁尼一世妻子的名字,将她改名为塞奥多拉,并为未来的“皇后”施洗信仰基督教。拜占廷朝廷深感不安,遂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以重金贿赂哈扎尔人汗王,请诛杀流亡皇帝或将其引渡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二世从塞奥多拉处获悉其兄与拜占廷皇帝勾结准备动手的消息后,立即逃亡到多瑙河下游的多布罗加地区,在刚刚入主该地的保加利亚汗王特耳维尔(Tervel, 691/704—718年)帮助下,进攻君士坦丁堡,最终取得胜利,恢复皇权,而后对篡位者大肆屠杀。为了报复车绳流放地对他的虐待,查士丁尼二世先后多次派军远征克里米亚。第一次远征就对车绳人进行了大屠杀,而第二次远征导致车绳大起义,克里米亚半岛各城市联合抵抗查士丁尼二世,并联合自立为皇帝的亚美尼亚人巴尔达尼斯(Armenian Bardanes)共同进攻查士丁尼二世。最终,当他派出第三次远征舰队平毁车绳城市,杀光车绳居民时,哈扎尔人汗王转而支持巴尔达尼斯,后者率领拒绝执行皇帝命令的舰队反攻君士坦丁堡。711年,查士丁尼二世再度被君士坦丁堡人民起义推翻,巴尔达尼斯胜利入城,夺取皇帝宝座。新皇帝改名为腓力皮克斯(Philippikos, 711—713年在位)。在这一系列关系巴尔干半岛和拜占廷帝国安危的角逐中,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哈扎尔人汗王均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拜占廷皇帝们疯狂血腥的内讧期间,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哈扎尔人乘机扩大了势力范围,特别是在查士丁尼二世多次远征克里米亚半岛南部各城市期间,当地居民被迫寻求哈扎尔人的

^①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vol. II, p. 358.

援助,接受其统治。695年以后大约10年,车绳由哈扎尔人汗王派官员进行管理,而半岛地区残余的哥特人也成为哈扎尔人汗王的臣民。这样,拜占廷帝国在黑海北部的商业贸易据点和领地因查士丁尼二世的“传奇冒险”而丧失,直到711年以后,才逐渐被拜占廷人收回,双方在半岛的势力划分重新恢复到695年以前的状态。

在哈扎尔人控制的高加索山脉北部地区,汗王重兵把守的要道成功地抵挡了极具扩张能力的阿拉伯军队,双方在控制山脉所形成的自然疆界中进行了百余年的较量。737年,控制黑海和里海之间地区的古太白曾越高加索山脉,企图征服哈扎尔人。古太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希沙木(724—743年在位)治下的倭马亚王朝的军事将领,虽然他一度击败了哈扎尔人,但是最终被驱逐到高加索山脉南部地区。军事上的失利还伴随宗教传播上的受挫,当地的哈扎尔人在举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大辩论后,最终选择了犹太教^①。大约在同一时期,阿拉伯海军对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遭到了彻底失败,另一支阿拉伯军队在法兰克王国南部的波亚迭战役中也遭到查理·马特致命的打击。西方学者从欧洲人的角度分析问题,对拜占廷人和法兰克人的胜利均给予高度评价,却忽视了哈扎尔人的历史贡献,奥伯林斯基就此评价说:“哈扎尔人据守高加索山脉的成就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假定他们失败了,那么毫无疑问,伊斯兰军队就将出现在顿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地区。人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其对拜占廷和俄罗斯历史产生的后果了”^②。

抵抗阿拉伯军事扩张的共同利益是拜占廷人和哈扎尔人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原因。在8、9世纪期间,两大国基本上维持着友好往来,对于双方在克里米亚偶尔发生的争执也多采取和解的方式。733年,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 717—741年在位)积极促成了其子君士坦丁与汗王女儿之间的婚姻。婚后的汗王之女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取名为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上册,第243页。

②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72.

伊琳尼(Irene),意为和平,并将哈扎尔人习惯的服装介绍给拜占廷人。由于这种服装更适合寒冷环境和骑马作战,因此迅速在巴尔干地区和拜占廷人中流行起来。哈扎尔人与拜占廷人的友好关系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根据拜占廷《礼仪书》记载,哈扎尔人汗王在非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中排列在第二位,仅次于伊斯兰教哈里发^①。

拜占廷人的传教活动早在5世纪就开始了,但是其在哈扎尔人中的活动则是在其他宗教进入这个地区后才真正受到拜占廷统治阶层的注意。大约在737年前后,哈扎尔人汗王开始接触伊斯兰教信仰。事实上,伊斯兰教随阿拉伯军队扩张步伐推进到小亚细亚地区,只是当时激烈的军事对抗掩盖了传教活动。当拜占廷人将阿拉伯水师阻挡在君士坦丁堡城外时,倭马亚王朝就企图从高加索方向打开通往欧洲的道路。在阿拉伯军事行动的同时,伊斯兰教的阿訇也在哈扎尔人中进行传教活动。为了从战略上防止阿拉伯人从黑海北岸对巴尔干半岛的威胁,拜占廷人加快了基督教传教的步伐。根据文献记载,拜占廷人在克里米亚地区建立的教会可以上溯到4世纪,当时,基督教教士主要活动在哥特人中间。6世纪期间,特别是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阶段,克里米亚地区教会的势力得到发展。到8世纪,随着拜占廷人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基督教组织进一步发展,兹西亚和阿巴斯吉亚教区主教扩大了他们在哈扎尔人中的活动。由于得到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直接指导和资助,基督教在哈扎尔人地区城乡扎下根。格鲁吉亚古代文献表明,当地有许多城市和农村的全体居民都先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客观分析8世纪拜占廷基督教教士在黑海东、北沿岸特别活跃的原因,可能主要不是拜占廷人的战略意图,而是毁坏圣像运动的结果。

毁坏圣像运动是八九世纪在拜占廷帝国爆发的教、俗统治集团借口禁止使用圣像或崇拜圣像而开展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斗争。在这段被称为“毁坏圣像时代”的百余年间^②,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有大批教士流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ceremoniis*, ii, 48.

^②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234.

亡拜占廷帝国边远地区。这场运动自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 717—741年在位)于726年夏季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为开端,至公元843年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842—867年在位)统治时期,摄政皇后塞奥多拉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为止,持续了117年。我们所讨论的时期正当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一阶段,当时,利奥三世发布的毁坏圣像法令引发了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的有关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730年,利奥三世召开宗教大会,撤换了反对毁坏圣像的大教长日耳曼努斯(Germanus),代之以拥护毁坏圣像的大教长阿纳斯塔修斯(Anastathius),并制定了有关的宗教法规,揭开了宗教迫害的序幕。此后,宗教迫害的范围持续扩大,手段越来越残酷,大量圣像艺术品被焚毁,教堂内的圣像壁画被清除,一些拒绝服从的高级教职人员被处死,修道院被关闭,反对派教会财产被没收,修士修女被强迫还俗。宗教迫害使许多坚持崇拜圣像的教士纷纷离开京城和其他大城市,逃往意大利南部、小亚细亚南部、塞浦路斯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黑海北岸。后者包括克里米亚半岛、车绳,特别是兹西亚和阿巴斯吉亚教区,它们成为仓促出逃者的重要庇护地。在这里,逃亡教士受到不同程度的欢迎,他们又建立了一批修道院,成为基督教和拜占廷传统在黑海北部的据点。车绳、哥特人定居区的教士与流亡的教士大多持崇拜圣像的观点,因此他们在拜占廷中心区大肆破坏基督教艺术的同时,坚持绘画圣像,尤其是在哥特人定居区,形成了崇拜圣像派别的中心,而约翰(St. John of Gothia)主教则成为抵制朝廷毁坏圣像的重要领袖,领导着君士坦丁堡、格鲁吉亚、耶路撒冷的反对派教士^①。

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测,在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一阶段,拜占廷朝廷似乎没有意图阻止反对派教士流亡黑海北部和东部地区,甚至有意利用这些教士扩大拜占廷帝国的宗教政治影响,达到君士坦丁堡的外交目

^① 约翰后来因反对信奉犹太教的哈扎尔汗王发动起义,失败后乘船逃到阿马斯特里,病死它乡。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174.

标。一份流传至今的拜占廷古籍中就保留着隶属于多罗斯主教区的哥特教区主教名单,其中有八名为当地教会的负责人^①。这些地区在这一时期都属于哈扎尔人控制区,其范围大体从克里米亚半岛山区多罗斯(今辛菲罗波尔附近)向东,直到伏尔加河下游的伊提尔,后者即哈扎尔人的首都,北从伊提尔向南直到里海西海岸,南边到达库班河谷,这样就包括了直到刻赤海峡东部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既有如同多罗斯、伊提尔和塔马塔尔查这样的城市,也包括广大的农村地区,混居着芬兰乌戈尔人、残存的哥特人、匈奴人。

但是,最后进入这一地区的犹太教似乎获得了哈扎尔人君主的青睐。有证据表明,拜占廷基督教在当地的的活动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犹太教^②。中世纪犹太教文献记载,哈扎尔人接受犹太教信仰一事即发生在730—740年间,而现代学者认为这一年代还应向后推移半个世纪,文献记载的8世纪中期可能是犹太教刚刚开始进入该地区的年代,哈扎尔人需要一定时间对各种宗教进行对比和选择,最终确定接受犹太教。无论如何,哈扎尔人在8世纪改变其原始信仰萨满教而接受犹太教有其深刻的原因^③,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因素是,当时的哈扎尔人正在寻求独立,包括信仰上的独立,哈扎尔人统治阶层对于曾经长期统治欺压本民族的突厥人必定十分仇恨,正像突厥汗王吐尔克撒什对阿瓦尔人的仇恨一样,为了彻底摆脱突厥人的影响,他们放弃萨满教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该地区早已存在的基督教,哈扎尔人也有理由加以拒绝,因为,接受基督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接受拜占廷帝国的政治

^① Herwig Wolfram, *History of the Goth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56—67.

^② 犹太教在多瑙河和黑海北方地区传播的故事长期流传,著名的《哈扎尔辞典》显然取材这些传说。参见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南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273页。

^③ 萨满教是满—通古斯语族的氏族部落原始宗教,因其神职人员“萨满”而得名。该教各族间无共同经典、神祇名称和统一组织,只是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各族萨满的主要职责与巫师相似。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4—645页。

权力,类似的疑虑也曾出现在保加利亚人中。而且,基督教教派林立,争辩不休也是哈扎尔难以接受的因素。同样,哈扎尔人放弃已经接触和初步信仰的伊斯兰教同样出于对丧失独立性的担忧,他们不想成为哈里发的附属国。而接受犹太教不存在上述危险,又可以实现其政治独立的计划。当然,哈扎尔人接受的犹太教与严格正统犹太教是有区别的,这里不做详细分析^①。哈扎尔人重点接受的是其律法和礼仪部分。

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哈扎尔人与拜占廷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9世纪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区发生了新的变化后,两国关系因共同利益而得到了加强。俄罗斯南部地区的变化主要指来自北欧的瓦兰吉亚人(Valangians)和来自中亚的马扎尔人(Magyars)进入哈扎尔人控制区,甚至挺进巴尔干半岛地区。根据最早的俄罗斯人古籍《往年纪事》的记载,大约在859年,“来自海外的瓦兰吉亚人”,向当地分散居住的斯拉夫人和其他部落征收贡赋,迫使东斯拉夫人于862年一度“把瓦兰吉亚人驱逐到海外,不再向他们交纳贡赋,同时开始自己对自己的管辖。他们彼此之间再无正义可言,各个氏族相互争雄,内讧不休,战乱频仍。他们相互商议:‘我们为自己寻求个王公吧,由他来治理我们,根据法律裁决(我们的纠纷)。’……这些人也(称为罗斯人)。……来到斯拉夫人这里。长兄留里克坐镇诺夫哥罗德,……正是由于这些瓦兰吉亚人的缘故,才出现了‘罗斯国家’这个名称。诺夫哥罗德人指的是出身于瓦兰吉亚氏族的(诺夫哥罗德市民),而(诺夫哥罗德市民)以前指的是斯拉夫人。……留里克独自掌握一切权力……(罗斯人)全都受

^① 民间传说也证实哈扎尔人保持其政治独立的真实愿望,“这是因为犹太人身后既没有哈里发和他扬起绿帆的舰队,也没有希腊拜占廷皇帝和他头盔上竖着尖十字的军队。哲学家君士坦丁身后有长矛和骑兵,而在犹太教拉比身后,只有一件做礼拜时穿的无袖外套”。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第67页。犹太教为犹太人信仰的宗教,为古代世界的一种民族宗教,信仰唯一真神雅赫维,后随犹太人传播世界各地。其经典主要为《圣经》,公元2—8世纪形成了由历代律法书构成的多种《塔木德》,其内容涉及犹太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第998—999页。

着留里克的统治”^①。879年留里克去世后,瓦兰吉亚人继续统治诺夫哥罗德,并南下第聂伯河,占领基辅,建立留里克王朝统治下的基辅公国。这个公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瓦兰吉亚人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罗斯国家。他们占领的地区就是哈扎尔人国家的一部分。

正是在瓦兰吉亚人南下扩张期间,哈扎尔—拜占廷关系得到加强。833年,哈扎尔汗王派遣特使晋见拜占廷皇帝塞奥非鲁斯(Theophilus, 829—842在位),请求后者帮助他们在顿河下游地区建筑防御要塞。当时拜占廷人也担心与之长期作战的阿拉伯人从高加索山脉向黑海北岸发展,进而从多瑙河方向威胁拜占廷帝国,因此塞奥非鲁斯立即指派高官彼特罗纳斯·卡马特鲁斯(Petronas Camaterus)带领大批建筑师和工匠,在一支拜占廷舰队保护下前往车绳,而后经亚速海到顿河流域。他们按照汗王的要求,在顿河下游左岸建立了砖石结构的沙尔克要塞。彼特罗纳斯·卡马特鲁斯在施工期间,根据皇帝的要求仔细考察了车绳的政治形势和面临的军事威胁。在其上奏报告中,他认为当地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由当地贵族选举出的地方官员在瓦兰吉亚人入侵的压力下有可能脱离拜占廷帝国的控制,进而威胁拜占廷人在黑海的利益和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因此,他建议在克里米亚建立军区,恢复拜占廷帝国的权力。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皇帝的批准,组建了车绳军区,任命彼特罗纳斯·卡马特鲁斯为军区首脑,管辖整个克里米亚地区的军政事务,控制所有地方官吏,并直接对皇帝负责^②。

车绳军区的建立对于完善拜占廷帝国北方防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重新确立了拜占廷帝国在黑海北岸的军事据点,将拜占廷帝国的防线向北扩展,在黑海北部建立了第一道防御屏障。这使从东地中海经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到黑海的拜占廷海上防御线得到完善,加强了北部水师的防区。其次,它使拜占廷黑海水师可以获得前哨陆地支援,

① 《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5页。

② Paul S. Galtsoff, "Seasonal Migrations of Mackerel in the Black Sea", *Ecology*, vol. 5, No. 1 (Jan., 1924), pp. 1—5.

从而将黑海重新纳入拜占廷人的掌控之中。事实上,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海上实力强于陆上实力的国家,其军事优势建立在水师基础上。车绳军区的建立与其他沿海军区一样,承袭了古代希腊人海军的优良传统,在防御体系中,可以通过水上交通相互支援,并保持大体相似的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再者,拜占廷人掌握的秘密新式武器“希腊火”更便于在海战中发挥作用。除了军事方面的作用外,拜占廷人重新加强对车绳的控制也有利于拜占廷人对当地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以及扩大其宗教文化传统。

巴尔干半岛的安全是与其周围的水域为依托的,在 11 世纪末西欧大规模移民运动(包括十字军东侵和西西里王国东侵以及威尼斯商业战争)开始以前,半岛地区面临的入侵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而上述自东地中海到黑海的水域以及多瑙河形成了阻挡入侵的自然屏障。哈扎尔人的沙尔克要塞和车绳军区的建立使两大强国完善了双方的防务战略结合点,也使两国的合作有了更实际的内容。车绳军区的辖区与哈扎尔人在顿河下游的防务体系连接,符合两国共同防范新兴的瓦兰吉亚人入侵。为了加强双方的合作,860 年底,皇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842—867 年在位)派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 826/7—869 年)和麦瑟迪乌斯(Methodios, 819—885 年)出使哈扎尔汗国,这是他们在完成对斯拉夫人传教以前担负的重大外交使命。他们率领的庞大使团沿黑海传统航线首先到车绳首府,在此停留过冬,到次年春夏之际。停留期间,君士坦丁加紧准备宫廷辩论所必需的希伯来语知识和思考应答汗王问题的方案。君士坦丁使团在高加索山脉北麓特雷克河(Terek)下游汗王设在德本特的行宫拜见了哈扎尔人汗王,并就汗王提出的神学问题与犹太教拉比展开辩论,应答对汗王朝廷影响极大的拉比主动提出的挑衅。可以理解的是,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希望得到汗王支持的竞争中,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犹太教必然极力排挤其他宗教。君士坦丁使团在汗王的朝廷上与穆斯林阿訇和犹太教拉比进行激烈的神学辩论,其雄辩的口才和慎密的逻辑思维受到广泛赞誉,

也为之赢得了巨大的名声^①。这次外交活动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汗王在给米哈伊尔三世的信中称:“我们都是朋友,也是你们帝国的盟友,随时准备在您需要我们的地方为您服务”^②。大约在860年,瓦兰吉亚人(或称罗斯人)船队首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是因暴风雨而失败。可能在此之前,瓦兰吉亚人曾进攻了哈扎尔人的部分地区,迫使后者的部分居民迁出基辅地区,哈扎尔人的西线边界也退后到伏尔加河下游。在抗击瓦兰吉亚人的过程中,拜占廷人和哈扎尔人进行了充分的合作。

然而,拜占廷人认为十分可靠的盟友哈扎尔人在正式接受犹太教以后不久即开始衰落,10世纪前半期,这个曾经十分强大的民族神秘地消失在历史舞台上,以至后代学者产生了许多离奇的推测。事实上,哈扎尔人是在新的外来原始游牧民族两面夹击下消亡的,其部分居民西迁到多瑙河北岸,部分居民与其他外来民族融合。在这个地区,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罗斯国家和来自中亚的潘臣涅格人。为了保持黑海北岸地区和高加索山区的战略平衡,拜占廷人转而注意与这些新兴的原始部落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根据10世纪初拜占廷教会在这—地区地方主教名单分析,拜占廷人的势力在罗斯人、阿兰人(Alans)和潘臣涅格人的挤压下,不断向沿海地区收缩,克里米亚的车绳教区放弃了大部分辖区,只管辖半岛南部,而黑海东北沿岸地区也逐渐脱离拜占廷人的控制。这意味着巴尔干半岛北方第一道防线的崩坏,从此,其中心区又直接面临罗斯人的攻击威胁。

第三节 潘臣涅格人

潘臣涅格人(Pechenegs)也属于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曾长期活

^① 关于这次辩论,拜占廷史料和犹太教史料记载不同,民间传说也有区别,有关情况参见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第63—68,237—243页。

^② F. Dvornik, *The Makin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49, p. 375.

动在突厥汗国的西部地区,很早便与地中海民族有过接触^①。9世纪下半叶,潘臣涅格人在其他突厥部落的攻击下向西迁徙,进入哈扎尔人占据的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北部地区,并在10世纪上半叶由此扩展到伏尔加河和顿河下游地区。拜占廷人对新兴的潘臣涅格人的了解首先是因为他们侵入克里米亚地区,威胁车绳军区的安全。

为了维持拜占廷帝国在黑海的利益,拜占廷朝廷制定了与潘臣涅格人结盟的外交政策。当时,巴尔干半岛北部形势发生变化,927年保加利亚国王西蒙去世后,半岛两大国之间结束了对立状态,恢复了地区和平。拜占廷人利用其娴熟的外交手段化解了北方新兴民族的进攻,特别注意进行传教外交工作。10世纪上半叶,传教外交工作在潘臣涅格和马扎尔人中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写道:“我因此坚信,罗马人的皇帝只要牢记与潘臣涅格人国家保持和平,并订立友好协定和协议,每年向他们派遣我方的外交使团,赠以他们喜欢和适合那个国家的礼物,就会始终占有巨大的优势。”^②根据他的记载,人们知道这一时期两个民族的交往频繁而稳定。涉及平时的贸易或人力支援等日常事务,都由当地车绳军区的官员作为拜占廷帝国的代表与潘臣涅格人谈判安排,而涉及重大的军事援助和高规格外交活动则由朝廷派出的使团进行谈判。拜占廷人的使团都由高级贵族官吏或著名学者教士带队,携带皇帝的信件从首都出发,或走水路经车绳前往潘臣涅格人首府,或双方代表在多瑙河三角洲地带会面。拜占廷皇帝和车绳军区官员都深刻地认识到与潘臣涅格人结好的重要性,因此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君士坦丁七世明确指出:潘臣涅格人“愿意为罗马皇帝和车绳官员在罗斯人、哈扎尔人和兹西亚和阿巴斯吉亚教区的事务服务”,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因此可以得到回报,包括拜占廷人制造的奢侈品和

^① M. Edith Durham, *Some Tribal Laws, Origins, and Customs of the Balkan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8, pp. 100—140. Antal Bartha, *Hungarian Society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rans by K. Balaz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75, pp. 123—133.

^②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 40, p. 178.

部分国际贸易的商品,例如“预先支付的报酬,……裁成一块块的紫色布料、丝带、宽大的针织服装、金丝织锦、胡椒等香料、深红色的帕提亚皮革,以及其它他们喜爱的物品”,他甚至对这些野蛮人贪求无厌的欲望感到厌恶^①。物质交流直接促进了潘臣涅格人对拜占廷人的了解,特别是高质量的舒适的生活吸引了许多潘臣涅格人每年自愿到君士坦丁堡充当人质,他们的生活和临时住宿由拜占廷朝廷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安排。

然而,潘臣涅格人社会发展缓慢,长期处于分散的部落生活。他们与拜占廷人保持的友好关系也大多建立在索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基础上,因此,这种关系常常是不稳定的。尽管拜占廷人每年定期派遣使团出访或在帝国城市里接待潘臣涅格人,但是,这样的交往似乎更加刺激了他们的物质欲望,索取奢侈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他们面临更加强大的外族攻击时,也会在物质享受和生存安全中首先选择后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与拜占廷人订立的联盟。例如,965年前后,罗斯大公爵维雅托斯拉夫进犯巴尔干半岛时率领的万人军队中就有潘臣涅格人,当“斯维雅托斯拉夫一路战斗,一路破坏城镇,向首都挺进”,攻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时,潘臣涅格人丝毫不顾及与拜占廷人的友好关系,参与了对城郊农村的大肆破坏^②。至于拜占廷人为什么没有对潘臣涅格人进行基督教传教工作,可能主要因为拜占廷人当时忙于应付罗斯人的进攻,同时,他们刚刚遭受了对哈扎尔人传教的失败,其中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对突厥民族的传教经验和基础。原始部落居民尚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各个部落的原始神祇各不相同,接受基督教信仰也有相当的难度。据11世纪初前往潘臣涅格人中活动的德意志传教士记述,这些游牧民族非常粗野,风俗极为强悍,只讲武力,不受神的约束。潘臣涅格人后来逐渐融合在俄罗斯南部民族中。

11世纪初以后,潘臣涅格人开始大举西迁,对巴尔干地区进行不定

①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ch. 6, p. 52.

② Leo Ciaconus, *Historiae*, vi, 10, ed. B. G. Niebuhr, Bonn 1828, p. 104—5.

期抢劫。这一时期,拜占廷人还控制着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因为在约翰一世到瓦西里二世期间,拜占廷军队在征服保加利亚人的同时,完善了北方地区军事防御体系,这些军事堡垒同时发挥着镇压人民起义的作用。近年来,罗马尼亚考古学家在多瑙河下游图尔恰县的考古发掘也证明潘臣涅格人入侵造成半岛军事形势的变动,因为原来于10世纪末修复或重建在多瑙河三角洲地区的海军基地,在11世纪初以后大多改建为陆地要塞,这反映出11世纪初半岛北方迎来了新一轮游牧民族的入侵^①。其中,潘臣涅格人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

1034年,潘臣涅格人成为巴尔干半岛威胁最大最急迫的入侵者。但是,拜占廷人还能够据守多瑙河下游军事据点,但是到了1047年,拜占廷军队开始放弃部分难以防守的地区。这样就打开了巴尔干半岛东部防御大门,潘臣涅格人开始定期从多布罗加地区南下,洗劫色雷斯平原,甚至曾到达君士坦丁堡近郊。为了防御这些抢了就跑的草原游牧部落,拜占廷人再次使用其挑拨离间的外交手段。皇帝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允许潘臣涅格人两大部落中的科根(Kegen)酋长率领其族人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地区,并将拜占廷军队把守的三个位于多瑙河南地区的要塞交给科根部落,条件是抵抗另一个名叫提拉赫(Tyrach)酋长领导的部落。为了从政治上控制前者,皇帝授予他贵族称号,并指派修道士欧塞谬斯(Euthymius)为他施洗。而当这两个部落自相残杀打得不可开交时,拜占廷人又邀请提拉赫访问君士坦丁堡,允许其部落定居在科根部落西部,并给他加封官职,施行洗礼,提拉赫也如同科根一样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北方官吏^②。

但是,拜占廷人尚未从潘臣涅格人事务中摆脱出来时,另外一支游

① Spiridon G. Focas, *The Lower Danube River, In the southeastern Europe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plex from antiquity to the conference of Belgrade of 1948*, tran. By Rozeta J. Me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pp. 34—54.

② Jadran Ferluga, *Byzantium on the Balkans*, Adlf M. Hakkert Publisher, Amsterdam 1976, pp. 238—245.

牧部落乌寨斯人(Uzes)侵入巴尔干半岛。他们原为中亚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与塞尔柱人有亲缘关系,由于受到突厥库曼人(Kumans)压力而西迁,进入黑海北部地区,渡过伏尔加河。10世纪末时,他们与潘臣涅格人同时进入多瑙河北部,侵袭多瑙河中下游地区。1064年,乌寨斯人渡过多瑙河侵入拜占廷帝国领土,横扫保加利亚人地区,兵临塞萨洛尼基城下,据记载其人数达60万。但是,乌寨斯人受到瘟疫袭击,部落中疾病流行,更由于当地居民坚壁清野躲入山区,使他们缺少食物,实力迅速瓦解。拜占廷人和保加利亚人以及潘臣涅格人趁机对分散的乌寨斯人发动攻击,最终使之消失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舞台上。其残余居民或加入拜占廷军队和基辅罗斯军队,或融合在相同血缘的潘臣涅格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躲避在荒山野岭以开垦荒地为生。在拜占廷史料中,乌寨斯人一直作为拜占廷军队中服役的士兵,直到11世纪末才逐渐消失。

第四节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本只是突厥人的一个小部落,与其很多前辈同胞一样从中亚迁徙到小亚细亚地区。在西迁过程中,土耳其人逐步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在阿拉伯人的影响下摆脱了原本信仰的佛教和其他宗教,按照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原则建立了最初的中央集权制度,但还仍然保留突厥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是在迁徙过程中,他们不断与沿途接触的其他民族,如拜占廷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融合,逐步形成了有特点的独立民族。它将伊斯兰教圣战的精神与其原有的好战传统结合起来,并“在这种宗教精神的鼓舞下,突厥人通过武力征服了小亚细亚”^①。公元11世纪中期,他们所属的乌古斯和土库曼人各部落大举向西迁徙,逐步定居在日益衰落的拜占廷帝国控制下的小亚细亚地区。

^① 黄维民:《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据说,这次大迁徙的总人数达到200万。“阿拉伯人在亚洲的残余势力被塞尔柱突厥人急风暴雨般横扫而光,而此前拜占廷人征服的辉煌战绩相比之下黯然失色。他们征服了波斯领土,席卷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夺取了哈里发首都巴格达。……很快,塞尔柱突厥人就占据了上自拜占廷帝国边界下至埃及法蒂玛哈里发国家边界的整个近东地区。而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拜占廷帝国。……帝国内政的虚弱和其防务体系的崩溃,意味着通往拜占廷帝国重要腹地省区的道路洞开”^①。

1068年,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迪奥格尼斯(1068—1071年在位)发动反击塞尔柱突厥人的军事行动,为此,他千方百计招募了一支由潘臣涅格人、乌寨斯人、诺曼人和法兰克人组成的外族雇佣兵军队。他在1068年和1069年的两次战役中,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此后就遭到失败。1071年8月19日,双方在凡湖附近的亚美尼亚重镇曼兹克特展开决战,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拜占廷军队由于构成复杂纪律松弛,被阿尔普·阿斯兰麾下的突厥军队全歼,皇帝本人被俘^②。罗曼努斯四世作为战俘,与突厥人谈判,设法达成和约,得到允诺释放他,条件是他必须支付年贡和150万第纳尔的赎金,并释放突厥战俘,提供军援。这次战役的结果彻底改变了小亚细亚的政治格局,使塞尔柱突厥人稳定地立足该地区,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拜占廷帝国的掘墓人。

拜占廷帝国持续衰落,1204年首都失陷于第四次十字军骑士,虽然1261年重新恢复对该城的控制,但是其衰亡之势已定,气数已尽。“这座京城从此再也没从1204年的洗劫恢复过来,传到米哈伊尔(八世)手上时破败不堪;最为精美富丽堂皇的建筑好像刚刚被洗劫过;各个教堂里珍贵的装饰神器被抢劫一空,布莱赫奈皇宫被完全摧毁,这里自科穆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287页。

^② Alfred Friendly, *The Dreadful Day: The Battle of Manzikert, 1071*, London, Hutchinson, and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1., pp. 114—123.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356.

宁朝以后曾一直是皇室驻地,并一直以其绚丽多彩的装饰和镶嵌画令外国人瞠目结舌;一个当时的希腊人说,那里面由于拉丁皇帝们的寻欢作乐而‘充满了意大利人的乌烟瘴气’,根本无法住人”^①。

如果认真考察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人们可以找到多种原因,半岛各国抵抗力量缺乏统一指挥,各种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巴尔干半岛传统秩序主要维护者的拜占廷人缺乏远见,一错再错,终酿大祸。由于拜占廷末代王朝治理无方,军事实力大为下降,其外交政策屡犯错误,国家的外交活动没有成为强化内部改革的补充,也没有为加强国力提供外部条件,而只是他们苟延残喘的权宜之计。在该王朝统治的近200年期间,统治者或者无意或者不能推行任何富国强兵的措施,甚至连在尼西亚流亡期间实行的军事和土地改革也被废止了^②。从米哈伊尔八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历代君主仅仅利用外交活动应急,从而错过了自救的时机,堵塞了从内部解决边防问题的可能性。该王朝一度推行的亲土耳其人政策使新兴的土耳其人顺利发展,其外交政策之养虺成蛇、养虎贻患的错误非常明显。

早在13世纪时,拜占廷人完全有能力清除侵入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人,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尤为严重的是拜占廷朝野贵族在内战中将凶猛彪悍的土耳其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雇佣兵,极大地促进了土耳其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正是由于该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势力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他们崛起过程中未遭遇巴尔干半岛各小国那种相互牵制、难于发展的环境。该王朝的亲土政策更为土耳其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借口,使后者大肆扩张,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拜占廷人对土耳其军事淫威的屈服也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活动被合法化。在土耳其人发

^① George Pachymeris, *De Michaele Palaeologo*, II, 31, from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I, p. 581.

^② M. Angold, *The Byzantine Government in Exile*, Oxford 1975, chp. 3—6.

展期间,拜占廷人一味乞求西欧人的援助,他们对西欧国家的游说和对教皇的争取工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成果,但是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约翰五世、曼努埃尔二世和约翰八世先后访问西欧国家,短则数月,长则数年^①。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土耳其人发展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恶化的半岛形势和错误的外交活动互为因果,形成了这个时期巴尔干半岛国际关系的恶性循环。拜占廷国家的经济危机始于12世纪军区制彻底瓦解的时期,至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阶段,国家的税收几乎不能保证,国库所存无几,政治分裂造成的中央直属领地的迅速缩小使国家财源和人力资源趋于枯竭。该王朝推行的外交政策非但无助于国内形势的改善,反而促使财政经济进一步恶化。拜占廷人在外交活动中动辄割让土地,使国土资源急剧萎缩,如1298年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被塞尔维亚人击败后,割让大片被占领土给国王米鲁廷(Stefan Uros II Milutin, 1282—1321年在位)^②。1302、1308、1331和1355年拜占廷人多次割让土地,以换取与土耳其人的暂时和平,特别是拜占廷人割让色雷斯、加拉大等对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导致国家丧失了最后的自救资源,以至到1423年帕列奥列格王朝将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卖给威尼斯后^③,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首都城内少许工商税收勉强度日。他们还通过出让经济权利断绝了最后一点经济来源。1267年米哈伊尔八世许可热那亚人在首都近郊的加拉大建立商业特区,次年又出让该区全部商业特权,使拜占廷国际贸易的优势完全丧失^④。1351年约翰六世因使用土军作战耗尽国库最后的金钱,不得不以没收教产的方法支付军饷^⑤。从约翰五世到约翰八世统治期间,拜占廷人与土耳其人

①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London 1972, p. 309.

②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p. 120.

③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p. 333—334.

④ D. J. Geanakopols, *Emperor Michael Palaeologus and the West*, Cambridge 1959, pp. 213—216.

⑤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p. 240—241.

签署的协议大多包括纳贡的内容,从而使土耳其人榨干了对手最后的油水。

错误的外交活动还加剧了国家的政治分裂。晚期拜占廷王朝政治极为动荡,几次大规模内战中,几乎都有土耳其人参与。1383年至1387年,土耳其军队利用拜占廷人外交失误夺取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后^①,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每一步扩张几乎都有合法的理由和外交上的借口,直到他们完成了对整个拜占廷国家陆海领地的征服占领,包围和封锁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社会分裂和国家解体的趋势在巴尔干半岛地区表现的极为明显。晚期拜占廷国家政治上的分裂是以其社会全面解体为背景的,其明显表现在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教会内部斗争激化。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于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标志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分裂。这一分裂在拜占廷帝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各阶层支持东正教的立场,特别是罗马教会支持的拉丁帝国统治被推翻后,东、西教会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帕列奥列格王朝于1273年签署“里昂教会和解令”,一经公布,立即在君士坦丁堡掀起轩然大波,大教长约瑟芬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而支持“统一”的拜库斯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教会上层的对立两派^②。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活动将教会上层的分裂推广到教会基层,并进而推广到整个社会。当土耳其军队兵临城下、团团围困了君士坦丁堡、准备发动最后攻击时,拜占廷教士们还在圣索菲亚教堂里喋喋不休地争论“统一和分裂”问题,一些主教甚至公开宣扬宁可欢迎伊斯兰教也不要天主教,社会解体的程度非常严重。

拜占廷国家的衰落导致巴尔干半岛传统政治秩序的崩坏,半岛陷入混乱局面。作为半岛传统秩序的维护者,拜占廷国家丧失了控制能力,自身也卷入无休止的争权夺利的角逐。巴尔干半岛各国之间的斗

^①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p. 288.

^② J. Barker, *Manuel II Palaeologus (1391—1425)*, New York 1979, pp. 218—238.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pp. 61—62.

争还与各国内部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局面极为复杂。特别是拜占廷贵族集团的内讧加剧了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恶化。

为了获得一党一族的私利,拜占廷人完全丧失民族自尊,采取了“有奶便是娘”的外交政策,随时准备投靠任何强大的外族力量。就此而言,拜占廷人远比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表现糟糕。约翰五世(John V, 1341—1391年在位)在位时期,拜占廷外交政策就呈现从利用土耳其人向依赖土耳其人政策的转变。1341年6月15日,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kos III, 1328—1341年在位)去世,其九岁之子约翰五世即位,由母后安娜摄政。数月后,爆发了争夺宫廷最高权力的斗争,进而演化成为全面的内战,这对恢复巴尔干半岛正常秩序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这场内战的双方是同名约翰,即皇室血亲约翰五世和国丈约翰六世,“两约翰之战”持续了七年。在此期间,交战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向周围强大的邻国求援。约翰五世的保护人皇后安娜寻求保加利亚军队的帮助,而约翰六世则投靠土耳其人。当时,势力迅速发展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小亚细亚地区,正在寻找进入欧洲的机会,约翰六世的请求恰好为之提供了正当的理由。1345年至1356年间,土耳其人在约翰六世的邀请和支持下先后五次对巴尔干半岛大规模增兵。为了巩固其傀儡皇帝的地位,约翰六世还将亲生女儿许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乌尔罕(Orkhan, 1326—1362年在位)^①。

约翰五世一方也是如此。他们在西欧人的帮助下击败约翰六世,因此,在其恢复帝位的初期,对西方国家充满幻想。1366年和1369年,约翰五世前往匈牙利和罗马,企图说服西方君主再次发动援助东方基督徒的十字军,但结果使他大为失望。他们不仅没有响应他的求救的呼吁,反而大敲其竹杠。威尼斯人以其赖帐为借口将他扣押在威尼斯,直到其子以大笔赎金将他赎回^②。1371年,直接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巴尔干各国结成反土联盟,在梅里奇河右岸与土军进行决战,结果被凶猛

① A. Amaky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Athens 1947, pp. 162—197.

② J. Barker, *Manuel II Palaeologus*, pp. 1—18.

彪悍的土耳其人击败。这一仗使约翰五世彻底丧失了抵抗土耳其人的斗志,他认为阻止奥斯曼土耳其人势力的扩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放弃亲西方政策,步约翰六世的后尘,积极主动、低三下四地讨好土耳其苏丹,缴钱纳贡,送交人质,甘心情愿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①。

拜占廷末代王朝唯土耳其马首是瞻,听命于苏丹的指挥,将本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命运交给了强大的新兴的土耳其国家。1354年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扼守海峡的加里波利要塞城墙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人乘机占领该城。约翰六世深知此城的重要性,因此提出以大笔赎金和另一座城市交换加里波利城。但是,苏丹乌尔罕在收取了金钱后宣称他不能放弃真主赐予的东西,并拒绝会见约翰六世,使其岳父受尽屈辱。约翰五世控制政权后,作为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的“皇帝”,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令只有服从一途可走。他不仅通过与土耳其人苏丹订立条约的形式使后者对色雷斯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还不得不接受他们将首都从小亚细亚地区迁入巴尔干地区的事实,继而,他曲意迎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支持土耳其人逐个灭亡了波斯尼亚、瓦兰吉亚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国家。1374年,约翰五世和其它巴尔干国家一样,正式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并将次子曼努埃尔送入苏丹宫中作为人质。也是在苏丹的命令下,他将长子安德罗尼库斯和孙子约翰的眼睛刺瞎^②。

自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 1391—1425年在位)于1391年成为皇帝直至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半个多世纪,帕列奥列格王朝在土耳其人的步步进逼下,又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拜占廷皇帝不断以各种形式乞求西欧国家的救援,他们不计成果,坚持不懈,直到最终灭亡。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扫清了占领君士坦丁堡

^①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ed by Hier Wolfii, Bonnae: Weber 1829—1855, II, p. 342.

^② J. Barker, *Manuel II Palaeologus*, pp. 18—36.

的一切障碍,完成了灭亡拜占廷帝国的准备工作。新苏丹巴耶札德(Bayezid, 1389—1402年在位)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后,组建起庞大的舰队,控制了爱琴海,使拜占廷人龟缩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成为孤岛上的绝望者。在此背景下,曼努埃尔二世只能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西欧国家。他先是请求威尼斯人向被封锁的首都运送粮食,以缓解城中发生的饥荒^①,而后,向包括教皇、法、英、阿拉冈、威尼斯在内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求援。虽然各国口头上表示同情,但大多开出空头支票,只有俄罗斯人支援些许金钱和法国人派来1200人的骑兵,这些援助对于挽救拜占廷帝国危急形势如同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于是,曼努埃尔二世在法国将军布希考特的陪同和保护下前往西欧进行了为期三年半的游说活动,但是得到的几乎全部是空洞的承诺。

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 1425—1449年在位)也先后访问过威尼斯、匈牙利和米兰,费时一年。1438年,他率领包括东正教大教长约瑟芬二世在内的希腊教会代表团再赴西欧,参加教皇主持召开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签署“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以图换取教皇尤基尼乌斯(Eugenius IV, 1431—1447年在位)发动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1444年,匈牙利国王弗拉迪斯拉夫(Vladislav III Jagello, 1434—1444年在位)统率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军队组成的十字军与土耳其军队决战,在瓦尔纳战役中遭到重创,全军毁灭,弗拉迪斯拉夫阵亡^②。这是东欧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扩张和挽救拜占廷帝国的最后尝试。此后,约翰八世停止了外交努力,听凭命运之神的摆布,消极等待最终的末日。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1449—1453年在位)在位的四年中,尽其所能,进行最后抵抗,并向西欧各国发出绝望的求救,直到战死沙场。

① Michael Dukas, *Hizantiou*, Bone 1850, p. 50, (Greek).

② Duc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75, 20—277, 15.

显然,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形势的变化完全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而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活动和巴尔干各国的抵抗,随着当时西亚和欧洲、乃至国际形势发展的变化完全丧失了主动权。1402年土军在安卡拉战役中遭到蒙古军队致命打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迅即瓦解,这给了拜占廷人自救的机会,但苟且偷生的心理使他们没有抓住这一机遇,最终被土耳其人征服。

奥斯曼土耳其人首先征服了保加利亚人。沙皇阿森二世统治时期是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最强盛的阶段,曾控制了半岛大部分地区,他自豪地宣称:“我,约翰·阿森,虔诚信仰基督上帝的沙皇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出征发动讨伐罗马人的战争,打败希腊军队,俘虏皇帝主子塞奥多利·科穆宁本人及其所有贵族。我还占领了从亚得里亚堡到迪拉修姆的所有土地,征服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①,他还自称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沙皇”。但是,在土耳其人强大攻势下,保加利亚人丧失了抵抗的斗志。1371年和1389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梅里奇河战役和科索沃波尔杰战役中大败塞尔维亚人,而后大举入侵保加利亚。1393年7月17日,苏丹巴耶札德一世率军占领保加利亚首都特尔诺沃,标志着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灭亡。此后,土耳其人攻城掠地,占领了保加利亚全境,并使保加利亚人臣服了五个世纪。

而后,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征服战中遭遇到真正强大对手塞尔维亚人。斯蒂芬·杜珊统治时期的塞尔维亚国家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由于拜占廷人忙于内战和保加利亚人彻底衰败,其实际控制的领土范围包括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1355年斯蒂芬·杜珊去世,

^①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43. 历史家乔治(George Acropolites)在描述阿森时说:“他从不挥舞刀剑敌视自己的人民,也不像先前保加利亚君主曾做的那样屠杀拜占廷人以玷污自己。正因为如此,他不仅受到保加利亚人而且也受到拜占廷人和其他民族的爱戴。……他是野蛮人中最好的一位”。George Acropolites, *Historia*, ed. A. Heisenberg, Leipzig 1903, pp. 43, 64.

使塞尔维亚人的“伟大理想”在接近实现的最后关头受挫^①。塞尔维亚国家此后迅速瓦解,各地贵族纷纷独立,形成了众多的小国。这就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355年,杜珊之子斯蒂芬·乌罗斯(Stephan Uros V, 1355—1371年在位)即位,无力处理复杂的宫廷斗争,任凭各地贵族凭借军事实力称霸一方,在原来统一的塞尔维亚王国领土上出现了扎赫鲁米亚、扎塔、塞尔里斯等独立小国^②。在与土耳其人艰苦的斗争中,各个独立割据势力无力抵抗,只有扎塔国家在反抗土耳其征服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最终屈服^③。1371年,在梅里奇河战役失败后,塞尔维亚人就承认了土耳其人的宗主地位,其领地被土耳其人吞并。

罗马尼亚人在14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巴尔干半岛人民抵抗土耳其军事征服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这个时期的拜占廷人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包括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内的巴尔干半岛大部分民族国家先后屈服于土耳其人的军事压力,因此,多瑙河以北的匈牙利人担负起领导抵抗战争的领导责任。1396年,作为匈牙利王国的邻国瓦兰吉亚的君主老米尔西亚参加了匈牙利国王西吉蒙特(Sigismund)领导的反土战争。特兰西瓦尼亚山区天才将领约翰·洪亚迪(John Hunyadi)与国王西吉蒙特一起,在战争的初期给土耳其人以沉重打击,他们领导基督教国家军队在塞尔维亚重创土军^④。1396年,西吉蒙特在多瑙河流域的尼科堡被土军击溃,1444年,约翰·洪亚迪的军队

① 一些学者分析个中原因时指出,塞尔维亚人强于陆军而弱于水军,这是他们无法取代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霸主地位的主要因素,正如在他以前的多位斯拉夫铁腕领袖败于此一样。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p. 256.

②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xv, 1, vol. ii, p. 747.

③ 14世纪期间,扎塔国家更名为蒙特内哥罗(Montenegro),1444年巴尔什奇家族统治结束,出现了克尔诺杰维奇(Crnojevici)王朝,并承认了威尼斯的保护权,不久在土耳其人的军事压力下成为后者的藩属国。

④ Joseph Held, *Hunyadi: Legend and Re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 P. 1985, pp. 34—56.

也遭败绩。1462年,穆罕默德二世在全面清除了拜占廷人抵抗力量后,亲自率军侵入瓦兰吉亚,征服了多瑙河流域居民。但是,其北扩的步伐遭到摩尔多瓦人的顽强阻挡,摩尔多瓦君主伟大的斯蒂芬(Stephen the Great,?—1504年在位)领导当地军民继续保持独立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504年他去世以后,摩尔多瓦才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藩属国。

拜占廷帝国的衰落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使他们从13世纪小亚细亚原罗姆苏丹国治下的部落发展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所以迅猛崛起,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接受了伊斯兰教统治方式,重视军队建设,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军事封建专制制度。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彻底的全民军事化使这个新兴的国家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土耳其人在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帜下继续发挥其勇猛善战的军事优势,通过分配战利品的制度将土耳其军队每个将士的利益与战争结果直接挂钩,不断激发全军扩张的积极性。其二,奥斯曼土耳其人生逢其时,拥有迅速崛起的良好外部环境。当时,西亚地区,特别是小亚细亚地区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罗姆苏丹国已经瓦解,阿拔斯王朝也灭亡了,拜占廷贫弱无力,内外交困,无暇东顾。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土耳其人大举扩张。到14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黑海、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沿海的小亚细亚西北地区,奠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展的基础。1345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势力扩大到欧洲,至14世纪末基本完成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占领并迫使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主要国家臣服,控制了这一地区周围各个海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了原拜占廷帝国的疆域。在这广大的领土上,苏丹巴耶札德迫使所有民族臣服,包括拜占廷皇帝在内的各国君主都必须向他称臣纳贡、送子献女,或作为人质,或作为妻妾,他则以宗主身份对各国君主发号施令,左右各国朝政,决定君主兴废,如有不从和

反叛则无情镇压。1390年,俯首称臣的约翰五世试图加固君士坦丁堡沿海自马尔马拉海到黄金角湾一段城墙,刚刚开始动工就接到巴耶札德的停工命令。次年,约翰五世去世,曼努埃尔逃回君士坦丁堡即位,巴耶札德对其擅自离去大怒,下令海军封锁君士坦丁堡达7个月之久,并要求曼努埃尔二世割让首都部分城区给土耳其人,允许土耳其人在那里建立清真寺,同时要求增加年贡,开放加拉大商业特区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营^①。对于具有反叛倾向的波希米亚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多次镇压,甚至将他们迁离故土,安置在小亚细亚地区。为了在政治上造成既成事实,他以最高宗主的名义召集巴尔干半岛各国君主会议,强令其臣属国的君主,即拜占廷帝国皇帝、米斯特拉专制君主、法兰克的阿塞亚侯爵和塞尔维亚君主到会。他为最后攻占君士坦丁堡作好了准备。

灭亡拜占廷国家是在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统治时期完成的^②。当时的形势对土耳其人极为有利:巴尔干半岛各国已经臣服,色雷斯、马其顿、保加利亚地区和希腊地区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直接统治下;拜占廷、塞尔维亚、波希米亚、瓦兰吉亚和莫利亚也承认苏丹的宗主权,缴纳贡赋,提供军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实力空前强大。而敌视土耳其人的西欧各国君主正处于专制王权形成的关键时刻,无力顾及东方事务。一度凌驾于西欧各国君主之上的教皇也早已从基督教世界领袖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无法组织起十字军。经济实力强大的意大利人,特别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正在为争夺商业霸权激烈交锋,打得难解难分。当时的欧洲和西亚没有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抗衡的力量,也不存在能够阻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势力。

形势对穆罕默德二世十分有利,他仍然谨慎从事,为攻城作最后的准备,表现了政治家的精明和军事家的战略洞察力。他首先孤立拜占廷人,与所有有可能援助君士坦丁堡的势力进行谈判:1451年,他与威

① J. Barker, *Manuel II Palaeologus*, pp. 163—180.

② S.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1965, pp. 234—239.

尼斯人订立协议,以不介入威尼斯和热那亚战争为代价换取了威尼斯人的中立;同年,又与匈牙利国王订立和平条约,以不在多瑙河上建立新要塞的承诺换取了匈牙利人的中立^①。同时,他进行攻城的军事准备:组建莫利亚军团和阿尔巴尼亚军团,前者用于在希腊方向上作战略牵制,后者用于阻止马其顿西部援军;他还组织大规模军火生产,特别是用于攻城作战的军事机械,专门高薪聘请匈牙利火炮制作工匠乌尔班指导生产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巨型火炮^②,其口径达99厘米,可发射1200磅(相当于448公斤)重的石弹,是攻城最有效的武器;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建立鲁米利·希萨尔城堡和炮台,配置强大的火炮,它与海峡对面的阿纳多利·希萨尔城堡隔水相望,有效地封锁海峡。

面对穆罕默德二世有条不紊的备战,守城的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1449—1453)也在作着最后的努力。他一方面向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和教廷派出使节,请求援救,另一方面与莫利亚地区的希腊专制君主、他的兄弟联系,希望他们停止内战,增援危急中的首都。但是,所有的欧洲国家君主除了表示同情和开具出兵援助的空头支票以外,没有及时作出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个别君主派出的小股部队对抵抗即将到来的攻击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莫利亚地区的拜占廷皇室成员内争正酣,彼此势同水火,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呼吁根本不予理睬。这样,君士坦丁十一世就处于既无内助又无外援的可悲境地。他可以用来抵抗土耳其人的防御力量只有不足五千人,另外还有两三千外国自愿军,其中热那亚贵族乔万尼·贵斯亭尼安尼率领的队伍最有战斗力。在海上,拜占廷人仅有的26艘船一字排开,防守在黄金角湾入口处的铁链之后^③。

1453年初,穆罕默德二世开始部署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部队。据不同史料记载,参加这次战役的攻城部队有10—20万人,其中包括奥斯

① S.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pp. 240—246.

②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p. 256.

③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廷帝国》,第469—471页。

曼土耳其帝国精锐的禁卫军上万人和阿纳多利亚军团万余人。穆罕默德还有 50 多门大炮,分成 14 个炮群,其中最大的巨炮费时两个月才从铸造地亚得里亚堡运到君士坦丁堡。此外,土军集中了 120 艘战船于马尔马拉海和南北两条海峡水面,其中 15 艘是大型军舰。外围战役于 4 月以前完成,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占了所有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在距离城墙 1200 米的地方扎下军营。4 月 6 日,攻城战正式开始。在 53 天的战斗中,土耳其军队使用重炮轰击城墙,使用陆军突击城墙缺口,使用大量灌木填护城河,使用高大的活动塔楼施放弓箭流石,使用舰队强攻黄金角海湾,使用黄油铺地运送船只翻越 41 米高的佩拉山丘,使用地道偷袭防守部队,总之,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最终于 5 月 29 日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廷人之所以与数十倍土耳其精兵周旋了近两个月,主要依赖的是这座千年古都完善的城防体系和对上帝奇迹般拯救的希望。就在破城的前夜,在守城军民清楚地意识到最后时刻来临之际,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举行全城祈祷仪式,最受民众爱戴的圣母子像在神圣的歌声和“上帝啊,赐福于我们”的祈求声中被抬上城头和巨大的缺口中央。而后,长长的祈祷行列返回圣索非亚教堂。这个末代皇帝发表了如下演讲:“我们的敌人是用大炮、骑兵和步兵武装起来的,占尽了优势,但是,我们依靠我主上帝和救世主耶稣基督之名,依靠我们的双手和上帝全能之力赋予我们的力量。……我要求和恳求你们每一个人,无论等级、军阶和职务如何,都要爱惜你们光荣的名誉并服从你们的长官。要知道,如果你们忠实地执行了我给你们的命令,那么,我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避开上帝正义的惩罚。”^①但是,拜占廷人面对的也是土耳其杰出的君主,他意志坚定,在战斗进行中曾斩钉截铁地拒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和谈提议,他说:“我要与这个城市决一死战,或是我战胜它,或是它战胜我。”^②最终,拜占廷人高大的城墙和坚如磐石般的意志都在奥斯曼土耳其大军的重炮下化为灰烬。

① A. A. Vasil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 651.

② 陈志强:《君士坦丁堡陷落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39 页。

精明的穆罕默德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改变了总攻前对将士们许下的诺言,提前停止抢劫,因为他要的不是一个被摧毁的城市废墟,而是一个完整的首都,一个未来主宰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世界的大帝国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拜占廷帝国这个具有 1100 多年历史的国家寿终正寝,此后不久穆罕默德将其首都迁入君士坦丁堡,标志着奥斯曼土耳其人正式成为巴尔干半岛的霸主。为了防止拜占廷国家死灰复燃,穆罕默德在此后 14 年中继续剿灭帕列奥列格王朝后裔,1460 年,吞并了该王朝最后一块属地,王朝最后的男性继承人迪米特里和托马斯,一个被关押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客死科孚岛。1461 年,穆罕默德灭亡了最后一个希腊人国家,即由科穆宁王朝统治的特拉布宗帝国,将皇帝大卫一世(1459—1461 年)及其七个儿子扣押在君士坦丁堡,几年后,将他们全部杀害。

人们在分析奥斯曼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因素:特殊的苏丹制度要求苏丹的儿子必须尽早参与国家军政事务的管理,在实践中培养管理和指挥才能,从而防止了拜占廷皇帝子女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残酷的君主继承制度要求在世苏丹应在生前确定继承人,并在新苏丹继位后立即杀死其他继承候选人,从而降低了宫廷内讧的可能性;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体制强化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集权;奥斯曼土耳其社会的军事化社会生活将全体臣民的利益与他们个体生存的必需条件结合起来;土耳其人从最初的弱小部落迅速发展成为强大帝国的外部条件是周围其他民族的衰落,在缺乏强大对手的国际环境里,土耳其人扩张的本性得到宽容的发展机遇,即使他们犯了一系列错误,甚至遭受重大的挫折(如蒙古西侵),都未能阻止其发展势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实行的“有限宽容征服政策”极大地降低了其扩张期间的阻力。

胜利后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致力于大帝国的建设。首都伊斯坦布尔(意为“伊斯兰教的城市”)很快就从战前的数万人上升到 70 万人口,古老的建筑得到修缮,新建的清真寺规模超过了圣索非亚教堂,哈里发的

皇宫比皇帝的宫殿更富丽堂皇^①。土耳其人并未满足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征服,1456年,穆罕默德二世发动了“贝尔格莱德战役”,遭到洪亚迪领导的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组成的联军的英勇抵抗,土耳其15万大军死伤过半,战败撤军。1474年,不甘失败的土耳其人再度兴兵讨伐,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大公率领4万将士在“高桥战役”中击溃12万敌军。直到1476年,穆罕默德亲自统率20万大军才勉强取胜,不久在斯特凡的骚扰下被迫撤军。1499—150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海战中战胜威尼斯人,取得了东地中海霸权。1512年苏丹塞利姆一世继位,尔后四面出击,东征波斯,南伐叙利亚和埃及,建立起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1520年苏莱曼大帝继承父位。他在位46年间,取得一系列胜绩:1521年亲统10万大军攻克贝尔格莱德,1522年征服罗得岛的基督教骑士团,1526年再率领10万大军征服匈牙利,1529—1537年两度发动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最终将双方的边界确定在匈牙利平原西部。他修建的苏莱曼清真寺比圣索菲亚教堂高16英尺,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鼎盛的标志,这个靠军事征服建立和维持的帝国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新兴的西欧列强和俄罗斯不久就将它作为宰割的对象。

^① Robert Liddell, *Byzantium and Istanbul*, London, J. Cape 1958, pp. 230—235.

总 结

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只是巴尔干半岛文明史的一个阶段。从半岛开发之初直到今天,拜占廷人对巴尔干半岛的经营只有千余年。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巴尔干半岛被纳入由拜占廷人开创的东欧东正教世界,也是在拜占廷帝国统治下,巴尔干半岛形成了多民族的政治格局。巴尔干半岛这个山水秀美的历史大舞台,在拜占廷帝国时期上演了无数动人心魄的戏剧,拜占廷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先后扮演过舞台的主角。拜占廷人力图统一的种种努力都化为历史的泡影,直到人类社会迈入近代的门槛,巴尔干半岛如同整个欧洲一样,成为诸多实力相当的民族比肩而立的“大拼盘”,成为世界上最缺乏地区一体化内在动力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最复杂化的地区。古代巴尔干半岛留下的不仅是包括半岛最南部的希腊人、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的土耳其人、占据多瑙河南部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占据多瑙河北的罗马尼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占据潘诺尼亚平原的匈牙利人、半岛西部的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等大小民族在内的政治格局,而且遗留下大量无法解开的民族、宗教、文化“死结”。拜占廷人不自觉的巴尔干“一体化”计划遭到多种外来力量的破坏,而土耳其人后来继续强制进行的巴尔干“一体化”则因宗教文化差异过于悬殊而失败。今天的巴尔干半岛仍然缺乏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内部联系仍然极为脆弱,现实的共同利益仍然不能消融历史留下的隔膜,也无法填平历史造成的巨大鸿沟。巴尔干半岛一体化的未来只能依赖外来力量,只能在欧洲一体化中完成。路漫漫其修远,巴尔干半岛如今仍然是个随时可能点燃的火药桶。

参 考 书 目

第一章

1.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2. 列夫臣柯:《拜占廷》,三联书店 1962 年。
3. 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Strabo's Geography*),迪勒尔编注,阿姆斯特丹 1975 年。
4. 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5. 《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
6.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7. W. Ashburner, "The Farmer's Law",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32 (1912) 68—95.
8. N. H. Baynes and H. L. B. Moss,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49.
9. J. L. Bintliff, "New Approaches to Human Geography, Prehistoric Greece: A Case Study", in Francis W. Carter ed.,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10. A. E. R. Boak,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Problem of Races in the Prehistoric Aegean Basin",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13, No. 1 (Oct., 1917), pp. 25—36.
11. J. B. Bury,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 Oxford 1911.

12. S. Casson, *Macedonia, Thrace, and Illyria: Their Relations to Gree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down to the Time of Philip, Son of Amynt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13. Francis W. Carter ed.,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Academic Press, London, NY, 1977.
14. Slobodan Curcic and Evangelia Hadjityphonos ed., *Secular Medieval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1300—1500) and its Preservation*, AIMOS, Thessaloniki 1997.
15. Glanville Downey, "Earthquakes at Constantinople and Vicinity, A. D. 342—1454", *Speculum*, vol. 30, No. 4
- D. Dvoichenko - Markov, "The Vlachs", *Byzantion*, 54 (1984) 508—26.
16. H. C. Dwight, *Constantinople, Old and New*,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5.
17. John V. A. Fine, *The Early Medieval Balkans, A Critical Survey from the Sixth to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18. Spiridon G. Focas, *The Lower Danube River, In the southeastern Europe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plex from antiquity to the conference of Belgrade of 1948*, tran. By Rozeta J. Me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19. Marija Gimbutas, *The Bronze Age Cul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Hague, Mouton 1965.
20. N. G. I. Hammond, *Epirus, The geography, the ancient remains, the history and the topography of Epirus and adjacent area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7.
21. N. G. I. Hammond, *A History of Macedonia*, Oxford 1972.
22. P. Heather and J. Matthews, *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 Liv-

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 T. Hauken, *Petition and Response, an epigraphic study of petitions to Roman Emperors*, Bergen: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at Athens 1998.

24. Hugh Hencken ed., *The Pre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1956.

25. W. V. Herbert, *By - Paths in the Balkans*,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06.

26. Martin E. Huld, *Basic Albanian Etymologies*, Columbus: Slavica 1984.

27. I. Karayanopoulos, *The Byzantine State*, Thessaloniki 1983. (in Greek)

28. A.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Oxford 1991.

29. Machiel Kiel, *Studies on the Ottoman Architecture of the Balkans*, Variorum Reprints, London 1990.

30. Ph. Koukoules, "Onomata kai eide arton kata tous Byzantinous chronous", *Epeteris Hetaireias Byzantinon Spoudon*, 5 (1928) 36—52.

31. John R. Lampe and Marvin R. Jackson, *Balkan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1982.

32. Chrysanthe Maupoulou - Tsiume, *Byzantine Thessaloniki*, Pekos 1992. (in Greek)

33. Gy. Moravcsik, *Byzantium and the Magyars*, Amsterdam 1970.

34.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1993, vol. 14, "Balkan States".

35.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36. Vasile Parvan, *Dacia, an Outline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of the Carpatho - Danubian Countries*, trans., by I. L. Evans and M. P. Charles-

wor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37. Stewart Perowne, *Death of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69.

38. Edward Peters ed., *The First Crusade, the chronicle of Fulcher of Chartres and other source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39. Polybius, *Historia*, 转引自 AA. Vasil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40. A. Popp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the Baptism of Rus: Byzantine - Russian Relations between 986—89." *Dumbarton Oaks Papers* 30 (1976), p. 198.

41. S. Pollo, A. Puto, *The History of Albania*, London - Boston 1974.

42. Procopius, *Buildings*, trans., by Dewing, London and New York 1914—1940.

43. Sir Ian Richmond, *Trajan's Army on Trajan's Column*, London: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982.

44. Renc Ristelhueber ed., *History of the Balkan Peoples*, trans By Sherman David Spector, NY: Twayne 1971.

45.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30.

46. Robert Sallares,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47. Thanasis D. Sfikas ed.,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Aldershot, England 1999.

48. Henry Skene, "The Albanians", *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 (1850), pp. 159—181.

49. G. A. and M. G. Soteriou, *Η Βασιλική του Άγιου Δεμητρίου στην Θεσσαλονίκη*, Athens 1952.

50. Stable URL, "Speed of Railroad Trains in Europe", *Science*, vol. 14, No. 358 (Dec. , 1889), p. 409.
51. A. H. Stride, R. H. Gelderson and N. H. Kenyon, "Evolving Miogeanticlines of the East Mediterranea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vol. 284, No. 1322 (Feb. , 1977), pp. 255—285.
52. O. Syco ed, *Notita Dignitatum*, Berlin 1876.
53. Paul Tabori, *The Real Hungary*, London: Skeffington and Son 1939.
54. J. Teall, "The Grain Suppl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00—1025", *Dumbarton Oaks Papers* 13 (1959) 87—139.
55. F. Tinnefeld, "Zur kulinarischen Qualitat byzantinischer Speisefische", *Stud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Past and Present*, 11 (Tokyo 1988) 155—76.
56.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70.
57. Ivan Venedikov, "Thrac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New Series, vol. 35, No. 1, (Summer, 1977), pp. 72—80.
58. Count Louis Voinovitch, *Dalmatia and the Yugoslav Move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0.
59. Wayne S. Vucinich, *Slavic Review*, vol. 32, No. 1 (Mar. , 1973), p. 195.
60. A. J. B. Wace and M. S. Thompson, *The Nomads of the Balkans, an account of life and customs among the Vlachs of Northern Pindu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New York: Biblo & Tannen, 1972.
61. J. M. Wagstaff, "Settlements in the South - Central Peloponnisos", in Francis W. Carter ed. ,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 pp. 202—204.

第二章

1. 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2. R. H. 巴洛:《罗马人》,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3. 保罗·G·巴恩主编,郭小凌等译:《剑桥插图考古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年。
4.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理想国》又被译为《国家篇》。《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5. M. M. 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中世纪的农业生活》,郎立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6. 雅各布·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宋立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
7.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8.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10. 恩格斯:“启示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1.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9 卷。
12. 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13. 基托:《希腊人》,徐卫翔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4.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15.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6. 马西姆·利维巴茨:《世界人口简史》,郭峰、庄瑾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5 年。

17. 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 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20. 《圣经·新约》(中国基督教协会中文版)

21. 沈坚:“色雷斯人与罗马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22. 沈坚:“古代巴尔干伊利里亚人述论”,《世界历史》2001 年第 3 期。

23.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24. 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25.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2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27.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29.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30. 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31. 理查德·詹金斯编:“罗马的遗产”,《罗马的遗产》,晏绍祥、吴舒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2. E. R. Bevan, "Antiochus III and His Title 'Great - King'",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22 (1902), pp. 241—244.

33. Richard Brilliant, *The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in the Roman Forum*,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967.

34. L. H. Canfield, *The Early Persecutions of the Christian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13.

35. Michael Cherniavsky, "Ivan the Terrible as Renaissance Prince", *Slavic Review*, vol. 27, No. 2 (Jun., 1968), pp. 195—211.
36. Slobodan Curcic and Evangelia Hadjistryphonos ed., *Secular Medieval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1300—1500) and its Preservation*, AIMOS, Thessaloniki 1997.
37. G. L. Duncan, *Coin Circulation in the Danubian and Balka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A. D. 294—578*, London: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1993.
38. N. G. L. Hammond and G. T. Griffith, *A History of Macedon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39. John Fine, *The Early Medieval Balkan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40. Pat Getz—Preziosi, *Sculptors of the Cyclades: Individual and Traditio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 C.*,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41. B. F. Harris, *Bithynia under Trajan: Roman and Greek Views of the Principate*, Auckland: the University 1964.
42. Walter M. Hayes, "Tiberius and the Future",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55, No. 1 (Oct., 1959), pp. 2—8.
43. Ernst Jackh, "The German Drive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6 (Nov., 1939), pp. 763—783.
44. Alexandra Karetsou ed., *Crete - Egypt,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links*, Herakleion - Cairo 2001.
45. Angeliki. E. Laiou,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Washington, D. C. 2002.
46. F. R. Maunsell, "The Rhodope Balkan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8, No. 1 (Jul., 1906), pp. 7—24.
47. P. H. Reill, "Barthold Georg Niebuhr and the Enlightenment Tradi-

tion",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 3, No. 1 (Feb., 1980), pp. 9—26.

48. J. C. Robertson and H. G. Robertson, *The 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Victoria Colle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J. M. Dent, Ltd. 1928.

49. R. Shaw - Smith, "A Letter from Augustus to Tiberius",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18, No. 2 (Oct., 1971), pp. 213—214.

50. Kenneth Scott, "The Role of Basilides in the Events of A. D. 69",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24 (1934), pp. 138—140.

51. H. H. Scullard, "Carthage",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2, No. 3 (Oct., 1955), pp. 98—107.

52. S. M. Sherwin - White, "Babylonian Chronicle Fragments as a Source for Seleucid History",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4 (Oct., 1983), pp. 265—270.

53. D. W. Thomson Vessey, "Silius Italicus: The Shield of Hannib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96, No. 4 (Winter, 1975), pp. 391—405.

54. Peter Wells, *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55. John Wilkes, *The Illyrians*,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1992.

第三章

1. 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 1983 年。

2. 恺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3.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4. 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5. 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6.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7. 《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 1997 年。
8. 《汉书》，中华书局 1997 年。
9. Agathias, *The History*, trans 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N. Y. : De Gruyter 1975.
10.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Amsterdam 1966.
1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1.
12. St. Jerome, *The Letters*, trans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 N. Y. : Newman Press 1963.
13. John of Nikiu,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trans. R. H. Charles, London 1916.
14. Jornandes, *The Gothic History*, Cambridge Speculum Historiale, N. Y. , Barnes & Noble 1966.
15.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D. 354—378)*, trans. , by Walter Hamilton, N. Y. Penguin Books 1986.
16. Nicephorus Patriarcha, *Opuscula Historica*, ed. De Boor, Leipzig 1880.
17.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18. Socrates, *The Armenian Adapt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by Robert W. Thomson, Leuven, Belgium Sterling, Va. Peeters 2001.
19.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by Photius, Ann Arbor, Mich. :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8.
20.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noted by Harry Trutledov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21. A. A. Vasil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1970.

22. Zachariah of Mitylene, *The Syriac Chronicle*, trans. F. J. Hamilton, London 1899.

23. 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 , by Ronald T. Ridley, Sydney: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

第四章

1.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人类病毒性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3. 《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

4.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5. 朱寰:《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6. P. Allen, "The "Justinianic" Plague", *Byzantion*, 1979 (49). Christine A. Smith, "Plague in the Ancient world: a study from Thucydides to Justinian", *The Student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8 1996—1997, 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 4/5/2002 (<http://www.loyno.edu/~history/journal/2002—10—28>), p. 11.

7. Agathias, *The History*, trans 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N. Y. : De Gruyter 1975.

8. Agathias of Myrina, *Historiarum Libri V*, Bolin 1967.

9. Sylvia Benton, "Notes on Cret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98, No. 2 (Aug., 1941), pp. 77—83.

10. L. Brehi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N. Y. 1977.

11. 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Thames and Hudson 1987.

12. J. Brunsmid, *Eine griechische Ziegelinschrift aus Sirmium*, Eranos Vindobonensis, Vienna 1893.

13.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Amsterdam 1966.

14.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Thematibus*, trans.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15.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cerimoniis*, trans. J. J. Reiske, Bonn 1829.

16. Florin Curta, *The Making of the Slav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Lower Danube Region, c. 500—7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Francis Dvornik, *The Slavs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2.

18. M. Esposito, "A Ninth - Century Commentary on Phoca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13, No. 3/4 (Jul. , 1919).

19. Evagr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by Michael Whitb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 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 D. 431 to A. D. 594*, 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 trans. by E. Wlaford, London 1854.

2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1.

22. Isidore of Seville, *Chronicon*, PL, trans by Stephen A. Bar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thematibus*, ed. A. Pertusi, Vatican 1952.

24. 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tran. By R. Smith, Oxford 1860.

25. John Ephesus,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tran. By R. Payne Smith, Oxford 1860.

26. Maria Georgopoulou, "Late Medieval Crete and Venice: An Appropriation of Byzantine Heritage", *The Art Bulletin*, vol. 77, No. 3 (Sep. ,

1995).

27. R.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N. Y. 1985.

28. P. Lemerle,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Byzantium*, Galway, Ireland: Officina Typographica, Galway University Press 1979.

29. John Malalas, *Chronicle*, Chicago 1940.

30. John of Nikiu,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trans. R. H. Charles.

31. Justinian, *The Civil Law*, tran. By S. P. Scott, Cincinnati 1932, Novella, II.

32. H. Lamb, *Theodora and the Emperor*, N. Y. 1963.

33. C. A. Macartney, "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1, No. 2 (1944), pp. 266—275.

34. Malalas, *The Chronicle*, trans by Elizabeth Jeffreys, Michael Jeffreys and Roger Scott, Melbourn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6.

35. 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Oxford 2002.

36.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D. 354—378), trans by Andrew Wallace - Hadrill, N. Y. : Penguin Books 1986.

37. Menander,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trans by R. C. Blockley, Liverpool: F. Cairns 1985.

38. T. Mommsen,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tr. By C. C. Mierow, Princeton 1915, rp. New York 1960.

39. Nicephorus, *The Life of St. Andrew the Fool*, ed by Lennart Ryden, Stockholm: Distributor,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95.

40.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41. Phrantzes, *Chronikon*, trans by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42. Procopius, *The History of the War*, tran. By H. B. Dew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43. 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tran. By H. B. Dew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4. S.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London 1933.
45.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46. Theophylactus, *The Explanation*, House Springs, Mo.: Chysostom Press 1992, I, 8.
47. Th. Uspensky,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St. Peterburg 1914, vol. 1, p. 28, from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2.

第五章

1.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2.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3. 科谢夫等著,《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3 年。
4. 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5. 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南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
6.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7. 《圣经·新约》(中国基督教协会中文版)。
8. 《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
9.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10. Adam Smith Albion, *Symeon, Tsar of Bulgaria (893—927)*, as seen through Byzantine Lens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11. John Beddoe, "On the Bulgarians",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8 (1879), pp. 232—239.
12. Andrew Blane and Thomas E. Bird ed., *The Ecumenical World of Orthodox Civilization, Russia and Orthodoxy*,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1974.
13. L. Brehi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N. Y. 1977.
14. R. Browning, *Byzantium and Bulgaria: a comparative study across the early medieval frontier*, London: Temple Smith 1975.
15.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Amsterdam 1966.
16. John B. Bury, "Roman Emperors from Basil II to Isaac Konmeno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 No. 3 (Apr., 1969), pp. 366—381.
17. John Cantacuzenus, *The History*, trans by Robert H. Tron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79.
18.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Thematibus*, trans.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19.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cerimoniis*, trans. J. J. Reiske, Bonn 1829.
20. Geoffrey Neale Cross, *Epir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21. Seta B. Dadoyan, *The Fatimid Armenian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in the Near East*, Leiden: E. J. Brill 1997.
22. F. Dolger, *Byzanz und die europaische Staatenwelt*, Ettal 1953.
23. David C. Douglas, *The Norman Fate, 1100—1154*,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24. Ivan Dujcev, "On the Treaty of 927 with the Bulgarian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32 (1978), pp. 217,

25. F. Dvornik, *The Makin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49.
26. Edward G. Farrugia, et. al, *Christianity among the Slavs: the Heritage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 by Pontifical Oriental Institute, Roma; Pont. Institutum Studiorum Orientalium 1988.
27.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1.
28. Stephen Graham, *Boris Godunof*,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3.
29. Ian Grey, *Boris Godunov: The Tragic Tsar*, N. Y. :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30. Janet Hamilton and Bernard Hamilton, ed. , *Christian Dualist Heresies in the Byzantine World, c. 650—1450*, N. Y.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 Done Ilievski, "The Macedonian Orthodox Church: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Slavic Review* , vol. 38, No. 2 (Jun. , 1979) , pp. 341—342
32. Done Ilievsky, *The Macedonian Orthodox Church: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trans by J. M. Leech, Skopje; Macedonian Review Editions 1973.
33. R. J. H. Jenkins, "The Supposed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907: Evidence of the Pseudo - Symeon", *Speculum*, vol. 24, No. 3 (Jul. , 1949) , pp. 403—406.
34. John of Nikiu,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trans. R. H. Charles, London 1916.
35. John the Exarch, Shestodnev, ed. R. Aitzetmuller, 转引自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04.
36. Peter Lauritzen, *Venice: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N. Y. : Atheneum 1978.
37. Leo III, *Jus graecoromanum*, Athens, Ekdotikos Oikos Georgiou

1931.

38. Leo Grammaticus, *Chronographia*, ed. I. Bekker, Bonn 1842.

39. Yaacov Lev, " Army, Regime, and Society in Fatimid Egypt, 358—487/968—109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9, No. 3 (Aug. , 1987), pp. 337—365.

40. C. Mango ed. ,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1. David Marshall Lang, *The Bulgarians from Pagan Times to the Ottoman Conquest*, London and Boulder, Colorado: Thames and Hudson and Westview Press 1976.

42. J. P.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Series graeca, Paris 1857—1936.

43. Nicolai Mystici, *Epistola*, XX. 转引自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70.

44.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1993.

45. Will S. Monroe, *Bulgarian and Her People*, Boston: The Page Co. 1914.

46.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1993.

47. Dmitri Obolensky, " The Bogomils; A Study in Balkan Neo - Manichaeism",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64, No. 253 (Oct. , 1949), pp. 537—538.

48.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49. C. 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N. Y. 1924.

50.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1956.

51. George Ostrogorsky, " The Byzantine Background of the Moravian Mission",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19 (1965), pp. 1—18.

52. G. Ostrogorsky, "The Peasant's Pre-emption Right: An Abortive Reform of the Macedonian Emperor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37, Parts 1 and 2 (1947), pp. 117—126.
53. Nicephorus Patriarcha, *Opuscula Historica*, ed. De Boor, Leipzig 1880.
54. Nicephorus, *A Partial Account*, trans by Joseph A. Munitiz, Leuven: Spicilegium Sacrum Lovaniense 1988.
55. James Riddick Partington, *A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56. Photios, *Epistolae*, ed by Johannes N. Baletta, Jildesheim: G. Olms 1978.
57. M. Macdermot, *A History of Bulgaria*, N. Y. F. A. Praeger 1962.
58. M. G. Popruzhenko, *Kozma Presviter*, bolgarsky pisatel' X veka, Sofia 1936.
59.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30.
60. Steven Runciman, *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and his Reig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61. Kenneth M. Setton, "On the Importance of Land Tenure and Agrarian Taxat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the Fourth Century to the Fourth Crusa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74, No. 3 (1953), pp. 225—259.
62. Kenneth M. Setton, "A Note on Michael Choniates, Archbishop of Athens (1182—1204)", *Speculum*, vol. 21, No. 2 (Apr., 1946), pp. 234—236.
63. Matthew Spinka,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Chicag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1933.
64. Matthew Spinka,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Balkans. A Study in*

the Spread of Byzantine Culture among the Slavs, Chicago: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1933.

65.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66. Theophylact of Ohrid, *Epistolae*, J. P.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Series graeca*, Paris 1857—1936.

67. Theophylactus, *The Explanation*, House Springs, Mo. : Chysostom Press 1992.

68. Stanislaw Turlej, *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the migration of the Slavs and church conflicts in the Byzantine sour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9th century*, trans by Marta Dabrowska, Cracow: Towarzystwo Wydawnicze 2001.

69.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70.

70. A. A. Vasiliev, "Was Old Russia a Vassal State of Byzantium?", *Speculum*, vol. 7, No. 3 (Jul. , 1932).

71. Katherine Verdery, *Transylvanian Villagers: Three Centuri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thnic Change*,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72. Speros Vryonis, ed. , *Byzantine Studies: Essays on the Slavic World and the Eleventh Century*, New Rochelle, N. Y. : Aristide D. Caratzas 1992.

73. Despina Stratoudke White, *Patriarch Photios of Constantinople: his Lif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Brookline, Mass. : 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 1981.

74. John Wilkes, *The Illyrians*,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1992.

75. Robert Lee Wolff,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 *Speculum*, vol. 24, No. 2 (Apr. , 1949), pp. 167—206.

76. Robert Lee Wolff, "Romania: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Speculum*, vol. 23, No. 1 (Jan. , 1948), pp. 1—34.

77. H. Charles Woods, "Communications in the Balkan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47, No. 4 (Apr., 1916), pp. 265—290.

78. I. Zepos, *Ius Graeco - Romanum*, Athens, Ekdotikos Oikos Georgiou 1931.

第六章

1.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2. 陈志强:《君士坦丁堡陷落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3.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4. 罗伯特·福西耶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陈志强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年。

5.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6. 《拉夫连季编年史》,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7. 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8.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9. 梁工主编:《圣经百科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0. 《罗斯法典》,王钺译注,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1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内幕》第 5 章,《历史研究》1978 年第 1 期。

12. 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南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

13. 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士超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14. 《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

15.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16. 朱寰:《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7.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Amsterdam 1966.
18. Constantine, *De ceremoniis*, trans by A. Vogt, Paris, Societe d'e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1935.
19.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by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20. Gerald W. Day, "Manuel and the Genoese: A Reappraisal of Byzantine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7, No. 2 (Jun., 1977), pp. 289—301.
21. Francis Dvorni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issions of Cyril and Methodius", *Slavic Review*, vol. 23, No. 2 (Jun., 1964), pp. 195—211.
22.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1.
23. J. M. Hussey,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24. D. G. Kosary, *History of the Hungarian Nation*, Danubian Press 1969.
25. Zoltan J. Kosztołnyik, "The Church and Bela III of Hungary (1172—1196): The Role of Archbishop Lukacs of Esztergom", *Church History*, vol. 49, No. 4 (Dec., 1980), pp. 375—386.
26. Leo the Deacon, *History*, trans by Alice - Mary Talbot, Washington, D. C. :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5.
27. C. A. Macartney, *Studies on Early Hungarian and Pontic History*, Brookfield, Vt. : Ashgate 1998.
28. Paul Magdalino, *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9. J. P.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 Paris 1857—1936.

30. T. Mommsen,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trans by C. C. Mierow, p. 119, Princeton 1915, rp. New York 1960.
31. Gyula Moravcsik, "The Role of the Byzantine Church in Medieval Hungary",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 No. 3/4 (Dec. , 1947), pp. 134—151.
32.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33. Photius, *The Homilies of Phot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By C. Mango, Cambridge, Mass. , 1958.
34. S. F. Platonov, *History of Russia*, trans by E. Aronsberg, N. Y. :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5.
35. Andrzej Popp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the Baptism of Rus'; Byzantine - Russian Relations between 986—989",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30 (1976), pp. 195—244.
36. Michael Psellus, *Chronographia*, ed by Vrasidas Karales, Athens 1992.
37. R. Rosetti,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1396)", *Slavonic Review* 15 (1937), 629 ff.
38. Scylitzes - Cedrenus, *Synopisi historiarum*, ed. I. Bekker, ii, Bonn 1839.
39. Robert William Seton - Watson, *A History of the Czechs and Slovaks*, Hamden, Conn. : Archon Books 1965.
40. Theophanes Continuatus, *Chronographia*, ed. I. Bekker, Bonn 1838.
41.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2.
42. George Vernadsky,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Russian Campaigns in the Black Sea Area",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8, No. 1 (Feb. , 1949), pp. 1—9.

第七章

1. 乔治·奥斯特洛格夫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Andrew Aghioritis, *Holy Mountain, Bulwark of Orthodoxy and of the Greek Nation*, Thessaloniki 1980, pp.
3. Oona Ball, *Dalmatia*, London: Faber 1932.
4. Voin Bozhinov and L. Panayotov, *Macedonia, Documents and Material*, Sofia 1978.
5. Patricia Fortini Brown, *Venice and Antiquity: the Venetian sense of the pa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L. Carl Brown ed., *Imperial Legacy: the Ottoman imprint on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N. Y. : Columb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Robert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N. Y. :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8. John Cantacuzenus, *The History*, trans by Robert H. Tron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79.
9. George Christos Soulis, *The Serbs and Byzantium, during the reign of Tsar Stephen Dusan (1331—1355) and his Successors*, Athens: Ekaoseis Baniias 1995.
10. Sima M. Cirkovic, *The Serbs*, tran. By Vuk Tosic, Blackwi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4.
11. Roger Collins, *Charlemagne*, London: Macmillan 1998.
12.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by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13. Slobodan Curcic, " The Role of Late Byzantine Thessalonike i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57,

Symposium on Late Byzantine Thessalonike (2003), pp. 65—84.

14. J. A. S. Evans, "Justinian and the Historian Procopius",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17, No. 2 (Oct., 1970), pp. 218—223.

15. Jadran Ferluga, *Byzantium on the Balkans*, Adlf M. Hakkert Publisher, Amsterdam 1976.

16. Nevill Forbes, Arnold J. Toynbee, D. Mitrany, D. G. Hogarth, *The Balkans, a history of Bulgaria, Serbia, Greece, Rumania, Turkey*,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15.

17.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Bonnae: Impensis Ed. Weberi 1829—1855.

18. Stanko Guldescu, *History of Medieval Croatia*, The Hague: Mouton 1964, pp. 2—5. Muriel Currey, *Dalmat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30.

19. Thos. Hodgkin, "The Roman Province of Dacia",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5 (Jan., 1887), pp. 100—103.

20. Angeliki E. Laiou,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2.

21. Paul Magdalino, *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 Ramadan Marnullaku, *Albania and the Albanians*, trans by Margot and Bosko Milosavljevic, London: Hurst 1975.

23. Peter Munz, *Frederick Barbarossa: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24.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25. George Pachymeres, *De Michaele et Andronico Palaeologo*, ed. I. Bekker, Bonnae: Impensis Ed. Weberi 1835.

26. Vasile Parvan, *Dacia, an Outline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of the*

Carpatho - Danubian Countries, trans by I. L. Evans and M. P. Charleswor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27. Joseph S. Roucek, "Albania as a N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32, A Challenge to Peacemakers (Mar. , 1944), pp. 107—109.

28. K. N. Sathas, *Βιβλιοθήκη*, Venice 1872.

29. George P. Scriven, "The Awakening of Albani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 No. 2 (Aug. , 1919), pp. 73—83.

30. George Christos Soulis, *The Serbs and Byzantium, during the reign of Tsar Stephen Dusan (1331—1355) and his Successors*, Athens: Ekaoseis Baniias 1995.

31. Harold W. V. Temperley, *History of Serbi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9.

32.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70.

33. A. J. B. Wace and M. S. Thompson, *The Nomads of the Balkans, an account of life and customs among the Vlachs of Northern Pindu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New York: Biblio & Tannen, 1972.

第八章

1.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2.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3. W. B. Bartlett, *An Ungodly War: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Fourth Crusade*, N. Y. : Sutton Publishing 2000.

4. Ernle Bradford, *The Sundered Cross: the 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 N. J. : Prentice - Hall, Inc. 1967.

5. Charles M. Brand, "The Byzantines and Saladin, 1185—1192: Op-

ponents of the Third Crusade", *Speculum*, vol. 37, No. 2 (Apr. , 1962), pp. 167—181.

6. Louis Brehi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 Oxford: North -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7. Horatio F. Brown, "The 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40, Part 1 (1920), pp. 68—88.

8. Patricia Fortini Brown, *Venice and Antiquity: The Venetian Sense of the Pa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R. Ignatius Burns, "The Catalan Company and the European Powers, 1305—1311", *Speculum*, vol. 29, No. 4 (Oct. , 1954), pp. 751—771.

10. C. Chapman, *Michael Paleologue restaurateur de l'empire byzantin 1261—82*, Paris 1926.

11. Anna Comnena, *Alexiad*, trans by E. R. A. Sewter, London, N. Y. : Penguin Books 2003.

12. Michael Duc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3. Geoffrey Neale Cross, *Epir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14. Frederic Duncalf, "The First Crusade: Clermont to Constantinople", in K. M. Setto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5.

15. Alfred Friendly, *The Dreadful Day: The Battle of Manzikert, 1071*, London, Hutchinson, and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1.

16. Alice Gardner, *The Lascarids of Nicea: the Story of an Empire in Exile*, London: Methuen 1912.

17. D. Geanakoplos, *Emperor Michael Palaeologus and the West, 1258 - 1282*, Cambridge 1959.

18. Deno Geanakoplos,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and the Union of Lyons (1274)",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46, No. 2 (Apr., 1953), pp. 79—89.
19. John Godfrey, *The Unholy Crusa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0.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ed by Hier Wolfii, Bonnae: Weber 1829—1855.
21. Angeliki E. Laiou, *Constantinople and the Lati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dronicus II*,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LXXXVII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2. Paul Lemerle,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Twelfth Century*, Ireland: Galway University Press 1979.
23. Calogero Muscara, "The Right to Adap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 Venice and the Venetia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 No. 2, (1984), pp. 181—188.
24. D. M. Nicol, *The Byzantine Family of Kantakouzenos*, Washington, D. C. 1968.
25. W. Norden, *Das Papsttum und Byzanz*, Berlin 1903.
26.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27. Michael Palaeologus, "Autobiography of Michael Palaeologus", ed by Gregory, *Byzantina*, vol. 29—30, (1959—1960), pp. 447—476.
28. Donald E. Queller,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1201—120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29.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30. Steven Runciman, *The Sicilian Vesp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31.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London: U. P. 1933.

32. S.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33. Palmer A. Throop, " Criticism of Papal Crusade Policy in Old French and Provençal ", *Speculum*, vol. 13, No. 4 (Oct. , 1938), pp. 379—412.

34.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70.

35.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by M. R. B. Shaw, Baltimore: Penguin 1987.

36. Robert Lee Wolff, *The Later Crusades 1189—131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2.

37. R. L. Wolff, *Studies in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U. P. 1976.

38. <http://www.cc.uoa.gr/4thcrusade> (2004年2月28日)。

第九章

1.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陈志强:《君士坦丁堡陷落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陈志强:“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29—139页。

4. 黄维民:《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

5. 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南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6.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7. 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8.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中文版)

9. 《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0. 《往年纪事》，王钺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
11.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12. D. 西诺：“突厥帝国”，《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年。
13. 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年。
14. 朱寰：《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5. George Acropolites, *Historia*, ed. A. Hejzenberg, Leipzig 1903.
16. M. Angold, *The Byzantine Government in Exile*, Oxford 1975.
17. A. Arnaky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Athens 1947.
18. J. Barker, *Manuel II Palaeologus (1391—1425)*, New York 1979.
19. Antal Bartha, *Hungarian Society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rans by K. Balazs,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75.
20.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95—800)*, Amsterdam 1966.
21. Leo Ciaconus, *Historiae*, vi, 10, ed. B. G. Niebuhr, Bonn 1828.
22.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Thematibus*, trans.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23.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cerimoniais*, trans. J. J. Reiske, Bonn 1829.
24.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by Romily Jenkins, Washington DC 1967.
25. M. Edith Durham, *Some Tribal Laws, Origins, and Customs of the Balkan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8.
26. F. Dvornik, *The Makin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49.
27. Michael Dukas, *Ἱστορία του Βυζαντίου*, Bone 1850.
28. Duc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De-

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9. Jadran Ferluga, *Byzantium on the Balkans*, Adlf M. Hakkert Publisher, Amsterdam 1976.

30. Spiridon G. Focas, *The Lower Danube River, In the southeastern Europe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plex from antiquity to the conference of Belgrade of 1948*, tran. By Rozeta J. Me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31. Alfred Friendly, *The Dreadful Day: The Battle of Manzikert, 1071*, London, Hutchinson, and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1.

32. Paul S. Galtsoff, "Seasonal Migrations of Mackerel in the Black Sea", *Ecology*, vol. 5, No. 1 (Jan., 1924), pp. 1—5.

33. D. J. Geanakopols, *Emperor Michael Palaeologus and the West*, Cambridge 1959.

34. Nicephorus Gregoras, *Byzantina Historia: graece et Latine*, ed by Hier Wolfii, Bonnae: Weber 1829—1855.

35. Joseph Held, *Hunyadi: Legend and Re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 P. 1985.

36. Robert Liddell, *Byzantium and Istanbul*, London, J. Cape 1958.

37. Xinru Liu, *Silk and Religion. An Exploration of Material Life an the Thought of People A. D. 600—1200*,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8. R. S. Lopez, *Byzantium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78.

39. Menander,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ed. C. de Boor, Berlin 1903.

40. 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London 1972.

41.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42. 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y*, tran. By H. B. Dewing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3. S.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1965.

44.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2.

45. Herwig Wolfram, *History of the Goth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相关王朝在位君主年表

1. 罗马帝国

屋大维·奥古斯都	(公元前 27—14 年)	Octavianus Augustus
提比略	(14—37 年)	Tiberius
卡里古拉	(37—41 年)	Caligula
克劳狄	(41—54 年)	Claudius
尼禄	(54—68 年)	Nero
格尔巴	(68—69 年)	Galba
奥托	(69 年)	Otho
维特里乌斯	(69 年)	Vitellius
韦斯帕芑	(69—79 年)	Vespasianus
提图斯	(79—81 年)	Titus
图密善	(81—96 年)	Domitianus
涅尔瓦	(96—98 年)	Nerva
图拉真	(98—117 年)	Trajanus
哈德良	(117—138 年)	Hadrianus
安敦尼	(138—163 年)	Antonius Pius
马可·奥里略	(161—180 年)	Marcus Aurelius
康茂德	(180—192 年)	Commodus
塞维鲁	(193—211 年)	Septimius Severus
卡拉卡拉	(212—217 年)	Caracalla

马克里努斯	(217—218 年)	Macrinus
埃拉加巴努斯	(218—222 年)	Elagabalus
亚历山大·塞维鲁	(222—235 年)	Alexander Severus
马克西密努斯	(235—238 年)	Maximinus Thrax
戈尔狄亚努斯三世	(238—244 年)	Gordianus III
菲利普	(244—249 年)	Philippus Arabs
戴修斯	(249—251 年)	Decius
加路斯	(251—253 年)	Callus
埃米里亚努斯	(253 年)	Emilianus
瓦勒利阿努斯	(253—260 年)	Valerianus
伽里恩努斯	(260—268 年)	Gallienus
克劳狄二世	(268—270 年)	Claudius
奥勒良	(270—275 年)	Aurelianus
塔西佗	(275 年)	Tacitus
普洛布斯	(276—282 年)	Probus
卡路斯	(282—283 年)	Carus
戴克里先	(284—305 年)	Diocretianus

2. 西罗马帝国

霍诺留	(395—423 年)	Honorius
约安尼斯	(424 年)	Joannes
瓦伦提年	(425—455 年)	Valentinian
彼得洛尼乌斯·马克西穆斯	(455 年)	Petronius Maximus
阿维图斯	(455—456 年)	Avitus
马雅利亚努斯	(457—461 年)	Majorianus
利比乌斯·塞维鲁	(461—465 年)	Libius Severus
安提米乌斯	(467—472 年)	Anthemius

奥勒布里乌斯	(472 年)	Olybrius
格莱塞里乌斯	(473 年)	Glycerius
朱里亚·纳波斯	(473—475 年)	Julius Nepos
罗慕洛·奥古斯都	(475—476 年)	Romulus Augustulus

3. 拜占廷帝国

君士坦丁一世	(324—337 年)	Constantine I
君士坦丁二世	(337—340 年)	Constantine II
君士坦斯	(337—350 年)	Constans I
君士坦提乌斯	(337—361 年)	Constantius II
朱利安	(361—363 年)	Julian
卓维安	(363—364 年)	Jovian
瓦伦提年	(364—375 年)	Valentinian
瓦伦斯	(364—378 年)	Valens
塞奥多西一世	(379—395 年)	Theodosios I
阿尔卡迪奥斯	(395—408 年)	Arkadios
塞奥多西二世	(408—450 年)	Theodosios II
马尔西安	(450—457 年)	Marcian
利奥一世	(457—474 年)	Leo I
利奥二世	(473—474 年)	Leo II
泽诺	(474—491 年)	Zeno
瓦西里斯克斯	(475—476 年)	Basiliskos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	(491—518 年)	Anastasios I
查士丁一世	(518—527 年)	Justin I
查士丁尼一世	(527—565 年)	Justinian I
查士丁二世	(565—578 年)	Justin II
提比略一世	(578—582 年)	Tiberios I

莫里斯	(582—602年)	Maurice
福卡斯	(602—610年)	Phokas
伊拉克略一世	(610—641年)	Herakleios I
君士坦丁三世	(641—641年)	Constantine III
伊拉克罗纳斯	(641—641年)	Heraklonas
君士坦斯二世	(641—668年)	Constans II
君士坦丁四世	(668—685年)	Constantine IV
查士丁尼二世	(685—695, 705—711年)	Justinian II
利昂提奥斯	(695—698年)	Leontios
提比略二世	(698—705年)	Tiberios II
腓力皮克斯	(711—713年)	Philippikos
阿纳斯塔修斯二世	(713—715年)	Anastasios II
塞奥多西三世	(715—717年)	Theodosios III
利奥三世	(717—741年)	Leo III
君士坦丁五世	(741—775年)	Constantine V
利奥四世	(775—780年)	Leo IV
君士坦丁六世	(780—797年)	Constantine VI
伊琳尼	(797—802年)	Irene
尼基弗鲁斯一世	(802—811年)	Nikephoros I
斯达乌拉焦斯	(811—811年)	Stauracios
米哈伊尔一世	(811—813年)	Michael I
利奥五世	(813—820年)	Leo V
米哈伊尔二世	(820—829年)	Michael II
塞奥菲鲁斯	(829—842年)	Theophilos
米哈伊尔三世	(842—867年)	Michael III
瓦西里一世	(867—886年)	Basil I
利奥六世	(886—912年)	Leo VI
亚历山德尔	(912—913年)	Alexander

君士坦丁七世	(913—920, 945—959 年)	Constantine VII
罗曼努斯一世	(920—944 年)	Romanos I
斯蒂芬和君士坦丁	(944—945 年)	Stephen, Constantine
罗曼努斯二世	(959—963 年)	Romanos II
尼基弗鲁斯二世	(963—969 年)	Nikephoros II
约翰一世	(969—976 年)	John I
瓦西里二世	(976—1025 年)	Basil II
君士坦丁八世	(1025—1028 年)	Constantine VIII
罗曼努斯三世	(1028—1034 年)	Nikephoros III
米哈伊尔四世	(1034—1041 年)	Michael IV
米哈伊尔五世	(1041—1042)	Michael V
邹伊	(1042—1050 年)	Zoe
君士坦丁九世	(1042—1055 年)	Constantine IX
塞奥多拉	(1042—1042—1056 年)	Theodora
米哈伊尔六世	(1056—1057 年)	Michael VI
依沙克一世	(1057—1059 年)	Isaac I
君士坦丁十世	(1059—1067 年)	Constantine X
罗曼努斯四世	(1068—1071 年)	Romanos IV
米哈伊尔七世	(1071—1078 年)	Michael VII
尼基弗鲁斯三世	(1078—1081 年)	Nikephoros III
阿莱克修斯一世	(1081—1118 年)	Alexios I
约翰二世	(1118—1143 年)	John II
曼努埃尔一世	(1143—1180 年)	Manuel I
阿莱克修斯二世	(1180—1183 年)	Alexios II
安德罗尼库斯一世	(1183—1185 年)	Andronicus I
依沙克二世	(1185—1195 年)	Isaac II
阿莱克修斯三世	(1195—1203 年)	Alexios III
阿莱克修斯四世	(1203—1204 年)	Alexios IV

阿莱克修斯五世	(1204—1204 年)	Alexios V
塞奥多利一世	(1205—1221 年)	Theodore I
约翰三世	(1221—1254 年)	John III
塞奥多利二世	(1254—1258 年)	Theodore II
约翰四世	(1259—1261 年)	John IV
米哈伊尔八世	(1259—1282 年)	Michael VIII
安德罗尼库斯二世	(1282—1328 年)	Andronicus II
米哈伊尔九世	(1294—1320 年)	Michael IX
安德罗尼库斯三世	(1328—1341 年)	Andronicus III
约翰五世	(1341—1391 年)	John V
约翰六世	(1347—1354 年)	John VI
安德罗尼库斯四世	(1376—1379 年)	Andronicus IV
约翰七世	(1390—1390 年)	John VII
曼努埃尔二世	(1391—1425 年)	Manuel II
约翰八世	(1425—1448 年)	John VIII
君士坦丁十一世	(1449—1453 年)	Constantine XI

4. 拉丁帝国

鲍尔温一世	(1204—1205 年)	Baldwin I of Flanders
亨利一世	(1206—1216 年)	Henry of Flanders
彼得	(1217 年)	Peter of Courtenay
尤兰德	(1217—1219 年)	Yoland
罗伯特	(1221—1228 年)	Robert of Courtenay
鲍尔温二世	(1228—1261 年)	Baldwin II
约翰	(1231—1237 年)	John de Brienne

5. 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

米哈伊尔一世	(1204—1215 年)	Michael I
塞奥多利	(1215—1224 年)	Theodore
(1224 年进入塞萨洛尼基并加冕为皇帝,称“塞萨洛尼基皇帝和专制君主”)		
塞奥多利	(1224—1230 年)	Theodore
曼努埃尔	(1230—1240 年)	Manuel
约翰	(1240—1244 年)	John
迪米特里	(1244—1246 年)	Demetrius
(恢复伊庇鲁斯专制君主称号)		
米哈伊尔二世	(1237—1271 年)	Michael II
尼基弗鲁斯一世	(1271—1296 年)	Nicephorus I
托马斯	(1296—1318 年)	Thomas
尼古拉斯	(1318—1323 年)	Nicholas Orsini
约翰	(1323—1355 年)	John Orsini
尼基弗鲁斯二世	(1355—1340 年)	Nicephorus II
(塞萨利头等大贵族)		
约翰一世	(1271—1296 年)	John I
君士坦丁	(1296—1303 年)	Constantine
约翰二世	(1303—1318 年)	John II
(1348 年被斯蒂芬·杜珊征服)		

6. 保加利亚王国

阿斯巴鲁赫	(681—702 年)	Asparuch
特尔维尔	(702—718 年)	Tervel

无名氏	(718—725 年)	unknown
塞瓦尔	(725—739 年)	Sevar
科尔米索斯	(739—756 年)	Kormisos
温内奇	(756—762 年)	Vinech
特勒兹	(762—765 年)	Teletz
萨宾	(765—767 年)	Sabin
沃马尔	(767 年)	Umar
托克图	(767—772 年)	Toktu
帕甘	(772 年)	Pagan
特勒里格	(772—777 年)	Telerig
卡尔丹	(777—803 年)	Kardam
科鲁姆	(803—814 年)	Krum
杜昆,迪西维格	(814 年)	Dukum, Dicevg
奥穆尔塔格	(814—831 年)	Omurtag
马罗米尔	(831—836 年)	Malomir
普里西安	(836—852 年)	Presiam
伯利斯一世·米哈伊尔	(852—889 年)	Boris I Michael
弗拉基米尔	(889—893 年)	Vladimir
西蒙	(893—927 年)	Symeon
彼得	(927—969 年)	Peter
伯利斯二世	(969—971 年)	Boris II
沙木埃尔	(976—1014 年)	Samuel
加布利尔·拉多米尔	(1014—1015 年)	Gabriel Radomir
约翰·弗拉迪斯拉夫	(1015—1018 年)	John Vladislav
阿森一世	(1186—1196 年)	Asen I
彼得	(1196—1197 年)	Peter
卡罗赞	(1197—1207 年)	Kalojan
伯利尔	(1207—1218 年)	Boril

伊凡·阿森二世	(1218—1241年)	Ivan Asen II
科罗曼·阿森	(1241—1246年)	Koloman Asen
米哈伊尔·阿森	(1246—1256年)	Michael Asen
君士坦丁·提奇	(1257—1277年)	Constantine Tich
伊瓦杰罗	(1278—1279年)	Ivajlo
伊凡·阿森三世	(1279—1280年)	Ivan Asen III
乔治一世·特尔特尔	(1280—1292年)	George I Terter
斯米勒兹	(1292—1298年)	Smiletz
查卡	(1299年)	Caka
塞奥多利·斯维托斯拉夫	(1300—1322年)	Theodore Svetoslav
乔治二世·特尔特尔	(1322—1323年)	George II Terter
米哈伊尔·西斯曼	(1323—1330年)	Michael Sisman
伊凡·斯蒂芬	(1330—1331年)	Ivan Stephen
伊凡·亚历山大	(1331—1371年)	Ivan Alexander
伊凡·西斯马	(1371—1393年)	Ivan Sisman
伊凡·斯特拉西米尔	(1360—1396年)	Ivan Stracimir

7. 塞尔维亚王国

约翰·弗拉基米尔	(9世纪中期)	John Vlasitmir
穆提米尔	(?—891年)	Mutimir
普尔沃斯拉夫	(891—892年)	Prvoslav
彼得·格杰尼科维奇	(892—917年)	Peter Gojnikovic
保罗·布兰诺维奇	(917—920年)	Paul Branovic
扎哈利亚斯·普尔沃斯拉夫杰维奇	(920—924年)	Zacharias Prvoslavljevic
卡斯拉夫·科罗尼米罗维奇	(927—950年)	Caslav Klonimirovic

Zeta

约翰·弗拉基米尔	(? —1016 年)	John Vladimir
斯蒂芬·沃伊斯拉夫	(1040—1052 年)	Stephen Voislav
米哈伊尔	(1052—1081 年)	Michael
君士坦丁·伯丁	(1081—1101 年)	Constantine Bodin
Rascia		
乌康	(1083—1114 年)	Vukan
斯蒂芬·奈曼加	(1166—1196 年)	Stephen Nemanja
斯蒂芬	(1196—1228 年)	Stephen
斯蒂芬·拉斯多斯拉夫	(1228—1234 年)	Stephen Radoslav
斯蒂芬·弗拉迪斯拉夫	(1234—1243 年)	Stephen Vladislav
斯蒂芬·乌罗斯一世	(1243—1276 年)	Stephen Uros I
斯蒂芬·德拉古亭	(1276—1282 年)	Stephen Dragutin
斯蒂芬·乌罗斯二世·米卢亭	(1282—1321 年)	Stephen Uros II Milutin
斯蒂芬·乌罗斯三世	(1321—1331 年)	Stephen Uros III Decanski
斯蒂芬·杜珊	(1331—1355 年)	Stephen Dusan
斯蒂芬·乌罗斯	(1355—1371 年)	Tazr Stephen Uros
乌拉辛	(1365—1371 年)	King Vulasin
拉扎尔	(1371—1389 年)	Prince Lazar
斯蒂芬·拉扎雷维奇	(1389—1427 年)	Stephen Lazarevic
乔治·布兰科维奇	(1427—1456 年)	George Brankovic
拉扎尔·布兰科维奇	(1456—1458 年)	Lazar Brankovic

8. 穆斯林君主

阿布·贝克尔	(632—634 年)	Abu Beker
奥马尔一世	(634—644 年)	Omar I
奥斯曼	(644—656 年)	Othman

阿里	(656—661 年)	Ali
The Umayyads		
穆亚维加一世	(661—680 年)	Muawija I
杰兹德一世	(680—683 年)	Jezip I
穆亚维加二世	(683—684 年)	Muawija II
迈尔万一世	(684—685 年)	Merwan I
阿布达马利克	(685—705 年)	Abdalmalik
瓦利德一世	(705—715 年)	Walid I
苏莱曼	(715—717 年)	Suleiman
奥马尔二世	(715—720 年)	Omar II
杰兹德二世	(720—724 年)	Jezip II
希斯哈姆	(724—743 年)	Hischam
瓦利德二世	(743—744 年)	Walid II
杰兹德三世	(744 年)	Jezip III
迈尔万二世	(744—750 年)	Merwan II
伊布拉希姆	(744 年)	Ibrahim
The Abbasids		
萨法赫	(750—754 年)	as - Saffach
曼苏尔	(754—775 年)	al - Mansur
马赫迪	(775—785 年)	al - Machdi
哈迪	(785—786 年)	al - Hadi
哈伦·拉斯希德	(786—809 年)	Harun al - Raschid
阿敏	(809—813 年)	al - Amin
马蒙	(813—833 年)	al - Mamun
穆塔希姆	(833—842 年)	al - Mutasim
瓦什科	(842—847 年)	al - Wathik
穆塔瓦科基尔	(847—861 年)	al - Mutawakkil
蒙塔希尔	(861—862 年)	al - Muntasir

穆塔兹	(862—866 年)	al - Mutazz
穆赫塔迪	(866—869 年)	al - Muchtadi
穆塔米德	(869—892 年)	al - Mutamid
穆塔迪德	(892—902 年)	al - Mutadid
穆克塔非	(902—908 年)	al - Muktafi
穆克塔迪尔	(912—932 年)	al - Muktadir
卡希尔	(932—934 年)	al - Kahir
拉迪	(934—940 年)	al - Radi
穆塔基	(940—943 年)	al - Muttaki
穆塔克非	(943—946 年)	al - Mutakfi
穆提	(946—974 年)	al - Muti
泰	(974—991 年)	at - Tai
卡迪尔	(991—1031 年)	al - Kadir
凯穆	(1031—1075 年)	al - Kaim

9. 塞尔柱突厥

苏莱曼一世	(1077—1086 年)	Suleiman I
阿尔斯兰一世	(1092—1107 年)	Kilij Arslan I
马利克 - 沙赫	(1107—1116 年)	Malik - Shah
马苏迪一世	(1116—1156 年)	Masud I
阿尔斯兰二世	(1156—1192 年)	Kilij Arslan II
凯科斯鲁一世	(1192—1196 年)	Kaikosru I
苏莱曼二世	(1196—1204 年)	Suleiman II
阿尔斯兰三世	(1204 年)	Kilij Arslan III
凯科斯鲁一世	(1204—1210 年)	Kaikosru I
凯考斯一世	(1210—1220 年)	Kaikaus I
凯库巴德一世	(1220—1237 年)	Kaikubad I

凯科斯鲁二世	(1237—1245 年)	Kaikosru II
凯考斯二世	(1246—1257 年)	Kaikaus II
阿尔斯兰四世	(1248—1265 年)	Kilij Arslan IV
凯库巴德二世	(1249—1257 年)	Kaikubad II
凯库巴德三世	(1265—1282 年)	Kaikosru III
马苏迪二世	(1282—1304 年)	Masud II
凯库巴德三世	(1282—1307 年)	Kaikubad III
马苏迪三世	(1307—1308 年)	Masud III

10. 奥斯曼土耳其

奥斯曼	(1288—1326 年)	Osman
奥康	(1326—1362 年)	Orchan
穆拉德一世	(1362—1389 年)	Murad I
巴耶扎德一世	(1389—1402 年)	Bajezid I
穆罕默德一世	(1402—1421 年)	Muhammed I
苏莱曼	(1402—1410 年)	Suleiman
穆萨	(1411—1413 年)	Musa
穆拉德二世	(1421—1451 年)	Murad II
穆罕默德二世	(1451—1481 年)	Muhammed II

11. 莫利亚的希腊专制君主

曼努埃尔·坎塔库震努斯 (1348—1380 年)	Manuel Cantacuzenus
马太·坎塔库震努斯 (1380—1383 年)	Matthew Cantacuzenus
迪米特里·坎塔库震努斯 (1383 年)	Demetrius Cantacuzenus
塞奥多利一世·帕列奥列格 (1383—1407 年)	Theodore I Palaeologus

塞奥多利二世·帕列奥列格

(1407—1443 年)	Theodore II Palaeologus
君士坦丁·帕列奥列格 (1428—1443 年)	Constantine Palaeologus
托马斯·帕列奥列格 (1443—1460 年)	Thomas Palaeologus
迪米特里·帕列奥列格 (1449—1460 年)	Demetrius Palaeologus

12. 东正教君士坦丁堡大教长(315—1459 年)

迈特洛法尼一世 (315—327 年)	Metrophanes
亚历山大德罗斯 (327—340 年)	Alexandros
保罗一世 (340—341 年)	Paul I
尤西比乌斯 (341—342 年)	Eusebios
保罗一世(第二任期) (342—344 年)	Paul I
马其顿尼奥斯一世 (342—348 年)	Makedonios I
保罗一世(第三任期) (348—350 年)	Paul I
马其顿尼奥斯一世(第二任期) (350—360 年)	Makedonios I
尤多修斯 (360—369 年)	Eudoxios
迪莫非罗斯 (369—379 年)	Demophilos
尤阿吉流斯 (369—370 年)	Euagrios
格里高利一世 (379—381 年)	Gregorios I
马克西莫斯一世 (381 年)	Maximos
奈克塔流斯 (381—397 年)	Nektarios
约翰一世·赫里索斯托姆 (398—404 年)	John I Chrysostom
阿尔萨基奥斯 (404—405 年)	Arsakios
阿提科斯 (405—425 年)	Attikos
西西尼奥斯一世 (426—427 年)	Sisinnios I
聂斯脱利 (428—431 年)	Nestorios

马克西米安	(431—434 年)	Maximianos
普罗克鲁斯	(434—447 年)	Proklos
弗拉比安诺斯	(447—449 年)	Phlabianos
阿纳多流斯	(449—458 年)	Anatolios
艮纳迪奥斯一世	(458—471 年)	Gennadios I
阿卡基奥斯	(471—489 年)	Akakios
弗拉比塔斯	(489—490 年)	Phrabitias
尤非米奥斯	(490—496 年)	Euphemios
马其顿尼奥斯二世	(496—511 年)	Makedonios II
提莫塞奥斯一世	(511—518 年)	Timotheos I
约翰二世·卡帕多西亚	(518—520 年)	John II Kappadokes
埃比发尼奥斯	(520—536 年)	Epiphanius
安塞姆斯一世	(536 年)	Anthimos I
迈纳斯	(536—552 年)	Menas
尤提修斯	(552—565 年)	Eutykhios
约翰三世·安条克	(565—577 年)	John III Antiocheus
尤提修斯	(577—582 年)	Eutykhios
约翰四世·聂斯特乌特斯	(582—595 年)	John IV Nesteutes
基里亚科斯	(595—606 年)	Kyriakos
托马斯一世	(607—610 年)	Thomas I
塞尔吉乌斯	(610—638 年)	Sergios
皮尔豪斯一世	(638—641 年)	Pyrrhos I
保罗二世	(641—654 年)	Paul II
皮尔豪斯一世(第二任期)	(655 年)	Pyrrhos I
彼得	(655—666 年)	Peter
托马斯二世	(667—669 年)	Thomas II
约翰五世	(669—675 年)	John V
君士坦丁一世	(675—677 年)	Constantine I

塞奥多罗斯一世	(677—679 年)	Theodoros I
乔治一世	(679—686 年)	Georgios I
塞奥多罗斯一世(第二任期)	(686—687 年)	Theodoros I
保罗三世	(688—694 年)	Paul III
卡林尼科斯一世	(694—705 年)	Kallinikos I
基罗斯	(705—712 年)	Kyros
约翰六世	(712—715 年)	John VI.
日耳曼努斯一世	(715—730 年)	Germanos I
阿纳斯塔修斯	(730—754 年)	Anastasios
君士坦丁二世	(754—766 年)	Constantine II
尼西塔斯一世	(766—780 年)	Niketas I
保罗四世	(780—784 年)	Paul IV
塔拉修斯	(784—806 年)	Tarasios
尼基弗鲁斯	(806—815 年)	Nikephoros
塞奥多托斯	(815—821 年)	Theodotos
安东尼奥斯一世	(821—834 年)	Antonios I
约翰七世·莫罗哈扎尼奥斯	(834—843 年)	John VII Morocharzanos
麦瑟迪乌斯一世	(843—847 年)	Methodios I
伊格纳提乌斯	(847—858 年)	Ignatios
弗条斯	(858—867 年)	Photios
伊格纳提乌斯(第二任期)	(867—878 年)	Ignatios
弗条斯(第二任期)	(878—886 年)	Photios
斯特发诺斯一世	(886—893 年)	Stephanos I
安东尼奥斯二世·考莱阿斯	(893—901 年)	Antonios II Kauleas
尼古拉斯一世·米斯提库斯	(901—907 年)	Nikolaos I Mystikos
尤非米乌斯一世	(907—912 年)	Euthymios

尼古拉斯一世(第二任期)(911—925年)	Nikolaos I
斯特发诺斯二世 (925—928年)	Stephanos II
特利封 (928—931年)	Tryphon
塞奥非拉克特 (933—956年)	Theophylaktos
伯利埃乌克特斯 (956—970年)	Polyeuktos
瓦西里奥斯一世·斯卡曼德峡诺斯 (970—974年)	Basileios I Skamandrenos
安东尼奥斯三世·斯图迪特 (974—980年)	Antonios III Studites
尼古拉斯二世·赫里索斯堡 (984—995年)	Nikolaos II Chrysoberges
西西尼奥斯一世 (995—998年)	Sisinnios II
塞尔吉乌斯二世·曼努埃利特斯 (999—1019年)	Sergios II Manuelites
尤斯塔修斯 (1019—1025年)	Eustathios
阿莱克修斯·斯图迪特 (1025—1043年)	Alexios Studites
米哈伊尔一世·科鲁拉利奥斯 (1043—1058年)	Michael I Kerullarios
君士坦丁三世·雷乎德斯 (1059—1063年)	Constantine III Leichudes
约翰八世·克西非利诺斯 (1064—1075年)	John VIII Xiphilinos
哥斯马斯一世·西尔罗索利米特斯 (1075—1081年)	Cosmas I Hierosolymites
尤斯塔修斯·加里达斯 (1081—1084年)	Eustraxios Garidas
尼古拉斯三世·基尔迪米亚特 (1084—1111年)	Nikolaos III Kyrdiniates Grammatikos
约翰九世·阿嘎配托斯 (1111—1134年)	John IX Agapetos
利奥·斯提配斯 (1134—1143年)	Leon Styppes
米哈伊尔二世·库库阿斯 (1143—1146年)	Michael II Kurkuas

哥斯马斯一世·阿提科斯 (1146—1147 年)	Cosmas II Attikos
尼古拉奥斯四世·穆阿斯伦 (1147—1151 年)	Nikolaos IV Muaslon
塞奥多托斯 (1151—1153 年)	Theodotos
奈奥非托斯一世 (1153 年)	Neophytos I
君士坦丁四世·赫里亚雷诺斯 (1154—1156 年)	Constantine IV Chliarenos
卢卡斯·赫里索斯堡 (1156—1169 年)	Lukas Chrysoberges
米哈伊尔三世 (1169—1177 年)	Michael III
哈里顿·尤吉尼奥特 (1177—1178 年)	Chariton Eugeneiotes
塞奥多西·伯拉迪奥特 (1178—1183 年)	Theodosios Boradiotes
瓦西里奥斯二世·卡马特罗斯 (1183—1187 年)	Basileios II Kamateros
尼西塔斯二世·蒙塔奈斯 (1187—1190 年)	Niketas II Muntanes
利奥提奥斯·塞奥托基特 (1190—1191 年)	Leontios Theotokites
多西塞奥斯 (1191—1192 年)	Dositheos
乔治二世·克西非利诺斯 (1192—1199 年)	Georgios II Xiphilinos
约翰十世·卡马特罗斯 (1199—1206 年)	John X Kamateros
米哈伊尔四世 (1206—1212 年)	Michael IV Autoreianos
塞奥多托斯二世·埃伦尼科斯 (1212—1215 年)	Theodoros II Eirenikos
马克西莫斯二世 (1215 年)	Maximos II
曼努埃尔·萨兰特诺斯 (1215—1222 年)	Manuel Sarantenos
日耳曼努斯二世 (1222—1240 年)	Germanos II
麦瑟迪乌斯 (1240 年)	Methodios
曼努埃尔二世 (1244—1255 年)	Manuel II
阿卡辛尼乌斯 (1255—1260 年)	Arsenios
尼基弗鲁斯二世 (1260—1261 年)	Nikephoros II
阿辛尼乌斯 (1261—1267 年)	Arsenios

曼努埃尔三世	(1267 年)	Manuel III
约瑟佛一世	(1268—1275 年)	Joseph I
约翰十一世·贝科斯	(1275—1282 年)	John XI Bekkos
约瑟佛一世(第二任期)	(1282—1283 年)	Joseph I
格里高利二世	(1283—1289 年)	Gregorios II
阿塔纳修斯一世	(1289—1293 年)	Athanasios I
约翰十二世	(1294—1303 年)	John XII
阿塔纳修斯一世(第二任期)	(1303—1311 年)	Athanasios I
奈封一世	(1311—1315 年)	Nephon I
约翰十三世·格里基斯	(1316—1320 年)	John XIII Golykys
吉拉西莫斯一世	(1320—1321 年)	Gerasimos I
杰塞亚斯	(1323—1334 年)	Jesaias
约翰十四世·阿普伦诺斯	(1334—1347 年)	John XIV Aprenos
伊塞多利一世	(1347—1349 年)	Isidoros I
卡利斯托斯一世	(1350—1354 年)	Callistos I
非罗塞乌斯	(1354—1355 年)	Philotheos
卡利斯托斯一世(第二任期)	(1355—1363 年)	Callistos I
非罗塞乌斯(第二任期)	(1364—1376 年)	Philotheos
马卡利奥斯	(1376—1379 年)	Makarios
内罗斯	(1380—1388 年)	Neilos
安东尼奥斯四世	(1389—1390 年)	Antonios IV
马卡利奥斯(第二任期)	(1390—1391 年)	Makarios
安东尼奥斯四世(第二任期)	(1391—1397 年)	Antonios IV
卡利斯托斯二世	(1397 年)	Callistos II
马泰一世	(1397—1410 年)	Matthaios I

尤非米乌斯二世	(1410—1416 年)	Euthymios II
约瑟佛二世	(1416—1439 年)	Joseph II
迈特洛法尼二世	(1440—1443 年)	Metrophanes II
格里高利三世	(1443—1450 年)	Gregorios III
阿塔纳修斯	(1450 年)	Athanasios
艮纳迪奥斯二世	(1453—1459 年)	Gennadios II Scholarios

13. 罗马(主教)教皇(314—1455 年)

西尔维斯特	(314—335 年)	Sylvester
马可	(336 年)	Mark
尤里乌斯一世	(337—352 年)	Julius I
利比里	(352—366 年)	Liberius
达马萨斯一世	(366—384 年)	Damasus I
西里修斯	(384—399 年)	Siricius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	(399—401 年)	Anastasius I
英诺森一世	(401—417 年)	Innocent I
左西莫斯	(417—418 年)	Zosimus
卜尼法斯一世	(418—422 年)	Boniface I
塞勒斯廷一世	(422—432 年)	Celestine I
塞克斯都三世	(432—440 年)	Sixtus III
利奥一世	(440—461 年)	Leo I, "The Great"
喜拉里	(461—468 年)	Hilarius
辛普利修斯	(468—483 年)	Simplicius
菲力克斯三世	(483—492 年)	Felix III
吉拉修斯一世	(492—496 年)	Gelasius I
阿纳斯塔修斯二世	(496—498 年)	Anastasius II
赛马库斯	(498—514 年)	Symmachus

约翰一世	(523—526年)	John I
菲力克斯四世	(526—530年)	Felix IV
卜尼法二世	(530—532年)	Boniface II
约翰二世	(533—535年)	John II
阿加皮图斯一世	(535—536年)	Agapetus I
西尔沃留斯	(536—537年)	Silverius
维吉里	(537—555年)	Vigilius
皮雷吉一世	(556—561年)	Pelagius I
约翰三世	(561—574年)	John III
本笃一世	(575—579年)	Benedict I
皮雷吉二世	(579—590年)	Pelagius II
格里高利一世	(590—604年)	Gregory I, "The Great"
萨比尼安	(604—606年)	Sabinianus
卜尼法三世	(607年)	Boniface III
卜尼法四世	(608—615年)	Boniface IV
迪奥达特一世	(615—618年)	Deodatus I
卜尼法五世	(619—625年)	Boniface V
霍诺留一世	(625—638年)	Honorius I
塞维林	(640年)	Severinus
约翰四世	(640—642年)	John IV
塞奥多利一世	(642—649年)	Theodore I
马丁一世	(649—655年)	Martin I
尤吉尼乌斯一世	(654—657年)	Eugenius I
维塔利安	(657—672年)	Vitalian
迪奥达特二世	(672—676年)	Deodatus II
多姆努斯一世	(676—678年)	Domnus I
阿加托	(678—681年)	Agatho
利奥二世	(682—683年)	Leo II

本笃二世	(684—685 年)	Benedict II
约翰五世	(685—686 年)	John V
科农	(686—687 年)	Conon
塞吉阿斯一世	(687—701 年)	Sergius I
约翰六世	(701—705 年)	John VI
约翰七世	(705—707 年)	John VII
西辛尼阿斯	(708 年)	Sisinnius
君士坦丁	(708—715 年)	Constantine
格里高利二世	(715—731 年)	Gregory II
格里高利三世	(731—741 年)	Gergory III
扎加利	(741—752 年)	Zacharias
斯德望二世	(752 年)	Stephen II
斯德望三世	(752—757 年)	Stephen III
保罗一世	(757—767 年)	Paul I
斯德望四世	(768—772 年)	Stephen IV
哈德良一世	(772—795 年)	Hadrian I
利奥三世	(795—816 年)	Leo III
斯德望五世	(816—817 年)	Stephen V
帕斯卡尔一世	(817—824 年)	Paschal I
尤吉尼乌斯二世	(824—827 年)	Eugenius II
瓦伦廷	(827 年)	Valentine
格里高利四世	(827—844 年)	Gregory IV
塞吉阿斯二世	(844—847 年)	Sergius II
利奥四世	(847—855 年)	Leo IV
本笃三世	(855—858 年)	Benedict III
尼古拉一世	(858—867 年)	Nicholas I
哈德良二世	(867—872 年)	Hadrian II
约翰八世	(872—882 年)	John VIII

马利纳斯一世	(882—884 年)	Marinus I
哈德良三世	(884—885 年)	Hadrian III
斯德望六世	(885—891 年)	Stephen VI
福尔摩苏斯	(891—896 年)	Formosus
卜尼法六世	(896 年)	Boniface VI
斯德望七世	(896—897 年)	Stephen VII
罗马努斯	(897 年)	Romanus
塞奥多利二世	(897 年)	Theodore II
约翰九世	(898—900 年)	John IX
本笃四世	(900—903 年)	Benedict IV
利奥五世	(903 年)	Leo V
塞吉阿斯三世	(904—911 年)	Sergius III
阿纳斯塔修斯三世	(911—913 年)	Anastasius III
兰多	(913—914 年)	Lando
约翰十世	(914—928 年)	John X
利奥六世	(928 年)	Leo VI
斯德望七世	(928—931 年)	Stephen VII
约翰十一世	(931—935 年)	John XI
利奥七世	(936—939 年)	Leo VII
斯德望九世	(939—942 年)	Stephen IX
马利纳斯二世	(942—946 年)	Marinus II
阿加皮图斯二世	(946—955 年)	Agapetus II
约翰十二世	(955—964 年)	John XII
利奥八世	(963—965 年)	Leo VIII
本笃五世	(964—966 年)	Benedict V
约翰十三世	(965—972 年)	John XIII
本笃六世	(973—974 年)	Benedict VI
本笃七世	(974—983 年)	Benedict VII

约翰十四世	(983—984 年)	John XIV
约翰十五世	(985—996 年)	John XV
格里高利五世	(996—999 年)	Gregory V
西尔维斯特二世	(999—1003 年)	Sylvester II
约翰十七世	(1003 年)	John XVII
约翰十八世	(1004—1009 年)	John XVIII
塞吉阿斯四世	(1009—1012 年)	Sergius IV
本笃八世	(1012—1024 年)	Benedict VIII
约翰十九世	(1024—1032 年)	John XIX
本笃九世(第二任期)	(1032—1044 年)	Benedict IX
西尔维斯特三世	(1045 年)	Sylvester III
本笃九世(第三任期)	(1045 年)	Benedict IX
格里高利六世	(1045—1046 年)	Gregory VI
克莱门特二世	(1046—1047 年)	Clement II
本笃九世	(1047—1048 年)	Benedict IX
达马萨斯一世	(1048 年)	Damasus II
利奥九世	(1049—1054 年)	Leo IX
维克托二世	(1055—1057 年)	Victor II
斯德望十世	(1057—1058 年)	Stephen X
本笃十世	(1058 年)	Benedict X
尼古拉二世	(1059—1061 年)	Nicholas II
亚历山大二世	(1061—1073 年)	Alexander II
格里高利七世	(1073—1085 年)	Gregory VII
乌尔班二世	(1086—1087 年)	Urban II
帕斯卡尔二世	(1099—1118 年)	Paschal II
吉拉修斯二世	(1118—1119 年)	Gelasius II
卡莱克修斯二世	(1119—1124 年)	Calixtus II
霍诺留二世	(1124—1130 年)	Honorius II

英诺森二世	(1130—1143 年)	Innocent II
凯莱斯提尼二世	(1143—1144 年)	Celestine II
卢西乌斯二世	(1144—1145 年)	Lucius II
尤吉尼乌斯三世	(1145—1153 年)	Eugenius III
阿纳斯塔修斯四世	(1153—1154 年)	Anastasius IV
哈德良四世	(1154—1159 年)	Hadrian IV
亚历山大三世	(1159—1181 年)	Alexander III
卢西乌斯三世	(1181—1185 年)	Lucius III
乌尔班三世	(1185—1187 年)	Urban III
格里高利八世	(1187 年)	Gregory VIII
克莱门特三世	(1187—1191 年)	Clement III
凯莱斯提尼三世	(1191—1198 年)	Celestine III
英诺森三世	(1198—1216 年)	Innocent III
霍诺留三世	(1216—1227 年)	Honorius III
格里高利九世	(1227—1241 年)	Gregory IX
凯莱斯提尼四世	(1241 年)	Celestine IV
英诺森四世	(1243—1254 年)	Innocent IV
亚历山大四世	(1254—1261 年)	Alexander IV
乌尔班四世	(1261—1264 年)	Urban IV
克莱门特四世	(1265—1268 年)	Clement IV
格里高利十世	(1271—1276 年)	Gregory X
英诺森五世	(1276 年)	Innocent V
哈德良五世	(1276 年)	Hadrian V
约翰二十一	(1276—1277 年)	John XXI
尼古拉三世	(1277—1280 年)	Nicholas III
马丁四世	(1281—1285 年)	Martin IV
霍诺留四世	(1285—1287 年)	Honorius IV
尼古拉四世	(1288—1292 年)	Nicholas IV

凯莱斯提尼五世	(1294 年)	Celestine V
卜尼法八世	(1294—1303 年)	Boniface VIII
本笃十一世	(1303—1304 年)	Benedict XI
克莱门特五世	(1305—1314 年)	Clement V
约翰二十二	(1316—1334 年)	John XXII
本笃十二世	(1334—1342 年)	Benedict XII
克莱门特六世	(1343—1352 年)	Clement VI
英诺森六世	(1352—1362 年)	Innocent VI
乌尔班五世	(1362—1370 年)	Urban V
格里高利十一世	(1370—1378 年)	Gregory XI
乌尔班六世	(1378—1389 年)	Urban VI
卜尼法九世	(1389—1404 年)	Boniface IX
英诺森七世	(1404—1406 年)	Innocent VII
格里高利十二世	(1406—1415 年)	Gregory XII
马丁五世	(1417—1431 年)	Martin V
尤吉尼乌斯四世	(1431—1447 年)	Eugenius IV
尼古拉五世	(1447—1455 年)	Nicholas V

14. 对立罗马教皇

君士坦丁	(767—768 年)	Constantine
腓力	(768 年)	Philip
约翰	(844 年)	John
阿纳斯塔修斯	(855 年)	Anastasius
赫里斯托佛	(903—904 年)	Christopher
卜尼法七世	(974 年)	Boniface VII
约翰十六世	(997—998 年)	John XVI
格里高利	(1012 年)	Gregory

本笃九世	(1058—1059 年)	Benedict X
霍诺留二世	(1061—1072 年)	Honorius II
克莱门特三世	(1080 年)	Clement III
塞奥多利克	(1100 年)	Theodoric
阿尔伯特	(1102 年)	Albert
西尔维斯特四世	(1105—1111 年)	Sylvester IV
格里高利八世	(1118—1121 年)	Gregory VIII
凯莱斯提尼二世	(1124 年)	Celestine II
安纳科莱图斯二世	(1130—1138 年)	Anacletus II
维克托四世	(1138 年)	Victor IV
帕斯卡尔三世	(1164—1168 年)	Paschal III
卡莱克修斯三世	(1168—1178 年)	Calixtus III
英诺森三世	(1179—1180 年)	Innocent III
尼古拉五世	(1328—1330 年)	Nicholas V
克莱门特七世	(1378—1394 年)	Clement VII
本笃十三世	(1394—1423 年)	Benedict XIII
亚历山大五世	(1409—1410 年)	Alexander V
约翰二十三	(1410—1415 年)	John XXIII
菲力克斯五世	(1439—1449 年)	Felix V

15. 俄罗斯

留里克	(862—879 年)	Rurik
伊格尔	(912—945 年)	Igor
奥尔加	(945—969 年)	Olga
斯维雅托斯拉夫	(964—972 年)	Sviatoslav I
雅罗伯克	(972—980 年)	Yaropolk I
奥列格	(972—980 年)	Oleg

弗拉基米尔	(980—1015 年)	Vladimir I
斯维雅托伯克	(1015—1019 年)	Sviatopolk I
雅罗斯拉夫	(1019—1054 年)	Yaroslav I
穆斯提斯拉夫	(1019—1036 年)	Mstislav
伊兹雅斯拉夫	(1054—1078 年)	Yziaslav I
伊塞维罗德	(1078—1093 年)	Ysevelod I
斯维雅托伯克	(1093—1113 年)	Sviatopolk II
弗拉基米尔	(1113—1125 年)	Vladimir II
穆斯提斯拉夫	(1125—1132 年)	Mstislav I
雅罗伯克	(1132—1139 年)	Yaropolk II
伊塞维罗德	(1146 年)	Ysevelod
伊格尔	(1147 年)	Igor
伊兹雅斯拉夫	(1146—1154 年)	Yziaslav II
尤里	(1154—1157 年)	Yuri Dolgoruki
安德烈一世	(1157—1175 年)	Andrei Bogoliubski
米哈伊尔	(1175—1176 年)	Michael
维塞沃罗德	(1176—1212 年)	Vsevolod III
康斯坦丁	(1216—1219 年)	Constantine
尤里	(1212—1216、1219—1238 年)	Yuri II
雅罗斯拉夫二世	(1238—1246 年)	Yaroslav II
斯维雅托伯克二世	(1246—1249 年)	Sviatopolk II
安德烈二世	(1246—1252 年)	Andrei II
亚历山大	(1252—1263 年)	Alexander
雅罗斯拉夫三世	(1263—1272 年)	Yaroslav III
瓦西里	(1272—1277 年)	Vasili
迪米特里	(1277—1294 年)	Dmitri
安德烈三世	(1294—1304 年)	Andrei III
米哈伊尔	(1304—1319 年)	Michael

尤里二世	(1319—1325 年)	Yuri II
迪米特里	(1325—1326 年)	Dmitri
亚历山大	(1326—1328 年)	Alexander
伊凡一世	(1328—1340 年)	Ivan I
西蒙	(1340—1353 年)	Simeon
伊凡二世	(1350—1359 年)	Ivan II
迪米特里	(1359—1389 年)	Dmitri
瓦西里一世	(1389—1425 年)	Vasili I
瓦西里二世	(1425—1462 年)	Vasili II
伊凡三世	(1462—1505 年)	Ivan III

16. 匈牙利

阿尔帕德	(? —907 年)	Arpad
兹索尔特	(? —947 年)	Zsolt
塔科索尼	(? —972 年)	Taksony
盖扎	(? —997 年)	Geza
斯蒂芬一世	(997—1038 年)	St Stephen I
(沙木埃尔)	(1041—1044 年)	Samuel Aba
彼得	(1038—1041—1046 年)	Peter
安德烈一世	(1047—1060 年)	Andrew I
贝拉一世	(?)	Bela I
所罗门	(1063—1074 年)	Solomon
盖扎一世	(1074—1077 年)	Geza I
拉迪斯拉斯	(1077—1095 年)	Ladislas
科罗曼	(1095—1116 年)	Coloman
斯蒂芬二世	(1116—1131 年)	Stephen II
贝拉二世	(1131—1141 年)	Bela II

盖扎二世	(1141—1161 年)	Geza II
拉迪斯拉斯二世	(1162 年)	Ladislav II
斯蒂芬三世	(1116—1173 年)	Stephen III
斯蒂芬四世	(1162—1163 年)	Stephen IV
贝拉三世	(1173—1196 年)	Bela III
埃梅里克一世	(1196—1204 年)	Emeric I
拉迪斯拉斯三世	(1204—1205 年)	Ladislav III
安德烈二世	(1205—1235 年)	Andrew II
贝拉四世	(1235—1270 年)	Bela IV
斯蒂芬五世	(1270—1272 年)	Stephen V
拉迪斯拉斯四世	(1272—1290 年)	Ladislav IV
安德烈三世	(1290—1301 年)	Andrew III
文塞斯拉斯	(1301—1304 年)	Wenceslas
查理一世	(1310—1342 年)	Charles I
路易斯	(1342—1382 年)	Louis
玛利亚	(1382—1385 年)	Maria of Anjou
查理二世	(1385—1386 年)	Charles II
西吉斯蒙特	(1387—1437 年)	Sigismund
阿尔伯特	(1437—1439 年)	Albert of Hapsburg
弗拉迪斯拉夫一世	(1440—1444 年)	Vladimir I
拉迪斯拉斯五世	(1444—1457 年)	Ladislav V
马特塞亚斯	(1458—1490 年)	Matthias Corvinus

译名对照表

阿巴斯吉亚	Abasgia
阿比杜斯	Abydus
阿波罗尼亚	Aboronia
阿伯都刺汗	Abdura
阿达加斯特	Ardagast
阿达曼提乌斯	Adamantius
阿迪安奈	Atiante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阿尔卑斯山	Alps
阿尔伯因	Alboin
阿尔达河	Arda River
阿尔哥斯	Argos
阿尔卡迪奥斯	Arkadius
阿尔卡条堡	Arcadioburg
阿尔努夫	Arnulf of Germany
阿尔帕德	Arpad
阿尔普·阿斯兰	Alp Aslan
阿尔屈安	Archian
阿尔提努姆	Artinum
阿佛罗狄忒	Aphrodite
阿富汗	Afghanistan
阿伽门农	Agamemnon

- 阿亥亚 Achaia
阿基琉斯 Achilles
阿杰托尼 Ajtony
阿卡迪亚人 Arcadian
阿卡丢堡小城 Arcadiopolis town
阿科卢维乌姆 Acruvium, 今 Kotor
阿奎利亚 Aquileia
阿拉伯人 Arab
阿拉冈 Aragorn
阿拉里克 Alaric
阿拉曼尼人 Alamanian
阿莱克修斯 Alexius
阿莱克修斯四世 Alexius IV
阿兰人 Alan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
阿里乌派 Arius
阿利阿克蒙河 Aliakmon River
阿林赛乌斯 Arsenius
阿马塞亚 Amasya
阿马斯特利城 Amastris
阿姆河 Amu River
阿内吉斯科鲁斯 Anegiscolus
阿纳多利亚 Anatolia
阿纳斯塔西亚 Anastasia
阿帕米亚 Apulia
阿齐里斯 Achilles
阿萨拉里克 Athalaric
阿萨纳里克 Athanaric

- 阿塞拉斯要塞 Acheloos fortress
阿塞亚侯国 the Principality of the Achaea
阿森 Asen
阿斯巴鲁赫 Asparuch
阿索斯 Athos
阿提卡 Attica
阿提卡半岛 Attica peninsula
阿提卡雅典人 Athenian in Attica
阿提拉 Attila
阿瓦尔人 Avar
阿维图斯 Avitus
阿尤布王朝 the Ayyoubids
埃比达姆斯 Epidaurus
埃庇洛特 Epirot
埃德萨 Edessa
埃迪尔内 Edirne
埃尔贞河 Elzen River
埃格南底亚大道 Via Egnatia
埃及 Egypt
埃提乌斯 Aetius
埃托利亚同盟 Aetolian League
埃泽利泰人 Ezeritai
爱奥尼亚海 Ionian Sea
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爱尔巴桑城 Elbasan
爱琴海 Aegean Sea
爱琴海公国 the Duchy of the Archipaelago
安德列 Andrew

- 安德烈一世 Andrew I
安德烈 Apostle Andrew
安德罗尼库斯二世 Andronicus II
安德罗尼库斯三世 Andronicus III
安东尼四世 Antony IV
安敦尼 Mark Antony
安菲波利斯 Amphipolis
安阁文人 Angevin
安格拉留斯 Angelarius
安卡拉战役 Battle of Ankara
安库斯 Ancus
安娜 Anna
安娜·科穆宁娜 Anna Comnena
安奇亚鲁斯 Anchialos
安茹的查理 Charles I of Anjou
安塞亚鲁斯 Anthialus
安特人 Antes
安提瓦利 Antibari
安条柯公国 The Princedom of Antioch
安条克人亚赫雅 Yahya of Antioch
安条克三世 Antioch III
安息(帕提亚)王国 Parthia
安夏鲁斯城 Anchialus
盎格鲁萨克逊人 Anglo - Saxon
奥伯林斯基 Obolensky
奥德里森王朝 the Auderisons
奥地利 Austria
奥多里克 Theodoric

- 奥多亚克 Odovacar
奥尔加纳 Organa
奥尔良 Orleans
奥古斯底 Augustae
奥古斯都 Augustus
奥赫里德 Ohrid
奥赫里德城 the town of Ohrid
奥勒良 Aurelianus
奥丽加 Origa
奥列格 Oleg
奥列利安 Aurelian
奥列良皇帝 Marcus Aurelius
奥林波斯山 Olympus Mount
奥林图斯 Olymtus
奥穆塔格 Omurtag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Ottoman Empire
奥松·迪·拉·利赫 Othon de La Roche
奥崧河 Othon River
奥苏姆河 Osumi River
奥特郎托海峡 Straits of Otranto
奥托伯尼 Autobonia
奥托马尼 Automania
奥托一世 Otto I
奥西耶克城 Osijek
《奥德赛》 Odyssey

八思哈(镇守官) Baskak

巴布 Babu

- 巴尔 Bar
巴尔达尼斯 Armenian Bardanes
巴尔达斯·福卡斯 Bardas Phokas
巴尔达斯·斯卡莱卢 Bardas Sclerus
巴尔干半岛 the Balkans
巴尔喀什湖 Balkhash
巴居奈特人 Baginetes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里 Bari
巴隆古山谷 Palongu Valley
巴耶札德 Bayezid
拔都 Padua
白克罗地亚 Croatia
柏严 Bayan
柏扎思 Byzans
拜尔修斯 Byerxius
保加尔人 Bulgar
保加利亚 Bulgaria
《保加利亚编年史》 Bulgarian fables
保罗派 Paul
鲍尔温 Baldwin
鲍尔温二世 Baldwin II
贝尔格莱德 Belgrade
贝拉三世 Bela III
贝雷达 Breida
贝利撒留 Belisarius
本都王国 the Kingdom of Pontus
本尼迪克特教会 Benedictines

- 本尼迪克特七世 Benedict VII
比莱夫斯 Pireas
比利牛斯 Pyrenean
比萨 Pisa
比萨拉比亚 Bessarabia
比托尔杰 Bitolj
彼得 Apostle Peter
彼得 Peter
彼得 Peter of Serbia
彼得 Peter the Hermit
彼得·德尔严 Peter Delyan
彼得·特里布诺 Peter Tribunos
彼拉图斯(即彼拉多) Pirates
彼特罗纳斯·卡马特鲁斯 Petronas Camaterus
彼特罗三世 Peter, or Pedro III
庇西斯特拉图 Peisistratus
别尔克 Berke
别拉什尼察山 Belašica Mountains
别伦 Perun
波夫伦山 Powlun Montain
波河 Po
波兰 Poland
波罗的海 Baltic Sea
波诺尼亚(维丁) Bononia
波斯那河 Bosns River
波斯尼亚 Bosnia
波斯人 Persian
波希米亚 Bohemia

- 伯赫蒙德 Buhemond
伯里克利 Pericles
伯利斯二世 Boris II
伯利斯一世 Boris I
伯利沃杰 Borivoj
伯罗奔尼撒半岛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军区 the Theme of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同盟 Peloponnese League
伯努斯 Bonus
伯泽特人 Bozetes
“伯格米” Bogomilism
勃艮第人 Burgundian
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horus
博斯普鲁斯王国 the Kingdom of Bosphorus
布尔加斯港 the Gulf of Bulgas
布拉格 Prague
布拉尼米尔 Branimir
布拉奇岛 Brac̃ Island
布利比斯塔 Burebista
布林奈的约翰 John of Brienne
布鲁萨 Burussa
布鲁图 Marcus Junius Brutus
布匿战争 the Battle of Buni
布瑞 Bury
布希考特 尤基尼乌斯 Eugenius IV

查赫鲁尼人 Zachluni
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

- 查理大帝 Charlemage
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查士丁尼 Justinian
查士丁尼二世 Justinian II
查士丁一世 Justin I
查斯拉夫 Caslav
“查士丁尼瘟疫” the Justinian Plague
察尔西顿城 the Town of Chalcedon
长安 Changan
车尔尼戈夫 Chernigov
车绳城 Cherson
楚德人 Chud
- 达巴尔谷地 the Valley of Dabar
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
达尔达尼亚 Daldania
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军区 Dalmatian Theme
达吉亚 Dacia
达里耶卡湾 the Gulf of Darijeka
达米安 Damian
大卡佩拉山 the Grand Cappella Mountains
大马士革人约翰 John of Damascus
大摩拉瓦河 the Grand Morava River
大卫一世 David
大西洋 Atlantic
大夏 Balkh
“大族番” Grand Zupans

- 代沃度斯城 the town of Develtus
代沃里河 Devolli River
戴克莱安人 Diocleians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戴修斯 Decius
丹德罗 Dandolo
丹尼尔 Daniel
德坚 Dejan
德拉瓦河 Drava River
德里纳河 Drina River
德利兹派拉城 Drizpira
德列夫里安人 Drevrian
德林河 Drin River
德罗古比特人 Drogubites
德罗米亥迪斯 Doromichides
德罗斯托隆 Dorostolon
德涅斯特河 Dniester River
德维纳河 Dvina River
德乌塔 Teuta
德意志 Germany
迪拉修姆城 Dyrrachium
迪拉修姆军区 the Theme of Dyrrachium
迪拉修姆平原 the Plain of Dyrrachium
迪米特里 Demetrius
迪米特里 Demetrius Cydones
迪米特里·奥伯林斯基 Demetrius Obolensky
迪米特里大公 the Grand Duke of Demetrius
迪纳拉山脉 Dinaric Mountains

- 迪奥克利 Dioclea
底比斯 Thebes
底格里斯河 Tigris River
地拉那 Drana
第纳尔 Dinar
第聂伯河 Dnieper River
蒂雷城 Tiry
蒂萨河 Tisza
东地中海 East Mediterranean Sea
东哥特人 Ostrogoth
东罗马帝国(也称作拜占廷帝国) Eastern Roman Empire (Byzantine Empire)
窦宪 Douxian
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
杜卡斯 Ducas
杜克加尼 Duccani
顿德查河 Dondecha River
顿河 the Don River
多布罗加 Dobrudja
多利安人 Dorian
多利斯托隆 Doristolon
多瑙河 Danube

俄罗斯 Russia
恩卡莱耶 Enkomia
恩拉沃塔斯 Enravotas

法蒂玛 Fatimid

- 法兰德尔伯爵鲍尔温 Baldwin of Flanders
法兰克人 Frank
凡纳格利亚城 Phanagoria
非洲 Africa
菲里比科斯 Philippikos
菲利吉亚 Phrygia
菲利普二世 Philip
菲利普五世 Philip
菲洛卡利斯 Philokales
腓力普堡 Philippopolis
腓立比 Philippi
腓尼基 Phenicia
腓特烈·巴巴罗萨 Friedrich Barbarossa
费尔哲湖 Pherzo Lake
芬兰乌戈尔人 Finland - Ugrian
佛拉维塔 Fravitta
佛里提格恩 Fritigern
佛罗伦萨 Florence
弗拉迪斯拉夫 Vladislav III Jagello
弗拉迪斯拉夫 Vladislav
弗拉基米尔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 Vradimir
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 Vladimir Monomakh
弗拉基米尔克 Vladimirk of Galicia
弗拉尼察山 Vlanica Mountains
弗拉斯迪米尔 Vlastimir
弗塞维沃罗德一世 Vsevelod I
弗条斯 Photios

伏尔加河 Volga River
伏尔塔瓦河 Vltava River
福卡斯 Phocas

伽利埃努斯 Gallienus
盖那斯 Gainas
盖塞里克 Gaiseric
盖扎 Geza
盖扎二世 Geza II
高加索山脉 Caucasus
高卢 Gaul
《高卢战记》 Gallic War
戈尔狄亚努斯 Gordianus
戈利亚山 Goliath Mountains
哥达斯 Gordas
哥拉兹德 Gorazd
哥林多 corinth
哥斯马斯 Cosmas
哥特人 Goth
格庇德人 Gepid
格利高里七世 Gregory VII
格利高里十世 Gregory X
格列布 Gleb
格鲁吉亚 Georgia
古德温 Gudwin
贵于拉 Gyula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s dynasty

- 哈德良 Hadrianus
哈拉尔德 Harald
哈里发 Caliph
哈里基第基半岛,
哈罗尔德 Harold
哈扎尔人 Khazars
海伦 Helen
海伦娜 Helena
海洛塞乌斯 Hierotheus
《汉书》 Han Shu
汉尼拔 Hannibal
荷马 Homer
《荷马史诗》 Homeric Epic
赫尔曼里克 Hermanric
赫尔松 Kherson
赫拉 Hera
赫里索堡
赫力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 Hellespont Strait (Dardanelles Strait)
赫瓦尔岛 Hval Island
黑海 Black Sea
黑米蒙都省 Haemimontus
黑姆斯山 Haemus Mountains
黑塞哥维那 Hercegovina
黑山 Black Hills
黑山 - - 尼什道 Black Hills - Nis
亨利六世 Henry VI
亨利一世 Henry I
呼喇珊 Khorasan

- 胡尼亚迪 Hunyadi
霍诺里乌斯 Honorius
- 基督教 Christianity
基辅 Kiev
基克拉底斯 Cyclades
基索斯山脉 Kisos Mountains
基托 Kitto
基乌斯城 Gyus
吉庇德人 Gepids
吉普塞人 Gypsy
吉维尔人 Gyverian
加百利 Gabriel
加伯莱尔 Gabriel
加拉大 Galata
加里波利半岛 Gallipoli Island
加里伯利要塞 Gallipoli
加里克斯河 Garriques River
加里西亚 Galicia
加洛林帝国 Carolingian Empire
加佩王朝 Capet Dynasty
迦太基 Carthage
杰拉德 St. Gerard of Csanad
杰罗姆 St. Jerome
杰扎 Geza
捷克 Czech
金帐汗 Antin
金帐汗国 Antin orda

“金角湾” Golden Horn

“金门” Golden Gate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

君士坦丁·伯丁 Constantine Bodin

君士坦丁·提奇 Constantine Tich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九世·蒙诺马毫斯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

君士坦丁七世 Constantine Porphyrogenetos

君士坦丁四世 Constantine IV

君士坦丁五世 Constantine V

君士坦二世 Constans II

君士坦斯二世 Constans II

喀尔巴阡山 Carpathian Mountains

卡杜查特 Kardutsat

卡尔卡河 Carca River

卡法 Caffa

卡拉万克山 Carevac Mountains

卡里斯图斯 Callistus

卡罗严 Kaloyan

卡罗赞 Kalojan

卡纳利特人 Kanalites

卡尼尔奥拉(或称克兰) Carniola

卡帕提亚 Carpathia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卡桑德拉 Cassandra

卡斯图斯 Castus

卡斯托利亚 Castoria

- 卡塔罗 Catalo
卡西约 Gaius Cassius Longinus
凯尔特人 Celt
凯法利尼亚军区 the Theme of Kefallinia
康波纳 Conpona
康查亚河 Conchaia River
康科第亚 Concordia
康拉德三世 Conrad III
科尔丘拉岛 Korcula
科尔特内的彼得 Peter of Courtenay
科夫拉特 Kovrat
科浮岛 Cofu
科根 Kegen
科里库斯 Cricus
科利德罗(今科扎尼) Kozóni.
科林斯地峡 Corinth
科鲁姆国王 Krum
科鲁亚城 Kroja
科门条鲁斯 Comentiolus
科穆宁王朝 Comneni Dynasty
科乃里乌斯·弗斯库斯 Cornelius Fuscus
科索沃 Kosovo
科托尔 Kotor
克拉布尔 Khrabr
克拉苏 Crassus
克莱第翁隘口 the Pass of Cletivon
克莱蒙特 Clement
克劳狄 Claudius

克里奥帕特拉 Cleopatra VII

克里米亚 Crimea

克里斯普斯 Crispus

克里特岛 Crete

克里维奇人 Cryvician

克里亚斯 Colias

克利斯提尼 Cleisthenes

克鲁卡斯 Klukas

克罗地亚 Croatia

克罗曼 Koloman

克门条罗斯 Komentiolos

克尼瓦 Cniva

克诺索斯 Cnossus

“克拉尔” Kral

刻赤海峡 Kerch Straits

库班河 Kuban

库曼人 Kumans

库帕河 Kupa River

库特里格斯人 Kutrigurs

昆尼蒙德 Cunimund

拉迪斯拉斯一世 Ladislas I

拉丁帝国 Latin Empire

拉多米尔 Gabriel Radomir

拉古萨城 Ragusa

拉凯戴孟人 Lacedaemonian

拉里萨 Larisa

拉斯迪蒙尼人 Lacedaemonians

- 拉斯迪斯拉夫 Rastislav
拉斯卡 Lascar
拉斯特科 Rastko
拉提亚利亚
拉文纳 Ravenna
莱斯伯斯岛 Lesbos
莱茵河 Rhine
兰普萨库斯 Lampsacus
劳迪亚斯河 Laudius River
劳伦斯 Laurence
老山 Lausiae
“老大保加利亚” the Old Great Bulgaria
勒斯非尔德 Lespherd
雷根斯堡 Regensburg
雷提亚 Rytia
李库尔古斯 Licoercus
李锡尼 Licinius.
里昂 Lyons
里海 the Caspian Sea
里拉山 Lira Mountains
的里雅斯特湾 Trieste
利昂提奥斯 Leontios
利奥 Leo I
利奥·赫埃罗斯发克特 Leo Choerosphaktes
利奥六世 Leo VI
利奥三世 Leo III
利奥五世 Leo Armenian
利姆河 Lim River

- 列沙茨岛 Lesaz
留德维特 Ljudevit
留里克 Ruric
卢卡斯·诺塔拉斯 Lucas
卢瓦尔河 Loire
鲁庇西努斯 Lupicinus
鲁非努斯 Rufinus
鲁吉拉 Rugila
路德米拉 Ludmila
路易七世 Louis VII
伦巴底人 Lombard
罗伯特 Robert
罗伯特一世 Robert I
罗得岛 Rhode Island
罗德彼山脉 Rhodope
罗克舍拉尼人 Rocseranian
罗马 Rome
罗马尼亚 Romania
罗曼努斯二世 Romanus II
罗曼努斯一世 Romanus I
罗姆 Rum
罗穆洛 Romulo
罗斯河 Ross river
罗斯人 Russian
罗斯提斯拉夫 Rostislav
罗维尼平原 Rovene

马丁 Martin

- 马丁四世 Martin IV
马尔古斯 Margus
马尔马拉海 Marmara
马尔西安 Marxian
马尔西安堡 Marxianburg
马尔西安努堡(今保加利亚 Prebislaw)
马格利特 Margaret
马格尼亚 Magonia
马古斯 Marcus
马克西米安 Maximilian
马克西姆斯 Maximus
马克辛迪乌斯 maxentius
马库 Maku
马库斯·奥理略 Marcus Aurelius
马拉拉斯 Malalas
马拉米尔 Malamir
马里卡战役 the Battle of Malika
马利亚 Maria
马连山 Maalan Mountian
马罗斯瓦尔 Marosvár
马木路克王朝 Mamluk Dynasty
马其顿 Macedon
马其顿军区 the Theme of Macedon
马撒格提 Massagetius
马特河 Matt River
马提努斯 Martinus
马扎尔人 Magyars
迈奥底斯 Maodes

- 迈里奥塞法隆战役 Battle of Myriocephalon
迈林格人 Melingoi
迈森尼人 Messenians
迈锡尼 Mycenae
迈锡尼人 Mycenaean
麦利迪尼 Melitene
麦良人 Melingoi
麦尼克 Melnik
麦瑟迪乌斯 Methodios
麦森布里亚 Mesembria
曼努埃尔 Manuel
曼努埃尔·科穆宁 Manuel Comnenus
曼努埃尔一世 Manuel I
曼努斯四世·迪奥格尼斯 Romanus IV Diogenes
曼兹克特战役 Battle of Manzikert
梅里奇河 Marich River
梅利克沙 Malikshah
梅南德 Menander
美西亚 Moesia
蒙古人 Mongol
蒙南瓦西亚 Monemvasia
蒙太奥鲁 Monteaolus
蒙特菲拉特公爵伯尼法斯 Boniface of Montferret
蒙特内哥罗人 Montenegro
米底人 Media
米尔弥冬人 Mermitiones
米哈伊尔 Michael Ahgelos Comnenos
米哈伊尔 Michael Choniate

- 米哈伊尔·安直利 Michael Anglius
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 Michael Choniates
米哈伊尔·西斯曼 Michael Sisman
米哈伊尔八世 Michael VIII
米哈伊尔三世 Michael III
米哈伊尔四世 Michael IV
米哈伊尔一世 Michael Rangabe
米加勒 Michael
米兰 Milan
米鲁廷(Stephen Uros II Milutin), 12
米诺斯 Minos
米斯拉夫 Mislav
米斯特拉城堡 Mistra
米特拉达梯六世 Mithradates VI
米特拉达梯五世 Mithradates V
米西安 Mysian
《米兰敕令》 the Milan Edict
缪里德汗 Muerid
摩尔达维亚 Moldavia
摩拉维亚人 Moldavian
莫埃思亚地区 Moesia
莫哥来那 Mogorena
莫杰米尔 Mojmir
莫里斯 Maurice
莫利亚 Morea
莫森诺堡 Mosynopolis
莫斯科 Moscow
墨涅拉奥斯 Menelaus

姆列特岛 Mljet

姆斯提斯拉夫 Mstislav

穆罕默德二世 Mohammed II

穆萨拉蜂 Musala

穆斯林阿訇 Muslem Imam

.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内韦西涅平原 Nevesinje

纳尔西斯 Narses

纳兰塔河 Narenta

纳伦塔尼人 Narentani

纳乌姆 Naum

奈斯多斯海湾 the Gulf of Nestos

奈苏斯 Naissus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瑙洛巴图斯 Naupactus

尼布尔 Barthold Georg Niebuhr

尼古拉斯 Nicholas Mysticus

尼古拉斯 Nicholas

尼古拉斯三世 Nicholas III

尼古拉斯一世 Nicholas I

尼基弗鲁斯 Nicephorus

尼基弗鲁斯·科西菲亚斯 Nicephorus Xiphias

尼基弗鲁斯二世 Nikephoros II

尼基乌 Nikeus

尼科堡 Nikopolis

尼科堡军区 the Theme of Nikopolis

尼科堡战役 the Battle of Nikopolis

- 尼科米底亚 Nicomedia
 尼禄 Niro
 尼姆菲条约 the Treaty of Nymphaeum
 尼什 Niš
 尼西亚 Nicaea
 《尼西亚信经》 Nicaean Creed
 尼西亚帝国 Nicaean Empire
 尼亚波利 Nikopolis
 涅门河 Neman River
 涅斯托尔 Nestor
 聂斯脱利派 Nestorians
 《农业法》 Farmers Law
 努法鲁 Nufărul
 挪威 Norway
 诺夫哥罗德 Novgorod
 诺里基人 Norichy
 诺里库姆 Noricum.
 诺曼人 Norman
 诺瓦 Nova
 诺瓦埃 Novae
 诺维奥顿努 Noviodunum
 诺维帕扎尔 Novi Pazar
 诺亚 Noah

 欧罗巴 Europa
 欧诺古尔人 Onogurs
 欧塞缪斯 Euthymius

- 帕迪亚 Padua
帕拉格尼亚 Paragonia
帕里斯 Paris
帕里斯特隆军区 the Theme of Paristrion
帕列奥列格 Palaeplogus
帕列奥列格王朝 Palaeplogian Dynasty
帕米尔山口 the Pass of Pamir
帕特罗克洛斯 Patroclus
帕维亚 Pavia
潘臣涅格人 Pechenegs
潘诺尼亚 Pannonia
庞培 Pompeii
佩拉 Pera
佩拉斯吉人 Pelasgi
佩琉斯 Peleus
喷赤河 Pandj River
皮罗斯卡 Piroška
皮提乌斯 Pitius
皮瓦河 Piva River
品都斯山脉 Pindus
普里阿摩斯
普里来普 Prilep
普里斯卡 Puliska
普里斯科斯 Priskos
普里斯拉夫 Preslav
普里斯帕湖 Plespa Lake
普里兹伦 Prizren
普林尼 Plinius

普罗夫迪夫 Plovdiv

普罗柯比 Procopius

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普罗尼亚” pronia

契恰里亚山 Chiaria Mountian

虔诚者·路易 Louis the Pious

乔尔达尼斯 Geordanes

乔浮利·迪·威利哈冬 Villehardouin

乔万尼·贵斯亭尼安尼 Giovni Guistiniani

乔治 George Choeroboscus

乔治·巴尔什奇 George Balsic

乔治·布兰科维奇 George Brankovic

乔治亚王国 the Georgia Kingdom

乔治一世·特尔特尔 George I Terter

热那亚 Genoa

日耳曼 German

《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日耳曼路易 Louis the German

瑞典 Sweden

撒布伦特战役 the Battle of Sabrunt

撒丁岛 Sardinia

萨尔马提亚人 Sarmatian

撒马尔罕 Samarkand

萨比努斯 Oppous Sabinus

萨尔河 Saar

- 萨尔底卡(今索非亚) Sardica(Sofia)
萨古达特人 Sagudates
萨克森 Saxony
萨拉丁 Salah al - Din Yusuf ibn Aiyub
萨拉森 Sarazen
萨利塞斯战役 the Battle of Sarithes
萨洛尼卡王国 the Thessalonica Kingdom
萨满教 Shamanism
萨莫斯岛 Samos
萨图尔尼努斯 Saturninus
萨瓦河 Sava
萨维安 Salvian
塞奥迪米尔 Theodemir
塞奥多里克 Theodoric
塞奥多利 Theodore Daphnopates
塞奥多利·麦托西迪斯 Theodore Metochites
塞奥多利·斯维托斯拉夫 Theodore Svetoslav
塞奥多利二世 Theodore II Lascaris
塞奥多西一世皇帝 Theodosius
塞奥发尼斯 Theophanes
塞奥发诺 Theophano
塞奥非拉克特 Theophylact Lecapenus
塞奥非鲁斯 Theophilus
塞奥菲拉克特 Theophylact
塞尔迪亚 Seldea
塞尔吉乌斯 Sergius
塞尔里斯 Serres
塞尔柱人 Seljuk

- 塞尔柱突厥人 Seljuk Turks
塞里斯 Serres
塞利姆一世 Selim I
塞林布里亚 Selymbria
塞琉古 Seleucus
塞浦路斯 Cyprus
塞普里安 Cyprian
塞萨利 Thessaly
塞萨洛尼基 Thessaloniki
塞萨洛尼基军区 the Theme of Thessaloniki
塞纳河 the Seine
塞维利人 Severi
塞维鲁 Septimius Severus
色雷斯 Thrace
色雷斯军区 the Theme of Thrace
沙赫尔·巴兹 Shahr Barz
沙木埃尔 Samuel
珊蒂赫尔 Sandichl
神圣罗马帝国 Holy Roman Empire
圣阿纳斯塔修斯 St. Athanasius
圣潘特雷蒙 St. Panteleimon
圣马可教堂 St. Mark
圣乔治 St. George
圣索非亚教堂 St. Sofia
圣温西斯拉斯 Wenceslas
什昆比尼河 Shkumbin
什普卡山口 the Pass of Shipka
士瓦本的非利浦 Philip of Swabia

《史记》 Shih Chi

舒马瓦山 Summava Mountians

舒门 Sumen

舒特湾(即金角湾) the Gulf of Shute

斯巴达 Sparta

斯巴达克起义 Spartacus' Uprising

斯蒂芬 Stephen

斯蒂芬·杜珊 Stefan Uros Dusan

斯蒂芬·奈曼加 Stephen Nemanja

斯蒂芬·沃杰斯拉夫 Stephen Vojislav

斯蒂芬·乌罗斯 Stephan Uros V

斯蒂芬三世 Stefan Uros Decanski

斯基泰(西徐亚) Scyth

斯基泰人 Scythians

斯卡德拉 Skadar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Scandinavian Peninsula

斯坎德培 Skanderbeg

斯科普里 Skopje

斯科拉文尼人 Sclavinia

斯库台湖 Scutari Lake

斯拉德那山 Sratena Mountians

斯洛伐克 Slovakia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人 Slovene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斯帕拉顿 Spalatum

斯塔拉山脉 Stara Mountains

斯特拉波 Strabo

- 斯特利蒙军区 the Theme of Strymon
斯特里亚纳河 Stryana River
斯特利蒙河 Strymon River
斯提里克 Stilicho
斯瓦托布鲁克 Svatopluk
斯维雅托波克 Sviyabok
斯维雅托斯拉夫 Svyatoslav
苏埃里德 Suerid
苏格底亚纳大平原 the Grand Plain of Sogdiana
苏拉 Sura
苏莱曼 Suleyman Ibn Kutulmus
苏莱曼大帝 the Great Suleyman
苏齐城 Such
梭伦 Solon
索查河 Soea River
索代亚 Sotea
索格底亚那人 Sogdian
- 塔拉河 Tara River
塔隆尼狄斯 Taronites
塔马塔尔查 Tamatarcha
塔拉 Tara
塔西佗 Tacitus
泰伊 Teil
汤普逊 Thompson
唐朝 the Tang Dynasty
陶兰特 Torant
忒提斯 Thetis

- 特布尼奥特人 Terbouniotes
特尔迈克斯 Termacs
特尔诺沃·赫里苏斯 Trnovo Chrysus
特耳维尔 Tervel
特拉布宗 Trebizon
特拉古流姆 Tragurium
特拉沃尼 Travunija
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a
特雷比涅 Trebinje
特雷克河 Terek
特里斯 Trice
特利亚狄察(今斯特鲁加) Triadicha
特洛伊人 Dardan
提比略 Tiberius
提比斯 Tibbetts
提佛斯 Typhos
提拉赫 Tyrach
提洛同盟 Delian League
提莫克河 Timok River
提斯查河 Tisza River
突厥人 Turk
图尔恰县 Tulcea
图拉真 Trajan
图路斯 Tulus
土耳其 Turkey
吐尔克撒什 Tourxath
托伯尼察河
托尔钦 Tolchin

- 托勒密 Ptolemy
托马斯 Thomas
托马斯·莫罗西尼 Thomas Morosini
托马伊 Thomais
托米斯拉夫 Tomislav
- 瓦尔达河 Vardar River
瓦尔纳 Varna
瓦尔纳战役 the Battle of Varna
瓦尔特 Warter
瓦吉克 Vajk
瓦卡雷尔山口 the Pass of Vacar
瓦拉米尔 Walamir
瓦拉西察山口 the Pass of Wallachia
瓦莱利安 Walerian
瓦兰吉亚人 Vallangian
瓦勒利阿努斯 Valerianus
瓦勒良 Valerianus
瓦伦斯 Valens
瓦伦提尼安 Valentinianus II
瓦伦提努斯 Valentinus
瓦罗纳 Verona
瓦塔基斯 Vatatzes
瓦西里 Basil
瓦西里·利卡潘努斯 Basil Lecapenus
瓦西里二世 Basil II
瓦西里卡 Basilica
瓦西里库斯 Basiliscus

- 瓦西里一世 Basil I of Moscow
瓦西里一世 Basil I
瓦西列夫 Vassiliev
瓦兹河 Oise
汪达尔人 Vandal
《往年纪事》 Нестор: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威廉 William
威尼斯 Venice
韦莱比特山脉 Velebit Mountains
韦斯帕芑 Vespasian
维奥蒂亚 Viotia
维德米尔 Widemir
维尔巴斯河 Vrbas River
维尔布兹德 Boeotian
维尔西亚(今韦里亚) Wercia
维克多 Victor -
维雷吉泽特人 Wirycizotes
维里巴尔德 Willibald
维洛伊亚 Wallachia
维明纳修 Wimimnaxium
维奈塞人 Winetes
维塞梅尔 Withimer
维斯杜拉河 Vistula
维塔利安 Vitalian
维腾堡 Wittenberg
维托拉 Witoelar
维卓塞河 Wizoth River
温泉关 Thermopylae

- 窝狄纳 Udbina
窝马亚王朝 Umayyads
沃洛斯 Voles
沃伊斯拉夫 Voislav Diokletianos
乌恩非尔德人 Unpherdes
乌尔班 Urban
乌尔班五世 Urban V
乌尔德斯 Hurdes
乌尔非拉 Ulfila
乌果尔人 Ugric
乌卡辛 Vukasin
乌克兰 Ukraine
乌拉尔河 Ural
乌拉赫斯人 Vlachs
乌那河 Una River
乌乃提西 - - 土木鲁斯
乌皮人 Upi
乌提格尔人 Utigurs
乌图斯河 Utus River
乌泽人 Uze
乌寨斯人 Uzes
屋大维 Octavian
- 西班牙 Spain
西伯利亚 Siberia
西尔布迪乌斯 Chilbudiu
西尔缪姆 Sirmium
西尔兹布尔 Silzibul

- 西哥特人 Visigoths
西吉斯蒙特 Sigismund
西卡达尔 Skadar
西里斯特拉 Silistra
西里斯特利亚 Silistria
西里西亚 Silesia
西蒙 Symeon of Bulgaria
西蒙·乌罗斯 Symeon Uros
西奈修斯 Synesius
西诺塞发利战役 the Battle of Synothephare
西塔尔西斯 Sitalces
西突厥 Western Turkic
西西里岛 sicily
“西西里晚祷” Sicilian Vespers
西兹库斯 Cyzicus
希伯莱人 Hebrew
希腊 Greece
“希腊火” Greek Fire
希腊军区 the Theme of Greek
希利尔 Cyril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希沙木 Hisham
锡尔河 Syr Darya
锡尼亚耶维纳山
鲜卑 Sibiraea
威海 Aral Sea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谢尔维乌斯·图里乌斯 Servius Turius

- 辛菲罗波尔 Symphiroper
 辛吉东农城 Symgitonum
 辛迈利安人 Symerian
 欣基顿努(即贝尔格莱德) Symcidumnus
 匈奴人 Hun
 匈奴乌戈尔人 Hun - Ugrian
 匈牙利 Hungary
 休斯岛 Chios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旭烈兀 Hulegu
 叙利亚 Syria
 雪莱 Shelley
- 雅典和提比斯公国 the Athens and Tibbetts Lordship
 雅典娜 Athena
 雅弗 Japheth
 雅罗斯拉夫 Yaroslav
 亚得里亚堡 Adrianople
 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
 亚历山德鲁波利斯
 亚美尼亚 Armenia
 亚平宁山脉 Apennine
 亚速海 Azov
 杨特拉河 Yantra River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路撒冷王国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耶稣 Jesu
 哪哒人 Ephthalite

- 伊奥纳 Iona
伊奥尼亚 Ionia
伊奥尼亚人 Ionian
伊庇鲁斯 Epirus
伊尔门湖 Ilmen, Lake.
伊凡·亚森三世 Ivan Asen III
伊凡四世 Ivan IV
伊凡一世 Ivan I
伊戈尔 Igor
伊格纳条斯 Igonatios
伊拉克雷城 Heraclea
伊拉克略一世 Herakleios I
伊拉隆 Hilarion
伊犁河 Ili River
伊丽莎白 Elizabeth
伊利里亚 Illyria
伊琳尼 Irene
伊梅留斯 Admiral Himerius
伊塞多利 Isidore of Seville
伊斯赫姆河 Isichom River
伊斯科罗斯坦 Iscorostan
伊斯卡尔河 Iskar River
伊斯兰教 Islam
伊斯特尔河 Ister
伊提尔 Itier
伊瓦杰罗 Ivajlo
伊西多利 Isidore
伊兹雅斯拉夫 Izyaslav II

- 《伊利亚特》 Iliad
依沙克二世·伊凡科 Isaac II Ivanko
依沙克二世 Isaac II
依斯提普 Istipus
依亚德 Iader
以弗所 Ephesus
易北河 Elbe
意大利 Italy
英格兰 England
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尤多西亚 Eudoxia
尤赫里乌斯 Eucherius
尤里 Yury Dolgoruky
尤斯塔修斯 Eustathius Maleinus
尤特罗比乌斯 Eutropius
犹太教拉比 Rabbi
犹太人 Jew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约翰 John the Exarch
约翰 John the Orphanotrophus
约翰 St. John of Gothia
约翰·凡·安特维尔普 John Van
约翰·弗拉迪斯拉夫 John Vladislav
约翰·赫里索斯托姆 St. John Chrysostom
约翰·洪亚迪 John Hunyadi
约翰·库尔库阿斯 John Kourkougas
约翰·瓦塔基斯皇帝 John III
约翰·亚历山大 John Alexander

- 约翰·亚森二世 John Asen II
约翰八世 John VIII
约翰六世 John VI
约翰尼 Johannes
约翰一世 John I
约瑟芬·乌尔罕 Josephine Orkhan
- 宰塔 Zeta
赞塔道 Zanta Road
泽诺 Zeno
扎巴尔干 Zabergan
扎尔莫西斯 Zalmoxis
扎哈里亚斯 Zacharias
扎赫鲁米亚 Zachlunia
扎赫伦人 Zachlumian
扎科尼克 Zacroni
中亚 Central Asia
宙斯 Zeus
朱丽亚 Julia Domna
朱利安 Julianus
朱利乌斯 Julius
朱利乌斯·凯撒 Julius Caesar
兹德斯拉夫 Zdeslav
兹拉蒂博尔山
兹拉塔尔山 Zlatar
《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邹伊 Zoe
“祖番” Župan
左西莫斯 Zosimus

后 记

《巴尔干古代史》终于脱稿了，笔者确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说如释重负，不是因为解脱了项目规定的完成时限的压力。我是搞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在此期间，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教学中，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心头。拜占廷这个千余年的中古帝国究竟对欧洲的历史特别是对东欧的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人们通常所说的“拜占廷遗产”是否只是指拜占廷的文化？还有其他的什么吗？换言之，我们今天在谈论拜占廷帝国的影响时，难道只是局限在对其镶嵌画、建筑风格、圣像、文史哲著作方面吗？我的直觉认为，如果观察的角度变换一下或者视野更放大些，也许从这些问题中会有新的发现和领悟。恰好我在2000年以后先后承接了国家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的的项目，使我能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但是，深入其中方知难度之大。我不仅必须调动近20年对拜占廷帝国研究的知识储备，还要寻觅我有限知识库以外的知识，同时更要深入思考一些巴尔干的“历史之谜”。是的，巴尔干半岛这个狭小而多山的空间有许多令人费解的难题。好在各级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单位和南开大学教师管理单位为我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使我能够不去过多地考虑完成的时间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为弄清了一个史实而高兴，常常为从一个个史实中领悟出某些自认为有点“见地”的想法而自鸣得意。做学问是很苦，但是也有无穷的乐趣。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政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良好的契机，几年来我因此得到多次出国的机会，使我在本次研究工作中能够借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雅典大学、墨尔本大学、希腊国家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图

书馆。仅以哈佛大学拜占廷研究中心的图书馆为例,那里藏有全部拜占廷研究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提供最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和生活条件,特别是那台高级图书资料扫描机使我从容地将我需要的500本书籍全部转化为数据资料,这些资料成为我从事研究的主要基础。我从中也看明白了“国际一流”和“国内一流”在理解上的巨大差距。当本研究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大体找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在本书“总结”中概括出来的几点。当然,细心的读者会在本书封面“手稿”书影中发现最后一句话,那是不便印成铅字的,但却是我对于这个课题六年来研究的“一句话心得”。

在此对所有给予我帮助的学界同仁表示感谢,对本书的责任编辑马燕和对本书进行译名校对的李秀玲同学表示感谢,特别衷心感谢范曾先生对“南开史学家论丛”出版的大力支持。

2007年3月15日于南开园